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哲学与宗教系列

世界宗教

（第二版）

WORLD RELIGIONS

〔英〕尼尼安·斯马特 著
高师宁 金 泽 朱明忠 等译
高师宁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作者简介：尼尼安·斯马特（Ninian Smart，1927–2001），兰开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和圣塔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宗教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宗教研究之父"。斯马特教授的研究涉及不同领域，有二十多部著作，其中包括《理性与信仰》（*Reasons and Faiths*）、《毛泽东》（*Mao*）、《世界观》（*Worldview*）、《佛教与基督教：对抗与结盟》（*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Rivals and Allies*）。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世界宗教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是一本备受欢迎的畅销书。本书以世界历史为背景，从伦理、礼仪、叙事或神话、经验、制度、教义以及艺术等七个层面，对世界诸宗教进行了考查。本书第一部分追溯了诸宗教从古代世界的传统中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第二部分考查了文艺复兴以及西方征服和地理大发现之后，信仰与文化的嬗变。

本书评价：作者极其清晰地阐明了从精灵崇拜到禅宗等不同的主题，以简明而精确的形式描述了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材料……作为了解世界宗教之纷繁多样性的一本精彩且具可读性的入门书，没有其他书能够与之匹敌。

——[illegible]，《月刊》（The Month）

材料翔实，涉及面广，文笔明白晓畅，插图丰富多彩，在每一种意义上这都是一部优美的作品。它体现了作者文字生涯的最高成就。

——[illegible]，《教会时代》（Church Times）

这样一部著作出于一人之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illegible]》（The [illegible]）

未名译库

ISBN 7-301-06707-0
9 787301 067079 >

责任编辑：游冠辉
封面设计：山　人
ISBN 7-301-06707-0/B·0266
定　价：40.00元

末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世界宗教

World Religions

（第二版）

〔英〕尼尼安·斯马特 著
高师宁 金 泽 朱明忠 等译
高师宁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3-856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宗教/[英]斯马特著;高师宁　金泽　朱明忠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未名译库·哲学与宗教系列)

ISBN 7-301-06707-0

Ⅰ.斯…　Ⅱ.①高…②金…③朱…　Ⅲ.宗教-研究-世界　Ⅳ.B9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465 号

©1989,1998 Ninian Smart

Translation ©2003 Logos & Pneuma Press

This book was designed and produced by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London

本书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书　　名:世界宗教

著作责任者:[英]尼尼安·斯马特　著　高师宁　等译

责任编辑:游冠辉

标准书号:ISBN 7-301-06707-0/B·0266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22.25 印张　64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

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100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基督教文化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能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第二版前言

这本书需要修订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解体，以及摆脱了俄国统治的庇护（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庇护）后，一些“新”国家的出现。此外，还有那些曾经在一种更广意义上的斯大林式的征服者统治下的国家，东欧各国和蒙古，它们又一次经历了独立。由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建立起来的统治也分崩离析，肢解为一些经常相互冲突的国家。所有这一切改变了政治与宗教的蓝图。在欧洲，基督教的各种形式重新出现，值得注意的有波兰天主教（它在苏联帝国的瓦解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高加索（Caucasus）有形形色色的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亚也有伊斯兰教；在蒙古有佛教。犹太教也能够在俄国重新站住脚。我们在此已经尽力回忆了这些事件：有关东欧和苏联这一章的后一部分已经重写。 8

由于 20 世纪已经接近尾声，因此反映该世纪的新的一章即最后一章（第二十五章）已经写毕。这主要是考虑到 20 世纪后半叶境况中的多元主义。它强调应该通过并且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让人们了解宗教（与意识形态）的现实这样一个方面。最终，我们人类要开始严肃地把重点放在应该理解宗教，而不是以教条的或狭隘的心态去描述宗教这样一个方面。然而，仍然需要努力奋斗，因为许多所谓的宗教人士对于教条化他们观点的兴趣，要胜过说明人们实际上如何行事为人以及传统如何发展的兴趣。

对于人类而言，宗教是一个奇妙的源泉。但是现在所有的宗教都生活在一起：它们不得不如此，因为我们的全球文明就是产生于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在结尾时，在对如何利用宗教研究的思考中，我当然想要说明，像这样的一本书如何能够发挥一种小小的作用。

每一种文化在这个时代中都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因此，这个重要 9
的主题仍然是，各种传统如何回应现代，尤其是如何回应一个殖民时代的。

我特别要感谢伦敦的“美拉尼·怀特·卡尔曼与金”出版社，他们参与了这本书的创意和早期的写作过程，而且做了很好的工作，尤其是为文字配了精美的插图。我也要为ULSB[①]的迈克斯·李明(Max Leeming)、阿米·库伯(Amy Cooper)和艾伦·坡斯曼(Ellen Posman)的大力帮助而感谢他们。由于偶然的原因，这个版本中的某些图片有点变化。这些图片非常精美，它们的惟一缺点是，读者可能会因此而忽略文本。然而，文本是严肃的，它包含了一种关于宗教之现代变化的理论。

尼尼安·斯马特

于意大利特勒默索柯莫湖

1997年8月20日

① 疑为UCSB，即作者所在的圣塔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译注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1)
导言……………………………………………………………… (1)
　理解世界各种世界观的重要性……………………………… (1)
　宗教的本质…………………………………………………… (3)
　世俗世界观的本质 ………………………………………… (13)
　根源、形成与改革…………………………………………… (18)

第一部分

世界宗教大事年表一 ………………………………………… (25)
第一章　最古老的宗教 ……………………………………… (33)
　宗教的起源问题 …………………………………………… (33)
　史前生活的种种模式 ……………………………………… (36)
第二章　南亚 ………………………………………………… (45)
　印度的多样性 ……………………………………………… (45)
　组成印度宗教的各种成分 ………………………………… (47)
　印度的早期 ………………………………………………… (53)
　前古典时期 ………………………………………………… (55)
　佛教 ………………………………………………………… (62)
　其他沙门组织 ……………………………………………… (72)
　婆罗门教或奥义书的宗教 ………………………………… (76)
　上座部佛教 ………………………………………………… (79)
　大乘的兴起 ………………………………………………… (86)
　古典印度教:其主要形式…………………………………… (91)
　佛教在北方的传播:西藏的情况…………………………… (97)
　女神和印度教的密教哲学………………………………… (101)

伊斯兰教在印度……………………………………………………（102）
各地区的宗教运动…………………………………………………（103）
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印度传统………………………………（110）
第三章　中国……………………………………………………（113）
概况……………………………………………………………………（113）
中国宗教的初期……………………………………………………（117）
中国宗教的古典时期………………………………………………（124）
佛教传入中国………………………………………………………（128）
中国宗教的中世纪…………………………………………………（132）
朝鲜的贡献…………………………………………………………（137）
第四章　日本……………………………………………………（139）
日本宗教概况………………………………………………………（139）
早期时代：神道教和外来文化的渗入 ……………………………（141）
前古典时期…………………………………………………………（143）
古典时期……………………………………………………………（148）
日本古典宗教与前现代宗教………………………………………（157）
第五章　东南亚…………………………………………………（160）
地区性的种种模式…………………………………………………（160）
南传佛教及其古典时期……………………………………………（165）
东南亚对宗教史的贡献……………………………………………（169）
第六章　太平洋地区……………………………………………（171）
太平洋地区的经验…………………………………………………（171）
波利尼西亚宗教的诸层面…………………………………………（174）
美拉尼西亚宗教：某些模式 ………………………………………（180）
密克罗尼西亚………………………………………………………（183）
澳大利亚：梦之乡 …………………………………………………（184）
第七章　美洲……………………………………………………（188）
广阔的天地…………………………………………………………（188）
印加宗教……………………………………………………………（189）
南美洲的小规模社会………………………………………………（190）
加勒比地区…………………………………………………………（191）

导　言

理解世界各种世界观的重要性

理解世界诸宗教与诸意识形态在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性。第一, 10
在人类生活历程中,形形色色的体验有着变化无穷的故事,而它们是其中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古代希腊的或玛雅人的宗教与观念,作为人类文明伟大遗产的一部分,是值得我们(只要能够做到)去再获取的。第二,也是比较直接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领会今天世界多元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观,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作为它们之基础的世界观。为了理解中东,你需要了解一些伊斯兰教,更不必说基督教与犹太教了;为了理解日本,你需要对佛教、神道教和儒教的遗产有所认识。第三,作为个人,我们也许会努力去形成我们自己关于实在的连贯的、在情感上令人满意的图景,而它总是涉及到对于各种重要文化与文明的伟大思想和实践的了解。为了做出关于哲学与生活方式的判断,我们需要一种比较的角度——去了解一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印度教瑜伽修行者、哈西德派犹太人和大乘佛教徒的追求。在许多方面,世界的这些个体性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浸透在那些文化中的宗教与意识形态不应该被忽略。

一旦着手在世界宗教中遨游,我们就不应该过于狭窄地去界定宗教。对于我们来说,将各种世俗意识形态视为人类世界观的故事的一部分是重要的。将它们与宗教截然分开是人为的,部分是因为它们在社会中时常像宗教一样发挥作用,部分是因为宗教与世俗信仰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只是现代西方的一个差异,它并不代表其他文化对人类价值观进行分类的方式。归根到底,这本书是一部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这些思想与实践一直推动着人类向前发展。

为了理解宗教世界观及其实践与世俗世界观及其实践的意义, 11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想像力。这些思想与行为对于一些人而言是重要

的，因此我们必须进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正如一条道地的美国谚语所言："绝不要判断一个人，除非你已穿着他的拖鞋走了一里路。"从广的方面来看，这本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不过我希望，它也会传达人类对于跨文化交流之探求的某种精神。

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在一次公开的讨论上对我抱怨，因为我探讨的是佛教对于创造的态度而不是其他的主题，他说："我们有什么必要考虑佛教呢？它与福音书完全不相符，基督教的福音书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真理。"在我看来，如此地自卫并不恰当，而且它表现了这个人对于激励人性之不同部分的力量的认识存在着局限。不过，我巧妙地回答说："知道佛教与基督教的福音书不相符，你一定是读了许多书吧。"

在其他的民间信仰与实践中遨游，也许可以看作是在你自己的街坊邻里间串门。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共同生活在大城市中是很普遍的事。大多数大型宗教和意识形态在伦敦、纽约、洛杉矶、悉尼、新加坡、法兰克福和巴黎都存在。由于每一种传统都包括了许多形式（天主教、东正教、路德宗、浸礼宗的信徒；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穆斯林，摩洛哥、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穆斯林；斯里兰卡、越南和朝鲜的佛教徒以及英国的改宗者等等），这种多元化变得更加丰富。于是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城市成为整个世界的缩影。这便是了解一些其他东西具有重要性的另一个原因，因此，相互的理解可以促进团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也许它们相互并不赞同。

不可避免的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的越南移民和收听无线电的印度村民，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现代性而且多少会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西方的巨大冲击有助于古老的宗教在进入当代世界旅途中的发展。那些古老的宗教一直持守着它们的根基，但是它们也做出了调整。今天的印度教就带有奋力抵挡帝国主义心态的深深烙印，情况相同但却更清楚的是，较小范围的文化一直屈从于由西方控制变化的风向。因此，在这本书中，西方的导航、探索、开拓以及帝国主义的统治，标志着这个故事中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我们对于全球不同地方的宗教文化的沉浮作了叙述；在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相互作用的模式以及全球文明的最终出

现，在这种全球文明中，宗教的与世俗的各种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必须学会相互适应。

宗教的本质

一想到宗教，关于它是什么的问题很容易使人困惑。所有宗教
都具有的某种共同本质存在吗？不属于任何宗教的人不可以称为宗 12
教徒吗？对于本质的探求总是以含糊不清的结果——例如，以宗教是承认超验存在的某种崇拜体系或其他实践这样的声明而告终。而在企图定义"超验的"(transcendent)这个关键词时，我们的问题又一次出现。对于第二个问题用"yes"来回答(即不属于任何宗教的人不可以称为宗教徒)的原因在于，有许多人并不将自己与任何形式的宗教运动相联系，他们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任何超验的东西，尽管他们具有深厚的精神关怀。他们也许是在与自然的统一或与他人的关系中去理解终极的精神意义的。

较可操作的做法是，不要先去处理一般性的宗教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处理一种具体的宗教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能够找到某种有助于我们去思考并评价诸宗教之本质的理念结构吗？

在描述这样一种结构之前，让我先指出我们在看待诸如基督教、佛教或伊斯兰教这样一些传统宗教时需要牢记的某些东西。尽管我们使用了一个单一的标签"基督教"，事实上，有形形色色的基督教，而且，还存在着一些我们会怀疑它们是否算得上是基督教的运动。所有的传统宗教都如此：它们表明自己是一个由各种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亚传统的家族。我们可以想想看，格鲁吉亚的浸礼会教堂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尼亚东正教教堂的建筑，在那里烛光闪烁，雕像极多，两个小时内有丰富多彩的崇拜仪式：一方面是赞美诗和圣经的朗读、坦诚的祈祷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布道；另一方面是以列队和唱圣
歌的形式进行的固定的、更礼仪化的神秘仪式，光线从挂有雕像的帘 13
子后照射出来，而帘子使得神职人员的大多数活动处于隐蔽状况中。可以问问宗教方面的专家，无论是浸礼会的布道者还是东正教的神父，他们都会告诉你说，他们自己的信仰形式是与原初的基督教相一



仪式层面：莫斯科，由俄国东正教主教带领的复活节仪式。

致的。为了说明基督教多种多样的活动，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基督教宗派的名单：东正教、天主教、科普特教派、聂斯脱利教派、阿明尼乌教派、马多马（Mar Thoma）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循道宗、浸礼宗、一位论派、门诺派、公理会以及基督的门徒——我们还没有提及某些更新的、更成问题的形式：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基督教科学派、统一教派、祖鲁锡安派，等等。

此外，我们在许多国家都可以发现每一种信仰，而每一个地区都为每一种信仰增添了自己的特色。德国的路德宗不同于美国的路德宗；乌克兰的天主教有别于爱尔兰的天主教；希腊的正教与俄罗斯的正教有差异。每一种宗教都浸透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中，同时也被各种不同的文化所浸透。这虽然增加了人类体验的丰富性，但是它也使得我们思考并感受形形色色信仰的任务变得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要对付的不只是传统，而且还有许多亚传统。

顺便说一句，这样的事也许会是会发生的：在由各种亚传统组成的一个家族中，一个人与另一个家族中的某个亚传统的距离，要比与

他(或她)自己的家族的一个或两个亚传统的距离更近一些(正如人类的家庭一样,这就是为何会出现婚姻的原因)。我碰巧与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有许多关系,而且在某些方面,我感到我与他们的距离,要比我与自己的基督教家族中的某些群体的距离近得多。

宗教传统之内的多元主义的事实,被它们之间所发生的碰撞加强了。不同文化与传统的相遇,经常产生出新的宗教运动,例如在非洲,许多黑人独立教会就是传统的非洲主题与基督教的结合。在西方,在我们的周围,新的运动与新的结合处处可见。

尽管如此,要在世界宗教与亚传统的繁多的衍生物中了解这种多样性和辨别某种模式仍然是可能的。方法之一就是去看一看宗教的不同维度或不同的层面。

实践与仪式层面

每一种传统都有某些它坚持的实践活动——例如有规律的崇拜、布道、祈祷,等等。它们经常被认为是仪式(虽然它们也许比"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更丰富得多)。这种实践与仪式的层面在某些属于强烈圣礼型的信仰中尤其重要,例如东正教有着长时间的、精心安排的圣餐仪式。公元70年犹太教的圣殿被摧毁之前,圣殿中的古代犹太教传统被各种献祭仪式充斥,后来则被学习这些习俗所充斥,这种学习被视为等同于仪式的表演,结果,学习本身几乎变成了一种仪式活动。另外,在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的形式中,献祭仪式是非常重要的。

行为的其他模式也是重要的,尽管那些模式不被严格地算为仪式,但它们在发展灵性意识或伦理洞见中发挥了一种作用:例如佛教 14
和印度教传统中的瑜伽,东正教神秘主义中的自我镇静的方法,能够有助于增加同情与爱的冥想,等等。这些实际活动可以和崇拜仪式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冥想便直接导致了与上帝的结合。它们可以被视为祈祷的一种形式。在这些方面,它们与比较正式的或者明确的宗教仪式有部分重叠。

经验与情感层面

我们只须扫视一下宗教的历史,便可以了解经验在宗教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中的巨大生命力和意义。让我们想一想先知穆罕默德的幻象,保罗的归信,佛陀的觉悟,这些曾都是人类历史中的原创性事件。显然,男人与女人的情感与经验,是宗教的其他层面得以维持其生命的食粮:没有情感的仪式是冷冰冰的,没有敬畏或同情的教义是干巴巴的,不能感动听众的神话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努力地进入它引发的各种情感——去感受神圣的敬畏,宁静的平和,内心振奋的冲动,对内在彻底虚空的领悟,对爱的倾泻,对希望的感知,以及对已经得到的恩惠的感激——之中,这在理解一种传统时是很重要的。为什么音乐在宗教中如此有力的诸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具有表达和引发情感的神秘力量。

论述宗教的作家们已经挑选出了各种不同的重要经验。例如,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 1869—1937)就杜撰了一个词 numinous(既敬又畏)。对于古代罗马人来说,在他们周围,在小溪与大川里,在神秘的灌木丛中,在群山间,在居住的地方,处处都存在着守护神(numina)或精灵。奥托就从这个词开始,造出了他的形容词,它指的是由某种神秘所引起的情感,是把你拉向它而同时又使你产生敬畏感的某种神秘之物。它很贴切地描述了许多宗教的情感和对作为他者的上帝的幻象。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性的经验,上帝对约伯的显现,保罗的归信,在印度关于神之歌(薄伽梵歌)中阿周那(Arjuna)得到的那个排山倒海的幻象,所有这些冲击感,都被这个词捕捉到了。在一种比较文雅的层次上,它还描绘了充满爱的献身精神,因为信仰者将神视为仁慈和充满爱的神,然而神也是受到崇拜与敬仰的他者。

然而,既敬又畏的情感在特征上完全不同于常被称为"神秘"(mystical)的那些其他经验。神秘主义是对存在于内心的某些东西的一种内在的或冥想的探索——例如对于内在的神、永恒的灵魂或未知的云、虚空、闪闪发光的黑暗等的不同认识。有那样一些人,例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曾经认为,无图像

的、从内心体悟到的神秘经验存在于所有大宗教的核心之处。

也有一些相关的经验，例如所谓戏剧性的皈依，“再生”，从此世的存在转向了来世的存在等经验。也存在着巫师式的（或萨满式的） 15
经验类型，在这种经验中，为了解救濒临死亡者并且带他们起死回生，一个人经常通过使自己痛苦而且逼真地出游到另一个世界去，不断地进行着一种幻象的探求。在许多小型的社会与靠打猎为生的人群中，巫师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巫师式探求的标志在各大宗教之中都一直保留着。

叙事与神话层面

体验的引发与表达，经常不仅依靠仪式而且依靠神圣的叙事与神话。这就是第三个层面——神话或叙事的层面。它是宗教的故事层面。它的特点是，一切信仰都在传递着各种有生命力的故事——某些历史故事；某些关于世界还处于无时间开端时的神秘的原初时代的故事；某些关于时间结束时一切事情的故事；某些关于伟大的英雄与圣徒的故事；某些关于伟大缔造者如摩西、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等的故事；某些关于遭受恶魔攻击的故事；某些寓言和教诲的传说；某些关于诸神冒险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常常被称为神话。这个词也许有一点误导，因为在对宗教的现代研究中，并不存在神话是虚假的这一含义。

宗教的这些基本故事，其根源也许在也许不在历史之中。关于创造的故事发生在历史之前，它们是说明死亡与苦难如何进入世界
的神话。其他的是一些关于历史事件——如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生， 16
或者耶稣被处死刑，佛陀的觉悟——的故事。尽管历史学家时常怀疑这些历史故事的某些方面，但是，从研究宗教的学者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对于神话的意义与功能而言是次要的；而在信仰者看来（经常如此），这些叙事就是历史。

这种信念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加强，即，许多信仰都视某些也许最初是以长期口述传统为基础的教义为正宗经典。它们得到公认，或者得到相关的信仰团体（如教会、社团、在印度是婆罗门或其他上层阶级，佛教的僧伽或修道团）的承认。它们经常被当作上帝直接的授



神话层面：婆罗门教崇拜的黑天大神，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

意，或者是创立者言论的记录。它们具有权威性，它们包含了许多故
17 事和神话，这些故事与神话被认为是神圣的或者被保证是神圣的。但是，其他的教义和口述传统——圣徒的生活，作为佛教国度的锡兰的编年史，哈西德派传统中关于东欧著名圣人的故事，关于(圣训派)先知生平的传统等等——可以说也都是重要的。尽管这些故事可能具有的权威性较小，但是它们仍然能够激励其追随者。

宗教中的各种故事经常与仪式层面紧密结合。例如，基督教的弥撒或教会的仪式是为纪念并再现"最后的晚餐"的故事(指耶稣与

其门徒庆祝他未来之命运，按照基督徒的说法，耶稣通过其未来的命运拯救了人类，将我们带回与神圣存在和谐相处的关系中)。犹太教的逾越节仪式是纪念出埃及，纪念那些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与其那个指引他们摆脱古代埃及奴役状态的上主之关系等事件的，并且要使我们感到那些事件的真实性。当犹太人分享那一餐饭时，他们也就追忆了那个故事。仪式是与故事联系在一起的。

教义与哲学层面

支持与强化叙事层面的，是教义层面。所以，在基督教传统中，耶稣生平的故事和教会的仪式导致了为提供对于神圣存在之性质的分析(它必须保持耶稣作为上帝道成肉身的理念与相信一位上帝的理念)的种种努力。其结果就是三位一体教义，这个教义视上帝为一个本质三个位格。同样地，由于早期基督教与希腊—罗马的伟大哲学与理性遗产相遇，面对诸如关于创造的终极意义、上帝的内在特性、恩典的观念、对于基督如何既是神又是人的分析等等问题，已经成为必要。这些关注又导致了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详细阐明。我们再以佛教的情况为例，教义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佛陀提出了关于世界的哲学图景，它本身就有助于得救。

总之，在所有的主要宗教中，教义逐渐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这部分是因为一种信仰或早或迟都必须适应社会现实，也必须适应这个事实，即，许多领袖受的是良好教育，他们企图对信仰的根基作某种理性的陈述。

恰巧宗教的各种历史一直倾向于夸大经典与教义的重要性；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我们关于以往宗教的知识，必然来源于被学术精英们认可的教义。另一方面，尤其在基督教的情况下，教义争论一直经常是这个团体组织内的分歧的公开表达，因此，一种信仰的历史时常集中于这些热点问题。显然这是不平衡的；但是我确实不希望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今天有一些学者一直被神话的象征和心理力量所吸引，而且倾向于忽略对宗教本质的理性成分。

伦理与律法层面

18 叙事与教义通过促进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宣称终极解脱或得救的问题从而影响了传统的价值观。传统或亚传统结合进其组织之中的律法可以被称为宗教的伦理层面。例如在佛教中,有某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戒律,为人所知的如五戒或五德,它与一套更进一步的法规一起控制着和尚尼姑与寺庙团体的生活。在犹太教中,不仅有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还有一套由神圣存在强加于社团的包括六百多条规则的复杂体系。所有这些律法或妥拉(Torah,即律法书)都是正统犹太教徒生活的准则,因为,例如遵循安息日为休息日的规定,也是参与诸如出席犹太教集会、保持纯洁性情的某种神圣的活动和仪式的规定。

19 同样地,伊斯兰教徒的生活在传统上也受到律法或沙里亚(shar'a,伊斯兰教教法)的控制,律法与沙里亚组成了一个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社会,也形成了个人的道德生活,例如规定信徒每天都应该祈祷、为穷人布施等,规定社会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如婚姻制度、银行业务方式等。

另一些传统可能与法律体系的关系要松散一些,但是它们仍然体现了一种受到信仰神话和教义影响并且深受其控制的伦理。例如在基督教信仰中,核心的伦理态度是爱。这不仅源于耶稣要求其信徒爱上帝与爱邻人的嘱咐,也源于基督本人出于爱而为人类献出了其生命的故事。它也植根于三位一体的思想中,因为永恒的上帝就是一个由爱而结合在一起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的社会。基督徒加入一个社团,总是希望这个社团是神圣存在之生命的体现,即既作为三位一体,又作为人类以及一切创造物的受难仆人的神圣存在之生命

社会与制度层面

至此我们所概括的层面——经验的、仪式的、神话的、教义的和伦理的层面,可以说是从抽象的方面来考虑的,还没有包括外在的形式。最后的两个层面必须与宗教的具体化有关。第一,每一个宗教



社会层面：到达以色列后，犹太人的一家庆祝他们的第一个逾越节。

运动都体现在一群人之中，这群人经常被组织起来而形成教会、僧团 20
或乌玛(umma，穆斯林公社)。因此，第六个层面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宗教的社会或制度层面。为了理解一种信仰，我们需要了解它是如何在人群中发挥作用的。这就是宗教探索者如此重要的工具为什么只是亚学科(即人所皆知的宗教社会学)的原因之一。世界观的社会方面经常就等同于社会本身(尤其是在类似部落的小型团体中)。但是，在有组织的宗教和社会之间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一种信仰也许是一种官方宗教，或者它也许只是许多宗派之一，或者它也许与社会生活有某种隔绝，例如教派(sect)。因此，在一种宗教的组织内存在着许多模式：从一种激进的新教集会的相对民主的管理，到罗马教会的等级制和类似君主制的体系等等。

然而，从长远看来，在一种传统中证明是最重要的人物的人，也许并不是一种宗教中的正式官员。因为有一些卡里斯玛式的或神圣的人物如圣人、古鲁、神秘主义者、先知等，他们的精神力量通过其风范和行为而闪发出光辉，他们使得平平淡淡的民间信仰具有了生气，
他们的话语和榜样唤起了大众精神的热情，他们为传统的仪式和价 21
值观增添了深度与意义。他们也可能是革命者，把宗教推向了新的历程。像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一样，他们可能成为新宗派的

领袖,而这总是以其愿望相违的;他们也可能成为新团体的创始人,这种新团体到时候会以一种独立宗教的身份出现,摩门教这个新信仰的先知约瑟夫·史密斯二世(Joseph Smith II)就是一例。总之,宗教的社会层面不仅包括了广大的信众,也包括了那些杰出的个人,他们所追求的关于天堂的新旧思想,都会通过他们个人的特征而闪现出光亮。

物质层面

宗教的社会与制度层面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物质的形式,例如建筑物、艺术品和其他创造物来体现。某些运动(例如基督教的加尔文宗,尤其是在20世纪之前那一时期的加尔文宗)抛弃了被视为潜在的偶像崇拜的各种象征物;尽管它们的建筑常常体现出一种简洁的美,但是其含义却在于,不要艺术的或其他的图像,因为它们可能会诱惑人放弃这样一种思想,即,上帝是超越一切图像的精神。然而,宗教的物质性表达方式对于信徒而言,更经常是他们在接近神圣者途中的具体的、生动的、极其重要的表达。事实上,如果不了解那些图像为何物,不知道他们被视为通向天堂的窗口的话,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东正教呢?而不进入印度教众神的塑像中,我们又如何能够从中体会到印度教的感受呢?

此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作为具有特殊神圣性与意义而被选出来那些自然特征——例如恒河、约旦河、中国的仙山、日本的富士山、澳大利亚的阿耶尔石岩(Ayers Rock)、橄榄山、西奈山等等——也是宗教之重要的物质表现。当然,那些具有神圣性的名胜更经常地与人的创造结合在一起,例如圣城耶路撒冷、巴纳拉斯(Banaras)的神庙,或纪念佛陀觉悟的菩提城加雅(Bodh Gayar)的寺庙等。

对七种层面的利用

总之,我们已经简要地考查了宗教的七个层面,它们有助于描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之特征。列出这个一览表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对激励人类精神以及在社会的形成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各种运动作一种平衡的描述,既不会忽略思想方面,也不会忽略实

践方面。

当然，存在着一些宗教运动或者宗教表现形式，在其中此层面或彼层面极其单薄，以至于可以说它们事实上不存在：没有文字的小型社会就没有许多表达教义层面的手段；佛教的现代主义者关注冥想、伦理和哲学，几乎不关注佛教的叙事层面；一些新组成的群体在物质层面没有任何发展。当然也有许多人并不正式地属于任何社会宗教团体，但是他们有其独特的世界观与实践活动，因此我们能够在宗教的社会细胞中观察到那些并不具有完型的社会层面。当然，一旦在 22
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现象，它们就反映了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就会变成社会层面的影子（例如那些还没有自己的物质层面的人正在暗暗地积蓄其力量，因为建筑物会随着成功平地而起，雕塑画像也很可能随着仪式而出现）。

如果我们对宗教的七个层面所作的描述是足够的，那么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对宗教做出进一步的定义。总之，我现在将要转向存在于理解世界运作方式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或多或少是明显的宗教体系与被普遍称为世俗之物——例如科学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考查这些世界观时，我们将进行关于什么才算是宗教，什么是宗教主题的讨论。我们对七种层面的分析是否能够成功地运用到这些世俗的世界观方面来呢？通过这种思考来开始我们的讨论，将是非常有用的。

世俗世界观的本质

民族主义

严格地说，虽然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世界观，或者说其自身并不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但是从民族主义开始我们的讨论是很方便的。理由之一是，它一直是人类事务中一种强大的势力。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表面和部分海洋表面现在都被主权国家之间瓜分了。民族主义最终赋予了现代世界以形式，因为民族主义的盛行部分源于把不同民族集中于国家之内这样一种方式，它一直有助于工

业化和现代官僚组织的进程。许多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政府的体系从西方向东欧扩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从欧洲向亚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扩展。民族身份有时由语言来区分,因此,文化遗产有时由宗教,有时由语言与宗教,而有时只由共同的历史来区分。这些范畴中的每一个例子都可以在德国(共同的语言)、爱尔兰的两个部分(不同的宗教)、波兰(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宗教)、新加坡(中国人、马来人和讲其他语言的群体共同的历史)的例子中看到。殖民主义经常通过反作用来帮助民族主义的传播:在印度,英国征服者助长了印度的民族主义,在前苏联一些地区(曾经属于沙俄的殖民地),都有民族觉醒的迹象。

民族国家有许多关于宗教的附属物。首先(在此要利用我们在前面部分说明宗教之层面的顺序),存在着各民族的仪式:说自己的
23 语言;有自己的国歌;会升国旗,也许要向国旗致敬;有公众的纪念日以及其他的节日和假期;在庄严的场合有国家领导人出席;有阅兵仪式等等。公民们经常到自己国家的首都和其他有意义的地方——如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越战纪念碑、白宫等);普利茅斯岩石(Plymouth Rock);拉什莫尔峰(Mount Rushmore);展示"美丽的美国"的全国各个美景妙处去进行世俗的朝拜。纪念为国捐躯的人尤其有意义,而且在关于民族责任的祭坛上,人们经常使用宗教语言来谈论年轻人的牺牲。

民族主义的经验的或情感的方面的确是强有力的——因为爱国主义的感情、对国家的自豪感、对祖国美景和力量的热爱,对于民族目标的献身,都可能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时期,例如战争时期,这种情感就会凸现出来。然而,这些情感在任何时候都会通过唱国歌和唱其他爱国歌曲而得到增强。

24 民族主义的叙事层面很容易了解,因为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而在每个国家的学校里都要教授这种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历史是在赞颂这个民族的伟大男女的价值观——例如,意大利的伟大先辈朱利斯·凯撒(Julius Caesar)、但丁(Dante)、伽利略(Galileo)、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加里波第(Garibal-

di)、加富尔(Cavour)、威尔第(Verdi)、莱奥帕尔迪(Leopardi)、阿尔西迪·德·加斯佩利(Alcide de Gasperi)等等。历史主要是一种有助于培养年轻人与公民的身份意识、归属意识和群体团结意识的叙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日本海军军官在为战斗作准备。他把日本国旗缠绕在头上,以表示他的民族主义献身精神。

民族主义的教义层面几乎是缺失的,除非你把自己决定的教义算在内。但是,各个民族也经常求助一些激励现代国家的原则,例如对于民主的需要,个体在自由爱国方面的权利等等;或者,一个国家也可能求助一种成熟的世俗意识形态的教义,例如马克思主义。或者它会重新返回到其古代宗教的教导,进而把自己描述为基督教,或

佛教，或复兴与革命的伊斯兰教的真理和价值观的捍卫者。

民族主义的伦理层面包括了对公民谆谆教诲的那些价值观。年轻人都被期待成为诚实的人，能够按时纳税，在必要时愿意为国而战，遵纪守法，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这样可为国家提供人力）等等。当然，一般而言，在伦理价值与对个人的亲朋好友和同胞的具体的责任之间，存在着一种协调的问题。

当然，民族一国家的社会与制度层面很容易分辨。它在具有广泛的仪式性功能的国家首脑——尤其是在英国这种君主制国家，女王是一个重要的礼仪方面的代表，爱国主义的情绪也集中在她身上——方面体现得最充分。国家有自己的军事机构，除了负有战斗任务之外，军队也在仪式方面发挥作用。国家有公立学校，教师传授宝贵的知识，宣讲国家的各种规章。甚至游戏也逐渐发挥着制度的作用；忠诚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和其他的竞赛表现出来，运动员的民族精神逐渐与理想公民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在一些国家，对于宗教的忠诚或对于一种世俗意识形态的忠诚，与对于国家的忠诚相结合，因而那些并不赞同于那种世俗意识形态的人被视为不忠。国家的重大时刻也在电视上表现出来，电视逐渐具有了传递和集中体现国家之价值观的功能。

最后，民族国家当然有许多物质体现，如它的伟大的建筑物、纪念物、国旗、圣地、有力的军事装备等。

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国家就像一种宗教。如果你有一个亲戚因为某种原因死去，在过去他也许是为其宗教而死（或许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但现在他很可能是为国而捐躯。

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条件下的现代民族主义视为宗教。它代表的是一套经常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价值观，而对于我们当代的许多人的思维而言，这是十分自然的，它强调了某些基本的现代关
25 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技术的优势，科学的美好，在现代化过程中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其他混合主义的重要性；需要国家顾及的其公民的利益，教育普及的重要性，等等。

民族主义不断增长的局限性表现在这些事实上：在许多曾经一度是具合理性的同质国家，现在其伦理方面的混合性正在逐渐增加，

跨民族的合作正在增长，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性正在发展，在现代利益的背景下关注主权国家的较老的方式已经不再可能，等等。然而，在世界上，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非常强烈而具诱惑力的成分，许多麻烦困境——如在塞浦路斯、北爱尔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南非、斯里兰卡、库尔德斯坦、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正是由于没有实现的种族期待和种族竞争而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诸层面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不止是一种思想运动，而是在许多国家已经具体化，因此对它的分析也必须遵循我所简述的梗概。马克思主义有一套连贯的教义，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领袖如斯大林(Stalin)、毛泽东、霍查(Hoxha)、齐奥塞斯库(Ceausescu)，不断地对它做出了各种修正。在依据辩证法原则分析历史事件时，它具有一种神话的层面(因此，俄罗斯革命史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适合于更为一般的人类拯救史)。它的仪式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但是却具有自己的象征体系，例如普遍使用红色，将五月一日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作为节日等等。在情感方面，它鼓励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为革命献身；它的伦理强调团结一致；它的制度体现在党的制度方面；它的艺术风格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以一种更加虔敬(与能够体现宗教绘画特征的虔敬相比)的心态来荣耀党、政府和国家的理念。它的音乐是英雄式的、振奋人心的。因此，国家马克思主义(State Marxism)具有一种明显的宗教型的功能，它通过理论、象征、仪式和党的活动力来感动民众。就像许多宗教一样，它也许最终没有被证明是成功的，因为民众也许没有在心灵深处被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价值观所感动：事实上，苏联体制的崩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欧一些国家和在苏联的虚假性。它曾经总是面临着与狭隘的爱国主义、与宗教、与人类探索自由的愿望等等方面的斗争。

其他一些世俗世界观不像传统宗教那样非常清楚，因为它们没有表现出行使力量之象征的倾向：例如，科学人本主义(Scientific Humanism)，在西方许多知识分子中，它以此种或彼种形式而具有影

响力，而且它以相当模糊的形式表达着世俗化境况中普通民众的世界观。它坚持人的价值与民主的价值，强调科学是知识的源泉。它
26 不承认宗教的教义，尤其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神论。它认为作为人的个体为具有终极的价值。但是，正如我所言，它没有像宗教型的体系那样以一种丰富的方式去展现自身。除了增强现代性之其他方面的那些东西之外，它的仪式微不足道。也许，对于游戏和运动的现代热情，是维持对于根据仪式规则来举行的各种活动的兴趣之长久性的一种迹象。除了对自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以后的现代阶段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有一点感受之外，它没有什么神话。它的教义可能很复杂，在对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系统阐述方面而尤其如此。它的最深的经验也许是例如对音乐和艺术的文化体验。它的伦理一般而言是功利主义的伦理，功利主义认为道德就是：使幸福增加到最大限度，使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它的体制在世俗教育中可以发现。它的物质象征也许是摩天大楼和运动场。但是我们很难将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与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分解开来。

尽管我们关于七个层面的模式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也许适用于世俗的世界观，但是，企图称这些世俗世界观为宗教或者甚至是"准宗教"(根据含义，这个词是将它们降低至"真"宗教之下)，也并非真正的恰当。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追随者们希望将他们与那些信奉宗教的人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从总体上说)是反宗教的。然而，我们已经了解了世俗世界观(尤其是民族主义和国家马克思)的七个方面的特征，因而足以强调，思想和实践的各种不同体系，不论是否是宗教的体系，都是相互竞争，相互结合的，可以说它们都在同一联盟中发挥着作用。它们都有助于表现人类用来认识自身并且在世界上行动的各种不同方式。

根源、形成与改革

我们在此关注的是这个世界的各种世界观的历史。考查一下作为诸种信仰之源头的创立者与最初的经典是我们一向的惯例：似乎

犹太教的所有错综复杂的形式都出于摩西之口;印度教似乎都包括在吠陀(Vedas)经典之中;基督教似乎在(可以说)基督的思想中已经得到充分的描述。尽管评价创立者和最初的经典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对宗教传统发展和形成的方式保持敏锐性。例如,在早期的一些吠陀经典中,甚至在以奥义书(Upanishads)之名闻名于世的伟大的文献中,也缺少印度教的某些重要特征:比如寺庙宗教的整个复杂结构、对于塑像的崇拜和朝圣等等,思考一下这些并不要花费许多时间。尽管形成三位一体教义的那些素材或者形成东正教礼拜仪式的那些素材也许可以在新约圣经中发现,但是严格说来,那种教义和那种仪式都不存在于新约圣经中。一言以蔽之,尽管宗教也许植根于其早期的文献中,但是它们并不是仅仅根据经典的基础来形成和发展的。事实上后来有一种更大的发展——例如基督教 27
的改革——它要求回到绝对的源头上,并且企图以经典为一切的基础;但是,即便在此,一些耶稣的门徒或保罗意想不到的现代因素,都会被结合进宗教的新的、改革过的模式中。

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当代的传统,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北方的还是南方的传统,都在施展种种努力去对付征服了世界的那些革命变化——科学的兴起、民族主义、西方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出现以及相互作用的文化。这些事件必然已经导致了世界观方面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的世界宗教(除了最偏远地区的宗教之外)都经受了西方的和现代的影响。所以,即便是接受现代西方教育的印度,也可以利用古代的主题和古老的哲学,可以引用三千年以前的文本,她将以各种形式(它们的出现多应归于19、20世纪这一思想和斗争的萌芽时期)来阐述其信仰。她将会受到维韦卡南达(Vivekananda, 1862—1902)、拉达克里希南(Rakhakrishnan, 1888—1975)的影响,更不用说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的影响了(参见本书第十六章)。

因为世界传统与亚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的特征,我不能采取过于简单的方式来对待宗教,仿佛每一种宗教只有一种单纯的源头。当然,有一些宗教如伊斯兰教或摩门教,其创始时期的先知和先知的时代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可以

在这种时期（或源头时期）与那些形成时期之间做出区分。当然，早期的古典基督教在新约与保罗神学中有其源头。但是，一直到公元4世纪，随着对一些关键教义（如三位一体说）的阐明，对团契或仪式的全面阐述，复杂的教阶制的创建，神秘主义的发端、修道院的推动，既做好基督徒又做好公民的新时代精神的开始，以及以语言和政治之差异为基础的东西方形式的出现，它的形成（大致说）才完成。

犹太教也有一个同样的形成时期，这个形成时期的顶峰是犹太人流亡他乡的时期，或者在公元70年犹太教圣殿被摧毁之后犹太人流离失散的时期。拉比的学问、犹太教集会的崇拜、口传律法书的概念、对于作为指导它们的替代品的圣殿仪式的研究、社团的分散、对于来生的信仰等等，上述一切的古典特征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确实是直到基督教的出现，公元70年大灾难之后所感到的对重新组合的需要，以及罗马时期的迫害，犹太教最终才以一种我们今天可以识别的形式聚合在一起。然而，19世纪期间，在解放带来的振奋与创伤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个伟大的形成时期，即以分裂的模式（正统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以及各种不同派别）展现的现代犹太教时期。

28 当然，各种宗教都在反思自己的历史，而且将那些假设的诸多起源追溯到各种源头也是很自然的。口传律法书被归因于摩西时代；古典的基督教教义与仪式可以在新约中看到。相反，现代的学术倾向于竭力阻止这种追溯并且导致它们分裂，这是虔敬与学术之间张力的潜在源泉。因此，就这本书是一部现代史而言，它必须对某些虔诚的信仰持有某种怀疑；但是，当考虑到传统有一个“根源”时期、一个古典时期以及其他较大的改革时期后，我们也许会努力避免各种不必要的冲突。

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维持原样，各种传统都不得不变化。这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如果你要坚持固守既定时期的习俗与解释，那么，不断变化的环境将会使你显得不合时宜，而那并不是你的初衷。就像宾夕法尼亚州的阿门（Amish）教派，在汽车出现之前的年代，驾驶轻便马车的意义完全不同于事实上有了汽车而抵制它所造成的意义。因此，尽管传统的一些方面也许的确是传统的（例如大主教主教带的

头冠),但是并非所有的方面都是古老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传统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身,以便继续保持它的可理解性和意义。

在已经改变了宗教史之面貌的"分水岭"时代,也有某些变化。就西方而言,那是宗教改革与科学和艺术结果的时期。就犹太教而言,那是解放时期,即19世纪早期。就印度教传统和佛教传统而言,19世纪正是欧洲人渗入亚洲的有关文化的时期。就非洲宗教而言,那大概是19世纪,但是要晚一点。对于北美和南美的本土宗教而言,那实际上要早一些,是在16至17世纪,那是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的征服带来的巨大冲击的时期。从根本上说,世界上的众多国家(在此我没有列出所有的地区或所有的宗教)都逐渐受到欧洲的扩张,各种不同政治思想与科学思想随之而来的传播,以及基督教传教的深刻影响。显然一直也有其他的一些冲击和分水岭;在英国统治之前,穆斯林对于印度的征服当然影响了伊斯兰教。而在欧洲人"争抢非洲"之前,伊斯兰教的势力也改变了非洲的部分地区。从中国到欧洲,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和他的后继者们也曾经是一个冲击力。然而,没有任何东西最终能够与欧洲征服的影响匹敌,因为欧洲的征服在全世界引进了种种完全不同的挑战,它传播了诸如民主、解放、现代性以及对西方模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等这样一些令人兴奋的理念。宗教的世界观与其他的世界观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在这些征服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产生了各种骚乱,而当今的世界正是从这些骚乱中得以形成的。

第 一 部 分

世界宗教大事年表一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佛教	儒教	神道教和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前3000年之前	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城镇定居点(4500) 尼罗河沿岸文明的创立(4000) 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统一(3100)	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15000) 法国阿里埃日洞穴壁画(12000-11000) 土耳其 Catal 休于(6000-5500) 撒哈拉岩石绘画(6000-1000) 大洋洲拉比塔文化(3500) 印度河流域文明(3000-1600)	吠陀仙人听闻的《吠陀经典》得到口传(8000-6000) 哈拉帕文明(3500-1500) 毗湿奴下凡为毗耶娑,记录《吠陀经典》(3102)			神道教,始于史前时期,是地方性的自然和祖先崇拜传统				
公元前3000年	乌尔"皇家"墓地(2500) 吉萨的金字塔(2560) 萨尔贡统治下的苏美尔人(2330)	英国巨石柱的建造(自2800) 《吉尔美什史诗》编成(2212-2004)								印度—伊朗部落中的早期因素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佛教	儒教	神道教和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前2000年	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2000) 苏美尔文明的崩溃(2000) 赫梯人到达安那托里亚(1850) 中国商朝(1766-1122) 迈锡尼文明(1600-1200) 赫梯帝国的瓦解(1200) 中国周朝(1122-256)	迈锡尼文化中线形文字B的使用(1400) 埃赫纳吞(在位1378-1362)在埃及倡导一神教	雅利安人入侵北印度(2000-900) 耆那教的24位祖师 早期《吠陀经典》被记载下来(1500)			道教渊源于商代流行的萨满教(1766-1122)	亚伯拉罕,第一个族长(?1900-1700)带领希伯来人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居迦南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12世纪) 约书亚进入迦南(1274) 首次提到以色列人(1200)			
公元前1000年	埃及在利比亚统治下重归统一(950) 努比亚人征服埃及(750)	据传为荷马所写的《伊利亚德》和《奥德赛》(750-700)	毗耶婆系统整理《奥义书》(1000-500) 《梵经》写成(900-700)	乔达摩·悉达多(约563-483)	孔子(551-479)	神道教名称的使用 老子(600-500)	以色列王大卫(?1010-970) 建立第一圣殿(950)			琐罗亚斯德(628-551,或者更早)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佛教	儒教	神道教和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琐罗亚斯德教
	亚述人控制埃及(自664) 居鲁士一世(在位560-530)建立阿赫门尼德帝国 波斯人征服埃及(525)		白史婆那陀，耆那教第23位祖师 大雄(599-527)耆那教24位祖师中的最后一位			阴阳观念在6世纪的发展 《道德经》成书 庄子(389-286)	尼布甲尼撒二世(640-562)占领耶路撒冷(597) 第一圣殿被毁(586) 第二圣殿建成(515)			居鲁士大帝(585-529)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波斯阿美尼德王朝的国教
公元前500年	伯里克利治理下的雅典领导希腊城邦(495-429)	尼日利亚中部诺克定居点(5-3世纪) 帕台农神庙的重建(447-438) 萨巴特克文明(公元前300-公元300) 秘鲁莫契文化(公元前200-公元600) 俄亥俄和伊利诺斯的霍普韦尔印第安人(公元前100-公元500)	《罗摩衍那》(公元前400-公元200) 《摩诃婆罗多》(公元前400-公元400) 婆颠阇利系统整理瑜伽经典(至公元前200)	阿育王开始从印度向外传播佛教(258) 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开端(至公元200) 巴利文经典的编撰(80)	孟子(371-289)发展儒家理论并引入神秘因素 荀子(298-230)强调传统和礼仪的重要性 秦朝(221-206)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制度(205)		《妥拉》的制定(430) 亚历山大摧毁阿契门尼德王朝以及巴勒斯坦成为托勒密王朝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在塞琉西王朝统治下(198) 马卡比起义(165) 长者希勒尔(公元前100-公元10)			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口头传统的消失 米特拉达梯一世(171-138)时琐罗亚斯德教成为安息帝国的国教 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王朝的官方宗教以及伊朗帝国的国教(131)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佛教	儒教	神道教和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元年	中间期(王莽)公元 8-23 克劳狄(在位 42-54) 东汉王朝,中国(25-220)		耆那教教团分裂为"天衣派"和"白衣派"(79)	佛教传入中国并由此传入东亚(公元50)			拉比传统(1-4世纪) 耶路撒冷陷落到罗马人手中(70) 犹太教律法定型(90)	耶稣(0-27/33) 《保罗书信》(50-60) 《福音书》得到记载(73-83)		密斯拉教传人罗马帝国(50)
公元100年	图拉真(在位 98-117)扩张了罗马帝国的领土	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王国(100-1000) 柏柏尔人部落开始统治苏丹(150)		大乘佛教的发展(第2世纪)			哈德良在耶路撒冷建立罗马殖民地后犹太人的起义(132-135)			
公元200年	中国三国时代(228-280) 中国西晋(266-317) 戴克里先(在位 284-305)	秘鲁纳卡斯文化(200-500) 玛雅文明(200-850)		龙树发展了空的概念(200)			拉比犹大·哈-西那(135-220)编成传统律法《密西拿》(200)	《新约全书》在罗马被使用(200) 德西乌斯迫害罗马帝国的基督徒(249-251) 奥利金运用《新约全书》(250)		摩尼(217-277) 阿尔达希尔(224-241)建立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的萨珊帝国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佛教	儒教	神道教和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300年	君士坦丁一世(在位306-337) 中国东晋(318-420)		《密典》编撰成书(300)				巴勒斯坦的塔木德把《革马拉》加入《密西拿》(375)	君士坦丁宣布对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实行宽容(313) 尼西亚公会议(325)		
公元400年	哥特人攻陷罗马(410) 汪达尔人攻陷罗马(455)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	撒哈拉南部杰尼-耶诺的城镇(400)				陶弘景(451-536)编撰道家著作《真诰》和《登真秘诀》	学术领导权被转入巴比伦流亡者的后裔手中(4-5世纪)	迦太基公会议(450) 卡尔西顿公会议(451) 圣本尼迪克特(480-542)		
公元500年	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位527-565) 中国隋朝(581-518)		商羯罗重新组织整理《吠檀多》	智颢(538-597)创建天台宗	日本接受儒教来统一各部落(500-600)				穆罕默德(570-632)	《阿维达斯》由早期经典中编成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佛教	儒教	神道教和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600年	中国唐朝(618-907)	玻利维亚蒂亚乌亚纳科文化(600-1000) 米斯特克文化(公元600至今)	巴格提/虔诚运动(600-1800)	中国佛教鼎盛时期(618-907) 佛教传入西藏(640)	唐太宗(在位626-49)下令在每个州建立孔庙(630)			惠特比会议(664)	希拉古/出走麦地那(622) 《古兰经》书面定本的形成(650)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682)	
公元700年	怛罗斯战役(751)确定了中国和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边境线	加纳王国(8-11世纪)	穆斯林开始征服印度(711)	松赞干布宣布佛教为西藏国教 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749)			"黄金时代"(8-13世纪)		穆斯林入侵西班牙(711) 阿拔斯哈里发统治下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时期(750-1258)	
公元800年	查理曼大帝(在位758-814)		《往世书》成书(800-900)			萨迪·本·约瑟夫(882-942)	教皇权力的集中(800-1100)	阿拔斯王朝首都被迁往萨马拉(836)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佛教	儒教	神道教和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900年	中国五代十国时期(907-960) 中国宋朝(960-1279)	中美洲托尔特克文化(900-1100)阿拉斯加图勒文化(900-1300)			宋朝(960-1280)复兴了礼仪儒教,尤其是在赵恒时期(在位997-1022)	最大经典《道藏》于宋朝写成(960-1279)		克吕尼修院的建成(910)	哈拉智被谋杀(922) 《古兰经》经文最终定型(935)	10世纪时拜火教徒迁往印度
公元1000年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1066)	秘鲁奇穆文化(1000-1470)	耆那教盛行古吉拉特	米拉日巴(1079-1153)	张载(1020-1077)的《正蒙》为新儒家之基础		犹大·哈列维(1075-1141)	东西方教会大分裂(1054) 十字军(1095-1272)	穆斯林亵渎耶路撒冷的圣墓(1009) 安萨里(1058-1111)	
公元1100年	佛罗伦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1115) 中国金朝(1122-1234)	尼加拉瓜南部伊费文化(1100-1450) 阿兹特克文明(1170-1521)		荣西(1141-1215)将禅宗的临济宗带回了日本	整理校刊"五经"(1130-1200)		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	圣·法兰西斯(1182-1226)	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重新夺回耶路撒冷(1171)	
公元1200年	中国元朝(1279-1368)	印加文明(1200-1532)		道元(1200-53) 日莲(1222-82) 禅宗传入日本		长春真人(1148-1227)长途跋涉,谒见成吉思汗(1219)		宗教裁判所在欧洲的开始(1233)	德里苏丹的建立(1206) 蒙古人洗劫巴格达(1258) 马木留克夺取阿克里(1291)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佛教	儒教	神道教和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1300年	百年战争(1337-1453)欧洲黑死病(1350)中国明朝(1368-1644)					随着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犹太人益加被隔离	修会数量的增长			
公元1400年	哥伦布抵达圣萨尔瓦多(1492)	尼加拉瓜东部奥沃文化(1400)西非桑海帝国(15-16世纪)		佛教在南印度的衰落(15世纪)		整部《道藏》的印刷 日本应仁之乱(1467-78)	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1492)	西班牙建立宗教裁判所(1478)	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1453)	

第一章　最古老的宗教

宗教的起源问题

人类最早的祖先很可能来自非洲。非洲大陆和欧洲一度被森林 32
覆盖。随着草地和沼泽的增加，森林日渐稀疏，其中的猎物也变得愈加丰富。原始人类就出现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并不断地向现代人类演进。先是有了工具的使用者——能人（Homo habilis）；然后有了像我们一样用双脚行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然后到了大约250,000年前，就有了智人（Homo sapiens）。后来我们又发现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humans）。他们的四肢和骨架都很发达。他们和智人有着同样的或者是相并行的祖先。他们的名称来自最早发现了他们遗迹的一个西德小村庄。这个称呼有时会让人想起现代漫画里长着浓眉的暴徒。但他们是聪明伶俐的家伙。就像其他现代人一样，他们通过社会合作获得了优势，其中一个关键性要素就是语言。在某些尼安德特人的墓地，有一些留存至今的用来给骨头着色的赭土。这可以作为证据，表明尼人可能相信某种死后的生命。甚至在此之前，在史前直立人的遥远岁月中，也有一些痕迹可以证实他们对来世的信仰。

当我们把自身知识的触角伸展到更加遥远的人类史前时期时，就自然想要了解我们这些祖先们的生活；因此，我们最终也会探索人类宗教的起源问题。但是，我们很难从骨头中推断出古人的思想。同样地，我们也很难从经过雕凿的燧石来推断他们的情感；或者从被火熏烧过的动物骨架来发现他们的愿望。有些学者期望从今天的狩猎—采集者的宗教中，如澳大利亚土著人或者南美火地岛人（Tierra del Fuegans）的宗教中来推断宗教的起源。然后，这是一种很冒险的
做法，因为今天存在的每个民族都度过了许多世纪，也就必然经历了 34
许多变化。而且这样的做法还可能会滋长某种种族主义思想，认为

狩猎—采集者从根本上就是"原始的"。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存在某种叫做"原始宗教"的东西。这种观点还意味着当代的土著人社会正处于进化发展的某个停滞时期。对于那些进入他们领地，剥夺他们土地的人来说，这可是一种很方便的思想。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狩猎和采集社会中学到某些东西。如果早期人类也过着与此相同的生活，我们显然就能从中听到来自史前人类的回响。然而，早期的人类在基本性格和智力方面与我们大致相仿。惟一不同的只是在文化风格上，以及在当今世界组织的更大复杂性方面。现代的狩猎和采集社会在某些方面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应该记住，所谓探寻某种单一"史前宗教"的想法无疑是错误的。公元前30,000年以后，在西伯利亚、澳大利亚、非洲、欧洲，以及稍晚一点在美洲，不同的文化中一定正在形成迥然不同的礼仪和信仰模式，其中有些文化还展示了辉煌的岩石绘画和洞穴壁画。在地域上，这些文化的分布从法国西南和西班牙北部直至乌拉尔山



法国比利牛斯山脉阿里埃日(Ariège)地区宽阔的 Volp 洞穴中的野生动物壁画，这里画的是一匹马，时间约为公元前12,000年。

脉和南部非洲；在时间上则从公元前 20,000 年差不多直至近现代。琥珀色的野牛，黑白的奶牛，马，乌鸦以及雄鹰等等，跃然于那些远古材料的表面。狩猎者的形象和弓箭也一样栩栩如生。这些绘画都神秘莫测，有时它们还深埋地下，就像大地母亲的彩绘子宫。柳编的古老油灯发出昏暗灯光，让人看到远古人类令人惊叹的模仿技能。至 35
于这些艺术杰作背后的思想和礼仪，我们找不到任何记载，所以只能作些推测而已。

因此，对于宗教起源的问题，我们只能进行推测。现在已经不再流行创建什么理论。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这种做法曾经风行一时。比如像《金枝》(*Golden Bough*)的著名作者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 1854—1941)，他就认为存在着某种观念的进化：开始是运用巫术，即在仪式中说一些神圣的话语，试图胁迫大自然，使自然的运作服从人的愿望，由此进一步发展到宗教本身。后者的特点是试图讨好不可见的力量，而不是要征服它们。弗雷泽认为，在当今时代，科学已经取代这些应对世界的方法，成为驾驭各种自然力量的最理性和最有效的方法。一位早期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 1832—1917)认为，原始宗教就完全存在于对不可见精灵的信仰和实践之中。他把这种宗教称为"万物有灵论"(animism)(这是一个大多数现代学者都反对的术语，但是仍然得到广泛使用。在人口普查中它还被用来指小型社会中的传统和土著宗教)。另外一个人类学家，马雷特(R. R. Marett, 1866—1943)提出，"前万物有灵论"(preanimism)和"活力论"(dynamism)是更加古老和更加基本的观念。它们认为自然中弥漫着非人格力量，而人能够通过各种礼仪来与之进行沟通。通常用来指称这些力量的是一个美拉尼西亚词汇"玛纳"(mana)。它是一种存在于任何不寻常的东西中的神圣力量。这种东西可以是一块怪石，一座奇异的山脉，不寻常的人，一个酋长，一个漂亮女人，一头凶残的熊，或者任何其他什么东西。他的理论是，宗教最初开始于对玛纳的信仰，再进展到对更加人格化的精灵的信仰，然后又发展到神灵人格化更加充分的多神教。最后发展到一神教和无神论(这后一项额外的发展取决于理论家的基本意识形态)。

这种进化论的理论框架是可以斟酌的。威廉·施米特(Wilhelm Schmidt,1868—1954)是一位天主教神甫和人类学家。他就发现,在许多规模较小的社会里,人们普遍信仰在众多神灵、精灵和力量"之后"或者"之上"还存在着一个高位神(High God)。他认为这种情况表明了有神论的实质——信仰一个人格神——这个神来自于一种原始的启示,随后又被对众多神灵的信仰所覆盖。施米特希望拯救人类历史最初关于启示的传统观念,能够反映《创世记》中记载的上帝对人类始祖的态度。

这些思想可能有点道理。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同意任何此类的观点。我们也不会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追随弗洛伊德(1856—1939)在《图腾和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中所作的解释。这部书过分强调图腾崇拜,也就是对一个社群中的不同部分与某种动物或者实物之间的祭祀关系的信仰和实践。其实图腾崇拜在小规模宗教中从来都没有人们想像的那种普遍性。弗洛伊德的解释立足于其心理分析理论,并依赖于现代维也纳核心家庭的动态背景(dynamics of the nuclear family)。

史前生活的种种模式

36 如果要探讨史前宗教基本的观念和主题,我们就需要考虑石器时代以及更早的时代中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它们包括:在追捕比较灵活的大型动物时,以及在捕鱼时对群体合作的需要;可以追溯到直立人时期的火的发现和利用;故事在任何群体的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在大规模捕猎行动期间有许多时间需要消磨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对内在生命——梦和幻觉的反思,这可能还是冥想和瑜珈的早期形式;广阔天空及其与世俗周期性现象,如月经的周而复始的关系;关于能够说话和狩猎的人类是从他们赖以生存的动物中分离出来的特别一支的感受;礼仪和礼节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画像的魔力以及绘画和雕像的成功;人对自然,尤其是对动物和植物的极度依赖;人类以及其他生物身上的繁殖和生育能力;疾病的实质以及对保持健康的关注;死亡的普遍性;天空中的风暴和

环境的残酷；以及音乐开始具备的力量。

史前宗教的诸层面

从对上述主要问题的反思中以及考古发现中，我们就能对早期人类的宗教生活做一些大胆的猜测。让我们先说说仪式层面。第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是，宗教礼仪和庆典行为与我们作为人彼此交往所使用的那种程式化行为和言语的相通性。用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911—1960)提炼的一个词来说，人类的语言充满了行为性的表达方式(performance utterances)，也就是说，人们使用的语言不只是通知转达信息，而是实施或者从事了某些事——比如像诅咒，承诺，感谢，恳求或者致敬等等。每一句充分的行为性话语，就该词的广泛含义而言，都有着礼仪的一面。人们彼此说"早晨好"的时候就是如此。这样的问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仪式。通过这个礼仪，两个人在新一天开始的时候都接受了彼此的存在，并延续了彼此在前一天的关系。

早期的人类，通过使用语言和身体姿势，已经意识到群体和谐对于群体生存的至关重要性，因为人类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有能力对付像熊之类更强壮的动物。既然礼仪中使用的行为能够如此有效地团结群体并影响他们的狩猎和采集策略，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认为，这种行为在群体以外的场合也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像在群体与动物，自然力量，以及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整个宇宙的关系方面也是如此。因此，为这些事物所举行的礼仪可能成了自直立人以后早期人类生活结构和特征的一个部分。这在尼安德特人一族以及他的旁支，我们直接的祖先智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如此。

在墓葬的遗址中，在骷髅崇拜中，在法国拉科斯(Lascaux)，西班牙阿尔塔米拉(Altamira)之类的神秘洞穴绘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瑞士东部的一个洞穴中，有许多小洞穴，其中一个的墙上有许多壁龛，里面放着一些熊颅骨。除非我们认为这是针对熊的一些礼仪，否则就很难做出解释。有些人认为这些绘画与狩猎巫术有关。洞穴壁上以及骨头饰物上描绘着栩栩如生的野牛和其他野兽，让人联想到这些人的食物来源。然而，有些洞穴的位置让人无 37

法接近;有些被发现的灯具制作精良;绘制或者雕刻的抽象符号多种多样;所有这些都提示了某些更多的东西。

在人类文化史上,纯粹非人格的因果律观念要到很晚才得以确立。因此远古的人们在考虑他们的环境变化时,很可能会认为这些变化是由某种人格的原因引起的。除了各个群体中传承下来的历史知识以外,远古的人们对过去不可能了解很多。他们必须从自身经验中得出关于宇宙的看法。因此,他们通过礼仪手段来与各种力量建立潜在关系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

有些安葬礼仪还让人想到某种想让人们安全进入来世的仪式:尼安德特人的死者遗骨上就抹着红色的赭土。这可能是某种仪式性的重新输血,以象征复活的肉体。北京周口店直立人遗骨则提示了对人类艰难生存的关注。在法国多尔多涅(Dordogne)省的穆斯提尔(Moustier),安葬着一个年轻的尼安德特人。他头枕着平滑的石头,侧身右卧;在他的身边则是烧焦的动物骨头以及一把手斧。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对死后生命的某种信仰。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礼仪性行为无疑也证明了对死亡者的敬重和毫无疑问的热爱。

38 我们能够推测的另一个要素是象征性思维。一个象征符号就是代表了某种其他事物的东西。最明显,最有力的象征性思维的例证就是用某一类事物中的一个来代表该类事物的全部。它暗示了一种隐藏并弥漫在该类事物所有个体背后模糊而又真实的事物或精神集合体。一头野牛就代表了所有的野牛;推而广之,一幅画像也就代表了它所归属的那种事物。当今时代的哲学家们用所谓的"唯实论"(realism)来反对"唯名论"(nominalism),实际上也就是上述那种态度的回音(唯名论是这样一种思想:包含了同一种类所有个体的概念是通用名词[common name];唯实论作为一种理论源于柏拉图[Plato]。这种理论认为个体都分享了同一个"实在的"共相[real universal])。

这样一种观念使得人们以为,他们的象征性礼仪能使他们参与到这样一种力量中,这种力量就内在于他们的祭祀或圣餐所指向的对象。甚至还可能有这种情况:阿尔塔米拉,拉科斯以及其他地方的辉煌艺术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祭品,奉献给野牛以及艺术作品所代

表的其他动物种类所具有的神圣力量。

在法国三兄弟(Les Trois Frères)洞穴中有一幅著名的人物画像。他好像披着兽皮，戴着鹿角，可能是一个大巫师，或者一个萨满——即一个宗教专职人员，能够通过与神圣力量的接触而进入迷狂状态，并从中得到强大的力量。在英国斯塔卡尔(Star Carr)的一个湖边，人们发现了一个上面钻了几个孔的有角颅骨，说明它是一个供人们佩带的头饰，这让人想起西伯利亚和其他地方的现代萨满所佩戴的几种头饰。我后面还会讨论史前的萨满教问题。现在让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古代人类所持有的世界观。



著名的舞者巫师(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或者萨满形象。在法国南部阿里埃日地区三兄弟洞穴里幸存下来的丰富雕刻作品中，它最为引人注目。

狩猎者和采集者拥有大量闲暇时间。这在资源丰富时尤其如此。他们的生活既不同于大多数农耕生活的艰辛乏味，更不同于工业社会中的打卡工作。随着取火以及保存火种技术的发明，人类自然就开始关心温暖问题，注重社会交往。结果讲故事就不可避免地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讲故事能够牢牢地抓住人们的想像力。那是一种对过去的回望，有选择地使人想起过去的事情，并且解释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形成规律。人们同样也会很自然地以为，史前时期人们的思维是从微观演进到宏观、从人的处境演进到对整个环境的描绘。除了我们已经间接提到的那些观念——比如像在人类事务和自然中都发挥作用的人格化因果律(personal causation)；类似事物都在相同本质作用下而富有生机——对故事形式的偏爱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神话。它们包括：天地是怎样协调发挥作用的；月亮盈亏的方式以及妇女是怎样表现这种月亮特性的；野牛和狐狸的灵魂是怎样被造出来的；人怎样才能变成动物，并从一种动物变成为另一种动物；山脉为什么矗立在那里；大海是怎样形成的；海底精灵是怎样使鲸鱼繁殖的。随着定居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北部、泰国、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发展，对生殖力的关注以及把地球当作女人

的比喻无疑也变得日益重要。

39 穿插了许多象征符号的故事形式被完美地融入礼仪之中。早期人类就运用这些礼仪来赞美并讨好周围的各种力量。然而，这些故事里可能就有关于创始问题的尝试性解答。在人类某些早期经典中就能发现这样的思想：可能有一个神灵(Spirit)创造了一个蛋，其他的事物就来源自于此。或者可能是，第一存在(First Being)需要一个他者(Other)的思想开启了世界的进化。或者世界可能是由几个事物创造的(但是它们又是从何而来，那一个神灵又从何而来？——对于终极起源总有难解之谜)。或者是一些事物可能总是存在着，比如像水，它们在世界能够凝结或形成之前需要被搅动起来。

当然还有关于苦难的问题。我们怎么会遭受这些苦难？死亡又是从哪里而来？也许这是由于人类与神灵之间最早的疏离。很容易想像人类已经疏远了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以及我们)正想着其他的事物，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已经充分理解未来以及死亡的本质。但是我们人类却面临着这样的恐惧。

40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死亡就是终结吗？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问题表达了早期人类的教义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表明他们信仰某种来世的生命。还有一些与死者的告别礼仪，也可能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景仰。如果这样的话，早期人类一定对那另外的生命感到困惑：他也在别的地方狩猎吗？或者他碰巧也会再生为动物或者人或者灵魂吗？也许这里就有认识论的开端：也就是依靠生动的梦境以及在求知、舞蹈和自我控制中诱发的清晰景象，反思如何认识事物。也许正是萨满的异象为后来各种精致的瑜伽术铺平了道路。男男女女都注意到了他们各自的力量，并且发现通过运用语言，他们可以用甚至连神圣聪明的熊都无法得到的方式来思考。

萨满教也许能告诉我们某些史前人类的经验。那些有着强烈异象和梦境的人也会与某种动物——比如像野牛，蛇，乌鸦，老虎等，有亲密的关系。而且他们对狩猎方向也有特别的知识。他们还有治愈灵魂和身体疾病的知识。在他们进入幻觉状态期间，他们能够潜入亡者所在的世界，能够通过经历病人的痛苦和艰辛而拯救病人。这种做法有赖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身体和心智是相互交织的。岩石和

精灵，树木和神灵也是如此。精神可以被视为人或者动物的本质：但是人们也可以这样看待骨头。萨满死后，人们把他的肉从骨头上剔除（像死者那样），然后再重新拼装起来。



所谓的维朗多尔夫（Willendorf）维纳斯。发现于奥地利维朗多尔夫。它是用石灰石雕刻而成，时间约为公元前30,000到25,000年。还发现了几个与此类似的雕刻品，让人意识到女性生殖神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由于女性形象是旧石器时代艺术和宗教的重要代表，我们就很自然地要考虑它们的意义。在西伯利亚的贝加尔（Baikal）湖附近，人们发现了不下于20个女神小雕像。在意大利的里古列尔（Liguria），奥地利和法国都发现了出自相近时代的女神塑像。有时候，乳房的表达非常地夸张，而双腿通常则并拢在一起，往下逐渐地变细（让人

想到它们是直立在地上)。因此可以看出,生殖女神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保留至今的物品中,气候和其他的条件也许是有着选择,比如说石头(而不是稻草麦秆之类的东西)可以留存至今。因此我们关于早期社会的知识可能会有所偏离。即使如此,认为女神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仍然是很合理的。将它们与现存的狩猎和采集社会相比较,生殖的概念和象征很可能在这些早期文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使用洞穴并不只是为了把它作为庇护所,而且也是为了举行与这些辉煌壁画有关的礼仪,让人想起这些洞穴一度被人视为子宫。女性可能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她们是世界的创造者,是动物的女主人(人类不可思议地依赖着它们),是追踪和捕杀动物的助手。远古人类不会不注意到妇女生理周期不但与月亮周期变化相似,而且总的说来,
41 还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季节和生死的周期变化。女性在许多方面都不可思议地比男性更有潜力。我们也会注意到,远古人类无疑都明白他们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这种区别部分地在于他们的智力水平。所以,我们现在也许可以说,人类的力量部分地依赖于他们的宗教。

我们也许可以接受,远古人类在面对强大的神圣力量时将会产生敬畏感——亦即那种超自然的经验——就像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在其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当他们在草原上潜步追踪斑马时,或者在一起计划下一次狩猎大象时,或者当他们在火堆旁懒洋洋地晃动,想着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遭遇时,所有这些都可能帮助他们形成自我意识,使他们感到人类是与周围的环境相分离的。他们可能对乞力马扎罗山脉周围或者阿尔卑斯山下划破天际的闪电感到恐惧和敬畏;猛烈的冰雹也可能会让他们胆怯。然而,他们也会体会到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开始体会到与其他人类群体的亲密关系。因此他们很可能在自我意识中考虑过世界的创始问题。其中有些人无疑会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为此编出一个关于其起源的神话。他们这样做,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拥有关于某事物起源的知识乃是你对该事物拥有支配力量的一个方法。

我们对于远古人类的伦理层面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幅员辽阔,

人口稀少并且分布零散，但群体之间的征战无疑是很常见的。有些遗迹上就留着人为伤害的痕迹。随着以粮食富裕和农业耕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定居点和城镇的出现，人类就需要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制度。此类发展已经开始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领域、中国北方等地进入历史舞台。

对于远古人类许多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制度层面的本质特征，我们只能做一些猜测。某些有影响的早期理论也是有错有对。给历史的发展套上过分有序的进化秩序是错误的；更加错误的是认为所谓的"原始人"在基本结构和制度方面的发展远比我们自己逊色。那些理论错误地忽略了那些可以在现代人身上发现的所谓"原始"思想的方法。它们的概括通常太普遍，到处都发现（比如）图腾崇拜。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有在某个时候曾经被认为是早期宗教特有的各种因素，但是上述理论却把它们糅合成一个个畸形的整体。因此，可以认为，某些史前群体里的男男女女在信奉一个至高神，即信奉一神教的时候，还将其与其他许多思想进行糅合，其中包括许多有点被人格化了的力量的思想（多神教和万物有灵论），以及有着较少人格化特征的神圣力量的观念（物力论）。他们也许信仰一种死后的生活，也许还开始做一种正在成为某种原始瑜伽术的自我控制技能。

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雕刻的骨头上和洞穴壁画中，某些非常古老的部落创作了一些非常辉煌的艺术。他们生活的物质层面，就我们目前所知，也是激动人心的。这进一步表明了，认为他们与我们有 42
着根本差别的看法是不明智的。

他们也发明创造了一些符号和印记。他们是书写艺术的先驱。其中有些可能记录了月亮的盈亏，其他的则可能与祖先崇拜的礼仪有关。如果说他们对于天体有比较复杂的知识，那一点都不奇怪；如果说人类有一种进化，那就是一种逐渐积累的文化的进化。因为随着语言的触角变得日渐广阔，人们也随之积累了一大堆理解和控制世界的概念。

还有一些我不想在这里探讨的史前文化问题，比如像北欧的巨石文化，以及印度河流域远古文明的神秘遗址。我将按地区来阐述这种城镇和石头建筑的史前文化。这本身会有助于驱除一种单一史前史的幻想。鉴于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指导我们判断早期人类的精神

生活，结果就使我们很容易犯上述那种错误。

我们也需要记住，我们正在谈论一段很长的时期——直立人的出现也许是在二百多万年之前。人们在那些洞穴里连续居住并劳作的时间可能长达一两百万年。人类进化到能人，从能人进化到直立人，又从直立人进化到智人，再从智人进化到我们自己，在这个不断进化的“上升”过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以后的人类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繁衍。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经历过所有这些发展的人类已经意识到了那个不可见的世界，并且一直在用各种不同方式试图理解那个世界。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自己与动物的亲近，然而也明白与它们的距离。如果他们感到能够与作为他们食物的熊和公鹿进行交流，他们也知道怎样才能或多或少地控制生活，怎样才能开始以技术征服自然的漫长征程，其中还包括至少是他们所渴望的对自我本性的征服。但是类似的仇恨和爱恋，以及类似的身处一个群体之中的对身份的感觉，无疑使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生气勃勃，只是我们已经变得比他们更加危险。

第二章 南　　亚

印度的多样性

人们常常把印度称为次大陆。它的范围是很好确定的，因为它是冈瓦纳古(Gondwanaland)大陆的一部分慢慢向北漂移，最终与亚洲大陆的南部相接的结果。后来，喜马拉雅山脉升起，在印度和亚洲大陆之间形成了一个屏障，除了西北部之外几乎无法通过，这样便使印度文化主要是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上。谈到印度的范围，我们不能被现代政治的划分所迷惑。历史上的印度，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等国家。 43

印度次大陆的顶部和底部，分别是西藏和斯里兰卡，那里的居民主要是佛教徒。在一段时间内次大陆主要流行佛教，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印度教变成了印度生活的主要势力，同时还存在着伊斯兰教。在印度文明最辉煌的时期，一般说是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一千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主要流行的是印度教与佛教相混合的印度文化，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宗教因素，如耆那教(Jainism)以及在很远的西南部基督教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这种印度文明在内部有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它的丰富多彩是由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印度是在一个主要帝国的控制之下，而在另一些时期它又分裂为形形色色的小国和部落的飞地[①]。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有各种各样的语言，从北印度的印欧语(如古吉拉特语[Gujerati]、印地语[Hindi]、孟加拉语[Bengali])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Dravidian)语(泰米尔语[Tamil]、泰卢固语[Telugu]、卡纳塔语[Kannada]、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随着这些语言的发展，它们都成了传达各种不

① 一国境内的外国领土称为"飞地"。——译注

44 同类型虔诚信仰的工具。除了语言的差异外，这里还有气候上和地形上的差异，从斯里兰卡和喀啦拉（Kerala）的高山和绿色森林到古吉拉特（Rajasthan）的干燥沙漠，从季风区的湿热气候到喜马拉雅山麓的蒙蒙细雨和白雪。

谈到被称为印度教的一些东西可能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各种习俗、崇拜形式、神灵、神话、哲学、祭祀仪式、教派运动、艺术和音乐的风格，都被广泛地包括在这种宗教的范围之内。一些学者甚至想抛掉这个宗教术语。但是，在现代比以前能更好地确定印度传统中一些东西的意义。这好比是过去的许多个印度教合并成现在的一个印度教。现在，印度教更像一棵大树的树干，而它的过去却像是树上无数杂乱的枝杈。

45 有关宗教思想和实践的形成，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即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出现的早期印度教经典《梨俱吠陀》（*Rig Veda*）所反映的文化。

下一个阶段可以称为前古典时代，这个阶段涉及到各种世界观的形成、创造性的改进和发展，它包括著名经典《奥义书》（Upanishads，公元前800—前400年）的各种篇章、大雄·耆那（Mahavira the Jain）和乔达莫·佛陀（Gautama the Buddha，公元前500年）的教导以及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一般地说，这个阶段持续一千余年，从公元前1000年到新千年的转折期（到公元100年）。

再下面，我们进入了一直延续到公元1000年的伟大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这个阶段包括古典印度教各种信仰的发展，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和整个佛教的繁荣以及后来它们在印度的衰落。这个时期就是“印度教—佛教文明”时期，同时也包括许多其他信仰在其中。

然后，从公元1000年一直到近代（一般到1750年）形成了次大陆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文明”时期。这个时期包括大莫卧儿（Mughals）帝国在德里（Delhi）的统治、传统印度教的巩固、锡克教（Sikhs）的产生以及阿克巴（Akba，在位时间为1562—1605年）力图

创立一个能包容印度许多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意识形态。这个时期叫做"中世纪" 阶段,它是随着欧洲人的不断入侵,尤其是英国人对这个地区最终统治而告结束的。

1750 年以后,进入近现代。在这个时代,可以看到欧洲传教士的到来、英国统治的建立、铁路、高等教育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相对集中的行政管理。近现代还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革新、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以及后来巴基斯坦又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中国对西藏实行现代化。最主要的是,这个时期使人们对印度教有了新的理解。

在以上各个阶段出现了许多帝国,这些帝国有的时候统一了大部分的印度,有的时候则没有统一。例如,早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它延续到大约公元前 1500 年;一直持续到前古典时期末尾的孔雀帝国(The Mauryan Empire),特别是在倡导佛教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为公元前 269—前 232 年)统治之下;古典时期的笈多帝国(Gupta empire)和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现代以前的莫卧儿帝国等。尤其是在贵霜王朝时期,梵文文化在整个印度的传播促进了次大陆的统一。甚至在佛教徒中,他们虽然否定梵文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婆罗门的权威,但是也把梵文应用于佛教的经典和评注中。在斯里兰卡佛经是用巴利文(Pali)写的,而在西藏佛经被翻译成藏文。这些语言的差异逐渐成为印度、西藏和僧伽罗(Sinhala)各种文化之间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46

无论从哪一种方式来看,都不能把南亚——印度次大陆——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单位。各个大的帝国、地方小王国和其他集团都曾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而存在的状态是相当正常的。

组成印度宗教的各种成分

因为印度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这段历史特别复杂,所以印度有许多能代表印度思想特点的教义、仪礼、经验和习俗等。特别是西方读者以及那些受过现代教育而疏远了自己文化遗产的南亚人,对这

些东西也是不太熟悉的。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古代印度教、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一些主要组成成分，信仰和实践等。在讨论印度宗教历史之前，我们先浏览一下这些成分是十分有益的：这些成分构成了印度宗教的主要内容，比如神灵、圣人、庙宇，以及形成这些内容的各种背景情况。

如果我们能奇迹般地回到印度文化古典时代的圣河——恒河沿岸的一些圣城，我们就会被那些辉煌壮观的庙宇、形形色色的人物所感动：从剃有部分光头的傲慢的婆罗门，到头发杂乱的隐士；从失去丈夫并专心虔信行为的白皮肤的妇女，到属于耆那教和佛教的和尚和尼姑们。下面，让我们从七个层面来分析这些成分：

在仪式和实践层面，有三个主要因素：瑜伽(yoga)或称自我修炼、崇拜方式和献祭活动。在古代，传统的瑜伽构成了向内追求的基础，是修炼心思的形式，各个派别或运动都按照自己的不同方式来修炼。再往后，在近代以前的时期，瑜伽又增添了一种体操的形式，到了20世纪这种体操在西方很流行，经常与瑜伽等同起来，虽然实际上远没有精神修炼那样重要。瑜伽向内追求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真正的自我或达到解脱。瑜伽是印度精神传统的主要成分之一。

在古代印度，崇拜活动主要是面向以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大神为主导的各种神灵的。起初，佛教的崇拜活动只不过是举行仪式纪念伟大的导师，但是后来当发展到大乘佛教时期，佛教徒也把佛陀视为一位神，他们的崇拜则表现在对佛陀的热情奉献和虔信上。

在早期的印度，有各种类型的献祭活动。后来，佛教和耆那教特别尊重动物生命，在这两种宗教的影响下，奉献的祭品渐渐地只限于植物生命、熔化了的黄油和其他类似的东西。掌管献祭仪式的人是婆罗门，他们是四个阶层中的最高等级，后来这四个阶层构成了严格
47 种姓制度的骨架。由于婆罗门具有献祭的专门知识，所以他们控制了庙宇的各种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在最早期的婆罗门教，即吠陀时期，并不存在。庙宇是各种神灵居住的寓所，在这里神灵的日常生活被固定下来，丰富多彩的节日庆典也经常在庙宇中举行。

虽然朝圣活动在仪式层面是不太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耆那教、佛教和婆罗门教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崇拜圣河、神庙、伟

大人物的出生地，以及佛陀(Buddha)坐在树下成佛的那棵菩提树(Bodhi Tree)。信徒们还艰难跋涉到一些大山、恒河的发源地，以及圣贤禅思或实践苦行的地方去朝圣。

表示苦行的梵文词是“tapas”，其字面的意思足“发热”，因为严 *48*
格的自我禁欲活动可以在身体中产生热量，伴随着热量能产生出巨大的力量。苦行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逐渐变成一些宗教派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耆那教。与苦行极端对立的是密教(Tantra)，密教运用一些秘密传授的不可思议的手段去获得解脱，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运用一些被正常人所禁止的手段，如男女交合、吃肉等等。运用这些手段，密教的高手可以超越一般的社会法则。

所以，在印度教、佛教和其他宗教繁多的仪礼中，我们可以列举许多重要的实践活动，如瑜伽、崇拜、献祭、朝圣、苦行和密教实践等。从经验和感情的角度上看，这些仪礼活动背后的那种精神是不断变化着的。许多诗人或其他人都表达出了宗教徒的那种虔诚情感，这种情感总是是与神庙中的崇拜、朝圣和宗教节日中的狂热结合在一起的。在瑜伽的背后，有一种静思或“禅”(dhyana)的精神，这种精神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欢喜和向内观想，即所谓的解脱。对苦行者来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和巨大力量，因此按照神话传说，高超的苦行大师可以吓走神灵，因为苦行可以获得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神奇力量。

印度古代文化中的神话，是围绕着许多主题的。在印度有数百万个神灵(按传统说，有3.3亿个神)，但是三大主神，梵天(Brahma)、毗湿奴和湿婆，是最主要的。他们的配偶也非常重要，这些女神被看作是性力(sakti)或创造性力量的人格化显现。在印度文明中女性被视为积极主动的，而男性则是消极被动的。有的时候在一些教派中，如性力派，最高的实在就是女神杜尔迦(Durga)或迦利(Kali)。另一个主题是化身(avatar)或神的人格化形象，主要是毗湿奴的各种化身，这个主题在著名大诗史《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na*)中起了重要作用。一般认为，这些作为化身的神往往在衰败时代的后期下凡人世，为的是恢复正确的教导和行为。这类的主题在印度三大传统宗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

教中到处都可以发现。关于佛陀，准确地说，他不是下凡的神，而是一个进人世间，为人类重建真理的超人。

在无数的神话故事中，神灵被描述为各种各样的形象，因此逐渐出现了一种观点：各种神灵只是同一个最高神圣存在的不同显现。这种思想最初出现在《梨俱吠陀》中，后来它变成了综合各种不同神话的一种方法。

在印度文化所有的信仰体系中，都盛行这样一种“衰退观念”（a sense of decline）。现在的时代或称迦利时期（Kaliyuga），是无限时间循环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促使人类存在的衰退，而进人一个不断出现混乱和邪恶的时代。在佛教的宇宙观中就有这种观念，即你所处的时代离佛陀生活的时代越远，宗教越衰退。

以上这些思想都必须用教义和哲学的主题来加以解释，这些主题才真正代表印度古代文化的特点。一个最普遍流行的主题是再生（rebirth）或再一次肉体化。每一个个体生命实际上都要经历无限的时间，通过许多次的出生。一个人的命运，是靠他的前世和今生所做
49 的行为来决定的。这种“业的法则”（law of karma，“业”指的是人的行为）把人的生命与存在的循环——轮回（samsāra）捆绑在一起。摆脱轮回的愿望，或至少是战胜这种令人厌烦的结果的愿望，使人竭尽全力去追求解脱（moksa）。当一个人摆脱了轮回或至少是通过对世界本质的超然认识而战胜轮回时，他将最终获得解脱。在佛教传统中常常把解脱称为“涅槃”（nirvāna），而在耆那教的传统中却把它归于“完全知”（kevala）或摆脱尘世。

作为创造者的神也与轮回的过程有联系，但是它经常被看作是超越一切描述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梵（Brahman），当它以人格化的形式出现时，是高于一切神的。所以，在一些哲学中这种至高的神与每个人内在的灵魂，即永恒的阿特曼（ātman）或自我（Self），是同一不二的。一个人只要通过向内的观想和冥思，就可以证悟到自已内在永恒的自我，同时还可以实现与惟一神圣存在——梵的统一。在印度还有许多信仰体系不承认神的观念，因此在它们那里解脱并不是实现与神的结合，而只是从再生的轮回中摆脱出来。

所以，古代印度文化有几种占主导地位的教义学说：再生或再一

次肉体化的思想、可以实现最终解脱的思想、能够创造和再创造、毁灭和再毁灭宇宙的那些人格化神的思想、高于人格化神的不可言说的梵的思想、在每个活着的人内部都存在着“某种永恒之物”的思想。在印度传统中不同的哲学体系都是以不同的方法来表达的，它们用这些方法把不同的思想拼凑在一起。

谈到伦理层面，佛教和耆那教虽然观点不同，但是它们都非常重视不杀害生命的实践活动。这种思想也影响到婆罗门，他们也逐步成为素食主义者。不杀生是禁欲主义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禁欲主义渗透于古代印度文明的各个领域。这种“放弃”的思想经常采取脱离尘世的形式，因而使一个人成为和尚或尼姑。然而，能够取替这种形式的就是印度教“四个生活时期”的体系，这个体系被视为虔诚家庭户主的理想。按照这个体系：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是过独身的学生生活，应在婆罗门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宗教知识；而后，他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持者；第三个时期，他开始脱离家庭和公共生活；最后，他成为一个四处漫游的、无家的隐士或游方僧（sannyāsin）。这种体系是在世生活与出世生活之间相互妥协的一种道德。按照这个体系，一个人的道德义务和宗教仪礼义务，逐渐地就由他所在的特定生活时期来决定了。

当然，对再生的普遍信仰在理解整个道德生活中是有很大影响的。一般印度传统中有一个典型的思想是：一个人通过积德行善可以改变自己未来的地位，甚至能升到天堂。积德可以通过慈善的捐赠（为虔诚的目的向圣者捐款，如修缮庙宇等）来实现，但是最主要的是多做善事。

简言之，从道德的角度看，印度文明中有许多永恒的因素：尊重 50
一切生命的尊严的观念、重视禁欲生活特殊性的观念、强调积德行善的观念、在实践生活中更多地重视人的生活时期的观念。

以上各种思想都与印度古代文化的社会和制度层面分不开。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种姓制度的基本构架形成于印欧人侵人印度的初期，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这些入侵者像其他说印欧语的人群一样，也划分为三个阶层：祭司（Brahmins，婆罗门）、武士（Ksatriyas，刹帝利）、手工业者和其他为前两个高级

阶层服务的人(Vaiśyas, 吠舍)。当他们征服了当地居民以后,作为奴隶和仆人的第四个阶层(Sūdras,首陀罗)也出现了。继续发展下去,第五个阶层,即"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也逐渐被承认。因为印度教的宗教仪式非常重视纯洁性,所以包括四个或五个等级的这种体系也被实际流行的纯洁和不纯洁的观念所逐渐强化:高等级的印度人在接触低等级的人时,特别是与那些不可接触者的接触时,有可能被他们所污染。这最后一个等级也包括各种部落民族,这些部落民族也被吸收到印度大的社会结构中。前四个等级被称为"瓦尔那"(varnas),这个词的原意是"肤色"(colors)。"瓦尔那"这个名称可能是出自种族的差别,因为说印欧语的入侵者原初是白皮肤的。后来,这种"瓦尔那"制度不断得到加强,而且由于出现许多亚种姓,即所谓的"贾提"(jatis, 有出身或血统的意思),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以种姓制度著称的庞大体系,代表着印度社会所形成的等级制度。但是,佛教徒和其他一些宗教徒从来不承认这个制度,特别是当他们(包括男人和女人)加人僧迦社团(Sangha)后,他们就脱离了他们背后的社会等级。佛教的僧迦制度,耆那教类似的制度,都是古代印度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教伟大的改革家商羯罗(Sankara,公元 8 世纪后期)创立了宗教社团后,僧侣制度在印度教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各种类型的圣人也是印度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持祭祀的婆罗门,是印度教等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佛教徒和其他宗教徒,他们穿着棕色、灰色或象征旗帜的红色的长袍;裸体的圣徒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光身露体表示他们已完全弃绝了世俗生活;古鲁(gurus)或各种类型的导师;游方僧或其他不同信仰的隐士等等。此外,各种动物,主要是母牛,也是神圣力量的源泉,具有洗涤罪恶的效力。如果以上的人物代表的是对世俗社会的弃绝,那么,那种受性欲影响的对世界的强烈之爱也是印度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家庭是社会生活的重要中心,也是举行家庭宗教仪式的中心。

就物质和艺术层面而言,在古代就可以看到具有典型特征的印度风光——庙宇(早期婆罗门教就有一些暂时的祭神场所和建筑

物)。除了祭祀神灵的神龛之外,还有佛教和耆那教的庙宇。此外, 51
还有圣河——圣洁和积累功德的源泉、圣山、神灵和尊师的出生地等。在庙宇中供奉着各种神灵的画像和雕塑,如佛陀的塑像、大雄的塑像、其他耆那教伟大人物的塑像以及印度教的神灵等。在家庭中,也摆放着小的神龛。有一些古代的雕像,无论是佛陀布道、讲经的形象,还是他寂灭时躺着的形象,或者湿婆大神跳舞的形象,都是非常雄伟壮观的。在斯里兰卡,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和波隆那鲁瓦(Polonnaruwa)古城的黄金时代产生出了伟大的艺术。在西藏发展出一种奇妙的画像,它们描绘的是佛教传统中一些在天上的神圣存在。还有许多画像小而且便宜,主要面对农村和穷人的;有一些雕塑是用泥做的,临时用于印度宗教历法中一些大的节日。这些画像和雕塑都是免费发放的。在所有的形象中最有力量的是一种带有圆顶的石头柱子,即林伽(Lingam,男性生殖器)。林伽具有质朴而又富于性欲的力量,它代表着神灵的强大生殖能力。

以上各个方面,我们可以列表如下:

诸层面	具体内容
仪式和实践	瑜伽、崇拜、献祭、朝圣、苦行和密教修行
体验和感情	虔信、禅思、具有神奇力量的意识
叙事和神话	众多的神灵、重建真理的宗教英雄、衰退的时代
教义和哲学	再生、解脱的可能性、人格化的神、非人格化的梵、永恒的灵魂或每个人内部追求自由的本性
道德和法律	尊崇动物、禁欲精神、积德行善、一个人在生命不同时期的道德
社会和体制	种姓制度、僧伽制度、各种圣者、神牛、家庭
物质和艺术	圣地(圣山和圣河)、庙宇、神像、林伽

以上这些素材通过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印度宗教。正是这些古代的素材才形成了近代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教思想。

印度的早期

1924年在印度开始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伟大的古代

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使我们加深了对印度宗教的理解，因为它包含着许多有启发性的，预示未来发展的特点。这个伟大而统一文明的范围，是从南部的古吉拉特到北部的旁遮普(Punjab)，从西部的信德(Sind)到东部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边
52 界。它的主要城市是在印度河(Indus)畔的摩亨约·达罗(Mohenjo-Daro)和拉维河畔(Ravi，拉维河或拉维河附近，因为河床改变了河流的方向)的哈拉帕(Harappa)。这两座城市的街道一律都是方格型的，街道两旁建有高级的房子和一些普通房子，许多小巷穿过各个街区；城市还有一个高大的卫城，卫城包括一个样子很像庙宇的复杂建筑物和一个谷仓，在此上面有一个大的蓄水池或浴池。整个城市都修建了良好的排水系统。在每座城市的城墙外边(城墙的设计是为了抵抗洪水)，是务农者和其他为商人和祭司服务的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断，祭司是控制整个文明的人。

印度河流域文明与西面的埃兰文化(Elamite culture)①和苏美尔文化(Sumerian culture)有姻亲关系，或者说，有一定的联系。印度河领域文明可能从埃兰古国(Elam)吸收了它的书写系统。阿拉斯语(Alas)是一种至今还没翻译过来的文字，或至少还没有任何与之相一致的语言。与之最类似的语言就是最早的达罗毗荼语，说达罗毗荼语的民族也可能是游牧民族，他们从中亚向南迁徙到印度河地区，到这里后在农村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座城市和商业的文明。印度河文明从大约公元前 2500 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1500 年左右。这个文明突然结束了，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大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外部人的征服。许多学者认为，说印欧语的雅利安人(Aryans)的入侵毁灭了印度河流域文明，雅利安人是在大约公元前 1500 年进入印度的。

从印度河流域文明我们取得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获得了一批刻有清楚的表意文字的印章，对这些文字的翻译现在还有争议。这些印章把我们领入了一个特殊的世界，这里有各种女神、蛇、老虎、水

---

① 埃兰是伊朗西南部的古国，埃兰文化包括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至伊朗高地的文化。——译注

牛、独角兽、神圣的菩提树、公牛和大象等。印章上还刻有盘腿坐着的人物，有的时候人们把他想像为后来印度教湿婆大神的雏形。有的印章刻着一些小的人像，代表正在跳舞的男神和女神。但是，这些印章和人像所象征的意义仍是不清楚的。印章上有一些人与动物相混合的形象，特别是有一个奇妙的人物，可能是祭司或沙门，他留着优美的胡子，头的周围扎着箍。许多人物都具有暗示的意义：他们与后期达罗毗荼人崇拜生殖女神的观念有联系，这些女神既有仁慈的性格，又有凶残的属性。许多事实表明，当时在城市的高地上所举行的祭祀活动可能是最重要的活动。当时已经有了一大批女神和其他的神灵，而且也许出现了到印度河文明的居民所发祥的那座山上去朝圣的活动。另外，与湿婆相近似的那个人物也许就是一个代表生殖力的神。还有一些神话，讲神的夫妻关系。印章上的那头公牛看样子就是最大女神的配偶。

我们几乎没有证据来确定有关这个伟大文明的世界观和政治结构。我们只能设想，当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满生活活力的时候，每个家庭都会在雕塑的神像前举行祭祀活动。当时的宗教生活也包括沐浴，一些富裕的家庭常把动物作为献祭的牺牲品。在城外四周的农村有广阔的农田，农田所收获谷物的一部分要上缴到城市的谷仓。 53
所有这一切能够很好地组织起来，看来都是通过对宗教的忠诚、而不是靠什么权势。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没有发现当时有任何武器的证据。每当举行重大节日的时候，在建有沐浴水池的高台上，人们就会看到，祭司在献祭仪式上杀死动物，把它们供奉到女神面前，因为只有在女神的福佑下土地和农业才能获得丰收。无疑，各种家畜也来自于女神，女神可以保护它们，防止它们受到潜伏在地里和村边的老虎和毒蛇的攻击。

前古典时期

随着时间的流逝，达罗毗荼人逐渐向南迁移，他们对印度的宗教和文化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伟大的印度河文明也随之消失了。在印度河流域慢慢地出现了一个由雅利安文化和各种其他文化

成分所组成的新的综合体。从西北方面来的入侵者，逐渐定居在印度河（流向西南）和恒河（流向东方）之间的地区。后来，这种雅利安文化的核心地区扩展到恒河两岸，在雅利安文化中梵文是神圣的，后来它成为一种书面语言。到公元前6世纪，恒河两岸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如贝拿勒斯（Benares，现在的瓦拉纳西）和帕塔里普特拉（Pataliputra，现代的巴特那）。许多小的共和国和王国也正在成长之中。在这种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良好条件下，这个地区就出现了一个各种宗教运动兴起的浪潮。在大约500多年的一个时期内，雅利安人的祭司——婆罗门编纂了一个由神圣诗歌和宗教知识所组成的经典集。在同一个时期，大雄和佛陀复兴了苦行的传统；还有一些离经叛道的人提出了其他的世界观，与大雄和佛陀争论，也与婆罗门教正统思想相抗争。在这些思想原则中，既有否定一切超验思想和目标的唯物主义，也有否定一切观点的怀疑论。

婆罗门和苦行者

事实证明，在整个印度文明中婆罗门文化是最持久的因素。有一种婆罗门，他们认为自己是受梵的力量所激发，享有崇高的威信，与其他统称为“沙门”（śramanas）或“游方苦行僧”（wandering ascetics）的各种圣者一样是最杰出的人。这些苦行僧自认为超越了一般的社会义务，因为他们抛弃了自己身后的世俗世界。但是，还有另一种婆罗门，他们以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关注世俗的生活，与世俗生活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靠主持祭祀仪式的特长为生。祭祀仪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据说这些仪式可以给供奉祭品（牛和其他贵重用品）的人带来好运，并保证他们事业的成功。婆罗门所实行的祭祀传统起源于很早的过去——宇宙的始端，起源于永久的权威，起源于仙人（rsis）的时代。这些仙人圣贤可以听到最高神的声音，并且把这些声音以创造的形式发表出来，编写成
54 名为“三吠陀”（Three Vedas）的圣诗集（在前古典时代，大约公元前600年以后，出现了第四种吠陀——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即咒语集）。这些使用神圣语言编写圣诗的大师们擅长综合错综

复杂的事物，并且长期主持祭祀仪式，既为国王、公子，又为普通百姓主持仪式，所以这批婆罗门是创造印度宗教的一支主要力量。因此，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就连今天我们所说的"印度教"也主要是他们所创造的：正统印度教的定义就是承认吠陀天启(śruti)的权威价值。

早期吠陀时代

回顾古代的历史，我们必须感谢吠陀文献。我们知道，没有这批已经破译了的手稿的帮助，要解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考古发现是多么的困难。印度早期的雅利安人是在大约公元前 1500 年后的一段时期内一批批地进入印度河流域的，他们可能来自于南俄罗斯地区，我们发现了一些反映他们最初定居时期生活的文献。当然，这里也有不少问题，因为这些口头流传了几百年的文献后来收集起来是为了宗教祭祀的目的，而不是为了给我们一个说明早期情况的历史记录。通过这些吠陀诗歌我们可以做出各种判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常常是不太容易的。设想一下，试图通过天主教的圣书再现美国人或英国人原来的生活是多么困难。我们只能从中得到一些暗示，但是涉及到锡安山(Zion)和骷髅地(Calvary，耶稣被钉死的地方)，就会经常使我们感到困惑：这些文献是当时的证明材料吗?

吠陀圣诗所记述的那个时代，是北印度的平原已被自称雅利安人或"高贵民族"(Noble People)的人所占领的时代。这些人以自己的骑兵和战车而骄傲，充满自信，敢作敢为，他们征服了当地的达萨人(Dasyus)；达萨人皮肤黝黑，生活在城市，崇拜林伽等神灵，这种神灵无疑是与祈求庄稼丰收和牲畜肥壮的繁多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很多雅利安人都是最初占领印度河流域城市的人的后裔。他们的知识和语言成分，后来都变成了雅利安人的习俗。

《梨俱吠陀》中有许多神灵，其中一些神灵反映了当时那个权力扩展的时代。如高大凶猛的因陀罗神(Indra)，他是伟大勇士的领袖，常常化身为雷雨和闪电。《梨俱吠陀》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诗篇是写给他的。他的主要职责是领导武士阶层，即刹帝利种姓，吠陀社会四个等级中的第二个等级。大神因陀罗不仅与人类的敌人战斗，而

且也与支持这些敌人的妖魔鬼怪战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因陀罗也是一个创造者，因为最初是他拆开了天和地，是他从洞穴中把被关押在这里的乳牛解放出来。乳牛是雅利安人财富的主要象征。在因陀罗的创造活动中，他还发现了太阳，太阳给万物带来了光明和视觉。

有一幅图画，描写具有暴力和创造能力、精力充沛的因陀罗大神正在饮用一种能引起幻觉的神圣的苏摩酒（Soma）——这幅画使我们联想起那些勇猛的武士，他们引导人们向南、向西迁出平原以寻找
55 新的牧场和征服地。此画表现出了在遥远的过去，即雅利安人定居在这里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是与北印度的风光融为一体的。北印度具有温暖的气候、广袤的森林、划界清晰的耕地、广阔的村庄和正在发展的城市等。

因陀罗把天界与地界分开，为神灵与恶魔的冲突提供了场所。恶魔常常与人类的敌人结合在一起，但是神圣的吠陀世界本身也被这些冲突弄得分裂了，所以在吠陀圣诗所想像出来的各种强大势力之间都有某种紧张关系。甚至献祭活动、重要的仪式也被看作各种势力冲突的模式：祭祀仪式常常与猜谜和战车赛跑结合起来，仿佛内部的战斗连续不断。这种战斗是与雅利安人流动的游牧文化和被征服的当地居民的定居文化之间不断发展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因陀罗代表着残暴和某种混乱的东西，那么瓦鲁那（Varuna）大神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秩序的楷模。他管理着宇宙的秩序，这种秩序可以概括为宇宙的法则（rta）。“rta”这个词有点儿像后来印度教的概念——达摩（dharma），达摩是作为宇宙和社会生活基础的神圣法则。瓦鲁那取代了古老的天神迪奥斯（Dyaus），他在吠陀中相当于希腊的宙斯神（Zeus）和罗马的朱庇特神（Jupiter）。瓦鲁那管辖着天界，特别是夜间的天空，夜间天空中的星辰都被看作他的无数只眼睛。所以，只有他知晓万事万物。他是道德的法官，因为他能了解人的一切秘密；他与他的伴侣密特罗（Mitra）一起，管理着各种诺言和契约的执行。他掌握着真理。但是，他也有黑暗的、与世俗联系的一面，这一面在后来古典时代的神话中变得越来越重

要了。

火神阿耆尼(Agni)是主管祭祀仪式的重要之神,这种人格化的神灵对于祭祀活动是非常重要的。阿耆尼代表着地界之火,是三界火神中最低的一种,其他两种是空界之火——闪电(因陀罗)和天界之火——太阳(Surya,苏里耶)。但是,阿耆尼最终可以代表这三者的燃烧方面。那些用吠陀诗歌来解释当时社会的人,凭借着想像看到在天、空、地三界之间有着某种连续性。夜间的暴风雨加闪电,特别是在印度温暖的气候里,是令人恐惧和敬畏的;而地界的火也是无法预测和令人难以捉摸的,尤其在人们移动的时候,它更是难以保存。

在许多祭祀仪式中,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火至少有两种作用:它能把祭品燃烧和转化(如烤肉);它可以使祭品漂浮向上,传送给天界之神。当一个人想向神奉献有价值的物品时,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物品送出去:此物必须离开人的领域而进入神的领域。只有通过火燃烧祭品所冒出的烟,才能把祭品送给神。当然,至于动物,其他的方法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通过放血可以毁灭动物的生命。

在祭祀中,用一支小木棍在一个个小孔中不断地捻转,就能够创造出火来。男性生殖器插在女性生殖器中——这种两性的象征也可以产生火,似乎这样可以刺激人和动物的生殖能力。所以,在许多方面火对于宇宙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最重要的是,它能够燃烧和传送祭品,无论这种祭品是古代国王奉献的马,还是日常家 56
庭祭祀供奉的酥油和牛奶。在婆罗门主持的那些时间长而复杂的祭祀仪式中,火都是必不可少缺的用品,这些祭仪能给人带来丰收和繁荣。所以,火神阿耆尼在吠陀圣诗中频繁的出现,是不令人奇怪的。

在吠陀时代,另一个重要的神是酒神苏摩(Soma)。这个神在后来的宗教实践中逐渐消失了,但是在当时,制造酒和饮酒都是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可以刺激人的视觉,圣诗的许多想像物可能都是出自于这种视觉的内容。

通过对比我们知道,那些后来演化为毗湿奴和湿婆大神的神灵,

在当时都是比较小的。但是，毗湿奴的重要性在吠陀神话中就已经预示出来了：他三步跨过了宇宙，建立了自己的活动范围；最后一步他的确跨出了人的视野，因为他跨到了天界。那些在祭祀仪式中可以重现这种创造活动的人，将实现对宇宙的控制。毗湿奴的伙伴——楼陀罗(Rudra，暴风神)，红色之神，是不受管束的自由自在的火，他性格狂暴，居住在高山和丛林之中。以后，这个楼陀罗就演变成了湿婆大神。

吠陀圣诗表明，在某些特定的祭祀仪式上，许多神灵——如上述一些比较重要的神或其他的神——都被单独看作至高神。这好像一幅画，它的透视和结构使它与其他所有的画区分开来。所以，在特定的圣诗中，某些特定的神灵就成了最高神。这就是所谓的(在多神中特信一神的)单一主神教(henotheism)，此词来自希腊，意为“在某个时代的一神主义”(one-God-at-a-time-ism)。这是一种把一神论或对最高神的信仰与对多神的崇拜结合起来的方式，印度宗教从早期就开始具有这个特点。

梨俱吠陀和其他吠陀的圣诗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帮助我们追溯印度早期，即公元前600年以前的历史。作为历史资料，吠陀的价值远不如作为宗教文献，这些文献后来都成为印度教经典的重要部分。在吠陀圣诗与后来发展起来的印度古典宗教之间是有连续性的，但是在这中间也有一些重要的转化过程。这些转化过程的产生，是由于婆罗门力求控制宗教，也是由于印度社会中产生新宗教思想的那些非雅利安势力的不断影响。在吠陀传统与准备创立古典印度教的各种势力之间，曾有过一系列的调和过程。

一个新的开端

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一百年间，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和实践方法。最重要的是轮回的思想，即再生的循环，这种思想引导人们通过修炼苦行或冥思，或修炼这两者来实现解脱。为了实现解脱，我们必须消除我们过去行为或业的报果。正是这一套信仰，构成了许多新宗教运动产生的背景；这一套思想作为新的巨大奥秘也渗透到婆

罗门教，渗透在《奥义书》这种纯理论文献的各种教导中。

在这个时期，有异端思想的游方僧和宗教导师们明显受到极大的尊重，根据文献记载，他们还常常与婆罗门联系在一起。出现这些 57
宗教运动的地区，主要是在现代德里的东部，即雅利安人的核心地区。这个地区集中在恒河的两岸，那里有一些新兴的大城市，如贝拿勒斯和巴特那（Patna）。由于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包括出现了一些强大的王国和共和国，所以新兴的商业阶级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被吸引到新产生的宗教运动中，尤其是佛陀发起的佛教运动。



北印度北方邦贝拿勒斯3英里长滨水区的局部。被认为神圣的台阶直达水面，以便那些想通过在圣河恒河沐浴求得净化的人们前往水中。图中心的醒目建筑是维什瓦纳特（Visvanath）神庙。

佛　　教

早期印度历史上的所有年代，都是学术争辩的论题。然而，佛陀诞生及其他各种重要人物活跃的时间，却可能是在公元前6世纪。有些学者将这些事件的年代推后：例如，他们认为，佛陀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不过，我们将因袭较为传统的说法。

佛陀的生平故事是传奇性的：在某些历史事实中糅合了一些奇异的故事。这一事实说明，我们很难窥见“历史上的佛陀”的真实面

佛教　关键术语

菩萨(Bodhisattva)：地位仅次于佛，宁愿推迟自身的最终解脱，以为众生操劳。最著名的菩萨是观世音，在中国和日本又被称为观音(汉语拼音为 Guanyin；日语读音为 Kannon)。

佛陀(Buddha)：理解佛法真谛的觉者。

禅(Dhyāna)：通常经过八个阶段而达到意识纯净。

涅槃(Nirvāna)：最后的解脱，届时圣者将免于轮回再生。

般若(Prajñā)：对于宇宙的悟性或智慧。

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事物相互依存的根由，即将处于轮回之中的世间万事万物联系在一起的规律。

轮回(Samsāra)：回旋不停的生死循环，处于轮回的个人就中卷入再生过程。

戒律(Śīla)：激励美德的戒条，如总括佛教道德的五戒。

窣堵波(Stūpa)：初为安放舍利的圆冢，后定型为塔，成为寺庙主要特征。

空(Śūnyatā)：即虚幻不实，为所有事物的普遍特征。它们无独立实体，只是相对存在。

密典(Tantra)：佛教金刚乘(现在主要存于西藏)的仪式文献或修持方法，用以获得圣力，通常须古鲁予以指导。

日。但对佛陀生平的传奇性记述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历代佛教徒 58
的忆念和虔诚全系乎此。此外，佛陀传业已成为类似传记的一个范本，例如被认为与佛陀属于同一时代的耆那教创始人大雄的传记，即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来的佛教徒遵奉的信条是："皈依佛陀；修持达摩；托庇僧伽。"这些话的意思就是"皈依觉者；修持正法；托庇僧团"。这种对宗教虔诚的概括，确认佛教传统的三个最重要的成分：佛陀的事迹；体现在其中的教义性或哲学性世界观；躬行教义以求解脱的机构，即佛陀的虔诚信徒组成的团体。除了这一简明的信条之外，佛教后来还以多种形式出现，因此对佛教派系演变的历史略作勾勒不无裨益。

佛教简史

首先，在佛陀在世的早期阶段，佛教教义和修持方法得以确立。 59
可以说，这一阶段约从公元前 500 年持续到公元 1 世纪。在这一时期，在斯里兰卡，用巴利文撰写的上座部（Theravāda）佛经已经出现，并开始逐渐定型。这一佛教流派至今依然风行于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不过却搀杂了其他部派如大乘佛教的学说。与上座部同样起源于早期佛教的大乘佛教，约于公元前 3 世纪在印度兴起。

其次，从公元 1 世纪起，佛教传入中国并最终传入朝鲜和日本。无论大乘佛教还是上座部，都使佛教得以高度自成体系。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佛教的古典时期。

第三，从公元 7 世纪起，佛教的另外一种形式发展起来，被称为金刚乘（Vajrayāna）或真言乘（Mantrayāna）。该派注重咒术与仪轨，认为通过吟诵咒语便可即身成佛。金刚乘的仪轨逐渐为当时的印度教所吸收，从而成为佛教在印度本土最终消亡的原因之一。但金刚乘却成为尼泊尔与西藏佛教的主要形式，在这一时期流传开来。我们可以将公元 7 世纪至 18 世纪称为中世纪时期。

第四，近现代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南亚的佛教受到影响，就是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也受到了影响。本书第二部分将探讨殖民主义对佛教的冲击。

以上所有这些时期——早期，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和近现代时

期——的划分，主要适用于南亚佛教，对东亚和其他地方的佛教，将采用不同的分期方法。

在勾勒佛教根由之时，我们将从其不同的方面着手。首先，在叙事层面着墨，讲述佛陀的生平故事以及他生长的环境。其次是他所宣讲的教义：这些哲学理念与实际生活相适应，但在佛教传统中尤其重要，因为这一传统格外注重对世界和人性的分析——后面将阐明其原因。第三，对于寻求解脱至关重要的仪式层面，其中还要联系到佛教伦理层面。然后，我们将考察佛陀及其信徒们的内省层面。我们还将描述佛教的社会组织。最后，我们将探讨早期佛教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情况。

叙事层面

要讲述佛陀其人的生平故事，应当从何处说起呢？与我们不同，
60 他作为个人的生平，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开端，因为按照佛教的看法，他是一个在轮回中没有起点的行者。在佛经中，有许多传奇性和教化性故事讲到他，说他在前生曾是蛇、兔或国王，如此等等。这些所谓的本生(Jataka)故事，是社会生活中教育素材的一个不错的来源，也体现了对追随佛陀的民族的体恤。他在以人类的，同时又超出人类范围的导师、救世者、未来的佛陀或菩萨的身份降生现世之前，已经在兜率天(Tusita)居住了亿万斯年，像神仙一样大享其福。然而，他不得不放弃这种生活，以帮助众生减轻并最终摆脱苦难。

他可能在公元前 586 年降生于世，成为悉达多·乔答摩(Siddhartha Gautama)，生活在正沿着恒河涌现的新文明的氛围之中。他所降生的民族为释迦族(Śākyas)，他后来被称为释迦牟尼(Śākyamuni)，即释迦族的圣人。释迦族当时处于拘萨罗国(Kosala)的宗主权之下。乔答摩的父亲净饭王(Suddhodana)是统治者，母亲名摩诃摩耶(Mahāmāyā)。他出生时即有预言称，他注定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但究竟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却语焉不详。按照传说，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个奇迹。他的母亲梦见这位未来的佛陀化身为白象前来投胎，于是不再有交合的愿望。所以，尽管她已经生儿育女，不再是处女，但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乔答摩仍属通过感应

而孕育出生的婴儿;他于五月满月之时诞生于蓝毗尼(Lumbini)花园。

年轻的悉达多在奢华之中成长,但在成婚并有了一个儿子之后,最终被迫放弃世俗生活,开始了一个遁世者的漫游人生。他在目睹一位耄耋老人、一位病人、一位被运往火化场的死人和一位乞丐四种景象之后深受震动。他遗弃妻儿,开始过一种一边苦行一边冥思的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一度与一行六名沙门一道修炼。最后,他独自在今称为菩提伽耶(Bodh-Gaya)之地的一株神圣的荜钵罗树下觉悟成道,洞悉世界的性质和超脱苦难的途径。他作为一个觉者,从此以后被称为佛陀。

他返回贝拿勒斯,来到城外位于萨尔纳特(Sarnath, 即鹿野苑)的一个鹿园。他当年就是在这里离开自己的伴侣的,现在则要向他们进行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说教,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见解。这次说教通常被称为初转法轮。他们成为他的第一批弟子和新僧团的核心。此后,在45年的岁月中,直至年届八旬,他一直到处游走,教诲并巩固僧伽组织。他造访了这一地区的一些大的新兴城市——贝拿勒斯、优楼毗罗(Uruvela)、王舍城(Rajagriha)、吠舍离(Vaisali)、舍卫城(Sravasti)、赏弥以(Kausambi)及自己的故里迦毗罗卫(Kapilavastu)。根据斯里兰卡的编年史记载,佛陀在其有生之年曾经三度前往该岛,其中一次到了苏摩那迦陀(Sumanakata)峰,在那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足印,它成为该岛最重要的朝圣中心。该峰后更名为亚当峰(Adam's Peak)。他与王子、国王、妓女和工匠过从,他向他们宣讲 61
通往解脱之路的救世之理。

最后,他死于消化系统的疾病。至于他生平中的其他重要事件,则有天地两方面的征兆——地震和花雨。他是在觉醒和安详之中谢世的:所有的复合事物都是无常的,血肉之躯的乔答摩·佛陀的死亡迟早必然发生。魔(Mara)企图阻挠他悟道,并企图阻挠他在世间不断说法,而他则曾经不止一次战胜魔的招数。他克服了死亡的力量,他将不必再生。他于是被称为如来佛(Tathagata);他最后所处的态是神秘的。他将无须再入轮回。但无论认为他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者既存在又不存在,或者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都是错误的。

他的信徒焚化了他的遗体，由此生成的舍利被安放在各地的圆冢之中。

62 这便是佛陀世系中离我们最近一次的生平。在巴利文经典中，还列有佛陀的其他不同生平故事，如作为毗婆尸佛（Vipassi）、尸弃佛（Sikhi）、毗舍婆佛（Vessabhu）、拘那含佛（Kakusandha）、拘楼孙佛（Konagamana）和迦叶佛（Kassapa）时的生平故事。因此有人认为，佛陀并没有创立佛教，而只是恢复了佛教。

教义层面

佛陀的学说属于当时沙门教派的一般模式，但他对此给予一种全新的解释。主要问题都围绕着轮回和如何从令人不满的现实世界获得解脱而展开。如同当时的耆那教和邪命外道（Ājīvika）团体那样，他最初被苦行所吸引；但他最终发现，仅仅实行苦行过于消极。他从别人那里学习了瑜伽术并发展出一种禅定体系；但他认为，思而不悟是盲目的，而悟而不思也终无结果。你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而欲达此目的，找到有关哲理问题的正确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他的核心见解是，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和相互依存的。他寻求所有事端的根由，特别是与人直接相关的事端的根由：所以我们需要训练自身，以自觉领悟我们内心正在发生的事端的性质以及它们形成的条件。然而，他弃绝宿命论（如邪命外道所宣扬的宿命论）。我们从前生继承了自己的命运倾向，而且如果放任自流，这样的倾向会将我们导向别的存在形式。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浸透着苦（dukkha）。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自由塑造自己的命运。的确，按照流行的经佛教修改并重构的宇宙观，天有多重，而且即使在天上，美好的人生也有终结之时，令人恐怖的地狱也有多重；人可以依自己的行为变成鬼、虫或其他任何种类的生物。

因为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因此任何满足感都不可能永远存在；满足感的消失是令人痛苦的。所以，众生皆充满了苦。这是佛陀阐明的四谛（Four Noble Truths）中的第一谛（苦谛）。第二谛（集谛）是，苦的原因在于渴求生存（巴利文：tanhā）。第三谛（灭谛）是，苦的原因可以被消除。第四谛（道谛）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在

于遵循八正道(Noble Eightfold Path)。

佛教的一个基本观念认为,道有三个要素,即信、德、思。八正道正是对这一种基本观念的拓展,分为八个方面。八正道的头两个方面涉及诚信,即正见和正思维。其次三个方面与道德品行有关,即正语、正业和正命(即不从事必然导致违背佛教伦理的职业,如屠宰职业)。最后三个方面与瑜伽或自我修炼有关,即正方便、正念和正定。

佛陀认为,八正道是中道,即所谓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处于唯我与无我两边之间,处于灵魂不灭与人死魂灭两端之间。八正道在 63
其他各个方面都表现为一种温和适中的信念。

遵循八正道,此生就可以进入顿悟和清净的境界,就像佛陀自己悟道时那样;圣人告别人世时,就像火焰熄灭或火星在黑暗中消失一样。死亡不是寂灭,但也不是个体存在的延续。所以,如来佛被认为与今世没有进一步的关系。沉默是他处于超然状况的最好方法。

获得救度的最佳途径是出家为僧为尼。这样一种处于精神氛围之中的生活,再加上时常寂然独处,对于冥思再好不过。那些对僧伽比较苦寒的生活尚未做好准备的在家信徒,可以通过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和向僧团施舍,在来世获得较好的境遇或进入天国,如以后愿意身披袈裟,也可重返人世。

无常的观念、对个体灵魂不灭的否认、因缘观念和对不可言喻的最高境界——涅槃的追求,都是佛陀教诲的基本内容。我们将在后面论述这些观念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支撑佛教世界观的是轮回思想和无所不在的业报力量。这在佛教教义及其表述中是独创的,在佛陀施教的地区曾产生强大的感召力。

佛教弃绝对天启的诉求,尤其是婆罗门所主张的吠陀天启。佛陀直接体验了自己所传授的道理,他认为婆罗门所依赖的不过是传统和权威。他们没有见过他们向之祈祷以求保佑自己的诸神。真正的婆罗门不是生来就属于祭司阶层的人,而是秉持美德并能自律的人。

修行实践层面

佛陀教义激发的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就是对瑜伽的修习。在修习时，一个人坐在静谧之处，竭力控制自己的心思，通过禅（dhyana）的不同阶段，最终能够做到轻举。他可以从某个简单的物体如一朵蓝花开始，学会仅将这朵花看成一小片蓝色。然后，他可以抛弃这一道具，通过不断净化意识的各个层次攀升。行家并不能单纯通过这样的练习达到涅槃或成为圣人；然而，这样的练习是我们心目中早期佛教图像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对禅定和自我修炼的信仰。

《相应部：缘起与中道》

业缘于无明；	无明止则业止；
意缘于业；	业止则意止；
名、形缘于意；	意止则名、形止；
六识缘于名、形；	名、形止则六识止；
触缘于六识；	六识止则触止；
情缘于触；	触止则情止；
欲缘于情；	情止则欲止；
执著缘于欲；	欲止则执著止；
命缘于执著；	执著止则命止；
生缘于命；	命止则生止；
老、死、悲、伤、苦、痛	生止则老、死、悲、伤、
并绝望缘于生。	苦、痛并绝望止。
众苦遂缘是生。	众苦遂由是止。

然而，由于佛陀预期自己的信徒会按照戒律（vinaya）在一起生活，僧伽的结构必须防止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在不同月相出现时，僧人总会相互公开自陈所犯错误；在雨季结束时，总会有一个更为盛大也更为正式的场合进行这样的忏悔和相互宽恕。

早期佛教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如同其他沙门组织一样，佛

教僧尼要通过化缘求得食物。这其实是一种交换：僧尼得到食物，俗人求得功德。这种施舍是俗人对僧团的主要义务。早期，佛陀生平 64
中的重要遗址可能被认为值得参拜以求取功德。这些遗址包括他的出生地、他的悟道之地、他初次说教之地以及他去世之地，即蓝毗尼、菩提伽耶、鹿野苑和拘尸那迦（Kusinagara）。在乔答摩死后处置遗体时，播下了后世虔诚乃至膜拜的种子（虽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如来佛已“不复存在”，无从供人膜拜，惟有对他的忆念才能激发人们的善行和自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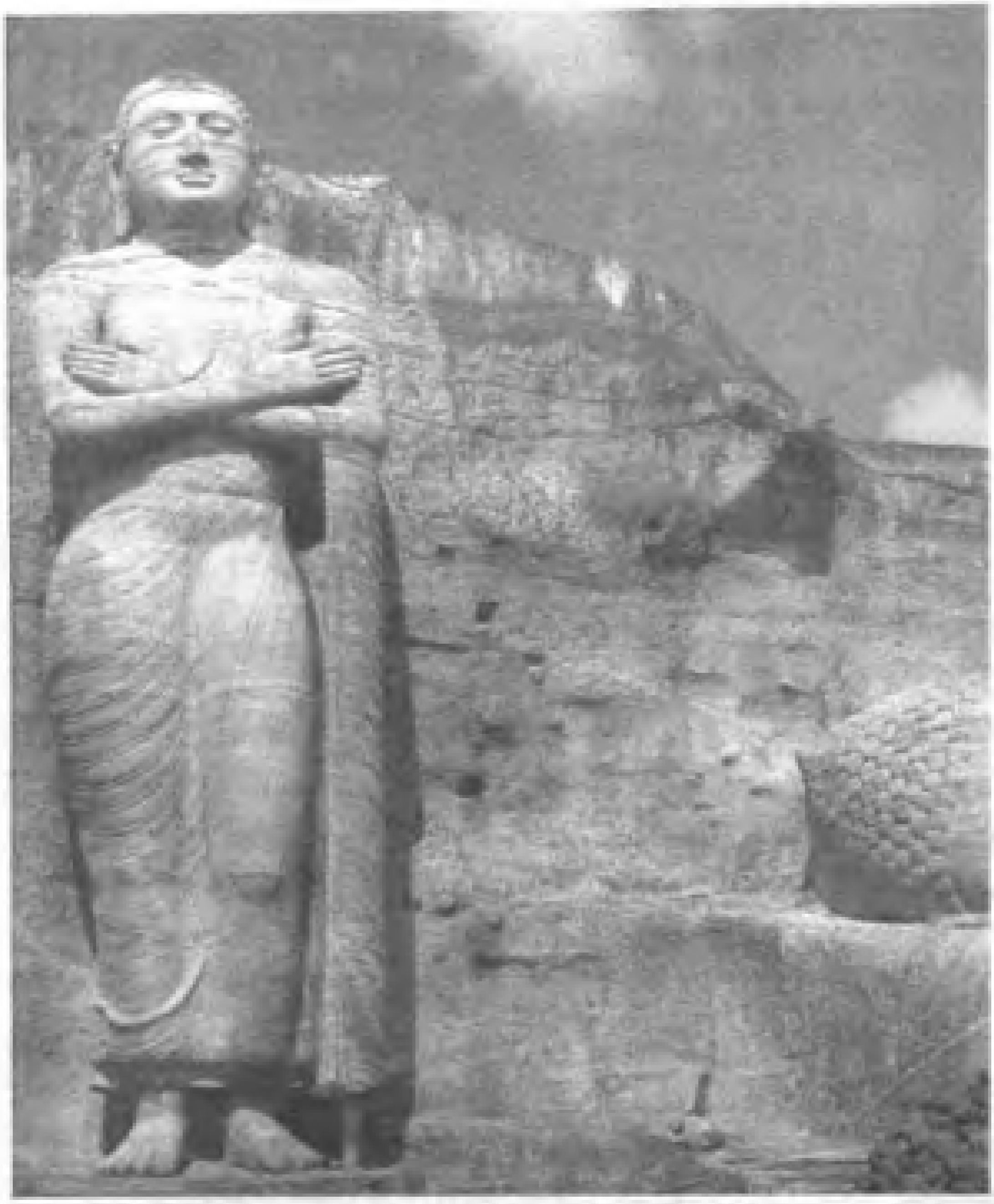
伦理层面

中道强调控制心意，认为心意的控制比戒律的实际应用更为重要。我们的行为应当受到五戒（panca śīla）的制约。人们应当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影响自我意识的物质）。除了这些基本规则之外，还又增加了一套制度，以更加严密地控制僧尼的生活。例如，关于不许使用高架床铺和金钱的规则，对于僧团条件因陋就简的规则等。这样的道德规范蕴涵着一些大的美德，比如同情心就是其中之一。同情心是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四摄（Four Divine Dwelling Places）之一，善人都应当秉持此四摄。

经验层面

早期佛教追求什么样的内心体验呢？我们可以从对瑜伽修炼的记述中了解一些情况。净化意识程度标尺的至高点，是一种安详的极乐境界。行家从入定状态走出，从这一高度俯视，就会把素常 67
体验看得十分凡俗，而在安详状态之中这种体验本身却充满喜悦和自信。

这种悟道的意识，有时被说成是一种神秘体验；但就佛教而言，将这种体验理解为与最高实在的合一，如与一位人格化神的合一是不成问题的。佛教并不否认神祇，甚至不否认婆罗门所信奉的创世大神梵天（他只是在宇宙新一轮循环开始之时出现的第一个神，不过佛陀并没有这样说）。然而，诸神无论多么光彩照人，毕竟也是无常的。所以，涅槃的极乐与顿悟境界是不可言喻的，也不可用与任何人



12 世纪斯里兰卡波隆纳鲁瓦(Polonnaruwa)的雕刻。雕刻的右侧表现的是最终获得涅槃的佛陀。

合一的理念来比况。

这似乎就是佛陀及其达到涅槃境界的圣洁信徒们的主要体验。然而,这样高度的意识是伴随着万有无常的理性认识的。这样的认识,可以在闪念之间出现,可以在悟道的重要时刻出现。收录在巴利

文经典中的早期僧尼的一些自传性诗歌中，就有对这种时刻的描述。一个更为热情虔诚的膜拜天界诸佛的宗教，需要经过时间的流逝才会问世。在早期经典中，不乏对自然的热烈赞赏和对人生痛苦的认识，这样的情调与佛教禅思的深奥和光轮构成了绝妙的对比。

社会层面

僧伽组织最初也许远比后来松散。许多僧尼一年之中多半时间都在独居隐修，在洞穴和河畔茅舍栖息，但在雨季，他们则会聚在一起，生活在由富有的俗人在城市和较大的村庄里或其周围地区提供的佛教中心。虽然佛陀在其有生之年如同僧伽之主，从而成为一名精神领域的世界征服者与帝王似的人物，但他并没有安排自己的继任者。他更喜欢被当时正在恒河流域崛起的王国所吸收的一些民族的共和制模式。新的领袖就是正法，就是教义。佛陀说，在我走后，教义将依然存在。

一些别的沙门运动也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大雄筏驮摩那(Vardhamāna)和末伽黎·拘舍罗(Makkhali Gosāla)分别领导的耆那教徒与邪命外道教徒。所以，佛教僧伽与其对手并存，同时又被形形色色的游方隐士所包围，后者或已剃度，或赤身裸体，或乱发如麻，或行为怪诞，或令人恐惧，但也有些人是高雅的。佛教对于实行世袭制度的祭司和婆罗门而言也是一个竞争对手。文明变得混杂，具有不同传统的婆罗门、隐士和僧人不得不在一起生活。佛教得到国王和商人的大量慷慨资助。佛教在当时是开明的也是微妙的，向俗人提供了正当使用财富和追求高洁生活方式的机会：他们这样做，来世就可以在天堂里获得佛教所许诺的美好生活。

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政治变化的时期。一些部落共和国正在被吸 68
收到主宰这一地区的若干王国之中。僧伽在许多社会变化发生之际，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

物质层面

佛陀死后，其舍利被分散。这些舍利被安放在圆冢之中。这些圆冢成为古典佛教寺庙中大圆冢即窣堵波(stūpa)的前身。这种对

舍利的关注预示了许多别的东西。然而,在经历相当时间之后,佛教寺院及与其相伴的佛教艺术才被创造出来。只是到了后来,佛教造像艺术和绘画艺术才获得惊人的发展。佛教造像与绘画使得佛教艺术成为人类文明壮丽的一章。最初,或许曾经存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按照佛陀传布的学说,并"不存在"可以雕刻或描绘的东西。大师犹如一头犀牛或空中的一只飞鸟,是无迹可求的。

其他沙门组织

佛教是以早期的沙门组织为起点开始传播的。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佛教的一些竞争对手的成功。在公元前400年之后的时期中,所有的主要宗教修行派别的确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有三部吠陀在佛教典籍中遭到猛烈抨击,但婆罗门也已大大超越这三部吠陀的范围获得发展。在佛陀时代或之后不久,古典时期的主要奥义书已经出现。这些原先依靠口传的论著所包含着的一些观念,对于古典印度教思想中的一些神学革新具有重要影响。在诸王国获得巩固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例如在摩揭陀(Magadha),婆罗门阶层获得新的机会;在德里附近的旧雅利安人地区(Āryavarta)并入恒河流域生气勃勃的各商业国后,婆罗门的理论与新生的沙门思想体系发生了直接冲突并得以共存。在往后的一个时期,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于公元前327至324年入侵印度,对印度文化产生了刺激性的影响。我们可以就这一时期的一些与早期佛教并峙的宗教传统作一番考察。这些宗教主要是耆那教、邪命外道和婆罗门教。

耆 那 教

同佛教一样,耆那教自称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其领袖大雄(Mahāvīra 或 Great Hero)只是恢复了一种古代信仰,而并非其创始人。耆那教在性质上比佛教更为严格,其中心道德观念是不杀生,并在非常广泛的范围予以实行。僧人走路时脚步应当轻柔,以免踩死昆虫及更渺小的生物。他们应当用孔雀羽毛拂拭地面,以将这样的生物扫到一边。他们应当过滤自己的饮用水,戴面罩,如此等等,以

防止不经意间杀生害命，因为如若杀生害命，即使是无意而为，也会招致不良业果。僧尼和在家的虔诚信徒都要实践严酷的苦行。该教 69
需要精神方面的修炼，但是肉体方面的苦行则处于中心地位。对于耆那教圣人而言，最崇高的理想是，一旦做好准备，就让自己绝食而死。

耆那教 关键术语

不害或戒杀(ahimsā)：对众生所持的非暴力态度，耆那教主要美德之一，在印度教、佛教和甘地思想中亦很重要。

非命(Ajīva)：非生命物质，包括人与其他物体，即一切无生命(灵魂)的物质。

非一端说(Anekāntavada)：即透视法学说或不秉持片面之见的学说，惟其如此方能让人见识事物的全部真相。

安迦(Angas)：耆那教传统中最早的文献。

天衣派(Digambara)：坚持僧侣裸体的戒律的耆那教徒；所以裸体在于表示完全不治私产。

耆那(Jina)：胜利者或征服者，耆那教祖师特别是大雄的主要称号，由此派生出 Jaina 一词，意为耆那的信徒。

完全知(Kevala)：解脱状态。此时，命(耆那教的灵魂)存于形如巨人的宇宙顶端一动不动。

大誓戒(Mahavrata)：僧尼所发大誓，愿不杀生、不欺诳、不奸淫、不偷盗、戒私财。

白衣派(Şvetambara)：属于不实行僧侣裸体制度群体的耆那教徒。僧尼每人有三件白衣。

苦行(Tapas)：在印度得到广泛实行，耆那教徒尤甚。

祖师(Tirthamkara)：指点迷津者，即如大雄那样为人指路以渡过生命之河到达彼岸的大导师。

按照耆那教的传说，筏驮摩那(Vardhamāna)，也就是大雄，于公元前 599 年诞生在今比哈尔(Bihar)邦吠舍离(Vaisali)附近的一个村

庄，但也有些学者将这一日期推后50年或更晚。他在30岁时，就像佛陀一样，弃绝尘世，拔光头发，开始过游方圣人的生活。在经过12载的斋戒与苦行之后，获得解脱并无所不知。他进而聚集弟子，以更为完满的形式对自己的前辈波湿伐(Pārśva)创立的耆那教予以重组。波湿伐为筏驮摩那之前的耆那教祖师(Tīrthamkara，或称指点迷津者，即指示通往彼岸之渡口的人)，可能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最后，大雄在72岁时进入涅槃。

《经造支·不害与道》

不杀害任何生物，是智慧的精髓。要认识到，这是从与不害有关的互惠原则得出的合情合理的结论。

作为理智的主人，为了避免错误，他不应当伤害任何人，既不可想，也不可言，更不可行。

他应当停止杀害生物，无论它们能动还是不能动，在高空、地下还是地上，因为这就是寓于和平之中的涅槃。

能够抑制官能并拥有大知识的智者，应当接受别人自由给予自己的东西，总是慎于接受施舍，并拒绝被禁接受的东西。

筏驮摩那被认为是耆那教24位祖师中的最后一位。耆那教在
71 中世纪时期逐渐变得颇有影响，但其目前在印度的信徒人数还不足300万。因为耆那教信徒不能从事农业和其他杀生害命的职业，他们逐渐转为商人和工匠阶层，因而是一个比较富足的群体。在大雄时代之后，随着历史的推进，他们认为耆那教在衰落。耆那教徒分裂成为两派，其主要区别是，一派要求僧尼除去衣服，另一派要求教徒身着长袍。前者被称为天衣派(the Digambaras)，后者被称为白衣派(the Svetambaras)。

耆那教没有创世学说，但认为宇宙的大体形状如同一个巨人，我们就在其腰部。上为天堂，下为地狱。获得解脱的灵魂，不再受其恶业之重的束缚，可以飞升到宇宙的顶部，并在那里停留下来，没有痛苦，一动不动。每一个灵魂自身都是无所不知的，但由于各种污染，遂失去知识；解脱之后，其原有知识失而复得。

这些信念似乎陈旧，但却为耆那教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框架。总的来说，许多世纪以来，该教对印度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佛教文献看，它与婆罗门教同为佛教的主要竞争对手。

邪命外道

末伽黎·拘舍罗(Maskarin Gośāla)是邪命外道运动重要的领袖。他遵奉总的沙门模式。他在当时也被认为是邪命外道的第二十四祖。他生于摩揭陀(Magadha)，当过游方僧，并曾确实追随大雄六年。他自称在苦行和法术方面已经超越了后者，遂在摩揭陀东北部舍卫城(Sravasti)建立自己的总部。他最后于公元前 487 年绝食而死。

根据从耆那教和佛教经典等外部资料重新构建的邪命外道教义，邪命外道的僧尼须经历严格的苦行。该教在其存在的最初二至 72
三个世纪中，曾是佛教和耆那教的主要竞争对手。阿育王(Aśoka，公元前 268 年之后)在其一篇铭文中，在佛教徒和婆罗门之后就提到了邪命外道信徒，将之位列第三(或许信徒规模第三，或许他的好感程度第三)。

邪命外道的教义以宿命观念为中心。任何德行或苦行都不能帮助个人从今世的苦中解脱出来，虽然这样的行为大概表明，一个人已经接近解脱了。每个灵魂当然必须经历 840 万次人生。即使在那时，这一灵魂可能还没有最后解脱，而是从极乐的生存状态返回继续其轮回。于是，个人无法通过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观念受到佛陀和大雄极其顽强的抵制。佛教认为，邪命外道的宿命论特别具有威胁性。

约在公元前 100 年之后，他们的影响似乎已经缩小，但直至 14 世纪，南印度也还有人提到他们。他们似乎最终在泰米尔人居住区与耆那教的天衣派以及虔诚的毗湿奴派(Vaisnavas，毗湿奴的信徒)融合起来。

观察三个主要沙门运动的相对命运十分有趣。佛教在印度几乎完全灭绝，但在印度之外的南亚和东亚的几乎所有地方，却得以安身立命。它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邪命外道彻底消亡。耆那教曾经

活跃但终究萎缩，虽然在印度很有意义地幸存下来，但却没有像佛教一样成为有人热中于传播的宗教。佛教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文化方面的适应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那也是它在印度灭亡的原因，因为它极其成功地与印度教文化融为一体，以致印度教得以取而代之。

婆罗门教或奥义书的宗教

与此同时，在佛陀时代之前的许多世纪中，婆罗门教一直在嬗变着。由于长期立足于雅利安人地区，使得武士因陀罗强有力的带有征服性的宗教不再那么适宜。在雅利安人为主的地区以东，由佛教、耆那教和其他沙门运动所代表的新的宗教复兴，是来自婆罗门的控制和存在都不大为人感知的地区的挑战。在婆罗门的生活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两难困境。国王和富人需要婆罗门的原因是他们对宗教仪式的专门知识：这意味着秘密。另一方面，他们的学说需要通过与诸如那些投身深奥的新宗教运动的局外人的辩论来发展。他们几乎从不在特别公开的场合讲话，只向属于三个上层阶级（祭司、武士和工匠）的社会成员提供指导：这三个上层阶级是通过佩戴圣线并获得合格雅利安人身份的仪式从而拥有第二次生命的“再生者”。

在一定的程度上，婆罗门的思想是通过撰写奥义书文献而得以
73 开发的。主要的奥义书或许是在公元前800至400年之间撰写的，与沙门运动中流行的一些思想并存。这些诗歌与散文杂糅的著作，是附属于当时还在增加之中的梵书（Brāhmanas）和森林书（Āranyakas）的，而梵书和森林书则是附属于吠陀本集的。奥义书基本上是阐述祭祀仪式的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深刻的形而上学思想和宗教思想。

当我们提到奥义书时，我们指的是那些包含吠陀天启内容的原著。事实上，作为一种文献，直到16世纪时还有人在继续撰写。奥义书一词的意思是“秘密教义”，据推测，它们源于古鲁（宗教导师）在举行仪式时对圣典的口头解释。

奥义书的中心观念是有关梵（brahman）的观念。梵是一种在献

祭时起作用的神圣力，而且也是对婆罗门阶级自身起作用的神圣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这些文献中的新颖见解认为，整个宇宙可以说就是一场献祭，而梵就是充满整个实在并赋予其生命的神圣力量。因此，梵一词逐渐被作为最高实在即神的名字来使用，在英文中通常大写为 Brahman。婆罗门神圣的专门知识，也不再被认为只能专门用于神圣的仪式；他们的知识此时在原则上被视为有关整个宇宙的知识。有些种类的奥义书，如《伊莎奥义》(Isa Upanisad)，认为梵是一个人格神。有时，梵又被认为是没有人格性的，无差别相的，不可言喻的。印度后来的许多哲理探索，都关注最高实在究竟 74
是有人格的还是非人格的这一问题。有时，最高实在被认为既是有人格的又是非人格的：其本质是非人格的，但在与宇宙和生物相联系时则是有人格的。

在梵的神圣世界中，在婆罗门的意识形态中，也渗透着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沙门思想，如轮回、解脱、瑜伽及苦行等观念。所以，许多古代婆罗门文献和沙门文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时社会中的两个圣人阶层。毫不奇怪，婆罗门朝着综合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在奥义书中就可以找到这一动向的结果。

首先，轮回观念，即关于无从证悟最高实在的人将在生死的世界上循环不已的思想，被表述为一种新颖而秘密的教义——再生也常被令人生畏地说成是再死。

其次，在奥义书中，我们发现了奇妙的认同行为，即内在的瑜伽探索含蓄地与婆罗门试图用以控制天下大事的祭祀仪式结为一体。这种认同行为意味着，梵与寓于人身的阿特曼即永恒的自我，是同一不二的。正如一句常见梵语所说："那就是你"，换言之，作为本原和创造者，既在现象世界背后又弥漫于其中的最高实在，与内在于人的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同样的。

于是，祭祀仪式与内心自控这样两条道路交会了。此外，奥义书强调世界的同一性，以及主宰世界的神与世界的同一性。然而，吠陀传统中的众多神祇并没有被简单地一扫而光：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主的折光。这些文献还利用了一些与后来或就在同时融入数论

(Sāmkhya)哲学体系中的一些思想观念。数论哲学体系与瑜伽修习
75 以及印度教瑜伽哲学思想传统密切相关。虽然在一般意义上瑜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界限,但对瑜伽哲学的独特阐述却逐渐被印度教视为正统而予以接受。瑜伽哲学体系在中世纪时期与数论哲学体系形成合流。

《伊莎奥义》

在这个运动着的世界,无论有什么运动着的东西,
这整个的宇宙,都一定是在主(梵)的怀抱里。
弃绝这一切,你就可以享受存在。
不要觊觎任何人的财富。
人们即使在造业的时候,
也期冀自己长命百岁;
不过,事情就是这样:
业依附于你,而非人本身。

那些别样的世界是以魔鬼的字号命名的,
幽深的黑暗笼罩着,将它们层层裹覆。
那些杀害自我的人们正在下坠,奔向那些黑暗的世界。

虽然不动,太一比思想还要迅捷。
感官无从捕捉它,因为它在前飞驰,
让别的一切望尘莫及。它静止不动,
却在行走。摩多利首(Matarisvan)就活动在其中。

它动,它不动;
它既遥远又切近;
它在宇宙之内,
它在宇宙之外。

他如果认为万物存于自我
并认为自我存在于万有,
在面对大写的“他”时
他就不会退缩。

数论思想与沙门体系也有相似之处。数论哲学以一元宇宙或一元自然的眼光看世界,认为许多灵魂不断地在轮回中游走,因而只能陷于苦境。按照这一观点,神本身是不存在的,但奥义书却认为,追求解脱就是与独一无二的神圣力量——梵的合一或密切结合。

如果祭祀在婆罗门教(Brahmanism)的仪式观念中占有主要地

位，那么通过冥思直接体验则在内心求索的观念中占有主要地位。通过有关奥义书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个闪光的成分。虔信(bhakti)运动的开端被认为是针对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这一主题后来在佛教和印度教虔信运动构成的印度传统中得到非常有力的继承。对神的依赖也成为《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核心思想的先声。于是，印度教传统中的重要主旨至少在原则上已可见端倪。

在《伊莎奥义》(神的秘密教义)中，有几节著名的诗句描绘立于宇宙之外的宇宙之主，以及存在于我们自身的梵。后来引起思想家们注意的问题是，梵与灵魂是否完全等同，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共同拥有惟一的自我，我们似由许多个体组成的这一事实不过是一个假象；或我们是否拥有许多单个的自我，在这些自我中寓居着惟一最高存在。然而，从奥义书到古典印度教还要有一些时日。

上座部佛教

孔雀帝国与阿育王

佛陀在世时期，在恒河流域崛起的国家中，摩揭陀最为重要，而且最终成为孔雀帝国的基础。孔雀帝国系从公元前 326 年即位的旃陀罗笈多·孔雀(Candragupta Maurya)得名。他扩张了帝国，使之覆盖了北印度的大部分地方，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击败了亚历山大的希腊继任者塞琉古(Seleucus)，同时在西北部获得大片领土。在他身后的继任者中，阿育王是最重要的。他可能在公元前 268 年登基。数年后，他征服了东部一个麻烦不断的王国羯陵伽(Kalinga)。这次军事行动造成的大屠杀和苦难状况使他的良心不得安宁，他于是成为在家佛教信徒。他在自己的领地各处颁布的石刻诏书，证明他对宗教宽容和正法观念的关注。这一正法观念是从整个佛教教义中推导而来的，但要求弘扬道德同时抑止食肉等做法。佛教价值观念中的调和稳定作用，被阿育王运用到治国实践之中。在公元前 258 年，他在恒河之滨自己壮阔的首都华氏城(Pātaliputra，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76
城市)庆祝佛教的一个盛大节日，并开始派遣传教者与使节前往遥远的地区，其中包括希腊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后继国家。在一定的程度

上，佛教由于阿育王的努力而传入中亚，并从那里适时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阿育王树立了一个法王的榜样，在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想君王的化身。

他的最为恒久的功绩之一，是派自己的儿子（侄子）摩哂陀（Mahinda）将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巴利文佛经就是在斯里兰卡撰写的，而佛教的一个主要形式即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在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古城）极其繁荣的文明背景之下臻于鼎盛。

古典时期与中世纪时期的上座部佛教

摩哂陀的到来和阿育王在佛教历史传奇中的重要地位使人们愈加相信，佛陀在其生前曾经涉足斯里兰卡。对于操一种从北印度派生而来的语言的僧伽罗人来说，他们的福祉之岛似乎是惟一受到青睐而传承佛法的。斯里兰卡是一个富饶的地方，尤其是在干旱的中北部地区，灌溉系统发达。在首都，由于佛教逐渐被确立为王室宗教，于是建起了宏伟的寺庙建筑群大寺（Mahāvihāra），大寺中巍峨的舍利塔名为鲁安瓦里（Ruanväli）。后来，另一座名为无畏山寺（Abhayagiri）的寺庙建筑群矗立起来，在对非上座部佛教派别上，比保守的大寺显得更为好客。在公元3世纪，过多的非正统成分的渗透（叛逆者作如是想），导致第三座宏伟的寺庙建筑群——祇多林寺（Jetavana）的分立。

虽然大乘佛教和印度教的一些成分最终被吸收到正统上座部佛教之中——例如采用佛像（佛像在早期佛教中不知何故不受欢迎）和在寺庙院内为神祇建立神殿——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从公元前1世纪杜多伽摩尼王（King Dutthagamini）至英国人到来之间的悠长时期中，上座部佛教却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它成为一种开化的宗教，与岛上文化相得益彰。一条结实的纽带将君主政体与僧伽联系起来。国王需要留神寺院僧团，以免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弊病传布过于广泛。僧伽则确保王国的繁荣和秩序。君主政体以世俗的方式为宗教的健康做出贡献，而宗教则以精神的方式为君主政体的健康做出贡献。这样的模式后来在泰国和南亚、东南亚的其他佛教社会都得到采用。上座部佛教当然也曾经长期兴盛于印度本土，但通过对印度本土之

外的活生生的印度文明传统来追溯其形态则是方便的。让我们看一看上座部佛教的各个方面。

上座部佛教:仪式与修持层面

我们已经了解,禅思是早期佛教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理论 77
上,这是僧尼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巴利文经典逐渐被撰写出来后,各种注疏书籍也在不断增加,因此读经也日趋重要。佛教的分析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对物质的分析,也有对个人心理成分的分析,即从血液、脓、精液到精神气质和意识状况全都包括在内;还有对知觉形式以及行为准则的分析,如此等等。因此,注疏工作还有广阔的余地。僧人也负有向俗人传教和以社会生活行为准则教化他们的责任。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愈来愈讲究的公共节日,例如,在5月满月之日的卫舍迦节(Vesak),是来纪念佛陀的诞生、悟道和逝世的。僧人也受人邀请为病人做法事,祈保家人平安,等等。从理论上讲,僧尼是通过化缘获得食物的,但现代考古发掘披露了对寺院僧尼提供大量食物的举措,它们无疑是由国王和其他俗人提供的。在安居(Vassa)也就是雨季留在寺院隐居时期结束时,俗人向僧人施舍新僧袍,此时于是成为举行喜庆仪式的时节。

使大寺院得以维系的原因,一是来源于粮食种植的高额收入,二是一个能够控制拥有大规模灌溉工程社会的有序政府。在一个非常富饶的环境中,宗教存在着变得自满的风险;自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试图对其进行改革。有些人成为林栖和尚(araññika),有些人恢复了隐修生活的做法,独居在岩洞中或丛林茅棚中,严格进行禅思。他们与边远的村庄生活有关,因为他们的功德令名使得村民的奉献特别有效。

对于俗人来说,各种虔诚行为,如供养僧尼,送子女进入僧团,去寺院绕阁堵波环行,均属一定之规。安放着舍利的圆冢往往宏伟而洁白,它那抹了灰泥的表面,在热带风景青枝绿叶的映衬下闪闪发亮。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可能赠送僧团礼物。所有这样的行为都会成为功德,可以助人日后进入天堂或至少在来生获得较为适宜的地位。对于俗人来说,也许天堂是主要的希望,然而,如同现在一样,

他们能够区别享乐欲望和精神追求，能够再生于多重天堂中的某一层是前者的最高体现，而涅槃则是后者的顶点。僧尼以其生活不断提醒人们，注意通过"放弃"实现理想，展望超越所有寻常目标的目标。

78 主要是在外来（大乘佛教）影响之下，在寺庙中逐渐出现了神殿来供奉佛像，其中一些佛像形制伟岸。这些佛像成了虔诚膜拜的对象，而供奉佛陀又成了获取功德和实现精神净化的途径。各种神祇与精灵分布于四周并混入佛教修习方法之中，村民们仍然祈求这些神祇与精灵保佑他们获得丰收和财富、免除疾病，等等。这种与一般文化的相互联系，是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特色。

上座部佛教：经验层面

古典时期的上座部佛教所以在宗教史上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是不承认造物主乃至不承认梵这样无所不在的绝对力量的神秘主义的主要范例。僧尼或虔诚的俗人，只要遵循知名书册之一，例如佛音（Buddhaghosa）所著《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公元 4—5 世纪）中提出的规定，在行事方面就已经很像那些断念绝想以幻见神灵的苏非派（Sufis）和基督教敛心默祷者了。然而，上座部佛教的终极体验，被认为是对涅槃的证悟或者（也可以说是）触摸，即接触未来的、不可言喻的、超验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佛陀来说就是最高实在。一个人要通过这条道路找到最高实在就必须修炼，除了意识净化——这要涉及道德提升——之外，还有许多内容，但其中心则是对禅的修习，前面对此已经提及。然而，由于佛陀不相信彼岸以造物主或绝对力量形式出现的任何东西，上座部佛教传统中的神秘主义并不涉及任何种类的同一意识，尽管神秘主义的其他许多分支会谈论这种意识。

虽然上座部佛教并没有给超自然的至高无上的力量留有地位，但在实践中往往在其仪轨及艺术作品上面罩上一层神圣意识。所以，俗人在佛像之前，在日常生活中与小神祇发生联系时，可能会有一种敬畏之感。在民间崇拜中，在为精怪附体的人举行治疗仪式时，也会出现萨满教（shamanism）中的一些场面。然而，神祇和精灵都在

僧伽组织势力范围之外。至于精神道路本身，则着重生活的纯洁和通过禅思自我修炼。神僧圣尼正是通过这条道路显现出了一种奇异的力量。

上座部佛教：叙事层面

佛陀的生平故事，可以往前追溯许多世代。这已经成为一种老生常谈。他的前生故事是教化性的，而他的影响在身后依然存在。在斯里兰卡，这一故事对于僧俗全都一样，依然在各种编年史中延续。这些编年史见证了该岛创造优秀的佛教文明以及为保护这一精神遗产而战斗（例如与泰米尔印度教王朝的斗争）的历程。前往亚当峰朝觐，强化了关于佛陀在该岛的神圣存在的意识，也强化了这一精神遗产。在米欣特莱（Mihintale）的神殿，令人回想起摩哂陀受伟大的传奇皇帝阿育王之命前来斯里兰卡。在这些方面，佛陀的故事被融入历史，确认了福祉之岛斯里兰卡在整个解脱故事中的中心地位。

上座部佛教：教义层面

尽管佛经中讲到佛陀的地方有许多奇迹，上座部佛教却主要将 79
他看作一位伟人。他在完全领悟佛法之后开始逐渐使之体现出来。所以，他的天性中有超验的一面。然而，信徒们坚持认为，超越佛陀所说的一切是不明智的，所以分析虽然可以细致入微，但大规模发展佛教教义是不可能的。对于涅槃的性质，除了说它超越现世无常事件之外，几乎不容置喙。他们坚持佛陀就此阐明的四重否定。对于如来佛死后是否依然存在这一问题，他说："说他存在，或不存在，或既存在又不存在，或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都是不对的。"这种囊括一
切的否定表明，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是错误的：我们的寻常语言无从描 80
述涅槃状况。

上座部佛教着力强调无我（anatta）学说。个人可以轮回转世，但没有永存的灵魂。不变的灵魂有何益处？灵魂不变这一事实本身什么也解释不了：一个事物必须变化才能引发别的事物。不变的灵魂只是一个象征拯救可能性的符号，而使用涅槃观念就可以完全取而



斯里兰卡的亚当峰，对于岛上佛教徒来说是神圣的。靠近山峰顶部的一处凹陷，状似一只巨足之印。据信，它是悉达多·乔答摩留下来的。然而，印度教徒将这一足印归到湿婆名下，而穆斯林则认为亚当在被逐出伊甸园之后曾在此处伫立千年。

代之。

上座部佛教的世界是广阔的：除了我们所在的世界之外，还有许多世界体系，而每一个“星系”都有自己的天堂、地狱、人间以及自己的神祇，其中包括梵天，还有自己致命的诱惑者——撒旦和魔。宇宙实际上是没有终结也没有开端的，存在于浩瀚的时空范围之内。个人在这一浩瀚的体系内轮回转世，时而上天堂，时而获得人类、动物

或鬼蜮的形态，时而在地狱中遭受折磨，时而升入昆虫世界，如此等等，直至他有望被再生为僧并接近最终的解脱——涅槃。那时，他将不再被再生。精神上纯粹的无私将确保，他不会因为自己个体的最终消失而懊悔。

佛教对个人的分析，是被用来加强这一"无私"意识的：一个人是由五类事物——肉体、知觉、情感、意志和意识状态——构成的。这五组事物在死亡时消散，并由于蕴涵在意志中的持续的冲动而重聚。所以，如果你依然有所渴望，你将会被再生。使你的生命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不过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缘，与使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相似。因此，个人是五种无常事物的暂时统一体。

上座部佛教中的许多严密的教义分析，在三藏（Tripitaka）的第三部分之中。这一部分被称为"论藏"（Abhidhamma），是在"经藏"（Sutta）和"律藏"（Vinaya）这两部分之后最后集结起来的。

上座部佛教：制度及其他问题

佛教戒律非常细致地制约着僧尼的日常生活。从理论上讲，佛律可以依照多数人的投票变更，因为僧伽在本质上是根据佛陀时代存在着的一种共和制政府形式组建的。然而，从总体情况看，上座部佛教的保守倾向将僧团体系控制得相当严密。当然，佛经是与缅甸、泰国一类国家的上座部佛教团体分享的。许多世纪以来，流传上座部佛教的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甚多。

辉煌的都城阿努拉达普拉，逐渐被东部的波隆纳鲁瓦的辉煌所取代，后者在公元 11 至 12 世纪时成为一个以灌溉系统为基础的复兴文明的中心。在这一时期，佛教仪式与印度教仪式更多地融合在 81
一起，供奉诸神的神殿被引进寺庙建筑群内部。随后，在流行上座部佛教的斯里兰卡，出现了丰饶的印度文明。它对于自己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光荣天命，怀有强烈的情感。

大乘的兴起

在上座部佛教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佛教派系。它自称大乘，也即"大车"，意思是就救度问题来说，相对于观念较为狭隘的上座部等所谓"小车"部派而言，它能提供所谓"大车"。大乘佛教在伦理、仪规和哲学等三个方面都有根本性的改变。在伦理层面上，它对佛教传统思想阐释中的道德内容似乎给予了更多的强调。它问，如果一个人竭尽努力，通过禅定和其他类似的宗教实践提升自己，并最终证得涅槃，那么这样做在本质上难道不是罔顾他人，而仅念一己之私吗？那种对于宁静无扰的阿罗汉果位(arhant)或上座部圣者理想的追求，归根到底还是自私自利的，同逐利商贩的追求一般无二。问题在于真悟和同情不得两全，而解决的途径，照该派思想的鼓吹者说，就是菩萨(Bodhisattva)的理想，即未来之佛的理想。菩萨出于同情之心，将自己的最终解脱推迟到一切众生获救之后。这种观念乃是本生故事所寓思想的发展，原已存在于佛陀自己的行迹之中。佛陀渴望出世，但还是留了下来，为的是宣教那微妙难解的解脱之法。

在仪规的层面上，约从公元前2世纪起，西北印度的佛像使用之风已见兴盛。从此发展，不过一步之遥，就到了佛陀不断现身面前，可以接受我们崇拜的观念。这便导致了一类佛教的产生，在这类佛教里，虔信(热诚献身)加了进来，可以同严格的自我制御和神秘主义并行不悖，乃至取而代之。相继出现的还有神话学上的改革。新补充了若干关于伟大菩萨的故事，如以同情之心下视民情之主——观世音的故事，以及具有无量之光的佛——阿弥陀佛(Amitōbha Buddha)的故事等。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印度已有一派称作大众部的开始从上座部一系分裂出来。他们要求僧团更加开放，而对历史上佛陀的言教则不必严格拘泥。他们把佛陀视为出世者(lodottara)，即他是出离现世，超越经验的，同时又认为他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发展趋势，都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以来佛陀和菩萨形象的多样性崇拜盛行之时。佛教因此而带上了浓厚的虔信

特征，功德观念也相应地发展出来。于是俗众，当然还有僧、尼，便可以凭借对这些半神的崇拜(pūjā)来求取功德；而这又为接踵而来的恩惠之说铺平了道路。所谓恩惠，就是上神施与的救度之恩。

哲学上的变化，从某些方面来说，其实更为明显，只是这些变化把握起来有时不太容易。与前述迁变相应的哲学发展可见于一类著作之中，它们称作《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s)，亦即 82

龙树

龙树可能是公元2世纪人，他的传记直到公元405年才由著名的中国学者鸠摩罗什(Kumarajiva)写出。传记内容与其他中文和藏文的有关记述是一致的，同别的证据也相符。他出生在南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中，儿时就已显示出非凡的领悟力。似乎他在年纪轻轻初次接触大乘佛教的教义时，就皈依了它。这一说法看来是正确的，因为他的哲学继续发扬了表达于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圆融)著作中的思想传统，而这种思想当时正在南印流行。鸠摩罗什谈到，是一个属于那加(Naga)部落的菩萨向他传授了最为深奥的大乘经句。龙树很快消化了它们，并开始鼓吹它们所宣示的真理。那加人生活在南印度，因此上述故事多少能够彼此应合。他将其后漫长的一生大多用来撰述各种哲学和宗教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中论》(Mūlamadhyamakakārikā，关于中道的基本经句)。

龙树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有关空和万事只有相对存在的教理，他的二谛(日常普通的俗谛和更高的真谛)说，都在大乘传统理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他将佛陀四对否定范畴在应用范围上不断扩大以至于无处不宜的做法，则有些大胆。他的哲学对于后来商羯罗的不二论吠檀多(Advaita Vedānta)也深有启迪。此外，他还在如下两者之间看到了联系，一个是佛教明显具有的哲学或理论性的方面，另一个是实践性的方面，涉及信徒平常表达慈悲和虔诚情感的需要。

智慧圆融之经(sūtras of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也可见于公元2世纪初哲学家龙树(Nāgārjuna)的著作。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类经典("经"),是用梵文,或者一种称作佛教混合梵文的语言写成的。这些著作并不晦涩难懂,也不吞吞吐吐,像印度教的类似著作那样(印度教的经没有老师指导或注释说明,就无法理解)。佛教著作往往篇幅长且不收口,长到了冗赘啰嗦,反复再三的地步。有一点十分重要,即新的经典正在不断地创作出来。那正是一个个体写作逐渐普遍起来的时代。对尚未彻底摆脱口耳授受习惯的人们来说,写作所具有的某些神秘性对这类作品也产生了影响。经文甚至会封入窣堵波中,像圣物一样受到礼敬。词语描述了真理,同时也分享了真理;你礼敬了经文,也就礼敬了真理,并由此礼敬了佛陀。佛陀之体,就是真理。很自然,上座部拒绝将这些它认为是新的,未经认可的"经典"纳入正规藏经。但是,这类新经文的作者却认为他们已经吸取了佛陀言教的精义,因此应将他们的著作视同佛陀本人所出。

85 "智慧圆融"学说的基本理论,就是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彼此相关的,互相依存的。任何一物都没有独立存在于自身之内的本性。本质上,所有存在之物都是"空"。如果确有什么真理的话,那么它就是空的真理。这真理不可言说,而只能通过直接经验——佛陀的神秘体验——来领悟。

龙树的中观学说(Mādhyamika),或称"中道"哲学,也是一样。它是以一种更为清晰的哲学方式来辩明的,容不得任何理论变通。按照龙树的观点不难说明:某些在我们的思想和谈话中已经司空见惯的基本概念,比如说原因观念,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原因是转瞬即逝的事,那么在结果产生以前,它们就不存在了。存在以非存在为原因,显然荒谬不经。同样,其他理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种种基本观念由于自相矛盾而失去了意义,那么所有关于世界的描述也就同样没有了意义。我们的语言充其量只是使用方便的工具,谈不到触及存在的本质,而存在其实是相对的,空的,不可言传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追随佛陀,他为我们指出了穿过矛盾,达到解脱的体验。这种体验足以取代一切哲学,包括佛陀自己的哲学。龙树的这一见解意味着存在两个层次的真理理论:一个是普通的,可供实用的真

理；一个是终极的，诉诸体验的真理。



教义层面：按照印度教传统的看法，宇宙是定期一次又一次被创造出来的。在两次创造之间是休息阶段。此时毗湿奴正安卧在巨蛇阿难陀（"无止"）身上，阿难陀之名寓有永恒之意。这里，毗湿奴正在等待着再一次的创造行动，陪伴在身边的是他的妻子吉祥天女。画的上部是坐在金翅鸟上的毗湿奴与梵天、湿婆。

来自"智慧圆融"和中观学说的哲学观念又可与宗教的观点相结合。在伦理层面上，只要踏上了菩萨之路，我们便在实际上成为未来之佛。同样地，真理一旦在握，我们实质上便已成佛。佛性原本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中。当我们崇拜佛陀，崇拜菩萨的时候，我们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之上，等于在崇拜我们的未来状态。当我们终于到达彼岸，进入不可言说的觉悟状态时，所有对天上佛陀的整个设想和对地上佛陀的崇信等，便都可以弃之不用了。

以上的理论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变化。如果你同意龙树的观点，认为我们通常对于一事和另一事在概念上所做的区分不过是暂时性的，那么我们对于涅槃和轮回所做的习惯上的区分，亦复如此。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置身于涅槃境界之中了，只是必得待我们有了"更高的"着眼点时，方才能够意识到。所有这些都与俗人获得的新地位相一致，那就是，俗

人可以踏上菩萨之路，而同时过着未脱轮回的普通生活。

大乘净土

在龙树的著作问世后三个世纪或更晚一些的时候，出现了无著(Asanga)和世亲(Vasubandhu)两兄弟的哲学。他们宣扬一种所谓唯识论(Vijñavāda)，或称意识学派的理论。一般认为它宣教的是一种外在世界并不真实，以及这一世界源于内心的观点。依它看待世界的方式来判断，它在哲学上属"唯心主义"。然而，严格说来，它的教旨是，任何我们视为真实或视为知识的东西，都是意识认可了的。换言之，是意识和语言将它视为实在的。人们看它，往往得通过意识的"主一客观结构"这一透镜。不过，实在自身并没有这种主一客观
86 的特征。通过佛教更高的体验，我们不难找到一种不具有这种主客观二重性的统一意识。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更有意义的是乐土或净土学派(Sukhāvatī)。该派肇始于龙树时代前后，宣称阿弥陀佛在西方创造了一方净土，那里光辉灿烂，充满欢乐，溪流的深浅冷暖悉随你意，各种树木全由珍宝作成。到了这个地方，最终实现涅槃也就不远了。然而，它的壮丽往往让人心向往之，而它本身也开始适用于多种目的，就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天堂一样。一个虔诚的信徒只要呼唤阿弥陀佛的名号，就保证能在死时往生净土。

后面，当我们谈到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实践时，还将重提大乘佛教的这些形式，因为它们在那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大乘和佛教的许多其他派别都曾在印度繁荣过。在北印的那烂陀(Nalanda)和南印的纳加尔朱纳康达(Nagarjunikonda)这样的研究中心，它们都很兴盛，并和正在发展壮大的印度教交织在一起。在现代以前，佛教还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南亚存在着。这里指的是进入西藏并在那里扎根的佛教。它与所谓密法的发展有联系。现在，让我们掉转眼光，先来看看在公元前和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古典印度教的实践和观念是怎样形成的。



典型的南印度寺塔，装饰着众神的图像。该塔在南印度泰米尔纳杜邦的康契普腊姆。



浮雕，恒河自天而降，周围多有神话人物。该印度教雕刻在南印度泰米尔纳杜邦迤城马哈巴利普拉姆（Mahabalipuram，Tamil Nadu），建成于公元7世纪。

古典印度教：其主要形式

信　仰

处在婆罗门影响之下而又特征各异的诸种宗教最终获得统一形 87
式，是种种不同因素共同参与的结果。当初，对男女各神进行敬拜，想必只是在家庭纯朴的仪节中有其重要性。现在，这种敬拜活动开始采取公开的形式，并且长久地保留下来。印度教寺庙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恐怕部分也是佛教影响的结果。这些寺庙可以为人们举行礼仪提供集中的场所，也为他们接近大小神祇准备了地方。昔日的婆罗门教传统是不兴这类建筑和偶像的。诚然，祭祀的地方要设计好，建造好，以适应原始游牧的生活方式，但是并没有非要婆罗门参与不可的寺院崇拜活动。不过，毕竟有一点对这个

僧侣阶层还是有利的，那就是他们掌握着有效的手段，足以将人们的宗教虔诚和冲动化作施舍行动。在不断发展的印度教社会中，可以
88 说，偶像和寺院正是僧侣作用已经扩大的有形表现。

这不仅意味着崇拜活动变得日见重要，更说明了所谓虔信的那种期望分享神恩的热情已经十分习见。在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或称《主之歌》里，可以见到关于前述特点的描述。《薄伽梵歌》估计创作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照印度最著名的哲学家商羯罗的说法，它体现了吠陀的根本精神。该书普遍流行开来，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其他神祇如湿婆等的崇拜者也争相仿效。[1]后来，它也被纳入神圣传统，即所谓“传承”(smrti)经典，成为其一部分。传承经典是严格说来更具权威的“天启”(śruti)经典，也即神示性著作的后继者；而“天启”，则是指吠陀圣诗以及其后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直到经典性的“奥义书”为止的附属性著作。实际上，若论对于印度人信仰所起的规范作用，《薄伽梵歌》的影响比吠陀圣诗犹有过之。

在《薄伽梵歌》里，毗湿奴作为众生之主和超自然的宇宙创造者，还展示了他亲切可爱的一面。他的化身黑天在诗歌的末尾宣称：“凡是全心全意崇拜我的人、凡是将思想始终集中于我，冥想我的人，我都会迅速地将他们从死亡和再生之海中救脱出来。”阿周那在等待同他的族人决战时，曾经因为作战的对方是自己的亲友而不知所措，乃
89 至生出绝望之感。是黑天给了他战斗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经常略称为《歌》的这首诗里有着丰富的宝藏，而其主要价值，还在于强调了对于神的忠诚和挚爱，即“虔信”。

在这一时期，有两位神祇作为神性存在的表现形式，突显出来。一个是具有多重化身的毗湿代了吠陀圣典中某些重要旧神的地位。毗湿奴的追随者称作毗湿奴派信徒。湿婆的追随者称作湿婆派信徒，同时包括十分重要的克什米尔和泰米尔湿婆派运动的参加者。这两位神祇既彼此竞争，又互相配合，共处于传统宗教(“基于传承者”)的世界之中。毗湿奴较为温和。他关心正法秩序的定期恢复，

---

① 《薄伽梵歌》宣扬的是对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的崇拜。湿婆的地位堪与毗湿奴相比，故这里说他的崇拜者也有仿效《薄伽梵歌》进行创作之举。——译注

并为此使其化身降至人间。最重要的化身形式当属罗摩（Rāma）和黑天。前者是理想的君王，后者是值得赞颂的挚爱者。湿婆较具超自然性，易怒而充满破坏力。他常通过瑜伽功显示他的巨大威力，并与女神多有不解之缘。

印度教 关键术语

偶像（Arca）：一位神祇一旦成圣，就有了成为偶像的资格。

自我（Ātman）：具有永恒的性质。在不二论中，它被看作是与梵（见下）同一的。

化身（Avatāra）：指神（众所周知，如毗湿奴）的下凡或化身，采取的形象有罗摩、黑天以及未来的迦尔吉等。

虔信（Bhakti）：对神的虔诚信仰。

梵（Brahman）：存在于祭祀过程，也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神圣力量，因此又可用来称谓最高的神性存在。

达摩或法（Dharma）：宇宙背后的根本法则，也表现为人类道德和社会生活的准则。

自在天（Īśvara）：意为"主宰者"，也即神，有时用于人，但更典型的用法是指创世者。

阇提（Jāti）：也即种姓，指一个集团，其成员通过内部通婚和共餐而与之认同。种姓制度即由众多阇提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所形成。

业报（Karma）：在轮回转生的过程中根据人的行为所获果报的规则，体现于此生和来世。

崇拜（Pūjā）：对神明的敬拜。

遁世者（Sannyāsin）：已经摆脱由达摩和种姓所规定的日常社会职责的圣者，往往过游方生活。

瑜伽（Yoga）：禅定的方法，有时要身体和精神同时修炼。

奴，一个是湿婆这位伟大的瑜伽师、世界的毁灭者和神圣性力（śákti）的激发者。他们取后期印度教的第三个主要神祇是一位女

神。她是在公元4世纪开始获得普遍承认的，出现在诸如《戴维玛河特摩耶》(Devīmahātmyam)①之类的经文中。该女神本是经常出现的，其身影早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即已可见，也见于后来的村社生活里；而在吠陀圣诗流行的男权社会表层下，则存在于生活的潜流之中。她还在大量讲述诸神配偶故事的神话中出现，其重要性亦不亚于其他大神。在具有密教特征的印度教中，她注定会发展得更为成熟。可以说，从大部分的印度教传统来看，三大神是湿婆、毗湿奴和一位以难近母、迦利和雪山神女(Parvatī)等不同名号为人所知的女神。

在前述最高神的下面，还有众多的其他神祇。他们的故事散见于两大史诗、有关黑天的《诃利世系》(Harivamśa)、诸"往世书"(Purānas)，以及南亚次大陆不同地区的口头传说之中。

哲学

在故事的背后，各种哲学建立起来了；而高居于所有信仰体系之上的，是称作吠檀多(Vedānta)的哲学。吠檀多亦有几个大的分支派生出来。有一部格言体的经典，叫做《梵经》(Brhmasūtra)。是它提出了吠檀多，意思是"吠陀的终结或其最后部分"。它的学说，可能由所谓"分合论"(Bhedābhedavāda)，也即"不一不异论"脱胎而来，认为梵与世界和灵魂的关系，是互有区别而又无不同的。在现代最有影响的当属商羯罗(公元8世纪人)及其弟子所鼓吹的"不二论吠檀多"(Advaita)，也即非二元论的吠檀多。它主张灵魂和梵本是同一的，而相应地，多样性的世界则虚幻不实。到11世纪又出现了罗摩奴阇(Rāmānuja)的"制限不二论"(vi śistādvaita)，或称有限制的二元论。它是一种具有虔信性质的有神论，认为世界和灵魂乃是神的身体的一部分，是神实现意志的手段。13世纪的摩陀婆(Madhva)提出了"二论"(dvaita)，即二元论。它同样是一种有神论。在摩陀婆的二元论中，他断言灵魂和灵魂，灵魂和世界，灵魂和梵，世界和梵从来就是不同的。前述几种哲学一概强调精神实践的重要。商羯罗只肯把虔

① 《摩根德耶往世书》的一章名。——译注

信放在次要地位，认为它仅仅适用于那些依然辗转于虚假幻象 90
(māyā)世界的无明之人。惟有通过更高的途径，方能获得与惟一实在合一的神秘直觉。

商羯罗

商羯罗(Śankara，亦称商羯罗阿阇梨，意为商羯罗师)是印度教传统神学最有影响的宣教者，至少在现代是如此。通常认为他生活在公元788年至820年之间。不过，他的传记出现颇迟，所述细节也多不可凭信。

根据后世材料的说法，他出生在今南印度喀拉拉邦的一个叫做迦罗底(Kaladi)的村庄里。他的双亲多年不育，后产下一子，取名商羯罗。他的早熟令人惊奇。还在7岁的时候，他就决定跨过家居期(正统印度教徒一生中第二个重要的生活阶段)，而直接成为遁世者，也即苦行者。于是他离家出走，拜在牧尊(Govindanātha)门下。牧尊是住在纳马达河畔的一位古鲁，后来他又成为著名的乔荼波陀(Gaudapāda)的徒弟。商羯罗在他的著作中称乔荼波陀为自己老师的老师。两位师尊所传都是吠檀多不二论(吠檀多约略相当于印度教神学)。这种因商羯罗而出名的哲学体系虽非由他所创造，但是他确实提出了许多结构严谨，形式独特的观点。

从纳马达河向北，商羯罗又去了圣城贝拿勒斯，在那里他收了第一个徒弟。后来，他又转往喜马拉雅山的巴达利(Baralī)。此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些有名的论著，如对于《梵经》(《神圣力量箴言》)和《薄伽梵歌》(《主之歌》)所做的注释等。他不断地到处旅行，同观点对立的僧人展开辩论。他建立了四个或者五个修道中心，一个在南印的斯林吉里(Srngeri)，一个在北方的巴达利，一个在东部的普里(Puri)，一个在西部的德瓦尔卡(Dvāraka)，可能还有一个在泰米尔纳杜邦的康契普腊姆。他还建立了一个僧团。这些中心的首领贯彻他的教导，在僧团内权力巨大。较之他的成就，商羯罗的一生出奇地短暂。他可能死在喜马拉雅山、又有人说是在康契普腊姆。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人们掌握这些哲学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它们的帮助下求得解脱。在古典印度教所规定的人生四个目的中，解脱是最后一个。其他三个是：欲（kāma），即对快乐的追求（其中能带来最强烈快乐的是性，故"欲"字在这个意义上用在了《欲经》[Kāmasūtra]这本名著的书名上）；利（artha），即物质财富的获得；达摩（或称"法"），即以达摩为准则所行的善德或所表现的行为。达摩的内容在摩奴（Manu）论法的书上有所总结。该书罗列了印度教徒在种姓制度的框架内应当履行的各种职责。

古典时期的社会生活

在古典时期的最初阶段，一般认为同挑战正统信仰的力量做斗
91 争至为必要。这样的挑战来自佛教和其他沙门运动。人生四阶段的理论，即"种姓四行期法"（varnāśramadharma），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的。四阶段指的是作为学生、作为家主、作为已有成年儿子的父辈、作为禁欲者的四个不同生活阶段。印度教的寺院制度也在此时建立起来，其中之一即出自于商羯罗之手。

种姓制度在古典印度教时期渐趋严格。种姓集团各自在内部通婚，并且在集团范围内用餐。不同的种姓，是由职业、地域、历史和传统所奉神祇等的不同而形成的。实行内部通婚和集团共餐，是保持种姓框架所必需的。在这一四种姓的框架里，又嵌入了大量区别更加细微的内容，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其中高高在上的是婆罗门，而作为底部支撑的，就是所谓"第五阶层"，即不可接触者。后者的职业特别污浊（如皮革、屠宰、酿造、清厕、打鱼等）。

于是，从 4 世纪到 6 世纪的笈多时代，就成了印度历史上一个最为绚丽的阶段。我们不妨想像一下那一时期古典印度教昌盛而又复杂的情景——众多的寺庙、大河、朝圣者、行像仪式、史诗唱诵、虔信的热诚、游方的遁世者、入定的瑜伽师、探究玄学奥义的学者、精细的种姓制度、帝王君主的祭祀、大量古代诗歌的吟诵、家庭祭祀、奢华的婚礼、数不清的村庄、到处游荡的神牛、焚烧牛粪的气味、不可接触者的茅舍、骄傲的婆罗门、敬拜女神的仪式、湿婆林伽、黑天的故事——总之，大量的景象混合在一起，而其正统信仰的色彩，即使在婆罗门

中间，也还不那么浓。此时的印度教还是一个宽松的联合体性质的存在。它相信，一个人只要接受了“天启”，即使不接受其他东西，比如神明、毗湿奴、业报说、轮回说，功德观念等，便不失为接受那成于远古，却能与时俱进的吠陀权威的人。

不过，如果我们想在脑海中建立起那个时代的总图景，还需要使如下这些东西复活起来，加入前述印度教繁杂的景象之中：剃光头的佛教僧尼、各色的苦行者、耆那教尖角形的寺院、阇堵波、佛教建筑群中的菩提树、僧人的小房、非正统宗教庆典上的旗幡、佛像、本生故事、道德说教、大部头经典、对阿弥陀佛的虔信、发放护符、信奉佛陀智慧教诲的妇女，以及主张善待动物和昆虫的耆那教徒等。总之，这是一个所有非正统信仰和婆罗门掌握的正统宗教互相混合的时代。当时的印度，乃是一个不同习俗和信仰纷然杂陈的壮丽世界，正像今日的印度在较小程度上同样展示的那样。

佛教在北方的传播：西藏的情况

从拉达克（Ladakh）和尼泊尔向北延伸，越过丛山进入西藏，再向东延伸，穿过今天的西藏进入中国西部，为了方便，我们将这整个文化区统称为藏区。它曾经持续不断地从中国和印度接受影响。最后，印度的影响，尤其是佛教的影响占了上风。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 92
的地区。当北印度的佛教中心被突厥穆斯林掠夺者摧毁时，惟有西藏未罹此难，成为大乘经文和全部密宗典籍巨大的贮存库。在比哈尔北部、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发展出来的那一形式的佛教，自然就被西藏接受下来。它包括人们常说的“金刚乘”（vajrayāna），亦即有时常称的“真言乘”（mantrayāna）。叫它后一名称的原因，是这一形式的佛教十分强调念诵真言的必要。

金刚乘注重采用新的方法改变人的意识。在这里师父的引导往往必不可少，具体做法则与两种修持有关，即口诵真言和心观佛尊及其他神祇。个体生命、宇宙和神祇等不同方面的平衡达到后，即能形成着魔般心理方法上的内外融合。经验丰富的密宗法师有时会采取犯禁的修炼方法，如食肉和男女交合，以帮助他们“超越道德”，从而



同锡金一样，喜马拉雅山区也盛行金刚乘。图为一个信佛教的妇女在转动经轮，表达她虔诚的信仰。

超越世界。最先倡行这种举行秘密仪节，按照一定的仪规打破禁忌的修炼方法的，也包括北印度的印度教流行地区。虽然藏传佛教有此构成因素——自然是已经带有当地佛教特征的因素，但它仍可以在广义上归为大乘佛教。这里佛徒所习的经典，所修瑜伽的大部分，
93 以及他们精神气质的大部分，都可以说是带着大乘特点的。

金刚乘其名中的"金刚"二字，系指一切众生固有的永恒佛性。这种佛性坚不可摧，同时也要靠智慧(般若)的锋锐将它实现。密宗的精神修炼目的在于即时即地同佛性合一，前提是认为每一个体都与宇宙具有同一本性。这样，在借助早期佛教常用的那些禅定方法完成自我净化以后，一个有经验的人就可以观见他所选择的神祇或佛陀形象，最终实现与之合一。在念诵真言并于内心进行观想的同时，还应使用具有法力的图像或称曼荼罗(mandalas)，因为图像上有神圣的音节。这里还有各种因素的互相等同：五蕴(skandhas)，即构

成个体的五事（色、受、想、行、识）的聚合与五佛——毗卢遮那佛（Vairocana）、阿闳佛（Aksobhya）、宝生佛（Ratnasambhava）、阿弥陀佛（Amitābha）、不空成就佛（Amoghasiddhi）（意思分别是光明遍照、不动摇、宝石产生、无量光、无过成功）相当。此外他们也与宇宙五方（中、东、南、西、北）、五恶、五智等彼此相当。通过想像你的天神，你就实现了你与他，他与你的结合。这种非二元的结合，经常又以两性的结合为象征。两性结合能使两个身体融而为一。



一幅西藏图画，所画为入定的未来佛观世音。在中国，她是慈悲女神，人称观音。



曼荼罗（祭祀仪式用的图像），所画为阿闳佛，即东方佛，为五方（北、南、东、西、中）佛之一。可能绘于18世纪的西藏。

作为诸佛的伴侣，女神，或称女性之力，在藏传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伟大的女神——救度神多罗（Tārā），是观世音菩萨的配偶。印度教传统中那些令人尊敬的女神常显得凶相毕露。相形之 94
下，多罗女神在性情上就温和些，在外表上也纯洁些。尽管如此，这里的女神仍不过是印度女神的西藏化而已，说到头来也还是同一条古老感情之河的一部分，这条河流可以一直追溯到印度文明的滥觞处。传说观世音和多罗生了猴子，后来经过多少代的演化，猴子变成了藏人。（这里的进化理论竟没有遇到感情问题！）

西藏的第一座寺院建立于公元8世纪末。新宗教的出现，受到了当地固有宗教，通常称作苯教（Bön）的某些抵制（苯教的性质和特征我们下面再谈）。到11世纪，佛教展开了更为积极的第二次传播活动。就在这一时期，伟大的传教师阿底峡（Atīsa）在西藏西部诸领主的坚持邀请下来藏。前此他曾到过苏门答腊（Sumatra），供职宫廷。后来，他的一个弟子建立了噶当派（bKa'-gdams-pa）。同在这一世纪，在另一位著名的西藏僧人玛尔巴（Marpa）所传教义的影响下，建立了萨迦派（Sa-skya）。玛尔巴曾到北印度的大型学府中学习过。第三个藏传佛教派别噶举派（bKa'-rgyud-pa）是由广受爱戴的弥拉·罗思巴（Mila Raspa，或称弥拉惹巴，Milarepa，1079—1153）创立的。

总的看来，西藏的世俗统治者将佛教引入西藏，原因似乎是政治上的，即希望为本地提供一种"现代的"统治思想理论，并给西藏带来学文化，懂哲理的好处。在嗣后的几个世纪里，藏传佛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许多蒙古人，特别是中国皇帝忽必烈（Kublai Khan），也皈依了该教。于是萨迦派大喇嘛的地位，也一变而成为蒙古人宗主政府委派的当地总督。经过一系列有时不免动武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见到的佛教派别斗争，常常就像僧侣大战。这种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出于信仰原因，而是为了政治利益），到17世纪，最高统治权终于归入了实行改革的格鲁派（Dge-lugs-pa）领袖之手。该派由伟大的宗喀巴（Tson-kha-pa）创建于14世纪。去世的达赖（Dalai）喇嘛的地位，是由他的转世灵童来继承。该灵童的身份，则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来确认。12世纪以后，西藏的其他教派也一直采用这样的继承方式。

就这样，西藏建立了一种僧侣政治，也可以称它为佛教政治。虽然它是一个金刚乘信仰无处不在的地方，但它还是包容了本土苯教传统的某些东西。不过，在佛教多年的影响下，这些东西已经经过了一定的转形。和佛教一样，苯教也有自己的经典集。它的经典将苯教的创始之功归于传说中的兴饶祖师（Gsen-rab），他来自一个远在西方的国家，是一个生而彻悟的人，作为王子，终其一生在西藏宣扬苯教。西藏的佛教徒相信，经藏中的丹珠尔（Tanjur）是佛陀释迦牟尼亲自开示的。同样，苯教徒也认为他们的丹珠尔是兴饶祖师亲口

传授的。他们也像佛徒一样，拥有一批经典的注疏和其他著作，称作 95
甘珠尔（Kanjur）。苯教徒有自己的寺院、宗教团体、阁堵波等，还模仿佛教，制作了自己的图像。他们习惯按逆时针方向围着阁堵波或其他圣物绕行，也有旋转苯教经轮的习惯。但是，他们宣传说佛教是骗局，佛教来到西藏，给西藏带来了灾难，也成为一切恶行之源。虽然如此，苯教徒的人生目的、宗教实践和普遍的虔诚与佛教徒大体一样。两教信徒比邻而居，相处得还是很和睦的。

女神和印度教的密教哲学

女神崇拜的根源尽管可以一直追溯到印度河流域文明，但它在印度传统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却已是古典后期和中古时代的事了。它虽然在东北部如孟加拉、阿萨姆（Assam）等地最为流行，但是却遍及印度全境，在各个农村和家庭祭祀之中，各种女神其实是随处可见的。她们看上去像是同一位女神的不同显现，而这位女神则代表着最高存在的创造之力，即性力。我们想到神时，总是难免要问是女是男。这样的追问，从教义看是没道理的，因为严格说来，他/她既非男性，也非女性。实际上，只有到了描述人类自身形象时，才需要做这种非此即彼的定性工作。然而，一位至高女性的观念与下列诸事仍是有着有力联系的，如作为我们母亲的大地、繁殖力、慈母之爱、情爱的产生等。一个信徒可以在许多表面的伪装下看到女神的存在，如食物的施与者、伟大的女造物者、爱慕和献身的对象、爱我灵魂者、吞噬一切的时间或者说死亡、天花和霍乱的传染者，等等。

实际上，性力派很可能同印度教的密教哲学有关联。在神秘亦复神圣的外表后面，其主要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密宗的影响，只不过到了印度教这里，它却明显地体现在试图驾驭那神秘而又神圣的力量上了。这种所谓性力的力量，女性既能把它人格化，又能够运用它。性力派另一重要的着眼点即在守密。它仿效印度教屏护吠陀知识的做法，尽力保守其密技，并使行家传法以制御性力之事不为外界所闻。像许多宗教运动一样，密教除违背种种别的禁忌以外，也打破了种姓的藩篱。

伊斯兰教在印度

虽然伊斯兰教早在公元7世纪时已经来到信德(Sind),而穆斯林商人也在不断地定居各处,但真正大规模入侵印度传统文化腹地的事却到11世纪才发生。总的说来,伊斯兰教和印度当地的各种宗教不乏冲突。伊斯兰教反对敬奉偶像,对偶像崇拜带有一种极度厌恶的心理。于是入侵者以此为堂皇借口,肆意捣毁圣像和寺庙,无论它们是印度教的,还是佛教和耆那教的。

96 然而,伊斯兰教毕竟并不完全是陌生之物。在印度还有别的思想运动,它们基本上也是不敬拜偶像的。一些诗人和传道者所宗奉的"桑陀"(sant)传统就曾强调,他们信仰的神是没有特性的,或者说,他们的神是不具备可见的属性,也即没有形象的。此外,伊斯兰教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它没有种姓制度这样的桎梏。它在印度的传播,主要靠的并非刀剑,而是男女居民的皈依。在这方面,负有传教使命的苏非们(Sufis)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神秘的生活历程能投合很多印度教徒的口味。他们自身的圣洁同伊斯兰教明确的社会正义原则正相表里,也颇能吸引印度教徒前来皈依。谢赫(shaykhs)和辟尔(pirs)之类地位神圣的伊斯兰教长者与印度教的圣者不无共同之处。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1185—1240)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强调所谓存在的统一论,这又与不二论吠檀多的思想不谋而合。此外还有一类称作卡兰达里(qalandars)的圣者,他们偏离正统,而与某些游方的苦行者十分相似——行无定踪,满身涂灰,乞食度日,修习苦行,吸食名为干草的大麻麻醉剂。他们轻视正统伊斯兰教习俗,但是却能使印度居民接近安拉信仰。

97 16世纪以后,在以德里为中心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下,国家政权的压力一直起着强迫改宗的作用。诚然,皇帝阿克巴(Akbar,1556—1605)曾经试图建立一种调和各宗的新宗教,把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其他各类思想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冶于一炉,然而到他的继承者统治时,又开始了对伊斯兰教教法的强制推行。

莫卧儿文化对印度贡献颇多。它为印度提供的社会结构使得一

种新的虔诚信仰得以风行。它在建筑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后世王公们提供了范式，无论他们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然而，它毕竟是处在一种丰厚文化的包围之中。此时，这种文化内部又出现了新的，有利于激发宗教创造性的推动力，而这推动力的某些部分，则早在古典时代已见端倪。

各地区的宗教运动

在讨论中世纪印度教种种变化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在各不相同的地区中，我将选择四个教派：泰米尔纳杜的室利毗湿奴派（Śrī Viasnavism）、中南印度的林伽派（Lingayats）、北方的克什米尔湿婆派（Kashmiri śaivism）、东北部的阇多尼耶派（Caitanya）。此外，我们还想加上锡克教。锡克教虽然已是独立宗教，但它还是表现出印度教虔信派的若干特征。

室利毗湿奴派和泰米尔诗歌

毗湿奴信仰传统中最伟大的思想家无疑当属罗摩奴阇（Rāmānuja），他生活在大约公元1000年前后。他的综合性理论调和了泰米尔毗湿奴派思想和吠檀多传统。他最初的理论动机不在哲学，而在宗教方面。他发现商羯罗的不二论将会带来严重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他把真理和实在分出了层次，并将神和对于神的崇拜放在了较低的层次，低于对惟一实在的神秘直觉。这就破坏了虔信宗教的根本基础。与此同时，它也破坏了婆罗门教的祭祀习俗——而这种伤害还是次要的。罗摩奴阇希望表达出对至上之神的热情挚信，至上之神既可看作是“天启”精神的完美表达，也可看作是印度教信仰真理的完美表达。这样的真理曾经明确地表达在《奥义书》和《梵经》里，也为“传承”经典中的瑰宝《薄伽梵歌》所宣示。

在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伟大的泰米尔纳杜诗人们为毗湿奴和湿婆创作了大量圣歌。这些诗人被人们称为“阿尔瓦尔派”（Ālvārs，毗湿奴派信徒）和“那衍纳尔派”（Nayanars，湿婆派信徒）。在一部叫做《四千圣诗》（*The Four Thousand Divine Verses*）的10世纪作品集

中，记载着 12 位阿尔瓦尔。至于 63 位那衍纳尔的著作，则统统纂辑在《湿婆派法规》(Śaiva Canon，箴言)之内，其中又以摩尼迦瓦沙伽尔(Mānikkavā.cagar)的作品最为重要。泰米尔宗教运动常称湿婆悉昙多派(Śaiva Siddhānta)。对于它的信奉者来说，前述法规所具有的地位足以替代“吠陀”(有时又称“第五吠陀”)。

罗摩奴阇死后，室利毗湿奴派在南印度的势力变得十分强大。该派分为两宗，其理论分别建立在梵文和泰米尔文的不同经典和其他资料上。对于神恩问题，它们看法不同。虽然它们都强调，唯有神
98 的垂爱能将人从轮回之海中救脱出来，但是在进一步的解释上，它们发生了争论。问题是，一个信仰者究竟应该像小猫似的一动不动，等着被抓住颈背，送到母亲那里；还是应该像小猴子一样伸出手臂，紧紧抓住母亲？不过，信仰的根本还是奉献给至上之神的爱和对于他的信赖。人们应该用歌曲，为他穿衣、奉食(摆在圣像前)等仪节，或到纪念他的光荣圣地去朝拜等方式，赞美传说中至上之神的业绩和善德。在社会生活中，室利毗湿奴派主张，在至上之神面前人人平等。既然你不是凭借自己的作为而获救度的，那么你那由宿业决定的身份，就无关紧要。这样，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虔信亦不妨看作是对于印度社会等级性质的抗议。南印度的虔信者从佛教和耆那教那里吸收了某些精神特质，但是他们却凭着自己的传教热情，费尽心力，一步步地把这两种宗教排挤掉了。

罗摩奴阇将宇宙和在宇宙中不断轮回的灵魂统称作“神体”(God's body)。他这里的“体”，是某种对灵魂起支持推助作用的东西。神是完全的。他完全地掌握着自己的体。我们人则只能不完全地掌握自己的体。作为“内部的掌握者”(antaryāmin)，神从每一个体灵魂的内部指引我们。“业”只不过是神的意志的具体体现。如果我们真诚地对神发出吁求，我们就会从他那里得到恩惠，从而诞生在神所居住的辉煌天国，与他常相亲近。通过“体”这一比喻说法，罗摩奴阇表达了一个含义，即神和世俗之间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这正是《奥义书》曾经表达过的。

与众不同的林伽派

林伽派由巴萨瓦(Bāsava)创建于12世纪。他是一位知识分子改革家。林伽派也可称作勇者湿婆派(Vīra Śaiva)。该派具有源自耆那教传统的苦行性质。林伽派名称的意思是“林伽携带者”,因为每个信徒都需要随身携带一个小的男根的象征物,放在一个筒子里,系在颈上,或挂在腋下。实际上,它是他们表达信仰的惟一崇拜对象。对他们来说,朝拜圣地、到寺庙敬拜和举行任何仪式都没有意义。巴萨瓦规定信徒一生大部分时间惟一应做的法事,就是每天两次拜敬湿婆的象征物林伽。林伽派的其他宗教活动还包括若干仪式,以及使用圣水、圣灰、念珠,口念“礼敬湿婆”,在内心忆念神等,意在从不同方面对湿婆表示崇敬。

林伽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否认种姓制度,谴责童婚,主张两性平等。它虽然有一套自己的僧侣职位世袭制度,但还是设法避免各种依赖婆罗门举行的仪式,而在某些方面甚至对婆罗门至上的地位也提出了异议。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它虽然反对种姓,然而在别的种姓眼里它却成了一个种姓。在充满印度教氛围的印度,摆脱种姓制度的罗网谈何容易。在伦理上,林伽派主张人人平等,谦卑处世,对于所有大神的追随者来说,都是如此。在该派看来,诚实和敬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些方面,林伽派倒很像欧洲基督新教的印度版。

克什米尔湿婆派:一个综合体

这个所谓“克什米尔三位一体湿婆派”,与我们前面谈到的两个 99
地方性宗教运动在教义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它最初是一种密教运动,意在吸收和利用三位女神的能量。她们后来又被视为强有力的湿婆配偶迦利女神(可能是印度女神中形象上最有威力的一位)的三重显现。这一运动主要以克什米尔为根据地,其首要的倡导者和神学理论家是哲学家阿毗那伐笈多(Abhinavagupta,975?—?1035)。他撰写了若干重要的美学著作。这部分原因是因为该派湿婆教对其仪式中的舞蹈、歌曲和诗歌十分重视。阿毗那伐笈多曾对许多派别

的观点表示异议，尽管他对它们的基本道理并不反对。比如对于湿婆悉昙多派（南印度湿婆派的理论）、佛教的瑜伽行派（Yogācāra）以及不二论吠檀多等，都是如此。他将正统的商羯罗哲学和非正统湿婆派密宗的不同因素糅合在一起，声称自己宣讲的是最开明的湿婆派教理和行为方式。湿婆派密宗为求获得充满内在福乐和知识的最高状态，把男女交合当作有效手段。他把世界看作如下三者的统一体：个人、神圣性力也即女神、女神背后作为基础的湿婆大神。建立此所谓“新三位一体”，意在赋予不二论观点以积极的内涵，即不二体验[①]可以通过以狂喜心态参与世俗生活来获得，而不必（像商羯罗所说的那样）通过隐居的方式来求更高层次的真理。

黑天信仰和阇多尼耶

后来，当印度教发展到接近现代阶段的时候，即16世纪在孟加拉和印度东北部的其他地方（奥里萨和阿萨姆），通过阇多尼耶的行迹和宣教活动，我们看到了表达形式狂热的黑天信仰和毗湿奴虔信运动的复兴。22岁的时候，阇多尼耶到菩提伽耶朝圣，为给他死去的第一个妻子举行祭仪。在那里他转变了信仰，强烈地表达了对于黑天的忠诚和热爱。结果他连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克里希那——阇多尼耶（Krsna-Caitanya，“以黑天为意识者”——因此，他的现代追随者称他们的运动为“黑天意识”，即“克里希那意识运动”）。他的运动在中产阶级那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信仰者无论是出家行乞，还是不离家门，需要做的就是唱诵黑天名号，吁求他施以神恩。黑天同布兰德万（Brindavan）森林中的牧女们，尤其是他的情人——神女罗陀（Rādhā）之间的情爱，常被用来喻指黑天之爱。同黑天分离是痛苦的，故虔信者无不以挚爱之心依恋黑天。像任何地方处于印度教主流传统的人一样，信仰黑天的人们也为连续不断的轮回所束缚。但是，他们可以依靠神的仁慈和恩惠而获救度，恢复同毗湿奴的密切关系，而他们原本就像火花一样，是从这位大神身上迸发出来的。在当前这个时代，即所谓“争斗时期”（Kaliyuga），人们大多不能履行自己

① 指与惟一最高实在相结合的神秘感觉。——译注

的宗教职责。因此,那些能够满怀信心和真爱投入大神怀抱,而大神也以爱心予以救度的人,的确是十分幸运的。

锡克教和虔信传统

在虔信运动,特别是强调至高之神是无形无性的那一派,与伊斯 *100*
兰教只敬拜惟一神安拉的传统之间,确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两教的

锡克教 关键术语

甘露(Amrit):入教礼。行礼时要用经双刃剑搅动的甜水洒身,入教者宣誓遵守拉希特法典。

《阿底·格兰特》或《古鲁·格兰特》(Granth, Adi Granth or Guru Granth):锡克教圣典。在师尊戈宾德·辛格以后,信徒视此圣典为师尊。

师尊或古鲁(Guru):锡克教的领袖和导师,从那纳克到戈宾德·辛格,前后共十位。

《阇难萨契》(Janamsakhi):记颂师尊那纳克生平的旁遮普语著作。

卡尔萨(Khalsa):意为"纯洁者",锡克教团名称,最初由戈宾德组建。

"基本颂条"(Mool Mantra):那纳克有关信仰的短篇创作,肯定神的惟一性。

班陀(Panth):意为"道路",锡克教团名称。

拉希特(Rahit),锡克教徒应守的道德和礼仪规范,包括所谓"五K",即蓄长发、佩短剑、穿短裤、加发梳、戴铁手镯。

桑陀(Sant):北印度一派虔信运动的成员。该派认为神无属性,与毗湿奴派信徒所主张的有人格化神不同。其成员中最重要的有锡克教创立者那纳克和伽比尔。在这派传统中,桑陀是具有导师地位的人。

萨陀·古鲁(Sat Guru):意为"存在,师尊",是锡克教徒赋予神的名号。

锡克(Sikh):意为"门徒",指锡克教团的成员。

共同点被具有宽仁之心的那纳克(Nānak,1469—1539)看到了。那纳克后来成为锡克教传统承认的第一代师尊(Guru)。有关的生平事迹传说描述了他的传奇经历,说他在一次入河沐浴时曾经受到神的召唤。他在失踪三日后回归,第一句话就是:“世无印度教徒,也无穆斯林!”从那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遁世游方僧,开始长途旅行,足迹之遥,曾到麦加。实际上,早在那一传奇经历以前,他已在宣传一种跨越外在宗教藩篱的新信仰。他和一个叫做马达那(Mardana)的穆斯林诗人共同创作了若干圣歌。唱诵这些圣歌后来成了锡克教
101 崇拜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说,那纳克去麦加时,曾经犯了错误,脚朝着麦加就睡着了。这对穆斯林信仰是大不敬。一个毛拉愤怒地将他摇醒,他反倒气势汹汹地说:“把我的脚挪到没有神的方向去就是了!”由那纳克推动的这场宗教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师尊的重要性。师尊从来未被当作神的化身或显现。他的重要性是他要在真理之路或通往神的路上引导人们。那纳克的神学理论框架带有印度教特点。他承认轮回转世说,也相信至高之神最可靠的象征是源自吠陀的神秘音节“唵”(Om)。他认为神是婆罗门和吠陀的创造者。他还认为僧侣阶层的存在没有必要(他自己是一个刹帝利,为武士阶层)。

师尊那纳克的圣歌

世上只有一个至高之神,他的名字是真实的,他是创造者,无畏,无敌,永生,无始,自存;师尊赐福。

那真正的惟一者存在于宇宙之始;那真正惟一者存在于原始之世。

那真正惟一者尚存于今,那纳克啊,那真正惟一者将存于未来。靠思考我无法把握他,即使我思考千百次。

那纳克的继承者共有九位师尊,他们都是这一新的教派团体的首领。最后一位师尊是戈宾德·辛格(Gobind Singh)。他于1708年去世,死前曾指定锡克教圣典《阿底·格兰特》(Ādi Granth)为未来的

师尊。其他师尊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阿尔詹(Arjun)。他在1581至1606年间领导锡克教团。其间他于阿姆利则(Amritsar)建造了金庙，开展收集圣典资料工作，并与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Jehangir)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导致锡克教徒更加把自己建成一个外向的、具有军事性质的团体。其实，关于锡克教发展历史的这一说法出自后世，是已经到了现代的事。注意一下不难发现，在很长时期内，锡克教并不显得与周围判然有别。与那纳克同时代但年纪稍长的伽比尔(Kabīr，1440—1518)创作的诗歌有一些也编入了锡克教圣典。有一些那纳克的追随者和伽比尔的追随者一样，还是留在了印度教社会中。他们遵循的也还是主张虔信和各教协调的路线。

若干小的传统文化集团

不应忘记的是，在描述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印度主流传统的时候，还有一些重要的小的传统文化集团需要重视。比如，不同部落集团的宗教散见于次大陆各地，它们在不少方面已逐渐融入主流文化结构之中。我们不难在极其丰富的印度神话宝库中找出某些内容，指 102
出它们就是从这些性质各异的文化集团里吸收来的某某故事。

在稍后的时代里，印度也有了不少基督教徒。他们是基督教使徒圣托马斯(St. Thomas)在南印度的追随者。据说，圣托马斯曾在这里布道，最后殉教于此。他的坟墓在马德拉斯(Madras)郊外的迈拉波尔(Mylapore)。无论有关他的传说是否真实，圣托马斯派肯定十分古老，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3世纪。

在今喀拉拉邦海岸有两个犹太教团，所谓一白一黑。他们自称早在耶路撒冷圣殿倒塌时就已存在。不过，有关他们的历史记载只能追溯到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

自公元8世纪开始在印度西海岸定居的还有琐罗亚斯德教徒(Zoroastrians，人称帕西人，Parsees，即波斯人)。他们人数虽少，但在印度社会中却有相当的影响力。

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印度传统

前面所述，不过是就印度的整体状况撷取些实例看看。实际情形是异常复杂的。如果对印度宗教的各个方面巡视一番，我们可以把多种多样的不同模式罗列如下。

首先，就仪式和习俗来说，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类型的瑜伽——印度教的、佛教的和耆那教的。我们也看到了婆罗门坚持不懈地举行祭祀仪式，以及他们如何垄断寺庙，寺庙里摆放着人们要去供奉，表示虔敬的神明。我们了解到了何以内在的虔诚有时比外在的奉守仪节更为重要，就像在林伽派和那纳克的锡克教中所表现的那样。我们看到，在贝拿勒斯，在波罗耶伽(Prayag，今天的阿拉哈巴德)规模巨大的“贡帕庙会”(Kumbh Mela)上，盛大的朝圣活动把印度人聚集在一起。波罗耶伽乃是恒河、朱木拿河同见不到的萨拉斯瓦蒂河相汇合的地方。从秦米尔纳杜到克什米尔，从喀拉拉到阿萨姆，我们看到了地域习俗的巨大差异。我们也看到穆斯林进入了这一个文化复合体。他们在北印度驱逐了佛教，促成了该教在整个印度的衰亡。我们还看到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它们由许多基本的单位即家庭所组成。每个家庭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小神龛。各家日常的祭仪，正是形成印度宗教格局的有机部分。

至于宗教经验，我们见到的模式包括内在的禅定以及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喜乐和内心平衡；面对伟大而又凶暴的神和女神时的敬畏之心；虔诚之心和充满爱心的神祇所给予的平和心智；来自地方和家庭所崇拜之神的安全感；密法在性上给人的销魂感受；通过金刚乘获得的光亮明晰的幻见能力。在西藏有同多罗女神的结合；在斯里兰卡有求得内心清净的崇高途径；在村庄里还可以见到依旧存在的萨满教和跳神治病的仪式。所有这些宗教经验都充满着来自教义和神话的观念和信条。

104 在哲学方面，这里拥有“空”的观念，以及其他观念如无属性的梵、创造之主、脱离轮回之中的声色和苦难后得的朦胧解脱、二元论、非二元论、介于二元和一元之间难以参透的理论、不二论的本我、佛



叙事层面：罗摩是毗湿奴的化身。他和他的弟弟罗什曼那向楞伽城魔王罗波那射箭。背景为哈奴曼和众猴。悉多在罗波那的宫中等待，周围是魔王的兵丁。故事情节见《罗摩衍那》，绘画为19世纪后期作品。

教的无我，以及虔信派的多个自我。此外还有正统婆罗门学派的六种观点、半正统的湿婆悉昙多派和其他体系的观点、佛教内部的各种学派、耆那教的玄学思想、唯物主义者的否定观点等。所有这些思想模式都编织在古典和中世纪时期的印度文明之中。后来又织入了苏

非和其他穆斯林哲学的思想成果，使这一文明变得更为复杂。

在叙事层面，中世纪印度教的作品异常丰富：伟大的梵文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以及后来它们的各种方言译本、称作《往世书》的神话故事宝库、佛教的本生故事以及各种各样有关佛陀和菩萨的故事、耆那教的叙事文学、种类繁多让人目眩的地方传说，外加对赋形不同的神表达信仰的故事。众神以种种形象显现于人，使得印度教舞台呈现出纷繁杂乱的景象，同时却无人态度鲜明地说，无论
105 神有多少，实际上只有一个惟一之主；连在这个方向上偶一为之的努力也不见。凌驾于众神之上的是湿婆、毗湿奴和女神，还有一位是作为无情而强大的对立观念出现的——穆斯林的安拉。

种姓制度所带来的社会钳制在中世纪时期毫无松动之意。当时佛教式微，耆那教无力，任何一个小的对手都可能被吞噬，而其群体则沦为种姓（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曾遭此对待）。这个制度将一种无所不包的模式强加于不同社会集团原本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法律责任乃至伦理标准之上。这样的社会集团有从杀羊献祭的，到严格遵行不杀生原则的；从刻苦禁欲的，到对性行为赞美不置的；从寻求完全自由的，到强迫寡妇殉夫的。此外还有处于社会边缘的各种类型的圣者——裸体的苦行者、遁世者、游方的导师、印度教僧侣、佛教和耆那教僧人；还有很多部落集团，它们被圈起来，像是印度文化海洋里的座座孤岛。

宗教多样性和地区变化在物质层面的表现，则有众多的圣祠——从南印度高大的庙宇，到尼泊尔的阇堵波，从阿布山镇（Mount Abu）的耆那教寺院，到壁画令人惊叹的阿旃陀（Ajanta）。在这些印度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中，入定佛陀和舞王湿婆的雕像恐怕是最为出色的了——一个充满优雅的沉静，一个表达着美丽的勃勃生机。它们正好代表了印度文明的两极。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中世纪去，所幸加德满都（Kathmandu）谷地还能为我们提供最接近的样板。那里有按中世纪式样雕刻的楼台和古色古香的街道，佛教和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英国人的到来改变了次大陆的面貌，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正是加德满都谷地能让我们在柴油气味弥漫的氛围中，多少领略到以前那古老而又多彩的文化是个什么样子。

第三章　中　　国

概　　况

西方人经常会对中国的宗教感到困惑，他们以为中国的宗教和 106
哲学思想可以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划分，所以他们说中国有三教，即儒、道、释，但这三教却不是一个单一的功能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①]同样，我们对三教所冠的名称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儒家”会不会是指孔子开创的哲学思想流派？道家是否为老子的教诲？如果是这样，儒、道所指称的宗教就应该与他们所教诲的“哲学”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它们兼指宗教和哲学。尽管植根于孔子的礼仪思想，且有专门祭孔的庙宇存在，不时被标榜为“儒家”的中国国家信仰仍然是一个人文教化体系。它称不上严格意义的宗教，除非国家以功利为手段强制人们遵守这个教化体系。当然，中国也有“民间宗教”，即通常所说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或勉强也可以称之为儒教的、夹杂着道教、佛教及国家宗教的某些特征的思想和行为。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中国宗教实在是一个大杂烩。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对这些指称进行一点梳理。

首先，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有简单组织的，然而又十分地方化的复杂现象——中国宗教。就有实际的组织系统看，佛教和道教都明显地自成一体；它们都有寺庙宫观及教阶人员。要用这些名称指涉这些传统，所指的是分别包含在这些传统中的宗教。为了与此相
符，我们用“儒家”指一种官方的信仰系统，它在 1911 年的辛亥革命 107
后即告终结，自那之后它就没有在中国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如果指称孔子开创的哲学传统（实际比孔子要早），我们不妨称之为“儒家思

①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通常被视为亚伯拉罕信仰体系，一些西方人常以此系统类比中国的宗教。——译注

想”;它包含明显的伦理道德学说和行为箴言。因此,我们不应对“儒家思想”中“思想”一词在学理上过分纠缠。对于由据传是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和《庄子》论文所揭示的“道家思想”,我们也应作如是观。
108 道家思想的主要论题都可以作为一个组成要素被包容进“道教”之中。但是,无论是老子或庄子,假设历史上真有其人,都与后来的道教无大关涉,因为道教与道家虽然同借一名——道,但道教的内容要驳杂得多。

孔子:《论语》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虽然中国人能在地方上的具体活动中整合三教的仪式,但三教的组成如儒士阶层或儒生制、佛教的僧团制和道教的宫观制都希望获得国家垄断性庇护。我们也还应该提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西方宗教:一度影响很大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an Christianity);摩尼教(Manichaeism);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在这些外来宗教中,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最大。近代基督教的传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教育方面。

中国宗教历史的重要时期

公元前1000年以前,商朝为周朝所取代,摄政王周公成了后代儒家推崇的理想人物。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东周列国(公元前771—前221年)时期。此时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知的中国文化。孔子所编撰的、作为其教育和哲学思考内容的诸经典也形成于此时。孔子,即孔姓的教师之意(英文“Confucius”——孔子——实际是拉丁语的读法),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传说中

的老子据信生年略长于孔子,但是传说中由他所著的经典——《道德经》——却是后人晚出的作品。之后的几个世纪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传统中又增添了巨擘,如庄子和孟子。

公元1世纪,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公元2世纪,张道陵开创了道家的宗教体系(至少也是道教的主要流派)。因此,我们有理由将公元2世纪以前称为中国宗教的形成期或初期。然后我们可以将隋、唐至公元10世纪视为中国宗教的古典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中国的三大宗教都已定型,而且中国佛教也于此时对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教义和礼仪的改造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从11世纪到18世纪末,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宗教的中世纪或前现代时期。这个时期西方宗教对中国产生了全面的,甚至是命运攸关的影响。

特别是在中国宗教的古典时期,中国文化已播及海外,主要是越南、朝鲜和日本。其时,中国正执世界文明之牛耳,中国佛教开创了诸文化整合的新局面。19世纪,在全球殖民经济的影响下,大量的中国人被卷入国际移民的浪潮中,其结果是,中国文化和宗教也被带到了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其他地区。

某些重要的思想和实践

由于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单一的文明,而且可以把它归结为 *109*
一个单一而松散的宗教,因此应该描绘出它的主要思想和实践。从仪式层面看,"礼"的观念是最概括和最重要的,它主要是指仪式行为,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就是包括了音乐的仪式。"礼"在孔子的全部哲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明显的重要性还包括对祖先所举行的祭奠——有皇帝对祖先的祭祀崇拜以及宗族的和家庭的祖先祭祀崇拜。祖先祭祀还与丧葬有关,意在欢送死者至其安息之所,以避免他们死后沦落为厉鬼的噩运。

礼仪的第二个重要旨趣是占卜,这是一种在《易经》成书前就广 *110*
为流行的活动。风水,或可称为调和人间行为——诸如建房——与地形精灵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宗教通过道教的练气和中国佛教打禅的新颖方法对神秘主义与瑜伽都做出了贡献。

中国宗教 关键术语

教(Chiao):一种宗教运动、教义或教派。

道(Dao):道路或自然运行的规则。

经(Jing):经典的文本,通常指古代儒家的五经(如四书五经),也用以指其他教派的经典,如禅宗的《坛经》等。

理(Li):原理或与“气”相结合的精神实体或能量。

礼(Li):仪式,庆典时的礼仪或规范,得体的行为,儒家教育的核心概念。

禅(Qān,梵文 dhyūna 的中译名):也是日本著名的“Zen”,即禅宗流派。

气(Qi):物质能量的概念,与“理”结合构成现实世界的存在物,是新儒家哲学的基本概念。

仁(Ren):人道,或对他人的关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

太极(Taizhi):《易经》和新儒家思想中所言的终极实在,或一切存在物之源。

太平(Taiping):上天之和平或某些道教经典中所描述的天堂,也特指1850—1864年在中原和中国北方试图建立太平天国的革命者。

天(Tian):上苍或天上的人格神,在信仰上其地位与皇帝相同。

阳(Yang):世界的阳刚性原理,与“阴”的相互作用关系构成了大部分中国思想的基础。

阴(Yin):与“阳”相互作用的阴柔性原理。

从经验层面看,中国宗教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通过遵循自然生长之理——道——来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神灵附体的行为在民间宗教中十分重要,人们对仙境也很憧憬。

从教理上讲,人们很重视“天”的观念,有时视其为抽象的意志
111 之天,有时视其为人格之神。统治者通常被视为奉天承运而得其权位,或也以逆天之命而被罢黜权位。后来中国人宗教思想中还出现

了超神之神或太上神的观念。贯穿中国历史的宇宙生成论都是由“阴”、“阳”(雌、雄二性原理，消极与积极两极之间的交互作用)相荡相生的结果。中国人将宇宙间的一切存在都归结为阴阳及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生相克。

从叙述和神话层面看，中国文化的内涵也极其丰富。就我们所关心的主题而言，有必要涉及有关孔子生平的故事、老子的传说以及那些特别重要的神仙们的故事。就社会层面而言，理想的学者或儒士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成为社会中的圣贤。儒家的伦理大部分都是围绕家庭关系而展开的，但是佛教和道教的寺庙宫观反而为人逃脱家庭羁绊提供了避世的场所。从总的方面看，儒家的伦理是用入世的“仁”来展示人的慈爱和诚意，而道家或佛家则与之相反[①]，关心的是“无为”，即无所作为或无所作为而为。

上述这些即是中国宗教文化的某些主要方面。如果我们要确定这个宗教文化的具体内容，那就该想像一下中国的绘画。中国的绘画是不加边框的，因为中国人认为自然是不能以边框局限的；画面上的风景奇观往往在画卷之外还寄有深意。所以中国的艺术强调综合 112
的意境：一幅画往往需要题诗或题字，反之亦然，俾得诗文、书法和绘画三美之俱。自然无限的生意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动感，因此它不像西方或印度哲学和宗教那样注重静态的分析。

中国宗教的初期

孔子的生平和施教活动

由于孔子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影响，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从他开始讲述。我们今天所见的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是一本叫《论语》的书，它所讲述的道理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学者和官员。孔子大约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即今日的山东；他的家庭或许有些贵族血统。无论如何，他接受了当时通常只有贵族才能享受的教育。不

① 道家和佛家主要是强调这两种思想传统的哲学方面，而道教和佛教则是表明它们各自的宗教方面。此处是谈它们的伦理哲学，故译为道家和佛家。——译注

过，他在后来的施教活动中却引入了一种革命，即有教无类。在他的推动下，君子的观念得以形成[①]。在他看来，君子之所以高贵并非由于其出身，而是由于其有道德的行为。孔子生逢乱世，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可谓颠沛流离、历尽艰苦。从理论上讲，周王室在如今的中国北方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则是由大大小小的诸侯在控制局面。孔子认为，理想的治理应该源于道德劝勉而不是诉诸武力征讨。因此，他特别关注礼仪；他认为礼仪是劝勉正当行为和忠于职守的典范途径。他思考着传统的意义并对历史岁月悠悠有深情，但这不妨碍他仍然是一个改革者。他憧憬古代，思绪万端，精益求精，认为是非暴力的禅让制度开了太平盛世的先河。

孔子在《论语》中宣称，“五十而知天命”。他曾官拜鲁国大司寇，但他短暂的官场政治生活并不得意。之后他便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历时13年。他于68岁时回到了鲁国。70岁时，他说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了精神自由的崇高境界。经受了丧子及两个得意门生英年早逝之痛，孔子于73岁时辞别人世。但他的影响却常留世间，甚至他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也成了中国近两千年的典范。

据信他编撰（也许是误传）了六经，实际上现在看到的只有五经，即《诗经》、《易经》、《书经》、《礼记》及《春秋》，六经中已遗失的是《乐经》。无论如何，他的名字是与这些文化典籍密不可分的。

这些典籍与其他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官考试的主要教材。因此，孔子至少间接地影响了一个官僚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的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谙熟生活的仪式，被教育成为正心诚意、举止优雅的君子。他们心中的道德理想是“仁”或爱心。根据这个标准，为政者应公正、真诚和人道。这是一种将经典教育置于政治核心的远见卓识，中国因之得孔子思想之福佑者良多矣！

孔子不事玄思遐想。尽管只是偶然谈及，他还是明显地信奉“天”为一有人格的神。据说他也不语怪、力、乱、神，谈论宗教也以谦和然则理性的语调。这大约也是后来“在位”的儒者轻蔑带有迷信色

① 原文将君子gentleman拼为xunzi或hsun-tzu，即荀子，估计是误解汉语拼音“junzi”之误，此处予以纠正。——译注

彩的民间宗教的缘由吧。在中国的儒家学者中后来出现了一种贵族意识，这也是孔子思想异化的产物。孔子强调对所有的人都应待以忠恕并恪守古代礼仪，包括敬天祭祖。他在本性上不是一位斗士，而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一位彬彬有礼然而又不失幽默的博雅君子。“弋不射宿”，以示公正，此其豹斑也。

孔子也为其身后的中国思想确立了框架，它涉及政治、德行及人性。他去世后的下个世纪中国又经历了政治和道德观念上的波动。墨子极力鼓吹兼相爱与交相利；他认为这将有利于民众，增进他们的财富与安全。他以天命为最高的神谕，统辖诸多鬼神。他个人的道德和生活上的节俭对于他的事业无大助益，他所倡导的运动也归于沉寂，尽管18世纪时一度出现了复兴墨家思想的苗头。 113

孟子、荀子、韩非子

孔夫子思想的最伟大继承者是孟子，西方也以拉丁文 Mencius 称之，以示其为古典权威。孟子生卒之年为公元前371至289年，他的实际生年也许比这个时间早20年。他一生鼓吹圣王之治，即政治当以恪守道德为前提。他坚信为政当以王道，人们有权推翻暴君的专制，只要他逆天命而行。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和平主义，这大概是出于对他所经历的乱世杀戮的反思。征伐必须以建立人们所期盼的圣人之治为目的。他的教诲中最重要的观念是“心”和“智”。[1]它是人本性中所具备的力量，如果发扬光大就会演变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基本道德，分别代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人在本性上都有向善的倾向，换句话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在这一点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传统，既与主张利己而有损于社会和谐的道家相反对，也与墨子重利轻义的虚善相区别。根据性善论，孟子认为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政治政策都应以发扬人的本性、充分实现道德为宗旨。

与孟子相反，荀子（公元前3世纪人）见证了秦朝统一中国（于公

---

[1] 孟子“性”或“性善论”的另外一种表述。——译注

元前 221 年)[1]，对于秦朝的凶恶本性惶恐不安，特别是他的两个门徒参与了秦朝的宫廷政治，使他提出了与孟子不同的、对人性更加悲观的看法。他认为人之本性躁动而趋恶，只有使用强制的教育才能转其为善（“其善者伪也”）。他特别强调孔子思想中“礼”的重要性，以为言谈举止得体之礼是内在感情和外在行为的统一。在他看来，礼既然有约束个人行为使其举止得体的功能，它就应被视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尽管与先前儒家传统的道德乐观主义有所不同，但荀子还是主张在实践上采取与传统儒家相同的教育方式和观点。他在作品中表明，“礼”有宇宙生成的功能，如：

115 凡礼……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

谈及追念死者——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他也动情地写道：

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2]

荀子生时，正值中国历史上具有创新精神的“诸子百家”时代的尾声，除了儒家学派之外，还有其他诸多学派，如道家、法家或称当权
116 学派以及其他诸派。儒家传统那时已在教育领域独领风骚。之后不久，儒家文献通过国家设立太学的五经博士成为中央教育机制中的经典。而在此之前，中国却经历了一个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波动时期，导致公元前 213 年所有有争议的书都被焚烧了。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他曾问学于荀子但却不满于儒家的

---

① 中国历史的常识只是说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与秦始皇有关，但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荀子见证了秦朝的统一。——译注

② 以上两段引语皆见于《荀子·礼论》。——译注

道德说教。法家的主要观点见于他们反对儒家的思想：他们反对儒家提倡的以传统道德管制人民，而是力主治之以法律条文。韩非子的著作是一种实用智慧，它解释了统治人民和控制官僚的最好方式。他认为个人的头衔要与他所该履行的责任相匹配，所谓“循名核实”，赏罚因其功过而分明。统治的关键在于用权，此方面韩非子确有不少好建议。例如，管理之效，不偏私好，臣下遂无阿谀哄骗之机。他应该因势利导，位于权势之中央而静观其变（颇有道家的意味）。赏罚为统治的两个权柄，须形成制度而施行之。法术胜于道德，韩非子以为，法术之利，中才之人亦可调用以成事业，安能待圣人出而后世有其治耶？他作品中那种愤世嫉俗的腔调以及重法术而轻圣德的思想，使其背上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唯利是图的骂名。

老子及道家传统

在中国文化早期就与儒家正相反对的是以《道德经》为标志的道家。该书中的内容充满了奇妙的神秘主义，以至于后世广为流传，甚至难以置信的是它居然被译成了40多种英文的译本。按道家的传统说法，老子（老聃）年长于孔子，后来有文章说孔子还就诸如“礼”之类的问题请教过老子。现代的学者对于历史上是否真有老子其人颇存疑问，可是在中国人的想像里老子仍然是活龙活现的人物，因为老子其人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积淀甚深。甚至有人相信他转世成了长寿神仙——太上老君。不过我们将在后面论述中国宗教的古典时期时涉及这位神话般的人物。目前我们还是只讨论道家思想，它们主要体现于《道德经》与《庄子》二书。

《道德经》开篇的文句就不同凡响，成为点睛之笔：

> 道可道，非常“道”；
> 名可名，非常“名”。
>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 *119*
> 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些话表明，宇宙赖以化生的神圣规则就是道。这本经典著作的中心思想是，我们必须尊道而行：人法道，道法自然。这不是可以随便违反的。违反自然不足效法，这是自明之理，也是不假言教的。从这点看，儒家所重的繁文缛节之“礼”是南辕北辙，走错了方向。这也就是为什么传说中孔子需要老子教诲的原因。因此安时处顺的人能看清自然之理，可名状的世界蕴涵着不可名状的实在。正如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的那样，道家的哲理与佛家的哲理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这一点在大乘佛教的《般若波罗蜜经》和龙树的著作中尤为明显。





左图：驱魔避邪的红漆门牌，上有阴阳八卦图，可以防止鬼怪进入房内。
右图：观世音菩萨，是差遣灵魂的救星，见于伦敦大英帝国博物馆的一幅10世纪的丝绸画。

这种相似性既在佛教禅宗派的演变中也在道家的思想中表现出来，

只不过道家的人认为佛教是自己的变种而已。

《道德经》中有许多类比的说法，以揭示道的神秘力量："无为"的力量，"无所为而为"的力量；山中峡谷虽空而充满活力；水流无形而暗藏漩涡；容器虽空，然能乘物，此空即为实。总之，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自然、无欲、消极。其传统至为安谧，强调和平、自省；从体验层面看，它意在获得内心的安宁。如果说儒家思想是积极的、实用的和入世的，那么相比之下道家思想则是静默的、无政府主义的和直觉的，甚至是无所用心的。

道家的这些思想旨趣在据称是庄子所著的《庄子》一书中继续得以展现。庄子的生卒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69至286年。关于他生平事迹可信的资料并不多，我们主要是通过那本充满优美诗意的著作《庄子》来了解他。同样，他也认为，弥漫于一切存在物中的奇妙精神是道。因为一切如强弱、生死、苦乐、明暗都是具有相对性的人为判断，不能代表真实存在的道，所以我们应超越它们；我们应该对强弱、好坏一视同仁，不加分别。我们应培养绝对的宁静，不过这只能是一种神秘的个人体验。庄子的这套体验原则让儒家的人怀疑其充满阴谋诡计和反叛意识。

我们也许注意到，道家的思想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为中国后 120
来的反叛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的人说道家思想易于导致造反活动，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在描述得道神人的自由时，庄子所欣赏的是大鹏展翅飞翔，凌空万里。不过道家的传统后来却大幅度地转向了寻求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及修道者的神道魔力。可以说庄子的思想预示了这些转向。

至此，我们已经介绍了早期的一些思想家。此后中国趋于统一，佛教也开始向中亚传播。中国内外各种势力的交互影响促使道教在道家的基础上脱颖而出。此后便进入了我们所谓中国宗教的古典时期，其间形成了一个以儒释道三教为核心、以其他地方宗教为羽翼的宗教系统，该系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才宣告崩解。

庄子

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年):也许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道家思想家。尽管老子有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但人们一直认为他是道家传统的创始人。如果老子真有其人,那也许是庄子同时代的人。庄子是(宋国)蒙地之人,大约在今河南(商丘东北),作过漆园小吏。关于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但他留下了《庄子》一书,即新道家复兴时由郭象(Kuo Hsiang 死于公元312年)从众多材料中编定的庄子著作。这是一种充满奇妙想像的著作。它的寓言内容丰富,涉及飞禽走兽,甚至树木。其目的是放松读者的思想,使他从盲目地追求语言的区分和极端性(辩名析理)中解放出来。较晚的佛教禅宗派也是采用同样的玄妙而又似是而非的方法寻求同一目标。庄子最有名的故事大概是这一个:

>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庄子所达到的这种觉悟可以使人成为隐士,他这样做也许是乐于住在农村与那里的昆虫鸟兽和睦相处。他也许靠着自己的卑谦和退隐避开了社会的烦恼,超然自得地享其天寿。这也许是对儒家入世思想的一剂解毒药。

中国宗教的古典时期

儒家的官方化

121 尽管秦始皇(其执政时期为公元前221—前210年)采用了法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对统治者的吸引力更大。一方面是因为儒家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文化,这是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是儒家的礼

仪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控制；另一方面是治理社会也得借重儒家的伦理道德（如果明目张胆地施行马基雅维利式的唯利是图的方案，那将是不明智的；要玩世不恭最好还得罩上道德的假面具）。综合言之，儒家思想是可以让人信服的。不管怎么说，在公元1世纪的汉朝儒家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信仰。官方开始祭奠孔子，其活动也纳入了皇帝祭天之类的国家祭奠规格。后来到了7世纪，在中华帝国的行政系统中普遍建立了孔庙，孔门高弟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儒家人物也被赐以牌位并列入孔庙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已经变成了一种“国民宗教”或国家信仰，以纪念那些有功于帝国的人士。

成为国家正统的儒学实际上是由声望卓著的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所提倡的那一支。董仲舒所宣扬的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宇宙生成论思想并以儒家的思想原则解释之，是阴阳、五行、天地之类的观念。所不同的是，他将这些观念解释成了具有人格的主宰。他对天命的思想也加以利用并发展出一套朝代兴替的理论。其意为，如果统治者不尊天命、道德沦丧，则其政权早晚要土崩瓦解。在最关键的人际关系方面，董仲舒也运用了阴阳理论加以解释，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些关系中，阳（君、父、夫）被视为主导方面。总之，儒学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推崇的是一套等级制理论。

实际上，儒学的官方化进程也是把孔子敬奉为祖宗的进程，这与敬奉其他贵族和皇帝的祖先性质是一样的。这种敬祖祭宗的信仰在中国宗教的古典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南方的宗族祭祀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种祭祀加上家族祖先的祠堂灵位祭祀最终演变成了宗法式宗教的模式。

道家演变成为宗教

我们已经讲到过的早期的道家思想后来演变成为道教的一部分，其作为一种思想对道教的影响也仅限于此。促成道教成为一种宗教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张道陵的宗教体验和组织活动。传说在公元142年，张道陵得到了作为神仙的老子的福佑，封其为“天师”（Tianshi），即承受天意的大宗师。他设计出了新的崇拜方 122

式，见血的牺牲祭祀被禁止了，新的信徒应该放弃对旧神的崇拜。这个宗教活动演化出了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宗派，每个参加者都应贡献5斗米（所以这个宗教活动又被戏称为“五斗米道”）。

中国东部也同样兴起了道教运动，对它产生影响的著作是《太平经》，即关于天下太平的经典，该书后来也被列入《道藏》。在地上建成和谐的天国的理想激励着中国历史上一系列的救世造反运动。宗教意识浓烈的黄巾造反运动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张鲁——张道陵的孙子，虽然仍与政府有嫌隙，却通过谈判赢得了有条件投降的局面，在魏武帝的朝廷里获得一席官位，作为“天师宗”一系的领袖而得到庇护。在这个宗教组织所控制的广大地区，设立了义米和义舍及其他免费的服务，在某些方面还取代了政府的职能。此时，在道教徒的心目中老子已被奉为最高的神，曰太上老君，是最高神灵的道成肉身者。道教的这个传统形式一直延续至今日，天师的谱系也延续了好几百年。当然道教之所以成为宗教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也起了作用。

带有乌托邦理想的造反运动的失败也是形成道教的原因之一。中国人通过萨满教式的静思冥想的修炼以求得太平的境界，以为可
123 以在心目中见到太平世界，甚至见到太上老君，此类情况也是道教形成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企求长生不老的传统伴之以梦想成仙的炼丹术也是道教形成的原因。此外，寻求医治由道德欠缺而致之疾病的努力也促进了道教的形成。关于道教实际修炼的著作最后也由葛洪（283—343）所完成，取名为《抱朴子》，意为“包容简易之法的宗师”。他所提倡的方法包括：行善、练气、存精、食丹，此皆长生不老之法。

道教形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江苏的茅山运动。在公元4世纪晚些时候，杨羲称受到神启，即诸多神仙造访了他并面授机宜，这些神启的内容后来都被写进了道教的经文之中。

这些道教运动最后逐渐都演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宗教，其中有古代的清静无为教与天君老子崇拜的结合，有对其他神仙稍逊一筹的
124 崇拜，有对个人静默、养气、节食、炼丹成神的执著，甚至道教的沉思修炼发展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以至于与佛教的坦陀罗颇为相似。

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佛教是道教形成的第五个因素。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对道家形成了挑战，道家的回应之一就是说老子西出中国而到了印度而且在那里创立了一种佛教。实际上，可以说道家是模仿佛教的三藏而重编自己的经典，而且从4世纪晚期就开始以佛教的精神编撰道教的经典，创立一种与佛教相似的宗教。一位道教学者约韩·拉杰威(John Lagerwey)甚至将这时形成的道教称为"精义大乘道教"(pure Mahāyāna Daoism)。为道姑和道士提供修炼之所的道观此时也得以建立。道教的静思修炼及神秘的房中术都较坦陀罗更为悠久，但在其他方面却大量借鉴了佛教的修炼方法。



仪式层面：在台湾的一个中国寺庙内。

自然，宗教在中国的发展都想谋求皇室的庇护，因此也相互竞争。在唐代(618—907)朝廷开始施行祖护宗教的政策。高宗皇帝(649—683年在位)颁布皇帝诏令，在中国地州以上区域皆置道观佛寺，由国家负责其费用。这种对宗教既保护又控制的体制一直延续

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个制度并没有损害儒家学者作为文官的重要作用。尽管许多儒家学者用相当理性的眼光看待僧人和尚、尼姑道姑、传教士等，控制其迷信活动不使民众遭受愚弄，但中国各种文化体系之间大体上仍然维系着互相支持和宽容的局面。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最初渗透进入中国是沿着西藏北部的商路，它在中国的传播与其说是靠传教，毋宁说是靠自己的存在来吸引他人。佛教最早在中国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即公元166年汉桓帝时代，中国皇帝在宫殿里树立了黄老（黄帝为史前之神与老子）及佛陀的塑像。

佛教传入中国有大量的翻译工作要做。由于格义（由道理的相似性而进行的类比）的特征，人们运用了道家的语言来翻译，对某些梵语术语只能用一些令人难解的语音标出。佛教以道路，即道家的“道”描述自己的旨意。它的神是佛陀；它的行为就是无为。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宗教（佛教中国化以前，和尚的相貌和服饰以及佛陀塑像的轮廓都是外国的），道家的人对其多少都存有些偏见，但道家的人有个说法，即老子西出函谷关后就到印度传教去了，佛教的经文不过是老子古典说教的翻版而已，因此，道家的人接受佛教就成了见怪不怪的事了。

佛教中业与轮回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外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中国人也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这些观念。诸天的宇宙观及印度的净土宗都为中国人提供了诱人的天堂观念，使他们相信只要
125 诚心诚意地念阿弥陀佛（Amitābha）就可以进入天堂。不仅如此，中国人还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了这些观念。但是，纯粹由中国本土发源出来的佛教流派则只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天台宗

我们下面所讲的是佛教引入中国以后的第五个世纪的事。此前佛教在中国既得到了过分的庇护有时也遭受迫害（主要迫害佛教的

时期是公元 446—452 年及 574—579 年的北朝以及公元 842—845 年的唐朝，史称“三武一宗”中的“三武”灭佛事件）。天台宗是由智顗在天台山建立了最重要的寺庙修炼而得其名。他的佛教著作是一种集大成之作。原本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经典和流派纷乱复杂，使中国人难于了解佛教的精义。智顗致力于解决这些为中国人难解的问题，他将佛陀释迦牟尼的教导分为不同的阶段，这是因为人只能循序渐进地理解佛教的精义，最终才能到达由《妙法莲华经》（Lotus Sūtra）所清晰表达的最高境界。

在对佛陀的教义进行创新的解释时，智顗引入了“方便”（upāya），即方法技巧的观念，佛陀本人运用这些观念就是为了听众在心理和精神方面便于接受他的教诲。例如，在贝拿勒斯的鹿野苑佛陀宣讲上座部佛教的原则和修炼方法，但一当人们听懂了这一层教义并达到了圣人或阿罗汉境界，佛陀就会告诉人们圣人境界并不是佛教的最后和最高境界。此时大乘佛教教义的魅力才开始展现在人们面前，吸引他们追寻大乘精义并认识到小乘（Hināyāna）教义的某些特点。佛陀圆寂之时口中仍在唱颂可与《妙法莲华经》媲美的《涅槃经》（Sūtra of the Great Decease）。

智顗的这些努力旨在将佛教的主要经典解释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如此，智顗解释佛经的方法意在表明，我们不能局限于探究理论或哲学本身，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经文中所蕴涵的修炼方法。天台宗后来传到日本并成为重要的教派，其在中国宗教的古典时期影响甚巨，也是显而易见的。

华严与缘起

华严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的另外一派，它在解释佛教的教义时独创了一种新的形式。大约在公元 600 年以前，该宗就已显端倪。但该宗真正的集大成者大约可算到其三祖法藏（643—712）的头上。其经典《华严经》（*Mahāvaipulya Buddhāvatamsaka Sūtra*），亦即花鬘经（Flower Garland Sūtra），大约是于公元 4 世纪在中亚由传教者从诸多佛教经典中综合而成的。这部经典记录了佛陀觉悟之后所得的丰富多彩的思想，其中佛祖看到了万物的“如实所见”。这部

经典的结尾一章，有时也被列入单行本经典，即"入法界品"，其中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寻求真理的主人翁，他一生游历，博采诸家之说，最终修炼成了菩萨。

126 《华严经》的经义指明，一切现象和本质都有因缘关系并且相辅相成；它们相互渗透而又不失本性。这是一种积极的缘起（Interconnectedness of Events）观念，也是佛教初期的教义。但是，后来印度的一些作者，如龙树，却把缘起观念推至极端，导出了一个消极的结论（如"一切皆空"）。然而华严宗的结论是积极的。它将世界比作因陀罗网境界，因陀罗网是一珠网，其上每一珠中显示一切珠，又显一切珠中所反映的一切珠，层层推演，以至无穷。看清世界这一本质者方可见到世界上每一生物的佛性，亦可观见无处不在的佛心。这种心境可以使人看到污秽中之纯洁，瞬间中之永恒，悟者之天性，存在之潜能。它以缘起的观念给宇宙描绘出乐观和美妙的图景，这也是中国佛教的中道思想。

照华严宗看来，其他各宗都不完备。小乘强调有生命体的我空，但不遍及一切现象。早期大乘强调假有性空，但又点不出性的重要意义。中期大乘虽看到了万法唯识，但又忽视了个体的特殊意义。强调顿悟的人忽略了渐进的努力，甚至轻视运用语言（人倾向于得意而忘言）以指导修炼的价值。

禅——中国人的方法

华严宗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这支强调静默修炼的宗教后来又影响到了朝鲜和日本。禅是中国人对印度佛教梵文 dhyāna 的说法，甚至可以说佛教所有的方面总是和"禅"密不可分。但是"禅"的思想却因其大无畏的特点而彰显于世。从理论上讲，禅宗进入中国大约是在公元 520 年，是由传奇和尚菩提达摩（Bodhidharma）从广东传入的。无论如何，后来人们都尊他为这支新宗派的始祖。这个新的宗派还对中国民间传说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逐渐将菩提达摩说成了道家的神仙。人们也把禅宗的精义归于他的名下：

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最初，禅宗只是限于游方僧。但是到了7世纪，禅宗的僧人也开始修建自己的寺庙。六祖慧能(638—713)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127
的影响。他的教导，其中只有极少部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被编为《六祖坛经》，也简称《坛经》。慧能和神秀(Shi-hsiu)都是五祖弟子中的佼佼者，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争论最后演变成了禅宗的南北两支，称为南宗和北宗。北宗强调觉悟靠渐进式修行，而南宗强调觉悟靠忽然得道，即北宗的"渐悟"与南宗的"顿悟"之别。后来这两支都传到了日本并有很重要的发展。我们在讲到日本宗教时将充分讨论之。

南宗在慧能的主持下发展成为独立的系统，其特点有，第一，传教不靠经文而靠掌门弟子的言传身教(当然也重视经文，特别是《金刚经》[Diamond Sūtra]，即《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二，利用"公案"，即让弟子去求解表面看上去无意义的谜语；第三，弟子由禅师严格训练，过有组织的寺庙参禅悟道生活；第四，形成了活力充沛的禅宗艺术传统。

在这些修炼和思想的背后，还形成了佛教对语言和概念的严厉 128
批评传统。禅宗的人认为，常见的概念都充满矛盾并会误导思想，所以应该一律清扫。我们必须学会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树的本来样子并非是树，只是由于我们的视觉关系才把它当成了树。如树是树，这才是真，我们称之为树，是我们运用语言之过；我们应该凭借我们的直接体验以把握事物的真实。用直接体验把握事物的真实也是早期道家的思想，因此，禅宗实际上是融会了佛教和道家两家的思想(即以不思为思)。这是中国历史上两种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深刻思想，但其中也存在着失控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能依赖经典的权威，那么我们只能诉诸世俗社会的权威，按禅宗的逻辑讲，这个结果或世俗的权威则是更严厉的经典。实际上，禅宗思想中也隐含着权威主义，

即在传教中强化了大师对弟子的言传身教的权威。为了达到顿悟，信奉者不得不苦苦修炼。人必定要经过人为的矫揉造作之后才能复返本性自然。

净土与观音

大乘佛教认为，虔诚可以获得很多成佛的机会。根据佛教的说法，佛有三身。一身是说，佛陀转换身体成为世俗的人形以教导地球上的生命；一身是神体，佛陀以阿弥陀佛这样的大神出现，其形状如我们所知的观世音菩萨；一身是佛陀的真身，它的终极实在是绝对者，是空，是涅槃，是佛的本性。信奉者的虔诚可以使佛陀的人形身体和神形身体显现。净土宗特别相信这一点。到了公元 7 世纪，净土宗在中国已大为流行。印度的观世音大菩萨换了一幅样子也进入了中国，即在中国人眼中的观音菩萨是一位慈祥的女神，类似于中国的圣母马利亚。

这些虔诚信仰的倾向和对传统佛教神秘荣耀的执著，也增进了中国人对道教神仙所有的虔诚。中国的佛教演变成了高度人格化的、形式简便的宗教。这对佛教衰败、人们对原始佛教的信仰减弱倒是一线转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的佛教理论日趋衰落，人们只能简化佛教的理论，而加强其信徒的虔诚体验。同时，道教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更强调教徒对信仰的虔诚体验。因此，中国人造出了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由他辖制诸小神仙，包括佛陀（道教徒是这样说的，而佛教徒则有相反的说法，认为恰好佛陀是辖制玉皇大帝和其他诸神的最高主宰）。宗教各派之间的争斗最终导致了公元 843—845 年的严重的排佛事件，致使大约 25 万僧尼被迫还俗，4 万座寺庙和神殿被关闭，4600 座寺庙被毁坏。之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到这一时期的宗教繁荣水平。

中国宗教的中世纪

新儒家的复兴

129 道教与佛教的昌盛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照儒

家看，本来是无知的净土宗和道教，却能以追求觉悟和成仙吸引着大批神魂颠倒的信奉者，使他们对儒家的实用主义、政治和伦理问题熟视无睹。在儒家的思想和社会的现实之间形成了真空，为了填补传统儒家的这一空虚地带，儒家的人开始了在西方人看来是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的运动，中国人称之为"理学"或"原理的学问"。

新儒家运动使中国进入了宗教的中世纪，即在公元1000年以后，中国宗教形成了她的前现代风格。儒家的这个复兴运动是直接靠教育推动的。例如，胡瑗（933—？1059）[①]在自己所设的诸多讲堂中首创两类课程，一类涉及"体"——主要是儒家经典，一类涉及"用"——主要是实用的以及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科目。用现代的眼光看，"体"最好翻译为"价值观"。后来到19世纪，又出现了是否可以将西方的思想视为"用"而同时保留中国传统为"体"的辩论，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但是，就在复兴教育之时，儒家的人也开始探究实在的本质及求知的方法等问题，其结果是加强了儒家思想的形上学基础。新儒家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佛教思想在分析世界方面的奥妙及其严密的知识论。这样，在宋朝（960—1126）"北宋五子"的著作中出现了系统的世界观的表述。他们的思想为大儒朱熹（Zhuxi，1130—1200）所总结并成为其新创的思想体系的基础。在他看来，事物的现象背后都有"理"，或生成原理。这些具体的生成原理来自"太极之理"，我们也可以将其翻译为"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太极之理是超时空的，但它却包含着万物生成变化所必须依据的每项特殊的原理，即"理一而分殊"。它不像道家的终极原理——无，也不是佛教的纯粹的空。如果我们用否定的方法描述它，只能说它是语言所不能描述的实在，因为语言也占有时空。

凡事必有"理"，也必有物质的动力（"气"），但是"理"在逻辑上先于事，即"理在事先"。人的心智可以分享"天"或"太极之理"的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道德实践有助于恢复上天赋予我们人的本性，克服由物欲诱导的自私和冷漠对我们人性的损害。朱熹也提倡"静

---

① 胡瑗生卒年代应该为993—1059年，英文原文为公元933—？1059，恐有误。——译注

坐”，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佛教在方法上对儒家的影响。对于“即物穷理”，朱熹也是不遗余力：亦即探究事物内外之理。

130 能否将朱熹视为有神论者，尚多争议，但他有时是在暗示天有人格神的特征。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官场度过，由此看，他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①他对佛教的轮回理论及道教长生不老的梦想都进行过极严厉的批评。

王阳明——道德理想主义

两个多世纪之后，明朝又出现了一个新儒家中泰斗级的人物，他就是王阳明(1472—1529)。王阳明并不像朱熹那样关注寻求事物的外在之理。在他看来，知识是内在于人心的，尽管它不能绝缘于人的行为。但他的全部兴趣却在于认识的“存在”本性(当然人只有通过痛苦才能认识痛苦)。他曾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执著于维护人性的良知并将良知与万物之理统一起来。他认为圣人的自我实现即是将自己的知行扩展至整个世界，以使宇宙与其身体同一。心是宇宙论的种子并且能够被真切地体验到。当见到孺子将入于井，我们都本能地想到要去救他(这是孟子论述性善论时的主要例子)，我们对于受惊吓的鸟兽、受摧残的植物，甚至破损的瓦石，都会产生类似的恻隐之情。

在新儒家传统中出现的类似精密的论述都是对佛教作出的回应。他们开辟了争论的场地，以证明自己对中国古代经典和“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正确解释。四书及其他经典是中世纪中国文化的主要资料，也是形成受教育者世界观的基础。

中世纪中国宗教诸层面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观察中世纪中国宗教在某些领域的表现，来总结上述的文化运动和宗教现象。

---

① 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朱熹由于志趣高远，在官场的时间并不长，而且还很不得意。参见黄榦《行状》言朱熹：“历事四朝(高、孝、光、宁)，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译注

祭奠仪式层面。祭奠仪式活动常见于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并且表现形式多样。地方上的庙宇即是各个庆典活动祭神的场所。高一级的祭奠仪式是在官方修建的庙宇中举行，这些庙宇有为国家信仰而建的，也有著名的道观和佛寺以及僧院，后者还承担着其他一些不同种类的祭奠仪式活动。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言，中国人信仰如此之执著得益于对死后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来世的观念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宗教虔诚。中国人的葬礼通常也由道士和僧徒帮助超度亡灵，其象征性的仪式有为亡者在阴曹地府送食品、纸做的衣钱物等以及念经祈愿。也有泛中国化的节日活动，如中国阴历的过年、龙舟竞渡、庆秋收、清明时节扫墓修坟、贡祭饿死鬼等。中国人宗教仪式生活的另一个特征是流行的进香活动，特别是朝拜那些与重要的宗教人物或事件相关的神山。与之形成补充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祭祀自己先人的活动，无论道教徒还是佛教徒都有对逝去的祖先祭奉供品的传统。

在经验层面，不仅虔诚的宗教有强烈的情感，以显示对佛陀和其他神祇的忠诚和感激，而且佛教和道教还强调参禅悟道的各种高级状态。中国传统还一直强调托梦和灵魂附体等宗教神秘体验。禅宗进入中国使中国人对悟道有了新的体验，也与道家原有的自然和谐思想相互融合。

在神话层面，中国的传统不如印度传统那么丰富。但是中国人关于周公和黄帝的传说，有关孔子、老子及其他圣人的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记录，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神秘感。这些丰富而又庞杂的神话都充分地体现在中国庙宇的装饰中。由于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所以历史故事便在中国人的记述活动中占有绝大的比例。

在教义层面，有关天的论述被深化成了终极实在。至于佛教所说的空和道教所说的神秘莫测的道，则都是以否定的方式对天的回应，即以说它不是什么而证明它该是什么。阴阳两极及五行也是宇宙形上学的内容，在它们之上还有终极实在的决定性作用。关于来世的观念也很丰富，但对于轮回后人的表现形式却有多种说法，各家各派各执己见。从某种意义上讲，道教长生不死的期望是对来世生活忧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过道教又外加了个人修炼规则及外丹

等一系列内容。

在伦理层面，关于宗教的伦理价值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争论的话题。由于新儒家运动对伦理的思考，中国中世纪的宗教流派也对伦理问题表现热烈。儒家、佛教、道教各派的伦理观念虽有差异，但大致上都还支持使中国维系统一的、松散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这种局面可以辩证地看待。在道教的传统中有阴谋诡计和社会动荡的因素，往往容易被救世的理想煽动起来，追求社会新秩序，其结果是反对儒家循规蹈矩的贵族说教。佛教追求的是来世的乐土，往往又和儒、道的追求相去甚远。但是中国宗教的这种奇妙的折衷主义的大杂烩使中国人的禀性趋于多元化，因此三教合流的多元主义反倒使中世纪中国的大一统社会局面得以稳定。

在制度层面，三教可以说都是并行不悖地发展的。佛教和道教的教阶制度是独立运行的，而儒家传统的等级制却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体现为世俗的社会制度。

其他宗教派别

132 有些外来的宗教流派在中国宗教古典时期的早期就传入了中国，但是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如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也曾在中国立足，但是到12世纪基本上也趋于灭绝。真正一直保持到近代社会的重要的外来宗教是伊斯兰教。它的信徒是那些基本上是在8世纪到中国西北和东南海岸的穆斯林商人和元朝中国西部回民军的后裔。明朝，即1368年以后，中国的穆斯林基本上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断了联系，成为十分地道的中国人。他们保留着穆斯林的信仰和法律，据信他们的生活与他们逐渐融入的主流民族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的内陆和边缘地区还生活着诸多少数民族，甚至是部落民族，他们也只是在缓慢地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他们是道教传统的力量源泉，道教相对地讲平等并承认这些族群的宗教地位。可能是借鉴这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之故，道教的修炼活动中才有——其他族群的宗教活动中也有——那些神秘的偏见和仪式。在中国人边缘的族群中，最重要的是蒙古族人，其所以如此的

部分原因是在成吉思汗(Genghis Khan,1162—1222)[①]的统治下,蒙古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蒙古人的元朝还于1280—1368年间统治了中国。蒙古人在宗教上是宽容的,他们自己的宗教基础是有神论的萨满教,后来又转信了伊斯兰教、聂斯托利基督教和佛教,最终是佛教对他们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到16世纪,蒙古人从西藏人那里引进了《金刚乘》和佛教政治体制,成了一个佛教化的民族。

朝鲜的贡献

中国的宗教也对其邻国产生了影响。中国文化曾经对朝鲜、日本(参见第4章)及越南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中国宗教、哲学以及文字技巧包括印刷术都被传播到了这些国家并转化成为当地的文化。

大概在远古时期朝鲜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历史上某些时候朝鲜还直接归中国管理,例如在公元前193至37年就是这样。之后的700年间朝鲜半岛大体上被分成新罗(Silla)、高丽(Koryo)和朝鲜(Chosun)三国。

新罗时期朝鲜最有影响的佛教思想家是元晓(Wonhyo,617—686)和义湘(Uisang,625—702)。元晓的主要工作是综合了佛教的各种经典和流派并将佛教的教规引入朝鲜的贵族阶层。元晓的朋友义湘亲自访问过中国并在智俨大师(Chin-yen,602—668)的门下学习华严宗。义湘后来也成为华严宗的大师并且对中国的法藏大师产生过影响,即法藏曾在元晓的门下学习过佛学。这两位早期的哲学家使得佛教在朝鲜立稳了阵脚并且为佛教在朝鲜赢得了广泛的荣 133
誉。高丽王朝(Koryo Dynasty,935—1392)的创立者王建(Wang Kon)于公元918年颁布谕旨,以佛教掌管精神事物及风水预测之事,以儒家思想管理社会及政治,此可见中国宗教及伦理价值对朝鲜影响之一斑。佛教各派被引入朝鲜是在新罗时期(668—935),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派是禅宗。在朝鲜的李朝时期(Yi Dynasty,建于公元1392年并一直延续到近代),新儒家的思想则一度相当昌盛。

---

① 成吉思汗的卒年应该为1227年,参见《辞海》"成吉思汗"条。——译注

朝鲜传统的宗教强调萨满祭师的作用,这些祭师是世袭的专职宗教人士,但后来这个传统与佛教和儒家的教理相互融合了。朝鲜原始的宗教是多神教,有山神、灶神——有点像罗马的神灵,即日常生活中时时会遭遇之神灵,但这些神灵没有等级划分。这些神灵先于朝鲜的统一而存在,具有地方神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看,朝鲜人祭祀这些神灵的宗教活动借鉴了从中国传入的道教的某些方面。

在朝鲜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实践中,最有创新意味的或许是知讷(Chinul,1158—1210)以高度的想像力对华严宗和禅宗所做的综合。知讷很年轻时就进入了禅院并感受到了禅宗僧阶制度的堕落;他意图改革使他失望的朝鲜禅宗。此前,朝鲜佛教中的学院派和禅宗派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激烈冲突,知讷所做的工作是以折衷的方式弥合它们之间的分歧。他后来被视为最有朝鲜特色的禅宗——曹溪宗(Chogye school)的创始人。他在自己的修道技巧中融入了公案的明道方法;他推行的菩萨成道方法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顿悟,阐明在到达体验最后的真理之前要循序渐进地走完十个菩萨阶段。这样,他就完全调和了禅宗与佛经规定的成佛之间的矛盾,使禅宗所强调的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华严宗所强调的人为进取的形上学思想并行不悖。

通过李退溪(Yi T'oegye)与李栗谷(Yi Yulgok)的著作,朝鲜思想家在16世纪对中国新儒家所争论的问题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李退溪发挥了朱熹的学说,认为理在事先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不是本体论的意义;李栗谷却强调事的重要意义,反对将理说成是一成不变的绝对存在,因为理事是相互依赖的。

在李朝,这两位作者都十分活跃;他们的思想对新儒家意识形态的传播都有所贡献。当时朝鲜严格推行新儒家的思想,这意味着官员们都深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这就是朝鲜在面临近代诸多问题——包括日本的侵略和西方传教士的宗教渗透——时所具备的思想背景。

第四章　日　本

日本宗教概况

日本人在文化认同上具有相当显著的一致性。但日本的宗教传统却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形态。许多世纪以来，日本人所生活的岛屿，一直没有多少外来民族进入（主要的少数民族是朝鲜族[Korean]），也没有势力强大的部落族群（主要是生活在北海道[Hokkaido]北部岛屿的阿伊努人[Ainus]），这使得日本民族自发地融为一体，并且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他们的语言与邻邦的语言有很大不同；它采用了汉字的书写系统，但是又另外发展出了两套音节文字表，因为日语与汉语不同，是一种多音节的语言。由于语言的复杂性和居住于孤立的岛屿，日本人保持了文化上的独立，尽管他们擅长从其他文明中吸取养料。在古代，日本主要是吸收中国文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朝鲜文明。 134

日本早期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观念，特别是佛教理念和实践的输入。这一进程在圣德太子（Prince Shotoku）摄政之前就已经开始，并在他摄政时期仍然继续着（公元5—6世纪）。在此之前的阶段被称为早期时代。从圣德太子到镰仓幕府（Kamakura Shogunate）兴起（12世纪晚期），这段时间可以称为前古典时期；从镰仓幕府到足利（Ashikage）统治期间是古典日本宗教的创造繁盛时期，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晚期，那时天主教侵入了日本南部地区。从德川幕府（Tokuguwa Shogunate）一直到19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这段时期可以叫做前现代时期，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与外部世界是隔离的。1858年之后，日本开始对现代化和殖民时代的冲击作出回应，本书第二部分描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日本宗教史。

西方的作者通常将佛教和神道教（Shinto）看做日本的两个主要 135

宗教，而儒教和道教则处于从属地位。神道教常常被认为是某种可以被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宗教。确实，它崇拜的神灵（kami）有着连续性，其神话也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是，如果说神道教是某种以前就有的组织化传统，这种观点却是错误的。神道教作为一种有自我意识的力量是逐渐出现的。所以这里我们应当说的是日本的神灵宗教，它与组织化的佛教共生，只是到了后来它才被制度化为神道教。



实践层面：佛教僧侣生活的苦行修习，如上图，信徒们在高野山的修习。高野山是日本真言宗佛教的总部。

日本文明的独特创造性表现在一系列运动中——净土宗佛教具有虔诚的祈祷形式，恩典的重要性被大加强调，以至于据说天主教传教士圣弗朗西斯·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在到达日本时曾说，路德（Luther）在他之前已经到过这里了；禅宗的革新，特别是将禅的训练与
136 世俗的追求，如武士技能和插花艺术融为一体；新儒家和禅宗特质的相互融合。在现代时期还出现了其他革新，这些我们将在后面谈到。日本唯美主义的力量，作为艺术家刻意而高度献身的奋斗结果，也以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宗教和其他活动的界限是很难界定的。



日照大神，神道教传统中的太阳女神，是最伟大的女神。风神毁坏了她的庄稼，她就隐匿于一个山洞中，从此世界就失去了阳光。她只有在洞外的众神大声呼求中，才被引诱复出。上图由国定（Kunisada，1786—1864）所作，收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

早期时代：神道教和外来文化的渗入

在公元最初几个蒙昧的世纪里，日本政权的主要中心是由不同部落控制的中心地带，这些部落在大和（Yamato）王权下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不同的部落有着不同的神灵，但是渐渐地，人类起源神话中的一个核心开始在大和天皇们要求中心化的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这类神话部分地将重点集中在伟大的太阳神——天照大神（Amat- 137
erasu）上，她是王室的神圣祖先。这些复杂的神话从波利尼西亚、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不同文化中汲取资源，并且以恰当的顺序记载于7世纪后半叶编纂的《古事记》（Kojiki）和《日本书纪》（Nihonshoki）中。它们有助于使皇权合法化，通过神将权力无条件的赋予她的子孙。

在日本，没有与皇室相关的"君权神授"(Mandate of Heaven)这种理论，事实上，多个世纪以来，日本国实际上是由幕府统治的，它们在理论上不同于天皇。这是对皇家世系最终神圣性的重要注脚。在早期时代，来自朝鲜和中国的文化因素也开始慢慢渗入。4世纪，日本人在朝鲜南部进行了战争，尽管被高句丽(Koguryo)的北方政权打得惨败，

日本宗教 关键术语

菩萨(Bosatsu Budhisattva)：未来佛，经常以类似于佛的面孔出现，是天上之神。

佛龛(Butsudan)：在家中的摆放有佛像的祭坛，类似于神龛或神道教的神社(佛在日文中为 Butsu)。

题目(Daimoku)：对《妙法莲华经》的称呼，在日莲宗佛教中，信徒口念"南无妙法莲花经"以祈求神灵保佑。

净土(Jōdō)：信徒们的天堂，是坚信阿弥陀佛的信徒的虔诚所向。

神(Kami)：传统的自然神或神灵。

观音(Kannon)：以女性形象出现的观世音菩萨(中文为 Guanyin)。

国体(Kokutai)：即国家的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神道教有时被称作国家神道教。

祭祀(Masturi)：神道教的节日或仪式。

巫女(Miko)：神道教的巫师或女祭司，被严格地作为贞女来培养，奉献于地方神的祭礼。

念佛(Nembutsu)：对佛的名号的念住，真言宗佛教认为这能给信仰者带来拯救。

神道(Shinto)：神之道，日本宗教中势力强大的一支，在现代的某一段时间内，神道教曾是日本强制的民族精神。

天台(Tendai)：佛教中的一场神圣的秘传运动，其依据是《妙法莲华经》。

禅(Zen)：字面意义即"冥思"。瑜伽佛教在日本的别称，运用各种沉思的新方法。

138

神道教:《古事记》前言

那时混沌开始凝缩,但形成宇宙的力量和形态还未露端倪。一切都是未名的,都是无为的,谁知道那时宇宙的情形呢?但天与地已经分离,三位神开始了宇宙的创造;消极和主动的力量产生了,这两种力量成为了一切事物的创造者。他涌进朦胧黑暗中,带来了光明,洗亮了他的双眼,太阳和月亮也就出现了;他继续漂浮,跳进海水里,在沐浴中天空神和大地神产生了。所以依据这些原始的教义,我们可以得知,在伟大的创世的混沌之始,大地的观念何时出现了,岛屿何时产生了;在遥远的创世之初,根据那些先贤,我们可以推测神创世和造人的世纪。

他们还是在朝鲜南部居住了下来。这就为6世纪中期官方佛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入奠定了基础。

多种多样的山神、河神、岩神和海神,与已同特定部落的生活结为一体、作为其祖先和守护者的神灵合一。广义上说,神灵居住于存在的不同层次:天国(Takamanohara),或“上天”;中间世界(Nakatsukuni),或“中土”,大致相当于地球;黄泉(Yomi),即地狱。尽管天上的神灵很重要,位于中间世界的神灵对人类和部落的事务却有着更加直接的兴趣。供奉着各种精灵的神殿,由于受到政权的庇护,在王朝时代的早期数量激增。

这些神灵对农业生产、狩猎和古老的萨满教活动非常重要,他们不论男女都在日本宗教中被保留了下来。后来常见的宗教仪式,例如崇拜时拍掌、用水净化等,似乎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前古典时期

圣德太子和佛教改革

传统上认为,佛教是在公元538年或者552年传入日本的。但是,佛教作为官方生活的组成部分扎下根来,主要是在圣德太子摄政

期间。在摄政的第二年，那时还非常年轻的太子（他19岁开始摄政），颁布了一道敕令，宣布佛教的三宝——佛、法、僧应当是一个不可分解的整体。稍后，在他颁布的《十七条宪法》（Seventeen Article Constitution）中又宣布，所有的人都必须崇敬三宝。因此，在他看来，佛教是一种能够赋予这个国家道德感的精神力量。他派人到中国取回佛经以及其他文献，自己也为重要的大乘经典写了注疏，其中包括
139 《妙法莲华经》。后一项成就被保留在皇室档案中，并且据称是圣德



体验层面：一位禅师画了一个圆，表示终极认识的空无和圆满——对觉悟的体验

太子亲笔所写。有一两座重要寺庙的建立也归功于圣德太子,最著名的是奈良(Nara)的法隆寺(Horyuji)寺,奈良后来成了王朝的都城。但是他也借鉴了儒家的传统,在朝廷建立了不同等级的官位;同时他也不认为自己对佛教的青睐和对神灵崇拜的支持之间有什么矛盾。

在圣德太子死后,经过短暂的混乱和流血事件,他的改革成果得以巩固,一个更加中心化、以中国为模式的王朝建立了起来。颁布法律要通过天皇的敕令——换句话说,写下来的法律,而不是古老的习俗才是真正重要的,同时天皇本人也被当成了活着的神。天武天皇(Temmu,672—686 年在位)下令编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有 140
助于为新的建制提供传统的合法性。他也被认为建造了位于伊势的天照大神神殿,这是皇家崇拜的中心圣地。

妙法莲华经

举世闻名的一部佛教经典,如来以他的大智慧讲述了人生至理。我们虽然追随佛,并得到了一时涅槃的报酬,但我们就认为这是圆满的收获,从未考虑过去追寻大乘之理。我们虽然也说菩萨具有如来的智慧,但我们从未有过去追寻大乘智慧的渴望。为什么?佛知道我们乐于尘世,他随机而教,但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佛的弟子。

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妙法莲华经》并不吝啬佛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佛的弟子。即使如此,我们还一直以红尘凡事为乐;如果我们有乐于追随大乘的意愿,佛就会教导我们以大乘之法。具体而言,在这部经典中,佛只宣讲大乘之理。以前在菩萨的面前,佛贬抑乐于尘世的声闻乘,虽然佛实际上也一直在教导他们以大乘之法。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我们没有追寻大乘之法的愿望,但法轮王的大法已经在接近我们了,佛的弟子能获得的佛法我们都获得。

对宗教的青睐同时也意味着对它的控制。僧尼的活动被置于法

律的监控之下，神教的祭祀活动被组织起来，神殿和祭司都必须注册。天武天皇还下令将传统的诗歌集进行编订。710年，宫廷在奈良落成，它将来自于佛教信仰的光辉与皇权统治的壮丽融为一体。741年，圣武天皇(Shomu)下令由国家出资，建造了一系列地方级的神祠。749年，他拥有了一座巨大的卢舍那(Vairocana)青铜佛像，这座佛像就安置在奈良的东大寺。卢舍那佛主要是与华严宗(日语是Kegon)的传统有关，他是整个宇宙和超越于宇宙的实体的人格化形式。

最澄和空海

宗教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对僧侣生活的过多补贴，产生了不良后果。桓武(Kammu)天皇(781—806年在位)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将都城从奈良迁到了平安(Heian，京都[Kyoto])。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政府恢复了通过法律诏书进行统治的方式。多种多样的经济和军事改革使平安时代有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开端。佛教与国家事务的分离是有益的，而且也因此产生了两种新的佛教形式。这一创新是通过平安时代两位高僧的活动而完成的，他们就是最澄和空海。

最澄(Saichō)，谥号传教大师(Dengyo Daishi，767—822)，在奈良
141 的东大寺修学数年之后，被派往中国求学。他将天台宗的教义带回日本，并对其做了某些扩充，这一宗在日本也被称为“天台”。最澄在比睿山(Hiei)建立了天台宗的总部，这里离首都不远，在他去世后最终成为公认的僧人培养地(培养僧人的权力曾经被位于奈良的一个中心所垄断)。他的天台宗教义比中国的天台宗更加圆融，因为他将重要的密教要义(Tantric motifs)和圣礼仪式活动也融入其中。

日本天台宗关于万物众生的图式中有着日本人所崇拜的神灵的位置，也有着一种民族性的偏好——最澄相信日本人的灵性生命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已经做好了成就《妙法莲华经》最圆满教义的准备。他还精心建构了他的“本觉”(hongaku)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佛陀的觉悟与众生的觉悟并没有差别，解脱与世间的生活也是平等一致的。各式各样的禅修方法相继出现，例如在阿弥陀佛像前静坐九十天，围

绕圣像行走九十天等。这些修行方法是由最澄的弟子圆仁(Ennin)从中国介绍到日本的。

由于天台宗为宗教的每一发展阶段都留出了位置,所以广受欢迎;但是它强调仪式具有神奇的、精神性的效果,这在某些时候却是一种弱点。仪式主义在另一个改革运动中更加显著,这就是日本真言宗(Shingon),或者说真言宗的曼特罗教派(Mantra Sect)。空海(Kūkai),谥号为弘法大师(Kobo Daishi),最初是想在官场中寻求职位,并且学习了儒家经典;但是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转向了佛学研习;后来他获得了随日本使团出使中国的机会,并花了三年时间在当时的都城长安学习真言宗教义。回国后,他将这一佛教形式介绍到了日本。他在奈良南部的金刚峰寺(Kongobuji)和京都的东大寺(Toji)建立寺院,作为宣传自己教义的出发点。他在不同方面拥有影响力:他建立了综艺种智院(Imperial Academy of arts and knowledge);他还是宫廷的资深宗教顾问。他对日本当时的神教持欢迎态度。他的教义为后来神道教与佛教秘密乘的融合铺平了道路。他在高野山(Mount Koya)建立了这一佛教新教派的总部,在他死后,他的追随者们认为他还留在山上,等待未来弥勒佛降世时再度显现。

他革新后的佛教图系非常复杂。处于图系最高点的是大日如来佛(Mahāvairocana),被认为等同于佛的法身(Truth-body)。佛教用来描述终极实在的术语是"空"或者"如"、"实相",这也是佛的名号之一"如来"的意义。但是佛的"空"是一种圆满的状态。"法身"是现象界背后的创造性力量,同时它又包含了所有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空海吸收了华严宗的思想。但是由于内在和外在是相互联系的(现象和真如、心灵和肉体、密教和显教),所以觉悟到自身所具有的佛性的方法在性质上就是神圣的。因此觉悟不仅仅可以通过禅定获得,也可以通过使用神秘力量而获得——手印(mandalas)或某种身体姿势,它们在印度的密教思想中起着重要作用;从中国带回来的神圣曼荼罗和图像;某种神圣的音节,即咒语等。对空海来说,显教真言宗是佛教的最高形式,因为它反映了大日如来佛法身的永恒真理,而不是释迦牟尼佛暂时的、引导性的教导。 142

最澄和空海开创的教派代表了前古典时期佛教最稳固的成就。

这两位智者有机会共同访问唐朝伟大的都城长安,他们将当时流行于长安的理念和实践做了某些调整后融入了自己的教义。但是日本佛教的原创性主要是在后来,即镰仓时代到来之后,才真正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佛教的方向被引向了净土崇拜,回归禅宗的禅修中心,以及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日莲宗(Nichiren)教义。

古典时期

净土运动和末法时代

12世纪以前,改革运动的基础是一种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末法(mappō)时期的观念。从佛教正统的观点看,现在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严格的修行无法被有效地履践,人们的信愿和才能都变得非常低下;而根据新的观点,这是一个乐观的时期,应该以一种更加平民化的眼光看待佛陀指出的解脱之路。因为传统的观点在本质上倾向于将从事某类职业的人——如渔夫、武士、猎人、农民、妓女等——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违背了佛教的伦理要求。但是在新的时代,佛教信仰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净土运动在日本的胜利,可以部分地归功于它扩大信仰的社会范围,使更多人可以享有最终的希望。禅宗也是这样做了,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方式。

净土运动中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法然(Honen,?? —1212)和亲鸾(Shinran,1173—1262)。法然曾广泛研究天台宗的思想,但是却特别着迷于观想无量光佛,即阿弥陀佛(Amida)。他依照禅修的方法,在对阿弥陀佛的观想中与之合一;但是在经过很多次艰辛的禅修,以及在比睿山睿空和尚(Eiku)的隐修所过了好几年修行生活之后,他还是无法满足:他仍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脱感。法然于是转向了另一种观念:那些不能通过艰苦的禅修获得解脱的人,只需通过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或"南无阿弥陀佛"(Homage to the Buddha Amida),就可以得到阿弥陀佛的护持,并且往生西方净土。法然认为这种方法是专为那些依靠"他力"(tariki),而不是"自力"
143 (jiriki)的人准备的。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人如果不能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得到救赎,就必须依靠他力。

所有这些都和阿弥陀佛发誓拯救苦海众生的弘愿相一致。他的慈悲心使他建立了净土世界，那里的环境最适合于往生者获得最终的解脱。这样一来，这种教义就削弱了天台宗和其他佛教宗派进行广泛宗教训练的理论基础，因此法然的对手都将这种新教义视作对自己的威胁。尽管他们并没有否认法然本人的圣洁，但是却在1204年和1205年两次力图压制这一新运动。最终，法然门下的两个僧人，由于在引导宫廷妇女进行通宵敬拜的过程中发生了不检点的事情，而触怒了天皇：他们被处以死刑；从1207年起，法然被从京都流放到外地四年。他于1211年返回，并在1212年初就去世了，死时仍然宣称他的弥陀信仰。

法然虔诚的信仰主义中包含有一些可能的不连贯性，这就是后 144
来亲鸾试图进行更为激进的佛教改革的原因。首先，法然教导说，应当以虔诚的态度持续不断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在信仰中寻求阿弥陀佛的护持，一次就应当足够了。重复不断的称念佛名，无疑创造了一种新的修行方式，这种方式比传统的自力更加容易，但是仍然是一种自力。第二，法然仍然坚持了传统的佛教形式。他对经典的了解相当深入，持戒也非常精严。但是，这些都是自力心理的残余。净土宗佛教，或者说净土宗(Jodoshu)，应当走更为激进的道路。促进这一进程的正是亲鸾，他是后来被称作净土真言宗——真正的净土教派的奠基人。

亲鸾在研习了多年天台宗教义之后，在一次观想中受到触动，转而追随法然。当这场新运动被镇压时，亲鸾也受到牵连，被流放到了新泻(Niigata)省。在那儿，他在观想中见到了一位女性菩萨，即观音菩萨；这暗示他应当有一名女性助手。在后来的几年中，他结了婚，并且有了几个孩子；过着贫穷的、普通人的生活。由于阿弥陀佛并不要求功德，而是渴望众生的救赎，所以也就不必要出家修道了。同路德的逻辑相类似，亲鸾也是一名废除僧侣生活的先驱。严格说来，与其认为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获得救赎的条件，不如说这只是一种信仰的表达，而信仰本身则是阿弥陀佛自己赋予众生的。亲鸾说，如果善人能够获救，恶人更能。称念阿弥陀佛，是由于对佛慈悲救赎心怀感恩而自然流露的。

145

亲鸾

亲鸾(1173—1262),净土真宗的创始人,把对佛的虔诚发展到了逻辑顶峰。他出生在一个社会极度动荡的时期,这使他确信,日本已经进入了末法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禅思或获得觉悟已经不可能了。只有依靠阿弥陀佛,即依靠他力人们才能得救。从9岁时,他就是天台宗的僧侣了,接收过传统仪式和教义的综合训练。1201年,他经历了一次显圣,促使他投了净土宗创始人法然的门下。1207年,他被流放到现在的新泻(Niigata)省。在那里,他与惠信尼(Eshin-ni)结了婚,并生有几个孩子。这是在末法时代里不依靠善行或自力得救的延伸。在一次观音的显圣中,亲鸾被告知惠信尼将以女性的形象成为他的同伴,所以他娶了她。

所以,亲鸾开始废除了他入僧时的宣誓。他所做的这些受到农村平民的巨大影响,那些人没有被日本佛教的诸多传统派别所吸引。当亲鸾自认是法然的忠实信徒时,毫无疑问,他在聆听法然的教导上更具有直接性。流放结束后,他搬到了常陆(Kanto),在那儿他在普通群众中劳作,写下了具有方言特色的赞诗和教导。60岁的时候,他回到了京都,过着安静的生活,修改他的著作。他的晚年生活不大安定。他的大儿子声称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特殊的教导:亲鸾矢口否认,并被迫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

亲鸾认为阿弥陀佛是惟一的终极实在,是惟一的被供奉的对象。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是解脱的途径,而是信仰阿弥陀佛的回应。同样,信徒所施的各种仁慈之举本身也是对阿弥陀佛仁慈之心的回应。这些思想与路德的思想极为相似,这使得圣弗朗西斯·沙勿略俏皮地说,路德早在亲鸾之前就到达了日本。

在其学说中,商羯罗(śankara)坚持认为,内在的自我等同于神圣的实在,世界及其创造者都是虚幻的,人在获得终极方面需要神秘的知识(jñāna 或 vidyā)。在最后的诉求中,神、仪式等等都是不真实的,虽然它们对于那些仍未解脱的人来说具有间接的实在性。他的赞诗表明了他要把民众宗教和对终极目标的追求结合起来的愿望。

尽管亲鸾的观点和基督新教中上帝恩典的教义非常类似，但两者之间仍然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来自于佛教的神话结构。在基督教那里，无论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多么亲近，无论二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上帝与人始终是不同的。但是在净土真宗看来，那些往生净土的众生注定会获得佛的觉悟，并返回世间救助世人。

从以下诗句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亲鸾信仰的精神实质：

我内心的罪孽太深重，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克服。
我的灵魂就像在蛇的毒液之上。
甚至我的善行也同这种毒液相混合，
以至于必被称为欺骗。
尽管我不知羞愧，心中也无真理，
但是圣名的功德，那来自于觉悟者的礼物，
能够通过我的话遍布世间，
尽管我还是我。

亲鸾的谦卑反映了佛的美德与慈爱的另一面。

亲鸾的教义在莲如（Rennyo，1415—1499）的领导下得到了第二次发展。莲如通过发展新的布道方法，包括以日本俗语书写的书信，重塑了净土真宗教团。

亲鸾生活的时代是动荡不安的，旧贵族和新兴武士阶层为了土地和政治权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某些僧团也加入了这些斗争，这正是堕落时代的标志。镰仓幕府时代的法律体系比它所取代的繁琐的律令体系要简单得多。这使得宗教拥有了更多的自由，13世纪及随后的几个世纪之所以能够成为日本宗教史上极具创造性的时期，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146

日莲和日本民族主义

日莲（Nichiren，1222—1282）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他渴望促使政府重新考虑对待宗教的态度，而他跌宕起伏的生活正与此有关。那是一个洪水和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蒙古人入侵的危险也时时存在（幸运的是，一场台风摧毁了蒙古人的舰队，日莲的追随者们将这

一"奇迹"归功于他)。尽管他的修习——像这一时期其他卓越的领导人一样——是在天台宗的传统之内，他却谴责它是空洞和错误的，违背了佛陀的真正教导。他对净土宗和禅宗也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的心紧系于《妙法莲华经》，将之看作佛教真理的化身。他认为佛教的其他说法是错误和危险的，并且将这种推崇《妙法莲华经》的基本立场与强烈的日本民族感情结合到一起。他是一名先知型的人
147 物，谴责当时正统治日本的北条(Hōjo)家族，因为它容忍错误的见解，接受佛教的多元化，而且还信仰净土宗教义。由于这些谴责，1262 年，他被放逐到伊豆(Izu)省两年；1271 年，又被流放到佐渡(Sado)岛将近三年时间。

对《妙法莲华经》的笃信促使他以南无妙法莲华经(Namu Myōhorengekyō)，即"南无妙法莲华经"(Homage to the Lotus of the Perfect Law)的信条，取代了念佛法门。他自称是一名菩萨，在佛经中，释迦牟尼佛曾将经书托付给这位菩萨，并且也预言了这位菩萨将会在世间重新出现。他谴责禅宗的僧侣，因为他们宣称真理的传授可以不依靠经典：他认为要使佛陀教导的真理流传下来，就必须依靠经典。他抨击净土宗，认为他们将关注点集中于来生，从而使人们忽视了现世生活的和谐。他对于各个佛教宗派的攻击都非常严厉，包括曾培育了他的天台宗。他认为，通过激将法，通过以狂热的坚持或折伏(shakubuku)向人们施加压力，可以促使他们更为深刻地反思自己的信仰。日莲宗传统的这种强硬作风，以及它某种程度上尚武的爱国主义，使得人们禁不住会问，它是否还是真正的佛教。但是日莲宗在日本历史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始终宣称自己对佛教的解释才是真理。

禅宗的形成

经典的日本佛教派别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强调一种"此世"的态度，禅宗尤其如此。禅宗在进入日本之后，那种原先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又被大大地发展了。荣西(Eisai, 1141—1215)是日本禅宗之父，尽管他遇到了很大阻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进行了妥协，认为禅宗是一种可以被增添到天台综合建制中的额外成分。但是，他是

禅宗运动的发轫者。

禅宗能够在日本扎下根来，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在日定居的中国导师，他们都得到了日本当权幕府的庇护。13世纪，他们当中的四位主要人物在日本创立了纯正的禅宗。随后日本的佛教领袖给临济禅的顿悟运动赋予特殊内容，对此大多数禅宗的赞成者都表示拥护。

道元（Dogen，1200—1253）和尚将曹洞禅（Soto）的修行方法和教义从中国带到了日本。他在同自己的中国师父一起进行禅修时，证得了解脱，因此有资格加入传道者的行列，传播释迦佛教导的真理——至少他自己是这样看的。曹洞禅保留了佛教最基本的要素——冥想，这一点常常被日本佛教注重仪式的形式主义所忽视。

道元的著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九十五卷的巨著《正法眼藏》（Shōbogenzō）。这部著作使他在都城京都以及周围地区获得了巨大 148
的影响力。但是他的后半生却是在残破的永平寺（Eiheiji）中度过的。在那里他反复灌输他认为是真正禅宗修行的理念——一种在严格的戒律下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默想生活。

道元的思想是符合佛教根本精神和基本教义的。他认为果报和修行是不可分割。通过以正确的方法修习禅定，即"坐禅"，修行者可以直接体认实相。佛教最重要的真理就是无常。一切众生，无论生死，都在不停流转，在无常的世界中，没有超越于迁流变化的事物之上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或实体。相反，事物的无常即是它们的真正本质，同样，也是佛的本质。获得这一觉悟需要重复的，不是某些外在的东西，而是看到事物流转的特性。因此，事物的实质就存在于时间之中：生命是时间性的，是一系列"现在"之流的联结，然而每一个现在都是独特的。

无论是曹洞禅还是临济禅（Rinzai Zen）都力图消除人们的先入之见。它们强调，我们日常用来区分和理解事物的语言概念，在本质上是误导性的。临济禅的宗师们使用公案（koan、汉语为 kung-an）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使我们的思维活动顿止，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语言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直接体认事物的实相，而语言是阻碍我们清晰视线的雾障。当我写到这里时，不禁思维片刻，抬头朝窗外望去，我在众

多景物中看到了一棵巨大的枞树。但是枞树自己愿意被这样归类吗？把我眼前的景象分成不同的部分，如树、湖等，只是为了人类自己的方便。例如，我们说这是一棵"大"树，但是树自己要求我们将它和其他的枞树进行比较了吗？因此，尽管我们的语言在交流的过程中非常有用，它却将一种特殊的偏见赋予我所经验到的一切。它妨碍了那么一种直觉的、单一的经验，这种经验有时被称为"万物一体"，这种经验在我们试图将事物进行主客二分，即区分这是我、那是树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语言实际上是在事物之前设置了一道屏障，因此，从禅宗的观点看，应当将语言废弃。公案就是方法之一。

一开始，摆到修行者面前的公案是从过去宗师们的问答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中通常包含着悖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位中国的禅宗祖师正在修习禅定，和尚过来问他正在想些什么。这位祖师答道："我正在想思想无法达到之事。""但是，"和尚问道："一个人怎样才能想思想不能达到的事情呢？"回答是"通过无想"。换句话说，你必须超越"想"的一般概念。

使用公案和坐禅的目的在于获得觉悟，或者说体证到本身具有的觉悟。由于这种教义主张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在某种意义上它
149 通常被看作是由祖师认可的。因此，只有祖师才可以证实弟子是否如实地看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由于融入了道教的理念和中国禅宗的思想，也由于日本传统本来就有强烈的自然观念（这种观念部分地来源于对神灵的态度），觉悟通常是通过参照自然事件而被间接地表达出来。日本的艺术和文学开始同禅修紧密地结合起来。就像这首日本风格的短诗所显示的：

> 去年在广泽(Hirosawa)秀丽的寺院中，
> 今年在日光(Nikko)的岩丛里，
> 一切对我都无异，
> 击掌声四处回荡，响彻蓝天！

禅和艺术，尚武及其他

在幕府统治的古典时期，禅对人们最主要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它在改革寺院制度和取悦注重世俗生活的普通人两方面所具有的双重效能。改革寺院制度是通过简化僧侣生活，以及强调艰苦劳动和禅修来完成的——这两者都可能在建构的过程中失去原义。这一运动能够取悦于在家信徒，是因为它以一种严肃而且切实可行的方式实践着大乘佛教的宣言，即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或者说生死流转与涅槃的平等不二。这一理念用拉丁谚语来表达即“*laborare est orare*”，意思是“工作就是祈祷”，这一点对西方的修道院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默想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的技能结合到了一起。日本佛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禅与武士道结合在一起：射箭和剑术被以禅的方式发展，不通过瞄准而直接击中靶心（禅的训练强调自发性和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女性艺术，例如插花和茶道，也融入了禅的风格和趣味。禅的理想——疏朗、清新、节制、自然——在所用主要艺术门类，如绘画、园艺、书法中都很有影响力。

在足利时代（1338—1573），禅宗的政治影响力大增，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官方宗教。由于进一步融合了新儒家的思想，以及主张平民应当遵守儒家伦理，禅宗的这一地位又得到了加强。儒家的价值观与军事贵族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和谐一致。五常的观念（父子、夫妻、君臣、长幼、朋友）为等级社会提供了思想的框架，在这样的社会中，对这种从属的体系的维系，是由社会关系中上级一方父亲般的仁慈所补偿的。

神道教和流行宗教

佛教在日本，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并不是一种排他性的宗教。日本的佛教徒没有理由不尊敬神道教所崇拜的神祇，只要他们已经为佛陀的荣耀留出地盘，将佛教的价值观念放在了首要地位。我们发现，在日本的古典时期，佛教和神道教的圣所常常混合在一起。有时，佛教的和尚会和神道教的女萨满师结婚，这对夫妻会共同经营一座寺庙。有时，山上的传统神祠会弥漫着佛教的气息，神圣的朝拜也 150

混合了起来。禁欲者(yamabushi)的增加,或者说山林苦行佛教徒的增加,有助于神灵观念和佛教价值观的融合。对天皇来说,他们仍然进行着那些常规的仪式,这些仪式与他们神圣祖先的神话相关,但这与他们作为个人信仰佛教之间,并没有形成紧张关系。在一个家庭中,即有神灵的祭坛又有佛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它们可以和谐地并处。佛教对于葬礼仪式和墓地的控制使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颇具影响力;但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婚礼上通常要接受神灵的祝福,这显示出人们在对待演变着的仪式上的一种综合。儒家的价值观激发了日常生活的伦理;同时道教的占卜师和术士也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基督教的传入

足利时代的末期,社会上充满了暴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具有毁灭性的应仁之乱(Onin War,1467—1478),同时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分崩离析。1568年,当织田信长(Oda,Nobunaga)成功地控制了都城之后,他开始对天台和净土宗佛教进行报复,因为它们曾经对他的统治进行过武装抵抗。他偏爱天主教。天主教是在1549年著名传教士圣弗朗西斯·沙勿略来到日本的九州(Kyushu)[1]之后才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天主教在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天主教就像是净土宗佛教,只需要称念基督耶稣的名字。这种仪式与天台宗的仪规有些类似之处。在一个有着大量外来思潮涌入和很多不确定性的时代,各种神话、体验、伦理观念都强烈地融合在了一起。

151 但是,另一个强有力的人,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6—1598),不仅打破了佛教的军事力量,还钉死了26个基督徒。他死后,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的统治建立了起来,并且成功地在日本建立了新的秩序。当时由于害怕受到葡萄牙或欧洲其他势力的侵扰,日本将自己同世界的其他国家隔离了起来。在经历了

---

① 此处疑有误,原英文中的"九州"拼写为Hyushu,正确拼法应为Kyushu。——译注

1637 年的一次暴动之后，天主教最终被严令禁止了。在德川的敕令下，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要求成为佛教徒，至少表面上如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佛教教区系统也形成了，这大大增加了佛教寺院的数量。但是，统治的精神特质仍然是儒家的，而且也重新出现了对神道教的兴趣。稍后，当我们评价日本对伴随着西方贸易扩张而来的殖民主义和掠夺所做出的反应时，还会再次谈到德川时期或者说这段前现代时期。

日本古典宗教与前现代宗教

这一时期的宗教体系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多元化的态势。此时的宗教仪式层面是多种多样的。各宗都对祈祷仪式投入了很大热情，例如净土宗和日莲宗。在禅宗的各个派别中，出现了重新向正统禅修回归的现象，但是仍然难以摆脱中日传统的纠缠。天台宗和真言宗较为古老的仪式仍被保留了下来。神道教的祭拜仪式既与佛教寺庙有关，又同它们相分离。本土仪式成为儒家、神道教和佛教理念的混合体。朝圣的潮流，出现了前往敬拜 33 座观音堂，或者位于四国(Shikoku)的 88 座四方庙的现象(这一旅程超过了 700 英里[1100 公里]，这在旧时根本算不上功德)。伊势的天照大神社庙也是朝圣地点之一。这类仪式加强了人们的各种宗教体验。

古典时期最卓越的创造是打开了两种最基本的宗教体验之门——敬畏体验和神秘体验。对阿弥陀佛的虔敬开辟了对神之荣耀的即敬又畏的体验，使人们感受到了在无限者面前个体的卑微与无意义。出于神秘主义的探求，禅宗重新返回到了佛教严密的禅定修习中。但是，在这里，修为很高的禅师在发现内在空灵、炫目之光的同时，也直接体验到了与自然的合一，这是一种万物一体(panenhenic)的体验。与此同时，神道教的仪式也开始强调体验圣洁、去除不净的需要。

古典时期强调传统的伦理观念，特别是儒家伦理。这有助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构建，这一精神融合了儒家理念和禅宗传统中的斯多葛特色。从社会以及制度的层面来看，古典时期，佛教经历了扩展



这个位于京都的间有天然岩石和树木的经过精细耕耘的花园，井然有序，体现了艺术和宗教的融合。

与兴盛的阶段，但是最终幕府收回了控制权。皇室家族和它同神道
152 教的联系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佛与神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儒生的学院生活受到禅宗和尚的控制，同时，尽管天台宗和真言宗的建制之间、净土宗和禅宗的形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它们在德川时代还是进行了忠实的合作。

从教义层面上看，道元的思想是对日本传统显著的发展，他为“涅槃与生死不二”(nirvāna-samsāra equation)，以及亲鸾提出的关于拯救的极端但是符合逻辑的结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叙事层面上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日莲对于自己先知使命的看法，以及将日本命运与在他教义影响下的佛教相融合的思想。事实上，从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一个真正佛教化日本的神话，使日本佛教和斯里兰卡佛教有了某些相似之处。

但是，日本创造性最显著的体现是在第七个层面——艺术的创

造性。日本人是奇妙的精神唯美主义者：他们将宗教与美微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像它一样，在赋予尘世技能以超越意义的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其中，禅，以它最本真的风格，深深浸入了日本艺术创造的灵魂。可能只有通过倾斜的鹅卵石路、设计好的灌木丛和岩石、修剪过的树木和寺庙花园的美景，你才能够深入地体会到宗教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对话。美的养成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的动力。

这一进程的大部分内容在后来的殖民时期被颠覆。但是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将在第十九章再谈。

第五章　东　南　亚

地区性的种种模式

155 东南亚由今天的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共十个国家组成。除菲律宾之外，所有这些地区都曾经深受印度的影响——或许越南的情形有些特殊，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本身包含了以佛教形式出现的古印度的因素。过去的模式，包括印度诸王国在内，都像在柬埔寨一样，基本上由南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相互交迭：佛教是在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则在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占据主导地位。新加坡从文化上讲基本是中国化的，因此也具有类似的宗教特征。菲律宾人基本上都是天主教徒。东南亚出现华人是殖民时代之后的事情，它是向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输入华人劳工的结果。

印度影响向东南亚的渗入是从公元2、3世纪时开始的，因为大致说来，印度具有一种佛教与印度教的混合型文化，两种宗教在思想和制度上的混合体很容易在东南亚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印度影响深入其地的主要时间自公元7世纪开始，而在接下来的六个世纪里，许多重要的文化在这里站稳脚跟并且成相互影响。从公元13世纪开始，在东南亚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南传佛教仿照僧伽罗（Sinhalese）模式所进行的合并。这也是一个穆斯林力量渗入其中的时间。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上强大的马六甲帝国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且为伊斯兰教向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菲律宾南部进行传播的中
156 心。而在这同时，越南北部的傣越（Dai Viet）人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人的入侵（入侵的目的是准备把这一地区重新并入它一度从属的中华帝国），并且向南扩张，夺取甘蒲王国，从而形成一个大致和现在的越南同样大小的帝国。在这一地区里，除了我们行将研究的主要信仰

之外，其他各种小规模的宗教都属于该地区各处的不同部族。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印度的影响以及印度的一些婆罗门、商人以及佛教僧侣肯定已经到过这里并在这里驻留下来，但是印度文化和中国因素打入这一地区的原因却是这样的：借用印度王权体制的意识形态或者运用佛教思想为政治统治寻找支持，这是一种方便事宜。移入这种文化所依赖的群众基础是一个混合体，而不是严格意义的印度人或者中国人。所以这些外来的大宗教是和土生土长的通俗宗教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

方便的做法是，把直到公元7世纪时的这一段时间看作是早期，把公元7世纪起至正统南传佛教的形成以及伊斯兰教较大规模的传播——即至公元13世纪时的这段时间看作是前古典时期，把公元13世纪直至16世纪看作古典时期。古典时期之后，我们就进入了近代，并且见证了这一地区对殖民时期各种冲击的不同反应。

印度影响的起源

关于印度文化（佛教和印度教两者）的影响何以会跨越孟加拉湾 157
并且在缅甸以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确立地位，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在柬埔寨的吴哥窟（Angkor Wat）寺院和爪哇的婆罗浮屠（Borobodur），那些巨大的纪念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是贸易、征服或者宗教的结果吗？如果不是，那么又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呢？有可能这三种原因兼而有之，但是证据似乎与我们关于印度商人和武士的看法不符，也就是说，有悖于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吠舍和刹帝利种姓理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印度文化形式的转变过程中，这两个种姓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当时东南亚已经出现了一些土生土长的王国。但是这些王国和南印度发生过交往，这说明关于商人的理论有其一定的道理。它们与南印度的联系表明，这些规模较小的王国正在创建帝国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的意识形态形式和进行统治的方式相当引人注目。和那些亲眼目睹了北印度的观念和实践传播到南印度的人们相比，印度化过程在这些地方的代言人具有类似之处。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在巴利文文献或者其他地方经常见到的那种古老的公式：婆罗门和沙门——婆罗门和隐世者，后者

当中有很多人被组织进佛教和耆那教的僧团里。神职人员是新文明和政治理论的载体。不仅如此，而且婆罗门长期以来担任着谋士的工作，他们可以传播政治和建筑方面的理论。这样一来，最有可能的似乎就是，东南亚许多地区的“转化”是一种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关于政治统治的新理论被有意识地输入进来，以巩固当地王公和帝王们的权力。所有这些都以当地各个民族的农业与宗教混合在一起的实践为基础。通过政治手段，这些土生土长的各个民族正被组织成较大的财富生产单位，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水利建设来发展水稻种植。

王国与帝国

中国人提到的一个较早的帝国叫“扶南王朝”。“扶南”（Fu-nan）很可能是高棉语 Phnom 在汉语里的说法，意思是“山”。毫无疑问，甚至早在公元 2 世纪的时候，它的统治者们就已经采用了“山之王”的称号（南天竺实践的一种反映）。这是神话理论的一部分。它的首都 被建成一个曼荼罗的形状，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用石头来象征位于世界中心的神山，在山里住着大神。所以国王的宫殿就是神圣中心的象征，国王本人被看作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是他通过尘世间有组织的权力从事着造物主在地上的工作，从混沌中产生秩序，并且保障尘世间的丰收。所以通过某种方式，就所涉及到的人民而言，存在着一种公平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大米、其他农产品以及手工产品被当作税收，而纳税人则被给予国内的秩序和丰收的富足。扶南王朝的东边，即今天越南南部，存在着另外一个名叫甘蒲的王国，这个王
158 国很可能采用一种类似的意识形态。一直到公元 900 左右的时候，越南的北部都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有着明显区别的是，这个地区主要受到了中国而不是印度文化的影响。

扶南王朝最后被取而代之，一个名叫金边（Khmer）的帝国建立了起来，后者的地位在公元 9 世纪阇耶跋摩二世国王（King Jayavarman Ⅱ）在位时最为巩固。它的首都吴哥变成了一个伟大建筑的宝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耶跋摩二世国王（King Suryavarman Ⅱ，1113—1150）的毗湿奴避难所，世称吴哥窟。后来这里被丛林覆盖，



阿布抄罗斯或歌者，其仙乐与仙舞给凡人和神灵带来欢愉。此为刻在柬埔寨吴哥窟建筑群主建筑上的雕像，大约1200年由阇耶跋摩七世建造。

直到现在被重新发现并加以修复。金边王朝王家祭祀的主要焦点是 159
湿婆；在多种情形中，佛塔或者神山被男性生殖器围绕着。这样的安置对于婆罗门举行基本仪式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随着扶南王朝的衰亡，兴起了疆域辽阔的海上王国宝利佛逝帝国（Kingdom of Srivijaya），这个帝国很可能是由印度在南苏门答腊岛上的贸易据点发展起来的，后来由于它对印度和中国之

间方便海路的控制而繁荣起来。它的首都设在巴邻旁(Palembang)，统治扩及到苏门答腊的广大地区、婆罗州的部分地区和整个马来半岛。在它的东部，即爪哇，有一些信仰佛教的小国家，在婆罗浮屠留下的巨大而优美的寺庙建筑群，尤其能够让人联想起它们的存在，佛塔建筑群的样式就像是曼荼罗。到13世纪时，室利佛逝与爪哇的萨因勒特拉王朝(Sailendra)进行了联合，无疑是东南亚的主宰力量，它显示了海上帝国的效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大乘佛教徒们学习梵语的重要中心。

11、12世纪，在圣城蒲甘(Pagan)的基础上，缅甸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新兴国家。它的政权后来遭到蒙古人入侵的破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受益于伊斯兰教对北印度的控制。由于伊斯兰教的缘故，很多博学多识的佛教僧侣们从佛教徒的大学城那烂陀(Nalanda)逃亡到蒲甘。

伊斯兰教的意义

伊斯兰教在印度北部的传播对印度南部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原因是，蒙兀儿人(the Mughals)统治下的印度切断了印度南部与佛教圣地以及佛教信仰传统上的心脏地带之间的联系。随着蒙兀儿人的统治向南扩展，旧有的印度君主政体的某些模式变得不那么富有吸引力了，而且也确实提出了穆斯林模式在这一地区的生存能力的问题。与此同时，它推波助澜，把东南亚的各个王国推向了斯里兰卡南传佛教的一边，把南传佛教的意识形态当作进行统治的典范。其结果是，这个地区现在基本分成伊斯兰教和南传佛教两个部分，菲律宾是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两个部分，而爪哇则仍残留着一些印度教的成分。

在15世纪的初期，马六甲王国(the state of Malacca)建立了。这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由于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它接管了从前属于室利佛逝的权柄。尽管在16世纪初期它自己也被葡萄牙控制了，但是它对马来伊斯兰教君主地位的确立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并且作为一个势力中心，对菲律宾南部和婆罗州(Borneo)以及苏拉威西岛(Sulawesi)两地许多地方的伊斯兰化发挥了作用。

南传佛教及其古典时期

我这里对东南亚文化“古典时期”的划分和殖民主义时代有交迭的部分。但是即使是这个时期的末期，即16世纪，葡萄牙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地区崭露头角。这也是南传佛教 160
的文明在这里达到鼎盛阶段的时期，它当时的盛况给这一地区的近现代社会留下了烙印。南传佛教在缅甸、泰国和老挝等国家变成了主流，而且维持了和斯里兰卡不间断的贸易和学术往来。

在缅甸，阿律奴陀王国王(巴利文称作 Aniruddha)于1044年登基。他对南传佛教的皈依为缅甸通向君主政治和文化彻底南传佛教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础。阿律奴陀王是由一个著名的僧阿罗汉(Shin Arahan)剃度皈依的，他对南传佛教的接受对宗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他的继承者江喜陀王(Kyanzittha)的统治之下，蒲甘城才建造起了巨大的瑞达光大金塔寺宝塔。阿律奴陀王派人从斯里兰卡迎请了一件佛陀圣物和一部佛经《三藏经》，圣物被安置在宝塔内，《三藏经》用来对已经从被征服的孟族人那里得到的经典进行核对。与斯里兰卡的这些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预示了后来与斯里兰卡更加紧密的关系。迄今为止，这里最为流行的各种佛教学说还是坦陀罗(Tantra)，尽管阿律奴陀王时期就已经开始企图取代它。

缅甸人和其他东南亚人的一部分君主政体理论是从僧伽罗人(the Sinhalese)那里得到的，这种理论就是，国王应当效仿理想中的佛教徒皇帝阿育王(A śoka Maurya)。而僧伽罗人的佛教文明于12世纪时在波罗羯摩跋诃国王(King Parakramabahu)的统治下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达到了顶峰。为了登基或者开拓自己帝国的疆土，一个君主可能不得不采用邪恶的手段，就像阿育王所做的那样，但是阿育王归根结底是一个贤良的国王，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宣传素食主义，主持公道，并且鼓励优秀宗教的传播。这样一个模范的佛教徒国王又被称做转轮王，即称作“转法轮者”(梵语：Bodhisattva)，人们把他在人世间的作用同释迦牟尼佛在精神领域里的角色相提并论。他还被人看作是菩萨(Bodhisattva)或者未来佛，而

这种看法和关于未来佛，即弥勒佛(Maitreya)的神话传说有一定的关联。这个国王是未来佛在人世间的化身，因此是把过去和将来联系起来的纽带，也是把精神世界和此岸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这种意识形态是十分有用的：它在一个新的综合体系中分配了国家政权和僧伽们精神力量两个并行不悖的角色，以确保国家在物质上的繁荣和道德上的纯洁。

东南亚各大陆国家或许是这种模式的最成功的例子。公元15世纪，缅甸由达摩悉提王(King *Dhammaceti*，1472—1492年在位)在缅甸南部的勃固(Pegu)进行统治。达摩悉提王试图统一僧伽；缅甸及其周边的僧侣们都前来接受他的分封。缅甸有僧侣使团前往斯里兰卡，而僧伽罗也有僧侣参拜勃固的佛教中心。在缅甸的历史中，这一时期是南传佛教政治制度的黄金时代。

泰国的文化应当归功于忽必烈(Kublai Khan)向南扩展中国疆土，以及许多讲泰语的人们南下征服出孟族人和金边所控制的地区。他们学习了这些文化，并且在有作为的君主的统治之下，在今天泰国的疆域的不同地方分别建立了南传佛教政权，北边的一个在清迈
161 (Chiang mai)，南边的一个在大城府(Ayuthia)，它们控制了泰国中部的许多地方。佛教继续繁荣，并且与僧伽罗人保持着联系。

泰国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广泛影响，是保证"南传佛教革命"(Theravādin revolution)向这两个国家进行传播的一个因素。在柬埔寨的情形中，旧有的印度模式的国家受到了政治和精神上的削弱。南传佛教关于寺院制度的理想让其僧尼们和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他们相对困苦的生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在整个地区把与农业生活相关联的地方宗教和正统的南传佛教相混杂也有了可能，因此可以产生出一个其乐融融的共生状态。

这些南传佛教国家拥有大同小异的世界观，但是也包含着环境上的差异和地方宗教的内容，这些环境差异和地方宗教内容被融入了佛教的体系之中(还存在着部落文化，这些部落文化部分地存在于南传佛教影响的模式之外)。在宇宙观方面，国王被看作是中心人物，他的任务是保护佛法，保障人民的繁荣昌盛，以及鼓励道德的生活。它的轮回理论非常慷慨，原因是它为虔诚的在家人保留了进入

天国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在家人向僧伽慷慨布施的话。男女僧众履行禅定和学习的职责，同时也教化众人，宣讲教义，并且帮助进行法事，驱除恶魔以及类似的神怪。由于辉煌的寺庙建筑和从斯里兰卡 162 以及其他地方引进的素负盛名的圣物，首都本身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朝圣中心。首都以外的各地也会有自己的庙宇，这些庙宇会把神殿同当地的神灵结合在一起，比如缅甸的守护神等等。

人们可能发现，在整个南传佛教地区，不管是在斯里兰卡还是在东南亚大陆，各种形式、多少有些相似的民间宗教都被融入了佛教。从最早的时候起，佛陀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否定神灵的存在。农业生活中渗透着这样一种观念：存在着一系列的神灵，而对于所有这些神灵，人们都需要谨慎对待。有时候，佛教仪式被用来对抗这一类神怪。还存在萨满教用来康复或者表现教义的各种方法。由于佛教不太依重于巫术（在南传佛教的形式中这种特点非常显著），所以它理所当然地宽容它，并愉快地和诸多的神灵和平共处。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大混杂型的宇宙观，在这个宇宙观中，民间信仰可以有自己的立身之地。一些西方人所断言的严格理性主义的佛教版本也正在得到一些现代佛教知识分子们明确的认可，但是它从来都不是现实中的佛教。各种神灵魔怪是在八正道（the Eightfold Path）旁边播下的杂草，尽管它不会让你更接近圆满（nirvāna），但是也没有人禁止你闯人其内。

除这些民间信仰之外，佛教文明中还生活着各种各样土生土长 163 的民族，比如洪族人（the Hmong）、克钦人（the Kachin）等等。直到很晚的时候，在搬迁到佛教徒居住区并开始接受佛教之前，他们还只是南传佛教的见证者而非参与者。但是他们自己文化的传统实践从来未被同化过。他们的文化代表了土生土长的另类，有别于我们所注意到的普遍南传佛教化的典型的农业文化仪式。

越南的宗教：中国的影响

和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不同，越南主要受到中国的影响。自从公元前 111 年被汉朝吞并之后，有一千年的时间它一直都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除公元 15 世纪早期短暂地再次由中国控制

之外，它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但是作为傣越王朝，它沿用了中国的制度。儒教是其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是其考试制度的基础；道教与大乘佛教和儒教一起，被编织进三教合流的世界观中。在这个混合体中，很可能是道教的成分被更多地掺杂进了当地的民间宗教。这种掺杂的方式部分是通过行使萨满治愈力量的男女媒介，部分是通过当地的和全国的、可以为各个村子或者更大社区主持事务的守护神灵。但是大乘佛教也在越南的土地上扎下牢固的根基，虽然还保留着一些南传佛教的寺庙，但主要是中国的大乘佛教主宰着这个国家。因此越南的官方宗教和东南亚大陆其他地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西方势力介入这一地区之前的古典时期，这一特点尤其明显。

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

虽然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地区相对较晚，但是它传播的效率却非常之高。自控制阿拉伯世界之时起，伊斯兰教也控制了印度洋上的贸易。葡萄牙和其他一些国家之所以被迫另辟航路，绕道非洲前往东方（而哥伦布此时就要向西开始他那重要的短暂旅行了），其部分原因也确实就在于此。伊斯兰教把穆斯林商人和船员们带到了这个地区，无疑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伊斯兰教首先被移植到了这里。公元13世纪，马来半岛上的国家巴赛（Pasai）已经有了一个穆斯林统治者。1400年前后，马六甲王国建立（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从那时起，伊斯兰教开始了它所向披靡的进程。大量资料清楚地显示，正如它们在印度大陆的表现一样，苏非派教会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大量的巡回传道者从印度源源不断地来到了这里。

在爪哇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出现了两种形式的伊斯兰教：一种是正规的、正统的，另外一种是调和型的，它混合了当地原有的和
164 印度的宗教要义。此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融合了印度教和佛教两者主题的中世纪印度宗教在顽强地生存着，这种现象在巴厘岛（the island of Bali）最为显著。所以伊斯兰教在南亚受到了印度教和佛教强烈的反向灌输，其势不可挡犹如地上涌出的喷泉一样。而这种反向灌输正是来自上述的那些势力，许多神秘主义者，他

们是向伊斯兰教进行反向灌输的来源，尽管同时也帮助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传播。正如我们下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不同宗教主题的巨大混合使得殖民主义时期印度尼西亚宗教和西方人之间的遭遇变得多姿多彩。

国际宗教的背后

除了我们这里考虑过的各种势力之外，也就是说，除了中国的儒教、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各种各样的大乘佛教，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和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之外，在这一地区的许多群体中当然还存在着大量小规模的宗教。这些群体种类繁多，从婆罗州中部的猎人和猎物收集者到苏拉威悉(Sulawesi)的种稻人，从缅甸的少数民族到老挝的山地人，应有尽有。有时候，他们被吸收进或者被迫屈从于更大的文化载体，但是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本质特征。他们也为东南亚丰富多彩的生活做出了一份贡献，而且他们也曾经面对殖民时期的巨大冲击被迫做出过斗争。

东南亚对宗教史的贡献

简单思考一下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文化综合体对宗教历史的新方向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认为关于印度文化形式向东南亚移植的婆罗门理论是正确的(或者至少关于婆罗门和僧侣是主要的共同传播者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思考对我们就有启发意义。第一，印度文化具有或者曾经具有巨大的灵活性，它不是必需印度种姓制度的支持。这种文化包含了关于君主政体的一种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在当时是有用而且重要的。第二，这一地区在印度文化的基础上，曾经建立了一系列受到僧伽罗影响的南传佛教国家。这种最终对该地区印度文化基础的利用有助于我们重新调整自己的观点。佛教基本上从印度本土消失了，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南传佛教的“小乘”形式，这种小乘佛教在东亚文化和西藏宗教中的表现也非常微弱。由于这种消失和微弱，人们很容易忽视南传佛教的力量，当然，例外的是它在东南亚的地位变得引人注

目了。此外，南传佛教关于君主政体的理论是相对良性的，它可以替代印度教和大乘教的模式，虽然后两者要比南传佛教绚丽多姿。

东南亚伊斯兰教让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只在于它对于非伊斯兰起
源的文化势力的开放性，而且还在于它的引进如此之多，似乎已经不
只是在基层群众的层面上。从根本上说，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的传
播方式和亚洲的许多其他地区的传播模式很不相同，在其他地区总
165 是一开始先进行政治征服。在蒙兀儿统治的保护下，这里对虔诚的
要求要比在东南亚强烈一些，事实证明，这种更加强烈的形式在印度
次大陆是至关重要的。

在殖民统治时期，东方兴起了惟一一个基督教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菲律宾。在亚洲，只有这个国家未能感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或许不是一个巧合。

最后，关于宗教的诸多影响，我们发现有两个方面在东南亚发挥着特别显著的作用。首先是关于神祇和待开悟国王的中央集权的观念。这个待开悟的国王要保护王国里的教规，并且与僧伽进行合作（比如在佛教的事例中）。因此他是阿育王神话的具体体现。其次，在吴哥窟，在婆罗浮屠，在蒲甘，以及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此类观念被转换成了令人惊异的艺术形式，转换成辉煌的宗教建筑群。在这里，建筑要比文本的说服力大得多。

第六章　太平洋地区

太平洋地区的经验

太平洋的广阔水域，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特别是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历史上最有抱负的航海技巧的场景，他们在远至夏威夷和复活节岛，塔希提岛和新西兰等相距甚远的岛屿上建立的居民点。波利尼西亚人，尽管极其分散，但在他们的文化中有某些可加以概括的一致性。然而又绝不可能轻易地描绘出它的轮廓，因为这个文化的大部分在18、19世纪欧洲人到达之前，已经逐渐消失了。似乎清楚的是，他们起源于亚洲大陆，即东南亚和中国南方，跨海越洋来到这里。 166

波利尼西亚人活动的水域，大致形成一个指向西南的三角形，它的三个角位于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还有称为美拉尼西亚的地区。有时，巴布亚和新几内亚也被包含在这一区域内，有时则不然；而我们的习惯是将其包括在内。这一区域包括不同的群岛，如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群岛以及斐济(尽管斐济人因具有和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的特征而处于边缘)。粗略地说，美拉尼西亚包括澳大利亚北部和东北部的一些岛屿，并形成一个新月形地带。在美拉尼西亚的北部和波利尼西亚的西部，密布的小岛组成了密克罗尼西亚；它们分布的区域相当于美国大陆，拥有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大约15万居民。

最后，大洋洲当然还包括澳大利亚这个巨大的海岛：那里有所谓土著的各种群落。他们的宗教一直是强烈兴趣的关注点，并且吸引了许多相关的论述，但是这个宗教也处于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之下，这是大洋洲地区所有宗教面临的问题。

太平洋地区的地貌——世界被划分为岛屿，新几内亚的高山和深谷，澳大利亚的广袤(它的面积和美国大陆差不多)——使其民众 167

分散为小的文化单位,而这些小的群体很难抵御较大文化的冲击。因此,我们的问题是要穿越现代的条件,以便展现出太平洋地区的这些文化在欧洲人的威胁到来之前的某些画面。

至于这些文化本身,我们将按照上面展示的分别加以考察:首先是波利尼西亚,其次是美拉尼西亚,然后是密克罗尼西亚,最后是澳大利亚土著,或者按我的说法称为“古典的澳大利亚人”。在某种意义上,将这四组文化放在一起当然是人为的(这种为了方便起见的分组,内在地看,并没有任何程度上的文化同质性的必然基础)。它们的姐妹关系在于它们都在太平洋地区。无论如何,我描述它们的方式将必然具有极大的选择性,而且的确给人这种印象。尽管它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后殖民时代,但是它们代表着人类经验的重要分支。

塔布与玛纳

在我们开始描述太平洋地区宗教的某些特征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在它的词汇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它们在比较宗教中十分显著——玛纳(mana)和塔布(tabu or taboo)。后者的确已经进入了日
168 常英语用词的词库。玛纳这个词,则通过人类学家马雷特(R. R. Marett,1866—1943)在1909年出版的《宗教的起点》(*The Threshold of Religion*)中系统阐述的宗教起源的主要理论之一而变得众所周知。马雷特依靠的是一位人类学同行在1891年出版的关于美拉尼西亚人的一本书里提供的报道:他们的宗教的基本概念是玛纳或力量,例如存在于一位首领,或一块岩石,或某种神圣物体中的力量。后来人们又注意到与之相似的观念,亦见之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小规模的文化中;这种观念还受到某些重要的理论家的青睐,著名的有范德利乌(Gerardus van der Leeuw,1890—1950),他在著名的《宗教的本质与现象》(*Religion in Essence and Manifestation*)中,将力量作为其宗教解释的核心观念。

小规模宗教　关键术语

阿图阿(Atua,波利尼西亚):一位神灵或超自然的存在,从创造者Tahgatoa到本地的神灵。

长管烟斗(Calumet):法语词,现在用来指土著和南美民族的所有抽烟器具。抽烟是一种仪式行为,烟斗是世界的微缩模式。

狂欢(Corroboree):土著居民的节庆日子,伴有庆典仪式和舞蹈,经常重演神话。

卡奇纳(Kachina):美国西南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使用的面具与神话人物的其他代表。

玛纳(Mana):神圣的和令人既敬又畏的力量,与神灵、塔布的违反、本质上为神圣的力量等相关;被人类学家和其他人用作宗教的一个关键的概念。

马拉伊(Marae,波利尼西亚):摆放神龛、圣坛的神圣区域。

马萨雷(Masalai,源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的词汇):经常纠缠于人的动物精灵和恶魔。

米兹提努(Miztinu ,班图):死者的精灵;祖先。

恩冈德(Ngangd):与疾病和各种邪恶打交道的专家;所谓的巫医(南非与中非的传统)。

萨满(Shaman,来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一个能够产生幻觉的人,他能够通过实验改变病人,帮助他们康复,能够在狩猎社会中确定(诸如鱼群和猎物)的来源,经常体验到死亡和再生。

塔布(Tabu or Tapu,波利尼西亚):被禁忌的和危险的;重要的玛纳都会产生塔布。

图腾(Totem ,来自北美阿尔衮琴人):与某一民族尤为相关的一个动物的或植物的自然物种,该民族的人不能狩猎或采集那个物种;是许多人类学和心理学关于宗教本质的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波利尼西亚宗教的诸层面

169 波利尼西亚宗教的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精灵的或不可见的世界与我们可以看到和经验到的世界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两个世界交织在一起：神灵是位于可见事件（诸如打雷或行经）背后的各种力量，就其本性而言，他们经常访问人类的居住地。人们经常提到天上世界与地下世界的区别，前者是神灵们不与我们在一起时居住的地方，后者是死者的精灵去往的地方。

绝大部分的仪式与力图控制神灵有关。假如他们要访问我们，那最好是在我们希望的时刻和地点到来，所以重要的事情在于为他们准备住所，念咒行术以使他们到来，让他们高兴，然后（同样重要）再把他们送回到他们来此之前的地方。与神灵相关的任何事情都要倍加小心。所涉及的各种禁忌只是对神灵危险这一事实的反映。任何具有真正玛纳或内在力量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在夏威夷，首领具有巨大的力量，由于担心与下层阶级的人婚配会削弱他们的力量，所以赞许兄弟—姐妹婚姻。（这种情况亦见之于其他诸多社会，特别是在古代埃及。）

自然，有些仪式用于所有吉祥的场合，诸如种植谷物，出发去航海或狩猎远行。魔法——运用仪式手段给其他人带来恶果，而不是（像大多数仪式）给我们带来好运——也是广泛使用的。

塔布的观念遍布整个仪式领域，而且有一个拥有它、如何增进它与避免它的一般理论。比如，人们认为神灵可以借助相似物来吸引，所以为他们制作雕像并安置在临时的住所里，人们认为这样做往往很有效。女人是具有两面性：神灵往往害怕她们，所以她们能消除塔布，也能冲淡塔布。但是在某些情形中，神灵也会被女人所吸引。

对神灵的禳解（propitiation）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从人祭（对战争和建筑特别有效）到咒语。仪式的效力有赖于它的完美操作，所以有严格的规定：人们应当在仪式行为中保持安静等等。除了对神灵的邀请和禳解之外，对他们的遣散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些方面，塔布的概念都十分重要。假如人类能够控制这种易变的东西，那么

停止它的作用和启动它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神话的层面上，对世界的创造有不同的解释，但经常的解释是由一位大神(great God)创造了世界。一个相当感人的事例，是下面这首来自夏威夷的关于神灵塔阿罗伊(Ta'aroa)的诗歌：

塔阿罗伊是他的名字，
他存在于广袤之中，
　　没有地，也没有天，
　　没有海，也没有人； 170
上天以塔阿罗伊的名字命名。
只有他存在，他变成了宇宙。
塔阿罗伊是起源，是岩石。
塔阿罗伊是沙地，
因此这成为他的名字。
塔阿罗伊是光；
塔阿罗伊是里面；
塔阿罗伊是萌芽。
塔阿罗伊是下面。
　　塔阿罗伊是形式；
　　塔阿罗伊智慧。
他创造了夏威夷的土地，
夏威夷是伟大的和神圣的，
它是塔阿罗伊的身体或贝壳……

有时候，创造的故事非常的复杂。在社会群岛，同样的一位神灵生活在一种沉思的自足当中：但是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章鱼用它的利爪把海和天抓在了一起。塔阿罗伊创造了其他的神灵。他还摇动自己使羽毛纷纷落下(他显然被描绘成一只大鸟)，它们变成树和其他的绿色植物。尽管深渊神(Abyss)鲁伊(Rua)用魔法杀死了章鱼，但他的胳膊依然被章鱼的爪抓住。在经历了各种冒险之后，一个无法无天的东西，太平洋地区的大恶作剧精灵毛伊(Maui)，用楔子把



神话层面：坦伽罗伊（Tangaroa）或塔阿罗伊，海洋神，在波利尼西亚被广泛地看作伟大的创造者。在此，一些较小的神灵出自他的身体，象征着他们对他的依赖。木制雕像，来自南方群岛，中空，后背可打开。

天撑起来，他得到住在最高天上的塔内（Tane）的帮助，用一个贝壳打开了天而露出了光亮。后来，塔内用星星装饰了天空，并把太阳和月亮安放在它们的轨道上。

毛伊经常被认为是半神半人。这种半人半神的身份往往是神话中狡猾人物的特点，他们混淆了人的范畴：这是反复出现的恶作剧精灵（Trickster）的标志。其他地区的某些人物，如恩基（Enki）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也可划人恶作剧精灵的范畴。毛伊在波利尼西亚神话中代表着一个重要的基调，尽管他不从事创造——那是神灵的特权——但是他可以把神灵创造出来的东西变成对人类有用的东西。这的确是仪式的关键所在，它虽不创造力量但可将其引人某种指向，它虽不创造秩序但可以修改秩序。比如毛伊从神灵那里偷取了火，以便人类用火来做饭或做其他有用的事情。根据有关毛伊的神话，他用鱼钩钓起了不同的岛屿，包括新西兰的北岛。据说他还曾减慢了太阳的运行，以便使人类有一整天的时间准备食物，做一些事情，包括为神灵制作精美的形象。人们把他归于人类的祖先。但他并不享有人们的崇拜，尽管如此，他以自己的足智多谋来羞辱那些自负的神灵（他们受到崇拜）的故事，却为人津津乐道。

人类早先存在于“另一个世界”，每个人通过他或她的母亲而来到此世。同样，一个女人也是死亡的通道。有故事说毛伊打算杀掉海尼—努伊—特—波（Hine-nui-te-po），她是阴间的大海尼（Great
173 Hine），死亡的化身，毛伊通过她的阴道进人她的身体，最终从她的口中出来。他脱下衣服，把他的硬棍棒绑在他的右腕上，告诉他的小鸟伙伴保持绝对安静，以免惊醒海尼；然后他就爬进她的阴道。鸟儿们

自然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事，便哄堂大笑起来，这一切骚动把海尼吵醒了。她看到毛伊爬进她的身体，就想用两条腿把他挤死。



保罗·高庚(Paul Gauguin)的"守护死者的精灵"(Manao Tupapau)，现存于纽约布法罗阿尔布莱特·诺克斯(Albright Knox)美术馆，画于 1892 年他首次访问塔希提岛期间。这件作品在波利尼西亚人中引起信仰的强烈情感共鸣：精灵的世界与尘世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自然地，在波利尼西亚，神话的资源非常丰厚，随手可得，要了解这个世界，这几个例子就足够了。神的故事可以作为社会和社会规范的隐喻，而且在波利尼西亚的宗教精神中，伦理道德具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按照这个事例的本质来说，价值观的模式是英雄式的和以男性为主的。太平洋地区各民族间经常发生的战争，航海和捕鱼的巨大需求，等等，促成一种道德系统：赞美男子气和勇敢，以及展示具有玛纳的成功。



仪式层面：土著的身体绘画表明一个土著氏族的成员资格，这是通过一个复杂的成年仪式获得的。

至于经验的层面：在太平洋地区非常流行的对神灵信仰的模式，是认为任何地方，都处于隐藏的力量的掌控之中，这意味着日常生活总是不得不通过预兆和迹象，以便了解神灵的所想所为。当你向蓝色的太平洋深处看去，你几乎总是能看到风神、水神和暴风雨神；当你巡视白色的沙滩时，你会感到疑惑：是不是神灵已经神秘地穿过沙滩进入了人类的住所。在村庄周围，在缭绕的烟雾中，在阴影里，处处都有疾病之神、村神、木器神以及人类事务中一切神秘力量的迹象。他们像古罗马的"神秘者"。他们造成恐惧的，令人既敬又畏的气氛，造成令人惊奇的环境，人类在这种环境里生存，既感到美好，又感到危险。无声的塔布更强化了人们的畏惧。当雷声在远处隆隆作响时，也许正是神灵们的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动员起来，这或许给人们带来痛苦，也可能给人们带来欢乐。所以必须要了解天空、植物、动物、鸟和鱼。

某些人能特别深入他们的梦和幻觉，他们也许会变成专业的预言家和巫医术士。尤其是梦，那是特别有意味的事件。整个自然界，说到底，都是神灵之行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身体是雷，是雨，是猪和大地。任何方面的奇怪行为，都提供了神灵之意图的线索，都强化了浸透在波利尼西亚世界中的玛纳的令人既敬又畏，既令人害怕又鼓舞人心的那种感受。

在物质层面，面具、舞蹈、雕刻品、马拉伊或神圣的围栏，都是吸引神灵的人工制品，并成为他们的力量与人类相接触的通道。波利尼西亚艺术的雕刻品，代表着神灵的相似物，或令神灵愉悦的东西，其目的是诱导神灵出来，并以歌舞、赞美诗和古老的仪式来款待它们，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将它们送走。

至于宗教的组织层面，尽管准备马拉伊或神圣的围栏是集体活 174
动，但是在波利尼西亚人中有专门从事仪式的人，也有从事治疗、占卜和其他技艺的行家里手。有些人使用妖术，这是其宗教的阴暗面，在此方面，人们极其害怕仪式的错误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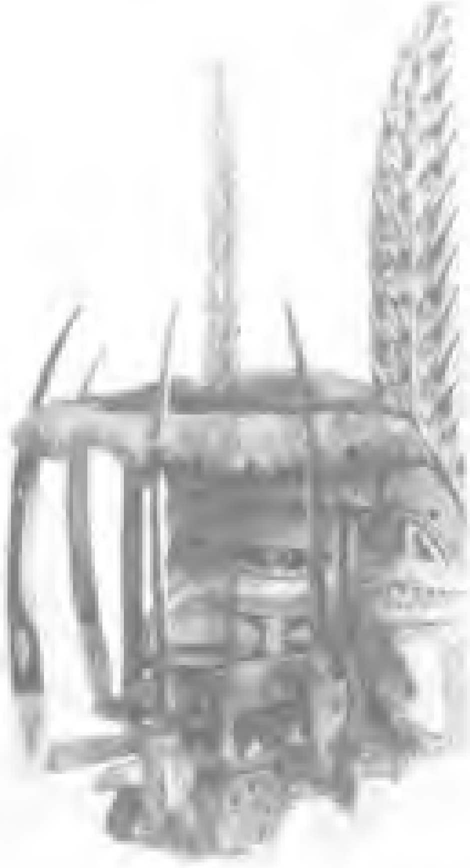
美拉尼西亚宗教:某些模式

假如在波利尼西亚的内部有不同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美拉尼西亚,这种变化就更多。新几内亚岛包括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伊里安查亚省(Irian Jaya),现在是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它有上千种语言,但能够说讲某些语言的人还不到二百。这个群岛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某些文化深受波利尼西亚基调的影响,如斐济文化。但若有人对其加以概括,那么可以说,美拉尼西亚宗教对仪式的操作力量有着更多的信赖。而不那么依靠神灵。那里也有神灵和各种各样的精灵,但是他们都比较接近尘世,在许多情况下,控制他们并非难事。由此来看,原初力量或玛纳,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人类想要操纵的能量,因此在美拉尼西亚文化中,非常重视如何在仪式中做到这一点。

如果要在巫术与宗教之间做出明确区别的话,那么美拉尼西亚所展示的,更多的是巫术而不是宗教。但这并不是一种能够结出丰满果实的区别。人们是可以说,对于许多美拉尼西亚社会来说,仪式是事物的核心,仪式所涉及的看不见的力量(它也可以创造看不见的力量),乃是各种事件的构造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因此,任何重大的灾难或实际的死亡,都可以用妖术的结果,精灵的行为或违犯某些禁忌的结果加以解释。于是,疾病本身有其相似的原因,巫医的工作就是能够确定相反的仪式(counter-ritual)的指向,以反抗使病人痛苦的危险力量。

看不见的力量的范围是巨大的。某些特定的神灵经常涉及到捕鱼或战争等活动,他们似乎远离人类活动,尽管他们在神话中都是个人物。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使遥远的文化英雄和神灵也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形形色色符咒的终极源泉,而这种知识则在仪式的专家中代代秘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精灵或不管怎样的神话人物,他们虽不是神灵,但依然令人畏惧:居住在野外丛林(那是处于有着菜园猪圈的人类居住地的相对秩序之外的)中的魔怪。较接近人类居住地的是饥饿的鬼魂:新近死去的人对他们生前认识的人还有思念,尽





仪式层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爱尔兰岛，面具和头巾（headdresses）是假装神灵和精灵身份的仪式手段。

管他们最终会漂流到他们自己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做着和人类同样的事情，但也许会过得更愉快。

对鬼魂的信仰与美拉尼西亚人对灵魂的一般信仰是结合在一起 175
的。灵魂受到妖术的侵扰甚至捕获。人类留下的东西，诸如剪下的头发或吃剩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控制灵魂。一旦出现这种事情，就只能用相反的巫术（counter-magic）来解决。在某些地方，如在新几内亚的高原上，祖先的灵魂在宗教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被认作能够促进那个团体的福利——比如庄稼的丰收等。他们的存在，乃是一个更广大社会的组成部分，而那个有形的团体，则嵌入这广大的社会之中。

总体上说，美拉尼西亚的宗教，将既包括神也包括人的精灵世界（以祖先幽灵和灵魂的形式），看作相当接近那个有形的团体的存在，

而在那个有形的团体中，人类有自己的原初存在。宗教的某些特征，尽管不是美拉尼西亚所特有的，但依然值得在此强调。比如，围绕着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常有许多复杂的禁忌，女人总是被认为是比较低
176 等的，因此一个男人不应比女人低：他在溪边饮水时不应站在女人的下方；在某些社会，村庄建造时将男人的住处建在高处，以保证其物质上的优越性。由于在许多场合，与女人接触本身就被看作受污染，因而男孩子的青春期仪式包括呕吐和放血，以便清除掉接触女人做的饭、月经之血等等造成的污染。有时成年礼采取加入男子秘密社会的形式，行家里手在其中表演如何制造神圣的面具以及如何用精灵来降神。

死亡的意义

在美拉尼西亚，对死者有着强烈的关注并给予认真的对待。精心安排的宴会和葬礼是正规的，有时还要对死尸进行盘问以弄清死因。寡妇自我克制的深居简出和面无表情的程度，被看作她没有卷入毒害其丈夫的标志。仪式会延长很久：首先是通过埋葬或放置在平台上仪式性地处理死尸，待皮肉腐烂后，将骨头收集起来，再举行仪式。在此期间，死者的亲属，特别是寡妇，要保持完全的隔离。

有迹象表明，在过去更深层次的仪式哀悼中，如在新不列颠岛，有寡妇被杀以使其陪伴死去的丈夫。死者生前拥有的财产或许会被毁坏，或最终作为亲属重新与社会成为一体的仪式的组成部分而被烧掉。

即使在所有的丧葬仪式规则都圆满地履行了，死者也并非必然会完全离去：他们的幽灵今后还可以召唤来并向其请教，他们的骨头保留在圣坛中，其功能就像祖先的圣殿。

艺术与宗教

特别在新几内亚岛低地，以及在其他地方，美拉尼西亚的艺术，尤其是制造用于仪礼的面具，是引人注目的。制造品经常——由树皮布制成，装饰以彩色的树叶和羽毛，或绘以传统的图案——是短命的，制造它们只是为了用于某些仪礼，诸如葬礼。在通常的情况下，

制作这类面具是高度秘密的事务，特别是不能让女人了解其秘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代表精灵的，比较永久的雕像或面具。有些仪式是为了将精灵引入面具或使之离去。有时，画眼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此类艺术品的创造当然不能如此来归类，因为审美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主要是一种西方的现象；但尽管如此，它依然证明了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卓越的想像力，以及直觉地再现和表达敬畏感的绝妙方式。

在美拉尼西亚宗教的广泛内容中，我们只想点到为止地指出人们信仰一位单独的至上的创造者或高位神。起源的神话往往讲述了从灾难的混沌中产生秩序。大多数社会的规模较小，它们的周围被一个巨大的未知和令人恐惧的空间（大洋或丛林）所包围，这给美拉尼西亚人一种人造秩序与神出鬼没的外部世界（与人类事务有关，但总有某种威胁）明显不同的感觉。在这个地区，宗教的主要特征在于高度发达的对仪式之实际功效（既有友善的，也有疾病的）的感知，因此在宗教的所有层面中，仪式发挥了最高的功效并受到赞美，与此相关的是仪式的物质展现，即为仪礼的生活而制作的身体绘画、面具和画像。 177

密克罗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人的世界是变化多样的，但是他们比美拉尼西亚人有更多的创造，而且更多地强调女性神灵的作用。其中的原因，部分地在于男性从事捕鱼、航海、房屋的建造和作战技术等，而女人则从事田园和农艺。尽管如此，一般来说，女人因为经血和生孩子而被认为是低等的和肮脏的。然而，高位神和创造者又被认作女性，人们往往把不同的可食植物的创造，归功于女神。在加洛林群岛，大母神利勾普普（Ligoupup）一直存在，她创造了世界。人们想象她躺在岛的下面，当她苏醒时，就会发生地震。她的儿子变成神灵，阴间和海洋等等归属于他；她的女儿升上天界，与一位神结了婚，他们的儿子阿鲁伊拉普（Aluelap），是所有知识的源泉。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位名叫阿努拉普（Anulap）的高位神，他很老了，白发苍苍，也很虚弱，有

上位男仆帮助他抬起眼帘以便能看见东西，或帮助他张开嘴唇以便能吃东西。他是富有历史学家称为"多余的上帝"（*Deus otiosus*）之色彩的代表，他对人类事务漠不关心（这种存在经常是极高的和令人既敬又畏的，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不能为人类的琐碎事务所干扰），因而也不享受崇拜。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创造者，全知者和至高无上者。

密克罗尼西亚的宗教，在许多方面相似于波利尼西亚的宗教，在某些海岛可以看到波利尼西亚文化的影响。它们是太平洋地区宗教之巨大的"马赛克"（mosaic）的组成部分，16世纪以后西方人出现了，来自异域的航海者们发现了这片似乎充满田园风光的海岛。

澳大利亚：梦之乡

最后，我们来到太平洋地区宗教考察的最后一站：在200年前白
178 种人定居这块大陆之前的澳大利亚古典文化。在澳大利亚的广阔大地上，从东南多雪的山区到西部的红土平原，居住着各种各样的社团，但是它们又都展示出某些共同点，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澳大利亚宗教和社会的共同特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点是图腾崇拜和梦的观念。

梦（或梦时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时期（它依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时，众神灵在地上到处行走，给土地以形状和材料，造就了人类，并制定了社会规则。就其自身方面来说，那是个创造的时代，但是它比关于宇宙起源的某些被概念化了的时期更为重要。梦有助于解释环境中的最为特殊的因素。那种环境——通常说来——是相当艰苦的，需要有高超的技巧才能成功。在热浪滚滚的陆地上，有红色的沙漠和闪闪发光的桉属植物，有半干涸的水道和已经干涸的峡谷，有稀薄的雨水和难以名状的高云，有巨大的圆形石头和奇形怪状的山丘；陆地上只有少量的但却聪明的动物——袋鼠和小袋鼠，食蚁针鼹，蜥蜴高安纳（goanna）——和色彩鲜艳的鸟，从小笑翠鸟到火焰般的桃红鹦鹉和彩色鹦鹉，以及许多昆虫，尤其是巨大的蚁冢（anthills）和无处不在的苍蝇。这种环境被看作梦境阶段

的特点。

在澳大利亚的神话故事中，关键所在是道路，主人公借此穿越梦之乡野。这些故事所指示的地方是神圣的，或者在那里发生了神话所描述的事件，或者更多地因为它们与某种相关的物种的丰产相联系 例如在澳大利亚南部的默累河地区，有恩古伦德利(Ngurunderi)的故事。他乘一独木舟下河，跟随在巨大的默累·考德(Murray Cod)之后，他来回甩动他的大尾巴，拨动水流旋转。由此在河流中造成了许多转弯，并在这里和那里形成了一些沼泽。最终，考德被他的大舅子(brother-in-law)抓住，他把一些剁碎的颗粒撒在默累河在下游，以及河口的湖泊里，从而有了许多种类的鱼，等待后来的人类来收获。而另一则来自北方的神话，讲述了一位著名的和广泛传播的神话人物：彩虹蛇(Rainbow Snake)。她来自大海，但最初只发现了干旱——非常干旱——的土地。她在地下行走，来到一处瀑布。她顺流而下，在溪流消失的地方她触及到一个干涸的水潭(河流至此中断)，在那里产下一个蛋，她把它放在太阳下晒硬，然后到一个洞穴里睡觉。一个老年男子经过这里，把蛋煮熟了。她抓住他并把他拖到水底下，呕吐出他那已经变硬的骨头。她又产了两个更大的蛋，放在潭中变硬。然后在水潭上方的洞穴里看着它们。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话，关系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神圣地点，这曾是个精灵出现的地方，彩虹蛇和老年男子，都通过故事而具有了不朽性。

沙漠里到处是神话的足迹，神灵和精灵在此旅行。你不可能知 *179*
道所有的故事，不同的部落分别了解那个相互重叠的神圣地理之意义的不同部分。在这些方面，整个大陆都是神灵经常出没的地方，从梦时代直到现在。当然，梦会给予我们的东西要比神圣的地图绘制学给予我们的更多：它解释了社会习俗，氏族组织，各种发明——总之，解释了生活的整个安排。它解释了仪式，仪式又反过来将梦带给我们，以便使我们从它的力量中受益。

创造与丰产

关于创造与天神，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如果将它们与“梦时代”的神圣事件相比较，就显得平淡无奇。在澳大利亚中部，讲阿兰

达语(Aranda)的人当中,有一则故事说,长着巨大的鸸鹋脚的父亲住在天堂里,他有许多妻子和儿女。他们从不为地上的事担忧。在地下也沉睡着许多其他的超自然的存在,他们最终醒来,开始他们的漫游。他们创造出人类,并教给他们在地上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艺。这些梦时代的故事,对阿兰达人来说,比任何高高在上的"无用的"上帝更至关重要。他们现存的宗教,不是要和伟大的父亲进行交流,而是要与梦时代的超自然的东西相交流,所以必须用仪式在当下重新创造祖先们的事业,而这些仪式本身,则是由超自然的东西所规定的。

某些起源的神话涉及到卡产,其中较著名的是丹伽乌尔(Djangawwul)的系列故事。丹伽乌尔带着一个男性伙伴和他的两个妹妹,从雾气笼罩的布拉尔古岛来到海岸上,他用其既长又硬的阴茎不断地使他的两个妹妹怀孕。那时还无所谓乱伦,因为结婚之事还未发明。二姐妹的后代就是现在澳大利亚土著的祖先。她们还创造了各种卡产仪式,女人经常参与这些仪式。二姐妹还带着一个象征阴茎的崇拜物体或朗加(rangga)。男人偷取了它,并开始他们自己的崇拜活动。

卡产也常常涉及到广泛存在于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体系。梦时代的超自然事物变得与氏族联系起来,一个氏族成为一个群体,它由一位超自然英雄的男性后裔所组成。这些观念可以用瓦尔比利斯(Walbiris)的北方部落的情况来说明,那里现在有大约1400人。他们分成大约40个氏族,每个氏族都有一个图腾或某种自然物种或物体的人格化形象——袋鼠、袋貂、番薯、雨、火,等等。这些英雄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由与之相关的当地人讲述——有些故事的线索极长(远至澳大利亚南方),有的则只限于本地。这些神圣之地浸透着神圣的微粒,相对而言,它们是些处于休眠状态的超自然物。它们必须由人类举行的仪式来唤醒,这些仪式是由男子在氏族的小屋中举
180 行的。不举行这些仪式,土地和人都不会繁荣昌盛。土地,梦时代的英雄,以前的祖先,现在的人,由此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网络,它虽然容易破碎,但只要循规蹈矩,一切就都平安康乐。

生态有灵论

这种有机的网络，随着对人与土地、超自然与社会之关系有着极为不同观点的人来到澳大利亚而中断。但是我们必须有一种想象的跳跃，即那个世界已经持续了三万年或更为久远。我们对于最初来到澳大利亚大陆的人们处于怎样的类型之中所知甚少。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考察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土著文化而向上追溯。我们看到一种值得关注的生活经验：不同的社会群体来往于同一块大陆，他们之间被神圣的地点，单独的地貌风景而相互分割开来，人们通过内在的眼光，超越岩石、树木和跳跃奔跑的动物，看到了精灵，这些精灵不仅弥漫于人们周围的一切创造中，而且给予他们的习俗以权威和意义。从外部看：是灰尘满身的土著人。从内部看：是复杂的社会分化、成年礼和其他仪式，它们与狩猎和采集密切相关，纵横于变化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他们开拓了一种生态有灵论（ecopsychism）的形式，这是一种生活在被看作充满精灵的大自然中的温和的、有效力的形式。

澳大利亚的世界与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极为不同，那些地方被大海环抱，土地肥沃。而在澳大利亚，则有着与之不同的、到处存在的干旱景象，不同的社会群体彼此比较开放，因为他们享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神圣的遗迹和地点。彩虹蛇的蛋在太阳的照射下变硬，一些看不见的人物在周围徘徊，也在死水潭中。

第七章　美　　洲

广阔的天地

181 似乎极为可能的是，所有或几乎所有定居在北美和南美的土著美洲人，都是从亚洲大陆的北方通道，即现在的白令海峡移民过来的。也许，还有波利尼西亚移民的少量影响，而且有可能在哥伦布(Columbus)之前，中国人已登陆此地；我们还听说曾出现过少量的北欧海盗(Viking)。尽管其人口是相对同质的，即主要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即使在那时，也如今日，有许多变化），但是他们在美洲的不同地区所创造的文化模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创造了某些伟大的都市文明。

在美洲有五个文化区域：首先是安第斯地区；其次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南美其他地区，诸如巴塔哥尼亚高原(Patagonia)，无树大草原(Pampas)，格兰查科(Gran Chaco)，亚马逊盆地(Amazon Basin)，东部的巴西和加勒比海岸；第三是加勒比群岛；第四是中美洲；第五是北美洲。我们在此论述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到前哥伦布时代各种非常不同的现象，最好的办法是选择一些不同类型的宗教与社会价值观。

就都市文化而言，我们可以将公元1000年看作分水岭，因为在10世纪时，作为阿兹台克人(Aztecs)的强有力的前辈，墨西哥的托尔特克(Toltec)帝国坍塌了。大约与此同时，位于安第斯地区中部的蒂亚瓦内科(Tiahuanaco)帝国，也消失了。在这之后，我们看到一些伟大国家的崛起，但是它们都未能成功地抗拒西班牙人。在10世纪时，马雅(Maya)文明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系统也消失了。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将10世纪以前的时期看作展示了中美洲都市文化的古典形式，尤其是精美的马雅艺术时期。在总体上，即使对马雅，我

们也所知甚少，还不能清楚地破译他们的宗教。但是后来的时期，以及阿兹台克文化和印加文化，都是以前者作为某种基础的。至于中美洲和印加地区以外的文化，我们对其公元1000年前的情况，所知寥寥。在许多方面，因为缺乏足够的历史和考古知识，我们不得不参照如今还存在的小规模群体来描述古典的宗教。 182

印加宗教

在位于秘鲁的印加帝国之前，曾有过不同的帝国——从查文(Chavin)帝国(8世纪之后)到奇穆(Chimu)帝国(1200—1400)。遗憾的是，我们对他们的宗教观念所知不多，因为他们像印加人一样，缺少书写的语言。圣殿似乎用来举行包括人牲在内的献祭，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有些复杂的仪式与描绘不同天体运动的历法相关。太阳和月亮是最重要的神明，有些神灵的形象是动物的形状，如美洲狮。

15世纪的印加宗教系统，是以前的各种膜拜的混合物，在某种意义上说，帝国的统治在其中得到了强化与组织化。大致说来，帝国是个集权的同盟，帝国各地的首领定期地被召唤到首都库斯科(Cuzco，或Navel，即大地的中心)。位于河流交汇处的太阳中心神殿，与 183
银河(亦被看作一条河)相连。无论如何，这里乃是帝国的中心。若干条设想的线条，呈放射状地从这里与428处的圣地相连。在库斯科与各地区的被批准的圣殿之间，有一种互惠的关联(但是许多地方的膜拜都受到压制，毫无疑问，它们支持人们反抗极力扩张的印加帝国)。帝国的意识形态表明，皇帝(印加)对帝国的福祉负有责任，所以他成为他的臣民与大的神灵之间的交叉点。他必须在现行的宇宙循环中主持尘世的事务，所以他本人就是一位神灵，太阳的后代。而太阳则处于库斯科圣殿中的仪式复合体的中心地位。

除太阳外，在库斯科的圣殿中，还有雷神(他的作用范围比诸天神较低)，月亮女神(对女人尤其重要)和诸星神。他们共同控制时间和变换季节。太阳的父亲和至上神(尽管不是惟一神)，是维拉科查(Viracocha)。是他在时间之始使万物成形并安排有序，他是祈祷的

接受者，尤其接受贵族的祈祷。有一篇保存下来的祈祷文这样说：

> 你无与伦比，跨越大地的边界：是你给予人类生命和力量，你对这个说，"让他成为男人"，对另一个说，"让她成为女人"，你使他们生存：让他们没有危险地生活，生活在和平与健康之中。你位于天空中，位于雷雨中，你使他们长寿。接受我们的这些献祭吧。

在这些大的神灵之下，是一大群其他的令人既敬又畏的存在物即华卡(huaca)，帝国的等级制度体系也反映在神灵的等级制度中，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到乡村一级。

从教义上说，有大量的内容包含了宇宙的二元对立：男性—女性，太阳—月亮，等等。与此相似，村庄也被划分为两半，整个世俗的和宇宙的体系被看作处于冲突中，但又能和谐一致的两个部分。印加首领的功能，就在于通过相关的献祭与维持公众仪式的循环来促进这种和谐。中国人在阴阳两极中对这种和谐的探讨，与此相应。

年节仪式极为荣耀和复杂。在库斯科举行的庆典仪式，令人眼花缭乱，坐在黄金座上的印加国王，在圣殿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主持献祭。控制如此之大一个帝国的能力，部分地有赖于这些仪式；但是还必须牢记的是，在帝国的广大地区，村庄和住宅中的男男女女，还在各地举行仪式，祭祀他们的祖先和较低的华卡，以帮助他们田园里的作物生长茂盛，并帮助他们战胜疾病和死亡。但是这个系统的弱点是强烈的集权，这也是 1532 年弗朗西斯科·皮扎罗(Francisco Pizarro)之所以率领很少的雇佣兵就能够致帝国于死地的原因。

南美洲的小规模社会

184 在安第斯以外的其他南美洲地区，生存条件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许多群体生活在亚马逊河与奥里诺科河盆地的热带雨林中(顺便说一句，自从与欧洲人的文化首次接触以来，其人口在悲惨地消耗，以致引起了非常巨大的社会—宗教的变化)，他们似乎只是偶然地信仰

一位高位神或至上存在。然而，这种信仰非常广泛地传播于无树大草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在安第斯地区，与祖先崇拜(ancestral cults)和保护死者相关的仪式，比其他地区要更为普遍——这也许是因为诸如“木乃伊化”(mummification)等实践在气候上是可能的，而在热带雨林中，死尸会令人恐怖地迅速分解。丰产崇拜(fertility cults)和植物神灵，在西北部的亚马逊河流域和其他地区，但不包括大查科(Grand Chaco)，都很重要。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值得注意的多样性，在人们考察不同的神话内容时，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然而，在安第斯地区之外，有一个因素几乎是普遍的，那就是萨满。在许多地区，萨满等同于美洲豹，它能够作为他或她的“第二个我”(alter ego)来行动。这可能有许多理由。首先，美洲豹可以在水中游泳和捕猎，因而能够进入(充满水的)阴界。同样，萨满在拯救死者精灵的过程中，也能访问阴界。其次，像萨满一样，美洲豹可以向上攀登，进入上面的地区，即天界。不管怎样，美洲豹是一种令人既敬又畏的动物，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意义。

萨满证实了宗教经验的重要性，因为他或她借助幻觉、狂迷和梦而获得神召。在许多此类社会中，专家指导下的实际训练是十分艰难的，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有幻觉的能力。这可能，而且就是要借助于致幻剂。而致幻剂似乎是用一种圣佩德罗的植物(San Pedro plant)，它被证实已使用了近三千年，在古代秘鲁的查文(Chavin)文化中的陶器上，就已经描绘了这种植物。这种致幻剂还经常与烟草混合使用。

萨满的重要性在于，借助他的经验和仪式力量，他能够使自己进入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因此，他能够对在某种意义上已死的人施以治疗。但是萨满也能进入显现于尘世——诸如鱼、动物、鸟，等等——的精灵世界，给予狩猎者和采集者以指导(如在许多小规模社会里)。

加勒比地区

加勒比海诸岛的居民，主要是阿拉瓦克人(Arawaks)和加勒比人(Caribs)。在欧洲人定居这些海岛后，原有的土著居民在疾病和奴隶苦役的折磨下所剩无几，只是在与欧洲人和来自非洲较强壮的

185 奴隶的混血后裔中保留若干。随之消失的还有前哥伦布时代诸岛的宗教。然而，其信仰与仪式的遗迹，还见之于非洲—加勒比（Afro-Caribbean）宗教中，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看到这些发展的某些方面。

阿拉瓦克人（大约在公元开始时移居此地）和加勒比人都来自大陆。如同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南美诸民族一样，萨满教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这里不仅有对高位神的信仰，而且在阿拉瓦克人中，这种信仰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据哥伦布说，加勒比人是食人生番（cannibals即"食人生番"，这个英语词来自"加勒比"Carib），但如今人们将此看作没有根据的指控。

中美洲的文明

马　雅

马雅的古典文明，以破碎残缺的形式保留在墨西哥东南部，危地
186 马拉和伯利兹，不仅以废墟的形式保留在奇琴伊察（Chichen Itza）和马雅潘（Mayapan），而且保留在依然说马雅语的许多民族的文化中。他们在艺术、写作和数学等方面的文化成就十分卓著，他们发明了一种灵巧的历法系统，用来计算和预言吉利之日。它的基础是以 20 天为一个单位，一年 360 天，20 的整倍数最接近一年的真正长度。年历根据 256 天为一年周期的短年计算法（Short Count）或在公元前 3114 年开始的长年计算法（Long Count）计算出来。短年计算法在马雅人中的使用一直坚持到 18 世纪，是西班牙征服之后保留下来的诸多文化之一。

时间是马雅文化的基本关注点，这当然是与太阳的旋转紧密相连。太阳神（Sun God）是宗教的主要焦点：他也是位创造者和第一位发明书写的祭司式人物。宇宙是垂直安排的，地的上面有七层天，地的下面有五层阴间（死者的领域）。在宇宙的中心有一棵"最早的树"（First Tree），即"世界之轴"（axis mundi）。这令人想起许多其他的文化，这或许反映了某些萨满教的主题早已进入马雅人的思想。但是，时间的神圣性质——可能是借助秘传的算术计算出来的——似

乎是祭司阶级的主要职业。



伦理层面：来自危地马拉的雅克奇兰(Yaxchilan)的马雅浮雕，表现一位忏悔者正在祭司面前毁坏自己的舌头。伦敦，大英博物馆。

阿兹台克

对于阿兹台克人来说，他们的神奇绝妙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是文明的最大奇事。城中巨大美丽的建筑，是以更古老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的托尔特克(Toltec)城，即"神灵的住所"为模本的，大约向北30英里，城中按四个方位划分，反映了阿兹台克人所理解的宇宙。这四个方位加上中央构成了典型的中美洲的宇宙的五个方位(如同中国的方位)。宇宙有垂直方向的轴或看不

见的中心,它贯穿这个城市,上面有十三层天,地下有九层阴界。数字5对于时间和空间都很重要。世界有五个主要的时期,每个时期都以不同的灾难结束。在现代,我们正开始第五个太阳时期,这个时期的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

但是世界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秩序的重新开始需要不断的献祭。的确,在第五个太阳时期之前,神灵不得不结合起来以供给太阳能量,仅靠集体的献祭本身并不能使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这个神话证明了连续的献祭崇拜是以特诺奇蒂特兰为中心的。阿兹台克的皇帝,也是最高的祭司,他所肩负的重任不仅是要保持帝国的秩序,而且还要维护整个宇宙的秩序。所以阿兹台克人有一种萦绕心头的和令人害怕的想法,即,太阳也许在明天早上不会升起来,世界享受的和谐将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在宇宙与人的世界之间有
188 一种深深的共振。太阳需要人的血:恰恰是这种人祭观,成为战争的巨大推动力——通过战争为神灵捕获食物。

但是神话的宇宙论远非只是对方向和时代的描绘。神话里充满了不同的神灵和灵界存在(spiritual beings)的图画,他们令世界有了生命并对世界加以控制,神话以最高的创造者奥梅特欧特尔(Ometeotl)开始,他无比强大,男女混身为一体,他在他/她自己的身体中熔化了这种对立。神话中还有一个特兹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是面冒烟的镜子,他在转变力量时充满活力且令人畏惧,被等同于刀,是献祭中生气勃勃的(或者说致命的)一位神灵。火神齐乌蒂特丘特利(Xiuhtecuhtli),在祭司的崇拜中也十分重要,火不仅要保持其永远不熄,而且要仪式地更新:每52年,当一个历法循环结束时,先将一个牺牲的跳动着的心掏出来,然后在其胸腔中点燃新的火种。火神在其他文化中,也是灶神,是家居日常仪式的基础。女神科亚特利库埃(Coatlicue,蛇裙),其力量在于丰产,十分凶猛,装饰以骷髅,献祭的心和其他奇形怪状的东西。

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神灵是技艺高超的魁扎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尊贵的羽蛇),他在前阿兹台克文明和马雅文明中都很重要,在马雅人中他的名字是库库尔坎(Kukulcan)。他是世界的再创造者,发明了农业和各种人的技艺,他还潜入阴间取回死者的骨头;当他自

哲人(阿兹台克)的任务:贝纳迪诺·德·萨哈贡(Bernarddino de Sahagun)

哲人:一道光,一个火把,一个没有烟的粗大火炬。

一面带孔的镜子,一面两边穿孔的镜子。

他的黑的与红的墨水,他的有插图的手稿,他研究有插图的手稿。

他本人就是书写和智慧。

他是路,是引领他人的真正之路,

他为人和事物指引方向;他是人类事务的向导。

哲人是细致的(像医生)并保存着传统。

他传承智慧;他以之教导别人;他遵循真理之路。

真理的教师,他诲人不倦。

他使别人的面容变得聪明,他给他们一个面容(个性);他引领他们发展它。

他打开他们的耳朵,启蒙他们。

他是向导之师,他告诉他们路在何方。

人们依赖于他。

他在他人面前放一面镜子;他让他们谨慎和小心;他使他们心中出现一个面容(个性)。

他管理事物,他使之运行有序,他做出安排并发出命令。

他发出的光照亮世界。

他知道上天和阴间的事。

他是个严肃的人。

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安慰、纠正和教诲。

感谢他,他使人变得有人性并获得严格的教育。

他安慰心灵,安慰民众,给予帮助,给予治疗,使每个人都康复。

己要死时,他会重新再造出来,他通过使骨头重新充满活力而拯救死者。围绕着魁扎尔科亚特尔,发展出了一个戏剧化的神话,它讲述了 191
他的奇迹般的出生,他对其父的死给予报复,他对祭司的培训,他作为神圣的国王施以的统治,他的帝国的没落,他的飞行,他对有朝一日从东方返回的允诺,恢复他的统治与世界的繁荣昌盛。这个故事被阿兹台克的皇帝摩克特祖马二世(Moctezuma II)重新讲述,他认

为乘着装饰有羽毛的船的赫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es),就是魁扎尔科亚特尔,他重返归来恢复他的王国。但那已是后来的故事。

此外还有凶猛的武士神维奇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南方的蜂鸟,他和特拉洛克(Tlaloc)——雨神,阿兹台克帝国和整个世界的丰产源泉——在一起,被供奉在首都大金字塔圣殿的顶部。他接受很多祭祀。他是女神科亚特利库埃神奇怀孕而生的儿子。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阿兹台克人的世界观里,战争与丰产密切相关,捕获俘虏以用于人祭已成为政治扩张的动力。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由皇帝本人主持的帝国的核心仪式是人祭,在仪式中,要把牺牲的胸膛打开,掏出还在跳动的心脏,将其撕裂献给神灵。这是一种阴森森的仪式,会使我们看不到城市本身的美:众多湖泊中间肥沃的谷地,高耸入云的山峰(特拉洛克在那里布雨),斜坡上的花园,精心栽培的蔬菜和水果,城市的几何图形布局,城中的白房子和大金字塔圣殿以及充足的阳光。它的弱点在于集权和对战争的承诺,它或迟或早会造就出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明,具有一种相当悲观的世界观,它部分地依赖于先前文化(托尔特克人的和其他人的)的成就,与如今已被毁坏的马雅文明密切相关。显而易见的是,玉米乃是美洲人最主要的食物,而种植玉米的技艺,使人们有机会利用农业的剩余产品创造伟大的城市中心,美丽的和精雕细刻的艺术品,以及奢侈的宗教崇拜。

北　美

当我们从伟大的都市文明向北方看时,我们碰到的文化也是以定居的农业为基础的文化,而玉米则是核心的农产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人(Pueblo),他们已经运用灌溉技术来增强他们的农业。还有其他的群体,诸如阿帕切人(Apache)和纳瓦霍人(Navajo),他们既有农业,也从事狩猎,此外,还有一些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的群体。在西部,加利福尼亚和西北太平洋沿岸,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其中许多与大海和在海上捕鱼为生有关。在东南部,有

河流冲积而成的富饶的农业用地，这一地区被分成若干首领的辖地，某些辖地还相当的大。东北地区的生活以狩猎为主要特征，那里有茂密的树林，其间有丰富的生命，但是也耕种“三姐妹”：玉米、豆和南瓜。 192

在大平原，即深入到现在加拿大的地区和美国的中部地带，在西班牙人将马引入此地后，明显地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围猎野牛。在此之前，是园艺与游牧结合，包括狩猎和采集。在这一地区内，各种不同的群体比其他地区的群体更互助合作，因此，他们形成了地域广大的部落，并发展出一种跨语言交流的手势语。最后，在遥远的北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群体，包括北极灵巧的伊努伊特人（Inuit），他们已经征服了变化多端的生存环境。

显然，如此不同的经济条件，如此不同的语言群体，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将四个群体作为典型来考察，也许是有助益的：西南部的霍皮人（Hopi），东北部的易洛魁人（Iroquois），大平原的拉科塔人（Lakota）和北方的伊努伊特人。在霍皮人中，我将重点论述宗教的社会组织层面和物质层面；在易洛魁人中，我关注的是经验、教义和伦理道德的层面；在拉科塔人中，我强调的是仪式的层面；在伊努伊特人中，我将侧重的是神话层面。

霍皮人的社会

在这种阐述中，霍皮人可以作为一个居住在小城镇和乡村的具有较广大群体的典型，同样知名的还有普韦布洛人。他们出于仪式的目的，以一种相当于家庭的方式，通过一定数量的不同社团的存在（每一个社团都必须实行一种特定的仪式）而被组织起来，这一点非常有趣。每一个群体中，都有祭司和常人，由于他们的“演出”都被整合到年度的循环中，具有某种程度的令人高兴的竞争气氛，因而确保形成某种较高水平的仪礼。仪式社会本身具有不同的层次，因而年轻人可以逐步通过它们获得前辈的地位。男性在16岁时加入四个主要的男性群体，而女性亦在此年龄加入女性的社团。有一种比较排他的男性社团，其组织化程度高度复杂，而且在冬至时节举行非常重要的仪礼，届时太阳的方向必需改变，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需要

在普遍的宇宙和谐中更新和重新整合。

霍皮人最关心的当然是玉米。玉米是生命的物质，而抛撒玉米饭，则具有圣化(sanctifying)的力量，如同基督教仪礼中水的作用。祈祷伴随着玉米的抛撒。当一个孩子降生时，要献上两个完好的玉米穗。如此等等。

霍皮人的仪式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卡奇纳(kachina)或面具，它由布料制成，上面画有彩绘，通过卡奇纳，霍皮人的"表演者"充当了内在于面具之中的精灵的中介。这是一种受舞蹈者驱使
193 的偶像。卡奇纳赋予超自然的精灵、死者、云(在他们看来是精灵的存在)的整个范围以形象；因此，表演关于人的神圣叙事，形成社会舆论，颂扬神灵，并给人们带来好运，都成为可能。从冬至开始的一段特殊时间，是卡奇纳时期，当这个时期结束时，神圣面具的其他相关用具都被送回山中的小屋，以待来年再用。在这种方式中，宗教的物质和偶像层面，赋予生命的形式，因为只有在仪式中，个人在穿戴面具的时间里会被精灵附体，而这些面具本身也就有了效用。这是一种神圣的芭蕾舞，它需要通过面具获得物质的显现。

易洛魁人的宇宙论，经验和伦理道德

对于易洛魁人来说，世界出于孪生子的创造：他们一个是善良，另一个是邪恶。善良不仅在宇宙中行善，而且还安排了人间习俗，它们以天界的优点为楷模。邪恶创造了扭曲的东西，令人惊恐的东西和反对生命的东西。他像冰一样的坚硬和冷酷。孪生子创造了善恶二方面的精神力量存在于世上。所以，易洛魁人的宗教的根本动力，在于避开邪恶的影响，促进善良所创造的善良的力量。

这些精神的力量可以被直接地经验到，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于幻觉和梦境给予极大的关注。尤其是梦境，受到特别认真的关注，因为它们会显示个人或群体将要遇到的好事或坏事。在这方面，如同在北美和南美的其他地方一样，萨满教十分重要：萨满只是一个具有
194 超常洞察和梦幻能力的人。通过梦境，一个人可以和将要作为他的朋友或守护神灵的某种精灵建立联系。与这种力量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疾病经常是这种友谊破裂的结果。它也是在一个人

的内部,在身体与精神之间发生异化的结果。梦境可以提供一个人的灵魂之秘密渴望的线索,而这种渴望是必须满足的。所以对梦境的分析就成为重要之事,成为解梦仪式的主题。

易洛魁人居住在家族群体共同拥有的长房子里。这是出于对相互合作做事情的强调。也许并不值得奇怪,在18世纪时,易洛魁人已经在较大的规模上形成了六个部落联盟:莫霍克人(Mohawk),奥内达人(Oneida),奥农达加人(Onondaga),卡尤加人(Cayuga),塞纳卡人(Seneca)和塔斯卡洛拉人(Tuscarora)。二元论的宇宙观也强调了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这是生命的方面,而邪恶的和坏的意图,则属于死亡的方面。易洛魁人与其他的许多美洲土著一样,将大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看作某种需要促进和提升的东西。在此观念中有一种伦理道德的情感,它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东北部森林地带生活的人们,会因其猎杀动物和收割植物而向大自然道歉。道歉还会指向被猎杀的动物,或指向个体动物所代表的集体精灵,与此相似,人们在砍倒一棵树时,也会向树精灵道歉。

易洛魁人的伦理道德观,还表现在他们的最基本崇拜形式中,即对他们所最为关注的精灵或力量的感恩。弥漫在世界之中的神圣力量之善的体现,必须给予感谢,因为它们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与此相反,以妖术而邪恶地运用仪式,则遭到反对。

团体的观念通过为死者举行的仪式而得以强化。比如,在每年一度的为死者举行的宴会上,食物要与幽灵一起分享,而且还要唱歌跳舞以使他们高兴。分享食物具有某种圣餐的特征。除了这类高级宴会之外,还有许多为死者举行的家宴。

拉科塔人的仪式

拉科塔人原来居住在西部的明尼苏达州,但是在18世纪初,他们从遥远的西部移居到了大平原。这是北美各民族大迁徙和大分裂的时期,在东北部和大平原地区更是如此。拉科塔人移居的结果,是他们的经济生活发生变化:他们现在主要是骑马猎杀野牛。由定居在湖畔到游牧生活的改变,导致了他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的改变。然而,他们保留了七种重要的仪式,其中某些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是

普遍见之于北美广阔大地中的仪式的典型代表。我将重点描述其中的三个。

第一个是出汗小屋(Sweat Lodge)的仪式。出汗小屋是用带皮
195 的小树搭建起来的半圆形建筑，它代表着拉科塔人的世界的形状。小屋里放着炽热的石头，往石头上浇水会产生蒸汽。一个人呆在这种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就会出汗；但这也会使他的精灵充满活力，他会受到超自然物的来访，并使他产生幻觉，由此找到集体和个人所关注的事情的线索。由此巫医可获得一种理解，而这种理解会致使患病的人在他或她的照料下得以康复。

萨满神歌(夸扣特尔印第安人)

"我靠天上的魔力，消失在世界的边缘里面，法宝，哈，呜，嚯。

只有当我被他治疗时，他真正地进入到我身体里，瑙亚拉库米(Naualakume)的过去生命的传递者，法宝，哈，呜，嚯。

我现在以瑙亚拉库米的治疗方法来治疗，法宝。所以我变成一个生命的传递者，哈，呜，嚯。

我现在手中有了瑙亚拉库米赋予的生命之水，这是带来生命的东西，法宝，哈，呜，嚯。"

尔后莱比德(Lebid)唱起他的另一首神歌：

"他转向右边，可怜的人，这是个超自然者，由此可以获得超自然的东西，哈，呜，嚯。

让超自然者成为生命的传递者，超自然者，哈，呜，嚯。

那个可怜人，以在瑙亚拉库米的生命传递者的帮助下，获得生命，哈，呜，嚯。

可怜的人活过来了，超自然者，用瑙亚拉库米给予保护的手段，给予保护，哈，呜，嚯。"

拉科塔人的第二个主要的仪式是寻求幻觉，此种观念与出汗小屋的仪式并无关联。一个人面向前方地坐在山腰的浅洞里，几天里不吃不喝。他通常会获得一种幻觉，然后由一位巫医为他做出解释。

第三种仪式是太阳舞，它在拉科塔仪式中最为重要。一棵树通过仪式被砍倒，用作代表宇宙之小屋的中心轴。在整个一天中，跳舞

者绕着小屋的外围边跳边转，同时尽可能不间断地盯着太阳。他们中的某些人将系在中心柱上的钩子挂在自己的胸膛上。在他们进行这种献祭的行为时，受到乐手的战歌和鼓声的激励。来自不同部落的家庭和群体，坐在小屋周围，以壮声势，构成一种神圣的场景。整个过程中的象征（与丰产相关）十分重要，因为太阳作为一种源泉，同时，小屋的中心轴（即宇宙之轴）具有生殖器的意义。跳舞者使他们自己和宇宙秘密的核心紧密相连，为仲夏的大狩猎做好准备，那将使整个群体的食物和生命变得充满。这种仪式或是与游牧群体的形成一起产生——或产生于古老的时代——无论如何，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196

出汗小屋，寻求幻觉和太阳舞这些仪式的主题，在美洲土著人中有着更普遍的意义。它们有着萨满教的基础，是弥漫于美洲的主题。

伊努伊特人的神话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北极地区的伊努伊特人的生活，是一种艰难的生活，它不得不与伊努伊特人赖以生存的海豹和其他海洋动物密切相关。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至少在东部的伊努伊特人中，广泛流传着海洋动物的女主人或海洋女神的故事。在许多文化中，动物之主人或女主人的形象，都十分重要（想想湿婆和俄耳甫斯）。但是在伊努伊特人中，有一则奇怪的故事，它讲述了海洋动物，诸如海豹、鲸和海象是如何产生的。当海洋女神还是个姑娘时，她中了海燕的诡计而与之结婚，他把她带到他的陆地，在那里她过得很悲惨。她的父亲前去营救她，用小划子带着她返回，海燕掀起暴风雨威吓他们。为了使海燕息怒，做父亲的把女儿抛进了大海，但是她抓住小船不放，父亲开始砍断她的手指：指尖掉了以后，她又用剩下的部分继续抓住，如此等等。而砍掉的手指就变成了不同的物种，小海豹、长胡须的海豹，等等。海洋女神沉到了海底，现在她还活在那里。

故事的道德寓意在于，假如你做了冒犯海洋女神的事情，她将扣留你所捕获的动物。有时人们认为人的冒犯会产生脏东西，这些脏东西会卡在女神的头发里，由于她没有手指，她不能梳理头发，所以会变得很不舒服。这时需要一位萨满潜入海底到她的住所。在与她

搏斗之后，他为她梳理头发，尔后她会释放扣留的动物。在某些伊努伊特文化里，还有对海洋女神的象征性献祭，以保证每年的丰收。

诸如海洋女神之类的神话证明了这样一种观念：在一个物种或一系列物种（伊努伊特人狩猎的动物）的背后，都有一位精灵，因而如果要想满足我们全年丰衣足食的渴望的话，就不得不与精灵建立友善的关系。在此地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萨满教占有重要的地位。

假如在美洲有什么普遍的主题的话，那就是萨满教。特诺奇蒂特兰的神圣中心，太阳舞中竖立的杆柱，都被证明是“宇宙之轴”的象征。出汗小屋和古代秘鲁的麻醉品，都被证明是“寻求幻觉”。祭司和治疗者（也是掌握丰产之秘密者）的形象，是古代世界重要的象征之一。

第八章 古代近东

概 况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大致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区——和古代埃及一道创造了璀璨的城市文明。前一个地区的先行者是苏美尔(Sumer),但开拓的荣耀首先归于巴比伦(Babylon),然后又属于其继承者波斯。向西是迦南人(Canaanites)和腓尼基(Phoenicia)的繁盛,自腓尼基始,北非的殖民地陆续开辟出来,形成一个迦太基(Carthaginian)国。另有其他的角色活动于这一历史剧幕之上:亚述(Assyrian)帝国、部分印欧民族如赫梯人(Hittites)等出没于北部地区,而局促在这些强权之间的民族,则是以色列人(Israelites)。 197

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身处同一发展序列,自从后两个帝国借用前者的宗教形式以来就一直如此。而从根本上讲,迦南和腓尼基的宗教也是这样。出于简化叙述的目的,我们可以设想小小的以色列是由迦南人、美索不达米亚诸宗教以及埃及所簇拥的中心。以色列对于我们而言意义重大,其原因在于它的宗教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而言都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对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因而,如今看来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也已埋葬于时间的沙砾之中,古代的埃及文化只见于博物馆和沙漠中的巨大石碑之间,大半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文明业已消失,惟有一泓流淌着的溪流从约旦河谷一直淌到我们跟前。

然而逝去的种种宗教依然值得人们敬奉:基于这一缘由,我们至少应当简略概括一下以色列宗教之外古代近东各种宗教的某些特征。我们拥有一些书面记录,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到其远古的精神世界;只是这种回溯还得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部分留在记忆中的基础材料开列如下:首先是公元前3000年代形成于苏美尔地区的城市文化,位置坐落在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



阿淑尔(Assur)成为亚述帝国的庇护神，集政治权力与精神力量于一身。该神祇的非人形象突出了与人类的差异性。

发拉底河(Euphrates)下游以及波斯湾顶部。到公元前 1700 年，在 199
巴比伦出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王朝，其治域辖阿卡德(Akkad)与苏美尔诸地区。这个巴比伦第一王朝于公元前 1595 年被赫梯人颠覆。约从公元前 1300 年起，亚述及其京都尼尼微(Nineveh)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势力，实际上也就征服了巴比伦；亚述享国直至公元前 612 年，这一年尼尼微陷落。随即巴比伦也被波斯人占领，波斯人逐渐统治整个地区直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 336—前 323 年在位)来临。同时埃及文明也从约公元前 3100 年发展起来，肇始者即第一王朝。在各个时期，埃及帝国延及亚洲的疆域直抵亚述，也显得气魄非凡。自公元前 500 年前不久起，这一国度的历史变幻不定，其间一度置于波斯人统治之下，然后是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及其部将——和罗马人治下。在公元前 1000 年之后，腓尼基人在北非创建了迦太基(Carthage)和乌提卡(Utica)以及南部西班牙的其它一些定居点。

美索不达米亚宗教

万神殿神灵述略

就其性质而言，我们并没有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完整信息，但我们却有各种各样的颂歌和神话，它们反映出这个成员丰富的万神殿中部分神灵，其中以大神安努(An/Anu)为首，他也是献祭仪式(priestly ritual)的焦点之所在。安努早先是名义上的神灵领袖，
风之主恩利尔(Enlil)后逐渐扮演了这一角色；而随着巴比伦第一王 200
朝的建立，马尔都克(Marduk，巴比伦当地敬奉的神祇)也就被抬升至这一崇高地位。

恩利尔是古代苏美尔宗教中心尼普尔(Nippur)的神祇。他是运动的气流，将雨露从高山导引下来降洒在平原之上；离开了他，谷物就不能生长；也就不能创造出财富来满足恩利尔崇拜者们引以为自豪的璀璨城市文化的需要。风雨又具有破坏性，故其仁慈神性又不能一以贯之。但总的来看，这些颂歌都将其称颂为仁德慈悲充满父爱。此外他还掌握着多种表册，判决着人类的种种命运。众多神灵

都进入他的城邸朝觐他。他的配偶是风之主妇宁利尔(Ninlil),各种不同的版本却谈及恩利尔追求她的韵事。在其中一个版本中,恩利尔扮作摆渡人模样,在去往冥界必须跨越的河流上勾引宁利尔。

要是恩利尔的模样慈爱亲切,那么恩基(Enki,阿卡德版本中是埃亚 Ea)就显得狡黠谐趣。他是地泉之神,从地下涌出浇灌土地:(苏美尔人的宇宙观认为,地下是一片广阔的淡水海洋。苏美尔人的农业自然是倚仗灌溉,这样的观点就能解释清泉的喷涌和掘井的功用。)神话中的恩基才思敏捷。譬如,原初的人阿达帕(Adapa)冒犯大神安努,折断了南风的翼翅;恩基遂建议他说动在安努宫廷充任门卫的两个神替他说情。但他与安努一道时再不可吃喝了。那两个门神照此而做,阿达帕得到宽恕,他也就不再吃喝。有人问及其缘故时,他就谈及恩基的建议。在这方面安努甚感恼意。他明白食物和饮料就如恩基宣称的那样,不再招致死亡而能带来永生,这可是恩基原先所没料到的。

在近东以及后来的罗马世界,影响巨大的另一个实力神灵是伊南娜(Inanna),阿卡德人称之为伊施塔(Ishtar),在亚述则称为阿斯塔忒(Astarte)。她是一个丰产神,与阵雨和雷电相伴,同时也是战神。她又是一个神妓且由众神婢侍奉。她甚至还被奉为天后,成为安努的配偶,不过她通常被描绘成嫁与美少年塔穆兹(Tammuz)。在一个著名的传说中,她冀望成为冥界主妇,但冥界女神击败并杀死了她。她遂变成一块腐坏的肉条。她没有返回时她的侍女四处求援:最终还是才思敏捷的恩基想出一个解救之法。他送两件生物至冥界,冥界的女主允诺满足他们一个愿望。他们求得这块腐肉,用青草和雨露滋润它——由此使伊南娜恢复原状。在这个故事中,更为错综复杂的奇险经历接踵而至,即是塔穆兹被流放于冥府代替她在此每年居留半载的故事。

最后我们来看看大神马尔都克的情况。他在某些方面类似印度万神殿中的因陀罗(Indra):都是雷暴之神,且都有类似母牛犊的模样。众神受到由提阿玛忒(Tiamat)代表的混沌危境的威胁。主神埃
201 亚和安努不能剪除威胁,有迹象表明惟有马尔都克方能成功抗击提阿玛忒。马尔都克就要求获得所有权力,众神遂赋予他一切权力。

马尔都克创造世界:选自《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泥版

众神赋予他诸神之王的实际权力,

众神确认他凌驾于天上地下的众多神祇。

安沙尔(Anshar)宣布至尊的名号阿萨鲁卢希(Asaru-luhi):

"我等诚惶诚恐敬慑于主上的威名;

主上一开言,众神皆瞩目主上。

主上的谕示经天纬地不容违逆!"

大众皆举为神嗣,我等的庇护者;

他的权威超越一切、无人可及。

愿他牧役黔首之众、他的创造物。

时日终端,没齿未忘;他们高呼他的指引。

愿他为天父举行大规模食奉仪式;

他们的奉献他们当齐备,亦当照管他们的神坛。

一场激战,提阿玛忒张开巨口欲吞噬马尔都克,但马尔都克驾驭风暴相抗并用镞矢击毙提阿玛忒。几个风神将她擒获并盛于一巨网中,马尔都克遂以其尸创造出现在的宇宙世界,先将她如治鱼般一剖两半,一半成为苍天,另一半成为大地。然后他编制历法并制定其他种种律规系统,遂被众神推为领袖。

神话恭贺马尔都克之城巴比伦及其领袖权威的确立。但神话也反映了创世建立秩序、世界始于混沌提阿玛忒的观念。这一创世史诗名曰《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赞誉的是马尔都克的胜利,为每年在巴比伦举行的大型开春庆典中表现典礼仪规和饰演叙事的一种稿本。它经常是被20世纪伊始影响巨大的"神话与仪礼"学派的学者们征引,用以显示我们如何能够透彻地理解与仪礼相关的神话。

崇拜与神庙

在我们视为样本处理的一部分神话作品中,可以见到与大型庙

字仪式过程相关联的内容,这些大型庙宇亦即塔庙,就是修筑于美索不达米亚、举行官方宗教活动的场所。塔庙修筑在高地之上,本身也有突兀而起的结构,从而连接着天和地。神灵居住在其顶端。圣经中关于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的故事(《创世记》第 11 章)反映的是巴比伦塔庙的情况(因为巴别即是巴比伦)。居于此处的神灵因人群而存在并与他们的福祉关系密切。或许,日常的种种祭典与后来印度流行的情况类似,印度的神灵及其配偶均有着衣、洗沐等等行为。在各种大型节庆活动中可能还进行喧嚣的戏剧展演,其基础就是流传至今的神话。这些仪式也涉及君王,他因一种圣婚仪式而成为相关神祇,以确保国家的繁盛。

然而有些神话更多的是具有自由文学创造的性质,却不一定直接关涉仪式。这种情况体现在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202 *of Gilgamesh*)中,这部史诗表明吉尔伽美什是如何陷于因朋友恩奇都(Enkidu)去世而引发面对死亡的巨大悲痛中,从而着手寻访他的一个远祖——智者乌特纳皮什提姆(Utnapishtim)以求克服死亡的。但乌特纳皮什提姆并不乐于赋予:他建议吉尔伽美什尝试着克服睡眠,说睡眠也就是死亡的小兄弟而已。但吉尔伽美什做不到,故而意识到了这一宿命真理:死亡必定降临每一个人。这部史诗因而也就传递了一个宗教中的大问题,人类的命运必须直而死亡。(该史诗也叙述了对圣经故事有一定影响的洪水。)

就这一点而言,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古埃及人的经验,这些经验更多地涉及死亡的性质以及人类对长生的需求。

古代埃及

我们的想像总是被静默的巨大金字塔群所萦绕,这些金字塔中有最早建于开罗以南萨卡拉(Saqqara)的,也有 200 年之后建于吉萨(Giza)的胡夫(Cheop)大金字塔。它们矗立在那里,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就像人造的斯芬克斯(Sphinx)雕像一样是个谜。这种神秘性在于,如此巨大的努力以及精确的工艺竟是用来修筑陵墓——并且是具有这种特殊几何设计的陵墓。在将此与古埃及人极其擅长的木

乃伊制作技术相提并论之时，我们就会意识到，一种文明在明了死亡之本性的同时又企盼死后复活时是多么的忧心忡忡。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些出色的雕像制作表达出一种铭记不忘的愿望。

古埃及逐渐形成和完备的时代是在第一王朝时期，该王朝是由美尼斯(Menes)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统上下埃及并定新都于孟菲斯(Memphis)时建立的。到第四王朝时期，约在公元前2600年时，就有多种资源用来建造吉萨金字塔群了(就在开罗城外围)。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80年之间，埃及陷入混乱并被亚洲侵略者喜克索斯人(Hyksos)部分占领，而这却助长了埃及人对亚洲的觊觎之心，其目的即是在西奈另一侧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对抗远道而来的入侵。一个稍晚的法老埃赫纳吞(Akhenaten，公元前1356—前1339年在位)试图倡行一种新的一神教并把都城迁至阿玛尔纳(Amarna)，以便压制旧的阿蒙(Amun)神崇拜。但他的行动并未取得成功。在公元前946—前727年间，埃及由利比亚出身的诸法老所统治，而在公元前664—前525年间由埃塞俄比亚人所统治；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又两度被波斯人占领。但即使是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占据之后，古埃及文化仍然保持了一种强势的连续性；在第一王朝时出现的某些模式一直绵延不绝。 203

或许，古埃及人最伟大的文献是被后世称为《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的那些东西，但对此更为正确的称呼应当是《日进之书》(*The Book of Going Forth by Day*)。其材料是基于相对更早的所谓棺椁铭文，因而其部分内容甚为古老；同时《亡灵书》又表现了古埃及人对死亡的本质以及死而复生途径的标准看法。这类文书随死者在下葬时一同放置，以有助于他们通过生后的判决。其神话性的场景为其过程作一铺垫，包括了奥西里斯(Osiris)神的生前、死后以及复活情形。太阳大神拉(Re)通常与城邦神祇合并一处而以阿蒙—拉神等等形式出现，奥西里斯与之毗邻，无疑也就是古埃及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神祇。到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50—前1750年之间)，此时《日进之书》业已集成，在奥西里斯安葬之处阿比多斯(Abydos)兴起的一种圣剧，成为多种虔敬的焦点，在这种虔诚活动中，参与者将自己视为奥西里斯，这种活动在罗马时期仍旧流行。法老生时被尊

为奥西里斯之子荷鲁斯(Horus),号称"在世荷鲁斯",法老崩后即被视为奥西里斯本人。

关于奥西里斯影响巨大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古代世界对基督教故事的接受提供了一定的准备,其情形一如下述。奥西里斯之弟塞特(Seth)让人制作了一口精美的棺椁。他备下盛宴并对赴宴的客人允诺,要将此棺椁赠予身体与之相适合者。只有奥西里斯一人身体与之刚好适合,而当他一躺进去,塞特就命人将棺盖盖上。他用铅封死棺椁并使人抛人尼罗河。最终棺椁漂至河岸另一侧,在这里它被神色仓皇的奥西里斯之妻伊西斯(Isis)所发现。她将其身体复原,而塞特又弄到这具身体并将其剁成几块遍撒埃及。伊西斯又将这些肢块一一找回——只遗落了生殖器,她就用了一件替代品——从而重新创造出奥西里斯。在给他的身体涂抹防腐剂之前,伊西斯先赋予他新的生命——奥西里斯遂与她交媾,从而孕育了他们的儿子荷鲁斯。后来荷鲁斯最终战败塞特,但在战斗中损伤了自己的一只眼睛。故而他的正常眼睛被等同于太阳,而失明的眼睛则是月亮。与太阳的关系又纠缠着对大神拉的崇拜。荷鲁斯常常被视为鹰隼,他展开翼翅而不为人所见(但对意念之眼例外),其翼翅笼罩着整个天空。

奥西里斯战胜了死亡,成为死亡的支配神并主宰着对死者进行木乃伊处理的过程。因而奥西里斯也就在来世对死者进行判决,部
204 分有关细节在《日进之书》中多有描述。死者的灵魂用真理之羽来衡量:这一利用天平进行判决的观念成为广为使用的譬喻。在《亡灵书》第 125 章有一份关于元素的程式化声明,它将会提交给 42 个判官审议,我们从中可以很好领略古埃及的伦理观。人们可以声称他未偷窃、不贪婪、未杀人、未损粮秣量度、未撒谎、未犯罪愆、未牟暴利、未搬弄是非、未行苟且、未诱奸小孩、未忤逆犯上,不一而足。该程式的目的是确保判官能让死者通过,从而能够在面对奥西里斯和拉神时获得新生。仪礼的其他部分也能够帮助死者:可以防止其主人心口不一的圣甲虫胸饰,如众仆役的小雕像等等。

奥西里斯也以丰产神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神话中,他的复活与庄稼经历冬天的"死寂"后,在春夏两季的发芽抽叶相联系,他与太阳神

拉的联系有助于突出丰产能力，原因是太阳激发并哺育了庄稼的生长。

埃及干燥的气候和棺椁密封的技术（技术之一我们知道，就是复原奥西里斯）以及涂抹防腐剂，都意味着保存死尸是埃及一项技艺领先的成就。尽管这是一个花销不菲的过程，但几个世纪以降，奥西里斯崇拜仍然逐渐流行开来。

在古埃及人的思想中有两种灵魂在起作用。其一是巴（ba），用象形文字描述是一只死亡时振翅向天的小鸟；其二是阿赫（akh）或魂灵，存留于来世。每个人都应当拥有一些咒语和别的预防措施，以使他的阿赫可以得到完善。阿赫实际上是个体熠熠生辉的状态。这些荣耀的先祖也逐渐成为死者崇拜的焦点，这与别的某些社群一样。

我们在以上诸情况中看到了古埃及人经历中各种要素的汇集：一种神化王权的观念，与之相联系的一种意识倾向于保留驾崩的诸法老；制作木乃伊的技术以及其他种种加工处理以保存死者的过程；建造大型陵寝，尤其是金字塔的各种资源（大概太阳崇拜与之相关联，原因是金字塔的形状表征着太阳光芒的照射）；一半是魂灵的来世观；崇拜垂死而升天的神祇奥西里斯；可以决定不朽的是伦理价值观，即使是生活上有一些瑕疵，也能借助陵寝文献中的法术和其它良好建议绕开。埃及对死者处理的坦荡与《吉尔伽美什史诗》中乌特纳皮什提姆相对悲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迦南宗教

自迦南人占据叙利亚部分地区以及历经一个长久时段成为今日巴勒斯坦的地域以来，与以色列人的势力相重叠，又诞生出沙漠地区的宗教——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宗教，要理解该宗教在整体上与地中海文化相关联，而成为一类以色列宗教的对等物，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该宗教在现代世界并未留下什么显著痕迹，但在遍览闪米特宗教时例外。

我们对迦南宗教的大多数确凿认识来自发掘乌伽里特（Ugarit）城市时出土的文献，该城市位于叙利亚沙漠的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其万神殿跟古代近东其它地方的一样十分复杂。为首的是埃尔(El)或称大神,但最具影响的势力是主神巴力(Baal),他与天气和降雨有关,也赐予人们生殖力。诸女神中的阿提拉忒(Athirat)是埃尔的配偶,处于维护自己神圣后代的地位而常怀嫉妒;还有阿纳忒(Anat),她是暴戾的情爱与征战之神,是巴力的姊妹,或许还是他的配偶。巴力有三大劲敌:雅姆(Yamm),有巨大的海怪相伴;利坦(Litan),即圣经中所说的另一大海怪利维坦(Leviathan);以及图南(Tunnan),亦即圣经中的坦宁(Tannin)。

这些故事中有涉及巴力的一个系列,透露出迦南宗教中的一大主题,也使我们想到了奥西里斯神话。巴力与海神相斗,用魔杖置之于死地。海神无疑就是混沌纷乱和不可控因素的代表,但战胜海神
206 还不够,还有最后的夙敌死神,他同其他神祇一样是巴力之子。巴力遣使至死神处,但死神却回应道,巴力也得像其他生灵一样生老病死,巴力屈服了,授之以自己的武器——云霭、电击、雨露以及别的类似物。巴力死去的消息激发了阿纳忒要为他做点儿什么。她埋葬了丈夫,便激烈攻击死神,用剑劈之、用筛筛之、用火焚之、用磨碾之,并将其撒播于田间。巴力得以恢复生命力。整个故事自然充满了神祇死生变换的观念,神灵的死去和复活对应着年份上的某些农业事实。这是神话,如同埃及的类似题材一样,都是与死亡和丰产相关涉,也涉及人类的生活和植物的供应。

从这一故事和其他材料中显然可以看出,迦南宗教仪礼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季节的丰产性。但这些文献表明有不少别的情况存在。在许多仪礼中,君王沐浴净身后向诸神敬奉供品。另一描述过的仪式则敬献牡牛与巴力神,以求其佑助克敌制胜。而第三种情况是乌伽里特的所有居民聚集于此,为他们的过失举行公共性赎罪活动,其目的是赢得安全不受敌方侵犯。有些神话——大概是巴力和死神的神话——也在神圣的仪式上进行戏剧性的表演。其它仪式则是种种崇拜的具体物像从一个地方挪移到另一个地方。

腓尼基宗教的某些变化

209 通常,腓尼基宗教中引出的也是类似主题。特别重要的是主神



摩尼之死。波斯人摩尼(216—276)创立的宗教主张必然有终极的普遍启示。他的主张以摩尼教训诫闻名于世,具有广泛的影响,对诺斯替教很有影响,也委实反映了部分诺斯替思想。

巴力,因为他除了使田地肥沃以外还指引着腓尼基航海者,他们远离

家乡,在东地中海(黎凡特[Levant]地区)闯荡游弋。女性主神是阿斯塔忒,她既是战争女神又是丰产象征。她有许多渊源,或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施塔、迦南的阿纳忒,或者另有出处。她常常就被简单称为"女主",在推罗(Tyre)和西顿(Sidon)以及新建大都会迦太基均受尊崇。该女神也见于马耳他、西西里及塞浦路斯(从这里衍生出其希腊姊妹,一般就认为是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还有多种多样垂死的和新生的神祇,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阿多尼斯(Adonis)了,有关他的种种仪式主宰着比布洛斯(Byblos)城。其名意即"主子",同样的名号也用于以色列宗教中,即阿多奈(adonai)。

虽然关于阿多尼斯以及其他神灵的多种仪式都有农业渊源,但很明显的是他们也逐步具有更为人性化的个体意义,因而牺牲者参与祭奠神灵死亡的哀伤情形以及庆贺他们复生的狂欢仪式,都能共享这种神圣事件,因而也共贺神祇的新生。

我已经强调过,在概览古代近东丰富的宗教遗产中,突出的就是死亡态度的宣示。这部分是因为死亡正处于公共及私人生活中的重合位置;我已经表明,即使是在闪米特世界的古代宗教中最为光辉灿烂的集体性方面,也已经具有或是发展出了个体的意义——至少对于那些有财力参与仪式的个人而言。或许也是这种垂死以及新生神灵的有关主题,为这一地区接受基督教预设了途径。但另有一主题却与以色列人的习俗和思维方式相冲突,即关于丰产女神的观念,以及一般意义上对丰产性的崇拜。该观念多少不为以色列的先知们所接受,但其明显的重要性却体现在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中,这些国家立足于农业,且从丰收中寻求额外财富,以便支付其日渐兴盛的城市庙堂之需要。

以色列宗教

开　端

现在来看看以色列的历史,这里提供的材料、尤其是记载在圣经各卷中的材料,在其反映的社会也已不存的漫长时间之后,仍然在宗教方面显得作用非凡。也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犹太教、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都追溯到亚伯拉罕(Abraham)和以色列人的宗教——故而就得考虑考虑,譬如说,摩西(Moses)是不是犹太教的创始人——严格说来我们所知的犹太教其实并不存在。在犹太人和其先辈以色列人之间,具有某些历史性的或是其它什么联系都毋庸置疑;但在我们谈及的时间段里,自公元前1200年起,或是自此以降至亚历山大之时(大约前330年左右),曾经存在的便是宗教发展之溪流,它向前淌进,且在久远的后世汇聚成犹太教,这大致是在基督教的古典形式初成之时,亦即耶稣诞生后三四世纪。 210

我们所知关于以色列故事的大多数都是取自圣经,考古学在颇有拓展之后也有补充作用。根据各种宗教历史的延伸,我们就可以利用圣经的叙述来构建出以色列人中间种种信仰演进的清晰解释;然而将它作为源头来利用,我们不得不审慎,在这本书中我们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利用其他经文传统的。

以色列人的宗教涉及的最早时段是史前时期:即父权制时期,始于传说中的亚伯拉罕(Avraham/Abraham),他来自苏美尔地区迦勒底人(Chaldees)的乌尔(Ur)城。其主神被描述为埃尔(也就是我们所知的迦南人最高级神祇的名号)。其子以撒(Yitshaq/Isaac)乃雅各(Ya'akov/Jacob)之父,他有多种惊险经历:一次他梦见一部梯子直通天境,便称他见到天梯的地方为伯特利(Bethel)或曰神所,这里后来成为以色列北部的崇拜中心,排名在耶路撒冷之前。在以撒游历美索不达米亚后返回途中,与一个神秘人物进行了一场摔跌,他的名字就改为以色列(Yisra'el)。他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就是以色列十二部落之名,这些部落形成一个联盟,通过争斗成功他占据了巴勒斯坦南北两部分。

与这一模棱漫漶的早期时代有关的许多故事在虔信者心目中仍然生机蓬勃,他们回顾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虔信上帝,故而甘愿献其独子作为牺牲;罗得(Lot)之妻是如何变为盐柱的;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的邪恶之城是如何毁灭的。但我们对那场暴动之前的宗教形态却委实知之甚少,这场暴动大致是由那些为埃及人服苦役的以色列人首领发动的,随后他们途径西奈半岛逃了出去。他们征服了迦南之地,凭借的是一种新的宗教意识,该宗教

只信奉惟一真神，他们称该神为雅威或雅赫维(Yahweh，该神在西方通常称为耶和华[Jehovah]，这是对其希伯来名称一个部分拉丁化的说法)。学者们还未确定摩西(Mosheh/Moses)生活的时代，但该时代或许是在公元前1300年后不久。

摩西革命和进入迦南

关于摩西的整个故事似乎是个合成品，在我们谙识之时就已通过叙述将不同的流传形式和思想编织在一起了，这个传说大致有三到四种来源：《申命记》(the Book of Deuteronomy)；学者们称之为"J(表示耶和华)"的材料——因为其中突出的是雅赫维的构思；关系密切的"E"(这里是用名称Elohim表示神祇而非雅赫维)；以及所谓的祭司材料或曰"P"。这些大概都是在公元前700—前400年间形成
211 的。在讨论文本来源和构成时，许多东西都是推测的。不过摩西委实是个革新型的领袖，他实际上就促进了对雅赫维忠诚信仰的接受，这种信仰又成为以色列人正式宗教的标志，并作为一神教信仰的显著形式脱颖而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奠下一方巨大的铭志。



摩西授予以色列人十诫，出自中世纪早期的圣经。

出埃及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要遵守安息日，因为这是我和你们之间遍及各代的标志，你们应当知道，我，耶和华，将会净化你们。你们要谨守安息日，因为它对你们是神圣的；你们中每一个亵渎了它的人都会去死；无论谁在这一天做什么工作，他的灵魂都会与他所处的群体割裂开来。六天中工作应该完成，第七天就是庄严休息的安息日，这对耶和华来说是神圣的；无论谁在安息日这一天工作，他都会去死。

因而，以色列人就谨守安息日，他们一代代都严守安息制度，成为一个永恒的约定。这就是我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标记，耶和华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和地，第七天他要休息、恢复精力了。"①

据说摩西是在孩提时就被置于苇舟而捡得性命的，后由法老之女发现救起，因而他虽是以色列人，却如王子般在宫廷中长大。但是，由于他击毙了一个欺压以色列劳工的埃及人，他不得不逃到埃及以外的地方，即东部的沙漠地区。在那里他同一个米甸(Midian)祭司一块儿居住并成了牧人。这段时间内他可能就接受了形式略有改变的米甸宗教，该宗教的焦点是主神雅赫维。在后来他率领以色列人出走埃及时，在这个犹太人后来意识到的所谓出埃及记(Exodus，希腊语称"出奔")的重大事件中，他便带众人来到西奈山。在盘桓西奈山的这段日子里，他进而体验了一丛灌木熊熊燃烧但却未被焚毁的奇观，他又听到了雅赫维的声音，叫他在其民众的生活中起表率作用并好生侍奉上帝。这也类似以后的日子中许多先知的际遇。

就是在摩西的领导下，同其兄亚伦(Aharon/Aaron)结成联盟，他领导以色列人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出走埃及，这里依据的是圣经的叙事，随即发生了很多事故如埃及的瘟疫、逾越节与红海的分开、 212
拯救以色列人却使埃及人深受其害。这些事件自然而然在犹太人的盛大家庭节庆逾越节(the Passover)中被隆重纪念。

① 译文引自和合本圣经《出埃及记》20:22,8—11。——译注

西奈山上发生的最重要事件，就是摩西在登上山巅与隐秘的神圣存在交谈并接受约定或契约，包括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这一后来成为妥拉(Torah)，或称律法的基础性条件(我将妥拉翻译为"律法"，但有些犹太人更乐意采用其它译法诸如"训诫"：他们希望不要翻译成在他们看来是不幸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律法一词，该词在新约中与恩典[Grace]一词相对立)。因而以色列人的这种正式信仰针对惟一真神而别无他神存在，就同迦南宗教发生了冲突。

圣　殿

由摩西开始的这一进程导致了十二部落对迦南的占有，遂可以认为这块土地的很大一部分早在公元前1200年就置于他们统治之下了。最终其治理模式演变成为王国。第二任君主也就是大英雄大卫(David)，他攻下耶路撒冷并在此筑建都城。他还表示要在此建造一座中心神庙，但该庙的建造却留待其子所罗门(Shelomoh/Solomon，公元前965—前925年在位)来完成。他所建造的宏伟建筑，亦即现在所知的第一圣殿，直到公元前586年才毁坏。

圣殿的建造是一种手段，它使得以色列的所有崇拜能够集中到一个点上。其优势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方面。这就意味着专制者具有更强大的控制力(但在所罗门驾崩之时政治权力已四分五裂，南北两部分的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已经形成；以色列在其都苏美尔[Sumeria]于公元前721年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攻灭，在随后的波斯统治时期已不再存在)。耶路撒冷仍然拥有中心崇拜仪址，这颇具精神象征意义，有助于扫平散布于这片土地上众多神龛中种种不可接受的仪礼活动。圣殿后来成为惟一的仪式场所。
213 实际上，由于有所罗门王对圣殿的慷慨赏赐以及他欲使信仰兴盛的愿望，崇拜活动中就有了各种超过原本崇拜雅赫维的那些素朴需求的因素。

圣殿的建筑包括一座高大的厅堂，以雪松木为大梁和门板，门上缀有金饰。西尽头里是一扇窗棂掩映的神龛，里面供奉有古代以色列最为神圣的物事约柜(the Ark)，约柜里面贮有镌刻着十诫的石版，上面是两个金制天使。圣殿的前面有一个祭坛用于牺牲供献，

在圣殿周围以后又逐渐建立起多座醒目的建筑，都是用来存放司祭器物、服饰等等物件的。最后圣殿又被嵌入两个巨大的厅院中，有三座门房和三扶楼梯相通达。

在公元前568年该圣殿毁灭后，有1500个南部犹大王国的菁英人士被强行流亡至巴比伦。在部分流亡者于公元前538年回转之时，他们就开始在同一地址重建神庙。为此花了二十余年。在此之后，历经多次修缮增添，希律大王（Herod the Great）在公元前20年启动重修整个圣殿集合体，从而建成了一座部分具有罗马风格的精美建筑。这次重建实际上使这一时期一直在继续，于公元前70年第二圣殿毁灭时而告终。

圣殿前面的多个牺牲祭坛当时定是一派忙碌景象，而非现代人所设想的祥和宁静。大量畜禽被宰杀，血被放干，多数用于燔祭亦即整只禽兽躯体在火种焚毁。也祭献谷物和其它食物。由于圣殿渐而成为人们朝觐的必去之所，兴盛之时许多人都自愿捐资奉献，日常的宰牲规模一定不小。多数牺牲的性质都是赎罪，有人捐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一只山羊或一头绵羊，实实在在地表明他感觉到了自己以往曾经犯下的罪愆。以色列人宗教的牺牲祭献方面同其通常的崇拜一样，也集中于一尊具有伦理意义的神祇。

先知传统

在很多宗教中我们都会遭遇先知和祭司类型的角色。要是圣殿是祭司宗教核心的话，其他一些设施则是先知信仰的中心之所在。它混合了视觉、听觉以及伦理诸意义。对上帝的种种实际奉献已有先知指出，就应当是一种残破的精神和一种谦卑的心境。宗教的内质乃其生机勃发的精髓。后来犹太教一直于此有所偏重：律法的复杂性在犹太人的宗教中有很多很多的外在成分，不过就像古代中国的礼一样，这些外在成分不严格遵循内质的搏动是不起作用的。

在以色列国和犹太国曾有“官方”先知，他们的职责是在军事斗争以及类似活动之前进行种种预测。其他人则归属于老崇拜中心。但是那些大先知因其所作的教谕被纳入传统经典之中而被奉为正统，从而也就从这类组织联系中分裂出来，他们的言论也就更具个人

214 色彩。由于他们所作的声明和批评都站在官方宗教的立场之上，其偏激蛮横在他们死后仍得维护。他们的批评性警示基于个人的宗教体验，就能提供更新传统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传统都有其开销巨大的圣殿仪式以及对律法诸条款详详细细的领会把握

有很多先知可以挑出来，但我们还是来简要说说这三四个吧：阿摩司(Amos)、两个(或三个)以赛亚(Isaiah)以及耶利米(Jeremiah)。

《阿摩司记》(the Book of Amos)写定于公元前750年左右，遂又并入对这位先知第一次看见异象的阐述中。先知在祭坛边仰视神主，故而他对仪式的种种批评并非源于对牺牲崇拜的拒绝。但他却激烈批评有些人认为繁盛时期的财富来源于各种祭祀礼仪、同时也就是上帝赐福的标志。这在社会不公正之时简直就是个太过简单的看法。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奠基于以色列的社会道德责任之上。统治阶层更有清醒认识。主降临的日子并非祥和安康，而是漆黑一片。通过这么一系列方式，先知尖锐地指出了他所处时代繁荣的虚幻表面性，从而大声疾呼崇拜的种种外在表现应该与终极目的的内在价值以及对穷人的怜悯之心联系起来。

先知以赛亚(Yesha'yahu/Isaiah)生活在阿摩司所处时代之后不久。然而《以赛亚书》(the Book of Isaiah)却是一部百衲之作，包含了主要的第二部分或说是以赛亚伪书(Deutero-Isaiah，亦即第二以赛亚书)，大概还有第三部分的一小篇附着于末尾。第一部分反映公元前8世纪的内容，这是亚述人入侵的时代，第二部分则属于波斯人统治的时代。我将分别介绍以赛亚和伪以赛亚这两个先知。

以赛亚宣称他的第一次看见异象时他正处于圣殿之中，这是一次庄严而神秘的体验：

> 当乌西雅王(Uzzi'ah)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seraphim)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

>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
> 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①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主题。首先，引发先知履行职责的异象神秘而又绚烂。这并非仍在内部依旧照耀着神秘主义者或是佛陀的那种光，而是一个他者外在的双重性典范。就是这种异象使得先知感受 215
到了他自己无甚价值以及他所在的民族罪孽深重。但是该异象也成了一种呼吁：神秘的天使前来焚烧掉他口内的不洁。而以赛亚此后却心甘情愿地回应道："我在这儿呢。"

以赛亚尤其与他所在时代的两个政治阶段有关：北部王国试图取缔南部独裁者亚哈斯(Ahaz)代之以一个他们中意的，其策略符合北部政治格局的人(这就涉及到与亚述的结盟或者是与亚兰[Aram]结盟对抗亚述)；以及亚述发动的进攻耶路撒冷之战。对于以赛亚而言，历史和政治的发展决不仅限于此，但这些发展都得关涉种种筹划方略以及上帝的意旨。而对他来说，亚哈斯和大卫的承袭体制才是至关重要的。以色列现阶段的诸多困难皆是伦理误导的结果。亚述即是上帝派遣来惩罚其子民的工具，却并不需要有什么终极的忧虑。最终耶路撒冷将会被荡涤干净，而一切孑留物都将复原。

在以赛亚伪书中的佚名先知对后世宗教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思想就是作上帝受苦的奴仆(雅威 eved YHWH)——或许是比喻以色列人吧，但基督徒就将其读解为指称耶稣——他被同时代的人所不齿，但却秉承上帝的旨意，肩负使命恢复公正。上帝受苦的奴仆提出一种理想，即以价值来衡量忠诚而非繁盛。只是最终一切意愿都将完好实现：伪以赛亚在第11章中企盼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弥赛亚

① 译文引自和合本圣经《以赛亚书》6:1。——译注

(Mashiah/Messiah)注定会恢复以色列并将其导引入一个和谐宁静的大世界时代，此时狼羊同榻、豹羯共居、狮豚和睦。地球上将遍布上帝的睿智。

第三个以赛亚——最后一派——设想恢复圣殿。该派别肯定了安息日(Sabbath，或 Shabbat)的重要性，也不遗余力地批评外来诸崇拜，还反对圣殿中进行的种种仪规。这样在重点方面就与关于其他先知的记录有所出入了。

在那些暴风雨肆虐的日子里，巴比伦人在尼布甲尼撒率领下攻占了耶路撒冷城，耶利米(Yirmeyah/Jeremiah)呼吁人们顺从而非抗拒。他很自然就以叛逆者的身份陷入困境；但由于他看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北部的以色列王国还是南部的犹大王国都不能违背与上帝的约定。他并未指定某一个阶层，而是指向了所有阶层。一旦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民族就不会忠心耿耿。耶利米呼吁人们反思忏悔；但如果他的呼吁没有获得回应，那么以后国土的沦陷就笃定不可避免。

作为个人，耶利米似乎很沉沦。他没有结婚、孑身一人、挑起诸多事端显得桀骜好斗，而这一切都是奉上帝之命而行。他委实也希望从未降生于世。但他感受到上帝的激励从而将蒙昧未明的真理向人们宣示。就是希望也当如此；而耶利米还预感到上帝还将订立另一个条约，按照这些情形写入民众心里，他们因而永远忠于上帝。

216 由于确信古老的以色列实际上已被摧毁，耶利米为更加个体化地理解与上帝的关系问题铺平了道路。这种情形在西奈律法中表现得已不明显，其原因在于伦理的种种需求已然置于个人框架内。以色列人宗教的大部分已基于一种选民的观念；不过这一观念也关涉个人的种种行动与选择。

公元前 6 世纪下半叶，随着波斯王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于公元前 518 年颁布法令，允许在耶路撒冷恢复圣殿并从巴比伦遣返流亡者。在以斯拉(Ezra)领导下，一大队人马从巴比伦出发了，他们携带着大量财产回到了圣城。在废墟间他们发现，很多犹太人已同异邦人通婚并不再恪守以前盛行于民族中的生活方式。这些混杂的婚姻都被解除，而由于惧怕索可提(Sukkot)，以斯拉遂举行一个仪式，高声诵读一本巨著中的律法，这些律法中记录的宗教经文的基础

性概念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经过一段时间的斋戒和忏悔，这些人在几个月后举行的另一仪式中上着手更新圣约，其手段是推崇圣殿、遵守安息日和其他多项律法。

或许以斯拉诵读的文本就是摩西五经(Pentateuch)或称圣经的前五卷，这一部分在很早时期就已成为神圣经典了。或者情况还有所出入。但在这一进程中，这五卷就已被遵为书面律法了。而所谓的"口头律法"，从摩西开始口头流传下来，也就被后来信奉正统的犹太人视为权威范本。这是拉比犹太教的一个重要支柱，我们下面还要论及。

以色列宗教的诸层面

简要凸显以色列人体验中的某些事件(它们一直延续至第二圣殿以及定型的犹太文化之中，而且在希腊人和罗马人来临并将犹太人同化于希腊罗马文化之前业已发生)，我们也就能理解该宗教种种范畴的某些主要特征了。

首先，考虑教义层面：上帝被视为至高无上而又独一无二。这就成了一神教，因而与毗邻的各种宗教和仪式分别开来。这一进步无疑应归功于在摩西名下进行的在实践上的变革。其次，就叙事层面而言，古代以色列有关于出埃及、沙漠环境的无助以及对迦南征服的记忆。这种叙说对于同上帝立约的观念而言地位非同寻常。再者，就仪式层面而言，有一个障碍抵制着偶像崇拜，它有助于使以色列同这一地区种种丰产与其他崇拜分别开来，只是这种分别却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王权的基础使得崇拜集中在圣殿举行，这一重要因素有利于保持以色列人崇拜的独特性和无形象性。然而流亡者的经历也意味着一个重要的精英阶层逐渐操纵着各项仪礼，甚至有无圣殿也变得无关紧要。基于这样的或者是其他的种种原因，恢复圣殿也只是在聚众崇拜的念头刚刚提及之时，人们只是聚会于此而已。 217

至于经验层面，众先知的呼吁日益明显地与祭司传统的保守主义相对应，其意在于牺牲的琐屑部分。该呼吁糅合了伦理上的宿命感，先知因此也就处于王室与祭司体制的特殊边缘之上。其种种异象也就强化了上帝神秘的存在。

在伦理层面，律法典章已然浓缩于十诫之中，这就使得以色列人能够清晰窥见与上帝订立的盟约关系中为人们所期待的行为准则。从组织性上讲，事实上直到我们所处时代结束，都存在着一种观念：书面经文是为书吏阶层而准备的，这些人的职责就是诠释记录下来的文本而已。这便与世相沿袭的祭司相对应，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与圣殿礼拜相关。

王权体制在政治上十分重要，即便其最终并未成功；然而它在人们的神话想像中甚至会更显重要，因为这些人企盼一个大一统者能够恢复王权并将其引领至一个祥和宁静、神武繁荣的时代。这种见地的产生，部分原因是圣殿在政治上变得脆弱不堪。

最后，就物质层面而言，圣殿当之无愧是以色列人精神所倚靠的宏大人造物。它在所罗门统治下的荣耀，以及随着巴比伦流亡归来者返回而带来的复兴，都是一种重新肯定。但是还有其它人造物，比如经典文献等。他们可能——并且最终也确实——替代了约柜中的石板条款。或许最终对该民族而言最具价值的还是以色列国土。只不过这片土地正处于众多强权——亚述人、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的交锋之中。

总的来看，以色列人的宗教并非未受该地区诸宗教的影响。突出的表现是它糅合了迦南宗教而自己又独立出去。周边的各种文化很容易理解在圣殿前的祭坛上宰杀绵羊和鸽子；王权的荣耀体现在圣殿前面的一根根廊柱上；神圣的书面记录的自然性；先知们的种种异象上。但是以色列的混杂情形甚是特别，而它也有相当能力幸存下来；原因或许就是，它的很多习俗以及重要思想，都由后世的许多民族继承下来了。

第九章　波斯与中亚

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统一

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军事天才，发端于公元前 550 年击败米底， 218
以及使伊朗诸民族统一成中近东地区的一支强大力量。他所建立的
阿赫门尼德(Achaemenid)王朝，一直延续至两百年后才被亚历山大
大帝及其继承者塞琉西(Seleucid)王朝所变更。从公元前 2 世纪至
公元 24 年的这一时期，由帕提亚人(Parthian)所主宰。经历一个纷
乱时期之后，波斯人从 224 年至 637 年，再次藉萨珊(Sasanid)王朝之
名成为强权势力，该王朝最终崩溃于阿拉伯穆斯林的攻掠之下。

伊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众多影响了世界文化的主要宗教的策源地。首先提及的便是琐罗亚斯德教(即袄教，Zoroastrianism)，该宗教可能以六种阶段形式存在。它的早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6 世纪，在阿赫门尼德王朝时期以官方宗教的形式进入其第二阶段。随后的一个融会阶段延续到了公元 3 世纪，此时它被萨珊王朝以官方宗教形式再次尊奉。此后，因穆斯林的统治而受到迫害，一部分信徒便迁往印度。最后是其现代发展阶段，它只在一小批人中盛行。

在琐罗亚斯德教内部也有一股重要潮流，即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孤立的宗教；然而更为恰当的看法是，再度人为尊奉起来的萨珊王朝宗教是其主流。这种潮流在现代西方以佐尔文教(Zurvanism)而闻名。

另有一种充满活力而又糅合种种思潮的宗教出现，它是由摩尼
(Mani，公元 3 世纪早期)所创立，人称摩尼教(Manichaeism/
Manichaeanism)；它曾经流行广泛，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公元 9 世纪的
中国、中亚、波斯和西方。还有一种具有波斯背景的神秘宗教叫做密 219
特拉教(Mithraism)，它曾经遍及罗马帝国境内，我们将在第十章对
它进行讨论。

琐罗亚斯德教

琐罗亚斯德生平

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这一名号出自希腊语对扎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的讹音。这个伟大的先知生活在公元前600年之前的
220 某个时期。晚近的琐罗亚斯德教资料宣称他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不到)三百年,这就将他的时代圈定在公元前630年左右。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的时代还在此之前,一个粗略的一致意见是,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他或许来自现在的阿富汗,也可能来自伊朗境内。这是一个具有东伊朗文化传统的地区。

关于其生平我们几乎不知道什么确凿事实,而后世的传说在空间上已然充满并将其经历视为理想形象所应有的,既睿智又美好。经文中的五篇颂歌或伽陀(Gāthās)归于他的名下,其间他提及他属于祭司阶层。东伊朗或东印欧文化与印度吠陀时期的雅利安文化颇有亲缘关系,故而他的地位也类似婆罗门。传统上的说法是,他20岁时离家——或许是已接受祭司所需的良好教育,30岁时他已具备深邃的灵感和洞见,这使得他能够着手宣传其新颖的教义。

该宗教的主要部分就是他宣称的一神教,将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ā)视为惟一真神:他正如其名号所示为睿智之主。他哺育了孪生两精灵,斯班塔·曼纽(Spendas Mainyu)与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即善神和恶灵(对应善恶)。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原初选择,一人选择良善——阿沙(asha)(对应于吠陀中的梨多[rta]),另一人选择谎言(Lie)——即对应谬行(druj)——介于善恶之间的一个语汇。这种原初的选择在其生活中与之直接面对。琐罗亚斯德也传
221 授了抽象地称为实体的六种半独立的存在,亦即六善仙:善思、至理、欲力、卡献、整体和长生。这些神灵是否迁就于盛行一时的多神教呢?可能还不仅如此:因为其他祭司的反对致使琐罗亚斯德离开故土而在古波斯王维什塔斯帕(Vishtaspa)的宫廷劝其皈依新的宗教。据推测这时他约42岁。他结过两次婚,有一大群子女:一篇伽陀就是庆贺其第三女成婚的。他卒于77岁时,为一个祭司所谋害。

琐罗亚斯德教　关键术语

阿杜尔或阿塔尔(Adur/Atar)：圣火。一切火都被视为净化过的，因而在祭祀时可施用于神庙中和圣所处。

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ā)：睿智之主，创世之神，后称奥尔玛兹德(Ohrmazd)。

善神(Amesha Spendas)：七位圣仙(后世变成六位，原因是奥尔玛兹德被认为亦是其中之一)，一般视为天帝的苗裔或是引申。

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敌对的精灵，万恶之源，注定最终会被阿胡拉·马兹达，以及后世的奥尔玛兹德所战胜。

波斯创世记(Bundahishn)：善恶精灵交锋中产生的创世活动。

离渡桥(Chinvat)：分离与评判之桥。如果灵魂中的善占优势，灵魂将由一个标致女郎引导渡过桥去；否则，一个老女巫将引导灵魂过此桥，此时桥如锋刃，灵魂即堕入地狱。

混世之终(Frashokereti)：创世活动，复生时机，包括了最后的评判。

庇灵(Fravashi)：人类永恒的精神，如天使般存在于天界，意味着人类自原以物质形式降生。

圣力(Manthvas)：表示力量的语汇。信徒主要是从琐罗亚斯德著述的最早经文中摘选出来的。

火袄祈祷(Yasasna)：神庙仪式，抑或指通常的崇拜。

雅扎塔(Yazata)：被认为值得尊奉的天神或天使。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密特拉。

佐尔文(Zurvān)：时间。后期琐罗亚斯德教中亦即佐尔文派的离经叛道的重要活动，奥尔玛兹德与阿赫里曼(Ahriman)被认为源自这一存在，它超越了善与恶。

琐氏的宗教反对当时流行的战争宗教的某些因素，比如说涉及到公牛祭和利用豪摩(haoma，无疑等同于吠陀中的苏摩)致幻。在各个方面他都是开辟道路的一个威胁。现在还不清楚的问题是，这

种遥远而又有些迷茫的传统是如何逐渐成为阿赫门尼德朝官方信仰的。在这方面麻噶(Magi)起着重要作用。

麻噶的角色

麻噶是来自东方的智者,因其在伯利恒(Bethlehem)到过耶稣马厩前而分外有名。大概他们是源自波斯西部米底人中间的一个祭司阶层或种姓。他们实行近亲婚配,这种习俗后来蔓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中间;他们还负责处理死者:他们处理死者的方式的特点是将死尸曝于禽兽(这种方式在琐罗亚斯德教中成为定制,其中包括有德赫摩[dkhmas]或称寂没塔)即供兀鹫撕食尸骸上肉的地方。由于人们认为祭司需得对祭祀仪礼负责,因而麻噶充任的角色一如印度的婆罗门阶层。随着波斯帝国于公元前550年的统一,他们就获得了重要地位。通常,他们是逐渐采纳了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但对此也作了些许增饰和变更,以服务于帝国统治。他们的布道使得古代琐罗亚斯德教已沉寂不用的文献能流传至今,他们从前5世纪开始就在收集这些文献了。在萨珊时期他们还负责对宗教及其教义进行了改革。

这些经文粗略分为三个部分:琐罗亚斯德的原始文献,即《伽陀》;然后是《阿维斯塔》(*Avesta*)的残本,约在公元6世纪编定,但依据的是千余年前纂集的材料;再者是巴列维(Pahlavi)语文献,写定于公元9世纪,此时已处于伊斯兰化时期,琐罗亚斯德教社团生存已受威胁。这最后的资料带有评注性质,也具有知识概括特征,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它各种宗教教义都有反映。

琐罗亚斯德训诫中展示的世界剧幕

在琐罗亚斯德原来的训诫中,就我们已经弄清楚的而言,宇宙的历史被想象成一幕戏剧。要是阿胡拉·马兹达的完美是至上无阙的
222 话,那么恶一定是产生于那种既依附于他(因为阿胡拉·马兹达是万物的创造者)又独立于他的渊源(原因是他还具有绝对的善)。有一种看法即其对手恶灵安格拉·曼纽具有恶性是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这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妥善解决,只是这种恶性意识的来源仍然显



恶灵安格拉·曼纽，即恶尊的精神实体，正与阿胡拉·马兹达激战，他决定诱惑人类的远祖。这幅公元 14 世纪的图画显示的是琐罗亚斯德教晚期人类堕落的观念，无疑受到了基督教观念的影响。安格拉·曼纽在这里与始祖夫妇攀谈，并给他们两只果子。

得神秘莫测。世界上的恶总是在与善争斗，而能够进行种种选择的人性必定站在善一边，这样一幕戏剧在善恶分离而善被赋予决断力和永生性的第三阶段达到高潮。整个这样一幅场景显示了一个一神教的框架，但同时对人们的实际体验而言又显得很现实，它将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杂体。

这样一出三幕剧，特别是它构拟出人们将在重生境界拥有完善躯体的未来阶段，在宗教发展史上颇具影响力。这种观点传布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在末日时分将会有一个灿烂的实体更新场景，使得一切重又光辉璀璨。谎言被击败镇压下去了：恶灵将会被逐去而最终会被吞并。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将会获得永生。这些观点在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之始就已存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

了相当的深化。

阿赫门尼德王朝时地位提升的琐罗亚斯德教

223 随着琐罗亚斯德教在麻噶祭司的指导下发展到国教阶段，它便开始再度吸纳毗邻各种宗教的种种特点了。这样，其中的各位神灵就又开始在信仰的网络中重新出现，而恶神或魔鬼性神祇亦不为琐氏贬斥。最要紧的是那些漫漶抽象的永生者（善神）也被人格化了。或许对于先知而言他们也是能够庇护善者的不可见力量，但后来亦作神灵看待。在阿维斯塔的一部分《耶斯特》（*Yasht*）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神祇被称为“值得尊奉的”或是雅扎塔（Yazata）。其中就有日神和月神；雨神提什特里亚（Tishtrya）；辨才天女（Anāhitā）和密特拉（Mithra，少时我们会谈到他俩）；司风的伐由（Vayu）、人格化的豪摩（Haoma）以及其他各种灵物，包括了引导个人的类似天使的形象庇灵（fravashi）。也还有拯救神（Saosha）和审判神（Rashnu），他们同密特拉一道对死者的灵魂进行评判。如果我们将神祇定义为人们尊奉的对象的话，那么我们在众雅扎塔中就会再度引入一类多神崇拜，即便是这些神灵从属于惟一真神。这有些类似印度传统中的情形。

在创世的第一阶段原牛（Gavaēvōdāta）与原人（Gayamaretan）即是动物和人的最初形象；后者与琐罗亚斯德以及救世主苏什扬特（Saoshyant）共同构成一组与时间相关的三位一体。最终三个救世主苏什扬特已经设定，每一个对应一个新千年的开端（有时，这种千年轮回的意象牢牢拽住了西方人的想象，比如，希特勒就宣称要以千年帝国的形式重现之）。最后一个救世主苏什扬特将会带给人类永生不朽，并与恶势力进行最后一战从而将其摧毁。

这种历史在未来达到完善的观点还得与略有不同的一种意象一并看待，此即离渡之桥（the Chinvat Bridge），它从位于宇宙中心高耸的世界山上并一直跨至天界，显得窄如刀锋。每个灵魂来到大桥边，都要由密特拉和其他评判者审视一番并与其形象当面核对：若是善，这个形象就宛如一个漂亮女孩；否则，其状如女巫。恶劣的灵魂会滑过锋刃掉入始终沸滚着的烈火中，正直者准能继续向前直达天界。

最后这个形象与另一个合并，此时救世主苏什扬特则善待世界并将其恢复至无上荣光的境地；正义者的灵魂将并入荣耀的躯体，而用豪摩和取自牝牛的油脂混合而成的牝牛饮祭献则会将永生之命赋予他们。

然而，尽管有众多男女神祇被重新输入这一宗教之中，但从整体上看，琐罗亚斯德教仍然保持了其无形象崇拜的特征，亦不为具体神灵树立偶像或是修筑神庙。有一些例外是：古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公元前404—前358年在位）在帝国的主要城市为辨才天女建立了许多神庙。不过总体上看，与拟人化的抗争还是成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实际上是将古代印度—伊朗游牧部落不事偶像的宗教类型特点，与在一神教的名义之下反对"异教"诸神的观念加以合并：它们达到的结果，如古代以色列人的官方宗教一样，但却来自另外的方向。

很多这样的观点，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实际行为，在公元3—7世纪的萨珊时期都得到了大规模的精微处理，这也表现在佐尔文派的神话和神学的发展上。对此我随即就会涉及。 224

神明时代：佐尔文派

在萨珊和希腊化时期演化出了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后来在可以追溯到萨珊朝鼎盛时代的巴列维语文献中都得到了深化处理。有一种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与琐罗亚斯德原初的二元论相抵牾。琐氏早已设定有一个人形的至上神祇以及仅次于他的一对孪生神灵，一个为善一个尚恶。在佐尔文派（Zurvanism）中，二元对立发生在奥尔玛兹德（阿胡拉·马兹达）与阿赫里曼（Ahriman，恶灵）之间。这两个都是时间之神或称佐尔文派的更高级力量的孪生后裔。

以这种方式变更原初类型的原因无疑是，在阿赫门尼德统治晚期以及希腊人治下的塞琉古时代，对时间崇拜的观念都颇具吸引力，其部分缘由在于巴比伦天文学对波斯文化的影响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占星诸手段能够预测未来的善恶形势，部分原因则是希腊人的命运观念。随即佐尔文派借助尊奉伦理上善的至上性对世界作出了一个崭新的形而上解释。琐罗亚斯德早已将至善神的地位提升到无以复

加的境地了，但只是崇奉其力量，又设置了一个渊源于原初阶段的恶原则来与之对峙，即使已经注定了恶势力最终会被击倒。在佐尔文派中，道德上显中性的时间之神已被抬升至统治地位，而宇宙争锋中的交战双方居于同一层面。虽然善神奥尔玛兹德最终会取胜，但在形而上学层面他已不是终极了。

萨珊琐罗亚斯德教诸层面

琐罗亚斯德教在公元3世纪再度抬头，其领袖繁多，而最重要的是卡尔得(Kerder)。我们涉及的一些叙事性成分也已变得精微。因而在最后时限将会莅临的救世主苏什扬特或智者，应当是由在保存琐罗亚斯德精子的湖水中沐浴而受胎的处女孕育——而这片湖水亦当是由在这一时限之前不下99,999个庇灵所引导。时间之神作为一个力量增进的先行者，被划分成了几个部分。宇宙的年龄据推算已有12, 000年，它又被分割成3000年一段的四个时间段。起初阶段即精神时期，奥尔玛兹德开始其创世活动并同阿赫里曼开战。他俩打了许久便议定讲和9000年。接踵而来的阶段就是从精神阶段转换为物质阶段。而第三阶段则是阿赫里曼偷袭奥尔玛兹德的创世活动。这一阶段末期善神做好准备以等候先知降临，先知的出现预示着第四阶段的到来。3000年过去了；每个3000年的末期都有一个智者降临，最后一个智者将会引领已经充满生机的宇宙。所有这一切以一种有趣而又颇具影响的方式将历史与神话融为一体。

225 从教义层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尝试将佐尔文派视为具有更正统内涵的一神教的对应者，这却是与多神教的一种妥协。就伦理而言；这一层面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思维的交错性来说是完整的，它集中在善恶之间的争斗上。总体看来，琐罗亚斯德教的伦理建设在于对世界的高度认可，即便是阿赫里曼的形象，在后期排斥世界的诸如诺斯替教(Gnosticism)和摩尼教的信条中也颇有影响。

至于仪式层面，其主要特征在于火祭仪式的异常复杂，还包括了祭献豪摩。火被视为具有净化入髓的力量，而这些与之相关的仪式得耗费相当的时间和知识。历法上也集中了很多节庆，比如在新年节(No Ruz)或元旦日以及其他五个重大节日中庆贺庇灵：这分别是

在仲春、仲夏、谷收、金秋以及隆冬五季。生命力也是密特拉神和天狼星(Sirius)神节庆中的特征。

在萨珊朝以后，体制层面当然已不再有官方参与；只是在该宗教繁盛的整个阶段，祭司制与帝国体制才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麻噶演变成了世袭的种姓，他们参与社会事务诸如成人、婚嫁、丧葬仪式等等。在某种更进一步的意义上说，麻噶阶层中的人是否都是职业宗教人士，是先知或巫觋，这对某些问题而言已不是秘密。虽然琐罗亚斯德本人是幻觉者，但我们却没有多少证据来证实该宗教的经验层面。 226

最后，琐罗亚斯德教主要的种种人为特色即是火祆庙和停放死者的寂没塔。在艺术品中，带翼的轮盘后来就象征阿胡拉·马兹达；但作为一种反对偶像或曰非形象性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与其他多数信仰相比还是少有艺术和雕像表现。

然而，精神意象其力量巨大无匹。将其他种种传统想象化又被离渡桥所纠缠，类似的还有荣耀躯体的复生、智者的降临、被视为善恶之间纷争的生命意蕴。尽管琐罗亚斯德教只有少量信徒幸存下来——现今约有150,000信众——但它曾经发生过较大影响，也是具有组织的信奉惟一真神的一种高级模式。

摩尼与二元论的其他用法

先知摩尼，约在公元217年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泰西封(Ctesiphon)城附近，恰在萨珊王朝建立之前。他在12岁时就有幻觉体验，若干年后，他在24岁时获得天使晓谕，公开宣示真理。他毕其一生，充满热情地着手传道事业，将自己的训诫书写、描绘下来。他高度看重绘画艺术，认为它应当成为宗教交流的一部分；他编撰了《偶像书》(*Images*)形象地展示教义。他因为传道来到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遂被沙普尔王(King Shapur)允许在波斯帝国境内传教。但沙普尔死后摩尼也就失宠；麻噶们处心积虑要在帕提亚时代之后重振琐罗亚斯德教声威。摩尼被捕，在接受审讯后被处死并用铁链悬起示众，那一年大约是公元277年，摩尼正好60岁。

摩尼认为他的宗教作为萨珊王朝的新兴官方宗教是甚为合适的，这就解释了麻喝和他之间的某种敌对情形。他天才地观察到其教义中的普适性，原因在于他坚持那些教义部分补充了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这三大创教者训诫的精髓。他本人也被举为基督徒，他参与的这一浸礼(Baptist)派在他生活的地区势力很大，因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将摩尼教视为基督教的一个异端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其主要教义，关于善恶分离和明暗对立，就得多多归功于琐罗亚斯德教传统了。

虽然波斯帝国对这一新兴宗教的迫害只是短暂一时，但摩尼教在这一地区却一直持续到伊斯兰时期。该宗教西传取得极大成功，在摩尼死后流行于该地区罗马帝国治下的大部分。其最著名信徒后
227 又皈依基督教者即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这一宗教也受到几个罗马皇帝的迫害，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前后皆是如此。公元527年，一纸法令宣称追随摩尼者即处死刑，由此可见摩尼教那时仍有吸引力。

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是：灵魂堕落于物质世界中；除非另生别情，灵魂在转世轮回中不得解脱；弘明之父真神(God the Father of Greatness)派遣智者来唤醒仍旧沉睡于黑暗之中的人们；解脱之法即是借助认识——直接体验灵光(Light)。

发生在弘明之父与晦暗之君(the Prince of Darkness)之间的战斗多涉性事，原因是后者期望产生出尽可能多的物事以网罗、羁绊住灵光。灵光存在于精子之中，摩尼大概是在其宗教中糅合进了一些性力(Tantric)派的观点，涉及的是有关精液保存的重要性。人们希望那些专职信徒能够完全脱离性事；已婚的俗家信众则应当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摩尼教教堂建制大略遵循佛教样式，教士居于庙宇中，由俗家信众供养。教士应当遵守不诳语、非暴力、不纵欲、戒肉类及其它不洁之食以及守清贫。

摩尼教系统中的起源神话较为贫乏。由于灵光之父与晦暗之君的首次交锋，世界得以产生，下半部分由晦暗之君所铸造，而日月星辰则是光明的子嗣。这一系列争斗也产生了些许怪物。原初物质产生出的魔怪阿沙格隆(Ashaglun)和南列(Namrael)吞噬掉这些怪物

后相互交媾，从而生下亚当和夏娃。而智者是来自上界，他将亚当从一无所知的沉睡状态唤醒，给他展示周围的光明，这从根本上讲还是渊源自天界的。

摩尼教的伦理严格而仁德，它对僧俗信众一视同仁地要求戒绝一切类型的暴力。民众理当向教会交纳收入的十分之一或七分之一。他们在礼拜日和一年一度的呗摩(Bema)祭之前的一个月内亦当实行斋戒。他们亦得在周际以及年度的集会仪式上忏悔自己的罪孽。他们还应当一日祈祷四次。呗摩祭是纪念摩尼受难殉节的。呗摩本身是一顶空有的冠冕，这有点类似早期佛教对佛陀修行不加彰显的情形。

无疑，摩尼教徒鼓励能够撒播光明的修持行为。通常是通过这样一种对灵光的直接了解，信徒才能完成重生的轮回而回升至灵魂之源的灵光中。

这是一种生机勃发但又消极悲观的宗教，它能够广为传布的部分原因在于，它的主张是将基督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其它来源的多种主题糅合成了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在某些方面它获得支持则是因为它的宽容性。除了悲观色彩也有希望存在，这就意味着虔信智者必将被指点一条出路。由于它的素朴性，在诸多官方宗教都表现出其腐败性和颓废性的时候，该宗教尤其被人看好。

我们叙述波斯的历史一直到萨珊王朝结束。波斯注定是要被伊 228
斯兰势力所征服的，随即进入一个迥乎不同的文明时期。然后我们再来简要看看中亚的情况，先知琐罗亚斯德正是诞生自这一地区的毗邻地界。

中亚的地理意义

邻接印度西北部的地区，一直到今日所称的阿富汗和苏联中亚一带，长期以来对于世界文化而言皆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因为通过藏北地区，商队就能通达连接中国西域和印度的地区。由于这一地区毫无屏障抗衡来自从欧洲绵延至东西伯利亚之北部大平原的入侵之敌，它也成了相对蛮荒的民族进入各个主要人口聚居区的通道。早期，雅利安人就是通过这一渠道迁入印度的。后来，佛教也是从北印

度平原由此向外扩散的。从这里佛教东扩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力。而奇怪的是,佛教从未在西向扩散太远。

也要注意到的是,传播开来的是佛教而非婆罗门的文化和宗教。这里有东南亚文化发展的一个对照事例。直到公元650年左右,伊斯兰教开始从阿拉伯半岛向外扩张,多种宗教,包括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景教、犹太教以及摩尼教,一直相安无事地并存于中亚地区。

7、8世纪时伊斯兰教已经进驻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主导力量。一个关键性的胜利就是于公元751年在但罗斯(Talas)之战中击溃中国唐朝的军队。该地区突厥斯坦(Turkestani)各邦统治者纷纷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使其它宗教也就受到压迫排挤;佛教因被视为偶像崇拜者而尤其受到摧毁。

13世纪早期该地区被成吉思汗(Genghis/Jinggis Khan)麾下的蒙古人征服,城市被劫掠一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这些统治者,或者是宽容地对待萨满教信奉者,或者是依赖了景教和佛教。但这些蒙古统治者最终还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特别是在帖木儿(Timur,1336—1405)统治时期。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史实。

源于北亚的萨满教

中亚也曾经是萨满教意识和行为遍布的一条暗渠。早先是印度的沙门(śramanic)传统受到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西伯利亚萨满教的影响。尔后,蒙古人的宗教又掺入了强烈的萨满教成分在内。

到现代,萨满教已经成了从俄罗斯欧洲部分一直绵亘到堪察加(Kamchatka)这一广袤区域内主要特征之一。萨满是一种职业巫
229 师,主司精神启迪;在此之前他需要经历一场严重的病症。他从这种体验中出来,由于精神上的启迪而成为一个生机勃发、富有创造力的人,从而能够帮助他人,也具有幻术力量。

通常他受到的这种折磨被想象成将其骸骨从体内抽出重新组装的过程——一种死而复生的过程——这是通过萨满祖先以及其他隐藏和精神性力量的操纵来实现的。他的幻觉就意味着他能够洞悉何处最适合狩猎或捕捞,而这种功能对于他所在的部落来说颇有价值。他也可以保存本部落的诗歌传统而成为神话和传说的扮演者。但首

先他是一个医师，帮助他人经历自己也经历过的死而复生过程。他也能进入一种恍惚状态，那时他就被某些有法力的神灵或精怪所掌控。他还能飞升上天、下至冥界，这都是为了引导灵魂到达其最终归宿并拯救那些病笃垂死的人。萨满经常身着异样服饰，手持一鼓，这便于他以有节律的敲击创造一种变更了的意识状态，这在萨满主导的公众集会过程中很是重要。

与萨满教有关的这一类宇宙论认为寰宇有一根神轴作为中心，米尔塞亚·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称之为世界之轴。这有时指的是神祇居住的高山，向下直通冥界。还有许多神灵和精怪，包括远祖的萨满(他们经常通过死而复生的幻觉痛楚赋予萨满以灵感)。在蒙古人中间，有一个至上神腾格尔(Tengri)主宰着天界；众多萨满仪式则转而服务于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这里面结合了借助集会崇拜祖先的种种仪礼——这种仪礼在内蒙古还在继续，那是向成吉思汗的英灵祈祷。

在欧亚大陆和北美的环北极地区，亦即西伯利亚居民萨美人(Same，发音为 Samay)或拉普人(Lapp)的聚居区，抑或是居住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因纽特人(Inuit)和其他部落，他们都能展示萨满教的生命力。自从在朝鲜、南北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以及中亚部分地区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形后，也许可以说明萨满教是从西伯利亚向外扩散的。然而萨满教在某些类型的社团中或许也就是一种人类普遍具有的行为，特别是那些以狩猎和采集活动为生的部族。由于这样一种营生模式在现代世界愈来愈显困难，萨满教也在衰微；虽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从精神分析到文学以及新纪元运动的灵智论(New Age spirituality)，在各种环境中，萨满教的主题也还盛行。

自从北亚的萨满开创了灵魂出窍通神的技能以来，他们就因此奠定了宗教体验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基础：一个方向是内在的不借助幻觉、但却需要高度技巧化的手段才能通达意识的高级状态，比如在佛教中；另一个方向则是用先知和其他人的超自然的幻觉体验，此时他者出现便能自发而又明显地通达主题。

第十章　希腊与罗马世界

230 不同的文化潮流交汇在地中海世界，形成了希腊—罗马文明。其中，有两股最主要的潮流，一为灿烂辉煌但政治上支离破碎的希腊文明，二是有着征服、法律和融合之天赋的罗马文明。地中海世界统一的一块基石由亚历山大大帝奠定，通过公元前336—前323年的一系列征服，他统一了希腊化的东方和黎凡特(Levantine)文化的不同区域①。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罗马人通过三次布匿战争战胜了主要的敌对力量迦太基，从而奠定了统一的另一块基石。随着罗马人对东方的征服和奥古斯都·凯撒(Augustus Caesar)在公元前30年以后对帝国的最终巩固，一个崭新的希腊—罗马文明强有力地形成了，它力量强大而优雅，充满了精神的活力。

对于后来的罗马和希腊文明的创造力，某些已然消逝的文明也不为人知地做出了贡献：比如，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the Etruscans)的文明，被早期的罗马人所吸纳；克里特岛(Crete)的米诺斯(Minoan)文明及其大陆分支迈锡尼(Mycenaean)文明，被说希腊语的人征服和超越。后来，罗马帝国从所征服的民族中融合和吸纳了许多思潮和习俗，这最明显地体现于它对下列宗教的融合和吸纳：来自埃及的伊西斯膜拜、来自波斯的密特拉膜拜、来自小亚细亚的西布莉膜拜、来自叙利亚的阿斯塔忒膜拜、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宗教、来自波斯的摩尼教以及同样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上述这些宗教和

---

① 在亚历山大大帝开启的希腊化时期，"东方"是指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从埃及一直延伸至印度的边境；"西方"则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世界。在罗马帝国时期，"东方"和"西方"的具体含义发生了变化，"东方"是指罗马世界说希腊语的部分(the Greek East，文中意译为希腊化的东方)，而"西方"是指说拉丁语的部分(the Roman West or the Latin West，文中意译为拉丁化的西方)。

黎凡特，或译累范特，指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岛屿)，即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译注

一些本土宗教，比如，希腊和罗马的古老异教、伊流欣努（Eleusis）秘教、奥尔菲斯教（Orphism）、柏拉图主义（Platonism）的理智信仰及其后学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斯多亚主义（Stoicism）和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相处共存在一起。罗马帝国堪称精神观念的大熔炉。我们将在本章对其中的丰富和辉煌管窥一二。

希腊—罗马宗教　关键术语

宇宙（Cosmos）：有秩序的宇宙整体。

燔祭（Holocaust）：整只焚烧的燔祭品。

傲睨神明（Hubris）：傲慢自大的人试图与神明同等，却往往带来毁灭性后果。

逻各斯（Logos）：人类的理性，有时被斯多亚主义、斐洛和基督教等当作统管宇宙的原则，还被基督教看成创造者和中保。

幽灵（Manes）：逝去众祖先的幽灵。

奥秘或秘教（Mysteria）：比如，通过入教的戏剧化形式来启示真理的伊西斯膜拜、伊流欣努秘教和密特拉教。

神话（Mythos）：一种故事，尤其指关于诸神的权威性故事。

精灵（Numen）：比如，在河流中的、灌木丛中的、山里的和其他一些神圣地点或力量中的精灵。

爱智（Philosophia）：对智慧的爱，或我们借以理解和应对生活的一套观念体系，比如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

宗教（Religio）：使我们与神明有紧密关系的。

神圣区域（Temenos）：常常包括一座神殿在内。

神明（Theos）：或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作为至高存在的上帝。

首先，在希腊和罗马社会，原有不少传统宗教一直占据上风，直到许多更为宽泛的理念和哲学运动百花齐放为止。因此，我们将论及上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实际上下迄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接着，我们将谈及公元1世纪之前的希腊和希腊化世界里的各种哲学和新兴宗教运动。然后，我们将对罗马进行同样的讨论。最后，我们

231 将讨论罗马帝国早期的各种宗教的此消彼长，其中涉及犹太宗教和基督教，不过，讨论的背景更为广阔，并且涉及其他一些运动：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密特拉教、其他哲学流派和一些秘教（mystery religions）。至于犹太宗教和基督教在稍后的发展，我们留待第十一章谈论，其中涉及这两种宗教的古典形态（classical forms）的形成。

希腊宗教

诸神的模式

就其信念和崇拜而言，希腊宗教的经典体系是诸神并存的多神论。这种观念后来受到了信仰一神论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猛烈攻击。其实，在希腊宗教的多神论体系中，有一位至高神，他在诸神中
232 为首、为主。而且，这位至高神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有权能的宙斯（Zeus）、天空的主宰，有时还和海神波塞冬（Poseidon）与冥府之神哈得斯（Hades）一起三神并列。宙斯毁灭了在他之前的一组神明，即，大有权能的众泰坦（Titans）及其领袖克洛诺斯（Kronos）。宙斯不但是天空的光之神，而且是正义的和君王的神，因为他关心人间的正义，支持人间的良善统治者。作为最终的统治者，他既是众神之父，又是人类之父；不过，如同任何一位首领一样，宙斯四周有顾问和朋友围绕，他不能完全控制他们。宙斯有着许多妻子，这象征了宙斯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些力量和典范。在伟大妻子赫拉（Hera）的帮助下，宙斯圣化了婚姻制度。在与大地女神的交配中，宙斯代表了世界男性一方的生殖力。在与秩序女神西弥斯（Themis）的结合中，宙斯为人类的和宇宙的活动带来了规律：其结合产生了掌管人类命运的命运三女神（the Fates）。如此等等。倘若宙斯频繁的婚姻和交配日后遭到批评，说他给人类做出了不好的榜样；那么，从某个角度而言，这些婚姻和交配只是标记了宙斯的不同能力。而且，诸神不同于我们：他们是不朽之神，甚至任何将我们与之比较的想法都是傲睨神明（*hubris*）或骄傲自大。

在希腊世界的一大群神明中，我们可以枚举另外一位神明，她来自塞浦路斯，其原型可能是闪米特女神阿斯塔忒。这位神明就是主

管生育和爱情的女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她是俊美的阿多尼斯(Adonis)之妻。在荷马笔下,她最后被证明是宙斯和狄俄涅(Dione)之女。正是出于阿芙洛狄忒的灵感激发,伟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活动于约公元前370—前330年之间)为她创作了最伟大的裸体雕像。阿芙洛狄忒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女神,但又不失其野性的一面,在科林斯(Corinth)[①]城就有不少神妓为她服务。 233

阿波罗神(Apollo)虽然来源难以确定,但影响却颇为巨大。这位神明在外表上是一位完美的年轻人,他是音乐、医疗和预言的保护神,而且还保护着牛群的安全。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泛希腊化的(全希腊的)神殿位于德尔斐(Delphi)。有人推测,阿波罗可能是某个泰坦的后裔,因而可能并非源自希腊,这种可能性或许反映了在宙斯治下的希腊化诸神与其前辈之间的古老斗争。总而言之,阿波罗代表了有秩序的灵感和创造性的预言。我们可以将阿波罗与无秩序得多的狄奥尼索斯(Dionysos)比照一番。希腊的主要神明大都居于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这座伟大的山峰位于希腊中部,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之轴(*axis mundi*)。但是,狄奥尼索斯并不住在奥林匹斯山,即使有人说他是宙斯和塞墨勒(Semele)之子。狄奥尼索斯既是酒神,又是祭酒神仪式和狂欢活动的领导者。据说,狄奥尼索斯和戏剧的宗教性起源有关系,因为在祭酒神的仪式中要上演一些神圣的叙述故事。对这个献祭仪式的描述组成了《酒神的女伴》(*The Bacchae*)[②]的核心段落;在许多方面,《酒神的女伴》都堪称戏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0—前406年)最有力度的戏剧作品。

不少神明都有一定的民族性含义,不过,这些神明也都各个植根于某个单独的城市国家或城邦(*polis*)。在希腊文化的全盛期(公元前600—前400年左右),城邦是一种典型的单位,比如,即使是雅典,城邦周围都聚集着不少附属城市和这些附属城市的领地,从而组成了一个帝国。每一片小的区域都有自己的神殿和神明,因此,希腊

---

① 或译哥林多、格林多。——译注

② 巴克斯(Bacchus)是狄奥尼索斯的别名。所谓"酒神的女伴"大概指的就是参加祭酒神仪式的女子,她们是参加者中的大多数。——译注

宗教是地方化的教派和(为绝大多数希腊文化所分享的)泛希腊化的宗教之间的一种互动;奥林匹斯诸神、(阿波罗发出神谕的所在地)德尔斐这样的主要圣地、伟大的诗人们(其中,最为伟大的是整个希腊教育的奠基人荷马,赫西奥德[Hesiod,约公元前700年]的贡献稍逊一等)和各种泛希腊化的比赛(比如奥运会),都是这种互动的具体体现。

祭品的重要性

希腊宗教的主要仪式活动是为诸神制作祭品。在很大程度上,制作祭品就是屠宰牲畜。据说,第一次的祭品来自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他是一名早期的英雄,并且颇有心计和手段。他试图用表面上看来不错的祭品欺骗宙斯,其实这些祭品只是一堆用肥肉包着的牲畜骨头,本该有的好肉被恶心的内脏等物取而代之了。普罗米修斯本以为自己这样做对人类有利;不料,宙斯识破了他的欺骗,狡猾地取走了那些骨头,而没有让普罗米修斯知道食肉的生活是致死的原因之一。于是,普罗米修斯无意中为人类选择了死亡。由此,祭品制度划定了不朽的诸神和会朽的众人之间的界线。

牲畜祭品几乎完全融入了日常生活,因为牲祭是希腊人有吃肉的特定时间;于是,享受和虔诚的义务由此合二为一。类似地,为公民服务的祭司成为了地方官员,宗教和城邦生活再一次失去了区别。

234 献给大地诸神的祭品是整只焚烧的,这些大地诸神是冥府的神明,属于土地和阴间。与献祭天空诸神不同的是,在给冥府诸神献祭时,血不是喷向高空,牲畜被割开喉咙后,血顺着地上的一个洞口往下流。而且,祭坛不是高的、而是低的。

英　雄　们

虽然希腊人截然区分了诸神和众人,但在诸神和众人之间还存在着一类过渡性的存在或曰半神半人(demigod);对于城市,对于家庭,有时甚至对于所有希腊人来说,这种半神半人都是重要的。这就是英雄,他在死后拥有自己的神殿,被广为纪念,而且成为传说的对象。他或许是某个殖民地的创立者,或许是某位伟大的古代英雄,比

如阿喀琉斯(Achilles)或赫拉克勒斯(Heracles)。他可能与某个城市的过去相关,可能与某种职业相关(比如传说中的医生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在有限的程度上,英雄的存在导致了祖先崇拜的出现。无论如何,尽管他们不是神,英雄们比其他人都更接近诸神;很多英雄被认为是诸神的后裔,有些还获得了不朽。

宗教之中的多种宗教

在希腊世界,多种崇拜形式复杂地混合在一起,其中一些运动有着更为私人化的意义,而且形成了更为宽泛的大宗教之中的多种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等哲学家开创的运动。)这些宗教包括喧闹的和狂欢的狄奥尼索斯运动;追求洗净罪孽和摆脱轮回的奥尔菲斯教;圣礼性的和戏剧性的伊流欣努秘教。

我们从最后一个运动开始。这场运动的中心距雅典城不远,位于神圣的综合性地点:伊流欣努。其仪式或奥秘(mysteries,来自*mustai*,意为"入教"或"传授神秘知识",*mustai* 的动词形式有"保守秘密"之意,因为入教者均须宣誓保守秘密)的庆祝每年一次,主要活动内容有:从雅典出发的公众游行、游行途中入教者在海里的沐浴、在山洞里和在伊流欣努神殿中的秘密行为。据说,这个庆祝活动当中的戏剧、仪式、言辞、被火把照亮的各种神圣图像,都是感人肺腑的、意味深长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参加这种庆祝仪式,不是为了弄清楚任何东西,而只是为了获得一种体验(希腊语中一段充满韵律的节奏:*ou mathein alla pathein*)。庆祝仪式中,神圣戏剧关注的对象是怒下阴间的农业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她的女儿科瑞或曰珀尔塞福涅(Kore or Persephone)被冥王哈得斯诱拐到阴间为妻;最终,宙斯强行给出了解决方法:科瑞每年半年回到大地,半年留在阴间。经过伊流欣努秘教的改造,这个农业神话有了更高的意味,涉及到了入教者生命的改变。于是,在城邦的日常事务中,入教者能够感觉到自己宗教生命的更深层。

奥尔菲斯教是一个定义松散的运动,其名来自那位早期的歌手,

235 他的声音颇具魔力，能够让野兽、植物和岩石着迷。奥尔菲斯教有自己的教士，他们四处游历，宣讲生命的纯净之道，其中包括素食主义和其他的一些自我纯净手段。奥尔菲斯教徒认为，宇宙一开始很完美，（根据该教的一个说法）如同一个巨大的蛋，然后逐渐地变得越来越混乱无序。按照他们的说法，身体是灵魂的坟墓，倘若得不到拯救，灵魂注定要轮回。整个运动有点像一场寂静主义者的反抗（a quietist rebellion），他们禁止吃肉，这意味着他们禁止参与献祭，从而禁止参与公民生活。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中，所有重要事务的决定都离不开祭祀，因此，奥尔菲斯教的信息看来必定是让人烦心的和具有革命意义的。

奥尔菲斯教和狄奥尼索斯教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交叉，不过，这交叉带来的更多是截然相反的行为。他们之间的神话也有所关联：在奥尔菲斯教的观念中，狄奥尼索斯被众泰坦吃掉，这些泰坦被宙斯烧死，他们的骨灰为创造人类提供了物质材料——因此，每一个人在其自身当中都有狄奥尼索斯的神圣火花。狄奥尼索斯教鼓励妇
236 女在野外参与其秘密仪式，鼓励狂热的舞蹈，鼓励生吃被活活撕碎的牲畜——这虽然违背了其特有的禁忌，却被广为接受。或者，在更为缓和的公开形式中，狄奥尼索斯教规定了一种类似“油腻的星期二”（Mardi Gras）[①]的节日，这种做法与其他肃穆的公民宗教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周期性复兴的运动，即毕达哥拉斯教。在这里，我们将开始在宗教的异象和哲学的异象之间建造沟通的桥梁。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0？—前500年）来自爱琴海的萨摩斯岛（Samos），但他的主要工作都完成于克罗顿（Croton）。克罗顿是一个希腊殖民地，位于意大利南部。在这里，毕达哥拉斯创立了一个宗教团体，该团体取得了对克罗顿城的政治控制权。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毕达哥拉斯被流放至小亚细亚的梅塔庞图姆（Metapontum），直至生命的终结。在克罗顿及其周边地区，他创立的团体不断发展

① 或译“肥美的星期二”，原文为法语。西方民俗中大斋首日的前一天，即狂欢节的最后一天。——译注

壮大，其影响持续五十多年之久。该团体奉毕达哥拉斯为圣人，甚至有可能是神人；这位圣人或神人所讲授的东西十分庞杂，有精神的、实践的，还有哲学的。根据毕达哥拉斯的说法，世界的最终组成部分是数字——这个观念在根本上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音乐的和谐中，毕达哥拉斯发现了数学的比率关系，这对他思想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世界流自无边际者（以数字为标记的）和有边际者的相互关系。灵魂被认为处于轮回之中；通过一系列的净化，通过遵行毕达哥拉斯的戒律，包括食物禁忌（比如，禁止吃豆），驾轻就熟者可以摆脱轮回，获得个人的自由。因此，毕达哥拉斯的信息是杂糅了理论的、数学的和实践的灵修（spirituality），而且所有这些都和政治行为息息相关。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对于柏拉图来说，所有这三种动机都相当重要。

爱智和宗教的目标

我们所说的宗教和所谓的爱智（*philosophia* 一词的直译）行为之间，早就有着相互的关联。在现代西方，哲学已日益成为技术性的和理论性的。的确，哲学有时候包含着一种世界观，——通常是一种科学人文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但哲学的自我界定往往趋向于反对宗教，甚至反对智慧的理念。然而，在古希腊，情况并非如此。

除了毕达哥拉斯之外，一些思想家也成了思辨思想的先驱，他们就是如今所谓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the Presocratics）：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等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约前480年）说，万物皆处于流变之中，而且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学说，使人联想到与其同时代的佛陀释迦牟尼的一些主张）。巴门尼德（Parmenides）认为，实在就是不变的存在。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470—前399年）专心地寻求事物的定义或本质，追问“什么是勇敢”之类的问题，而且总是试图促使同时代的人反思道德方面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苏格拉底被控腐蚀青年并被处以极刑。上述这些人的学说和方法，为柏拉图、从而也就为柏拉图主义和日后

的(往往采取高度宗教形式的)新柏拉图主义预备了道路。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前347年)受过奥尔非斯教和毕达哥拉斯教思想的一些影响;在其赏心悦目的对话录《斐多篇》
237 (*Phaedo*)中,柏拉图为轮回的学说作过辩护。他认为,人的灵魂不能保持其绝妙的、不朽的原初状态,于是陷落于身体之中,在生命的轮回中颠沛流离。但是,知识能够帮助人的灵魂重新恢复自由的状态。知识包括对本质的认识,本质被柏拉图定义为世间事物所模仿和分有的型相(Forms)。型相的世界正是灵魂的家园,所以获得知识其实就是记忆(remembering)。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正是记忆说明了苏格拉底激发思想的方法如何试图发挥作用;正如苏格拉底自己说的,他就是知识的接生婆。

型相的世界有着庞大的等级体系,高居顶端的是善的型相(the Form of the Good),它贯穿和充满于所有其他型相,因为每一个型相都是完美的。所以,通过知识,灵魂可以攀升至善的型相,并且在异象中领会它。由此,柏拉图的直觉既是神秘的,又是理智的,而且他对弟子的严格训练有一部分必须集中于数学。在位于以阿卡德美(Akademos)①为名的丛林中(于是就有了"academic"和"academy"这两个词),柏拉图办有一所学校;在学校的入口处,他写道:"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Mēdeis ageōmetros eisitō*)。

柏拉图不仅关注理论和异象,而且关心政治。出于独裁者叙拉古的迪翁(Dion of Syracuse)的命令,柏拉图数次访问西西里,均无功而返。不过,柏拉图的大半生都献给了教育;正是他的一位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把柏拉图哲学带到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亚里士多德把本质拉回现实之中,发展了许多非凡的分析处理方法,比如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逻辑学,这些均将对欧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主义的异象高贵而又统一,它能够与秘教和新兴运动共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一名英雄。雅典人在其城外的一片丛林中发现了他的坟墓,这片丛林因而得名。柏拉图在此讲学,借用"阿卡德美"作为其学校的名称。后世称学术、教育和艺术等机构为"阿卡德美",本于此。——译注

存在一起，也就是说，能够与传统宗教和公民的崇拜团体共存在一起。但是，柏拉图强烈批判了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歌传统和他们所描绘的诸神的低劣道德。在公元前 350 年左右的希腊宗教中，不同层次的公共宗教和私人宗教相互糅杂在一起，而且，有些高度哲学化的思辨也被编入了生活的结构之中。希腊宗教在某些方面与同时代的印度传统相像：还没有被综合进一个连贯的体系中，不过充满了以后将会实现的种种潜能。

亚历山大和亚历山大之后：一些新兴哲学运动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公元前 382—前 326 年）及其天才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65—前 323 年）——顺便说一下，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统一了希腊，驯服了各个城市国家。在一系列漂亮的战役后，亚历山大扫平了波斯帝国，这个大国邻居曾长期在政治、思想和宗教上与希腊尖锐对立。埃及、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波斯等地的政权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王国（Bactria），都曾深受希腊政权的影响，这正是出于亚历山大大帝所奠定的基础。在希腊本土，亚历山大大帝结束了原先动荡不安但又富于奇妙创造力的时代，把历史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我们所知的“希腊化”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新兴哲学的先驱，这些新兴哲学在整个 238 地中海世界都颇有影响，不管是在希腊化的东方，还是在拉丁化的西方。

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 342—前 271 年）在雅典度过了大半生的教学生涯。藉着其前辈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伊壁鸠鲁主张，世上万物均由虚空中的原子组成。灵魂也是一个组合体，于是当人死亡时，他的原子就消散了。同理，诸神由精细的原子组成，居于世界之外，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人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培养泰然自若的美德，在追求合理的快乐时培养克制力。后来，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 96—约前 55 年）以诗的形式表达了伊壁鸠鲁的世界观；在其《物性论》（*De rerum natura*，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卢克莱修试图驱散人们对诸神诸灵的恐惧。

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季蒂昂的芝诺(Zeno of Citium)创立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以"斯多亚学派"(Stocism)为名，此名源自他教学所处的回廊(*stoa*)。芝诺对诸神作了非神话的(demythologise)处理，认为诸神是一些自然的力量。宇宙被理智控制(理智虽然具有高级的、精细的本性，但其自身也是一个物质实体，而且有时可被诗意地称作宙斯)。一旦死亡，我们将不再存在；不过，我们仍比动物高级，因为我们拥有理性。在面临最终灭绝时，智者能够自健自强，在直面邪恶和死亡时，——邪恶和死亡是事物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智者能够凭着勇气和自我克制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自我克制的学说，对于罗马的贵族来说，很有吸引力；在公元1世纪，希腊奴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在罗马讲授这种学说；后来在161年成为罗马皇帝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21—180)在其著名的《沉思录》(*Meditations*)中教授这种学说。

在所谓希腊化时代的后期，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化的东方，地中海世界也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多文化的帝国。要想了解这个新时代的宗教性特征，我们有必要掉头回顾一下早期罗马的宗教。

罗马宗教

神明和公民的美德

罗马宗教关注的各种神灵可以集体地称为"神明"(numina)，即，激发敬畏之情的神秘神灵。这些神明包括伟大的朱庇特(Jupiter)及其妻子朱诺(Juno)、战神玛尔斯(Mars)、爱神维纳斯(Venus)、谷物丰收之神刻瑞斯(Ceres)，还包括除草之神萨拉托尔(Sarrator)和门神贾纽埃里厄斯(Januarius)等有所专司的神。在整个的实在和全部的人类活动中，这些神明无所不在。

在早期罗马的制度内，公共崇拜的目的在于确保诸神继续或变得仁慈。日历是崇拜不同神灵的节日汇编。例如，三月开始于对战神玛尔斯的献祭，三月的名称也源自他；还有许多日子专门用来为马、武器、号角等祝福。此外，许多比赛也有宗教意义，比如二轮战车的赛车、摔跤、拳击和以后(借自伊特鲁里亚人)的角斗。上述种种事



希腊人在描绘伟大神明宙斯时，宙斯形象的神圣可畏被不断增强的现实主义和人性取向调和了。

情得以付诸实施，有赖于不同阶层的祭司，他们的首领是祭司长，即 239
“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后被历代教皇用作头衔)。祭司中，有一群维斯太贞女(the Vestal Virgins)，这些享有极大特权的女祭司由大祭司委任，任期达30年，以确保维斯太女神[①]广场中的圣火永不熄灭。还有一些不同种类的预言家，比如，卜占师(augurs)以观察

① 或译“威斯塔女神”。罗马宗教中的炉火女神，既是家庭的灶神，又是国家的火焰神，还是厨师和面包师的守护神。当时，各城市在市中心广场都设有维斯太女神的圆形神坛，由专职的女祭司守掾。女祭司皆由皇帝以大祭司身份亲自从10岁处女中选出，她们40岁之前必须严守贞洁，40岁后方可还俗出嫁。——译注

鸟类飞行来预卜未来——这种风俗在一些欧洲国家还有依稀可见的痕迹，当看到奇数数目（而不是偶数数目）的喜鹊时，这些国家的人们就可能显得颇为迷信。

公共崇拜之外，还有户内的仪式作为补充。这些仪式拜的是家庭守护神（lares）和被尊为神圣幽灵的祖先。这种公共崇拜和家庭崇拜相结合的制度，使得罗马人成为一个谨守宗教规矩的民族。当罗马人向外扩张、吸纳其他文化的同时，他们的万神殿（pantheon）也在不断扩大。而且，随着罗马人对意大利南部希腊城市的占领，随着作为家庭教师等的有教养的希腊奴隶大批涌入罗马，罗马人与希腊文化的接触日益加深，把希腊的和罗马的诸神自由等同的趋势逐渐流行，比如，朱庇特等同于宙斯，维纳斯等同于阿芙洛狄忒，朱诺等同于赫拉。当罗马人最终占领希腊和希腊化的东方时，这种
240 等同趋势为混合型的希腊—罗马文明预备了道路。罗马人的有效征服始于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在夷平迦太基后不久，他们吞并了希腊；公元前 66 年，庞培（Pompey）把直到波斯边界的整个东方都变为罗马下属的行省。此后不久，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占领高卢，开始对不列颠的征战。到尤利乌斯·凯撒去世前，即在公元前 44 年之前，罗马帝国已基本成形。经过毁灭性的内战，凯撒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接掌政权，他采用了“皇帝”这个头衔，而且，在公元前 27 年，他还接受了“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个庄重且更有宗教色彩的名字。

秘教和哲学的扩展

或许是因为新帝国的多元主义和被兼并的各国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不断减弱，宗教变得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被视为个人的选择。的确，帝国的意识形态要求对皇帝献祭，以表忠诚。但是，在这个限制之内，各种信念和习俗都处于一种非同寻常的流动和变迁之中。在这些运动中，有许多类似于伊流欣努膜拜的秘教；这些秘教为那些希望追求纯净或不朽、希望分有神明力量之人创造了富有戏剧性的入教仪式。

241 一些来自东方的神明已经在罗马生根，比如埃及的伊西斯，自从

公元前2世纪以来,她就在阿文蒂内(Aventine)山拥有一座神庙。她以女性的力量来影响信仰。当然,正是伊西斯修复了奥西里斯被肢解的身体,并使之复活;同样地,藉着伊西斯,入教者可以获得被修复的崭新存在。伊西斯被视为"至高的神明";关于入教者对她的想象,作家阿普列乌斯(Apulius,公元前2世纪)的《金驴》(*The Golden Ass*)进行了动人的描述。一位英雄不幸被变为一头驴,最终女神伊西斯把他从野兽的生存状态中拯救出来。

普罗提诺

普罗提诺(可能生活于205至206年之间)对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他所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不仅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且与圣经传统一起在基督教的理智和实际层面开启了一个新的传统和潮流。(可能)成长于埃及的普罗提诺,曾师从萨卡斯。普罗提诺显得对东方思想饶有兴趣。由于商贸的往来,普罗提诺在埃及有可能接触到当时的一些印度哲学。他曾加入一个赴波斯的军事远征军。虽然这次远征并未成功,普罗提诺还是到了安提阿,并由此前往罗马定居。普罗提诺以教书和写作度过了自己的晚年,他的巨著《九章集》(*Enneads*)后来由弟子波菲利加以编辑。

就其有过关于神圣者的内在经验而言,普罗提诺可以说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此外,他把世界看作对"太一"的反映。这个"太一"类似于柏拉图的"至善"。人可以通过冥想与"太一"重新合一。但是,"太一"超出一切言语。这正是中世纪基督教否定神学的起源。所谓否定神学,即通过说明上帝不是什么来定义上帝。在指出这一洞见时,普罗提诺所用的语言不仅优美,而且有力。由于他绅士般的权威地位,普罗提诺有不少优秀的门徒来传承自己的信息。普罗提诺临死前的一句话可能最恰当地总结了普罗提诺的信息,即,"我正在努力把自己身上的神性带给在全体之中的神性"。

新柏拉图主义：扬布利柯论密教

"若没有祈祷，任何圣礼都不可能行之有效。有规律的、不断的祈祷能够滋养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灵魂更加开阔而易于接纳神明，使我们向神明及其领域更加开放，使我们能够习惯神圣光明的辉煌和耀眼，并且使我们逐渐完美、能够与神明合一，从而最终把我们带回至高之处。我们的思维模式被轻柔地向高出牵引，神明的灵性注入了我们体内；这灵性激发了我们的信心、巩固了我们与神明的团契和不死友谊；这灵性增强了对上帝的渴望；这灵性唤起了我们内心的所有神圣因素；这灵性消除了一切来自灵魂的抵挡，并且从形成和发出光明的灵中去除了一切可能导致生成者；这灵性创造了对光明的有益希望和信任。简而言之，这灵性把与神明的亲密关系赐给了那些孜孜以求的人。"

对于罗马的军人而言，密特拉教这种秘教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密特拉曾与太阳结盟，宰杀了一条能更新生命的公牛，因而颇受赞誉。密特拉教的特征就是，在一半埋在地下的神庙内献祭一条公牛，以赞颂和纪念上述神话。接着，参与献祭的崇拜者还会共享盛筵（也可能没有盛筵，至少，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考古证据，有盛筵的解释更为有力）。密特拉教成为了一种学习神秘知识者的俱乐部，其中的仪式使参与者产生了一种生命更新和同志关系增进的感觉。

在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人群中，新柏拉图主义运动发展不错，特别是藉着如下三人的写作和教导：普罗提诺（Plotinus，205？—269）
242 及其学生波菲利（Porphyry，232？—303）和扬布利柯（Iamblichus，250？—330）。来自上埃及的普罗提诺，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师从萨卡斯（*Ammonius* Saccas）。之后，怀着学点东方思想的愿望，普罗提诺参加了远赴波斯的远征军。后来，他开始在罗马任教，并在周围聚集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学生。普罗提诺极大地改变了柏拉图的学说。

普罗提诺体系的顶点就是"太一"（the One）——这只能被认知为太一，除了它是至高的上帝，或者它以理智或努斯（the Nous）的形

式流溢之外，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方法谈论它。在太一之中，包括了柏拉图体系中的各种可理解的型相。此外，理智有着进一步的流溢，即灵魂；在灵魂之中的各种型相可在时、空中被看见和领会。灵魂处在成为物质世界的边缘，人类的灵魂会下降至物质世界。虽然世界是一种诱捕人类灵魂的监狱，但它有着诸多的美好之处。为了自身，太一向开始上升的人类灵魂传播爱或激情（*eros*），而人类的灵魂则通过理智的、伦理的和神秘的努力试图回归太一。据说，在即将去世之时，普罗提诺说过，"我正在努力把自己身上的神性带给在全体（the All）之中的神性"。

最终，上述学说对一些基督徒非常具有吸引力，他们正在努力糅合自身一神论的犹太传统和所处罗马帝国内的古典文化。新柏拉图主义可以和异教信仰区分开来，其观念可以被用来阐述一种深刻的基督教神学。330年，基督教接管了罗马帝国，在一个无常的世界里重新肯定虔诚和纯洁之重要性的要求出现了；在此之后，当隐修制度方兴未艾时，新柏拉图主义由于也强调沉思默想，新柏拉图主义的作家曾一度占据上风。

因此，在希腊化的世界和罗马的前几个世纪，我们发现了种种不同的秘教，其中有些来自东方，发现了种种不同的哲学，这些哲学对受过教育的精英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此外，还有别的东西正在酝酿。作为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宗教，在整个帝国境内，犹太宗教也有一些吸引力。为了理解这些，我们有必要再一次掉头和回顾。

巴勒斯坦的宗教

犹太人的变迁与兴衰

从以斯拉（Ezra）重建以色列传统之时到罗马帝国时期，巴勒斯坦经历过希腊人的统治，即塞琉西王朝（the Seleucids）的统治。这段时期，巴勒斯坦也受到过波斯的一些影响，比如，复活的观念、对启示性先知的更加强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弥赛亚这个形象的日趋重视。弥赛亚，即大卫之家的受膏者，他会降临以恢复以色列王国。上述的波斯影响，在充满奇幻意象的《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中可见 243

一斑。在以色列人遭受外邦敌人的数度攻击之后，上帝终于给以色列人派来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以色列人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永恒王国。邪恶者被处以灭亡之刑，良善者则继续存活。

在耶稣之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派别；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的、混乱的时代背景下，耶稣开始了自己的运动。法利赛人(the Pharisees)被视为革新者，他们引进了诸如身体复活之类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是忠于抄写传统的保守派(scribal conservatives)所反对的。这些反对者属于撒都该人(the Sadducees)的团体，他们保管着《妥拉》，拥有圣殿礼仪的主要控制权。希腊化了的犹太人被希腊文明的种种刺激和生活方式征服了。奋锐党人(Zealots)试图武装反抗罗马的占领。艾赛尼派(Essenes)和库姆兰共同体(the Qumran community)则退居沙漠，与世隔绝，试图保存《妥拉》的完整无缺，与圣殿的礼仪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亚历山大里亚，有个名叫特拉普提(Therapeutai)的团体，他们以苦修为其精神，追求一种沉思的生活。也是在亚历山大，还有个叫斐洛(Philo)的人，他十分重视希腊的学问，试图以希腊的语词来表达犹太信仰和习俗具有的那些更为高级的真理。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更为广阔的罗马帝国，信念的众多潮流方兴未艾，其中的缘故在于：在圣殿于公元70年被毁之前，犹太人就四处流散。

作为一个犹太支派的耶稣之运动

(拿撒勒的)约书亚或耶稣(Yehoshu'a or Jesus)生活在一个暴风骤雨般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在罗马帝国刚刚建立的早期，犹太人对皇帝崇拜的态度就显得顽梗不化，这也是摩擦的持久根源之一。犹太人排他性的一神论可能是高贵的，但对于帝国官员来说，这也显得有些奇怪。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宗教上不同的犹太人有所区分，不过，这些区分都具有政治意味。在犹太社会中，犹太人曾濒于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反抗边缘，这场反抗最终爆发了，并且导致了圣殿的被毁。

耶稣的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来自一个甚至在犹太世界都属穷乡僻壤的地方：加利利(Galilee)；他的公开活动生涯只有两三年，十分短暂而且相当动荡，这段生涯开始于他接受表兄弟约翰

(Yohanan,John)的施洗之后。约翰也是一位强有力的传道人,正如耶稣一样,约翰也认为,上帝之国即将到来。约翰这个人虽然充满野 244
性,但却是一名先知,他特意在旷野和远离城市文明的地方争取支持。相反地,耶稣则与来自不同阶层的人,比如纯洁的和不纯洁的、



这种仅能在16世纪重新见到的地下墓窟反映了罗马人对死者的孝敬。一般而言,罗马人把死者的棺材放入图中所示的壁龛里。后世基督教教堂的地下墓穴就是仿效自此。

高贵的和卑微的、在城市里工作的，打交道。凭着自己的确信，耶稣宣讲了如下的信息：随着他的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他和上帝之间有着特别的亲密关系，他可以直呼上帝为阿爸或爸爸（Abba, Dad）。他经常用"人子"（Son of Man）来指涉自己，这个神秘头衔见诸《但以理书》等处。不过，他也认为自己深深地植根于犹太世界。他会解释《妥拉》（《圣经》的首五卷书），这是当时的圣典，后来扩展成为所谓的《塔纳克》（Tanakh）或"律法书、先知书和作品集"，——这些组成了全本的希伯来文圣经（the full Hebrew Bible）（而且，稍加变
245 更后成了已脱离犹太主流之基督教共同体的《旧约》）。耶稣还经常出入于会堂（synagogue）这个重要的场所。在耶稣教导过的那些城市，比如迦百农（Capernaum），以注重会众为特点的会堂崇拜已经成为正统犹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在身边聚集了一批男女门徒，并且开始引人注目的治病和教导：他的比喻和故事有时深奥难解却又栩栩如生。根据流传至今的文献和当中体现的风格，我们得出可以如下判断：耶稣的教导主要是通过类似的故事、类似的丰富多彩又生动活泼的警句和谚语来进行的。他可能极力宣称过，自己是弥赛亚或受膏者，他的家族和大卫之家有关系。倘若他确实使用过弥赛亚这个观念，那么他的使用方式也是新颖独特的：弥赛亚并不是意味着前来恢复犹太人统治的勇士般的国王，而是意味着一位受苦的仆人、一位戴有荆棘冠冕的新式国王。耶稣的许多教导，都是以全新的方式来使用老旧的概念，这也有可能成为误解的根源。无论如何，耶稣和犹太公会（Sanhedrin）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被后者移交给罗马行政官彼拉多（Pilate）；之后，耶稣被判以十字架之刑，十字架上还挂有"犹太人的王"之类的说明。根据《新约》的报导，数天之后，在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的团体经历了极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成为他们持续这场运动的动力源泉。

于是，在当时犹太宗教中的所有其他潮流之外，我们看到了约翰的团体的延续；更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希腊—罗马世界，我们看到了耶稣的运动。这场运动后被保罗（Paul）延续，保罗主要使用希腊语进行教导，他在不同的犹太中心城市（即希腊和小亚细亚的主要城市）游历，而且到过罗马。除了保罗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活跃的门徒。

通过不要求皈依者施行割礼，保罗使得这场运动成为通达犹太宗教某些更为高贵之处的简易途径；对于那些好沉思的外邦皈依者而言，犹太宗教的一神论颇有一些吸引力；对于帝国的人们而言，犹太宗教的伦理学在很多方面都颇具启发性。犹太宗教的这个新分支，充满活力与热情、充满一些显而易见的秘密，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新兴的秘教。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与犹太宗教有些瓜葛，他们被统称为诺斯替主义。在实际情况中，他们到底采取了怎么样的组织形式，这还不明显；不过，在内容上，而不是在组织上，他们类似于摩尼教（Manichaeism）。在公元 2 世纪，有一位名叫马西昂（Marcion）的诺斯替主义教师：他主张，《旧约》的上帝是邪恶的；他编辑并且实际上删改了保罗书信；他迫使成长中的基督教共同体在 2 世纪开始判定其所用的作品哪些是圣典，或者哪些是该共同体所核准的并包含上帝真理的。基督教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羽翼丰满、形式完整的基督教，圣经在公元 2、3 世纪的形成正是其中的标志之一。

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和基督徒

在大局基本稳定的罗马帝国，其内部的结盟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各种宗教运动、礼仪、信念系统和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也十分繁复，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会胜出呢？ 246

这个新兴的秘教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优势。第一，由于其犹太一神论，它在范围上是普世性的。第二，由于其注意到耶稣这个神人（God-human），它呈现了一个与希腊—罗马世界非常相似的主题。第三，尤其是从 3 世纪开始，它能够从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拾取一些主题，从而使得自己的信仰对受过教育的人具有吸引力。第四，在入教程序中加入了其“奥秘”（即圣餐）的本质；这种程序在对信念委身的方式上，比神秘派别有着更多更深的意味。第五，犹太人也经历过的不时发生的迫害，加强了这个群体的团结。第六，皇帝崇拜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帝国精英的信念显然是多元化的，这些都说明了帝国缺乏一以贯之的国家意识形态。君士坦丁一世（死于 337 年）在基督教

247 的学说中看到了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他把基督教的学说确立为官方学说，借以重组帝国，这正是基督徒的偶然好运；也正是出于他的命令，教会第一次伟大的大公会议召开了。第七，这个新兴宗教有一致的(consistent)组织机构，有监督制或主教制；这一点，除了摩尼教，没有其他宗教能及。第八，它对世界的态度相对积极一些，能够避免对手诺斯替主义和摩尼教的悲观主义。



图中人物是君士坦丁大帝。作为基督教战胜异教的象征，他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名手执十字架的基督徒。这幅壁画作于13世纪，作者是来自希腊阿索斯山普罗塔顿(Protaton)教堂的潘塞里诺斯(Manuel Panselinos)。

早期基督宗教的诸层面

在2世纪之前，基督教开始安定下来。在教义方面，它断言，只

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毫无阻碍地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而根本上是好的。不过，它的神话层面却断言，原初之人悖逆了上帝，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上帝希望拯救人类，以色列民族因而被拣选为拯救的工具。以色列民族保守和延续着对独一上帝的信仰，直到拯救者来临的时候；因此，就整个拯救史而言，以色列民族至关重要。来到地上的基督为人类的罪而死，从而使得相信的人可以获得上帝的恩典。基本上，这些相信的人组成了以教会为方式的共同体；特别地，通过（常在富有成员的家中举行的）感恩仪式，信徒可以在仪式中有份于基督，从而获得恩典。

在仪式方面，基督教有一些圣礼，比如洗礼；在上过辅导课程后，信仰者若接受了洗礼，就会被这个团体承认和接纳。还有圣餐（eucharist），圣餐之后通常有一次公共聚餐，基督的门徒借此表达他们

《约翰福音》中的创造主基督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①

① 原文引自《圣经·约翰福音》1:1-18。——译注



这幅画名为"掰饼"(The Breaking of Bread)，属于在罗马普里西拉(Priscilla)地下墓穴发现的2世纪或3世纪早期的一组壁画。除了公共用餐之外，这组壁画还描绘了治病的奇迹和作为群羊牧者的基督。

之间彼此的爱与团结。爱是伦理层面的根本；基督徒之所以口碑不错，乃是因为妇女在婚姻中地位的提高、信实、十诫中概括的正直行
248 为。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体制层面颇有弹性，在这种体制中，主教和司祭尽可能地照看着不同的区域及其中的每一个共同体。某些大主教，比如罗马、安提阿(Antioch)和亚历山大等地的主教，拥有特殊的威望；后来，新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也将同样如此。很多基督徒也都在开始尝试隐修主义，后来，隐修主义成了教会有组织的沉思和启发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宗教经验方面，与诺斯替主义的习俗一样，关于基督的异象被强调；不过，可能最重要的是，在受圣灵感动的基督徒聚集中，对上帝的爱显露无遗。在群体生活的早期，特别是在犹太人没有肖像的背景下，基督徒就拥有了不少艺术。不过，作为其物质性的对象，这个新兴共同体有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本和他们特有的一些希腊文新圣典。

对应于福音书和其他的作品，基督徒身上有生命的见证：他们有真理的源泉，这真理体现于殉道者和圣徒的生命。正是基督教的圣男圣女，他们显明了上帝的力量，显明了在罗马帝国日渐增长的宗教会众中这个新兴共同体所得到的恩典——正如他们所经历的。



这幅名为《万有的统治者》(the Pantocrator or Ruler of the Universe)的镶嵌画布满了童贞女教堂的穹顶。这座童贞女教堂位于雅典附近的达芙尼(Dafni)隐修院。在希腊,11世纪的拜占庭教堂拥有一些最精致的镶嵌画。

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罗马帝国国教

对于罗马帝国的宗教环境,基督徒和犹太人难免有些敌意。别人视为意味深长的故事,他们却视之为谎言。他们并不认为,在别人眼里,他们特有的叙事看起来会像神圣的神话。但是,在更为广阔的结构中,他们的这些叙事在两三百年内的确居于次要地位;从当时的流行观点看,宙斯或朱庇特被视为至高的神明,如果换成哲学的思考方式,宙斯或朱庇特可被重新解释为至高的理智。不同的神明代表



仪式层面：一群身着摩尔式（Moorish）服装的犹太人在会堂里崇拜。尽管在伊斯兰教国家有很多不利之处（大体上说，在基督教国家的处境更加恶劣），犹太人的仪式生活基本上未受限制。



叙事层面：这幅图画来自一份12世纪的手稿。图中，在亚当和夏娃被赶进沙漠的同时，天使正忙于添满伊甸园中的四条河流。

了不同的力量，最为重要地就是代表了更新生命的不同能力。帝国中充满了一种追求适当性（propriety）的气氛，因此，帝国的仪式和公民的仪式都必须适当地进行，从而维持事物的运转、巩固彼岸和此岸 253
的良好关系。在整个界限松弛的体系内，虔诚的人们就有可能选择并参与不同的秘教。那些不尊重皇帝的人是危险分子，应该加以迫害。与此同时，在从不列颠到昔兰尼加（Cyrenica）[①]的整个帝国境内，罗马的主要神明与地方性的神明相互融合、成为一体，这个过程给帝国的广大领土带来了一种庄严且忠诚之感。就其自身的方式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体系，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以多元化的方式运作的。

① 非洲利比亚东部一地区。——译注

犹太教的自我界定

犹太人的传统遭遇了多次打击。公元70年，一次反抗罗马的起义失败了，圣殿随后被洗劫一空，境况悲惨且令人痛苦。后来，耶路撒冷城被夷为平地；130年，罗马人在此建造了一座新城：卡匹托拉娜(Aelia Capitolana)[1](这次建城引发了一次结局惨烈的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西蒙·巴尔—科赫巴[Simon Bar-Kochba]，他被当时的著名拉比阿吉巴[2]尊为“弥赛亚”)。不断发展的基督教运动也引发了不少问题，从其正统的圣典传统看，犹太人看到，基督教离犹太教越来越远了。基督教的理念取得胜利后，犹太教发现自己不得不适应新的现实，不得不多少对自己有一些界定。

犹太教已经做好了准备。一些著名的贤人，比如(公元前1世纪的)希勒尔(Hillel)和萨玛伊(Shammai)，被视为犹太共同体的领袖，而且以渊博的律法知识而享有声誉。圣殿被毁之后，犹太教和基督教并肩发展，拉比或教师的作用日趋突出。先前时代已经出现的会堂崇拜，随着圣殿的被毁、祭祀仪式的告终，其地位显得愈发突出。拉比也保持着对弥赛亚的期待。在第4世纪，古代基督教采纳了其罗马和希腊形式；我们可以说，从这个世纪开始，犹太教作为我们现在还能认出的宗教也已开始形成。以色人的宗教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以斯拉的重建和希腊化时期的彷徨到勇敢地面对祭祀中心
254 的被毁，这个过程现已终结，全然成形的犹太教已经出现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一起发展，犹如一对双胞胎。当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必定是令人愉快的。它们之间在如何看待希伯来圣经以及其他多数问题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公元1世纪，拉比在犹太人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加强：这些拉比握有权力、拥有知识，堪称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不过，最为重

① 此城名可能与卡匹托尔山(Capitoline)有关，该城为罗马的七个山丘之一，上有朱庇特的神殿。——译注

② Akiba ben Joseph，约50—135年，犹太教口传律法书《密西拿》的主要编撰者之一。——译注

要的是，他们都是《妥拉》专家。他们的显要地位部分地归功于圣殿的陷落。再没有祭品献给上帝了。这座重修建筑的荣耀已然消失，而且，耶路撒冷也毁于一旦。那些希望永久延续传统的虔诚犹太人只好到记录之中、书本当中去寻找传统。研究替代了祭祀，成为了最为重要的犹太教仪式；通过透彻地研究《妥拉》，遵循《妥拉》的犹太人就得以界定了余下的全部仪式性生活。一旦生活变得更为容易，犹太人就可前往耶路撒冷。当时的犹太宗教也已经极大地倾向于会堂，在会堂中圣典得以保存。

基督教本可采取对犹太人而言是无情的路线：耶稣预见了圣殿的被毁。犹太人是悖逆的，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位弥赛亚，他们甚至被指控杀死了他。一种强烈的反犹神话在教会内酝酿而成。而且，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建立，其前提就是新国王已经来了。新的时代已现端倪，圣殿已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地，虽然圣殿已经被毁，但犹太人却不得不捍卫圣殿。圣殿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和对圣殿规矩的研究当中，祭祀的意思失去了原有的现实基础，仅剩下了字面意思。顺便说一句，这有点类似于《奥义书》，贤人询问祭祀的意思，并在内心的寻求中找到了。

在很多方面，新犹太教的凯旋，可以说是法利赛人的胜利，因为在新犹太教中，犹太人的日常生活遵循着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曾被详细地分析和解释，以适应变化了的处境。法利赛人早已将纯净的律法（从根本上说是为祭司们设计的）运用于作为整体的犹太共同体中。新犹太教的凯旋，也是两类妥拉的观念的胜利。一是书写的《妥拉》，即《希伯来圣经》的第一部分；二是流传自西奈山的口传的《妥拉》（新时代的拉比们这样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口传的《妥拉》被书写下来，即《密西拿》（Mishnah）及其注释《托塞夫塔》（Tosefta）。大约在公元200年之前，《密西拿》及其注释《托塞夫塔》业已出现。《塔木德》（Talmud）的两个版本——耶路撒冷版和巴比伦版——体现了对这些材料的广泛注释，当然，巴比伦版的《塔木德》来源于长期流亡于外国的经历，口传的《妥拉》因而在巴比伦成为了权威性的表述。

大量拉比解释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使得拉比成为犹太共同体

所受启示的延续者。因此，拉比具有了中心的地位，学识成为犹太人生活方式的主要理想。所以，我们刚刚讨论的是一个宗教，这个宗教
255 不仅建基于《希伯来圣经》，而且建基于书写的《妥拉》和口传的《妥拉》这两个方面。这个宗教的主要职责属于那些拥有学识的人；其中心则是统一于会堂崇拜的各个共同体。犹太家庭是基本的单位；在犹太节日经年累月的不断循环中，家庭年复一年地举行着一些最为重要的仪式；这种家庭仪式活跃和丰富了律法所规定的、与普通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义务的日常执行。

希勒尔

（主要活动于公元前40年的）希勒尔（Hillel）是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时期的一位拉比领袖。由于来自巴比伦，他偶尔会被充满敌意地当作外人；尽管如此，颇受爱慕和尊重的他还是成了犹太社团的领袖。在巴比伦求学后，希勒尔迁居巴勒斯坦，以便能在耶路撒冷进一步学习。获得盛誉的希勒尔，与同事和竞争对手萨玛伊一起创立了一个注释律法的学派。希勒尔的处境典型地代表和反映了当时拉比的状况：在当时，拉比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上升，犹太教开始采取我们所熟悉的形式；最终，大概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会堂、口传《妥拉》及其注释占据上风。

希勒尔的统治方式颇为温和。他保护穷人，这种典型的统治方式使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主意，即有需要的人可以在安息年（在这一年中，日常的规范都会被暂停）得到一笔贷款。希勒尔持有平等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每一个普通人都应有机会学习。确实，学习在当时正在日趋成为崇拜上帝的一种方式。

希勒尔当选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族长，其继任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希勒尔不仅学富五车，而且堪称耐心和谦卑的典范。他曾简短地定义过什么是犹太教：“凡己所恨，勿施于人；余下者，即为注释”。在注释方面拥有专门的技能和洞见，这当然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希勒尔还彰显了一种贤人的理想，这种仰赖于《妥拉》的贤人理想体现了对西奈山之上帝信息的孜孜以求。

上述种种都迥异于基督教共同体对生活的诠释。基督徒没有口传的《妥拉》。在许多方面，对于基督徒来说，《妥拉》早已被废止。弥赛亚已经来了。犹太人执著于遵循仪式、执著于过去的纯净规则，似乎显得有点反常。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的正确诠释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不曾看到这一点的人是蓄意的和固执的。于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认识论产生了，这为后来的反犹主义提供了动力。

希腊—罗马宗教的终结

当然，在博得君士坦丁的好感和随后的325年公会议后，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绝对的和一蹴而就的。不过，这个胜利在很多方面都是迅猛的。391年，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宣告废止异教的祭祀。399年，异教的圣所被摧毁或(在某些情况下)被归化。虽然哲学化的宗教可能持续下去，但它们也被吸纳进初现端倪的教义综合中；这些教义的综合是由希腊和罗马世界的继承人完成的，比如，圣奥古斯丁(354—430)和东方教父(the Eastern Fathers)。 256

结果，出现了两种生活方式的混合，基督教把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的许多价值观念都编进了自己的结构之内。因此，经过从第4世纪开始的相当混乱的一段时期后，基督教能够传达出一种希腊—罗马价值观念的完整综合体，这些价值观念并未完全被基督教的正统所埋没。但是，自此以后，教会开始充满许多正确的教义。基督徒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信仰者；而犹太教从来就没有过多地强调过信仰本身。

第十一章　古典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和犹太教

三一　论

257 正如我们所知的，尼西亚会会议出于皇帝君士坦丁的召集。之前，基督徒根据他们的信仰不断地界定着自身，尼西亚会会议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从帝国的角度来看，倘若基督教信仰注定要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那么确立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就事关重大；但是，对于基督教的领袖阶层来说，为什么确立正统的教义也很重要呢？其中的部分原因至少在于：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太一样；犹太教主要是种族性的宗教，生于犹太传统的，就是犹太人；然而，基督教把自己界定为新以色列人。如何在实际中界定新以色列人呢？这个界定不得不越来越依据信仰来达成。

在获得戏剧性胜利之前，在充满殉道和秘密叛教的艰难时日里，基督徒社团早就不得不竭力排斥那些对其信息错误的、危险的重新解释。他们尤其竭力排斥各种不同的诺斯替主义团体；对于世界和肉体，诺斯替主义者往往持有悲观主义的看法，比如，他们认为，《旧约》中的创造主上帝耶和华是邪恶的。基督徒则坚持认为，世界原本是好的，尽管原初的人类（即亚当和夏娃）堕落了。基督徒还不得不反对摩尼教的如下综合性主张：在摩尼的世界观中，耶稣、佛陀和琐罗亚斯德的学说都是趋同的。

在尊重希腊哲学的同时，基督徒也抵御了来自希腊—罗马异教的诱惑：他们划清了犹太的或基督教故事和异教故事之间的界线。异教的故事只是故事而已，而基督教的故事基于真正的事实，确实是
258 历史性的。正是由于这种对神话的负面评价，神话是虚假的故事这种现代的通俗说法就出现了。

关于其信仰和周遭灿烂文化的关系，基督徒已经多次争论过；他们既在这文化中找到了自己，又经由这文化继续前行。用拉丁文写

作的“教父”（日后的基督徒用这个头衔指称当时最重要的神学人物）德尔图良（Tertullian，160？—？225）属于北非迦太基的知识圈子，他具有深厚的文学和修辞学功底，著有多部重要作品。不过，德尔图良极力截然区分异教和基督教的观念与习俗。据说，他曾经问过这样一个著名的问题：“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何相干？”然而，最后得胜的仍是主张综合的人。用希腊的哲学术语来阐释基督徒社团的一些主要教义，即使并非必然，至少也是有所助益的。就三一论这个基督教学说中最具特色又令人困惑的教义而言，这种综合正是尼西亚公会议的本质。

关于基督的本性（the status of Christ）问题，基督教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君士坦丁也特别地为此忧心忡忡。来自埃及亚历山
大的教士阿里乌（Arius，250？—？336）领导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 259
认为，基督不是永恒的，而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把神性赋予了基督。他们有一个口号，即“有一段时间他并不存在”。他们的动机部分来自于更不折不扣地持守一神论的渴望。

关于耶稣的问题，基督教信仰陷入了一个怪异的境地。不管是从实践的、还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信仰都需要断言基督的神性；但是，它毕竟是一场出自犹太传统的运动。由于不愿意与异教的多神论妥协，坚定委身于独一上帝的基督教信仰受过不少迫害。

从实践的角度看，基督教信仰关涉到一个主要的仪式，即圣餐（Eucharist），这仪式包含了对基督的崇拜。崇拜上帝之外的任何东
西，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因此，基督必须是上帝。这是基督徒从实践 260
的角度来断言耶稣的神性。不过，他们在理论方面也需要这个观念。在与人性、人类休戚相关的情形下，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救赎了我们的罪。因此，他必须是我们中的一员。但是，作为救赎主，他必须是有神性的；若认为上帝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除罪，这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因此，从救赎论的角度看，在具有人性的同时，基督也必须是有神性的。如此种种，导致了信仰宣告的产生，这些信仰宣告试图简洁地表明：基督徒所委身的不是对两个或更多神明的崇拜，而是对独一上帝的崇拜；说清楚同一位格（person）的两种本性（神性和人性）。顺便提一下，因为从内部引导教会的圣灵也被视为有神性的，

所以就可以得出上帝的三重性；进而，任何关于基督的信仰宣告也都应该适用于圣灵。

基督教 关键术语

救赎(Atonement, At-one-ment)：基督藉着死和复活使得人与上帝和好。

洗礼(Baptism)：加入基督教会时所受的圣礼，或为浸水礼，或为点水礼。

《圣经》(Bible)：被基督徒当作记录上帝启示的一组书卷。

基督(Christ)：施行拯救的受膏者或弥赛亚。

教会(Church)：地上和天上基督徒的共同体。

圣餐(Communion)：通过分有基督的体和血(即饼和酒)来分享基督生命的首要仪式，在安立甘宗、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中还分别称为"Eucharist"、"Mass"和"Liturgy"。

恩典(Grace)：上帝临到人类并使之能够做出善行、得到拯救的能力。

圣像(Ikon)：正教用于当作通往天堂的窗户和，对信徒而言为崇拜的对象。

爱(Love)：希腊语为"Agapē"，对他人的挚爱。这是基督徒的首要美德。

罪(Sin)：人类与上帝的疏离，这据说被归咎于亚当和夏娃最初的作为。

神化或神智(Theosis)：成为神圣的或变得像上帝的过程，这是东正教属灵努力的目标。

三位一体或三一(Trinity)：一存在中的三位格或三意识中心，即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

相关的问题在多次大公会议上都引起过争论，在这些大公会议中，从325年的尼西亚到9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七次大公会议通常被当作权威性的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制定的信仰宣告常常引发了教

会内部的分裂，所以，这些信仰宣告并非总是有效，而且有时导致了互相指责对方为异端的事件。教义阐释的历史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不过，基督徒总觉得自己被推动着去阐释教义，并且将之作为说明什么是新以色列人的手段。

关于三位一体的本性，尼西亚公会议最终给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宣告。用希腊术语表述，这个宣告谈及的是一存在中的三实体（*hupostaseis in one ousia*）。用稍微不同的拉丁语表述，这个宣告的效果则大大不同：上帝被说成是一本体中的三位格（*tres personae in una substantia*）。这两种阐释三位一体的经典方式，包含了圣阿塔那修（St. Athanasius，296? —373）的功劳。不过，阿里乌主义虽被逐出了正统教会，但却依然存在，而且在随后的数世纪内侵蚀了对北欧的归化过程。 261

罗马与希腊的信仰形式

帝国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从而有了两个首都，一个是拜占庭（Byzantine）或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另一个是罗马；由此，基督教内部的文化裂痕渐趋明显。东方教会的仪式受到了拜占庭宫廷仪式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对圣像（基督和圣人的画像）的崇拜在东方尤其明显。教堂的格式逐渐发展为穹顶式，穹顶内绘有天堂的景况。由此，圣餐仪式显得有了天堂般的氛围。

隐修生活的发展对东方和西方都产生了影响。由于政治上的成功，教会开始面临随之而来的腐败问题；在这种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说，隐修生活就特别地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可以选择独身和苦修。关于神职人员主持圣餐仪式的功效，教会采取了如下方针：神职人员个人的卑劣不会造成丝毫的损害；不过，教会还是承认，需要新的出路来延续英雄理想，以维系教会的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隐修运动满足了这种需要。在基督徒的想象中，圣阿塔那修的亲密战友、埃及的圣安东尼（St. Antony）是一位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在沙漠中，圣安东尼与诱惑屡次搏斗，在他的帮助下，一个隐修士团体得以成立；后来，这个团体的生活方式，经过圣卡西安（St. John Cassian，

360? —435)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奠定了东、西方隐修主义各自的发展基础。从此以后,直到宗教改革,修女和修士成为基督教各派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富有活力的一部分,并且在各个岗位上培育了他们的沉思实践(与神秘主义的追求)和学习与研究的主要因素。

北欧和东、西方的分裂

由于帝国两个部分不同的政治命运,教会的两个分支之间愈加疏远了。给东方带来稳定的拜占庭帝国可能与匈奴人在多瑙河沿岸和其他地区达成过某种妥协;直到7世纪,由于穆斯林的到来,拜占
262 庭帝国才真正失去了大片领土,仅仅保住了其中的核心区域。另一方面,从4世纪下半叶起,野蛮人开始在西方大肆蹂躏。哥特人(Goths)在侵占帝国的领土之前,大体上已皈依基督教,不过,他们皈依的是阿里乌主义的基督教,这是由伟大的传教士乌尔斐拉斯(Ulfilas)传布的。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的皈依,部分地决定了北方基督教的命运;为了正统罗马基督教的利益,克洛维在驯化哥特人的过程中出力不少。正是为了对付阿里乌主义的异端,在西班牙举行的托莱多(Toledo)会议上,西方的教会在信经中加入了和子(*filioque*)句。其中的含义,我们马上就会谈到。随着查理曼(Charlemagne)在800年被加冕为皇帝,法兰克人和教会的结盟最终为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奠定了基础。中世纪基督教的各项基础及其在西方的南北之轴,由此得以奠定。

乍看起来,和子(意为"和从圣子来")短句的问题并不要紧,其实不然,这有两个理由。"和子"句的大意是,圣灵发自圣父和圣子。首先,对于东方的正统神学家来说,这打破了三位一体之间的平衡;他们认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位格之间的完美合一,其中,圣父永恒地生出圣子,圣灵则永恒地发自圣子。也就是说,圣父增进了一种平衡的介 -。其次,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些东方的希腊人看来,西方教会没有同他们商量,就擅自加人了"和子"句,这实际上是罗马主教(即教皇)对权威地位的篡夺。在新教义的形成过程中,罗马主教僭越了自己的本分。只有获得所有教会承认的大公会议才能改动教义。从那时起,这些问题,——首先是教义上的,其次是教皇权威上的——

直毒害着教会两大分支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基督教世界的分离模式。

当这两大分支按部就班地走进中世纪之时,西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西方教会成了它的精神传人;东罗马帝国则面临着不断增强的外部压力,东方教会成了它的官方宗教。在教义、组织和实践的层面上,东、西方教会有些差异;通过看看它们作为宗教的几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差异。

东、西方基督教的诸层面

首先,我们看一看两者的组织层面。在西方,[教会的]组织逐渐集权于罗马主教,即教皇。不过,这种集权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或宗教性的;而且,西方基督教世界日益分裂,这可能就使得把罗马当作一个权威中心的需要变得更为紧迫。在东方,帝国存在多久,所谓"君权高于教权"(Caesaropapism)的状况就存在多久;皇帝将自己视为使徒,积极参与教义和教规的制定。不过,实际上,君士坦丁堡的牧首(Patriarch)和东正教会的其他重要主教经常站出来反对皇帝;因而,这是一个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相互对立的二元统治体系。不过,皇帝的权力显然很大,一些皇帝在圣像之争这样的论争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从7世纪起,东方基督教的广大区域开始逐渐落入穆斯林的统治之中,在这样的处境下,基督徒的群体被视为相互分离的社团,由一些重要的主教或各自地区的牧首管理,由此,教会被赋予了有限的世俗功能。 263

在西方,神职人员逐渐世俗化;而在东方,隐修主义和教区神职人员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在受训之后,一位神职人员若不结婚,就成为一名隐修士。隐修士有着不同的等级,主教就选自这些隐修士。

在信仰的物质层面,早期教会已经使用过装饰,比如在罗马地下墓窟聚会时。在获得官方承认之后,教会的崇拜不再局限于(用于崇拜的、有些是捐献的)房屋和别墅之内。异教的神殿被查禁了,神殿所在的场所或建筑均被教会接收。长方形的教堂模式在西方成为主流。起初,这种有着高耸窗户和侧廊(aisles)的长长建筑被用于世俗

的意图。不过，如今，它被用于宗教目的，其末端被专门隔开，用于摆放祭坛和神职人员的座位，中殿属于平信徒，前院则属于慕道友（即希望成为基督徒的人）。在举行弥撒或特定仪式时，那些正在接受信仰培训的人必须从中殿退至前院或侧廊。东方的传统则偏好穹顶式建筑，要么以希腊式十字架为基础，要么以纵向的长方形为基础，后者的著名例子有建于6世纪查士丁尼（Justinian）统治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此教堂的穹顶和拱顶均覆以金制的镶嵌砖，熠熠生辉的柱子则由磨光的大理石和斑岩制成。金色光芒由内向外流溢，看上去十分轻盈，这正是拜占庭风格的绝妙体现。

长期以来，罗马的富裕基督徒在其坟墓中陈列了不少雕塑；然而，东方的基督徒一直持守着不得有三维雕像的禁令，他们认为三维雕像违反了不可雕刻偶像的戒律。不过，基督的或马利亚的或某位圣人的圣像日趋风行。用这些圣像装饰中殿和至圣所[①]之间的分隔之屏，逐渐成为一种风俗。但是，从723到842年，一场风雨飘摇的斗争围绕着圣像展开了，东方教会由此发生了分裂。在这段时间里，破坏圣像的派别在大多数时候都居于上风。在西方教会，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种认为使用圣像是异端的观点才出现。正是因为圣像的缘故，教皇革除了东方人的教籍（excommunication）[②]，从而加剧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分裂；这次革除教籍造成的分裂具体体现为：在教皇的主持下，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在800年的罗马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且继承了“奥古斯都”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头衔。于是，西方帝国的和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互相混淆了。在东方，维
265 护圣像的派别及时地赢得了胜利，对圣像的崇敬从此成为了东方虔敬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比起西方对画像的使用来，东方对画像的相应使用重要得多。

---

① 即上文所说的长方形教堂建筑的末端部分。——译注

② 或译“绝罚”（不准领圣餐、死后不准葬入基督徒公共墓地等）、“逐出教会”等，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受洗后“归入基督”的基督徒身份是其所在教会不能剥夺的。——译注

在教义层面，双方只有强调的不同，而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中世纪以前，来自北非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在戏剧性的境况下，圣奥古斯丁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并且开创了不同的文学形式，即《忏悔录》（*Confessions*）中的自传体形式和《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的历史诠释形式。在《上帝之城》中，圣奥古斯丁对比了上帝之城和以罗马帝国为原型的尘世之城。圣奥古斯丁的确没有说过把上帝之城等同于教会，不过，他开始接受如下的观点：尘世的权力可以被用来确保信仰的一致性，——由此，国家得到了许可：在教会的指导下，国家可以迫害异端和异教。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圣奥古斯丁非常强调代代遗传的原罪（即亚当和夏娃的罪）。正是由于上帝的道成肉身及其恩典的惠赐，罪被胜过，救赎成为现实。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354—430）是西方教会的一位主要思想家，也是一位重要的属灵领袖。他生长于塔加斯特（Tagaste），后成为希波（Hippo）的主教（两地均在今阿尔及利亚境内）。他曾主要在毛道努斯（Maudaurus）和迦太基（今位于突尼斯境内）等地求学。其母莫尼卡（Monica）是一位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其父帕特里修斯（Patricius）只是在濒死之际才皈依基督教。按照奥古斯丁自己的说法，他的学习生活放荡不堪。至少，他有过一段长时间的风流韵事，而且生过一个私生子阿丢达图斯（Adeodatus，意为“上帝所赐的”）。求学生涯结束后，奥古斯丁回到塔加斯特，开始讲授修辞学。

在此期间，奥古斯丁成了一名摩尼教徒，与他虔诚的母亲日渐疏远。同时，由于阅读西塞罗（Cicero）作品的结果，奥古斯丁也对哲学探索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后来，他移居罗马，之后又转到米兰，因为他在米兰找到了一份公共演说家的职位。正是在米兰，奥古斯丁受到了安布罗斯（Ambrose）的影响。安布罗斯所倾向的寓意解释《圣经》（而不是字面解经），使得奥古斯丁逐渐软化，并且最

终放弃了自己先前对基督教经典的尖锐批评。也是由于安布罗斯的引介,奥古斯丁开始深入地了解普罗提诺这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通过上述种种途径,奥古斯丁愈加接近基督教的信仰。

如下多人也来到意大利投奔奥古斯丁:他的母亲莫尼卡、他的兄弟、他的女友和阿丢达图斯、几位表亲和各种各种的学生。由于莫尼卡的祷告、安布罗斯的哲学教导和自己对《圣经》的阅读,奥古斯丁日趋感到了压力。一天,奥古斯丁经历了一段戏剧性的故事:他在花园里听到一个童声不断重复道:"拿起,读吧"(拉丁文为"tolle lege"),于是,他拿起《圣经》,一段保罗的教导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罗马书》13:13-14)。于是,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并在387年的复活节接受安布罗斯的洗礼。此后,奥古斯丁决定返回非洲,同行的母亲莫尼卡却死于归途。

在罗马的短暂寄居后,奥古斯丁又回到了非洲。391年,奥古斯丁在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亚安纳巴[Annaba])被祝圣为执事,最后升任当地的主教。奥古斯丁著有大量颇具影响的作品,其中主要有《忏悔录》(*Confessions*)、《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和《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在《忏悔录》中,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在《论三位一体》中,他从新柏拉图主义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在《上帝之城》中,他草拟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410年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Alaric)率兵洗劫了罗马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正是为了回应罗马城的这次陷落。奥古斯丁建立了一所隐修院,在度过简朴和独身的生活后,他死于430年,其时,汪达尔人(Vandals)正在围攻希波城。

凯尔特(Celtic)隐修士贝拉基(Pelagius,死于418年)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此予以批驳。由此,奥古斯丁奠定了预定论(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的基础,所谓预定论,即,个人一开始

即由上帝拣选，预定得到救赎（或者，不被拣选，预定遭受毁灭）。西方教会一直延续着这个倾向于强调基督之死的否定性说法，基督之死作为赎罪祭使得我们能够称义、与神和好；相比之下，圣阿塔那修强调：上帝如何成为在基督里的人、以至于人可以成为神圣的[1]；东方教会倾向于强调神化（*theosis*）的观念。不过，这只是强调上的不同而已。

在教义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方教会在和子句上存在分歧。比照西方的神学家，东方的神学家更为热切强调的是，正确的三位一体观中的重要属灵信息。

关于《新约》（以及其他）的叙事，西方教会当然着重强调了首任罗马主教圣彼得（St. Peter）的作用。复活的基督向彼得委托道，“喂养我的羊”[2]，这段经文和其他经文一起，都被用来支持教皇的首要地位（the Pope's primacy）。而且，继耶路撒冷之后，罗马也被视为世界的中心。对于持有这种信念的人来说，彼得和保罗的死于罗马也是全部信仰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世俗的罗马衰落了；然而，在东方，它却轻易地与教会搅和在一起，而且，灿烂的拜占庭艺术给希腊—罗马文明带来了崭新的维度。

关于仪式层面，双方的主要差异在于语言，西方教会以拉丁语为崇拜用语（因此，在日后的中世纪，当诸多地方语言脱离教会的语言时，某种疏离注定要发生）。在东方，仪式用语是希腊语和其他多种语言，这些语言（比如希腊语自身）在世俗中依然被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传统中，圣餐仪式的氛围开始变得不太一样；尤为特别的是，东方教会开始使用圣像，由于祭坛区域被画有圣像的屏幕 266
（即圣壁［iconostasis］）隔开，因此主要的仪式也就被遮盖了。屏幕后有亮光，祭司们拿出要诵读的福音书选段，从小的出口出现在会众面前；大的出口仅供取出面包和酒。这样的教会代表了天堂，其中的运动方向是由上帝走向人类。在罗马教会，其教堂建得更长，因而运

---

① 此处说得不甚明确，圣阿塔那修的大意是：“上帝成为人，是为了人可以成为上帝”。——译注

② 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1:15-19。——译注

动方向更多的是由人类走向上帝。

西方教会承认有七件圣礼：圣餐、圣洗（Baptism）、婚配（Marriage）、坚振（Confirmation）、告解（Absolution）、神品（Ordination to the Priesthood）和（为垂死者所做的）终傅（Extreme Unction）[①]。然而，东方教会有着更为宽泛的看法，他们不仅有这七件圣礼，而且还为房屋祈祷、举行葬礼、在主显节（Epiphany）为水祈祷[②]，等等。东、西方教会都庆祝受难日（Good Friday，基督死的那一天）和复活节（Easter Day，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一天）。不过，东方教会的复活节庆祝仪式更为戏剧化，在复活节那天的凌晨，星星点点的蜡烛光中，传来阵阵"基督复活了"的宣告。

关于经验层面，东、西方教会都执著于隐修的理想，随着这理想的发展，沉思的实践、与神圣者内在的神秘合一的观念也都在不断发展。我们稍后还会看到，东方正教会日后尝试过呼吸等技术，比如，借助《垂怜经》（the Jesus Prayer），"主耶稣基督垂怜我这个罪人"调整呼吸。东、西方教会都十分重视关于上帝和圣母的神圣异象，并且以各自不同的艺术方式表达了这一点。其中，东方的圣像画《万有的统治者》（Christ Pantokrator or Ruler of All），尤为显著地展现了基督深沉难懂的和压倒一切的威严。

在伦理戒律层面，东、西方教会非常相似。倘若说西方教会对
267 于性的看法更为悲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圣奥古斯丁的缘故：他认为性是原罪得以遗传的原因。神职人员应该独身的理想不断发展，对讲道也产生了影响。在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之后，殉道这种见证信仰的伟大方式在宽松环境下逐渐淡出，独身和贞洁被愈加推举为高尚的理想，成了见证信仰的新方式。

其他东方教会和东方的传教

我们刚刚集中讨论的是罗马帝国东部的说希腊语的教会。其实

---

① 除了坚振圣事，其他六件圣礼的名称分别可另译为圣体、洗礼、婚姻、赦罪或忏悔、圣秩或祝圣、病人傅油。——译注

② 可能与耶稣的受洗或变水为酒有关，分别参见《马可福音》第一章和《约翰福音》第二章。——译注

可以说，教会从一开始就在东方有着更多的存在形式。在耶路撒冷，有一些说亚兰语的(Aramaic)基督徒，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他们流落四方，遭受过多次针对犹太人的暴力驱逐。他们的后继者是说叙利亚语的聂斯托利教会。该教会的基地起初在安提阿(Antioch)，后由此向外扩展。其领袖聂斯托利(Nestorius，381？—？451年)被认为是异端(即著名的聂斯托利派)，他断言基督有人性和神性这两种本性。聂斯托利曾控制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古—特希丰(Seleucia - Ctesiphon)教区，并且由此在中国、中亚和印度做出了奇妙的传教工作。叙利亚教会尽管在组织上与正教会相互分离，但它仍然是东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亚美尼亚(Armenia)，甚至在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前，即在提里达特斯三世(Tridates III)统治下的314年，基督教就已成为朝廷的官方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曾在这个国家盛极一时。亚美尼亚教会采用东方礼仪，接受前三次大公会议，即325年的尼西亚会议、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和431年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

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es)早已建立，教会借以得名的“科普特语”是教会成员所用的一种语言，这种古埃及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希腊字母的一种变形。在日后的非洲，埃塞俄比亚[教会]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她象征了基督教信仰的一种古老的、黑人的形式，特别是在白人掌控西方主流宗教的殖民时代，它的存在就尤为值得记起。

与此同时，拜占庭基督教向北影响到东欧和俄罗斯。很早以前，拜占庭教会就接触过如今称为罗马尼亚的地方；不过，直到中世纪，圣西里尔(St. Cyril)和圣美多迪乌斯(St. Methodius)伟大的传教工作才真正卓有成效。不过，我们最好先看看也与东欧有关的拉丁传教士的工作。

西方教会的扩展

或许，西方边缘地带最重要的教会就是位于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凯尔特(Celts)教会。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390？—？460)，出生于不列颠，幼时被爱尔兰人绑架，成为奴隶，从而学会了爱尔兰人的

语言;后来,他重返爱尔兰,在皈化该地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268 作用。藉着圣尼尼安(St. Ninian)的工作,罗马—不列颠教会也在苏格兰西南部的基督教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圣尼尼安在威克顿(Wigton)[①]半岛创设了研究中心和隐修院。稍后,在更北的伊奥纳岛(Iona),来自爱尔兰的圣科伦巴(St. Columba)也建立了一所隐修院。

凯尔特教会有着形式独特的修院制度,男、女修士在一起隐修,并且持守一些不同于罗马教会的习俗;对于罗马教会,凯尔特教会有些反感。但是,在664年的惠特比(Whiteby)会议上,凯尔特教会和罗马教会实现了和解;在不列颠,罗马教会主要由盎格鲁—萨克森人组成,他们的皈依主要来自于另一位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传教工作,他在597年被差派到坎特伯雷(Canterbury)。

后来,对于皈化大多数位于老罗马帝国之外的北欧日耳曼人等民族,不列颠教会功勋卓著地完成了任务。对于基督教来说,北移生死攸关,因为它在7世纪受到了来自南方的暴风骤雨般的毁灭性攻击。伊斯兰教徒征服了地中海南部和近东,从而蚕食了西方和拜占庭帝国的广大区域。他们来到西班牙,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和葡萄牙大肆蹂躏。基督教赢得了对北欧的皈化,也算是补救损失和维持平衡。

在德意志的传教过程中,不列颠基督徒的活力和法兰克人的强力相互糅合,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的传教上,圣卜尼法斯来自西英格兰的德文郡(Devon),曾在德意志中部、黑森(Hesse)和图林根(Thuringia)等地传教。716年,圣卜尼法斯砍倒位于盖斯玛尔(Geismar)的圣橡树,这标志着基督教信仰对异教的取代。10世纪,两位挪威君王把基督教信仰带到了挪威:哈拉尔德松(Olaf Haraldson)殉道于沙场;特里格维松(Olad Tryggveson)做过不少事情,尤其是在颇有意味的1000年,他迫使冰岛投票接受作为(虽不是私人的)公共宗教的基督教。和克罗地亚一样,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Bohemia)也都被西方教会皈化。

---

① 疑为 Wigtown(威格敦)之误。——译注

于是，在11世纪之前，基督徒的影响遍布从西西里到北部挪威的[大半个]欧洲。在东欧，正教会的传教也卓有成效。虽然波罗的海地区还未皈化，但主要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这项工作的完成，有时来自基层的努力，依靠的是传教士的孤军奋战，更为重要的是隐修院的四处栽培。因为隐修院能够训练说方言的本地神职人员、提供知识和学问、促进农业的发展、树立基督徒生活的典范。然而，对基督教的接受有时来自上层。在动荡时期显得更为强硬的君王们可能把基督教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用于统治：基督教提供了可以用于行政管理的知识；基督教拥有一套法律机构；基督教的价值观是普适的；尽管修士们崇尚和平，基督教却能被用来加强军事方面的世界观念。比起那些古老的异教膜拜团体来，基督教能够承诺一种更为宏大的一致性；基督教会毫无忌惮地攻击（甚至是肉体消灭）这些异教膜拜团体。

东方的传教：俄罗斯的皈依

传教士在拜占庭之外的成就也同等重要，圣西里尔（826？—869）和圣美多迪乌斯（815？—884）兄弟俩的成就尤为值得一提。两人的社会地位都十分优越，一个是帝国大学的教授，另一个是行省的总督。但是，他们都抽身而退，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一起传教，先是在黑海东北部的卡扎尔人（Khazars）中，然后是在巴尔干人中。他们最为持久的功绩就是创制了斯拉夫字母（即所谓的西里尔字母），和鼓励用方言进行崇拜。基督教从不同的方向进入了俄罗斯；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 Prince of Kiev）受洗。他迎娶了拜占庭皇帝的一位姐妹，正是由此，东方基督教在俄罗斯扎下了根。在南方和拜占庭帝国东部失去根据地的基督宗教，在北方再一次有了充分的发展。 269

迄今为止，我们把基督教的故事延伸到了其主要形成时期之外，即4、5世纪之后。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逐渐发展出了几种主要的古典形式。稍后，我们将讨论基督教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最为强大的前现代时期，即所谓的中世纪。对于以基督教为主导的文明来说，这是一个辉煌灿烂、大有成就的时代；不过，这个文明遭遇了可

能更为熠熠生辉的伊斯兰文明。与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在其结构内也包括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仰，这就是以其古典形式出现于4、5世纪的犹太教。以下，我们就来看看，在面临官方基督教和官方伊斯兰教的早期境遇中，犹太教发生的一些变化。

犹太教的新生

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前，罗马帝国境内皈依犹太教的人并不鲜见；但是，由于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敕令，皈依犹太教的人可被处以死刑。后来，对于其境内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教也发布了类似的禁令。这就是犹太人加强认同的一个原因。不过，不同地方的犹太人有着迥然不同的生存处境。也门和卡扎尔帝国有一些犹太人，这两个国家曾短暂地以犹太教为国教；巴比伦的犹太社团规模很大，在整个犹太世界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其他的犹太人分布区域主要有：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Sephardic)；意大利、法兰西和不列颠；德意志和中欧(Ashkenazic)；稍后还有东欧。并不存在属于犹太人的单一处境。不过，即使四处分散，犹太人之间的往来依然频繁，这得益于犹太人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基督徒和穆斯林对高利贷的禁止，大部分的货币贸易因此都留给了犹太人。

做犹太人虽然有很多的不利之处，但也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在伊斯兰国家，犹太社团有正当生存的空间，犹太人能够受益于阿拉伯文明的文化和哲学成就；通过这些受益，犹太人获得了理解希腊经典的新途径。特别是在西班牙，犹太文化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期，新式
270 诗歌是犹太文化臻于巅峰的标志之一，比如伊本·伽比鲁勒(Ibn Gabirol，1021—1069)的《忠诚的冠冕》(*Crown of Royalty*)，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在赎罪日(Yom Kippur)前夜至今依旧诵读这首诗歌，比如对《妥拉》的新注释，等等。在创作诗歌赞颂上帝和锡安(Zion)的同时，耶胡达·哈列维(Yehuda Halevi)就卡扎尔人为什么选择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写了一篇辩论性的对话录。在这个充满创造力的氛围中，迈蒙(Mosheh Ibn Maimon)，也就是广为

人知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1204）无疑是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著有一部重要的注释作品《密西拿评注》（*Mishneh Torah*）和一部著名的哲学论述《迷途指津》（*More Nevukim* or Guide of the Perplexed）。在《迷途指津》中，他采用了否定神学的方法——即，你可以说上帝不是什么，但不能说上帝是什么。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迈蒙尼德认为，上帝创世的观念与世界的永恒特性相互兼容（其他哲学家早就多次反驳过这个观点）。迈蒙尼德对基督教的思想家，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影响很大。迈蒙尼德还提出了著名的“十三条”信仰原则，从此，这些原则成为了犹太教教义最常被采用的概括。这些原则分为三组。第一组关注的是上帝：他的存在、合一、无形和永恒。第二组涉及的是《妥拉》：先知的合法性、摩西信息的独特性、书写《妥拉》和口传《妥拉》的神圣本源、律法的永恒与不变。第三组讨论的是奖赏与惩罚：上帝的全知、善与恶的神圣补偿、弥赛亚的来临和死人的复活。

犹　太　年

在中世纪早期，遵循犹太历法的习俗已经完全成形。犹太教一直都强调特定时间的神圣性。随着圣殿的被毁，特别是以色列国土的丧失，犹太人在时间中而不是在空间上确实找到了更多的神圣性。

对于遵循习俗的犹太人来说，每周一次的节律（rhythm）彰显了安息日的神圣性。犹太人认为，一天始于日落而不是拂晓；在周五的日落之时，各家的女人点亮一些特别的蜡烛，对着这些蜡烛祈祷，随后是一顿饭，即神圣的安息日餐。在这（当然）一直延续至下次日落的特殊一天，人们聚集到会堂做祈祷。犹太律法规定，这一天禁止工作。

除了每周一次的节律之外，还有一种每年一次的节律。这一节律始于犹太新年（Rosh Hashnab），十天之后就是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赎罪日”（the Day of Atonement，Yom Kippur）。接下来，依次还有家族性的节日逾越节（Passover）、起初为了庆祝丰收的五旬节

(Shavu'ot, Weeks)[1]和住棚节(Sukkot, Booths)[2]。到了冬天,有献殿节(Hanukkah)[3],为的是纪念马加比(Maccabee)在164年的洁净圣殿与重建祭坛。此外,还有一些神圣色彩较少的其他节日。藉着这每年一次的节律,犹太人重演了他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重温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

除了这个仪式年之外,虔诚的犹太人还要遵守613条戒律;由
271 此,拉比们编出了一张笼罩在生活之上的大网,这张由义务和习俗组成的大网不断地提醒犹太人,他们在这世上有着由上帝所设定的特殊位置。藉着遵循书写《妥拉》和口传《妥拉》所要求的义务,犹太人不但走上了一条伦理的道路,而且实际上也走了一条宗教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遵循律法的外在行为,他们能够内在地实现遵循律法象征着的意义和奉献。

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

毋庸置疑,犹太人虔诚生活的内在意义得到了其社团外在问题的强化。在北欧的许多地方,因为始于1095年的十字军东征,犹太人屡次遭受了大屠杀。在大多数国家,这种反犹情绪随处可见。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犹太人在宗教上不遵奉基督教,而在当时,焦虑不安的基督教教会十分强大,基督教信仰也在不断得以强化。第二,犹太人大多从事商业和贷款业务,他们既在令人羡慕的同时,又反过来受到了羡慕者的压迫。比如,犹太人在1290年被逐出英格兰,在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

12、13世纪,在普罗旺斯(Provence)和西班牙,一场复兴了犹太教神秘主义传统的运动兴起了,这就是著名的喀巴拉(Qabbalah)运动。在很久以前的1、2世纪,神秘主义的传统就已显而易见了,比如阿齐巴拉比(Rabbi Aqiba)的"马车的神秘主义"(Merkavah [Chariot] mysticism)。这里的"马车"指的是先知以利亚(Eliyyahu, Elijah)升天

[1] 或译七七节、收割节。——译注

[2] 或译收藏节。——译注

[3] 或译哈努卡节、烛光节。——译注

时所乘的火车火马[1]，这火车火马象征了神秘主义者向着更高经验领域的内在攀升。

在教义方面，喀巴拉主义者把上帝看作 Ein Sof，永恒不灭、不可言说，而且有点像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太一”；从 Ein Sof 流溢而出的是十种力量或实体，即所谓的 the Sefirot。这些力量具有象征意义地排列成一个人型的图表，如同一个巨人一样。关于这十种力量，不同的列表采用了不同的名字，比如：皇冠或思想（Crown or Thought）、智慧（Wisdom）、理智（Understanding）、伟大或怜悯（Greatness or Mercy）、力量或审判（Power or Judgment）、宏伟（Grandeur）、永恒（Eternity）、辉煌（Splendor）、根基（Foundation）、王国（Kingdom）。据说，这些来自上帝的力量参与了世界的创造。喀巴拉主义者极为重要地探究了沉思和出神的技术，其中，可能受到了苏非主义或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影响的阿布拉斐亚（Avraham Abulafia，1240—？1291）的贡献尤为突出。

喀巴拉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可能有神圣的效果。这意味着，上帝有些需要人类，就像人类反过来需要上帝一样。由此，犹太人可以更为深刻地看待持守《妥拉》戒律的过程：这样的持守行为在天上是有回应的。

在面临基督教欧洲的不断压迫时，这样的观念可能让犹太人特别地感到满意。最后，到了中世纪，犹太人被按照规定严格隔离；在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的隔离状况不太严重，他们可以自行开发新的农田；但是，（尤其是）在德意志和中欧，犹太人被隔离在特定的聚居 272
区之内。

犹太教的诸层面

以下，我们将从犹太人生活的诸层面来概括他们在中世纪的状况。作为拉比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rabbis）的胜利成果——特别是从4、5世纪起——，仪式的生活被事无巨细地规定了。书写《妥拉》和口传《妥拉》的各种戒律，作为对上帝选民的不断提醒，控制了日常生活

[1] 参《圣经·列王纪下》2：11-12。——译注

中的种种行为。在会堂、(同样重要地)在家里,人们要举行许多不同
的仪式。在伦理层面,犹太人被认为应该保持高水准的伦理道德,应
273 该遵守十诫和拉比制定的其他戒律(比如,在中世纪早期,一个拉比法
庭发布了禁止多妻制的法令,然而,一夫多妻的习俗不仅有着《希伯来
圣经》的明证,而且在一些置身伊斯兰文明的犹太人中颇为流行)。

犹太教 关键术语

哈西德派(Hasidim):一场强调神秘主义的运动,兴起于18世纪晚期的东欧(乌克兰和波兰南部)。

哈斯卡拉(Haskalah):19世纪犹太人的启蒙运动,犹太教从此开始接纳欧洲思想和文化开放。

以色列(Israel):作为犹太人渴望焦点的一块土地。

喀巴拉(Kabbalah):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种"广为承认的传统",其具体表达比如(13世纪西班牙的)《光明》(*Zohar*)。

弥赛亚(Mashiah):将在以色列开创新时代的"受膏者"或未来的君王。

诫命(Mitzvah,复数形式为Mitzvot):共有613条,包括10条主要诫命和其他诫命。

拉比(Rabbi):讲授传统经书《妥拉》的老师,犹太社团的学者或属灵顾问。

安息日(Shabbat):"休息"的一天,从礼拜五日落时直至礼拜六日落时。

塔木德(Talmud):犹太教传统的主要文本,以亚兰语写成,有巴比伦式和巴勒斯坦式两种类型。巴比伦式对于所有正统犹太人通常都具有约束力,因为其中包含法律、伦理或哈拉卡(ha-lahic,《塔木德》中不载于摩西五经的口述律法)方面的规定。

妥拉(Torah):摩西在西奈山上所受的教导或律法,有书写的和口传的两种形式,其中,书写的《妥拉》被认为等同于《希伯来圣经》的前五卷。

耶和华或雅威(Yahweh):希伯来语中上帝的主要名字。

在教义层面，对一神论的严格持守是（而且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相比于周围的基督教文化，犹太人维系着一种不同的启示观。他们还在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关于历史的整套神话迥异于基督徒，对于基督徒来说，"受膏者"已经来了。犹太民族的苦难依旧是代表他们这个社团对上帝的特殊奉献的必要延续。周围的基督教文化并未善意地对待犹太人关于历史的神话：基督徒认为，犹太人不可救药地、固执己见地拒绝了《旧约》（当然，犹太人并不认为这是旧的盟约）的真正意思。尽管如此，基督徒依然能够理解《塔木德》的大量评注和口传《妥拉》的全套观念。

在经验层面，犹太人珍视亮光的经验、珍视在历法年的循环与安息日的节律中的团契。[1]凭借喀巴拉主义的技术，犹太人还探究了与神合一的整个神秘经验。在组织层面，通过商务旅行，他们能够把犹太世界的各个不同部分凝聚在一起。尽管不同的拉比法庭在审判上有所差异，但是，由于《律法书》评注的不断积累，不同地方的犹太教获得了一种结构上的相似性。在伊斯兰世界，优秀的伊斯兰文化对犹太人非常开放，犹太人有着不小的回旋余地。而基督教世界则不那么光明，开放的气氛很淡，更多的是对犹太人的压迫；因此，比起西班牙与葡萄牙以及其他"南方的"犹太人来说，德意志和北欧的犹太人内向、保守和孤僻。

在艺术层面，重要场所的装饰和物质资源的调度都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这体现在会堂的装饰和宗教典籍的装潢上。早期的会堂装饰包括：绘有约柜的镶嵌画、七支架的烛台（*menorah*）、棕榈枝和柠檬枝，甚至还有黄道十二宫。会堂仪式的主要焦点是内装有《妥拉》卷轴的约柜，包装的材料后来被不断地加以装饰。在早期的会堂建筑中，妇女似乎并没有特定的处所；不过，她们后来被隔离在会堂的楼座上。 274

进入中世纪后，在西方的犹太教不得不与似乎越来越单一化的西方基督教共处。在东方基督徒中的犹太教也是如此；不过，犹太教还在伊斯兰世界中度过了不少时光。尽管如此，犹太人一旦获得安全，就会再次遇到被征服的威胁。在西班牙，犹太人的处境颇成问

[1] 请参本章"犹太年"中的相关文字。——译注

题；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徒一直在缓慢地驱赶着这个半岛上的穆斯林，直到 1492 年他们才最终驱除了穆斯林，这也标志了天主教徒对这个半岛上的犹太人的最终驱逐。

中世纪的基督教

东方基督教：向外的延伸、向内的进展

1071 年，塞尔柱土耳其人（the Seljuk Turks）攻占耶路撒冷；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这预示着无数的烦扰时光。同年，塞尔柱土耳其人俘获拜占庭的皇帝，这标志了他们向小亚细亚的推进；很快，他们
275 就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塞尔柱土耳其人俘获皇帝的曼齐卡科（Manzikert）大捷是欧洲历史上一次决定性的事件。从此，小亚细亚或安纳托利亚（Anatolia）成为了土耳其人的心腹地带，这个区域和希腊的岛屿在文化上隔断了伊斯兰的东方和基督教的西方。君士坦丁堡则继续存在着。

格列高利·帕拉马斯

格列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1296—1359）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也是东正教的神学家——实际上可能还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者。在七岁时失去父亲的帕拉马斯得以继续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深受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影响的他，逐渐被苦修主义和冥想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在 20 岁时，他来到阿索斯山，在自己的第一家隐修院接受了一位静修主义者的指导，因此也就学会了属于这个灵修传统的呼吸技巧。之后，他先后转往一座位于拉夫纳（Lavra）的大隐修院和一处位于哥罗西亚（Glossia）的僻静地方。但是，由于土耳其人的入侵，他被迫离开阿索斯山，来到帖撒罗尼迦（Thessaloniki）城外隐居，并且成为一名神甫。不过，由于塞尔维亚人的来犯，他又被迫回到阿索斯山。

回到阿索斯山后，帕拉马斯与反对静修主义的人发生了多次

争论。他最著名的争论对手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巴尔拉姆(Barlaam),巴尔拉姆攻击静修主义者是一些"在精神上突出了肚脐"的人(*omphalopsychoi*,即灵魂位于肚脐的人)。巴尔拉姆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但是,皇帝恰巧在当时去世,局势一片混乱。由于牧首的敌视,帕拉马斯被捕入狱。不过,在一位静修主义者当选牧首后,帕拉马斯被任命为帖撒罗尼迦主教。1354年,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帕拉马斯被土耳其人俘虏,直到一年后才被释放。1359年,帕拉马斯逝世。按照帕拉马斯的神学,上帝虽然在本质上是不可认知的,但是,人可以识别上帝非受造的光明或恩典。倘若不断操练静修主义,人就可以与这非受造的光明合而为一,从而成为神圣的(即,所谓"神化"的过程)。这正是对于正教如下教义的解释:上帝之所以成为人,乃是为了人可以成为神圣的。

土耳其人还引发了著名的新兴运动十字军东征。如今,基督徒到巴勒斯坦诸圣地的朝圣之路已被封闭;于是,教廷在1095年挑起了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东征非常成功:基督徒夺回了耶路撒冷,进而掌控耶路撒冷近百年之久。但是,第四次东征出现了偏离,君士坦丁 276
堡遭到了大肆洗劫。之后,一个拉丁化的王国成立了,得以重建的拜占庭毫无疑问地又一次元气大伤。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之外建立的新帝国,不断威胁着拜占庭帝国,而且一直打到了巴尔干半岛。因此,在中世纪,希腊化的东方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防御的位置。1453年,君士坦丁堡最终陷落,对于希腊人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大囚禁;东方正教的力量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莫斯科被视为第三罗马,其他的两个罗马(罗马自身和君士坦丁堡)结束了它们的使命。

尽管处于这样的多事之秋,东方的虔敬生活依然有着一些显著的发展。隐修主义被复兴了,特别是在1052年,一个自治的隐修院共和国(monastic repulic)在希腊北部的阿索斯山(Mount Athos)成立了,这里只有专心于沉思独身和遵循礼仪的男修士。圣格列高利(St. Gregory of Sinai)曾一度在阿索斯山居住,这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强烈倾向于独处的生活,以至于他判定礼仪无关紧要,从而不得不 277



阿索斯山的一些隐修士正在绘制圣像画。这些圣像画大多是复制自拜占庭时期的原作。在作为"通往天堂之窗户"的圣像画中，基督的画像往往最美丽。

离开西奈，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后来，他定居保加利亚，成了日后俄罗斯流浪型圣人（*starets*）①的原型。圣格列高利·帕拉马斯（St. Gregory Palamas，1296—1359）的神秘主义更为正统，他大概是东方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曾在君士坦丁堡宫廷受过良好教育的他，24岁时成为一名苦修者，短期居住在阿索斯山，练习所谓"静修主义"（Hesychasm，字面意思就是"寂静主义"[Quietism]）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精通者善于运用包括控制呼吸在内的各种身体手段，以达到意识的更高级状态，最终获得关于神圣光明的异象。静修主义者遭到了一些批评者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在精神上突出了肚脐"的人（*omphalopsychoi*），即灵魂位于肚脐的人。格列高利争辩道，虽然上帝自身不可理解、不可描述，但上帝拥有非受造的能量：人类可以参与到上帝的光明之中，比如，基督在他泊山（Mount Tabor）变容

① 或意译为"长老"。——译注

(transfiguration)[1]时所放出的光明。人的内心也有这样非受造的光明，只要人能够专注于自己的理智，人就可以发觉这种光明，但由于起初的堕落，人往往会被人世间的事物分心。实际上，静修主义的训练是一种攀升至光明的内在方法。

人若是达致了上帝非受造的光明，实际上人就成为了神明；他经历了神化(theosis，这是正教传统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知道，278
4世纪的圣阿塔那修曾谈到过它)。在阐述救赎计划时，圣格列高利·帕拉马斯重复和总结了正教传统的一些主要意图；与此同时，他对静修主义的捍卫，确保了沉思式探寻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教会不得不经受奥斯曼人的统治；尽管如此，靠着以往时代所恢复的元气，教会依旧能够维持生存。此外，教会在俄罗斯有所发展，第三罗马的理想赋予了俄罗斯正教一种弥赛亚般的味道。

中世纪的西方文化：一个崭新的文明

在中世纪的西方，一个相对同质的文明诞生了，这个文明的重心位于北欧，北欧许多隐修院式的大机构促成了农业的发展和新财富的创造。隐修院的改革，确实是中世纪文化的几个主要根基之一。作为一个重要的领袖机构，910年创立于勃艮第(Burgundy)的克吕尼(Cluny)修院带来的影响不小、引发的改革也不少。11世纪，在修院院长于(Hugh)的领导下，发展迅猛的克吕尼修院建立了许多下属修院。其中的一些修院获得了大量捐赠，因为不少有钱的平信徒把修院看成了一种社会分工，他们向修士付酬，以便修士热切地为他们祷告。同样也在勃艮第的西多(Cîteaux)隐修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革，简化了修士的生活，恢复了圣本笃(St. Benedict)的规矩，而且还建立了为数甚多的下属修院。西多隐修院创立于11世纪末期，五十年以后就有了三百多间下属修院，其中大部分的功劳应该归于明

① 或译"显荣"。参《圣经·马太福音》17:1-8或《马可福音》9:2-8或《路加福音》9:28-36。——译注

谷的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rivaux,1115—1153)卓有成效的布道。在隐修院的圈子之外，还有一些神职人员进行了改革，特别是圣奥古斯丁会的(Augustinian)教士；这些一起住在集体宿舍中的教士自认为复兴了圣奥古斯丁对神职人员提出的理想要求。在以世俗宫廷为样板的教廷，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和律法主义不断增强着教会的等级性。随着教会开始成为［与世俗权力］平衡的权力体系，教廷不断要求更大的权力，从而导致了世俗权威和教会权威之间的苦涩斗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影响深远的新修会。首先是由圣多明我(St. Dominic,1170—1221)创立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这是一群愿以守贫为美好生活的布道者。在开始创立多明我会时，圣多明我的目标是皈化法兰西南部所谓的阿尔比派(Albigensian)异端。然而，圣多明我会的作用不仅限于此，它还在教育方面和后来的宗教裁判所的运作中起过作用。其次是由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1181/2—1226)创立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s)，通过布道和告解，这个修会对普通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同于教会上层的是，圣方济各及其修会追求一种朴实的生活方式。圣方济各这种对守贫的理想要求，日后在其追随者中引发了纠纷。

279 在中世纪，为了教会的缘故，一场关于理想骑士的新动员开始了。为了让那些经常充满暴力、骚动不安的王公贵族与武士发泄能量，十字军东征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军事化的修士团体中，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the Templars and the Teutonic Knights)首屈一指；为了进行军事行动，这些把基督教世界朝东北方向扩展至波罗的海沿岸的修士团体，保存了一些基督教的苦修价值观：因为他们以为，为基督教世界而战是一种实现福音的方式。

这也是一个学术复兴的时代。藉着阿拉伯文的翻译和拉丁文的转译，学者们开始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作家有所了解。这最终激发了不少新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集大成者就是多明我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阿奎那著有多部在天主教思想史上留下持久印记的权威作品，特别是《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e*)和《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

希尔德加德

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可能是中世纪教会活动中最伟大的女性。她是神秘主义者、修女、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布道家。她还坚定地主张,服侍上帝时男女是平等的。生为一个贵族家庭的第十个孩子,她被父母献给上帝,并送给一位名叫犹塔(Jutta)的女修士抚养。早在儿时,希尔德加德就有过她自己称为"永生之光的反映"的异象。她受教(主要是读拉丁语)的小隐修院采纳了本笃会的会规。1136 年,犹塔去世,希尔德加德被推选为她的继任人。希尔德加德得到感召,开始创作她最伟大的作品《认识那些道路》(*Scivias*)。与此同时,希尔德加德变得愈发有名,她所在的圣迪西博德(St. Disibod)隐修院挤满了申请加入隐修院的志愿者。希尔德加德名声大振的原因主要有:她曾写信给明谷的伯纳德,后者认可了她的异象;美因茨大主教听说过她和伯纳德之间的事,也知道她的《认识那些道路》。当时的教皇在主持公会议时,曾命人取来,并在会议中宣读她的《认识那些道路》;结果,这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希尔德加德考虑到加入圣迪西博德隐修院的志愿者甚多,决定在莱茵河对岸的鲁佩茨堡(Rupetsberg)建立另一所隐修院。经过一次争斗,希尔德加德赢得了一批犹豫不决的隐修士,1150 年她移居别处。1165 年,她在厄宾根(Eibingen)创立了一间附属隐修院。她和教皇、皇帝、主教、女隐修院长、男隐修院长、修女、修士和平信徒都有过通信联系。她的布道行迹遍及德意志,比如,在特里尔(Trier)、科隆(Cologne)和罗尔莱内(Lorraine)。除了《认识那些道路》,希尔德加德还著有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创作了题材丰富的教堂音乐,而且为自己的作品绘制了大量插图。但是,由于一些争论,比如,该不该把异端埋在鲁佩茨堡的教堂墓地,比如,关于她的音乐,希尔德加德的晚年过得并不顺利。对于这些争论,身体虚弱、但意志坚定的希尔德加德做出积极的回应。在禁止其隐修院的禁令发出之后六个月,希尔德加德与世长辞。

280 阿奎那的整个体系建基于如下的区分：依据理性可以自然地知道的和不得不源自上帝之启示的。前者的范围十分宽泛，藉着所谓的"五种途径"(Five Ways)，即五种重要的证明，可以推论出上帝的存在。通过这些证据，还可以证明上帝是善的、理智的、无形体的、等等。于是，在这种理性的基础上，阿奎那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哲学大厦。在启示的补充下，这座哲学大厦提供了一套庞大的观念体系，从而为基督徒的生活奠定了精神基础。阿奎那的许多著作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不过，阿奎那还吸纳了其他的一些资源，比如圣奥古斯丁和被圣保罗皈化的大法官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由此而来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区分，使得那些受理性支配的、满怀希望的哲学家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之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当时并不流行，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思想颇为倚重的阿奎那学说遭到了教会当局的怀疑；不过，在后来的思想史中，精确和清晰的阿奎那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诸如此类的思辨与大众的虔敬生活十分疏远，大众往往专注于圣物(relics)、听弥撒和朝圣。不少信徒前往坎特伯雷、罗马、康波斯特拉(Compostela)和耶路撒冷朝圣，由此积攒了不少功德、洗刷了许多罪过。整个十字军东征也是一种朝圣：在刚刚有了自我意识的基督教世界，信徒的巨大热情已被激发，跃跃欲试地想对付那些不信的
281 人。唉，这还包括自己国家中的不信者：经常受到迫害的犹太人和其他异端。于是，在13世纪的法兰西南部，一场针对阿尔比派异端的十字军运动发生了；阿尔比派异端得名于一座重要的中心城市阿尔比(Albi)，他们信奉一种摩尼教式的教义，宣称世界是邪恶的、教会是腐败堕落的。1233年，多明我会开始承担根除该异端的工作。在镇压阿尔比派的过程中，许多残酷的事情发生了。此外，阿尔比派运动对教会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其中的部分原因涉及完全(*perfecti*)这个伦理标准，换句话说，比起同时代的许多神职人员来，那些追求更高贵生活的阿尔比宗教(Albigensian religion)的信徒们的道德修养要高贵得多。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中，兴盛的神秘主义也颇为重要。关于对上

帝的内在经验，在许多方面都堪称最有力度的人物爱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1260？—？1327），给出了大胆新奇、令人兴奋的哲学性描述。对于爱克哈特来说，上帝确实是惟一的存在，每一个受造物都从上帝得到了其特有的存在。于是，人的神秘生活就是在自身之中努力去意识这神圣的存在。这与明谷的圣伯纳德的如下说法不谋而合：把自己消减至无（nothing）是一种神圣的经验。不过，爱克哈特的神学遇到了反对，他所宣称的一些前提也遭到了谴责。

关于与神圣者合一的终极经验，佛兰芒（Flemish）教士吕斯布鲁克（Jan van Ruusbroec，1293—1381）做出了更为个人化的表达："在黑暗中……不可理解的光被生出，这就是上帝之子……"这个时代也涌现了一些强有力的女神秘主义者，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锡耶那的圣凯瑟琳（St. Catherine of Siena，1347—1380）；她认为，上帝的实存存在于真理和爱之中，藉着真理和爱，上帝向由于堕落而自绝于上帝的人类伸出了援手。

然而，中世纪的西方文明还蕴含着不少张力，这些张力预示了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分裂。在不断发展的地方语言和教会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之间，出现了隔阂——由此，还产生了猜疑，正是带着这种猜疑，教会当局审查《圣经》的方言译本。在神职人员是否应该守贫这个问题引起不断争论的同时，教皇和教会上层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在欧洲各地，教会花费大量金钱修建了无数宏伟奇妙的建筑。在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诸侯和罗马教皇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张力。教权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不过，西欧文化依然充满活力，正如它向东北和西南扩展时所显现的一样。穆斯林被逐出西班牙。新财富在意大利被创造。不信者在地中海地区走投无路。一些新技术被发明并被用于探险，在15世纪之前，葡萄牙的船队正在沿着非洲海岸开辟道路，并且登陆过东方。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为躲避土耳其人，大批学者逃往欧洲，为欧洲带来了如潮水般涌入的古典知识。

我们该如何概括在这个时代，在中世纪占尽优势的西方基督教呢？骄傲自大、遵奉同一种宗教、在不信者面前不断增长的自信、教 282
义和哲学的错综复杂、迎合大众的丰富多彩的虔敬生活方式。弥撒、

朝圣、对异端的声讨与定罪、教堂内美丽的壁画、彩色的玻璃窗、圣徒的雕像、装帧精良的书籍、庞大的主教座堂、高耸的教堂塔尖、高级教士的华丽衣袍和普通教士的弥撒祭服、蜡烛、圣水、圣物敬拜、对荣耀的渴望和对地狱的恐惧、炼狱的不同时段、宗教节日和禁食、游行、十字军等冒险的布道活动、圣徒的生平、隐士的苦修、修女的泰然自若、修士们的大隐修院、童贞女的恩惠、拉丁语的祷告、肃穆的圣咏——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幅诸宗教实践的镶嵌画，正是藉着这样的宗教实践，信徒的虔诚通向了神圣的三位一体。教会被包含在一种难以忘怀的特殊综合之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信仰可以信靠；对于虔诚者来说，信仰的方式丰富多彩；对于神秘主义者来说，神学充满了奥妙；对于妇女来说，童贞女成为理想的对象；对于男人来说，信仰充满活力而且让人斗志昂扬。

正是这种综合将会产生分裂——部分因为文艺复兴，部分因为伟大的航海和到新殖民地的冒险，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场宗教革命，即著名的宗教改革。

消失了的诸世界

凯尔特人

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淹没了北方、西方和东方的异教。凯尔特人的、日耳曼人的和斯拉夫人的宗教成为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回忆。不过，它们的幽灵多少有些残存。在这里，我们将枚举出上述宗教来结束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描述——也就是说，我们将尽可能从虽纷繁、却又有些残缺不全的资料中了解这些宗教。

凯撒曾注意到，凯尔特人比任何人都更崇拜神明墨丘利神(Mercury)，凯撒可能把墨丘利神和经常出现于凯尔特世界的卢格神(Lugh)混同了。卢格是一位打败了众魔鬼的年轻神明。如同大卫一样，卢格用弹弓杀死了巨人巴拉尔(Balar)。[1]卢格是丰收之神，和

① 大卫击杀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请参《圣经·撒母耳记》17：41—54。——译注

生育与多产女神有关。最为重要的是，卢格是神圣君权的象征，是来世的管理者。后来，卢格与基督教的某位或某两位圣人融为一体。所有这些，都使我们都看到了对印欧类似观念的仿效。

德鲁伊特(Druids)[①]的情形与之类似，据推测，他们在62年被罗马将军保利努斯(Paulinus)肃清于不列颠。关于德鲁伊特，罗马人有过十分夸张的描述，不过，德鲁伊特这种教士阶层的存在是难以置疑的——他们是印欧社会深层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德鲁伊特的主要职能是管理人们的祭祀生活。一份来自12世纪的记录表明，北爱尔兰(Ulster)[②]依然举行一种祭马仪式。与在一匹白色母马交配后，君王用这匹马所做的汤沐浴，吃它的肉，喝它的汤。这种祭马仪式仿效自位于印欧世界另一端的印度。德鲁伊特有接触神圣知识的途径，可以把人开除出祭祀团体，即把人放逐出社会。

毋庸置疑，膜拜生育与多产女神的团体隐藏于圣帕特里克把蛇赶出爱尔兰的传说之中，因为蛇的首要象征意义就是生育与多产。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与其他凯尔特人一样，爱尔兰人最终在基督教这个新团体中找到了某种慰藉和替代。与卢格一样，年轻的基督打败了撒旦的军队。而且，凯尔特人的圣徒也能轻易地把新的形象赋予众女神。爱尔兰人的知识女神类似于罗马人的密涅瓦女神(Minerva)，热衷于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大地上的果实，博得过不少诗人的歌颂；后来，这位女神实际上变成了圣布丽吉德(St Brigid of Kildare)；在圣布丽吉德的塞尔·达拉(Cell Dara)隐修院所在的地方，有一颗神圣的橡树。根据稍后的描述，圣布丽吉德和其他修女(和维斯太贞女一样，而且毫不逊色地)守卫着一堆用树篱隔开的不灭之火，任何男性不得接近。 283

凯尔特宗教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互隔绝，因此对它的了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进路：洞穴、溪流、圣地、不同种类的神圣树木——橡树、山毛榉和各种冬青树。许多这类的地方被基督教接管了，并且代之以教堂建筑，许多圣徒也使人联想到治病之泉等类事物。为了适

① 凯尔特人中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的有学识的阶层。——校注

② 或音译为乌尔斯特。——译注

应和维系基督徒生活的严肃意图，为了赢得那些浮想联翩的诗性心灵，凯尔特世界的魔力被转化了。

维　京　人

这些斯堪的纳维亚水手的作用令人瞩目，不过，当他们为了安身立命而肆虐他方时，这种作用有时是破坏性的。他们一度控制过爱尔兰和男人之岛的东部沿海地区、苏格兰的南部和西部、英格兰、诺曼底、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的一些流域、冰岛和部分的格陵兰(Greenland)。他们对基督教西方的隐修院往往有着极大的影响。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诱惑。在屈服过程中，斯堪的纳维亚万神殿中的一些神明起了不少作用。

在乌普萨拉(Uppsala)有一个大的宗教中心，这里有三座神像，分别属于如下大神：奥丁(Odin)神、托尔(Thor)神和弗雷(Frey)神。奥丁神是万有之父、术士之首、伟大神秘符号(runes，倘若以印度为参照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吠陀经典中的咒语)的通晓者、法律事务的主管者和阴间的统治者。托尔神既是天空之神又是雷神，还是一名伟大的战神，喜欢暴饮烈酒，因而有点像因陀罗。如果说奥丁掌握了教士的力量、托尔具体代表了武士的力量，那么弗雷就可以说是主管了生育和多产。弗雷的坐骑是一头速度飞快的公猪，这种公猪在古代世界是一种美味。弗雷的妹妹弗雷娅(Freya)是所有女神中最有力量的，她在交往方面广泛而混乱，和所有男神都交配过，从而赋予了这些男神必需的力量。

上述四位神明，在精神上远离三位一体和童贞女。但是，奥丁之子英雄巴尔德(Balder)却不一样；年轻漂亮的他有过痛苦的经历。巴尔德的母亲弗丽格(Frigg)曾让所有生物发誓不伤害巴尔德，却独独遗漏了槲寄生。失明的神明洛基(Loki)向巴尔德扔出一根槲寄生枝条，巴尔德被枝条刺死了。悲痛欲绝的妻子把巴尔德埋在一艘船上。除非所有生物为巴尔德哭泣，阴间女神才会释放他——除了一
284 个女巨人之外，所有生物都这样做了。于是，除非历史终结于世界毁灭(Ragnarök)的大风暴中，巴尔德才会回来。这个非常清晰的世界终结的主题，将在基督教的时代得到不断的加强。这正是“众神的黄

昏"(*Götterdämmerung*)①。

有些学者认为,巴尔德的神话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有可能;不过,我认为,该神话在形式上肯定是彻底"异教化了的",而来自基督教传教士的新信息听来依然鲜活,而且能够引发一些回响。日耳曼人的神话世界黑暗幽深和充满风暴,其氛围大大不同于包裹在学问和理性外衣之下的中世纪基督教神话;这种学问和理性大大超越了在古老的北欧海岸上被看成是知识的那些东西。

关于斯拉夫的话题

同样地,在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我们也发现了印欧诸神的主导性力量。在这些诸神之中,我们也能看到某个前印欧古代女神的轮廓,她掌管死和生,是魔女又是贞女,是母系社会的象征,是在泉水边受孕的、泪汪汪的大地母亲。作为岁月的统治者,白色的神明贝洛博格(Belobog)对抗着黑暗和死亡。在斯拉夫人的世界里,存在着尖锐的两极对立:光明和黑暗、白昼和夜晚、生命和死亡。基督教之前的斯拉夫宗教有着一种近乎琐罗亚斯德教的味道。在诸神之中,与橡树有关的雷神佩伦(Perun)大力履行正义和猛烈攻击敌人。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祖先也非常强大,足以保护乡亲。当一个富人死后,盛装打扮的他躺在一条前往彼岸的船上。他的武器放在身边。被刺死的妻子也躺在他身旁,以便与他共享来生。船和船上的盛装与其他物事,会被一场熊熊大火统统烧毁,随后是一场延续数天的盛筵;人们会精心地维护这种祭奠死者的仪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呈圆形的斯拉夫庙宇建于山顶,内有诸神的雕像(这些雕像业已荡然无存),各处的君主和首领可能曾在此被授予权力。随着基辅(Kiev)作为一个城市的逐步建立,新的知识和新的价值必将兴起。当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有一定的优势,犹太教已被卡扎尔人接受;然而,拜占庭帝国的正教碰巧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于是,

---

① 疑为借用德意志作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的歌剧《众神的黄昏》之名,幽默的用语。另有一意为"世界末日"。——译注

基督被认同为光明之神，撒旦被认同为死亡和黑暗。于是，在教会的神秘主义中，光明只有在自身里面找得到。

在北欧平原，正是上述这些以及其他的文化形式被新兴的基督教所吸纳和淹没。最终，凯尔特人的诗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神话故事、斯拉夫民族的宗教直觉，都在基督教文化中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十字架被描绘成如世界之树"乾坤树"（Yggdrasi）[①]一般，十字架下有新上帝的审判宝座，十字架上悬挂着的不是奥丁而是基督。于是，北方和基督教南方的混合成为了欧洲中世纪文明的标志。

---

① 北欧神话中的大白蜡树，据称根深叶茂，接天入地，连天、地和阴间为一体。——译注

第十二章　古典伊斯兰教和中世纪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传播概况

伊斯兰教，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是顺从惟一神的宗教。7世纪时，它从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起步，迅速向西、向北传播。北到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中亚，西到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班牙和葡萄牙。自公元622年从麦加(Mecca)迁徙到麦地那(Medina)开始，伊斯兰教的政治统治以极快的速度扩展。到664年，这个新帝国已经占领了阿富汗的喀布尔(Kabul)，670年占领了突尼斯的凯万(Kairouan)。到732年，它已经跨越了中亚的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与法国在普瓦提埃(Poitiers)开战——尽管以失败告终。这个第一阶段，一直到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建立并把首都迁至美索不达米亚，可以称之为早期阶段。从750年到1258年，阿拔斯王朝统治着整个或部分的伊斯兰世界，这一时期可称为古典阶段。此后，从13世纪中叶到大约18世纪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形成冲击，我们可以称之为中世纪或前现代时期。 285

总之，在整个阿拉伯中东地区，从北非沿海一线，非洲西北部一直穿过撒哈拉(Sahara)，东非大部分地区直至肯尼亚(Kenya)，伊朗、阿富汗以及苏联控制下的中亚，印度北部和东北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包括土耳其和巴尔干的部分地区，伊斯兰教成了主要的宗教。在整个印度次大陆、泰国、菲律宾、中国、马达加斯加、南斯拉夫和坦桑尼亚，伊斯兰教都是非常重要的少数派宗教。概括地说，它从印度尼西亚的东部一角到西非，形成一个新月状地带。尽管伊斯兰教带有浓厚的阿拉伯文化因素，尤其是《古兰经》(Qur'an)使用的是阿拉伯语，但是大部分穆斯林来自不同的文化。人口最多的伊斯兰 286

国家都在南亚和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

伊斯兰教的主要轮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确立,部分原因在于它有一个奠基人,叫做穆罕默德(Muhammad),在于它有一部根本的文献,叫做《古兰经》,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政治方面:由于伊斯兰教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它不得不迅速做出关于组织结构的种种决定。宗教的故事自然大多要转移到先知的生平故事上去,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安拉使者的生平

先知穆罕默德很可能于公元570年生于麦加。当时的麦加非常繁荣。这是因为它处于战略要地,是从地中海东部,从大马士革(Damascus)那样的富庶城市到从事对印度、斯里兰卡贸易的港口的必经之路。同时麦加还是一个圣地,神圣的建筑克尔白(Ka'bah)就在麦加。麦加因而成为周围部落每年一度的朝圣之地。在一些特定的月份中,克尔白附近的区域是禁地,部落争战的冲突由此得到缓和。麦加最显赫的部落是古来氏(Quraysh)部落,穆罕默德就属于这个部落。穆罕默德幼时父母双亡,靠亲戚抚养成人。年轻的穆罕默德发现自己缺乏从事贸易活动的必要资本。但是一个富有的孀妇赫迪哲(Khadijah)雇用了他,后来又嫁给了他。穆罕默德积极投身贸易活动,但是也有机会沉思:据说他每年要在麦加附近的一个山洞中沉思一个月。

287 610年这一年,穆罕默德开始有一些非常显著的宗教体验,这促使他开始了自己作为安拉(Allah)使者的事业。最初,他只向家人和密友提及他得到的启示。三年之后,他开始公开传教。他所传达的信息并不受欢迎,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攻击多神教,而且这种攻击越来越明确。那些靠麦加神殿谋生的人的生计受到了威胁。而且通常在这类情形中,人们都是倾向于保守的一方。第二,他提出每个人最终都必须听候威严的神的判决。这些伦理规范与麦加城里那些要赚钱的富商的政策并不完全一致。此后,穆罕默德还会传达那些改变社会法律形态的启示,特别是有关婚姻方面的启示。

尽管最初穆罕默德身边聚集了五十多位忠实的追随者，但是他传达的信息在麦加进展甚微。620年和621年，他接待了来自北部城市麦地那的探访者。622年，他在适当的时机下受邀移居麦地那，并担任领袖。麦地那地区陷入纷争状态已有数年，人们希望穆罕默德能够运用外交技巧和他传达的团结信息，给这里带来和谐。穆罕默德做到了这一点，并且逐渐掌控了麦地那的政治事务。此后，反对古来氏人和麦加人的武装斗争开始了。624年，穆罕默德在白德尔(Badr)战役中取胜。在断断续续的几年战争之后，穆罕默德进入麦加，并成为领袖。紧接着在侯乃尼(Hunayn)展开的一场战争，除掉了边远的一些部落，穆罕默德成为阿拉伯半岛一大块土地的主人。288 他已经计划远征叙利亚和伊拉克，但是却于632年9月去世了。

穆罕默德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宽宏大量又极为果断，他的先知体验又使他对信仰确信不移。对穆斯林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人物，备受尊崇又有人追随，实际上，他被认为是完美的，是安拉托付最后启示的最优秀的人。穆斯林反对任何神化穆罕默德的启示，因为这样是在神之外另立他神，是最严重的罪过。但是，在实践中，穆罕默德是最高的道德典范，信徒们紧紧追随他，比基督徒对基督更甚。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关于他的生平积累下来的众多故事。这些故事称为圣训(traditions)，又叫哈底斯(*hadith*)，是根据传述的方法仔细筛选出来的，实际上构成了相对于包括在神圣的《古兰经》中的启示的第二个源泉。

先知和他接受启示的经历

穆罕默德之所以以先知身份开始他的宗教生涯，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他那带有超自然特征的最初体验。地平线上有一个有力的存在，他以为那是神，而后推断出那一定是天使长加百列(Gabriel)。天使长让他读一本书(尽管据说穆罕默德不识字)。根据《古兰经》第96章，他受命奉“主的名义而宣读”。这可能是最早启示的章节。在另外一些时候，先知感受到某些话语到了心头，认为这些也是神启示的。所有这些言词都收集在《古兰经》中。《古兰经》极具力量，非常

神的卓越与无所不在:《古兰经》[①]

真主是天地的光明,
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
那座灯台上有一座明灯,
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罩里,
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
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
那橄榄树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
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光上加光——
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
真主为众人设了许多比喻,真主是全知万事的。
有些寺院,真主允许建立之,
并允许在其中颂扬他的真名。
在那里朝夕赞颂真主超绝万物的,是若干男子。
商业不能使他们疏忽而不纪念真主、谨守拜功和完纳天课,
他们畏惧那心乱眼花的日子。
以便真主以他们的行为的善报赏赐他们,并以他的恩惠加赐他们。
真主无量地供给他所意欲者。
不信道者的善功恰如沙漠里的蜃景,
口渴者以为那里有水,
等到他来到有蜃景的地方时,没有发现什么,
却发现真主在那里。
真主就把他的账目完全交给他,真主是清算神速的。
或如重重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波涛澎湃,
上有黑云,黑暗重重叠叠,
观者伸出手来时,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真主没有给谁光明,谁就绝无光明。
难道你不知道吗?凡是在天地间的人物和展翅的群鸟,都赞颂真主是超绝的。
他的确知道各物的祈祷和赞颂,
真主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

① 引自《古兰经》(24:35—41)。如无特殊标注,本文中所采用的中文《古兰经》都以马坚本为准。——译注

优美，用的是深沉而且具震撼力的阿拉伯语。穆斯林们说，一个不识字的人如何能创作出这样的杰作？不论如何，在《古兰经》语言那种惊人的、神秘的语调之中反映了先知超自然的体验。

还有穆罕默德夜游耶路撒冷圣殿山（那里现在有一座清真寺为标识）的著名旅程。他从那里登上七重天，途中他看见了摩西、亚伯拉罕和耶稣。一日五次礼拜，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被认为都是在这次旅途中确定下来的。这一体验无疑是虚幻的，但是后来虔诚的人常常骑着穆罕默德的飞马布拉克（Buraq），将这变成一次实实在在的旅途。伊斯兰教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用神话包围穆罕默德，让他不只是先知，比如认为神使穆罕默德免于一切罪过。上述解释也是这种倾向的一部分。但是正统的神学家坚持一个奇迹已经足够，那就是《古兰经》的创造。或者更应当说，不是《古兰经》的创造，而是《古兰经》向人类的展示，因为它始终与神同在。

从人的观点来看，《古兰经》似乎是卓越艺术修养的神奇成就。不论如何，《古兰经》在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迅速被记录下来，而且其规定与教诲前后相当一致，不存在阅读《新约》时会遇到的那些问题。 289
《新约》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过不同人的重大编辑后才形成的。

如果仅把《古兰经》视为一本书，认为穆斯林信守圣书里的言辞，那很容易。但是，这却没有体现出《古兰经》在穆斯林眼中的核心位置和力量。如果你要在穆斯林的虔诚中为基督教的道成肉身（耶稣的神圣属性）寻找一个大致的等量物，那就是《古兰经》。它是化为言语的神圣思想和神圣律法：它是贯穿了生命与存在的神秘声音，是来自一个神圣存在的验证。神的属性之一就是言语，而《古兰经》就是神永恒的言语。当然，对《古兰经》的背诵和抄本都是被造的；但是作为神圣的言语，蕴含在《古兰经》之后和内部的东西都是永恒的。所有这些都使《古兰经》拥有了比《圣经》更为深刻的含义和更高的地位。

与《古兰经》并列的，有信徒们代表穆罕默德所作的诸声明。穆罕默德不仅是从亚伯拉罕、摩西到耶稣这一先知序列中最伟大的先 290
知，他还是最后一个先知，是“众先知的封印”（*khatm al-anbiyā*）。正

是他，对安拉的言语做了不可更改的传达。

所有这些都暗示着一个神圣的计划。亚伯拉罕和其他人都是神与人类种族相交通的手段，都是神教导人类“伊斯兰”或说顺从他意志的过程中的一部分。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把先前的宗教领袖放在一个先知序列里进行回溯，这些人由此成为可效仿的对象，由此伊斯兰教也能够宣称自己有着古老的根系，虽然它是各大宗教中最后被启示的。这就使得伊斯兰教可以以一种肯定的态度看待犹太教和基督教，尽管这一做法对这些宗教的信仰者来说似乎有些傲慢。穆斯林自然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篡改了先知们传达的信息，比如说认为耶稣有神性，这就是渎神。对其他两个传统回溯性的承认可以具体化到某些特定的诉求上，比如，说克尔白是亚当所建，由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也叫伊斯马仪[Isma‘il]）重建。无论别人对这样一个诉求的真实性有何看法，穆斯林都会认为这是他们信仰中经纬交错的一部分，确定无疑。

《古兰经》是被启示的，而且将永存，特别是它是不可翻译的，这些特征都赋予伊斯兰信仰以巨大的力量。经文只能是阿拉伯语：不能有非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因为它本来就是被“听”到的宗教。它就像演奏时使用的乐谱。非阿拉伯人可以意译经文作为评注，以助自己理解。但真正的《古兰经》依然是阿拉伯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神是用阿拉伯语来思考的。

穆罕默德所创信仰的诸层面

以穆罕默德的事业和《古兰经》启示为坚实基础，一座新信仰的宏伟大厦矗立起来。在它的帮助下，一个新文明确立了，并长期成为相邻的基督教世界的巨大挑战。这一信仰都包括哪些层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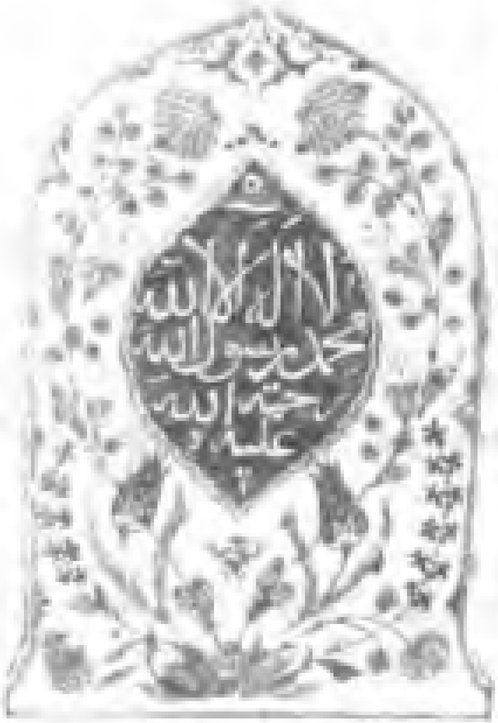
首先让我们从仪式开始。最重要的是，穆斯林有每天礼拜五次的义务。礼拜时要面朝克尔白，并遵循特定的言语和身体动作。五次礼拜的时间是：日出前，正午，午后，日落后，就寝前。[①]穆斯林还应当在斋月莱麦丹（Ramadan），即太阴历每年的第九个月中斋戒：从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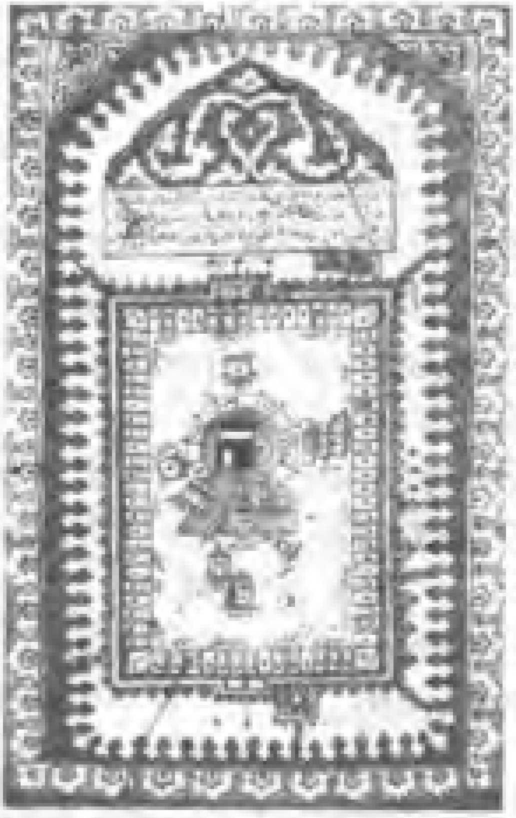
① 中文习惯翻译为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和宵礼。——译注

晓到日落之间不饮食，不抽烟，不行房。每个穆斯林一生应至少尽力去克尔白朝觐一次。这三项规则构成所谓伊斯兰教五柱石之第二、第三和第五条。而第一条则是对信仰做公开表白："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第四条是完纳天课，即礼克特（*zakat*）。因而整个社团都应关注穷人的福利。周五要举行特殊的礼拜，即在清真寺中聚礼，并听取讲道。

穆斯林以克尔白来定位自己的生活，而且只要有可能，就应去克尔白参加每年一度的盛大朝觐（即主命朝），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尽管穆斯林社团可能不时被政治或宗教的纷争割裂，但是社团的团结总是不断被提醒注意。 291

关于早期伊斯兰教经验的层面，很明显，先知穆罕默德本人所见的景象以及安拉令人敬畏的力量，不仅在《古兰经》中留下了印记，也





左：教义层面：刻写在一块16或17世纪土耳其瓦片上的"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右：印制在一块17世纪的土耳其瓦片上的麦加平面图。

对整个社团认识神超绝的本性产生了影响。在伊斯兰教中，最深重的罪就与这种认识有关联：那就是舍克（*shirk*），即认为还有其他神可与惟一神并立。因此，我们对神超绝一切的存在有了一种认识，他出于慈悲之心，与人类相交通，以引领人类走上正途。我们会看到，此后将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神秘的体验：这种感觉靠沉思得到，也存在于沉思之中。这要归功于苏非（Sufi）运动。

至于伦理层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早期穆斯林的道德与在神的指

伊斯兰教 关键术语

安拉（Allah）：惟一真神

哈吉（Hajj）：朝觐麦加，鼓励每个穆斯林履行

伊玛目（Imam）：领拜人；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指社团的十二位伟大领袖，其中最后一位已经隐藏或说隐遁起来，将在历史的末尾重返人间。

吉哈德（Jihad）：为伊斯兰而进行的斗争，既指正义的战争，又指精神的奋斗。

纳比（Nabi）：先知。其中有些是犹太传统中的著名角色，还包括耶稣。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

《古兰经》（Qur'an）：神圣的启示或说神的语言。它是永恒的，被揭示给了先知。

萨拉特（Salat）：崇拜或礼拜，穆斯林应每日举行五次。

沙握姆（Saum）：斋戒，特别是在莱麦丹月的日出和日落之间进行，针对每个穆斯林。

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

苏非（Sufi）：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者。分属于不同的塔里卡（*tariqas*）或教团。

乌玛（Umma）：整个伊斯兰社团。

札克特（Zakat）：施舍穷人。和信仰的表白、礼拜、朝觐、斋戒一起构成伊斯兰的诸柱石。



叙事层面:656 年,奥斯曼·伊本·阿尔凡('Uthman ibn 'Affan)遇刺之后,穆斯林宣誓效忠伊玛目阿里。这是关于什叶派开端的叙述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292 引下建立一个善好、正义社会的政治任务完全交织在一起。认为法律或说沙里亚(*shari'a*)占据中心位置的观点贯穿着伊斯兰教历史的始终。对神的顺从应当导向对人类平等的认同。男女的权利有所不同,但是从原则上讲,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社会立法和缴纳济贫税强调我们对穷人的宗教义务。应当培养人的仁慈之心,尤其是丈夫对妻子的仁慈之心。多妻制是允许的,但是每个男人限娶四妻。而且有嫁妆制度和有关离婚的立法对妇女的权利予以保护。先知穆罕默德本人作为榜样被大家效仿,哈底斯就是道德启示的重要源泉。

从制度层面看,伊斯兰教从开始就组织为一个国家,只是后来整个社团,即乌玛(*umma*)逐渐分裂了。从理论上讲,乌玛应该团结在一个领袖、或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khalifa* 或 *Caliph*)之下。在此后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哈里发制度不断复兴。从狭义的宗教制度来看,在伊斯兰教早期就有引领礼拜的人,后来还出现了神学和教法的专门解释者。

295 从教义层面看,伊斯兰教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宇宙创造者的神的独一性。神以人为摄政,行使对大地的统治,这是为了人类自己的根本利益。尽管《古兰经》在不同之处各有侧重,但是人们倾向于认为,神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古兰经》被认为是神永恒的言语。穆斯林对于自己所认为的基督教中的三神论,持强烈的谴责态度;但是对于神,可用多达 99 个的称谓予以称呼。第一个就是拉赫曼(*al-Rahman*),即"至仁者"。其他比较常用的称谓包括哈菲兹(*al-Hafiz*),监护者;哈卡(*al-Haqq*),真理;卡迪尔(*al-Qadir*),全能者;拉希德(*al-Rashid*),指引正道者。

至于叙述层面,我们可以到,伊斯兰教的历史中蕴含着一个从亚伯拉罕,其实还比亚伯拉罕更早,即从亚当到穆罕默德的先知链条。在穆斯林所理解的人类历史中,最后一位先知的来临当然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穆斯林社团在早期所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以及强有力的征服,就是安拉的荣耀与安拉的仁慈的迹象。世界末日最终

会伴随着不同的迹象而来，耶稣的降临[1]，还有大火会驱使人们去接受审判。

从物质层面来看，伊斯兰教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礼拜场所。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场所才成为伊斯兰建筑的一种荣耀。由于禁止对神进行任何具体的表现，进而又扩展为认为人的脸和形体中包含有神的形象亦加以禁止，因此书法逐渐成为一门艺术。但是在早期，伊斯兰教物质的层面主要就是麦地那城和麦加城。朝觐的所在地就在麦加，整个朝觐活动都围绕麦加进行。比如说，麦加城东的米纳（Mina）谷，穆斯林须在那里住宿一夜；还有阿拉法特山（‘Arafat），正是在那里，穆罕默德第一次体验到幻象。

超越早期阶段：古典伊斯兰教的形成

先知去世后的头几十年，关于领导权的纷争不断出现。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Abu Bakr）首先被任命为继任者。他统治两年后由欧麦尔（‘Umar）接任。欧麦尔对日益扩大的阿拉伯帝国进行了相当简单的组织划分：追求战争和信仰的阿拉伯人，还有非阿拉伯人。后者中有相当部分的非穆斯林，他们需要交纳赋税，但是额度要比原来他们承担的赋税为轻。继欧麦尔之后进行统治的是奥斯曼（‘Uthman）。奥斯曼的遇刺引发了伊斯兰教中的第一次内战，因为有人反对由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Ali）来接任。661 年，阿里遇刺。680 年他的儿子侯赛因（Husayn）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遭到伏击，成为什叶派（Shi‘a）运动中第一位重要的殉教者——这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及。在穆阿维叶（Mu‘awiyah）和他的继承人统治下的倭玛亚王朝（Umayyad dynasty），以叙利亚为中心，成功地推行了令人炫目的军事扩张政策。

750 年发生的一场革命最终使阿拔斯王朝掌握了权力。新都达 *296*

---

① 按伊斯兰教的理解，作为众先知中的一位，耶稣的降临只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众多迹象中的一个。——译注

尔·萨拉姆(Dar-es-Salam)[1]修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伊斯兰教由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文化新阶段。不过后来,由于出现了数个哈里发相互争斗,国家陷入分裂。在北非,969年开罗被攻陷,并成为法蒂玛王朝(Fatimad dynasty)灿烂的首都;在西班牙,科尔多瓦(Córdoba)从929年开始被第二倭玛亚王朝所统治。伊斯兰社团固然被分裂了,但这是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杰出时期。各种压力依然存在,其中之一就是什叶派在政治上的不满,他们忠于阿里的子孙,反

阿里

阿里(? 600-661)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也是伊斯兰教传统中的第四位哈里发。他娶了穆罕默德的小女儿法蒂玛(Fatima)为妻。在什叶派看来,他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先知在世期间,他以巨大的勇气维护先知,年仅十岁时,就成为最早认识到先知神圣使命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先知去世之后,阿布·伯克尔担任了哈里发,阿里某种程度上从公共生活中隐退了。但是二十多年之后,内战爆发,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被刺,阿里被推举为社团领袖。他选择库法(Kufa,在现伊拉克境内)为首都。内部的纷争依然存在。先是先知的遗孀之一的阿以莎('Ā'ishah)率人征讨他未果。接着是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h)发兵进攻。在一场结果不明的仲裁之后,阿里一方中的一些人——即哈瓦利及派(Khārijites)与阿里决裂出走。661年,一个哈瓦利及派成员在库法行刺阿里。他的遗体被秘密埋葬在纳贾夫(Najaf)附近,并成为什叶派信徒朝圣的一个重要场所。

阿里由于所具备的各种品质备受尊崇:他聪慧,因而成为睿智的典型;他慷慨,不在意世俗生活的清贫,他勤于礼拜,他勇气过人,他谦卑;他的宝剑在传统诗歌中也被人格化了,拥有它是极大的荣耀。在后来的想像中,他的妻子也被拔高:她是完美的女性,被称作天堂之女(Lady of Paradise)。

[1] 意为和平城。——译注

对崇尚圣训的逊尼派(Sunni)。

新的宗教力量出现在伊斯兰教之中。一个是希腊知识,特别是哲学,对伊斯兰神学产生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神秘主义的运动,即苏非主义,它把沉思的方法带到了伊斯兰教实践之中。与此同时,由于必须对伊斯兰教法进行解释,不同的教法学派成长起来。

伊斯兰教神学的发展

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第二和第三个世纪(约公元700—900年),诸多重要潮流中的一个就是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ah),它是凯拉姆(*kalam*)或说教义学的集大成者。在对理性世界观的探索中,该派 297
吸收了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atomism),但却扩展了其含义。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孤立的和不可分割的)即时事件和原子事件的序列,人类的行为亦包括于其中。在人行动之前,神会即时赋予他力量;但是选择在此后发生,而且是由人做出的。同时,穆尔太齐赖派不愿使神具备"神"之外的属性,因此他们不承认《古兰经》是神的语言,是不朽的。而认为《古兰经》是神创造的,不会永恒。

穆尔太齐赖派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建立在神是正义的这一观念之上。因此,不可相信任何形式的前定论。他们以这些方式维护了理性主义的立场,并一度成为巴格达宫廷的座上宾,其学说也成为官方路线。但是他们的观点中有些因素并不受欢迎,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对《古兰经》永恒属性的否认。而且他们激烈反对拟人说,认为《古兰经》中关于神有手,或是神坐在宝座上的说法都是隐喻。

对逊尼派或说主流传统做了决定性系统阐释的,是艾什尔里(al-Ash'ari,873—975)[①]。他认为,那些拟人化的表达字面上是用于神,但却是以我们不能理解的方式来应用的。他坚持认为《古兰经》具有和一切受造物不同的属性,它是永恒的,而永恒正是神的属性之一。他还认为,神是全能的,神决定了人类的全部行为。实际上,这一观

① 疑有误,应为873—935/936。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及《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一卷,530页。——译注

点就成为主流伊斯兰教对前定论的一种态度。男人和女人行善或是作恶，上天园或是下火狱（包括那些有罪的真信士的命运——进炼狱）都是前定了的。

苏非派的传播

苏非派的名称来源于"*suf*"，即苦行者所穿的粗羊毛衣。该派试图为个人生活注入某种精神性的因素，以补偿经历了显著胜利之后伊斯兰文化的某些过分行为。苏非派潜心于苦行禁欲的修炼，但它最关注的是神秘主义的沉思。苏非们渴望意识的净化，带有二元色彩（以我为主体，以神或是世界为客体）的普通意识将在净化后消失。因此，他们常常谈及与神合一，甚至是融入神之中或是成为神。这与主流的正统信仰完全不合。伊斯兰教一直非常强调神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苏非的一些主张会被视为渎神。苏非们似乎认为，通过自我的寂灭，人会为神腾出地方，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也就成了神。正统派反对这些观点，也就毫不奇怪了。

苏非运动开始于那些专注于虔诚修炼的组织。组织中逐渐形成了由一个领袖，也就是谢赫（*shaykh*）来担任精神导师或是师傅的习
298 俗。这些组织不仅发誓过简单的生活，而且进行各种形式的沉思，与基督教以及印度神秘主义中的冥想团（contemplative orders）非常相近。也许所有苏非中最著名的是哈拉智（al-Hallaj），他身上就体现了处在这种状况下的某种张力。哈拉智敬仰耶稣，并效仿之。当然这里的耶稣也是伊斯兰教的先知。据说他曾说："我即真实（*al-Haqq*）"。这就等于在说他就是神。他学说中提及最多的就是神之爱，而且他还公开谈到自己的神圣体验。结果，他被指控渎神，公元922年被处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苏非们称自己为"真主之友"，他们那极度的虔诚和狂热的学说对伊斯兰教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来自波斯东北部的伟大哲学家安萨里（al-Ghazali，1058—1111）以一种温和的形式，为苏非派做了有力的辩护。他放弃了在巴格达的大学里的教授职位，过起了苏非的生活。这为以后他蒙召担当重任，对苏非派进行思考，展示苏非派与正统信仰之间深刻的兼容性做了智识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苏非们的言论有时是相当过分的。安萨里认为，对苏非的言论不能仅从字面含义来理解。苏非达到合一的最高境界，就像一个人喝醉了酒——苏非们也常常以此自喻。这一状态下他们的话语，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说出的。一旦出了这种状态，他们会认识到，无论自己能与神多么接近，但神圣的存在与人类灵魂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

苏非派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圣徒们在许多社会中都受到人们的尊敬。巴拉卡(*baraka*)，即北非圣徒神秘的力量，中亚萨满的特征，以及印度瑜珈修行者的威望，这种种表现都被苏非所取代。对于伊斯兰教在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传播，苏非更是功不可没。

伊斯兰教法的发展

随着伊斯兰社团的壮大，以及文化和时间的变迁，拓展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势在必行。总的来说，确立评判的标准非常重要。法律的四个根源衍化了出来。第一个根源是《古兰经》。如果《古兰经》中明确提到一条法律，那它就是必须履行的。第二个根源是圣训，或叫做逊奈(*sunna*)。这就是关于先知生平和言论的总汇，即哈底斯对整个体系的重要之处。第三个源泉是类推，即根据关联性进行推理，也叫伊智提哈德(*ijtihad*)。第四个是伊制马尔(ijima‘)，也就是公议。

到10世纪和11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法律思想的主体结构已经确立。其影响最终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减弱，据说“伊智提哈德的大门关闭了”。几大主要学派已经形成，运用所谓补缀体系来变更法律渐成惯例。即，当一个学派的裁决过于严厉或不够严厉时，便采用另外一个学派的裁决，如此等等。不同学派流行于世界不同地区：哈奈斐 *299*
学派(Hanafi)盛行于印度次大陆、中亚、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马立克学派(Maliki)盛行于北非；沙斐仪学派(Shafi‘i)在东南亚；罕百里学派(Hanbali)在沙特阿拉伯；(什叶派的)加法里学派(Ja‘fari)在伊朗；哈瓦利及派(Kariji)在阿曼和东非。

伊斯兰教法包罗万象，从道德到民法，从刑法到礼仪。有趣的是，所有的行为被分为五类：义务的行为；嘉许的行为；禁止的行为；

可恶的钟为和无关紧要的行为。这一五重的区分使伊斯兰教法具备了许多精妙之处。

拉比亚

拉比亚(Rābi'ah,731/7—801)是伊斯兰教中一个著名的女神秘主义者。她出身贫寒,被卖给巴士拉(Basra)的一个富人为奴。不过,在发现了她明显的虔诚之后,主人让她重获自由。此后,她过着隐士的生活,先是在沙漠中,而后在巴士拉。她终身未婚(这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极为罕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与神的交际。据说,她是将纯粹的神爱观念引入苏非思想的第一人。移居巴士拉时,由于她的苦行和圣洁,身边聚集起了一批门徒。她的一生被各种传说所笼罩。比如说,有人曾见她手里同时拿着燃烧的火炬和一桶水,这表示她要点燃天园,将水泼入火狱,使天园与火狱没有区别。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希望进天园或是害怕下火狱而去爱神。另外一则故事说,当她去麦加朝觐时,克尔白向她移动,欢迎她的到来。毫无疑问,火炬和水桶的故事反映了她的情感。从她之后,对神无私的爱的主题就贯穿在苏非传统之中。而她作为女人的性别身份,并未影响她作为圣徒和神秘主义者的地位。阿塔尔('Attār),著名的《圣徒传》(*Biographies of the Saints*)的作者,给予她非常高的评价。拉比亚并无著述,但是她的祈祷词和言谈被收集起来,深受欢迎。她的一生既被视为普通人的榜样,也成为后世的神秘主义者和苦行者的典范。除了伊斯兰教产生时的一些妇女外,她或许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吉哈德或奋斗

从历史上来看,穆斯林法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存在这样一种观念:穆斯林有为信仰而奋斗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向其他信仰主宰的领域扩张的义务。把世界分为伊斯兰地区和战争地区这样两个区域的做法在古典时期已经成为惯例。向多神教徒

宣战，向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宣战，直到他们交纳人头税（*jizya*），表示
承认穆斯林统治的最高权力。这反过来也保护了“有经典的人”（the 300
People of the Book）非穆斯林不用服兵役，尽管他们可以作为志愿
者参军。斗争的义务，也就是吉哈德（Jihad），有时被视为伊斯兰教
的第六柱石。直接要求战斗的教义已经通过许多途径被弱化。可以
说，《古兰经》中提到的早期的战争都是自卫；据说还有比真正的战争
更为重大的斗争，即内心信仰的斗争，消除诱惑、排除障碍以真正顺
从真主。苏非派的学说尤其注重这一点。

什叶派的兴起和伊玛目的概念

在逊尼派的学说和法律解释主宰伊斯兰教的同时，什叶派文化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伊朗和伊拉克盛行。追根溯源，什叶派源自于作为先知堂弟和女婿的阿里家族与倭玛亚王朝之间的冲突。阿里的追随者认为，阿里才是先知真正的继承人。680年，什叶派的第三伊玛目（Imam），或说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先知的外孙侯赛因被诱往伊拉克，和一群追随者一起在卡尔巴拉被杀。每年穆赫拉月（Muharram）第十天的节日不断对这一殉难行为进行纪念。当象征性地带着侯赛因的血和箭的马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当侯赛因陵墓的模型被抬上大街，历时十天的纪念侯赛因之死的游行活动就达到了高潮。这种活动对那些想强调伊斯兰教的受难殉教主题的人非常有吸引力。它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也许要部分归于侯赛因这一主题与基督之死的相似性。

但是，随着什叶派运动在古典时代的逐渐壮大，比殉难这一主题更为重要的是宗教领导权理论，即伊玛目理论（Imamate）。在伊斯兰教中，伊玛目一词可以指清真寺中的普通领拜人。不过它更重要的含义是指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理论上说，伊玛目和哈里发应当是一样的。但在实践中，由于不正当的继承，哈里发制度被迅速破坏了，伊玛目的继承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线索。什叶派的主流派承认有十二位伊玛目，因此他们有时被称为“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s），以与伊斯马仪派（Isma'ilis）相区别。在伊斯马仪派看来，765年第七伊

玛目伊斯马仪(Isma'il)去世后,伊玛目的传系就结束了。十二伊玛目派则认为,最后一位伊玛目穆罕默德在孩童时代就隐匿了起来,但是将他重新出现。第十二伊玛目的形象类似于弥赛亚,他被称为穆塔扎尔(al-Muntazar),意思是被期待者。

此后这个观念发展为最后一位伊玛目处在隐遁(*ghaybah*)之中。最初,有一系列代理人按照隐遁伊玛目的意愿行事;但是当所有的代理人都去世,从941年起,"大"隐遁("major" concealment,英文中通常称之为occultation)开始了。据信,隐遁伊玛目依然生活在不可见的神的领域中、像天堂一样的环境里,这一观念对什叶派伊斯兰
301 教是一个非常强大有力的感召。通过梦与幻觉,尘世的领袖有可能与隐遁伊玛目相接触。但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最伟大的英雄是以血殉教的侯赛因,以及社团领袖处于隐匿之中,这些事实意味着无为主义、接受他人政治统治的趋势一直存在,尽管什叶派王朝最终在伊朗掌握了政权。

因此,对于伊斯兰教的历史和成果,什叶派与注重圣训的逊尼派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在教义上,什叶派认为有光引导着伊玛目的承继,这光传自于先知。在仪式上,产生了对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的崇拜,这有点类似于对圣母玛丽亚的那种崇拜;对侯赛因之死的纪念标志着对受难的强烈认同(在什叶派世界的某些地区,在穆赫拉月[Muharram]自残身体司空见惯,有些人往往遍体鳞伤)。从经验角度来看,苏非派贯穿逊尼、什叶两大主要社团,在什叶派中地位牢固,不过苏非派的作用本是帮助逊尼派抵御什叶派的进一步扩展。因为诺斯替(隐秘的知识)主题和秘密的实践在什叶派中都非常重要。在苏非运动的推动下,隐秘的知识也成为逊奈的一个常见特征。尽管宗教想像可能由于苏非的内心体验愈深,而愈加外化为某种正统。至于制度层面,什叶派有自己的知识权威圈,这些人代表着与主流伊斯兰教不同的脉络。从伦理和法律角度来看,除了穆塔尔(*mu'ta*),即在固定一个时期中的临时婚姻之外,什叶派在大多数事务上与主流意见一致。

什叶派中的伊斯马仪支派

伊斯马仪派最著名的成就是于909到1171年之间，在北非和埃及建立了法蒂玛哈里发王朝。这是一个熠熠闪光的时期，发生在此时的众多重大事件中，就包括艾资哈尔(al-Azhar)大学的建立，该大学在法律和神学方面的判断此后将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规范。伊斯马仪派的时钟停在了第七伊玛目那里。根据该派的宇宙论，世界是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所创造的，经过了由神而来的一系列流溢而成。就这样，他们把新柏拉图主义的元素编织进了此后关于创造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解释之中。因而，世界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六个先知开始，于穆罕默德时达到顶点。七位伊玛目到伊斯马仪为止。伊斯马仪会复临，并成为第七位先知。他将废除伊斯兰教法。

非常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观念，即众先知所说的话必须经过特殊的“沉默的人”(silent ones)的解释，因为先知的话语中另有隐义。换句话说，整个伊斯马仪派的系统都以隐秘的知识为基础。这一系统中还包含着等级式的品位制，并有道路导引向上。该派的反对者谴责他们的种种错误，包括他们在最高品级中无神论的隐秘教诲，以及最终对法律的漠视。伊斯马仪派一度习惯于以暗杀个别仇敌代替战争，因为以大麻麻醉决定献身的刺客而备受指责。暗杀(即阿萨辛，assassin)一词就是由此而来，并在十字军时代传入西方。 302

伊斯兰教的分支：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

什叶派传统中还衍生出了另外一个派别，德鲁兹派(Druze)。该派是根据其创始人之一达拉兹(al-Darazi)命名的。另外两位创始人是波斯人哈姆扎(Hamzah)和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哈齐姆(al-Hakim，985—1021)。后来两人都在1021年被杀，达拉兹则死于此前大约一年。这三位领袖都进入了隐遁。德鲁兹派的信仰以哈齐姆所谓的神性为中心。哈齐姆确实视自己为神，并对逊尼派、犹太人和基督徒进行迫害。他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墓大堂(the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他的敌人认为他丧失了理智；但是德鲁兹派信徒认为他是神的化身，注定最终要重返大地，统治全世界。德鲁兹派在

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盛行，并发展成了一个双阶层的社会。那些知识渊博的人构成精英阶层，他们已经完全入了神秘教义的之门；他们被预设要过一种无瑕的生活，还要戒绝暴力。而普通大众有比较宽松的伦理规范。德鲁兹人只在内部通婚，其品级对外封闭，这些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

另外一个相对较小的派别是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阿拉维派（Alawi）。他们自称属于什叶派传统，但又受到十字军时代基督教思想和实践的些许影响。对于严格的伊斯兰教实践而言，该派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比正统的什叶派传统更为松散的民间传统。他们长期以来被德鲁兹人视为不信仰者。

这些支派都非常有趣地显示出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思想的融合。不过，尽管数世纪来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政治中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古典时代的伊斯兰教广义上还是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在其主要影响范围内，这些支派无足轻重。

中世纪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西班牙：伊本·鲁世德和伊本·阿拉比

两个广为人知的伊斯兰作家，一个是哲学家，另外一个是苏非，都来自西班牙。这本身就显示出，在西班牙，尤其是在12、13世纪的西班牙，繁盛的西班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相互融合，产生了多么丰饶的成果。伊本·鲁世德（Ibn Rushd，1126—1198）在西方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知识中心科尔多瓦接受教育，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和塞维利亚（Seville）担任法官。他受苏丹的委托，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撰写概要和评注。他使其他地区的学者，包括阿奎那（Aquinas）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立场的特点，即认为事物永恒存
303 在，众多单个的灵魂在死亡时会合为一个主动的理智（Active Intellect）。这似乎是对个体不朽的否认。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这些观点是颇有争议的，确实也与常见的对《古兰经》的解释不同。伊本·鲁世德给安萨里（Ghazali）的名著《哲学家的矛盾》（*The 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作了非常著名的回应，叫做《"矛盾"的矛盾》（*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据大家说，伊本·鲁世德是一个好穆斯林，但是晚年他却和同道的一些研习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被指控为反宗教、并遭到放逐。

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1165—1240)在塞维利亚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同时又受到那里的苏非教师生活方式的吸引，逐渐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据说在他一次游历科尔多瓦的时候，曾与伊本·鲁世德相遇，据推测他还在辩论中赢了后者。但是，正如伊本·鲁世德的境遇所显示的，当时的环境颇不宽容，并不利于伊本·阿拉比身上的神秘主义倾向。这似乎限制了他的写作和思考。因此，三十多岁时他离开西班牙前往中东。他拜访了麦加和克尔白，最后定居在大马士革。在西班牙时，他认识一位年老的著名女苏非，叫做法蒂玛。在他看来，法蒂玛的面容似乎沐浴在光之中。他在麦加又有了一次相似的经历，但这次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尼扎穆(Nizam)，一位来自波斯、待他如友的苏非长老的女儿。他为她写了一首绝妙的诗歌，名字是"温慕解人"("The Interpreter of Warm Longings")。有人批评他写得放浪，但是此诗却另有深意。因为，这里的"她"是神圣的智慧(*Sophia*)的象征。纵观他后来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坚持所谓深度解经学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文本的表面来解释文本，对于《古兰经》也是一样。

作为亲身体验的结果，伊本·阿拉比在两本独特的著作《麦加的启示》(*The Mecca Revelations*)和《智慧的珍宝》(*The Jewels of Wisdom*)，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系统阐释了关于独一的哲学。在对独一的体验中，个体的经验完全消失了，即"寂灭"(*fana'*)。只有独一存在，所有主体和客体的意识全部消失。当他重返人世时，神秘的体验"永存"(*baqa'*)，在永存中，他在独一的光里看到了多。独一自身就显现为神，就是创造的世界(world of creation)。伊本·阿拉比的体系与印度传统中的不二论吠檀多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的思想后来对但丁(Dante Alighieri)产生了影响。

蒙古人入侵之后的发展

由于蒙古人在成吉思汗领导下开始的入侵，13世纪成为一个可

怕的毁灭时期。13 世纪初，中亚和波斯帝国的一些穆斯林中心被摧毁。1256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汗（Hülegü Khan）攻陷了巴格达，屠杀了大批穆斯林。蒙古继位者驻跸波斯，伊尔汗（Il-Khan）国
304 最终被伊斯兰教争取了过来，蒙古统治者开始青睐这一信仰。此后，贴木儿领导的突厥势力所造成的毁灭贯穿中亚，直到印度，穆斯林在那里的首都——德里被洗劫。但是，贴木儿的后代巴布尔（Babur）在德里建立了统治，创建了莫卧儿帝国。该帝国日后成为伊斯兰教和艺术的重要支持者。

与此同时，虽然莫卧尔人对新兴的奥斯曼政权予以打击，但是后者还是在小亚细亚一路前进。奥斯曼人也是突厥人，他们采用联合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方法，最终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并统治了其原有的大部分疆域。在 15 世纪，尽管伊斯兰教已经被逐出西班牙，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它正经历着一场复兴。伊斯兰教已经完全进入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它借助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支持大行其道，风风火火穿过撒哈拉沙漠进人黑非洲。尽管中世纪的伊斯兰教与上升的欧洲势力发生着冲突，但这依然是一个建设性的阶段。在中亚，在印度，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内，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书法以及绘画繁荣发展。

中亚和南亚的伊斯兰教

帖木儿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在他统治时期，中亚地区非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实际上已经被清扫一空。但是该地区信仰的巩固，还要归功于苏非教团。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在大众的想像中，神秘主义者的陵墓往往比清真寺有势力，苏非们聚集和礼拜的房屋，被视为新的虔诚的象征。14 世纪，影响很大的纳合西班迪教团（Naqshbandi order）在布哈拉（Bukhara）建立。其成员既包括知识阶层，也包括文盲。教团创始人位于布哈拉城外的陵墓，成为该地区信徒著名的朝圣之地。其他一些教团引进了萨满教的一些惯例，也有助于在伊斯兰教世界和本土宗教之间搭建桥梁。

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将中亚和印度的主题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融会而杰出的文明。不可否认的是，阿克巴大帝在位期间创建一

种多元意识形态的努力失败了，还有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紧张态势，在阿克巴的继承人奥朗则布(Aurungzeb)统治期间尤为严峻。莫卧儿皇帝当中最有创造力的，也许当数汗·贾汗(Khan Jahan)，他于1627年登基，是红堡(Red Fort)和泰姬陵(Taj Mahal)的最终创造者。这两个建筑把波斯和印度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综合成伟大的新建筑。同样叹为观止的还有阿克巴的城市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①]，因为不能确保水源供应，那里最终成为一座空城。

在印度和在中亚一样，大部分传教活动都是由苏非教团来完成的。苏非长老的形象我们并不陌生，他与古鲁、娑度(*sadhu*)[②]、瑜珈修行者非常相似。苏非教团心甘情愿迁移到边缘地区，而不固守权力中心。他们会说各种方言，从孟加拉语到泰米尔语，他们还参与这一时期广为流传的信瑜珈(*bhakti*)[③]式的宗教活动。他们潜心于社 305
会仪式，充任印度社会中相应的角色。有时，穆斯林游方苦行僧看起来和印度苦行僧非常相似，按照普通穆斯林的标准，他们很难受到尊敬。比方说，他们的身体相对裸露太多，使用肮脏的灰烬，诸如此类等等。对有些人来说，成为穆斯林具有一定的社会优势，印度教世界不得不为其贱民制度付出代价。

从更为智识的层面来看，伊本·阿拉比的影响非常重大，因为他的思想中体现了与印度教神秘传统相宜的观点。此后同样重要的是，从奥朗则布时代开始，玛德拉萨(*madrasahs*)，即受大量捐赠支持的教育机构到处建立，这就培养了一个研习伊斯兰教学说和法律的本地学者阶层。

---

① 位于现印度北方邦西南部。1569年阿克巴大帝以此为都，建有辉煌的大清真寺和其他优美建筑。因缺水，1586年迁都德里。——译注

② 印度人对宗教界人士的称呼。不仅包括不同宗教的真正圣人，还包括出家修炼的男女、林居隐士、术士和不同宗教倾向的占卜家。通常聚居于隐修院，或是四处云游，或独居斗室、岩穴。一般都许绝财和绝色愿，靠在家信徒施舍为生。——译注

③ 瑜珈修炼方法之一。主张通过对神的虔诚崇信来达到解脱。认为信徒不需高深的知识，只需在感情上对神无限忠贞虔诚，就可达到与神的结合。——译注

中世纪伊斯兰教的诸层面

在对中世纪伊斯兰教的成就进行考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在宗教的不同层面上显现出的一些变化。

仪式层面，从印度尼西亚到西非，从布哈拉到桑给巴尔(Zanzibar)，朝觐和每日礼拜实际上在何时何地都具有普遍性，因此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许多地区，由于民间宗教的影响，圣人的陵墓逐渐具有了神圣性，这就把大众的虔诚和与神合一的追求混合了起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穆斯林年历并不完全相同，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什叶派每年对侯赛因之死的哀悼。

经验层面，在那些按照正统礼拜的措辞来看待信仰，视安拉为令人敬畏的最高权威的信徒，和那些认为最重要的体验是处于寂灭并超越于寂灭的信徒之间，张力依然存在。在对文本和先知角色的不同解释方法中，也存在这样的张力。

法律和伦理层面，伊斯兰教在中世纪发生了变化，与各种不同社会相适应的需求促使了变化的出现。但是在玛德拉萨的圈子里还是相对一致的，声誉往往与那些重要的知识和法律中心，比如艾资哈尔联系在一起。什叶派世界中也有类似的中心，比如伊朗的圣城库姆(Qum)，以及类似的学术团体和著名学者。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还有各个以蔑视律法著称的派别，比如伊斯马仪派。

教义方面，出现了非常丰富、各自不同的哲学形式，从安萨里(al-'Ashari)略有些独断的实在论(positivism)，到亚里士多德学派伊本·鲁世德(在拉丁语世界的讨论中，他被称作阿维罗伊[Averroes]，影响很大)的尚有疑问的诸多理念；从(衰退的)理性主义的穆尔太齐赖派，到伊本·阿拉比丰富的思想。在神话层面，最主要的差异是关于伊玛目以及隐遁伊玛目的本性。对于哈里发的本性和世界末日，这两个不断出现在政治考量和民众头脑的主题，著名的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给出了一个和谐的看法。

制度层面，伊斯兰教中没有僧侣制度，也没有教阶制，纵使中世
306 纪时期政治权力彻底分崩离析，奥斯曼帝国控制伊斯兰世界的诸多腹心地区，并对哈里发职位提出要求。各种制度都是非正式的，更多

地依赖于声誉。对于作为一种体制的伊斯兰教来说，除去公议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约束，因此令人惊奇的不是伊斯兰教内部显著的差异，而是其同质性。

在宗教艺术和物质层面，诗歌、建筑、文艺创作，还有从奥斯曼帝国到莫卧尔帝国、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各帝国内不同的书法变体和绘画方式，都在中世纪伊斯兰教中极为繁盛。但是，这是一种不可预测的文明，因为它已逐渐步入冲突之中，并与西方的新势力相接触，而这势力预示着灾难和未曾预料到的征服。为什么这个由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传达给世界的伟大信仰，注定要遭遇的灾难要比成吉思汗所带来的灾难呢？

第十三章　古典的非洲宗教

非洲的轮廓

307 殖民地时代以前的传统非洲宗教，可以粗略地分为四个群落。首先是古老的基督教，如今还存在于埃塞俄比亚的科普特教会（Coptic）已有很长的历史，至少从公元4世纪就已经形成了。其次，有一个犹太教的社团。第三是伊斯兰教，它占有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尽管这一地区传统上还有某些基督教徒，包括埃及的科普特教会，他们分散在占大多数的穆斯林中间。伊斯兰教还向南方传播，穿越撒哈拉沙漠传播到西非的大部分地区，传入非洲之角，苏丹，以及更远的地方。最后，是可称作黑非洲的古典（传统）宗教。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对其加以论述。

在上至公元1500年以前的时期里，北非的穆斯林国家所进行的跨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刺激了南部地区，形成了较大的王国——比如位于西非的加纳（Ghana）帝国，从8世纪延续到11世纪，它的后继者马里（Mali），在14世纪时达到顶峰。在现在的尼日利亚北部，还有桑法伊（Songhay）以及一些讲豪萨语（Hausa）的重要的贸易城市。在尼日利亚及其以西地区，有奥约（Oyo），贝宁（Benin）和阿肯（Akan）等森林王国。在东非如今为苏丹的地区，15世纪时有芬吉（Funj）帝国。南部操班图语的各种不同的游牧群体，到处迁徙。1200—1500年间，在津巴布韦地区，在下扎伊尔，在刚果地区，有其他的文化和权力中心。它们当中某些文化的发展受到新来的欧洲人的影响，特别是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人的定居和探险使这种影响更为明显。但是书写记录的缺乏，使人们很难深入了解早期的历史。

308 当然，很难说有什么精确的共同点，可以作为非洲宗教的标签：只是到了近代，非洲人的自我意识才有所觉醒。然而有些重新出现

的主题。我们将要做的，就是要考察当欧洲人开始接触非洲时依然存在的那些我们所能了解的宗教。古典的宗教当然深深地受到了殖民地经验的影响，但这将是稍后讨论的问题。由于奴隶贸易而形成的，在加勒比地区、巴西和北美出现的"美洲黑人"(Afro-American)宗教，也同样放在后面讨论。

在中世纪，王国的创立涉及到一种神圣王权的意识形态的形成，特别是在西非的古典宗教中，至今依然可以见到这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但不是没有冲突，所以我们能在当地的膜拜团体面对帝国主义种种要求时举行的战斗仪式中，看到某些痕迹。正如 *309*
在其他的人类文化中一样，国王经常与土地的丰产联系在一起。一般说来，我们正在考察的时期，是引进了定居的农业以后的时代(经常需要创造财富以维持地域辽阔的王国)，这本身就会引发与从土地生产财富相关联的膜拜。这些可能被嫁接到王权的意识形态中。神圣王权的观念，似乎是分别独立地形成于非洲的不同地区，这证明人类势力的某些观念是与经济和政治的新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大约在公元1500年之后，农业活动中的种种变化由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展，与促进农作物丰产相关的圣坛出现了。另一个变化与引入新技术，特别是铁器制造有关。所以这一时期十分有价值的证据显示了宗教的、社会组织的和观念的各种变化。

非洲宗教的各个层面

某些教义的主题

大致上说，非洲宗教的教义内容，是被赋予人形的：即，神灵和精灵——这些看不见的力量可以解释并影响人的生活——是用人的措 *310*
辞来思考和打交道的。此外，宗教的许多东西都非常自然地涉及到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个人的和此世的模式在神话中表现为主导性的。尽管如此，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一种对至上存在的普遍信仰，他最终控制着人类的命运。但是这个存在非常遥远，内在的眼睛看不到他，在日常的膜拜或人们的神话想象中，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许多神话都表达了一种原初秩序的观念，在创世的过程中，这种

秩序在某个地方被扰乱了,它也是对死亡和混乱如何来到世上的解释。尽管在非洲的思想中,死亡是个值得关注的题目,但是个体的生存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教义而得以重视,与此相对照,祖先对于幸福和团体的存在却至关重要。

虽然有一位至上存在,但人们的日常关注却更多地与那些为数较多且更为直接的神灵相关联。他们既是最高神灵的代理人,但是也有其独立性。可以说,非洲的普遍模式是一种折射的有神论(refracted theism),即神圣的力量被分散为诸神灵的不同行为。

神话的主题

有许多关于死亡与混乱的神话。其中一个主题是关于生与死的信使的。上帝派了一个迟钝的动物给人类送去将获得永生的消息。这个信使经常被认为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他用彩虹般令人高兴的颜色来化妆。但是他行动迟缓,上帝又派了另外一个没有耐心的动物,像飞跑的野兔,传递死亡的消息。结果是人类受制于死亡。上帝也许希望我们永生,但自然事件的结果是我们必须死亡。另一个神话观认为,死亡来到世上是因为睡觉。我们(更确切地说,是原初的祖先)被告知说,要保持清醒以等待上帝从某处旅行归来;但是我们被睡眠压倒而错失上帝宣布人类不死的时机。信息失效了。这个神话意味着睡眠是最终死亡的先导。看来我们不可能逃避我们是有限的这个必不可免的结果。

许多神话将死亡更直接地与上帝和人类之间的根本不同联系起来。扎伊尔的一则神话说,在以前的某个时候,上帝与人类一起住在同一个村庄里。但是由于人类的相互争吵,被惹恼的上帝将他们驱逐到下面的地方居住。在那里,他们经历了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所以他们盼望返回早先的天堂之地。他们开始建造一个巨大的木塔,塔越建越高,越来越高。不久之后,木塔似乎已经高达天国,建塔者们在塔顶欢呼雀跃,又吹笛又敲鼓地欢庆成功。但是上帝不喜欢喧哗,他愤怒地击倒了木塔。另一个塔的主题是这样的:在很早的时候,由于人类的兽性、傲慢、嗜杀、不服从,使得上帝想把他们赶走;但是他们始终跟在上帝的后边,直到蜘蛛吐出一条神奇的丝,上帝和他

的随从由此爬上天空。人类力图用树枝堆积成一个巨大的高塔，结果是灾难性的，巨塔轰隆一声倒塌了。 313



仪式层面：马里东部和布基纳法索(Burkina)西北部的多贡人(Dogon)中的戴面具的舞者，他们的微妙而复杂的宇宙论教义，既反映在他们的村庄的实际布局中，也体现在仪礼生活的组织中。

背井离乡的加蓬俾格米人

夜是漆黑的，天空是污浊的，我们离开了我们父亲的村庄，创造者对我们生气……

光变得黑了，夜复一夜，明天还是饥肠辘辘——创造者对我们生气。

老一代去世了，他们的家园在地下遥远的地方，他们的精灵到处游荡——他们的精灵在哪里游荡？也许身边刮过的风知道。他们的骨头远在地下。

这些精灵在下面吗？他们在这里？他们看到摆好的祭品吗？

明天赤裸空无，因为创造者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他不再是和我们一起坐在火堆旁的主人。

在从前的某个时候，上帝因一位老妇用杵捣毁了天的下边而恼

怒，他把天与地分开，并一劳永逸地在作为不朽的他和作为终有一死的下界之间划出了界限。这也许同人类文化与死亡的关联多少有些关系。人类文化的最基本活动是做饭，许多故事将此与同上帝的疏离和死亡的产生联系起来。从一位上帝那里获得独立的渴望，似乎就是造成人类必死的原因：独立性与有限性不可分离。

除了死亡之外，另一个主题是一个恶作剧精灵，有时它被看作一个蜘蛛（它是个天地之间模棱两可的生物）。在一则俾格米人的故事中，蜘蛛人托利（Tore），将从一位老夫人那里偷来的水送给人类。他还为人类偷来了火：他在访问一个铁匠铺时，将腰布点燃。他十分痛苦地穿过树林，乞求火离开他而进入树林；事情如他所愿，而这就是为什么用树枝摩擦可以产生火的原因。在非洲，铁匠是个充满活力的人物，创造者的原型，秩序与混乱之间的调解人。原初的祖先经常被想像为一个铁匠。当然，特别是借助于铁器的使用，更为有效的农业得以扩展，并影响到人类文化的诸方面。

某些伦理道德的主题

一个人被认为有不同的心灵方面，其中某些方面在人死后会以一种半存在（half-existence）方式继续着。许多群体将死者作为活人来细心照料，直到某个时候才将他们融入先辈的群体之中。有时一个祖先会部分地再生于个体之中，作为他的守护精灵。不论怎样，死者一般都受到尊敬。丧葬与哀悼的程序变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义务，它能够愈合成员去世给群体造成的创伤。

314 正如死亡的故事所暗示的，人类的故意作对令上帝不高兴。人类被赋予了争吵和贪婪，以及其他社会上的不幸的倾向。这些倾向往往在密谋反对群体的妖法师身上表现出来，他在夜晚行动于灌木丛中，赤身裸体，乱伦胡来，食人成性，并和野兽住在一起。与这些特征相对立的是一般的伦理道德：行为必须和谐，大白于天下，正派得体（生殖器一般要掩盖起来），守规矩的性生活，有教养和遵守社会规则。

某些仪式的主题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最有说服力的仪式是献祭。祭祀可以采取奉献植物的形式，但更典型的是以奉献生命（如绵羊，山羊，牛，或鸡）的形式。动物的血常常被认作生命力的代表，因此它也具有（比如）避开邪恶势力的力量。像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献祭是与神灵交流的姿态。人类渴望被允许认识神圣的存在，也希望献祭的行为能够促进人们心想事成。有时，献祭通过将疾病转移到动物身上，而被用作治疗的一种形式。有时，献祭还被用作人类不良行为的禳解方式。由于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之间的联系破裂了，所以献祭就代表着沟通这两个世界的生命与力量的渠道。

有些季节性的节日成为新时期的转折点，如新年和收获时节；有的仪式用于社会秩序中，新地位的变化，如国王的加冕和首领的就任，将死者送入另一个世界，个体的婚礼（经常形成家族联盟），等等。在这些通过礼仪中，特别重要的是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成年礼。广泛实践的是男孩子的割礼和女孩子的阴蒂切除（clitoridectomy）仪式。其他的伤痕和身体标迹，则象征着过去的孩子气的死亡和具备了一个新的成年人的责任。

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音乐是崇拜和仪式中充满活力的要素。通常认为，精灵的世界对人类的音乐特别敏感，音乐可以成为神圣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来自神圣的源泉。一般说来，在神圣的音乐与其他的音乐之间，可以做出某些区别，通常有一批与神灵和群体的祖先相联系的赞美诗和赞歌。音乐还可以用于治疗，用于增进丰产，当然也用于庆典。

某些经验的主题

对于河流、风雨、森林、天空、亮光和动物之中的神灵的意识，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既令人敬畏又使人想往。梦境也必须考虑在内：它们是某个神灵出现在个体面前的信号，这预兆了某些必须进行禳解的罪恶或不端行为。在非洲各地，有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非常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某个人被精灵附体。这是令人恐怖的，需要举行仪 315

式让精灵离去，但这也许是个吉祥预兆，因为一个人会因此尽可能地接近他的神灵。祭司几乎被等同于特定的神灵，他们以神灵的名义讲话，因此他也具备先知的功能。在某些治疗活动中，往往请擅长借助萨满方法加以探寻和诊断的人到场，在仪式活动中，治疗者要与疾病搏斗，访问另一个世界，以便将病人从死亡中拯救回来。

非洲的神灵，以一种现实的方式真实地出现在社会中，并被普遍地体验到。他们并不是理论上的实体，而是活生生的存在，祖先们亦是如此。高山、河流、草原、丛林，都是体验其存在的地方，它们是人类体验之戏剧上演的场景，而命运则编织着它的种种模式。

宗教的专业人员与社会诸模式

非洲社会中的宗教专业人员有一个谱系，从与膜拜和仪式相关的祭司，到预言家、占卜者，再到治疗术士。非洲人治疗疾病的传统方式，在最近四个多世纪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治疗疾病的膜拜团体在整个非洲宗教的框架中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疾病之所以与宗教相联系，是因为神灵通过生病这个事实显示了自己。一个曾经生过病但又战胜了疾病的人，经常充当中介。所以治疗疾病的术士往往把自己附属于某个神坛，并作为那个神灵的喉舌。由此他们引起人们的注意，生病的人前去找他们给以专业的治疗。占卜是古典宗教提供的另一种社会服务，比如在西非的约鲁巴人(Yoruba)中，有一种特别复杂的占卜形式。它告知未来的某些事情，迫使求卜者面对选定的现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王权通常被看作一种神圣的制度，整个社会统一在国王的统治之下，国王自己有代表神圣秩序的祭司功能，而这个神圣秩序则运行于他所统治的世界：维护政治秩序与使土地多产和民众多福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有时，一个地区的统治者会将大地作为他精神上的妻子，生殖力的主题在此会格外突出；但是潜藏于农耕中的并对之加以控制的精灵，不同于潜藏于荒野生命中的并对之加以控制的精灵。比如，在加纳的阿散蒂人(Ashanti)中，作为土地母亲的神灵，与其住在阴间的危险的姐妹截然不同。文明的母亲总是更接近人类。

神圣的圣坛与宗教艺术

许多圣坛只是精灵的居所:森林里的一个树丛,或河流中的一块形状特别的石头。假如你横跨非洲,就会发现有些地方特别弥漫着力量,那里的某个精灵的居所会格外突出。但是某些圣坛是人造的, 316
至少包括一些建筑和标志,诸如在东非某些地区的宫殿式建筑。此类建筑包含有神灵的形象,有一部分为神灵的住所,而另一部分则为人所居住,两个部分的中间是祭坛,各种献祭的供品摆放于此。

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埃多人(Edo)中,有一个奇怪的传统:为奥巴(Obas)或国王制作雕刻的青铜头。这种青铜像是个体的代表,但是它们又不是个性化的雕像。的确,大部分的非洲艺术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具象的,所以你可以从一个面具的方方面面中了解到它就是它所代表的东西。面具和身体绘画是展示临时的和仪式中精灵附体的显著方式。恰恰是在这些可见的形式中并通过舞蹈,神灵将自己显现给人类。头饰和面具还能显示死者和创造的力量,诸如女性的力量,颂扬两性在世界中的互补作用的仪式充满了辩证性。某些雕像,如约鲁巴人中的跪着的妇女雕像,反映的是虔诚的信徒本身;这是人类对神圣力量的回应,而不是直接地代表神圣力量本身。

某些有代表性的模式

在简要地考察了非洲宗教的某些古典的方面之后,现在让我们通过来自非洲社会之"马赛克"的某些例证,来看看整个非洲大陆的文化。我们将分别从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非入手,看一下不同的社 317
会类型。

约鲁巴人的宗教

约鲁巴是个相当大的民族,人口在1200万到1500万之间,分布在西南部的尼日利亚、贝宁和多哥等地区。他们的神话故事讲述了 318
一位创始者奥杜杜瓦(Oduduwa),这可能反映了有关权力争夺和民族创建的某些历史的记忆。在神圣的年节中,最充满活力的是每年

-度的男性祖先的仪式，其形式有威严的队列行进和假面舞会，参与者穿戴上布料制成的衣饰，向外旋转，不断变换形态，以表示祖先的显现。另一个节日是母亲的宴会，颂扬女性的力量。其他的仪式有的与城镇的创建者有关，有的则涉及到首领和祭司、国王和神圣的专业人员之间的辩证关系。

位居奥里萨（orisa，即神灵，一般认为原本是人，他们通过自己的伟大成就而在死后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大万神殿首位的是奥罗伦
319 （Olorun）。其他的神灵被看作他的孩子，其数量估计有 401 位。奥罗伦并不直接受到崇拜，尽管在近来有些专门为他建造的神坛：人们的假设是献给较小神灵的祭品会由他们转给奥罗伦，所以在许多仪式的结尾处都有这样的套话："愿奥罗伦接受它"。其次，他并没有直接创造世界，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奥巴塔拉（Obatala），但是这项工作实际上是由奥杜杜瓦完成的。在奥杜杜瓦与奥巴塔拉之间，曾有一场大战，这场战争通过仪式得到重演。奥巴塔拉被放逐了，但在欢庆胜利时又被邀请返回。

许多神灵实际上表现了约鲁巴社会极其零散的特征，所以不同的神灵偏爱于不同的地方。约鲁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支离破碎的，这只是从 19 世纪就开始的争取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现象。所以奥罗伦也表达了一种最终统一的观念。此外，他还是个人命运的决定者。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其守护灵魂跪在伟大的上帝面前，人的命运和寿命就被决定了。虽然后来可能会有些变化，但寿命的长短依然是命中注定的。假如你过的是正派的生活，那么奥罗伦将判决你死后值得人们尊敬，并且不久就会得到再生。而那些过着邪恶生活的人，将被送到一个火热之地受到惩罚和毁灭。

约鲁巴宗教中的所有神灵中，到处可见的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奥冈（Ogun），他是铁匠神、战神和狩猎神，属于天国的俾斯麦（Bismarck）[1]。给他的祭品是狗，这会在狩猎和战争中有所帮助。他残忍的特征，揭示了人类这一事实，即我们靠毁灭他人为生，一个民族靠对其他民族的战争来捍卫自己的身份：因为不如此，其他人就会将

---

① 俾斯麦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此处借指奥冈的地位。——校注



铁神和战神奥冈(Ogun)在尼日利亚的神坛:这位精灵的独特之处在于神坛是露天的,而且是在路边。

你吃掉。人需要吃东西,使狩猎之类的活动必不可少的,在植物被栽培之前,这是人类的基本活动,直至动物越来越少。

献祭的仪式有使精灵进入崇拜者之中的力量,也成为沟通弥漫在宇宙之中的令人既敬畏又想往之力量的渠道。尽管在约鲁巴人的万神殿中有许多精灵,但关于世界的观念,包括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努尔人的宗教

努尔人(Nuer),像他们的近亲丁卡人(Dinka)人一样,在苏丹南部广阔的大草原和沼泽间放牧牛。他们的生活聚点是牛,因而无论是结盟还是分裂,都将自己反映在礼物和牲畜的偷盗中。他们在传统上将自己看作惟一真正的人类,认为其他的群体只是一种模糊的存在。所以他们的世界就是苍天、草原、牛群,以及不断地到处迁移——在许多方面是美丽的和轻松的生活,然而却不时地被人类冲突所破坏。伟大的精神存在或力量是克沃斯(Kwoth),他居住在天上,但也弥漫于生活之中——或者通过他自己的能量,或者以天上和地上的较小的精灵形式。这些存在有时是不祥的和难
320 以对付的,会带来疾病和不幸;但是克沃斯本人是仁慈的。有时困扰人们的麻烦是由他们的犯罪引起的,这时祭祀可以恢复原来的状态。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神灵与一位大的神灵之间关系的一种简单的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社会,这种社会里虽然有祭司,但却没有王权之类的复杂结构。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于1956年出版了《努尔人的宗教》(*Nuer Religion*),这本书有助于人们对非洲宗教另眼看待:首先,当其他人经常把宗教仅仅看作社会关系之结果的一个方面时,他还认真地同时将宗教看作一种独立变项;其次,更重要的在于,他对克沃斯作为一位神灵的解释,在观念上和情感上更接近于已知的有神论传统的理解,而不同于其他人对非洲神灵的解释。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克沃斯与上天的关系尤其密切,彩虹被想象为上帝(God)的项圈,也是耶和华(Yahweh)的,而且耶稣(Jesus)的祈祷也是以"我们在天之父……"开始的。

姆布蒂人的宗教

假如我们现在从西南部的苏丹转向中非扎伊尔的伊图里(Ituri)的热带雨林,我们就会看到俾格米人(Pygmy)的一支,他们的生活环境异常困苦,每一次狩猎远行都充满了危险。在俾格米人的大部分

历史中，他们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只是到最近才开始与外界交流。而他们的生活方式无疑地正处于化解之中。

他们的世界是稠密的热带雨林，充满了动物的吼叫和鸟儿的尖鸣。他们的生活是狩猎和采集，而狩猎则是他们为生存而战的充满活力的部分。在他们的宗教中有一种观念，认为世界是由一位退居到天上的上帝创造的：*a deus otiosus*（一位不再操心的神）。更重要的是神圣的文化英雄托利（Tore），是他赋予姆布蒂人（Mbuti）以火和其他技艺，如狩猎和收集蜂蜜的技巧，这是他们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森林本身充满了神圣的力量，而且必须与之打交道，死者逐渐消失在森林中并取代这些精灵的位置。

姆布蒂人有为数众多的成年礼，如对女孩的成年礼。当一个女孩第一次行经时，要举行称为伊利玛（Elima）的仪式。她和其他情况相似的女孩与世隔绝地在一个森林小屋里居住几周，在那里由一位老妇人教给她们应知应会的东西。其中包括女人们歌唱的音乐。的确，在向森林的精灵祈祷时，音乐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便



扎伊尔的伊图里（Ituri）热带雨林中的俾格米人姆布蒂支系的妇女。她们是狩猎采集者，社会内部没有等级分化，与在她们周围并弥漫于森林中的神灵生活在一起。

在某种灾难(如村里的某个人死了)之后,使森林的生活恢复如初。人们认为隐藏在森林背后的神灵,睡着了因而没有照看人类,所以死者进入了群体的生活:通过礼仪唤醒森林,使之重新开始其造福的方面。俾格米人的群体还举行向他们杀死的动物精灵道歉的
321 仪式——这使人想起北方的西伯利亚人的祭熊仪式。在从一个狩猎社会到另一个狩猎社会的共鸣中,人们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祖鲁人的宗教

在德拉肯斯堡(Drakensberg)山脉脚下,纳塔尔(Natal)的起伏的、美丽的丘陵处,祖鲁人(zulu)被紧密地聚合成一个民族,才仅仅150年。从那以来,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包括许多祖鲁人皈依了不同形式的基督教,也包括祖鲁复国主义(Zulu Zionism)。有些内容我们将在第二编中讨论。

祖鲁宗教是某些古老的主题的混合物,包括叙述早先的死者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讲述了蜥蜴如何比变色龙跑得快,以及这两种动物如何被第一个来到世上的乌姆威林宽吉(uMvelinqangi)杀死。人们认为是乌姆威林宽吉将人性以及和他们打交道的习俗,赠给了他们的祖先。这些祖先,称为阿马德罗兹(amadlozi),他们在祖鲁人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认为,世界拥有一个超出人之外的不可见的巨大团体。三代以上的祖先要回来定居而且不再具有威胁性,但是三代以内的祖先,必须以祭祀(并献上山头等供品)满足他
322 们的需求——这样才能使他们定居下来。人死后,要举行仪式以便使死者的鬼魂进入祖先的群体。年长的男性负责安排此类仪式,这使他们在解决争端时有权威性,因为阿马德罗兹也会参与到促进这个团体之和谐的进程中来。在战斗之前,传统地要祈求国王的祖先保佑,他们对于整个民族的福利至为重要。

伟大的丰产神伊恩考萨扎纳(iNkosazana),是一位重要的神灵,她是天上的公主,在农业活动开始前要祈求她的保佑,其中许多活动由妇女来担当。假如可能的话,她们会在河边为女神培植一小块特殊的地,这种祭品会带来丰产。她还在女孩进入青春期时举行的成

年礼中，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在祖鲁社会中，女人的作用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她们在不同的父系之间架起了桥梁，在其丈夫的群体中，她们的地位要更边缘一些，但又是家系延续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占卜者以女性为主，在治疗疾病和其他不适中具有核心的作用。女人特别容易被精灵附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她们就充满了萨满的力量。

然而，在过去的百多年间，在降临于祖鲁人头上的战争、土地掠夺和其他疾病的冲击下，传统的宇宙说褪色了。正如我所说过的，这是后来的故事。

对非洲宗教的反思

我们已经考察了不同的社会——约鲁巴人的具有城市特征的王权，努尔人的田园式的质朴生活，俾格米人森林生活的绿色威胁，祖鲁社会对牛畜的重视——它们乃是千百种社会和宗教的例证。我们已经指出了古典宗教方方面面的一些主题。尽管如今有些人在谈论复兴这些古老的方面，但很有可能的是，其未来在于某种更大范围内的综合，不仅在不同的非洲社会与不同的观念间综合，而且要综合那些由外部挤进来的力量。直到今天，非洲宗教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将仍然是黑非洲的资源，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也是人类的资源。但是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系统，或者至多感到它是个单独的传统，即曾经标志着历史的世界宗教之部分的传统。

如果说现在有了某种非洲统一的感觉，那应归因于对于令人恐怖的殖民主义的反作用。我们现在就转入世界历史上殖民主义这个时代的历史。

第 二 部 分

世界宗教大事年表二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锡克教	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新兴宗教
1500	H. 科尔特斯打败阿兹特克人(1519-1521) 巴布尔，印度莫卧儿帝国首任皇帝(1526-1530) F. 皮萨罗大白印加人(1531-1535) 俄罗斯沙皇恐怖的伊凡(在位1533-1584)	努比亚人摧毁麦罗埃基督教王国(1504) 桑海摧毁马里帝国(1546)		那纳克祖师(1469-1539)把迦比尔(1440-1518)的教义作为耆那教基础(1519) 第二祖师安格德(1504-52)	1549 年沙忽略到达日本九州。	喀巴拉学说的复兴	乌尔姆斯会议：马丁·路德被处以绝罚(1521) 耶稣会成立(1534) 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1541) 特兰托会议(1545-1563)：反宗教改革的开始 法兰西斯·沙忽略到日本(1549)	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巴勒斯坦(1517)，埃及(1517)，阿尔及利亚(1529)，突尼斯(1536)和匈牙利(1541)	
1550	伊德里斯·阿劳马，卡涅姆-博尔努王国国王(1570-1619) 荷兰人起义反对西班牙(1572) 丰臣秀吉(1537-1598)统一日本(1582-1598) 荷兰人定居爪哇(1595)	伊德里斯·阿劳马成为卡涅姆-博尔努王国国王(1570-1619) 摩洛哥人摧毁桑海帝国(1591)	阿克巴在帕尼巴特战役打败印度人(1556) 莫卧儿帝国(1556-1707)	第三祖师(1479-1574) 第四祖师(1534-1581) 阿姆利则金庙建成(1577)	耶稣会神甫利玛窦(1552-1610)拜访中国朝廷 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遭到禁止(1596)		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 安立甘宗教义的确立(1563) 法国圣巴特罗曼节大屠杀(1572) 圣保罗·味增爵(1580-1660) 南特敕令(1598)在法国实行宗教宽容	土耳其人征服非洲北岸(1554) 阿克巴(1542-1605)成为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1556) 奥斯曼进攻马耳他失利(1565) 在勒班托战役中一支基督教舰队打败了奥斯曼人(1571)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锡克教	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新兴宗教
1600	日本幕府政治(1603-1867) 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印度泰姬玛哈尔陵墓建成(1632) 中国清朝(1644-1911)	奥约帝国(尼日利亚)鼎盛时期(1600) 葡萄牙人摧毁姆韦尼马塔帕王国(1628)		第五祖师阿尔琼(1563-1606)编辑《阿底·格兰特》(1604) 第六祖师(1595-1644)起兵抗击沙杰罕(在位1628-1658)的穆斯林统治以捍卫锡克教		萨巴塔伊·茨维(1626-1676)伪弥赛亚 斯宾诺莎(1632-1677)哲学家	浸礼宗运动在荷兰和英国的开始(1600年代早期) 詹姆士钦定版圣经(1611) 日本压制基督教(1616) 清教徒之父前往北美(1620) 乔治·福克斯(1624-1691)建立教友会 圣方济会托钵僧前往刚果(1645)	西班牙驱逐摩里斯科人(1609) 什十坦丁堡的蓝寺(1609)	
1650	伦敦大火(1665) 英国"光荣革命"(1688) 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大帝(1682-1725)	班巴拉王国(上尼日利亚)的崛起(1660) 葡萄牙人打败刚果(1662)	马拉特王国建立(1674)	第八祖师(1656-1664) 第九祖师(1621-1675)因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而殉道 最后一位祖师戈宾德·辛格(1666-1708)创立卡尔萨教团(1699)			北京第一个罗马天主教堂(1650) 南特敕令的撤消(1685)	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匈牙利(1664) 奥朗则布开始在印度强制实行穆斯林统治(1680) 土耳其人攻占维也纳失利(1683) 莫哈奇战役(1687) 威尼斯人占领雅典(1687)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锡克教	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新兴宗教
1700	东非般图王国兴起(1700)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1701-1713) 阿富汗人起义抵抗波斯人(1709) 波斯统治者纳迪尔沙攻陷德里(1739)		戈宾德死后经典《阿底·格兰特》成为祖师(1708)		巴阿勒·鲁姆·托夫(1700-1760) 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哲学家	约翰·卫斯理(1703-1791)建立循道宗(1739) 詹姆斯和华德莱建立震颤会运动(1747)	伊本·阿卜德·瓦哈布(1703-1792),瓦哈比运动创始人		
1750	七年战争(1756-1763) J.库克测绘澳大利亚东海岸(1769) 美国《独立宣言》(1776) 法国革命(1789)		印度教改革家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		中山美伎(1798-1887),日本天理教的创立者	Y.弗兰克(1726-1791) 1791年:犹太人在法国被确定为全权公民	安丽(1736-1784)将震颤会运动传人美国(1774) 循道宗成为独立的团体(1795)	印度基拉法运动(1818-1924)	
1800	欧洲启蒙运动 拿破仑战争(1803-1815) 西蒙·利瓦尔确保委内瑞拉、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独立(1819-1825)毛利的酋长接受英国人的统治(1840)	布尔人在血河打败祖鲁人(1838)	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教活动(始自1820年代) 雅利安圣社的创立者: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1824-1883) 梵社的复兴(1828) 罗摩克里希那·帕拉马汉萨(1834-1886)抗议"一切宗教都一样"的思想。	兰吉特·辛格(1780-1839)建立锡克教王国 希瓦·达耶尔(1818-1878),罗陀索阿米派的创建者 锡克战争(1845-1846,1848-1849)	鸦片战争(1839-1842):英国与中国交战 《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大门(1842)		约瑟夫·史密斯(1805-1844)建立摩门教(1830) 杨百翰(1801-1877)带领摩门教徒前往盐湖城(1846) 爱伦·怀特(1826-1915):基督复临派的创立者	穆斯林地区受到欧洲的影响(1800-1900年代) 米尔扎·库拉姆·阿赫迈德(1835-1908),阿赫迈底亚运动的创始人 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伊斯兰现代主义者	3000-4000名被称为巴布教徒的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19-1850)的门徒被处死(1848-1851) 贝桑特·安妮(1847-1933):著名的神智论者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锡克教	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新兴宗教
1850	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 美国内战(1861-1865) 美国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1867) S.弗洛伊德(1856-1939) 俄国农奴的解放(1861) 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1893)	毛利人林格图(19世纪60年代)和利塔纳运动 美拉尼西亚出现船货崇拜教团(19世纪60年代) 土著美国人的仙人掌崇拜团体(19世纪90年代) 西门·金巴果(1889-1951)	纳伦德拉纳特·达塔(维韦卡南达:1863-1902)受到西方的赞扬 毗阇耶·音因(1868-1922):激励了耆那教的复兴 雅利安圣社的建立(1875)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1857-1947)		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 中国的自强运动(19世纪60年代) 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教(1878-1945) 安那伽里迦达磨波罗(1864-1933)创建摩诃菩提会(1891) 中国改革运动(1898)	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创建(1869) 德莱弗斯案件(1894-1906) T.赫茨尔(1860-1904)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1897) 沙皇遭谋杀后俄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1881-1882) 阿利亚(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开始(1882)	传教士前往非洲 梵蒂冈公会议(1870);宣布教皇无谬误 拉塞尔(1852-1916)建立耶和华见证会(1872) 玛丽·艾娣(1821-1910)建立基督教科学运动(1876) 威廉·布斯(1829-1912)建立救世军(1865)		巴哈欧拉(以努里著称)改进了巴哈依教义,强调对国家的服从巴哈欧拉被放逐到巴格达,然后又到阿卡(1863) 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考特建立神智学会(1875) M.贾维(1887-1940)倡议黑人民族主义 巴西的卡德克主义(19世纪70/80年代)
1900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俄国革命(1917) 鲁道夫·奥托的《神圣的观念》(1917) 华尔街危机(1929)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尼日利亚阿拉多勒运动(20世纪20年代) 《班图人的哲学》滕普尔斯(1945)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开始(1948)	旁遮普邦印度教大会的开始(1907) K.B.海奇沃博士(1889-1940)建立"国民志愿服像团" 印度的分裂(1947)		太虚大师(1899-1947):中国佛教思想家 儒教成为中国国教(1913) 共产主义者赢得中国内战(1949)	阿利雅的第二个高潮(1904-1914) 《贝尔福宣言》(1917) 纽伦堡法律剥夺德国犹太人的权利(1935) 纳粹大屠杀	教皇禁止天主教现代主义(1907) 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20世纪20年代) 纳格·哈马迪手稿的发现(1945)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建立(1948)	印度尼西亚穆赫迈底亚运动的建立(1912) 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度(1924) 穆斯林兄弟会建立(1928) 穆斯林巴基斯坦与印度教印	绍基·欧芬迪·拉巴尼(1897-1957),第一个圣护(1921)(巴哈依教) 贾维创立世界黑人改进协会(1914)埃塞俄比亚的

续表

年代	一般	传统、美洲、非洲萨曼教等	印度教和耆那教	锡克教	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新兴宗教
						(1940-1945) 以色列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48)		度的分裂(1947)	H.赛勒西被拉斯特法里主义者视为弥赛亚 巴西的乌班达宗教(20世纪20年代) 1934年华勒士·法德失踪(伊斯兰国家)
1950	朝鲜战争(1950-1953) 越南战争(1954-1975) 柏林墙的倒塌(1989)	澳大利亚土著宗教的复兴(20世纪70-80年代)	耆那教僧侣在印度以外建庙传教 印度教加速传入西方	桑特·法特·辛格(1911-1972)倡议把旁遮普邦建成印度国内独立的锡克教国家 (1947-1984)倡议锡克教国家的独立 1000名锡克教徒死于对阿姆利则金庙的围攻中(1984)	缅甸举行佛诞庆祝大会(1956) 达赖喇嘛出逃(1959)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所有宗教的攻击(1966-1976)	以色列犹太法学博士放弃对家庭法和私法的裁判权(1953) 六日战争(1967) 赎罪日战争(1973)	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1962-1965) 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倡议解放神学(1969) 归正宗联合教会:英国长老会和英国公理会的联合(1972) 巴巴拉·哈里斯被祝圣为美国第一个女主教(1989) 安立甘宗教大会投票赞成妇女担任神职(1992)	穆斯林国家加入欧佩克;穆斯林复兴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 对鲁什迪的伊斯兰教法裁决(1989) 阿富汗内战:塔利班与马苏德将军的势力(始自1989)	统一教会在朝鲜建立(1954) 马尔科姆·艾克斯遇难(1965)

第十四章　欧洲的蓬勃发展与基督教的重整

从欧洲释放出的新兴力量

326 1500年左右，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1500年以前，欧洲一直处于边缘，而且常常要努力避免穆斯林和蒙古人的侵扰。1500年以后，通过伟大的航海，欧洲使各大洋归于一统；重整了自己的首要宗教基督教；开始了朝向现代科学、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工业化的一系列过程。上述这些强大力量有时令人着迷，但常常却是极具破坏性的。这些力量与自身的产物殖民主义一起极大地改变了其他大陆和那里的生活方式。白人开始统治北美。伊比利亚半岛的(Hispanic)文化则弥漫了美洲大陆的余下部分。奴隶贸易把大批非洲黑人带到了巴西、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稍后，白人侵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在好望角的定居孕育了一个充满冲突的新时代。不少殖民帝国在印度，稍后在东南亚大部、印度尼西亚、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北亚和中亚等地区建立。只有中国和日本艰难地击退了欧洲列强。大洋洲也被西方人控制了。在19世纪结束之际，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地区没有感受到殖民主义的冲击。在1500年，欧洲似乎只是世界历史的分支；而在1500年之后，世界成为了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

328 新兴的欧洲文明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于中世纪的文明，这个新文明熠熠生辉、充满动力、富于理想而且残酷无情。文艺复兴标志了文学和艺术创造力的新爆发。宗教改革标志了西方基督教的重整。科学和资本主义在物质方面释放了众多新的创造力。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产生了对政治自由和自由思想的新希望。18世纪产生了种种新的发明，比如蒸汽机；新的经济理论，比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开创性作品；优美的建筑和音乐；新的哲学和农业生产方法；两次基础性的革命，一次在美洲，另一次在法国。



经验层面：神圣之爱正要刺向圣特雷莎（*St. Teresa*）。这个场景取自贝尔尼尼（Gianlorenzo Bernini）的雕塑《圣特雷莎的出神》（*The Ecstasy of St Teresa*）。该作品是最为著名的巴洛克雕塑之一，藏于罗马的 Sta Maria della Vittoria 博物馆。

基督教和新的动力

在上述种种处境中，基督教的地位暧昧不清。藉着与人类理智相似的理智，上帝创造了一个合理的宇宙；这种宇宙观在某种程度上

为大胆探索物理世界预备了道路，比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和牛顿（Issac Newton，1642—1727）等关键人物的工作。毫无疑问，后来那些被称之为"宗教改革"的事件推动了新思想和思辩气质的传播。然而，教会做出的反应却是：反对思想自由。基督教感受到了来自欧美的新兴力量的挑战，不得不做出调适，这有点类似于那些后来受到西方贸易和殖民主义冲击的其他宗教传统所做的反应。基督教不得不应对新科学对其传统宇宙图景所产生的影响，伽利略被判为异端、19世纪关于进化的理性辩论就是这种应对的两个主要实例。基督教不得不应对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在城市中产生了许多新兴的阶级，这些阶级往往疏离于基督教传统的乡村价值观。基督教不得不应对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国家和新型教育制度。基督教不得不应对可能会侵蚀传统权威模式的自由观念。此外，由于新教的兴起，基督教分崩离析了。不过，由于在新世界的复兴、在殖民地卓有成效的传教，以及在信仰与实践方面的新探索，基督教也获得了许多新的动力资源。

在19世纪，除了盛极一时的自由主义，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意识形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对20世纪产生巨大影响了的马克思主义。此外，联合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也产生了，这种观念将成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根源。上述种种意识形态从不同方面对传统宗教提出了挑战，甚至提供了取而代之的选择可能。如今，以前在欧洲文明中遭到严厉限制、饱受沉重压迫的犹太教，在欧洲获得了解放，找到了新的使命，在美国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看到了重建以色列的希望。纳粹大屠杀的毁灭性黑暗几乎淹没了初现的光明；1948年以色列国家的成立为犹太宗教和犹太传统提供了焕然一新的具体内容。

329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依次讨论如下内容：文艺复兴的宗教意义；宗教改革的开始：路德派、加尔文派和激进派；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欧洲天主教的重整；宗教和各种新兴民族主义的关系；犹太人的解放；东正教和俄罗斯的东进；基督徒在19世纪的处境中对新知识和自由主义的不同反应；马克思主义等新兴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欧洲以外的传教运动；20世纪欧洲的基督



来自鹿特丹的著名古典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正是他的人道主义学问和新颖看法成为了导致宗教改革的根源之一。

教和犹太教。我们会在下一章中讨论一些相同的主题,不过,讨论对象的处境是迥然不同的北美。

文艺复兴及其宗教意义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一场涉及面十分广泛,在视觉艺术和哲学方面特别突出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1500年前后的意大利臻至巅峰,当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如日中天,新兴艺术得到了教廷的英明保护和赞助。正是在这个时期,在重被发现的古典文明的激发下,艺术家和雕塑家超越了他们伟大的罗马与希腊前辈。正是在这个时期,现实被绘画艺术描绘得灿烂辉煌、五彩缤纷,这种绘画艺术甚至 330
比同一时期的另一成就更多地荣耀了这个世界。这另一成就便是思

想的更加自由和人文主义的学问。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 —1536）不仅运用全新的希腊学和拉丁学重现发现了基督教的起源，而且对教条主义的神学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些神学家的争论用陈旧的思辩外壳遮蔽了基督的道德性和人性。思想更加自由的例子有前后相继的一些意大利新柏拉图主义者：菲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和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菲奇诺提出了一套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菲奇诺相信，存在一种持续不断的、在不同传统中被不同老师教导过的哲学。皮科则表明，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柏拉图哲学可以相互融合、彼此兼容，此外，
331 有异端嫌疑的皮科还受到了伊本·鲁世德和喀巴拉主义的影响。对于时空中的无限宇宙有一套看法的布鲁诺认为，宇宙中的原子具有普遍的联系。在布鲁诺看来，上帝和宇宙就像同一张纸的两面。不过，布鲁诺的学说被谴责为异端邪说，他本人也因此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上述三人的新鲜看法都来自由同时代学术界所开启的希腊化世界；当时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古代文明以人性为导向、充满了人文主义的价值。此外，这种新学问和新艺术得到了教廷的大力保护和全力赞助，梵蒂冈延续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价值观，花费不菲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就是这种价值观的成功体现。

宗教改革：神学和政治权力

路　德

在德意志，所谓赎罪券（也就是说，允许逃脱多年的炼狱，在前往天堂的中途站炼狱，那些罪不至下地狱的灵魂得以洗净）的销售不仅招致了动荡不安，而且助长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点燃的火焰。按照预计，在德意志销售赎罪卷的收益，部分用于圣彼得大教堂的修缮，部分则被拨出用于偿还美因茨（Mainz）大主教的选举花销。对此毫不知情的路德送给这位大主教一份他在1517年10月31日张贴的“九十五条论纲”（the 95 Theses）。大主教

开始调查路德是否正统，整个事态由此变得公开。

生于图林根（Thuringia）爱斯莱本（Eisleben）的路德，是一位铜矿工人的儿子。在爱尔福特（Erfurt）大学获得第一个学位后，路德开始学习法律。不过，在1505年秋的一次电闪雷鸣中，路德向圣安内（St. Anne）立下誓言；由于这誓言，路德放弃了法律，转而成为一位奥古斯丁会的修士。151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路德开始任教于维滕堡（Wittenberg）的一所新大学。此前，路德到过一次罗马，他本以为这次旅行会成为一次不错的属灵经历，不料却发现罗马变得极为世俗和堕落。这次经历在路德经年累月的怀疑心田中又播下了一粒怀疑的种子。正是在1517年，路德提出了划时代的“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之前，路德可能（因为具体日期不能确知）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传教经历，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态度和看法，而且引发了他的主要神学主张。路德的神学主张主要有两点：第一，我们在神学上必须单单依靠《圣经》；第二，我们的得救根本不在于我们的工作，而唯独在于我们的信仰，换句话说，我们的得救唯独在于上帝的恩典。

路德拒斥了如下观念：善行等人为手段能够影响到人的得救与否，进而公开指责天主教的如下习俗：荒谬至极的、企图购买上帝恩惠的赎罪券；神职人员和男女修士的独身生活；朝圣；为死者举行弥撒，等等。天主教徒借以表达虔敬的大量盛行的习俗被一扫而光。332
在路德看来，教会由于垄断知识和理解力而自命不凡；把这种自命不凡抛在脑后的路德开始翻译《圣经》，创作赞美诗，从而促进了德语的诞生。为宗教改革而做出的斗争，也是各种地方语言反对阴魂不散的拉丁语而做出的斗争。在德意志，早就有人因为教廷的权力坐卧不安。随着事态的发展，路德和教会之间起初纯粹的神学辩论让诸侯找到了更多独立的借口。路德得到了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Frederick）的保护，这对于路德的事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随着反抗罗马运动的不断发展，很多诸侯采用了路德的宗教改革措施，从而在各自的领地上不仅获得了政治控制权、而且获得了相当大的教会控制权。

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受益于印刷机的发明和应用。宗教改革家们把小册子当作一种强有力的写作方式，借此把神学争论带到了集

市。讲道人大大地促进了新观念的广泛传播。因此，政治原因只是宗教改革运动得以扩展的部分原因，这场运动的内在基础乃是虔敬、对上帝的爱、对得救唯独来自上帝的认识和对教会官僚机器的普遍不尊重。

在这场运动中，军事冲突和政治冲突此起彼伏 在经过妥协而成的 1555 年奥格斯堡(Augsburg)和约中，各方达成了如下共识："谁的统治，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即教随国定)，也就是说，由诸侯决定其臣民的宗教。由此，德意志和北欧的其他部分被划分为天主教的和新教的；至关重要的是，路德宗向信徒反复灌输要服从国家的观念。

对于德意志诸侯来说，废除拥有大量富饶土地的隐修院也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废除隐修院后，诸侯可以把土地分给那些曾施以援手的人，从而巩固自己的影响。此外，各处隐修院的废除还解决了一些紧迫的财政问题。

路德堪称一位令人钦佩的杰出作家。无数小册子、神学论文、翻译和赞美诗从他的笔下迸涌而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路德的功劳，路德宗教会的崇拜仪式有了一种汹涌澎湃和令人敬畏的神圣氛围，一种对上帝的爱与怜悯的亲切感受。此外，路德嗓音洪亮的德语也能给会众带来一种充满信仰活力的全新感受。

加 尔 文

因为路德，水瓶的软木塞打开了。某人能以《圣经》为权威，这当然不错；但是，作为一本书，或更正确地说一套书，《圣经》的意义非常丰富。对《圣经》的解释极易出现差异。因此，路德之后的一些宗教改革家采取了迥异于路德的路线。其中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就是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3)，他属于新教更为正统的或更为"权威主义的"(magisterial)那一端；在这里，"权威主义的"指的是那些试
333 图与国家这样或那样结盟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激进的"宗教改革家主张的是宗教和政治的相互分离——尽管他们的运动本身被视为极具政治性。

原是一名法国律师的加尔文起初写下了一本小书《基督教要义》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该书后来被极大扩充。加尔文参与过日内瓦城的宗教改革。加尔文虽短暂离开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又被请回日内瓦，开始实践他所认为的、必须忠于真宗教和道德伦理的政治社会。这种教会行政制度就是著名的长老制(presbyterianism)，它成为了别处(比如荷兰和苏格兰)加尔文宗改革教会的一个特征。加尔文最有特色的学说是预定论。如果得救仅仅出于上帝，那么上帝已经拣选了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这个神圣的天命不会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因此，善行只是得救的表征，不能影响结果的产生。这种预定论强硬地坚持了宗教改革中某些知识分子的想像。更恰切地说，这种预定论是路德宗"唯独信仰"主题的一种哲学变形。

此外，对于加尔文主义者来说，"道"(Word)的宣讲是至关紧要的。因此，加尔文改变了日内瓦大教堂的设计图纸。移走圣坛，在教堂 的中间摆上讲坛；教友若是来了，面对的就不是圣坛，而是讲坛。



这幅绘画出自加尔文主义者之手。图中，《圣经》的重量远远超过了被革命掉的罗马天主教的各种标志(比如，隐修院生活、教皇的三重冠和据说是基督托付给教会的天国钥匙)的总和。加尔文本人正是这次称重活动的主事之人。

重新安排教堂内部的设施标志了观念的巨大改变。宣讲《圣经》成为一种规矩。美好的行为不是必须在女、男隐修院中特别培养的，而是发生在这个人世间的。既然德性被民主化了，那么，对工作伦理的清教徒式接受就顺理成章了。在这种世俗取向的苦修主义中，包括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内的一些人看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
334 线索。辛勤工作的清教徒创造了不少的财富，却又十分节制、花费不多，因此，他们拥有了可以用作创业资本的大量积蓄。

激进的宗教改革家：再洗礼派及其他

不过，最为激进的宗教改革家是那些率先将宗教视为个人信仰的人。在回到《圣经》和重新创造早期教会精神的过程中，一些宗教改革家否弃了婴儿受洗。只有成人才能估量和判断自己的信仰，才会有皈依经历。这些宗教改革家被称为再洗礼派(Anabaptists)，后来被更简洁地称为“浸礼会”(Baptists)。他们之所以激进，是因为他们对私人和个人信仰的强调打破了如下观念：国家这样的集体组织能够决定其成员的信仰应该是什么。这种简单直白却又充满革命意义的观念，不仅在天主教徒中，而且在其他宗教改革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再洗礼派信徒经常受到来自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改革家的迫害，上述双方都喜欢把再洗礼派信徒溺死在河里——这真是对再洗礼派施洗仪式充满讽刺和残酷无情的评注。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1488？—1525)属于再洗礼派传统，是一位早期的反叛者。信仰一种全新社会经济秩序的他认为，新时代即将来临。他在受过良好教育之后，成为一名路德宗的牧师。可是，他最终成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随军牧师。在起义遭到残酷镇压的法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战役中，闵采尔被逮捕，受尽折磨后死于1525年。1534年，一个革命的圣人王国在明斯特(Münster)成立了，这是另一次暴风骤雨般的起义。最终，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成为了这次起义的主要领袖。门诺·西蒙斯本是一名饱受权威折磨的天主教教士；后来，他和追随者一起在德意志的沿海地区安居下来；再后来，这个不断发展的团体可能因为擅长排水和开垦新农田得以登陆东欧和俄罗斯。他们著名的传人“门诺派”

(Mennonites)在北美的宗教生活中是一股重要的信仰力量。

在再洗礼派信徒之后，涌现了许多不遵奉国教、力主真宗教和国家应相互分离的团体：浸礼会、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或曰独立派(Independents)和后来的贵格会(Quakers)等。这些团体也是北美宗教的属灵祖先。

但是，在与天主教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那些喜欢与国家结盟的宗教改革家最初盛极一时。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英格兰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在位)断绝了与罗马的关系，关闭了境内的隐修院。天主教徒玛丽一世(Mary I，1553—1558年在位)曾短暂恢复过天主教；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58—1603年在位)使玛丽一世的努力付之东流，建立了与现在形式相仿的安立甘教会(The Anglican Church)：女王是教会的管理者，可以决定教会的礼仪。于是，受制于国家的英格兰教会顺从了著名的信经式条款《三十九条信纲》(the 39 Articles)。后来，在英格兰内战后，倾向天主教与路德宗的派别和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者达成了妥协。于是，英格兰的教会成了宗教改革的又一变种。此外，苏格兰成了加尔文主义的，而爱尔兰则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持续着天主教的习俗。

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态势

经过多次的武装冲突和宣传斗争，因着“谁的统治，谁的宗教”的原则，欧洲分崩离析了。那时显然还分为很多国家的北德意志大部分地区，主要是新教的；南德意志和奥地利则是天主教的。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克罗地亚、西班牙、葡萄牙和大部分的法兰西是天主教的。瑞士的一部分、尼德兰和苏格兰是加尔文主义的。在斯堪的纳维亚，路德宗占据上风。在东欧，比如在俄罗斯等地，东正教实力强劲；不过，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正在蚕食巴尔干地区，最终将会危及维也纳。在宗教改革开始之前的西班牙，好战的天主教徒国王击败了最后一股穆斯林势力；正是凭着天主教信仰，西班牙人征服了美洲大陆。

我们在这里不妨暂停一下，想想宗教改革给基督教带来的巨大变化。宗教改革实际上是基督教信仰的重建；天主教在某种程度上

336 不得不认同了宗教改革，他们进行了著名的、旨在重塑自身习俗和制度的反宗教改革。

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诸层面

在仪式层面，宗教改革家带来了不少或大或小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涉及地方语言的使用，除了只是作为一种神学语言而被保留下来之外，拉丁语已被废除。路德宗和安立甘宗遵循一种颇为简化的圣餐仪式，这是他们最经常举行的仪式。长老宗和激进派则倾向于认为，严肃和神圣的圣餐应该在特定时刻或每月举行；以讲道为中心的经常性聚会是他们的崇拜仪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将建教堂的格局体现了讲道的中心性。

许多虔诚的礼仪，例如朝圣、对圣人遗物的尊奉、童贞女马利亚的雕像，甚至也在路德宗和安立甘宗中一扫而光。在绝大多数的宗教改革家看来，童贞女马利亚在天主教中获得了极不恰当的地位，对她的信仰全然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信仰的象征；这种看法，直到19世纪英国国教高教会派（Anglo-Catholic）①的复兴才有所改观。一般而言，仪式被极大地简化了。在教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天主教认为，饼和酒在圣餐时被转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宗教改革家大大地修改了这个重要的天主教观念，进而禁止尊奉被祝圣过的饼（即所谓的“圣饼”[Host]）；然而，在反宗教改革之后，对圣饼的尊奉成了天主教信仰生活的显著特征。

在伦理道德层面，尽管处境大有不同，关于苦修生活的理想复兴了。每一个人都应该节制和自律。在平信徒和男、女修士之间，或在基督徒共同体的普通成员和教会历史长期以来被授予“圣徒”称号的人之间，不应该有所区别。在神职人员和会众之间，也没有根本区别。神职人员可能会受到一些特别的训练，以适应其职分，但所有信徒都有可能成为神职人员。于是，宗教改革引发了伦理道德的复兴，而且对公义和正义的生活提出了更为严肃和更为有挑战性的召唤（宗教改革家也会认为的）。基督教应该遍及生活的各个部分；这也

① 这个派别不受罗马教廷辖制，不过仍然持守天主教的传统。——译注



路德、维滕堡的其他宗教改革家和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John Fredrick，1503—1554，别号"慷慨者"[the Magnanimous]）。左数第一人是路德，右边前排右数第一人是路德的朋友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此画由小克莱纳西（Lucas Cranach the Younger，1551—1586）作于1543年前后，后藏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托莱多艺术博物馆（Toledo Museum of Art，Ohio）。



罗马天主教会普遍看重华丽的装饰，这不同于宗教改革所倡导的简朴。图中教堂是一栋位于安特卫普（Antwerp）的耶稣会教堂，它象征了耶稣会这个新团体的勃勃生机。该会在教廷争取皈依者的过程中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是天主教的教义；但是，在宗教改革家看来，这不同于天主教的教义，因为天主教向人的软弱做出了太多的让步。

在教义层面，至关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恩典被当作中心。这种思想可以部分地追溯至圣奥古斯丁，不过，可以更多地追溯至圣保罗的书信。得救是来自上帝的礼物。新教徒不但反复强调上帝令人敬畏的神圣性和可怕的震怒，而且愈加强调上帝的温柔与怜悯：他降卑来到世上以提升人类。虽然宗教改革（特别是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往
340 往倾向于高度的理性化，虽然这场运动确实推动了欧洲大学的重组、推动了哲学释放出巨大的新能量，但是，宗教改革的主流是反对运用理性认识上帝。也就是说，宗教改革家首要强调的是启示的中心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启示就意味着《圣经》。于是，圣阿奎那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在启示神学和自然神学之间建立的宏伟大厦就被拆除了。

如今，不再被学术语言屏蔽的《圣经》直接诉诸民众的心声，成为

了叙述不断喷涌的伟大源泉。印刷术把《圣经》带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在判断真理问题时，可以不再依赖学术的或教士的注释，而是自己直接查阅《圣经》。《圣经》在人们面前成了一系列的戏剧，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流浪、耶利米的困境、但以理充满异象的生命、基督的传道（ministry）、使徒们的含辛茹苦和英勇事迹得到了鲜明的突出；对照这类的戏剧，男男女女都可以进行自我的生命考量。《旧约》是一个观念丰富和故事繁多的宝库，天主教从总体上讲一直使平信徒远离它。犹太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可以用新的方式来重新体验，比如，在加尔文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内，守安息日就是根据清教徒的新规则来 341
进行的。

在解释自身所处的时代时，新教徒有时采取了极端严肃的叙事性比喻（因此就有了我们略有提及的闵采尔的弥赛亚式期待）。罗马教会和教廷遭到了极为负面的对待：教皇是敌基督（Antichrist），他的教会不是基督的新娘，而是淫妇。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争斗中，苦涩和悲伤司空见惯。

在经验层面，罗马教会强调神秘主义和在沉思生活中的自我训练，这也正是男、女隐修院的理想所在；这些强调都被削弱了。新教确实出过一、两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比如，伯麦（Jakob Boehme，1575—1624），他对贵格派和后来的德国哲学思想，特别是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都有过巨大影响。尽管如此，隐修院的消失有利于家庭生活，个人信仰和家庭祈祷从而得到了更大的重视。由此而来的敬虔主义虽然充满热情和温暖，但对灵魂深处的探索却不甚在行。对《旧约》的重新强调也引发了：上帝是会愤怒的和神圣可畏的之类的观念、对神圣者全然依赖的情感、我们全都不配的感觉，即，神圣性只能来自神圣者、唯独藉着上帝恩典我们才能从罪中得救。

在制度层面，加尔文主义者有一套民主的管理制度：地方委员会、全体大会、被选举的领导人。每一个教堂的会众各自邀请一名牧师为之服务。路德宗和安立甘宗在重整制度时则并不那么彻底，他们继续坚持使用主教、牧师、助祭——在他们看来，这是早期教会曾具有的三重结构。君主对教会事务的规范和管理上有相当的发言

权，教会—国家的联盟十分坚固，因此，就有必要管制那些不遵奉国教的人。

与天主教徒一样，宗教改革家动用了各种迫害手段，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剥夺或限制了不遵奉国教之人和天主教徒的公民权。这些剥夺或限制直到 19 世纪才被取消。在英格兰，信仰天主教在实际上一度等同于叛国罪，因为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战争也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或宗教之间的战争。1588 年，这场战争结束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被击败。忠诚于伊丽莎白女王意味着忠诚于以她为首的宗教。童贞女伊丽莎白取代了童贞女马利亚。

正是这样的宗教管制迫使一些更为激进的清教徒和宗教改革家移居他乡，如东欧一些国境未定的地区、波罗的海地区或美洲大陆。不过，在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1618—1648）之后，饱受宗教战争折磨和消耗的欧洲人终于达成了对宽容理想的进一步认识。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正是其中一位著名的宽容理论家。

对于宗教改革家来说，最深层的危机在于取消了教皇的权威；他们很快就发现：对于《圣经》的解释如此多么变化多端，以至于相互
342 冲突的不同体制可以由此奠定形成的基础。《圣经》是一位纸上的教皇，但是，谁又能确保信仰和实践的一致呢？有人主张教会和国家应该相互结盟，因为国家可以敦促教会在教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英国议会以法案形式向安立甘宗颁布了《三十九条信纲》；1597 年，新教徒被赶出奥地利；1685 年，新教徒最终被逐出法兰西。其他宗派则寻求一种力求内在一致的不同模式，即更加重视教义产生的民主过程和协商一致。但是，新教依然存在着权威方面的危机，这也正是新教为什么分为如此众多宗派的原因。

在物质层面，新教徒接管了一些天主教堂，他们拆除了那些具有显明非新教特征的部分，有时还对教堂的内部加以改造，比如在日内
343 瓦。新的教堂建筑，特别是在加尔文主义的国家，更为简朴：朴素的白墙，没有彩色玻璃窗和装饰品，只有一个大讲坛和一张圣餐桌。加尔文主义不鼓励唱赞美诗，只允许唱《诗篇》，因为《诗篇》真正是《圣经》的。虽然由于循道宗（Methodism）的影响，唱赞美诗早已在英格兰蔚然成风；但是，在清教徒影响下的英格兰教会，唱赞美诗直到



制度层面：在路德宗国家，国王或诸侯控制了教会；在安立甘宗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图中正在祷告的伊丽莎白一世就是英国国教会的元首。

1820年才成为合法的。对圣像的破坏屡见不鲜，比如，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手下的英格兰军队摧毁了大量的苏格兰教堂。

宗教改革对绘画的影响体现于绘画的世俗化：欧洲的新教地区不再需要圣像和祭坛装饰品。荷兰人开始热衷室内画、肖像画、海景画和山水画；英格兰人则开始喜欢山水画和肖像画。在这个新传统的激发下，18世纪的苏格兰诞生了一批伟大的肖像画艺术家。上述

这些都属于一种更为客观的对人与自然的新洞见，这种洞见对于现代科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因此，新教的宗教改革产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影响。这场运动促成了基督教的一种朴素无华的、修辞性的、以书为界的、虔诚热心的、教条主义的、民族的、简单明了的新创造，并且把各种能量赋予了基督教，从而激发了贸易、探险、科学、民族主义、民主和冲突。



这幅荷兰室内画反映了宗教改革带来的影响：简朴的仪式。

反宗教改革和现代天主教的形成

344 在宗教改革狂风扫落叶般的最初几年里，罗马天主教的大厦摇摇欲坠，迫切需要一些修补。不过，只是在1545年，教廷才在特兰托(Trent)成功地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开得断断续续，直到1563年才告结束。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致力于整顿和清除体制内的弊端，从而为一个更加集权的新生教会做好了准备。主要的会议内容就是拒绝与新教徒和好。此外，这次会议改革了主教和教士的任命方式；重新组织而且更加理智化了神职人员的训练；修订了拉丁

文《圣经》译本(Vulgate);重新整顿了教会的行政管理制度;重新阐述了七圣事和因信称义的教义;处理赦罪、圣徒敬拜等问题的方式不再宽松,而是更加严厉了。于是,天主教会增强了集权管理的力量,在实践中重新肯定了所有被新教徒极力批评的东西,比如,对童贞女马利亚的热爱、对圣徒的敬拜、朝圣、对圣饼的尊奉、教士的中心地位和教会的教阶体系。

差不多与此同时,进行传教活动和重申天主教价值观的最有力武器出现了,这就是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Loyola,1491? —1556)创立的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主要在西班牙宫廷被抚养成人的他,有过一段骑士般的战斗生涯。在潘普洛纳(Pamplona)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不得不长期休养;养伤期间,他读了几本基督教书籍,因而大发热心,皈依基督教。在献身宗教生活后,他启程前往圣地耶路撒冷。回到西班牙后,他在教士(不是修士)中建立了一个小团体,这就是日后其成员被称为耶稣会士(Jesuits)的耶稣会的雏形。他设计了一套充满活力的训练计划,并在其中加入了军事化的元素;对于那些想在此世侍奉基督的人来说,他的《属灵的操练》(*Spiritual Exercises*)是一份卓有成效的指南。他把自己的新团体置于教廷的支配之下。凭着钢铁般的纪律和高度理智化的训练,耶稣会成为天主教重新征服部分欧洲,比如,法兰西、南德意志、奥地利、波兰和其他地方的主要原动力。在印度、中国、日本和拉丁美洲等传教区,耶稣会的工作也卓有成效。

不过,对于天主教的未来并不吉利的是,特兰托会议还公布了一份《禁书索引》(Index of Forbidden Books)。由此,天主教会开始了对其教徒阅读和写作长达四百多年的审查。这是为了保护教皇权威的必要纪律。不过,在正统教义的限制内,天主教会还是呈现了焕然一新的勃勃生机。1622年,天主教会建立了一个传教部门:传信部(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de propaganda Fide*,现代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正是来源于此)。在新航海、新发现和殖民主义浪潮的风起云涌中,罗马天主教收获甚丰,足以弥补它在欧洲的损失。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给教堂带来了又一次的富丽堂皇:后文艺复兴的豪华圣画,装饰精美的天花板,大理石的祭坛

345 和曲折的蜡烛架，供奉圣体的金制圣体匣，精致的附属礼拜堂，湛蓝的、头上有星星环绕的童贞女塑像，和以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和莫扎特（W. A. Mozart，1756—1791）分别创作的弥撒曲为极致的各种新型礼仪音乐。新的修会层出不穷，神秘主义也方兴未艾。其中，阿维拉的圣特雷莎（St. Teresa of Avila，1515—1582）和圣十字的约翰（St. 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在西班牙创立了一个著名的神秘主义流派。

由于如此这般的原因和其他的因素，罗马天主教在其宗教生活方面重新焕发了生机。为了迎合传统的人群，它努力把一种新的理智化纪律和普通民众的敬虔融合起来。不过，为了获得一些优势和利益，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将在启蒙运动和欧洲民族主义兴起时期变得显而易见。

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

宗教改革及其结果对权威的削弱和打破有着哲学性的影响。宗教改革把理性置于权威之上；同样地，对于某些思想家来说，占统治地位的应该是理性而不是信仰。宗教所导致的可怕争斗激发了对宽容和合理性的渴望。一股理性主义的潮流在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中兴起了，这就是文化史学家所谓的启蒙运动。这场崇尚理性的新兴运动部分地来源于法兰西，包括其中的一些作家，比如猛烈批判教权、渴望摧毁罗马教会的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和社会理论家、温文尔雅的道德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标志着法兰西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的是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他主编了鸿篇巨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德意志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可能是莱辛（Gotthold Lessing，1729—1781）和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莱辛是一名戏剧家和神学家，著有《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这部戏剧以一位犹太精英为主角，致力于为宽容辩护。康德融合了启蒙运动的两个伟大主题：理性的重要性和对批判的本质需要。康德说过，通过阅读苏格兰哲学家和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

1776)的怀疑性作品,他从"教条主义的睡梦"(dogmatic slumber)中惊醒了。对历史更为科学的研究进路已经开始引发对《圣经》的真理性、至少是其无误性的普遍怀疑。这将给《圣经》权威的维系带来莫大的麻烦。如果罗马的教皇被断然拒绝了,如果纸上的教皇被削弱了,那么在何处才能找到权威呢?这将是19、20世纪宗教争论中的重大论题之一。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大产儿,他为世界伟大变革中的一股潮流——资本主义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看一看这个时代的发明吧:1775年,蒸汽机问世;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用他发明的新轧棉机革命性地 346
改变了棉花工业;1814年,第一台应用型蒸汽机车被建造出来;1831年,法拉第(Faraday)证明了电动发电机的原理;1846年,乙醚首次被作为麻醉药用于手术;等等。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时代;在此期间,许多科学开始真正展示它们的实际效用。随着庄稼轮作法和后来收割机等机器的运用——这些农业机器的运用使得北美大草原的开发变得非常便利——农业领域也发生许多伟大的变化。简而言之,人类步入了一个工业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进入了早期的鼎盛时期。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大出风头,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这也正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是民族主义。

当然,民族主义早已在宗教改革时期初露峥嵘。不过,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一同赋予了民族主义新的推动力,因为民族主义在19、20世纪和现代化发生了关联。民族—国家可以满足对更大运作单位的必然要求。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对新财富的创造进行管理的、具有政治活力的模式。一种新的文学播下了民族文化理念的种子。

寻求民族认同的斗争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已经势不可挡,民族的强大已再自然不过。帝国成为当然的结果。恰恰是荷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大不列颠、丹麦等这些谋求统一和自由的民族也卷入了殖民帝国之间的争夺。于是,我们发现了民族主义在进入世界历史舞台时所具有的爆炸性力量:正是民族主义的强大引发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反抗运动,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支配所有人类的一般

原则。我们有一个联合国(a United Nations),而没有一个联合的人(a United Persons)。

上述种种为新意识形态的形成预备了道路,这些新意识形态多少有些宗教的味道,纵使是最为激烈地反对宗教的信仰,比如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因为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教义方面有点薄弱,所以这种观念倾向于与更为宽泛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混合在一起。正如法兰西的民族主义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与自由主义混合一样,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也与自由主义混合在一起;不列颠的帝国主义致力于它所认为的基督教文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把天主教当作其教义上的担保者。

民族主义在其他许多方面有着如同宗教般的功能。民族主义的神话是民族的故事,一旦现代化使教育普及,在学校里就会讲授它。民族主义的仪式是国旗、国歌和阅兵式——这些仪式的前兆是法兰西的三色旗、《马赛曲》(*the Marseillaise*)和市民军队。民族主义的伦理学关涉的是守法、纳税和随时准备战斗的好公民——若是妇女,就需准备着为民族国家生育下一代。民族主义的教士阶层就是教师,它的圣人就是过去的英雄和诗人;它的组织就是国家自身的组织。它的情感是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思念。简而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宗教力量,所有传统宗教都不得不向它做出某种程度的调适。

347 在19世纪的新欧洲,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十分多样。在英格兰和瑞典这样的国家,民族宗教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过,对那些不遵奉大多数人所信宗教的公民也不得不迁就和容纳。在天主教会和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中主要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敌意;天主教会急于保住它在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the Papal States)——这个教皇国被视为天主教会独立性的保证——内的领地和据点。当德意志统一时,许多新的妥协(包括教育体制的划分)达成了;不过,一般还是认为,基督教属于个人生活,而国家则属于公共义务。如今,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为了宗教而丧命。哪里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哪里就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顺便提一句,正是出于民族主义,那

些多民族的帝国注定要麻烦不断，欧洲所有的多民族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将分崩离析。

犹太人的解放与新欧洲

从中世纪晚期起，由于迫害和其他的一些原因，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中心开始东移。的确，在18世纪的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特别是在德意志的一些公国内，一些犹太精英凭借在宫廷圈子中的优越职位，比如财政管理员、物理学家，等等，试图获得社会地位。大多数犹太人密布于波兰和俄罗斯。18世纪晚期，八十多万的犹太人被纳入俄罗斯，并被允许定居于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黑海沿岸地区在内的所谓“隔离地带”（the Pale）；波兰也是犹太人的一个居住区域，只是没有包括在“隔离地带”之内。正是在东欧，伟大的觉醒运动“哈西德主义”（Hasidism）发生了。

萨巴塔伊（the Sabbatean）运动在很多方面为哈西德主义预备了道路。这场运动的焦点是萨巴塔伊·茨维（Shabbetai Tsevi，1626—1676）其人及其主张。被一位追随者（加沙的拉比纳坦）称为弥赛亚的萨巴塔伊·茨维来自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即伊兹密尔[Izmir]）。萨巴塔伊运动的出现似乎恰逢其时，犹太人在当时遭受了极度的折磨。他们不仅被赶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而且在1648—1658年的哥萨克人起义中受到了腥风血雨式的屠杀。多少有点古怪的萨巴塔伊·茨维是一位具有超凡领袖魅力的人物；种种对弥赛亚的期待在各个犹太居住区被激发了。1666年，萨巴塔伊·茨维面临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被折磨致死，要么改信伊斯兰教，结果他选择了后者。依然还有人在追随他；最终皈依天主教的雅阿科夫·弗兰克（Ya'akov Frank，1726—1791）在波兰继续领导这场运动，先是进行地下活动，后再次公开活动。但是，在整个欧洲和东方，不少犹太人毕竟都被萨巴塔伊·茨维愚弄了；而且，这个事实给犹太人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促使他们必须找到更为耐心的、至少不同的方法来解答问题。

门德尔松

在犹太人从聚居区转而进入欧洲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作为哲学家的德意志犹太人领袖门德尔松（Mendelsson）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第一位公开发表德语作品的犹太人，也是犹太教改革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生于（德意志东部的）的德绍（Dessau），受过包括迈蒙尼德哲学在内的传统教育。之后，他在14岁时跟随一位拉比来到柏林。在柏林，他耳濡目染于欧洲启蒙运动及其科学和现代欧洲语言。剧作家莱辛的名剧《智者纳旦》（1779）的原型正是门德尔松。由于人文方面的成就，门德尔松成为一位“受保护的犹太人”，从而拥有了柏林的居民权。他常在家里举行晚间聚会，在知识界颇有影响。1767年，为了捍卫灵魂不朽的观念，门德尔松发表了《斐多》（*Phädon*）一书，从而在知识界享有了更高的声誉。

1769年，一位瑞士牧师向门德尔松提出质疑：作为一个受过启蒙熏陶的人，门德尔松为什么不信仰基督教。于是，门德尔松很快回到了自己的犹太本根，又一次浸淫其中。门德尔松不但使阿尔萨斯（Alsace）的犹太人免受反犹法律的迫害，而且在瑞士通过基督徒朋友的帮助对犹太人予以保护。他还发表了希伯来圣经前五卷的德文译本（顺便说一句，印刷所采用的字母是希伯来文的）。1783年，他发表了《耶路撒冷，或论宗教的权利和犹太教》（*Jerusalem, order Über religiöse Macht und Judentum*）一书，主张宗教上的良心自由和政教分离。书中，他还间接地为犹太人的权利作出了论辩。他认为，（得自启示的）犹太律法仅仅对犹太人有约束力。犹太人在原则上对律法的遵循不应该阻碍犹太人拥有完全的公民权，成为对国家忠心的公民。顺便提一下，门德尔松的很多同仁都是犹太教启蒙运动（“哈斯卡拉”）中的杰出人物。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世界和信仰传统的夹缝中继续生存，这有赖于犹太教的解放浪潮；其中，门德尔松的作用功不可没。

确实有着长远影响的哈西德主义与巴阿勒·舍姆·托夫（Ba'al

Shem Tov,或简称为"贝什特"[Besht])息息相关;"巴阿勒·舍姆·托夫"意为"美名大师"(Master of Good Name),是以色列·本·以利撒(Yisra'el ben Eli'zer)被赠予的头衔。贝什特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在其所处的乌克兰南部和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复兴了犹太喀巴拉的理想。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医治者、神秘主义者和善于振奋人心的教师强调,有必要操练与永在上帝的不断交流(*devequt*)。这场虔敬的运动也许除了组织方面以外都堪称正统。在严格遵守律法的框架之内,这场运动不仅强调在交流中的自我训练,而且强调热烈的情感。在贝什特去世50年后倾向于建立其自己的社团的哈西德主义,遭到了威尔纳的加昂(Gaon of Vilna)的反对;加昂是东欧犹太人律法方面的首席人物,他给哈西德主义带来了不少恐慌和痛苦。尽管如此,作为一股新生力量的哈西德主义在很多方面给《妥拉》的外在履行赋 349
予了内在的意义;而且哈西德主义是美国犹太教正统派(Jewish Orthodoxy)的一个重要分支,起过一些特别的作用。

比照于哈西德主义向内看的紧张和努力,18、19世纪犹太人的主要经验是解放后的不断扩展,以及更全面地进入当时的灿烂文化舞台: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这是成为贝多芬、康德、歌德和庚斯博罗(Gainsborough)①所在世界的一部分。在1791年的法兰西,犹太人被确认为享有完全公民权的公民;同年,博斯韦尔(Boswell)②的《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出版,莫扎特的《魔笛》(*Magic Flute*)首演。

两位伟大的犹太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为解放后的犹太人预备了可能采取的道路。斯宾诺莎(Barukh Spinoza,1632—1677)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文主义者,他放弃了犹太教,不过没有以信奉另一种宗教来背叛犹太教。后来,有许多犹太人效仿他,放弃犹太教的同时却保留了犹太性(Jewishness)。顺便提一下,斯宾诺莎是从历史角度批判 350
《圣经》的先驱。另一位哲学家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

---

① 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年,英国著名肖像画和风景画家,主要作品有《蓝衣少年》和《清晨漫步》。——译注

② James Boswell,1740—1795年,苏格兰作家,著有《科西嘉岛纪实》。——译注

1729—1786)，他拥护自然神论，或者说启蒙运动对理性上帝的信仰，但是依然捍卫犹太教。在他看来，犹太教是一套由启示得来的法规体系，这套法规体系规定了生活和生命的仪式方面，并以之作为真理的不断提醒方式和防御崇拜错误观念的樊篱。门德尔松宣称，在文化上成为德国人同时在个人习俗上成为犹太人，在实践中是可行的。他预示了犹太教后来的两种不同类型：正统派和改革派（Reform Jewish）。

犹太教的不同类型和犹太性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解放和宗教宽容，犹太人面临着不同的新选择。这些新选择在美国变得愈加明显：很多犹太人从充满迫害与贫瘠的东欧与中欧移民到美国，美国由此成了主要的犹太人生活中心。犹太人基本上分为如下四类：完全同化于周围民族的犹太人，这通常来说不太可能，因为周围的人会意识到这类人是犹太人；文化上同化但仍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在这类人当中，解放所促成的犹太教新派别改革派做出了特别的努力；犹太教的正统派，这个如今略微现代化的派别在全新的民族环境下尽可能地持守犹太教的规则；后来在19世纪晚期，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展望，试图为犹太人自身谋求一个民族性的祖国。如同其他民族主义一样，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也是与一种现代化的进程并驾齐驱的，它试图充当弥赛亚的角色，因而遭到了正统派的强烈反对。

犹太宗教转变为更为个人的而非群体的事情，这早有预兆，即一些犹太精英对拿破仑（Napoleon）的回应；当时，拿破仑他们召集参与后来所谓的“公会议”（Sanhedrin，此名字来源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公会议）。当时的人们对此说法不一，争论的要点在于：这些人是否是真正的法国公民，或者说他们是否属于法兰西的一个民族？这些犹太精英的回应是：以色列不再是一个民族，《妥拉》适用于以往岁月的部分已经失效；而且，在欧洲部分地区实行局部自治已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因此，他们实际上在公民身份上是完全的法国人，在宗教上是犹太人。

这个回应预示了在19世纪余下时间里广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即，犹太教是一种普世的信仰和伦理性的一神论，不需要披上种族的外衣。此外，犹太教也不需要曾经有过实质意义的一些象征：回归锡安、重建圣殿和恢复以色列。对这些未来图景嗤之以鼻的犹太教改革派，并没有以相当现实的态度对待正统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犹太教改革派的具体主张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肯定，而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不是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

拿破仑的上述启蒙主义看法，并没有阻止法兰西反犹主义的情绪；在1894年的德莱夫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事件中，法兰 351
西的反犹主义爆发了。德莱夫斯是一名犹太裔军官，被错误地指控为向德意志人出卖情报，之后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法属流放地魔岛（Devil's Island）被监禁多年，直到1906年才平反昭雪。正是部分地由于持续不断的反犹主义，犹太民族主义的观念，特别是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开始兴盛；1897年，在世俗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的设计下，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召开了。

我们将在描述美洲的犹太人时回到宗教方面的话题。对于犹太教来说，欧洲文明颇有吸引力，但也可能有侵蚀性，因此有时对他热烈欢迎，更多的时候却是充满敌意。在现代世界中，犹太教和犹太性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实现了以往在宗教方面受到限制的全部可能性。但是，一个致命的敌人将由于民族主义最终形成：正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推动了纳粹党及其大屠杀的出现。

俄罗斯与新知识：向东的动力

属于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或多或少地占据了以前拜占庭帝国的 352
领土，这使得属于东正教的整个狭长地带十分局促，只够生存和呼吸。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继续存活的东正教被纳入所谓“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这个制度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这样的亚群体[subcommunities]遵循他们自己的律法，由他们各自的领袖实施管理）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不过，已然庞然大物的俄罗斯注定要

从东方获得更多的版图，并且在东方彰显东正教信仰。既然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已被攻克，第一罗马已被新教腐蚀和削弱，莫斯科行将成为第三罗马，注定有希望领导各种信仰力量恢复纯净的和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首先立足于基辅，但是，这个权力中心被蒙古人摧毁了；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普斯科夫（Pskov）等地也是基督教的中心，但是，为了抵御来自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那里发生过艰苦的自卫战。于是，莫斯科顺利地成为新首都。在16世纪晚期，莫斯科大主教被冠以“牧首”（Patriarch）的头衔，并且成为伊斯兰教统治区[1]之外的主要正教领袖。

1552年，俄罗斯在东部的喀山击败了当地的蒙古可汗，由此打通了向东兼并大量国土的道路。在1689年之前，主要是为了有利可图的皮货生意，俄罗斯事实上完全接管了整个西伯利亚。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2—1725年在位）和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年在位）的统治之下，俄罗斯征服了西北和黑海沿岸地区，在圣彼得堡（St. Peterburg）和敖德萨（Odessa）创建了新的海港，从而极大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彼得大帝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其中包括对教会的控制，比如，废除牧首制，直到1918年牧首制才得以恢复；教会由主教公会[2]管理。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之前，东正教已经发生过分裂。为了使俄罗斯的仪式习惯与拜占庭的保持一致，尼康牧首（Patriarch Nikon，1605—1681）在17世纪试图进行一系列的仪式改革，其中包括对划十字方式的改革：用三个手指而不再用两个手指。许多人认为，尼康的这项改革措施冒犯了莫斯科会成为第三罗马的特殊召唤；尽管备受迫害，这些人还是组成了一个继续坚持旧式礼仪的大规模分裂团体，即著名的“旧礼仪派”（Old Ritualists 或 Old Believers）。大部分乌克兰人由于不同的原因

---

① “the Islamic captivity”，直译的意思是“伊斯兰教之囚”。此处用典，套用“巴比伦之囚”这个古代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的历史事件来指代伊斯兰教统治区东正教的处境。——译注

② 主教公会由若干名都主教组成，是教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局长负责管理主教公会。参《基督教史》，唐逸 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63—164页。——译注

——主要是民族主义的——自行组成了与罗马有所交往的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the Uniate Ukrainian Church),不过他们使用礼仪和习俗还是东方的。

在18、19世纪,向东一直延伸至北美阿拉斯加的新国土,成为了大量传教士的传教工场。属灵生活在这段时期也大大复兴。来自阿索斯山的静修主义(Hesychasm)被引入信仰生活,希腊式灵修学的文献被大量翻译。神圣的长老从此进入成为教会生活,成为教会的一大特色;由于具有非凡的属灵魅力,而且圣洁,这样的长老常被认为是教导方面的宝贵人才——有点类似印度的古鲁,不过,两者所处的宗教和文化氛围迥然不同。在所有这样的圣人中,萨洛夫的圣谢拉菲姆(St. Serafim of Sarov,1759—1833)是最有名的。在一位长老的建议下,他在年轻时进入了萨洛夫的隐修院。他从1793年直到1815年一直隐居在隐修院附近;在1815年至1825年则隐居于一间密室;正是在这间密室,他得到了神圣的启示要他去与人交谈并加以劝告。正是因为他,许多基督徒的生命经历过圣灵的恩典;而且,据说,当他治病、劝诫和说预言时,他的脸上闪耀着圣灵之光,接近他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

正是这样的一些长老,对一些俄罗斯伟大的作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和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作家反过来在作品中也阐述了深刻的宗教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著《卡拉玛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中描述了一位重新彰显了古老基督教信仰的佐西玛(Zosima)长老;不过,在这部小说中,这种基督教信仰是藉着如下方式得以净化的:在对上帝的严厉批判中,伊凡讲述了一个西班牙宗教大法官的故事,这位大法官毫不理会返回的耶稣。晚年的托尔斯泰宣扬一种简单的爱与和平主义,这使得他被正教会逐出教会,但却赢得了甘地的感激:甘地在心灵成长的过程中从托尔斯泰那里受益匪浅。

尽管东正教会的势头依然强劲,但是乌云逐渐开始密布和笼罩在东正教会之上。在19世纪晚期,俄罗斯人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主张现代化的西化派(Westerners),他们之中往往充斥着从自由主义

到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新奇革命理论；另一派是斯拉夫派（Russophiles），他们坚信的对象是古老的俄罗斯、农民的智慧、俄罗斯在这个苦难世界的神圣使命等。1861 年，随着农奴的解放，俄罗斯开始了新一轮的现代化浪潮；但是，由于领导层的拙劣和低能，这轮现代化浪潮归于无效。1905 年，俄罗斯在奉天（Mukden，沈阳旧称）陆战和对马岛（Tsushima）海战中均被日本人击败，大大蒙羞。上街示威的工人遭到军队枪杀，这动荡的局势预示了革命的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标志了君主制和旧秩序的命运；战后的崩溃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随着帝国的战线向南拉到了中亚，沙皇的扩张得以继续进行，以至于帝国在与阿富汗和伊朗交界的地区拥有了大量穆斯林人口。

近现代的欧洲

基督教在西欧的发展

启蒙运动激发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探索方法，其中一些知识和方法最终威胁了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以现代的方式和态度探索过去而不仅仅是讲故事，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和态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圣经》历史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进化论的出现等因素极大地动摇了对传统宇宙论的信赖——这种传统的宇宙论早已经过牛顿物理学的修改。

354 上述这类最早挑战传统的理智潮流，部分地来自影响极大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存在是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的不同表现形式得以展现的过程。黑格尔之所以这么说，原因之一就是康德式妥协的破产。康德认为，人把诸范畴投射于经验世界，但是，经验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现象界之外的“物自体”（things in themselves）的产物。一些批评者把这当作康德的弱点：在康德自己看来，诸范畴不能适用于经验之上的物自体，因此，不能用单数、复数、原因或存在的概念来言说“物自体”。因此，像黑格尔这样从经验世界背后去除了客观性实在

的观念论者(Idealists),就把世界当作了经验。

黑格尔的原创性在于,他把绝对者(the Absolute)看作富有动力的,比如,这个绝对者通过历史的不同过程发生作用,这些历史过程遵循着一套逻辑,他称之为辩证法——这个观念对马克思因而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历史之中,一个运动(正题)面临着它的对立面(反题);在正、反两题的冲突中,形成了合题。随后,这个合题成了正题,并且引发了它自身的反题和新的合题;等等。

不同的宗教是人类试图把握绝对者各自广为通行的、充满想像和直觉的不同道路;在基督教,绝对者被认为已经达到了自我意识。采纳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费迪南德·鲍尔(Ferdinand Baur,1792—1860)认为,耶稣是正题,保罗是反题,而天主教是合题。上述做法虽都倾向于思辩,但大大地激发了对关于耶稣的可知事实的历史性探索。这样的历史性探索在德意志大学的新教科系中,特别是在19世纪,非常兴盛;后来,这种探索从德意志传到了不列颠、美国和其他地方。

一旦《圣经》不再被视为权威而是证据,不再被看作神圣的文书而是历史的资料,不再被认为具有不证自明的真实性而是往往由不同的神学欲望和口头传统编制而成,那么《圣经》就失去了它长期以来的权威性力量。由此,教会面临了显然的危机。

这场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来自于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进化论的出现,他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在此之前,倘若有基督徒接受物理学,这仅仅是因为物理学和对现存事物的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Victorians)[①]来说,——不仅包括很多科学家,也有很多(绝不是全部)基督教人士——认为人类来源于猿,人类与动物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的观点似乎是一种莫大的震撼;这样的观点往往还被一些道德见解拙劣的人当作使用"牲畜般的"、"野兽般的"等

① Alexandrina Victoria(1819—1910),英国女王,1837—1901年在位。其统治期间,即史称的"维多利亚时代",据说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译注

词语的证据。而且,《圣经》讲的是上帝直接创造物种,而不是达尔文主张的物种的缓慢进化。此外,人们用来证明上帝之善的一些最为有力的论证,比如眼睛的精妙构造、鹰翼的美丽设计、琴鸟和蜘蛛的
355 优美艺术效果,都被进化论的以下说法大大削弱了:上述这些奇妙的事物都是来自于在生存竞争中得以幸存的最适宜者。

与其他的一些观念一起,历史和进化这两个观念对《圣经》的真实性和文字的精确性提出了疑问。亚当和夏娃可能消失于群猴之中。耶稣的明晰轮廓可能消融于历史学研究所带来的各种极端不确定性中。由于能够绝对依靠的不多,许多正统的信念大概不得不用"可能"的言辞来回避质疑、进行自我保护。科学是不是正在成为有神论者的不速之客?学术研究是不是正在抽掉信仰者的脊梁骨?

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挑战来自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的全然改变。男人和女人涌入肮脏的城市,在那里成为大机器的奴隶,受制于钟表的暴政。若有人纵情酒色,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与此同时,原本为不同时代和不同生活方式设计的乡村教区制度也土崩瓦解了。因此,各处的建制性教会都感觉到自己被削弱了,尽管有循道宗的教派在工业化时代的英格兰非常活跃,他们为了适应新社会的多种需要,试图进行勇敢的改造。

上述三个例子代表了基督教在19世纪的欧洲所遭遇的三种力量:学术研究和哲学的、科学探索的与社会挑战的力量。

356 对于这三种力量,有一种回应是拥抱和信奉它们。对历史上的耶稣(the historical Jesus)的追问和科学上的新发现都可能削弱对《圣经》文字之真实性的信赖,但即使如此,那又怎么样?《圣经》本来就不必成为一本历史教科书或生物学小册子。科学应对和研究的是这个世界,而宗教则是以另一个世界为根据来看待、应对和研究这个世界。宗教看见老虎和星星时,光源来自上帝之光,是藉着信仰的眼睛来看待它们的。而且,《圣经》关涉的是上帝的作为,尽管《圣经》本身并不是上帝作为全然可靠的记录。再者,进化是一条好消息,它暗示了人如何从早期灌木丛中的蹑手蹑脚和尖声喊叫提升到如今的道德高度;在这提升的过程中,宗教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基督宗教的作用首屈一指,这种说法肯定会引发不少

争议。至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悲伤，是的，这些悲伤应该被减轻；但是，人类的发明和能量正在塑造一个更为光明的世界。我们应该乐观地站起来面对天国。

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就很多方面而言是19世纪新教自由派(liberal Protestanism)[1]最伟大的代表。哈纳克认为，路德只是部分地改革了基督教，路德把基督教从礼仪主义和教阶体系等中解放出来，但不加批判地保留了教条。在哈纳克看来，我们必须有一种历史基础稳固的信仰，这种信仰指向基督的福音、强调人能经历到天父上帝的爱、强调凭着上帝恩典的爱邻人，不过，这种信仰对基督教的传统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看法。

另外一个回应是否弃自由派的力量，继续在科学怀疑主义的威胁下重申《圣经》的文字真实性；这种回应，我在涉及北美宗教时会加以更详细的讨论。这种基要主义往往与强烈的传教热情融为一体，在基督教传统中依然不失为一种充满动力的力量。不过，还有一种回应将有助于信仰的增强，这种回应强调教会组织的重要性。在新教内部，实际上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即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牛津运动在英格兰教会中强调天主教礼仪的活力，并且复兴了关于教会之神圣权威的高级理论；不过，有些牛津运动的追随者改宗了罗马天主教。这次复兴运动极大地改变了安立甘宗的礼仪维度和物质层面，因此，哥特式建筑再次流行于大规模的教堂建设与重建项目中，——这些项目是为了适应英格兰维多利亚时代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艺术方面的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运动也促成了晚期中世纪风格之宗教绘画的复兴。

但是，最重要的回应是重申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其中一次重申是通过著名的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Vatican I)。这次会议1870年在罗马举行，提出了教皇无谬误(infallibility)论[2]，也就是说，教皇“从圣座”(*ex cathedra*)，即从他神圣的和正式的职位，对教义和伦理问

---

① 为了区别于政治自由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一般不翻译成“自由主义的基督教”或“基督教自由主义”。——译注

② 或译“教皇不能错误论”、“教皇永无谬误论”。——译注

题发表意见时都无谬误。1907年,通过对所谓"天主教现代主义"(Catholic Modernism)的镇压,教皇无谬误论又一次得到了重申;所
357 谓天主教现代主义,即许多作家和神学家利用对新教已发生过上述影响的自由派进路来开展研究。在天主教的传统之中,《圣经》研究和论证的哲学界线都被极大地限制了。这种试图阻碍教会成员的努力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1881—1963)召集的、著名的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1962—1965)。

一些欧洲基督徒为了回应新社会和新世界的挑战,选择和采取了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方式。不遵奉国教的新教教派(比如循道宗和浸礼宗)的精神深深地渗透于不列颠的一场工人运动中,这场运动凭着所附属的工会和所拥有的知识,试图寻求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社会主义方案。循道宗甚至在19世纪的早期就已成为社会活动的先驱。我们稍候会谈到鼎鼎大名且十分重要的美国社会福音运动。

替代宗教的几种新意识形态

在19世纪产生的所有新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最大。对于那些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关系密切的革命群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早年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受过黑格尔的影响,不过,他采取了迥异的倾向来接受黑格尔的关键观念。在欧洲伟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1848年,在德意志和巴黎编过几份激进刊物的马克思最终定居于气氛相对宽松的伦敦。在这里,在富人朋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经济支持下,穷困潦倒的马克思著作其丰,而且从事着革命组织的工作。

358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是不同于黑格尔观念论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的辩证法体现于不同经济制度的冲突与矛盾之中。资本主义自身包含着矛盾,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为了追逐利益和利润,他们剥削工人以获得工人劳动赋予原料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必将强化,从而导致一场革命,进而实现

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是一个不错的理想；它得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证据和理论的支持；既然革命者站在历史这一边，它带来了信心；它本身是一种世俗的末世论，有一些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的味道。

对于马克思来说，宗教是社会经济处境的副产品和异化的症状。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和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认为，揭露宗教是所有理智任务中的第一要义；他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中表明自己受过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的影响。作为黑格尔的另一位追随者和批判者，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是人类对其基本属性(比如理性和爱)的投射(projection)。马克思接受了这种"投射主义"的倾向，并且加上了经济学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现代思想的一种有力组成部分，这种投射主义——即，上帝和其他超自然实体是人类投射于实在的产物——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现代思想中，比如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思想中。

马克思主义自身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带有宗教味道的世界观，它指向的不是一个更高级的世界，而是世界的改造。就教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V. I. Lenin, 1870—1924)和其他人的著作。就神话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有节奏的，其顶峰是无阶级社会的人间乐园。就伦理而言，它不断追求社会正义和阶级斗争的继续进行。就实践而言，它需要在革命行动中具体实现理论的要求。就经验而言，它培养某种热情和对阶级敌人的憎恨。就组织而言，它拥有许多不同的共产主义政党。当马克思主义成为许多国家的官方教义时，它的这些宗教性特征就会更加明显。

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共产主义者，还有一支更为温和的流派，这就是在欧洲和其他地方颇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Marxian Socialism)，这个流派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国家观念相结合。马克思本人曾质疑过法律和其他维护政治权利的手段的重要性。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一些创造贬斥为虚伪的东西；因此，个人自由的观念至少就政治意义而言并不主要出现于马克思的思想之中。不过，带有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

cratic Socialism)曾经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晚期的兴起激发了一些来自基督徒的回应,其中最著名的回应可能是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向教会发布名
359 为《新事物的通谕》(*Rerum novarum*)。在此之前,利奥十三世曾指责社会主义是一场瘟疫;不过,他后来认识到,新的组织形式在工业化时代是必要的。在这份通谕中,他为天主教工会和最终持守民主形式的天主教政党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天主教教育的改革中,利奥十三世也表现卓越;在1879年的通谕《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他改造了阿奎那的思想,创立了对天主教思想家具有强制性的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当这个思想体系刚刚出现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轻易挑战马克思主义和世俗思想对欧洲知识分子不断增长的影响。实际上,基督教对于20世纪早期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已不再是占据上风的信仰了。

许多形式各异的世俗意识形态颇有市场。在那些喜欢更自由和民主的思考方式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不够充分,而且过于思辩;对于他们来说,带有人文主义伦理观念的经验主义,比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1872—1970)的思想,就很有吸引力。以罗素为著名代表的科学人文主义认为:人性是最高的价值,爱人类同胞是最高的伦理,科学是与宇宙发生关联的最好途径。人文主义在西方是宗教的一种替代选择,它曾是、现在也是无神论的,尽管某些人文主义者更愿采用"不可知论"一词来表达他们所持立场的如下特征:无论如何,断言或否认上帝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此语由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造于1869年)都缺乏知识或证据。后来,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其他人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赋予了人文主义一种人格主义(Personalism)的语调和一种戏剧化的人类选择中的底色。英语世界的哲学在科学经验主义和语言分析的影响下已经被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支配了。

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心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部分地由于黑格尔的影响,出现了既反对中间派自由主义观念又敌视左派革命冲动的右翼意识形态。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领

导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持有如下的国家观念：意大利总体国家(corporate State)[①]应该组织专业化的、联合的和工业化的生活为民族主义的扩张服务，并且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不过，比法西斯主义更为危险和更具毁灭性的是纳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传达了一种过于民族主义的思想，断言了日耳曼人和"雅利安人"的优越性，提出了征服和灭绝劣等人(比如犹太人)的计划。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与天主教达成了还算合理的条款，借此维持存在；而德意志的纳粹意识形态则拥有其自身的宗教性(和反基督教的)特征。阅兵、希特勒式的举手礼、制服、旗帜，这些都提供了强有力的仪式因素。关于得救的情感十分强烈：领袖在复兴堕落的德意志时带来了拯救。虽然纳粹的教义和理论基础薄弱，但它关于雅利安日耳曼人的神话却非常厉害。纳粹关于"千年帝国"(the Thousand-Year Reich)的观念是一种欺骗性的末世论。元首希特勒的角色和职责也是宗教性的：这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通日耳曼人，现在正准备超越贵族和将军，把德国引向战争这条路(根本没有在意过他是奥 360
地利人！)虽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其领袖死后几乎没有存活下来，但是，许多与它们有着类似倾向的意识形态能够融入现代的右翼独裁政治中，这种好战的独裁政治和教会的关系往往是有时结盟、有时冲突。

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在欧洲之外的传教

倘若没有关于欧洲扩张的故事，19 世纪的欧洲历史是不完整的。除了俄罗斯这个庞大的陆上帝国之外，不列颠、法兰西、荷兰和德意志也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比利时、意大利和丹麦则建立了实力稍逊一筹的帝国。相对而言，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老牌大帝国由于如下两个缘故已经彻底地变小了：中、南美洲的独立运动，19 世纪末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走了古巴和菲律宾群岛。然而，不列颠在近乎整个印度次大陆巩固了它的统治，进而向北和向西北窥测阿富汗和西藏。它占据了部分的东南亚和大部分的太平洋区域。它控制了

① 或作 corporative State，或译组合国、社团国。——译注

好望角，并且做好了参与争夺非洲的准备。它在文化上支配了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法兰西得到了部分的印度支那，正准备向北非挺进。荷兰占据了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岛屿。参与瓜分非洲的德意志，获得了非洲西南部、东南部的大片土地和非洲西部的一部分。不列颠在东非和南非居于支配地位，并且在西非也颇有势力。法兰西在西非、北非和中非之间有一块巨大的狭长地带。比利时占领了刚果，即后来的扎伊尔；意大利在稍后挺进了利比亚、索马里，最终达到埃塞俄比亚。

所有这些扩张给传教工作带来了无数良机。在列强的庇护之下，基督教各教会四处传教。新教徒的传教在新教列国占优势；天主教徒的传教在天主教列国居上风；不过，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教活动中，不管是不同宗派之间还是不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不少竞争。这种竞争在基督教的立场看来是可耻的；因此，为了促进各教会之间的合作，一次传教会议在爱丁堡召开了；这次会议是所谓的普世教会(Ecumenical)运动或基督教合一运动中起初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我们将在其他章节讨论这些传教活动的结果；不过，这些传教活动的存在加强了欧洲人的如下观念：不列颠人(法兰西人或者无论是哪里的欧洲人)代表了一种将会给非欧洲世界带来理性启蒙和精神启蒙的基督教文明。此外，基督教的传教士还卷入了被征服者及其民族谋求自由与权利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这些自由与权利是征服者及其民族已然享有的。

20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和犹太教

作为替代性的选择对象，许多世俗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了各宗教的命运。在俄罗斯，革命使得教会又一次陷入被囚之境。由于第
361 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力量，数不胜数的人被杀；这次大战导致了原本是新教自由派的组成因素的乐观主义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受到诱惑的天主教会与意大利政府在1929年签订了一份新的宗教事务协定；根据这份协定，天主教徒获得了一些超越教育和婚姻法等的权利。纳粹主义的兴起不仅把德意志教会推向了进退维谷的窘境，而且给犹太人带来了莫大的不

幸。世俗人文主义的思潮即将盛行于斯堪的纳维亚大部，而且在不列颠也会变得颇为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往往被同盟国视为善恶之间的斗争；但是，这次大战照例把敌对双方的基督徒都动员起来了，而且告终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帝国在中欧的扩张。在1936—1939年间的西班牙内战中，一种情绪强烈的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发挥了作用。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之后的这段时期，对于大多数宗教来说，充满了不幸；对于犹太教来说，则不啻为一场灭顶之灾。

1917年，两部意义重大的书出版了，这两本书分别在欧洲的宗教舞台上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其一是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对保罗《罗马书》的评注。该书是巴特主要作品《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的前奏。对于在西线奄奄一息的乐观自由派来说，《教会教义学》所表达的新教神学无异于当头一棒。《教会教义学》虽然毫不偏离学术的规范，但它看待问题的角度非常保守。在巴特看来，启示的本质在于"基督事件"(Christ-event)，而不是经文的字句本身。不过，他坚定地遵循保罗的恩典观，并且以对各种自然神学的拒斥重新表达了这种观点。唯独藉着启示，我们才能知道关于上帝的事情。这是一种采取强硬路线的立场，由此，基督教的启示和其他所有的宗教观念与学说失去了连续性。正像费尔巴哈所说的，这些观念与学说都只是人类关注的投射。基督教具有的价值，仅仅在于它是人们对在基督里的启示的回应。这种教条主义的立场，尽管狭隘和非理性①，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自由派的基督徒和各地的传教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立场之所以后来声望大增，乃是因为巴特挺身而出反对纳粹；与巴特站在一起的，还有所谓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其他成员，他们共同反抗希特勒，并且在1934年签署了所谓的《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

另一本书是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的《关于神圣者的观念》(*The Idea of the Holy*)。奥托认为，"神圣者"是宗教的关键范畴，进而，他分析了关于"神圣者"的经验：numinous，这是一种

① 原文为"nonrational"，不同于"irrational"、"superrational"。——译注

既让人敬畏又令人着迷的神秘经验。于是，通过把自己的宗教哲学建基在这种经验之上，奥托恢复了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不过，奥托的工作语境主要是比较宗教学的。迟至19世纪七八十年代，基督教神学家终于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传统对旧式神学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必须认真看待这些宗教传统。假若没有其优秀的基督徒学者对其他宗教的研究，帝国时代就会不复存在；不过，这些学者的主要研究思路是，欧洲的和基督教的文化更为优越。作为比较宗教学的重建者之一，奥托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对"numinous"的强调在表明各种有神论——根据有神论，上帝是他者（the Other）——的感受特点时，是合适的；但是，在表明无神论神秘经验——特别是佛教徒的神秘经验——的特点时，这种强调就不那么有效。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不止一种类型的宗教经验。当然，奥托所开创的研究进路并不会因此失效。

362

在20世纪的很多时候，由于独裁政治的兴起，欧洲面临了许多迫在眉睫的大难题。尽管有包括著名的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在内的不少人为信仰殉道，但是，不管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和希特勒有过不光彩的交往。最大的难题来自大屠杀（Holocaust，或 *Sho'ah*）——在欧洲，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于纳粹的集中营和毒气室。吉普赛人、俄罗斯的囚犯等其他许多群体也都遭受了残酷的对待。在希特勒的思想和纳粹的意识形态中，反犹主义都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纯粹的雅利安血统等思想也渗入了纳粹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在反犹主义的产生过程中起过一定作用，这部分地是因为一种老早就有的指控：从《新约》时代起犹太人就被指控"杀死了上帝"；部分地是因为一种幼稚的认识论：犹太人没能认出《旧约》所预表的基督，该受惩罚；部分地是因为一种恐惧外国人的、十字军似的排外心理；以及其他的许多原因。然而，现在的基督教也仅仅是在与这个过去妥协。

大屠杀对于犹太人来说当然不只是一种外伤。在希特勒以前，很多德国犹太人都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自豪；在其他很多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在开始被排斥时，犹太人受到了震撼。但是，当大屠杀露出狰狞面目时，一个深刻的问题痛切地摆在了有信仰的犹太人面

前：一个良善的上帝何以能够造成如斯的不幸？有些人弃绝了信仰。有些人把这不幸仅仅视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一次极端体现。有些人认为，这不幸开启了犹太历史的新时期，这一恐怖的大屠杀事件使得犹太人不再受制于各种义务，而是可以绝对自愿地选择信仰上帝和遵守圣约（这种立场可在欧文·格林伯格[Irving Greenberg]的作品中找到）。还有一些正统的犹太人把这种不幸看作对罪的惩罚，也许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惩罚。但是，这种解释几乎不可能是真实的。什么样的滔天大罪才能配得上如此具有毁灭性的惩罚？与此同时，希望犹存。部分来自于欧洲劫后余烬的以色列国成立了，它在 1948 年赢得独立，在多次战争后奇迹般地屹立不倒。

由于大屠杀和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人密集分布于北美和以色列——因为许多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也移居到了北美和以色列。当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犹太生活中心，比如那些在南非和不列颠的中心；但是，重中之重已经转移到了美国，与此同时，以色列则开始在大多数犹太人的思维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比古老的锡安还更重要。如今，"明年在耶路撒冷"拥有了具体实在的意义。

天主教的现代化

对于欧洲的各个基督教教派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 363
的事件可能都与普世教会运动和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有关。前者的标志是 1948 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①]的成立；后者则是一次改革的大会，这次大会导致罗马天主教在思想和实践方面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

在教义方面，新托马斯主义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期间逐渐失势。在叙述方面，新教学术的清风被允许翻动《圣经》的书页。在礼仪方面，拉丁传统被废止，弥撒得以简化，并被翻译成世界各地的方言。在伦理方面，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占得上风，对穷人的关注也得到重申。在经验方面，许多新尝试出现了，在这些充满热心和虔诚的

① 或译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译注

尝试中，一些具有属灵恩赐的出神经历出现了。在组织方面，教会略微民主化了。在建筑和艺术方面，现代性的新力量得以释放。在普世教会运动方面，罗马天主教变得不再那么无动于衷，开始在基督教各派合作的发起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简而言之，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代表了一种不断引发变化的丰富源头。对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来说，这次会议是教会现代化(*aggiornamento*)的一次实际行动。但是，在这次会议前后，为数众多的神职人员、男女修士开始离开自己的岗位，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依然是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在教会内部，许多反叛性的力量被释放出来；这些力量结果变得极具活力，而且并非总是顺从来自梵蒂冈的指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比如避孕之类的事情上，许多天主教徒毫不理睬教皇反对使用人工手段的声明)。

在战后的欧洲，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影响着基督教的实际状况(the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这就是层出不穷的新兴宗教运动，这些运动的产生来源于如下的这个事实：在多元化的不同社团中，教会的权威多半不能得到贯彻和实施；与此同时，基督教和犹太教开始面对其他世界宗教，在原以为是自家领地的地方与这些世界宗教共处。比如，由于大量伊斯兰教信徒涌至西方国家工作，伊斯兰教因此成为不列颠的第三大宗教派别；从佛教、印度教的各种运动和一些新尝试中，年轻人在生活方面收获不少。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西欧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参与宗教活动，其中不少人还放弃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因此，欧洲如今的信仰图景呈现出一种更为不稳和多变的状态。这些地方的事态迥然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方。

对现代欧洲的反思

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的基督教，从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地延续到现代，并且以如此这般的形式一直拥有着官方宗教的地位。然而，对于如今的欧洲人来说，宗教信仰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一件出于自愿的事情。因此，宗教有了一种新的弱点和一种新的生机。新的弱点是，按照统计数字，各个教派似乎都衰落了；新的生机就是，出于自愿的宗教比出于顺从的宗教来得更为强烈和持久。

此外，我们注意到，二战以后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等不同的经济竞争者产生了，西欧由此成为了一个消费主义的整体。选择的机会难得如此丰富。对于宗教来说，相似的情况已现端倪：当不同文化交叉和融合时，随着各式各样元素的加入，一种宗教上的消费主义开始形成。尽管贫困依旧，但是更多的贫困出现于西方的边缘和角落。于是，日益把目光转向地球村的基督教开始履行其为穷人服务的职责。 364

尽管新的教派和宗教运动层出不穷，但令人奇怪和振奋的是，主流基督教的不同支流开始汇合。新教的不同宗派之间，自从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以来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在仪式方面的差异大大地缓和了。他们在教义方面也没有严重的分歧。也许，只是在神话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一些跨宗派的保守主义者或多或少地以字面意义理解《圣经》；另一些人则是自由派的基督徒，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理解《圣经》。当然，在伦理方面也存在差异，比如，多少有些边缘性的堕胎问题。在这个普世教会运动的时代，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约翰·保罗二世、特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图图大主教（Bishop Tutu）和罗伯特·伦齐（Robert Runcie，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虽然来自迥乎不同的历史，但他们都获得了基督徒的广泛认可。不过，基督教的中心已从欧洲移向南方，移至非洲、拉丁美洲和（一般而言）所谓的第三世界。毫无疑问，欧洲将极易接受更多新的影响。

第十五章　北　　美

一种新的多元主义

365 基督教和犹太教在北美，尤其是在美国，经历了一些新环境，也首创了一些新形式。比如，美国宪法中规定的教会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则在当时就是一种新生事物，至少在欧洲国家中基本上是没有先例的。又比如，现代基督教最有朝气的复兴运动也发生在北美。北美还是一些宗教的诞生地，比如像摩门教和基督教科学教派。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在新世界不得不展现一种相当不同的特色。也正是在美国，现代形式的犹太教得到了广泛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了创新。除此以外，土著美国人的命运也不容忽视。在欧洲传来的疾病和子弹的袭击下，他们的人口锐减，文化受到极大摧残，结果他们发展了各种新宗教来应对这些灾难。

北美对于现代宗教的历史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展示了庞大的移民以及一个文化熔炉是怎样影响传统的。美国宗教的所有这些方面使北美文化更加生机勃勃。移民们通常要比留在家乡的时候更加忠于他们的信仰。这种情况使得美国人有时候更加不能理解在欧洲某些地区，尤其是在北欧发生的宗教的世俗化程度。

到了20世纪，主要是自60年代后期以后，北美人在生活中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那时，选择的机会大为增加，某些东方的宗教也被融入了西方的生活模式。北美也藉着黑人宗教的朝气而更加生机勃勃。在这方面，它还吸收了某些伊斯兰教的因素，以及有着强烈感
366 情色彩的新教福音运动。此外，还有移民运动，尤其是来自远东的移民。他们给北美，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带来了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后来还有韩国和越南的佛教（以及其他一些随之而来的宗教形式，比如道教和儒教）。

我们需要考察一些不同的阶段。首先是从殖民地阶段到美国独

立;然后是美国宗教的起始阶段直至19世纪中叶;然后是汹涌而来的移民阶段,边疆开拓,以及内战;然后就是20世纪。加拿大虽然没有奴隶制,但其基本环境与美国很相似,所以上述阶段划分的方法对它大致也能适用。

殖民地的宗教事务

在北美定居点,英国统治着东部沿海地区。1664年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落入英国人之手并改名为纽约之后,情况尤其如此。在南部几个殖民地,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卡罗莱纳,那里的定居者主要是英国国教会信徒;而北方的殖民地,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宾夕法尼亚以及西新泽西,那里的定居者则主要是不信奉国教者。

1620年,"五月花号"(Mayflower)船抵达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岩。它在驶抵北美目的地的远航船只中是最著名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为到达者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使他们逃脱英国的宗教迫害和不利社会环境,也为他们的新宗教热情提供了一个核心场所,让他们建立一座"山城"(City Upon a Hill),即一个新锡安。新英格兰的清教徒(Puritans)并没有顺其自然地把宗教宽容的权利授予他们的成员:这些殖民地本质上是自治的,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因循守旧的态度。他们建立了新的神权统治。然而,很快就出现了一些令人注目的特殊情况。

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罗得岛殖民地。这个殖民地主要是由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 1603—1683)建立的。他在信仰上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但是他不遗余力地倡导教会与国家相分离。他加入了浸礼会,因为这个教会最符合他对一个基督教组织的期望。他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浸会教堂。他最终使得这个新殖民地有了一部永久宪章,他自己也在那里做了三年的总督,确保了那里的宗教自由。回顾历史,他可以被视为教会与国家相分离的伟大先驱,也是1791年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倡导者。该修正案说:"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条款,以确立一种宗教或

者禁止自由信奉宗教。"

西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殖民地也采纳了宗教宽容政策。《英国宽容法案》(English Act of Toleration Act)的通过是在所谓的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在促成该法的通过中起了领导作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在伦理方面强制实行了一些规定和限制,比如像反对修建堡垒以及储备武器,因为贵格会信徒是和平主义者。此外,他们还规定奴隶制为非法。而特拉华的印第安人则很偶然地被赋予了全部权利。因此,宗教的分歧有着重要的政治含义。这是从乔治·弗克斯(George Fox,1624—
367 1691)那里发展而来的思想。他创建了公谊会,俗称震颤者(Quakers)。这个运动把内在的经历以及那种"照亮每个人的光"视为真正宗教的渊源,把良知视为真正道德的渊源。他们把崇拜简化为一种聚会。信徒们参加聚会时,都要在牧师讲道或领做礼拜之前等待灵感的到来。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给每个人以同等的尊严。正是对每个人心中基督的认同把他们带上了这种美好的平等主义道路。而且这种平等的地位也自然地被赋予了奴隶和土著美国人。他们成为美国清教徒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是他们只是在最早期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才发挥一种主要作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就他们的人数而言,他们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他们仍然只是相对次要的群体。贵格会信徒和罗杰·威廉斯都证明了与印第安人建立友谊的重要意义。这与其他的白人——土著美国人关系是完全相反的。

许多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组织上都属于公理会。有些人把公理会信徒看成是从集权体制中解放出来的加尔文信徒。正如其名称所意味的,他们通过独立的会众来实行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反对更加集权的复杂的长老会制度(长老会制度在南部,也就是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更加强大)。他们在思想上通常信奉千禧年主义。他们在新英格兰关于一种纯洁信仰的理想中看到了一项特殊使命。
368 因此,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就为教会和国家的融合进行辩护,因为他看到在新英格兰,社会也是一个需要忏悔的角色。科顿·马瑟是哈佛学院的著名学子,也是波士顿一个著名的牧师。他在这方面追随了其父亲因克里斯(Increase, 1629—1723)——

太棒了，这些清教徒的名字真让人叫绝！——认为新英格兰是最终完成宗教改革的地方。科顿·马瑟认为耶稣将会在他的有生之年第二次来临，而且就在新英格兰。如此闪光的期望以及对美洲殖民地特殊使命的感受，将会被融入美利坚共和国的乐观主义以及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意识中。



叙事层面：清教徒移民到新英格兰已经成为美国历史的重要章节。这幅清教徒图画是解释一首民谣，他们在庆祝"独立号"驶往新英格兰。这是一次从迫害（如图左所示）到新生活（如图右所示）的旅行。

公理会信徒自始就很注重教育。他们在 1636 年建立了哈佛学院，稍后又建立了耶鲁学院和其他一些学院。这样，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就超过了英国。因为直至 19 世纪初，英国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但是，尽管学问和知识对于美洲殖民地的宗教很重要，心灵的重要性也毫不逊色。

18 世纪的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振兴。这是一连串影响和激励美国人的虔诚的运动中的第一场。这场运动在 1734 年肇始于马萨诸塞北安普敦市（Northampton）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的教堂里。乔纳森·爱德华兹也许是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这场运动激情洋溢，充满魅力。

英国巡回布道者和复兴运动家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的讲道则把大觉醒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他的讲道在大西洋沿岸南北掀起了澎湃高涨的热情。虽然他是安立甘教会按立的牧师,但这个有着正宗地位的教会却对他侧目而视。无论怎样,他受到了公理会、长老会、归正宗和浸礼宗的热情接待。他大力促成的事业还有让新罕布什尔殖民地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对印第安人开放。

浸礼会信徒从大觉醒运动中获益匪浅,因为这场运动使它的一些教义和实践变得更加贴切中肯。他们的分离主义思想(也就是他
369 们对正统宗教的反对)意义重大,因为他们满怀激情地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存在于信徒们的宗教经验中,而不在于和正统宗教保持一致。他们那种循环布道的模式现在已经变得很普遍了。他们开始取得巨大的进步。在此基础上,随着边境线越过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ies)并深入西部旷野,他们也将变得更有效率。更加复杂的,具有正统地位的教会发现难以应对移动的人口。

不但如此,浸礼宗还对黑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富有热情和魅力,尤其重视皈依经历。到18世纪中叶,南部已经有超过10万的黑人奴隶。浸礼宗也正在成为北美最大的宗派。在倡导成人洗礼方面,他们追随的是再洗礼派(Anabaptist)的原则。

美国新教的另一个重要流派开始成长于美国革命之前以及革命
370 期间,这个流派就是循道宗。这个名称来自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人的生活应当遵循《圣经》所指明的“道路”(method)。这个运动开始于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为复兴英国国教会而写的著作。但是,卫斯理受到了摩拉维亚教派(Moravians)的重大影响。后者主要是一个德国教派,起源于宗教改革之前的捷克改革家约翰·胡斯(John Hus, 1369? —1415)的著作,以及18世纪的敬虔派(Pietism),一种与领导人亲岑道夫(Count Zinzendorf, 1700—1760)有关的热情的敬虔主义。该派信徒对基督的热切情感以及对他的忠诚深深地吸引了卫斯理。循道宗运动受到了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 1708—1788)谱写的著名赞美诗的极大鼓舞,并将在殖民地以后的美国取得巨大的进步。

反教权的共济会纲领、自然神论、对人权的热爱以及对宽容的执着等等，都是起源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它们与清教徒的气质以及情感指向的宗教相融合。所有这些，就其宗教组织的层面而言，都在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中得到了实现。这个条款生动地阐明了美国革命的意义。因此是安立甘宗改革了自身，它不再是一个官方的正统教会，而是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新教圣公会教会。在弗吉尼亚，它失去了人们捐赠给它的财产。许多神职人员离职去了加拿大。

无论怎样，一种有生命力的安立甘宗传统还是保存下来了。第一个美国主教，康涅狄格州的塞缪尔·西伯里（Samuel Seabury，1729—1797）是被苏格兰的主教们按立的。他没有官方的身份。事实上，对他的按立在那时还被认为是对英国国教会的分裂。

北美殖民地的罗马天主教

对于天主教来说，最重要的地区不是在英国殖民地，而是在魁北克。在那里，天主教部分地成了种族身份的象征。这在魁北克于七年战争期间，即于 1759 年陷入英国人之手以后尤其如此。魁北克的陷落对于法国是个灾难。然而，1774 年的《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却给了天主教徒完全的公民权，并允许教会维持它的什一税制度。魁北克省被纳入了加拿大殖民地。

在南部英国殖民地，天主教徒的地位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大体上都居住在马里兰殖民地。但是在 1664 年，占殖民地人口多数的清教徒撤回了《宽容法案》，天主教徒被剥夺了选举权。

美国天主教取得巨大进展是在 19 世纪。因为在那时候，从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来了大量移民，其中就有庞大的天主教人口。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进展。

从美国革命到 19 世纪中期

美国人开始翻越阿勒格尼山脉，把边疆推进到了肯塔基、俄亥俄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在年轻共和国所弥漫的新乐观主义情绪中，第二场大觉醒运动于 18、19 世纪之交爆发了。复兴布道会就在新定居 371

地区的帐篷里举行。迁徙中的农民正在开垦美国的农田，他们很容易受到福音热情的感染。所以，那些最热烈的布道和宗教——浸礼宗、循道宗、公理会——都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就。

与此同时，在新英格兰公理会信徒中存在着一种改信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的倾向。一位论派接管了该地区的许多漂亮教堂。波士顿的威廉·禅宁(W.E.Channing, 1780—1824)对于这种改信一位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在1819年关于一位论基督教的布道概括了许多人已有的思想。他们认为基督虽然有着道德的完美性，但却仍然从属于上帝。这就像古老的阿里乌派思想(参见原书第258页)，它使得基督不再是永恒的，因为基督自己也是被神所造。他反对已经极其成熟的，作为正统基督教特色的三位一体教义。一位论教义在该时期以及该地区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中还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一位论与被称为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运动也有关系。这个运动首先与爱默生(R.W.Emerson, 1803—1882)和梭罗(H.D.Thoreau, 1817—1862)有关。超验主义作为一种观点，强调
372 了神性在大自然中的存在，以及个人需要真实地面对自己并与大自然和平共处。它与道教以及印度教的某些方面有关。这些观点对爱默生产生了一定影响。超验主义激起了人们进行比较宗教研究的兴趣，也是促成著名的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 in Chicago)的几个因素之一。它也影响了基督教科学派。

正是在19世纪的头二十五年，来自上纽约州的先知约瑟夫·史密斯二世(Joseph Smith II, 1805—1844)缔造了美国最早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受到异象经历的激励，以及他所谓的一个天使的指点，史密斯在库莫罗(Cumorah)山坡上发现了几块金板并将其翻译为《摩门经》。书中讲述的故事涉及哥伦布之前的某些北美人，有些是土著美洲人的祖先。而这些土著美洲人又是从失踪的以色列部落迁徙而来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the Latter-Day Saints)成立于1830年(其全名则始自1838年)。这场新运动波澜壮阔。史密斯和他的追随者迁移到了俄亥俄州的科特兰(Kirt-

land)，然后再进一步西迁。他们最终在伊利诺斯的诺伍(Nauvoo)建立了一个美丽城市以及一座教堂。1844 年，约瑟夫·史密斯和他的兄弟希拉姆(Hiram)就在离那儿不远的迦太基(Carthage)遭到谋杀。他们的新神权统治正变得极为强大。有些教义和实际做法(包括一夫多妻制)引起了局外人的指责甚至愤怒。杨伯翰(Brigham Young，1801—1877)把大部分摩门教徒(人们给他们起的诨号)带到了犹他州的盐湖城(Salt Lake City)。他开始在那里建立一个帝国：犹他之国(the State of Deseret)。但是，国会的不安和压力最终导致犹他州被并入美国。神权政体和多妻制也被抛弃。许多皈依者，尤其是来自英国的皈依者经受了前往犹他州的艰辛考验。摩门教的凝聚力、纯洁性以及家庭价值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一些教义——比如像上帝是物质的，存在许多神，人也能成为神——都被修改了。今天的摩门教在许多方面都像一个新教福音教派，只不过是神奇地增加了一部《摩门经》，还有对慈祥而又威严的约瑟夫·史密斯的迷恋和回忆。

大规模移民的影响

19 世纪后半叶，移民定居和社会工业化的速度加快了。这种变化把大量的移民吸纳到了美国。其中许多是天主教徒或者犹太教徒。对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习俗而言，他们都是外来的。人们都用有点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些群体对新世界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

天主教徒的问题是两个如何包容的问题。一方面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群体怎样才能在一个教会中共同生活？这些来自爱尔兰、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德国以及墨西哥的天主教徒需要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天主教将如何融入美国的生活方式？对这两个问题 373
的解决方法就是教育。天主教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建立了一个由教区学校，天主教学院和大学组成的体系。他们使教徒们无需丧失其宗教传统就可以转入美国生活。天主教教育事业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向其他人表明天主教并没有违背美国传统。通过在像美式

足球等体育活动和文化生活中的杰出表现以及在政治领域中的发挥相称的作用,天主教徒能够证明他们具备纯粹的美国特征。天主教会也把它的大部分精力奉献给了社会事务、建筑(风格粗犷而又装饰华丽)和教育诸方面。天主教修会有着杰出的表现,许多修会都致力于这些社会和教育工作。

对于新教而言,移民带来了北欧人,尤其是瑞典人,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他们最终组成了路德宗。这个教派在中西部地区尤其盛行,并且在民族文化和新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加拿大的一个类似移民过程带来了许多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新教徒、德国人以及其他人。他们使加拿大的新教有了自己的传统特色,即极其强烈的长老会色彩。

黑人宗教在这个阶段也很兴盛,因为内战确保了黑人将获得解放,过去已经存在的教会现在得到了蓬勃发展。早在1816年就有一个由理查德·艾伦(Richard Ellen,1760—1831)领导的非洲卫理圣公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他还是最早的黑人卫斯理宗教堂的建立者。随着解放的到来,黑人们大量地离开由白人控制的教派,创建了黑人浸礼会等新组织。重建时期还创办了各种重要的黑人学院和大学。但随后就是迫害卷土重来的更黑暗时期。

一个选择就是指望移民返回非洲。得到解放的奴隶们被安置在利比里亚(Liberia)。它在1847年获得了独立。非洲成为美国黑人的象征。卫斯理宗的特纳大主教(Turner,1834—1915)就说过,黑人需要一个黑色的上帝,黑人只有在非洲才能行使完全的权利。黑人们经受了奴隶制的苦难,他们所从事的重建非洲昔日辉煌的理想并非什么不寻常之事。事实上只有很少的黑人真正地返回了非洲。但是黑人基督教仍然充满活力,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活力甚至更加多了。

非洲裔美国人宗教的发展

在非洲裔美国宗教的发展中,另一个因素就是许多人从南部地区迁移到了北方工业区和中西部地区——像印第安纳、芝加哥、布法罗(Buffalo)、纽约、费城等等。这种现象在内战以后最为明显;在第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也是如此，因为战争需要大量的新劳工。非洲裔美国人的这种迁移在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不公正的最新意识中加入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成分。后来，非洲裔美国基督教与争取 374
正义的斗争完全融为了一体。但同时它也发掘了某些在奴隶制时期就开始形成的特色。

首先是人们开始充分强调经验性宗教的重要性。无论怎样，19和20世纪的美国都非常强调福音运动，鼓励对宗教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表达。被上帝之灵攫住和指导的强烈感觉是非洲裔宗教的有力特征。这种信仰还在出神的喊叫和舞蹈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表达。

这就导致了美籍非洲裔宗教的第二种特征，即其富有特色的礼仪形式：比大多数传统的白人礼仪都更加顺畅，更有表达力。福音赞美诗和布鲁斯（Blues）等非洲裔人特有的音乐形式就是从这些礼仪中诞生的。黑人布道家与众不同的风格也有助于使宗教礼仪充满活力。他们唱颂的赞美诗与会众们的情感相交织。顺便要指出的是，许多有影响的布道家都是妇女。

至于组织机构层面，那也多少受到了迁移的影响。宗教通常都扎根于临街的教堂里。社区很多地方的抗议态度以及对社会底层贫苦民众的同情是日常聚会活动的一部分。牧师们发现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之类的世俗团体相混合是很自然的；而且一般而言，参加政治活动也是如此。

在伦理的层面也能看到类似的个人美德与公共道德的混合。非洲裔美国人不得不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情况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教会必须参与同落后的教育、毒品和道德败坏做斗争；毕竟让人们感到有希望是很重要的。虽然某些领导人想为非洲裔美国人创造一个独立的身份，但是它的代价不应该是把自己与其邻居隔离开来。他们在争取民权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一个闪光的例子。

至于神话层面，美国黑人的故事自然是以被从非洲残暴地运抵一个新地方的悲惨历史为主。小说《根》（*Roots*）依然使人着迷。定居者来到新地方后的美国神话对黑人来说毫无吸引力。他们的天堂，如果真有的话，也是在某个将来，在约旦河（Jordan）之外的某个

地方，是在另一个未来而非此世．一些人希望回到非洲；有些人则希望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人，包括黑人都会得到上帝的正义。

关于教义层面，大部分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神学著作都和社会斗争有关，并且以新形式的《出埃及记》神话为基础。它批判了欧洲和白人神学中认为上帝容忍以往的奴隶制的思想。它也表明了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认同了穷人和被压迫者。当然也有人走地更远：他们把伊斯兰作为拒绝正统基督教信仰的替代品。

最后，在物质层面，一种新的非洲艺术正在流行，其中对耶稣和马利亚的描绘是新颖而有创意的。

土著美国人的宗教运动

白人定居点分布在直至遥远西部的广阔平原上。这对于土著美国人而言是一种无法弥补的伤害。从最早的时候起，土著美国人就对白人感到不快。因此，帕莫基·阿尔冈琴印第安人（Pamunkey Algonquins）早在1622年就起来反对弗吉尼亚詹姆斯敦（Jamestown）的定居者对他们的那些做法。但是他们的起义遭到了失败。随着白人们横跨平原以及美洲野牛的消失，各种新宗教运动也随之而来，以便应对印第安人问题。沃捷沃泊（Wodziwob）的鬼舞宗教预见了很快就会来临的时刻，那时死去的印第安人将会得到超度，白人将会离开，印第安人将会重新开始一种新生活。鬼舞宗教的第二个浪潮在沃沃卡（Wovoka）的领导下，于1889年开始于内华达州。这个运动传遍了整个西部平原，并很不幸地在翁第德尼（Wounded Knee）的大屠杀中达到高潮。当时的土著苏人（Sioux）以为他们的神圣衬衣可以使他们挡住子弹（这是一种殖民地时期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的信仰）。土著美国人被安置在保留地，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中。他们情绪低落，沉湎于饮酒，面对白人的统治感到无能为力。然而，复兴正在来临。20世纪将会重新强调土著美国人的价值。我们将会回来论述这一点。

改革时期的各种形式的犹太教

犹太教和犹太人在美国的命运是光明的。但是要在那个地方解

决现代世界的生存之道也并非没有痛苦。宽容的代价是宗教基本上成了一件私人事务。尽管犹太人可以在大城市生活区聚会，但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他们有时在欧洲和中东所取得的那种相对合法的独立性了。

最早大批涌到美国的移民通常都来自德国。他们已经做好了现代化的准备。等到内战结束，犹太社区已经变得相当富裕。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主张也是适当的。到了 1869 年，一群拉比发布了一个信仰宣言，反对人格化弥赛亚的观念以及任何字面意义上重建锡安的思想。总之，犹太人的期望被除去了神话色彩。几年以后，拉比以撒·怀斯（Isaac Wise，1819—1900）建立了美国希伯来公会联盟（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并通过这个组织在辛辛那提（Cincinnati）建立了希伯来协和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迄今为止，它还是犹太教改革派（Reform Judaism）的首要指导中心。在美国的犹太教中以改革派最为重要：它试图把犹太教展示为一种普遍的宗教；它还努力地建设上帝的王国。这个王国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组织，相反，人类在其中将团结一致并得到圣化（sanctified）。他们改变了崇拜形式，使它变得英国化，也更加纯洁（从改革派的角度来看）。它与新教的准则也更加对应。它的建筑被叫做寺庙（temples），而不是会堂（synagogue）。犹太教改革派在神学上是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而且还把文学和历史的最新学术成果与传统的犹太学问结合起来了。

犹太教改革派形成之时，东欧的新移民汹涌而来。他们中许多 376
是哈西德派（Hasidim），其中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不是德国类型的改革，而是波兰或者乌克兰类型的正统性。犹太教正统派（Orthodox）是对改革派的回应，正统的含义在此也就很明白了。到 1900 年时，新到美国的犹太移民有五十万左右；而在 1900—1914 年之间，又有超过一百万新移民。解决新移民问题的最初尝试，如在 1885 年建立美国犹太教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开始没有成功。但是在经过第二次尝试以后，新的组织形式被证明是更有效的。1901 年，他们重组了犹太教神学会堂（Jewish Theological Synagogue）。所罗门·谢克特（Solomon Schechter，1847—1915）被说

服来担任其领导。但是它的发展方向却是犹太教的第三种力量，即保守派犹太教(Conservative Judaism)。它融合了非常自由的学术思想与犹太教实践中的保守观点。

正统派犹太教建立了犹太高等学校(Yeshiva University)来培训拉比和其他人员。他们的大学课程包括了世俗学科，所以相当有适应力。事实上，美国的正统派犹太教倾向于在遵守《妥拉》的同时，也力争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谋取事业的成功。正统派的信仰倾向于保守。他们把《妥拉》看成是上帝在西奈山所启示的律法书，并且与传统的法律或者哈拉卡(halakhah)严格保持一致。对于正统派来说，保守派走得太远，而改革派又抛弃了信仰的实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哈西德派有了更大的影响，而保守派也有了被称为重建主义(Reconstructionism)的变种。

在所有这些发展的同时，还有极其复杂的犹太复国主义。总的来说，正统派和许多保守派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世俗动机是不能被接受的。即使如此，还有一些人是宗教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人后来在以色列国家中变得非常重要。

对于犹太教来说，还有第五个运动——脱离犹太教：也就是犹太人放弃犹太教，在美国社会更加广阔的苦乐和挑战中追求他们的命运。

基督教与社会福音

在考察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通常被称为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的运动。这是新教应对资本主义的后果以及现代城市生活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主要是受到了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 1861—1918)的著作和思想的启发与激励。他在纽约的德国浸礼宗第二教堂(Second German Baptist Church)工作了十多年，因此能够感受到那些城市底层民众艰难度日的痛苦。教会比较容易与小城镇生活相融合，而适应现代大城市的能力则比较差。

更多的新宗教

到了19世纪后半叶，人们继续创建新形式的宗教。三个特别而又重要的宗教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s），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以及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在上面第一和第三个教派中，妇女起着关键作用。基督复临会是由爱伦·怀特（Ellen White, 1826—1915）和她的丈夫詹姆斯（James）建立的。爱伦·怀特在小时候曾经被石块击中头部并昏迷了几个星期。他们对于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 1781—1849）建立的耶稣复临派预言耶稣将于1844年10月22日降临的主张感到失望。后来，爱伦·怀特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告诉她，《圣经》上所说的安息日是在第七天，也就是星期六；并且一个新的审判日期在1844年10月22日开始了。结果她和她的丈夫成了创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核心人物。这个教派后来获得了稳步发展。它还采纳了爱伦·怀特所见异象中的健康方法。在其丈夫死后，爱伦成为该教派的最高领袖。她的神学也越来越强调恩典，结果使得复临派与主流的基督教福音派更加接近。她的生活以及她最初的异像和临终体验，以现代的形式展示了萨满教的主题。 377

耶和华见证会起源于查理·拉塞尔（Charles Taze Russell, 1852—1916）及其富有创造力的继承人约瑟夫·卢瑟福德（Joseph Franklin Rutherford, 1870—1942）的教义。他们给教派取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深信耶和华就是《圣经》中上帝的名字。他们期望着上帝在地球上的奇妙复临，期望他拯救144,000个灵魂，让他们在天堂里参与基督的统治。他们通过基督向耶和华祷告。但是他们主要的活动是出版和布道。他们认为自从1914年之后，撒旦就统治了世界，所以他们不应该参加国家的活动或者战争。为此，他们被指责为奉行和平主义，不服从国家，并因此受到很多迫害。他们禁止祭师之类的工作，拒绝输血，认为这违背了耶和华的律法（《利未记》17章）。他们极其努力地从事传道工作。在西方几乎没有人是他们不曾接触过的。

玛丽·蓓克·艾娣（Mary Bake Eddy, 1821—1900）是新英格兰清

教主义的一个产物,但是她又背离了加尔文宗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ism)。1866年,在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最有决定意义的事。当时她正在阅读基督给人治病的一个故事,她突然从以前严重的事故创伤中令人不可思议地康复了。然后她就开始按照从中得到的启示试着理解世界和《新约》。九年以后,她就写出了《科学与健康以及经文精解》(*Science and Health with Key to the Scriptures*)一书。对她来说,上帝就是一切(God is All)。物质就其自身而言是不真实的;通过接受上帝的恩典或者是上帝的影响,明了意识或者精神的无处不在,我们首先就能消除我们的原罪,然后就能治愈我们的疾病。她的思想里有超验主义的回声。但是当她开始传播这种信
378 仰时,却遇到了正统基督教的极大敌视。她适时地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后来在1892年又把它改组成为波士顿基督教科学派第一堂(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 in Boston)。这个教会在组织上是本教派在世界上所有教会的母教会(mother church)。在此正如在艾伦·怀特那里一样,我们再次遇到了信仰治疗和福音的接合:从许多方面来看,它是一种重新发现了原始基督教的一个主要方面的宗教。1908年,艾娣创办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表明了她对教育的关注与投入。

上述各个教派以及摩门教是美国新宗教的典型。在它们之中就回荡着美国人不同的宗教理想。摩门教感到他们西进到了上帝专门为他们拣选的土地上,感到自己成了上帝意志的工具。他们寻求一种神权政体,但很遗憾是在一个受制于第一修正案的国家。耶和华见证会论证了有关撒旦统治的思想——在美国的心灵中总有一种善恶之间重大战斗的感觉。基督安息日复临会试图算出人类历史终结的日子。基督教科学派则企盼立即就能得到拯救。

福音派与基要派

基要主义的兴起

我们已经指出了自由派新教是怎样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学术上的自由主义及其对教育的积极投入当然不会离美国的状况

太远。然而美国宗教是非常执著于《圣经》的。因此反对自由主义的保守回应首先产生在美国。这就是后来人们知道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其名称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的叫做《基本要点:对真理的证明》(*The Fundamentals: A Testimony to the Truth*)的系列小册子。基要主义攻击现代的或者自由主义的《圣经》观,捍卫"基本的"(fundamental)教义,即所谓《圣经》经文没有差错,基督的无垢出生,代人赎罪(基督之死替人赎了罪),身体的复活,以及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宽泛地说,基要主义还意味着认为《圣经》字句是无误的,或者说"在文句上都是可能的"(因为很明显《圣经》本身就包含着比喻)。更加宽泛地说,这个词还适用于对任何信仰(比如伊斯兰教)的反现代主义的重新陈述。在基督教范围中,它是与福音运动相联系的——也就是相信《圣经》的权威,声称获得拯救必须通过对基督的切身信仰,精神生活的复兴,典型的是通过某些皈依的经历,道德生活的转变,包括《圣经》阅读,礼拜,戒除某些专门的恶习(如吸烟、饮酒以及男女乱交)。基要主义大致属于福音派的一个分支:并非所有的福音派都是基要主义者。但是由于他们都坚持认为《圣经》是权威的,是无差错的,因此很难划清它们的界线。

19世纪时,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中一种更加消极的人性观和命运观成了美国基要主义强调的核心。这种观点认为基督 379
将会在一个战争纷乱的时期后再次降临,来建立千年王国。而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则更为乐观。这种观点认为人类事务正得到改善,我们将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在地球上建立千年王国(millennium)。伟大的复兴运动人士慕迪(Dwight L. Moody, 1837—1899)是前千禧年运动中强有力的人物。大多数基要主义的和福音派的复兴运动都旨在提高个别人,但不是所有人的神圣性。成立于1865年的军事化组织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是英国和美国大城市中从事社会工作最前沿的机构。他们富有同情心,希望能够以自身的榜样来诱导被社会遗弃者改正自己,从而拯救他们。

福音运动是由大大小小的教派和小组组成的,比如像南方浸礼会(Southern Baptists),路德宗密苏里大会(Missouri Synod Lutheranism)以及许多黑人新教教派。因此,对于坚定的基要主义者激烈地强调《圣

经》的无差错性(inerrancy),福音运动有着广泛的同情和理解。

基要主义也受到被称为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的《圣经》解释方法的影响。这种解释方法与慕迪有关,它的相对学术化的表述是斯考菲尔德(C.I.Scofield, 1843—1921)在1909年发表的《斯考菲尔德圣经指南》(Scofield Reference Bible)。根据这种阅读《圣经》的方法,它提到了一系列不同的时代或者天道神意——比如在伊甸园中人类故事开
380 始时的纯洁时期,从摩西到基督的律法的神授(dispensation of the Law),等等。人类历史正在临近它的终点,其标志将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还有将被提升到天堂去面见基督的信徒们的“狂喜”(rapture),一场规模巨大的激烈战争,犹太人改宗基督教,耶稣从耶路撒冷实行治理的千年王国,最后还有末日审判。对于现代基要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

20世纪的福音派

对于美国的许多福音派人士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令人困惑的。人们已经感到美国民主不可或缺的古老的福音派价值观正在遭到淹没。战前天主教(更不用说犹太教)移民已经给美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新英格兰的新教古老堡垒,比如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现在天主教徒在那些大城市里也占了大多数。某些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城镇,尤其是芝加哥,也经历了同样的情景。19世纪20年代时下的社会风气从文化角度看也是很轻浮的,或者说看起来就如此。一种新的多元主义似乎正淹没主流价值观。部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1919年颁布了禁酒令(Prohibition)。结果却产生了地下酒馆和黑手党。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882—1945)在1933年上台之后就废除了禁酒令。但是它有力地表述了美国社会中福音派教会的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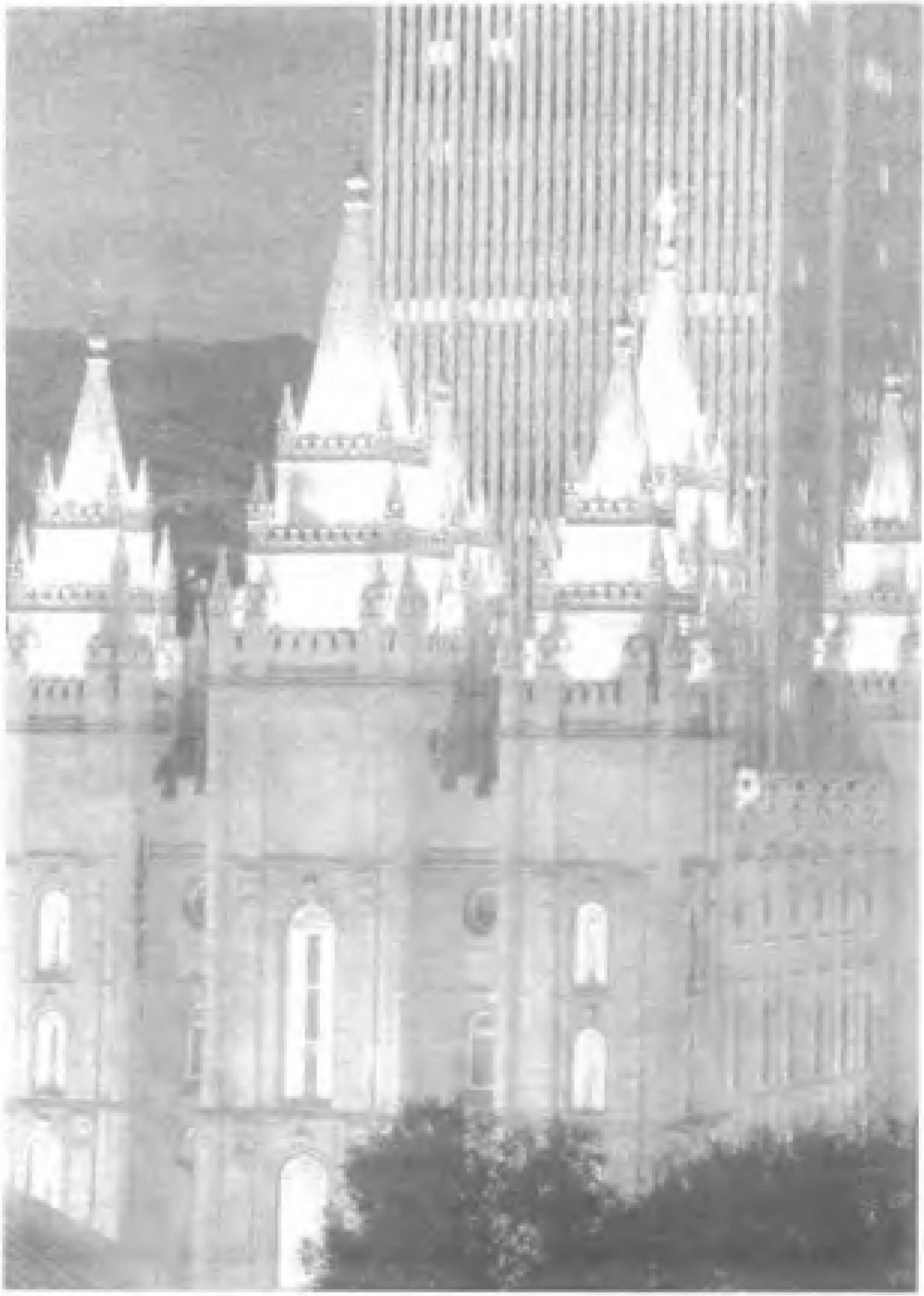
然而,政治家威廉·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0—1925)对科学的挑战却不是那么有效。布赖恩是田纳西州德通城(Dayton)著名的施科普斯(Scopes)诉讼案中的原告。当时有个叫施科普斯的教师教授了进化论。布赖恩的立场招致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嘲笑。审判后不久他就死了。但是直至今日,还是有人不时地对公

立学校中教授生物学和多元主义价值观从法律角度提出挑战。这个问题部分地在于基要主义者独断的认识论(或者叫知识论)。他们不能想象还有什么能合法地取代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或者还有什么能取代《圣经》本身。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基督教与基本上是多元主义的美国宪法以及美国人处世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

基要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退缩到了一个重组时期。但是福音派宗教却保持着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在黑人之中。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出现了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基督教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他生长在亚特兰大,在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和波士顿大学接受教育。他所受的影响来自于沃尔特·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和社会学书籍,来自梭罗(Thoreau)以及甘地的非暴力不服从路线。他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领导了一场公共汽车上的抵制运动。他还以其他方式推动了争取民权的非暴力运动,帮助改善南方黑人



1994年,英国,布里斯托尔(Bristol),妇女们排成方形,等待巴里·罗杰逊(Barry Rogerson)主教为他们祝圣成为英国国教会的牧师。



映照在夕阳余辉中的犹他州盐湖城的摩门教堂。摩门教徒于 19 世纪中叶在他们的领袖杨百翰带领下来到盐湖城并在那里定居。

的境况，尤其是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境况。马丁·路德·金在 1968 年遭到了谋杀。他持有自由主义的福音派立场，有点受到印度传统的影响。

葛培理（Billy Graham），一个极其成功的布道家和十字军战士，383
代表了福音派振兴运动中更加普世性的一翼。他开创了与所有主流基督教会合作的运动。但是电视的到来却创建了最著名的布道形式——电视福音运动．其代表人物有法威尔（Jerry Falwell）、罗伯特（Oral Roberts）以及阿纳海姆水晶教堂（Crystal Cathedral in Anaheim）的舒勒（Robert Schuller）。其中舒勒偏离主流的福音布道已经很远。他强调一种大致是长老会背景的有关积极思维的力量的教义。然而其他人则都有基要主义的背景。他们也是 70 年代复兴了宗教右翼的电视布道的部分源泉。法威尔在 1979 年组织了被称为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运动。福音派正是以这种方式强劲地进入了政治领域。对于福音派的流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也助了一臂之力。他和其他一些福音派人士并不反对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些基要主义法案。道德多数派却认为这个时代是个颓废腐败的时代。古老的美国价值观受到了攻击。此外，还有各种“平等权利”要求，主张削弱妇女传统的家庭角色；同性恋的合法化；堕胎合法化；新宗教运动和崇拜团体；越战（1965—1973）的失败以及水门事件。由于新运动致力于保守的伦理价值观，它就很容易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并且赢得罗马天主教的加盟。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天主教徒还是令人讨厌的人。

福音派和基要派基督教的诸层面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福音派的经历及其基要主义的变种，以便来反思它的诸层面。就其叙述层面而言，重点当然是《圣经》——伊甸园的故事、以色列、基督以及圣灵的降临。出于解释的目的，这种生动的叙述可以被安排为一系列的神意。对于未来的故事还存有分歧。有人认为基督的复临是在那和谐而胜利的伟大时期，即千年王国之前；而有些人则认为是在此之后。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圣经》观以及进化论之类的理论威胁着他们的故事，使他们对启示采取

一种更加坚定的立场。

教义层面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上帝的存在和三位一体论。它也寻求这样一种哲学观点：逐字逐句的《圣经》解释可以与大多数科学观点相协调。进化论的主要观点受到了攻击（通常也并非没有理由），认为它自身就是过分教条的，进化的方式也有解释上的困难（基因组成的偶尔改变以及自然选择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动物进化中的质的飞跃）。福音派基督教的基要主义一翼最近阐发了一种好像是科学的替代理论（也就是使用科学隐语的理论），它被称为创化论（Creationism）。

经验的层面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不但是因为福音派普遍信奉皈
384 依并获得"重生"，就像现在流行的那样；而且还因为福音派基督教中加入了黑人和白人的灵恩运动（Pentecostalism）的特点。这个教派根据早期教会有关五旬节和圣灵降临的阐述，鼓励信徒说方言以及对圣灵的出神感知。比如，1906 年，黑人布道家威廉·西摩（William J. Seymour）就在洛杉矶发起了阿佐萨街复兴运动（Azusa Street revival）。最初，各种各样的灵恩运动受到了主流基督教的拒绝。但是它们逐渐地就被人接受了。其中的某些主题还与信仰治疗相结合，这在 19 世纪 60 年代及其以后的电视宗教中也被采用了。无论如何，白人和黑人福音运动都以某种方式极其强调个人对基督的感知。

至于仪式层面，它们都非常强调个人的祷告。唱赞美诗、朗读《圣经》的布道也许是最主要的礼仪形式。复兴运动者做了大量工作来鼓励创作赞美诗，通常是给它们配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曲调。牧师或者布道家不得不发展他们作为演说家的技能。这就赋予了福音新教一种非常流畅的性质。人们因为甲是比乙更好的布道家而转会。组织一场集会成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的规模的大小标志着福音运动的成败。

至于社会和组织层面，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严格的基要主义者要把他们自己与那些观点软弱的福音派人士，或者是那些同自由派基督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以及犹太人相合作的福音派人士分离开来。因此就有了彼此联系的基要主义会堂的网络。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通过所谓的道德多数派，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合作更加广泛。

福音派防卫森严，拥有像加州帕萨德纳的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Pasadena)之类的著名神学院。

至于伦理层面，福音派人士充分地强调了一种大致可以被称为保守个人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质量反映了个人的生活。他们认为个人应该谦卑、勤奋，在两性关系方面保持忠诚，爱国，守安息日等等。某些基要主义者尤其反感他们认为是放任纵欲的时尚——比如像长发、留胡须，妇女穿休闲裤，等等。他们总体上不赞成自由主义的政治事业；尽管如此，福音派人士都普遍关注社会问题。

最后是物质层面，福音派人士有点像古老的偶像破坏运动传统的继承人。他们并不十分注重宗教的外在方面。但是对于怎样运用最新方法来传播他们的信息，他们是非常关注的。电视布道这种新形式就是如此：它使用了所有的最新技术。比如，1978 年 3 月 11 日的《洛杉矶时报》就报道说，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市(Virginia Beach)的基督教广播系统(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已经获得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卫星通讯机构(RCA Satcom)二号卫星的使用权，并且订购了价值 1200 万美元的地面接收站。较早的时候，灵恩派福音布道家，四方福音教堂(Foursquare Gospel Temples)的建造者艾米·麦克弗逊(Aimee Semple Mcpherson, 1890—1944)就戏剧化地运用了无线电(更不用说大型唱诗班以及剧院技术)。这种技术手段的现代化还体现在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身上。他在南加利福 385
尼亚州成功的布道生涯最初是在停车场进行的(他认为在现代汽车时代，绝大多数教堂都没有足够大的停车场，从而限制了它们的信徒数量)。

在许多方面，福音基督教可以是非传统的，但它同时也声称自己支持它认为可能被自由派分子背弃的古老价值观。它代表了一种方法，来应对由现代《圣经》知识所引起的权威危机。但是由于它代表了一种它认同的具体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并且极其强调切身的体验和礼仪，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

60年代和70年代的宗教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美国人不再有一战以后那种心满意足的感觉。美国人这时感受到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是外在的共产主义。带有琐罗亚斯德宗教色彩的有关善与恶的宇宙大战的神话成了外交政策的基础。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成为发掘异端的内在力量。到了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当政的年代里，美国是一个舒适和协调一致的国家。这是主流的新教自由主义教会和未经改革的罗马天主教的黄金岁月。随后是人们寄予希望的肯尼迪(Kennedy)政府。这个政府本身就预示了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一种新的和谐共处。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美国人最关注支持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并且感觉到了基督教和犹太教利益的真正相互交融。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是新的正统宗教。但这只是一个相对和谐的阶段，注定要遇上天翻地覆的变化。60年代后期目睹了许多年轻人的反叛以及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的诞生。这是一个丰富多彩、成果累累的时代，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烦扰的时代。不吉祥的事件接踵而至：肯尼迪总统(1963)被暗杀以及越南战争(1965)的开始；在天主教方面则有令人鼓舞，但又让人困惑的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1962—1965)。60年代对黑人而言是个有许多新机会的时代。而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到谋杀则让人想起在美国社会依然存在的暴力和偏见。

反叛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些也是针对美国主流宗教的。其中之一是到西方宗教以外去追寻——比如在东方宗教中的复杂巡游。最重要的是这种寻求所关注的是内在意识以及对神秘主义的追寻。这些宗教特征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中当然也存在，但是它们在东正教传统却几乎不为人知。而美国的天主教徒大多是活跃分子，他们在这个时期正忙于消化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提出的改革措施。修士和修女纷纷离开修会，而年轻人则在外国宗教中寻求神秘主义。这真是一种讽刺。某些导师，如艾仑·瓦茨(Alan W. Watts, 1915—

1973)阐发了佛教的禅宗;阿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的著作,如《永久的哲学》(*The Perennial Philosophy*)把神秘主义放到了普世宗教的核心,而《感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则赞扬了致幻药物产生的深层意识。在这些导师的指导下,年轻人开始体会东方宗教的神秘经验。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人员坐在印度里希克什(Rishikesh)玛哈里西·摩赫希·瑜吉(Maharishi Mahesh yogi)[①]的座前;其他人则用麦角酸致幻剂(LSD)和其他物质做实验。整个社会风气都反对新教伦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技术世界。矛盾的是,年轻人有时运用药物技术来克服外部世界的技术。 386

反文化运动自身也有暴力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那些把马克思主义革命作为理想的圈子里。马克思主义能够在麦卡锡之后的美国流行是令人吃惊的。但那些著作,尤其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的著作流行一时。这种革命的情感部分地是由越南战争的不公正和火焰引起的。部分地是在东方宗教的影响之下,和平主义者增加了:嬉皮士被认为是反战的,他们举着鲜花,唱着"要做爱,不要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口号。一种新的激进的反战主义扰乱了主流教会。与这些运动相混合是对环境的关注。还有朝着性解放的大踏步行进以及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人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未婚同居和同性恋的"出世"。所有这些至今都让许多美国人震惊不已,但却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那个时代更永久的后果中,我们还能指出的就是东方宗教在美国土壤中的扎根,尤其是佛教,从西藏佛教到禅宗,从大乘佛教到小乘佛教;印度传统的强劲显现,部分地是通过哈瑞克里希纳(Hare Krishna)运动;所谓崇拜小团体的生存,如文鲜明的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和上帝的儿女(Children of God)运动;瑜伽和其他冥想技术在更多人群中的更广泛的运用;基督教和其他主流宗教团体进一步意识到他们必须更加严肃的面对世界宗教的挑战性的存在。环境保护运动,对素食主义和动物解放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及愈加

① 超觉静坐会(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简称 TM)的发起人。——译注

严重的性放纵。我们将会看到，随着黑人权利(Black Power)运动的诞生，黑人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中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上述许多运动和思想到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都遇到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不利影响。道德多数派就是其征兆。但是上面所列的各种趋势还将存在下去。来自东亚的移民强化了东方文化在白人中的重要性。结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盎格鲁佛教徒(Anglo Buddhists)与各个国家的亚裔人混合在一起。这些亚裔人增强了他们对佛教的理解。所有这些都开启了美国多元主义的广阔范围。而这使得那些想把时钟拨回到更加一元的新教时代的人们难以有所作为。

与此同时，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在黑人、土著美国
387 人、墨西哥裔后代和其他一些人中激起了新的身份模式；也给妇女运动——一个对宗教有某些强烈影响的运动——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妇女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妇女开始令人注目地充当了基督教，某种程度上还有犹太教传统的评判人。一个例证就是玛丽·戴利(Mary Daly)的《超越父神》(*Beyond God the Father*)。这本书使人们注意到基督教传统中一贯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及那种男性首位的假设。《圣经》语言总体来讲是有性别歧视的。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的反思就能明白，性别在上帝身上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述的，只有在那些关于神圣存在物的物质属性的怪异假设中才是例外。而这种假设是所有的宗教都反对的(因为上帝被认为是一个精神的存在物)。上帝并不是像文字所描述的那样在他(或者她)的胸前长着毛发，所以任何有关性别的文字描述都是废话。但是当我们看到性别是一种隐喻时，那么在指称上帝时，除了使用"他"(he)，使用"她"(she)也是很重要的。严格说来，上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即不是两者都是，也不是两者都不是。基督教会中妇女的抗议运动使人注意到大男子主义(male supremacy)，这不但表现在如此之多的宗教语言中，而且更重要，当然也更具体地表现在宗教组织中。男性地位优先主要存在于从东正教到安立甘宗的主教制宗教的教阶体制中。它们也存在于其他一些教派中。妇女在这些方面争取更大权利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

束。作家和《圣经》解释家伊莎白·舒斯勒—菲尔伦查(Elizabeth Schussler-Fiorenza)在她的《纪念她》(*In Memory of Her*,1983)一书中使人们注意到了女性经验在基督教创立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而各个地方的妇女研究这门新学科也给人们认识宗教发展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新视角。类似的评判也出现在犹太教传统之中。一方面妇女运动在自由派新教中最为强劲;同时,它在罗马天主教中也相当有影响。

对宗教的女权主义批判通常都导致了在大多数宗派中妇女作用的强化。一位论教派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他们在1871年就把两名妇女祝圣为神职人员,但在随后的20世纪头十年中却遭遇了大男子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977年,一位论派—普救派教会取消了带性别色彩的教义和语言。在非洲裔美国人中,提供给妇女的神职数量很大。1948年,非洲卫理圣公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也确认妇女可以按立神职。新教的各个教派都相继跟上。英国的安立甘宗直到1995年才允许妇女牧师(尽管该教派在其他地方的教会,如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这已经是普遍的做法)。天主教会内部虽然也有人积极支持妇女权利,但是许多人,尤其是教皇本人对此表示反对,结果就使得妇女无法被按立为神职人员。东正教会在这方面采取了与此类似的保守姿态。在犹太教改革派中,女性拉比自从1972年以后就得到了认可,但是她们有时被安排到较小的 388
会堂,并且只得到较少的报酬。犹太教保守派在自己的社区中朝着妇女平等的方向迈出了步伐,但是犹太教正统派却拒绝这种改革。在西方主要宗教中,总的情况是,妇女的重要性得到了提高,但仍然地位低下。在世界宗教中,佛教也许自始就显示了充分的男女平等,至少在和尚或尼姑这种圣职方面是如此。西方的情况反映了妇女运动,但也并非是它的真实写照。正如性别方面的另一个问题,即同性恋的认可问题那样,人们对此的开明态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黑人的经历:背对基督教

黑人基督教在60年代一直非常有影响,并且取得了许多成就。与此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身份也很有吸引力。这种途径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我们将会看到,黑人伊斯兰教(Black Islam)的

故事非常引人入胜，因为它经历了从非正统到正统的发展过程。总
的来说，美国的黑人与世界上的伊斯兰教并没有多少联系，当然相当
数量的奴隶本来就是穆斯林。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阿赫迈底亚
运动（Ahmadiyah）的传教士从印度来到美国，赢得了一些黑人的皈
依。但是所谓的“伊斯兰国家运动”（Nation of Islam）在随后的 40 年
中就更加重要了。

一个叫华勒士·法德（Fard, Wallace D.）的小贩在 1930 年来到
底特律，开始布道和组织工作。但是他在 1934 年失踪了。他的主要
助手是伊利贾·普勒（Elijah Poole，1897—1975），后改名为伊利贾·穆
389 罕默德（Elijah Muhammad）。他宣布法德就是安拉，而他是法德的使
者。他教训说人类本来就是黑的，但是一个不道德的科学家创造了
一个邪恶的白人种族。安拉允许他们统治 6000 年。此后那个文明
就会崩溃，一个由黑人统治的新世界将会取而代之。他的结论是黑
人应该把自己分离出来。然后他们就应该过上纯洁的生活——不饮
酒，不吸烟，不吸毒，不吃猪肉，不看电影，不用化妆品。

最终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1925—1965）成了这个运动
最主要的发言人。他拒绝了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义道路。然而
他在 1964 年去麦加朝觐后，发现伊利贾·穆罕默德的教诲与真正的
伊斯兰教义实际上并不相符。因此他回来后就与昔日的导师分道扬
镳，建立了非洲裔美国人联合会伊斯兰社会主义组织（Islamic-Social-
ist 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他在 1965 年遭到暗杀。
四年以后，伊利贾·穆罕默德的儿子瑞斯沃迪·穆罕默德（Wraithud-
din Muhammad）接管了他父亲死后遗留下的运动，并且把这个运动
推向了马尔科姆·艾克斯所代表和预告的方向。他成了一个正统派
穆斯林，把穆斯林社会向白人开放，并把该组织的名称改为美国穆斯
390 林布道会（American Muslim Mission）。他鼓励其成员参与政治生活
和社会活动，而不是把自己与美国的主流生活相隔离。不出所料，
“伊斯兰国家运动”的某些人仍然忠于原来的观点。他们接受了路
易·法拉克汗（Louis Farrakhan）的军事化领导。与此同时，来自世界
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社团也定居到了美国，并且有美国黑人加入其
中。比如说，大洛杉矶的穆斯林人口正迅速超过犹太人。很显然，在

实行奴隶制，种族隔离以及种族歧视的岁月里，黑人对基督教的感觉大多是负面的。这也是他们在伊斯兰教中寻求兄弟情感的主要原因。

布莱克·艾尔科

布莱克·艾尔科(1863—1950年)是一个土著美洲人，一个萨满和药师。他对白人在这些方面的知识也有很好的了解。他希望自己所见异象的力量能够传达给民众，因此很喜欢约翰·内哈特(John Neihardt)写的《布莱克·艾尔科对你说》(*Black Elk Speaks*)。他也应该很赞赏约瑟夫·布朗(Joseph Epes Brown)所写的《神圣的魔笛》(*The Sacred Pipe*)，可惜该书是在艾尔科死后出版的。有一位作家认为这些书会成为土著美国人神学的经典作品。布莱克·艾尔科出身于怀俄明州，是拉科他(Lakota，即苏人)民族的一分子。他在九岁时就有了关于人称雷神(Thunder Being)的神圣力量的异象。这是说明其萨满力量的一系列异象中的第一次。他的民族在学会了骑马以后就在捕猎中来到了黑山(Black Hills)的西边；但是后来被迫住进了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的印第安人居留地。1877年，他在一次异象中看到了“马舞”(Horse Dance)的实质并被说服在1881年重跳这种舞蹈。他追求一种更广阔的景象，希望看到拉科他人的团结并在圣环中重新培植出鲜花盛开的圣树。他参加了“布法罗·比尔的西部旷野”的表演活动。部分原因是他希望能对白人有更多的了解并有助于振兴自己的民族。他旅行到了东海岸，后来又到了伦敦(在那里他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当他回到美国时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他目睹了1890年翁第德尼战役所带来的鬼舞运动的戏剧性的悲惨结局(顺便说一下，他也参加了卡斯特誓死抵抗战役[Custer's Last Stand])。结果他重操旧业，做了药师和萨满。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拉科他异象与其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但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一个和谐团聚的民族，与大自然和平共处，这个梦想对于60年代泛印第安人运动的复兴是至关重要的。失败之中可以重新燃起希望。

美国土著宗教的复兴

20世纪还见证了土著美国人在争取人们承认其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成功还促进了一种泛印第安人(pan-Indian)思想。首先是跨文化和跨国界行为与思想的传播。其中著名的是威廉斯仙人球崇拜团体(peyote cult)。在他们的宗教礼仪中,主要的特点就是象征性地使用一种威廉斯仙人球(peyote)。墨西哥人在本世纪之前就已经使用这种仙人掌。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教派得以发展壮大,并在西部大平原(Great Plains)上广为传播。这种仪式大致是在土著美国人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的名义下举行的。这个组织经过艰苦的斗争才使自己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传教活动的歧视与他们使用致幻药物的事实两者一起给他们的道路设置了特别的障碍)。核心的礼仪,包括庆祝生日、葬礼、祷告聚会等等,都是在一个叫帖皮(tipi)的地方举行的。整个过程根据一个相当复杂的程序举行,其高潮是在威廉斯仙人球的影响下唱歌,并从中感受与上帝的接近(在此人们经常借用基督教术语,认为他们所接近的神是圣母马利亚或者诸如此类的神灵;该传统的有些信徒在仪式中使用《圣经》,所以它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是一个基督教运动,但是有着坚实的土著美国人之基础)。所有这些给人的感觉即使不是泛印第安人的,至少也是跨印第安人(cross-Indian)的团结一致。

在土著美国人的团结这个方面,更进一步的作为就是综合运用传统礼仪,以便增进健康和福利。这些传统礼仪包括从使用威廉斯仙人球到采用蒸汽浴净礼(Sweat Lodge),从太阳舞到鬼魂舞。在重新获得神圣地位的斗争中,这种松散的泛印第安宗教性正迅速成为一个首要支柱。在这方面,活跃的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 Indian Movement)是一枝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中,土著美国人的宗教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宗教学(Religious Studies)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后果,而宗教学的这种发展则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思想潮流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印第安人土著宗教的这种复兴与墨西哥裔美国人争取权利和尊严的斗争

有密切联系，因为他们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古代传统宗教也有某种类似的关注。

美国的东方基督教

在新教和天主教会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东正教会是一个人数很 391
少的群体。尽管如此，通过来自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俄罗斯等国家，以及阿拉伯基督教黎凡特地区（Arab Christian Levant）的移民，东正教会一直在美国存在着。美国的希腊教会依附于希腊东正教的普世牧首（Ecumenical Patriarch）。而按民族组织起来的其他东正教会基本上都加入了所谓的美国东正教会（Orthodox Church in America）。这个教会是在 1970 年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独立的俄罗斯教会（Russia Church），被称为俄罗斯之外的东正教会（Orthodox Church Outside Russia）。阿拉伯东正教会（Arab Orthodox Christians）服从安提阿大主教（the Patriarchate of Antioch）的领导。在东正教会中，英语取代了各种方言。这促使它们转而趋于合作和团结。在整个美国的宗教生活中，东正教虽然其信徒人数不多，但却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 世纪的基督教自由主义神学

在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某些复杂发展中，主流的新教思想本质上一直是自由主义的——这是从学术方面来说的，从政治方面来说则并不总是如此。在 30 年代以及随后直至 50 年代早期的时期中，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曾短期地在一个教区中为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服务。并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学。这所神学院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一直都是最有生气的新教神学中心。尼布尔在底特律的经历使他关注政治和道德问题。他的立场有点像巴特（Barth）。他经常被称为新正统主义者。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在政治上，人们长期以来都认为他是左翼人物，并且一度还认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认为旧约圣经观强调线性的历史；他对人类原罪以

及人的脆弱有着强烈的感受；他强调上帝的恩典和爱。由此看来，他根本没有任何乌托邦思想；他也远远没有认为人类的社会问题有什么简捷的解决办法。他最著名的著作《不道德社会中的道德的人》(*Moral Man in Immoral Society*, 1932)正隐喻了这种思想。

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是协和神学院的另一个教师，也是新教神学中使人黯然失色的第二个人物。他于1933年被解除了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的一个教职，此后直到1955年他就一直待在协和神学院。他用自己的观点对自然神学进行了一场20世纪的改造。但他所运用的是存在主义的模型(mould of Existentialism)，这种哲学非常重视人对世界的体验。对于蒂里希而言，宗教渗透到了生活的所有方面：它是个人的、本性上的终极关怀。我们必须顺着这种思路来解释宗教的象征符号。例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最终就涉及到人类的有限性(我们对无限的感受也是如此——上帝就被认为是无限的象征)。一个人通过他或者她面对的有限，生活在死亡面前时的切身感受，就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内在含义。蒂里希以象征主义的手法，充满感情地阐述了基督教信仰，把她展示为这样一种形式，使许多人发现基督教信仰是现代的、可信的，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这尤其表现在他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1951—1963)中。在他生命最后的时期里(其中部
392 分是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度过的)，蒂里希开始意识到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对话的绝对重要性。

如果蒂里希是在20世纪60年代走红的话，新怀疑主义的力量会让他显得有点落伍。保罗·布伦(Paul van Buren)和托马斯·阿尔提泽(T.J.J. Altizer)被人称为"上帝之死"(death of God)派神学家。在他们的思想中，世俗主义重新得到了强调，并影响了大部分新教神学。从许多方面来看，哈维·考克斯(Cox, Harvey)的《世俗之城》(*The Secular City*, 1965)都是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但是他的立场后来至少发生了两次重大改变。耶稣之死被认为是否定了超验上帝"外在地存在"(out there)的观念。这些思想家尝试了一种基督教的无神论思想。这就是在一个经验主义和科学的时代里，试图用自由主义方法来保持基督教信仰可信性的最终结果：它抛弃了信仰，来取

悦情感和行为。

神学的这个阶段没有，也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洪流，即罗曼蒂克，轻信浮躁，多元主义以及虔诚严谨的洪流横扫了整个国家。这个洪流还迅速蔓延到了加拿大。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对越南战争的一种抵制，而大量的美国年轻人为躲避征兵已经迁移到了加拿大。尽管瑜伽和东方精神经常被融合进基督教，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信仰中，这种发展最初并没有影响基督教神学。但是，马丁·路德·金的工作，以及许多基督教徒的反战斗争，包括天主教的丹尼尔·贝林格(Daniel Berrigan)和新教的威廉·考奋(William Sloane Coffin)，都复兴了基督教的和平主义。

到了70年代，妇女运动以及其他不断增长的兴趣激起了对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的一种新观点。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民族神学(minority theology)——比如像黑人神学和印第安人神学(Black and Red)。到70年代末，人们对来自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表示了更大的兴趣和关注。解放神学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的基本思想(还加上一些新教的思想)。我们在第二十四章研究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情况时还要回到解放神学。

这个时期中最有影响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许是耶稣会的卡尔·拉纳(Karl Rahner, 1904—1984)。他的思想有点像蒂里希，融合了传统思想和存在主义思想。在美国广受欢迎的还有杜宾根(Tübingen)的持不同见解者，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斯(Hans Küng)。他对教皇教义的责疑以及以现代形式来解释传统的做法赢得了广泛的赞扬。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以后，美国天主教会在其风格和思想实质上与新教越来越接近。因此，尽管自由主义神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可能就已经到达了最稳健状态，现在的美国依然存在着一个广泛的，仍然保持活力的相对自由主义的神学支脉。

某些世俗的力量

与此同时，美国宗教的背景是多元主义的。对于身在其中的许多人来说，能够满足其精神需要的既不是传统宗教，甚至也不是新宗教运动。有的是人道主义者，其他人则在一些以冥想技术为基础的

393 新治疗时尚中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比如像艾尔哈德研讨培训会(*est*，Erhard Seminars Training，他们在拼写"est"时就不用一个大写字母)。还有一些则是关注人的潜力的运动。这些运动与较早时期体制化了的精神健康运动，如弗洛伊德的、荣格的以及其他种类的心理治疗法相并存。总的来说，像马克思主义之类通常起着宗教作用的有组织的政治思想，在美国是无足轻重的。当马克思主义有时与其他世界观，如解放神学和黑人权利(Black Power)运动相融合时，才有例外的情况。

近现代的犹太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时期，犹太教保守派和正统派运动得到了加强。保守派凭借的是卡普兰(Mordecai Kaplan，1881—1983)的思想，他于1935年发起了重建运动；正统派是依靠那些抵达美国的欧洲传统的重要教师。卡普兰强调了犹太人的整体概念以及他们那些必须得到保存和调整的延绵不断的宗教文化。他对有关启示的正统思想失去了信仰。这导致他强调犹太人生活的积极特性，认为这是对神圣性的回应；但是他抛弃了对一个神人同形同性(anthropomorphic)的上帝的信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寻求抵消外邦文化(Gentile culture)在侵蚀犹太生活方面的影响，所采取的途径是建立强大的文化组织，让犹太人可以在其中感受其传统。他对祷告书的修订引发了1945年纽约市正统派教徒的游行示威，期间还焚烧了他的一些修订本。

重要的是哈西德派力量的增强。自1941年开始，罗巴维齐(Lubavitch)的哈西德派教徒(他们来自白俄罗斯的罗巴维齐，他们的聚居地。他们更准确的称呼是哈巴德·哈西德派信徒[Habad Hasidim])开始定居纽约。他们的领袖是希涅苏(Schneersoohn)家族的一个成员。这个家族在苏维埃早期的头人(*rebe*)或者领导人约瑟夫·希涅苏(Schneersoohn，Joseph Issac，1880—1950)为犹太人宗教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直至1927年他被驱逐为止。20世纪60年代以后，哈西德派吸引了大量先前没有宗教信仰的年青犹太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在一个宗教面貌变化万千的时代里(尤其是在许多年

青犹太人于70年代参加了新宗教运动，选择了佛教等的情况下），哈西德派毫不妥协的正统性对于犹太人身份的形成是有吸引力的。美国其他的哈西德派还有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各种各样的沙特麻(Satmar)。其中的一个领导人是优厄·泰特巴（Yo'el Teitebaum，1888—1982）。他坚持认为犹太人遭受的恐怖大屠杀是上帝对犹太



犹太教正统派为1948年5月14日成立的以色列国而祷告。以色列国家宣布成立后二十分钟，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予以承认。

人的惩罚，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变得世俗了，并且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这是正统派犹太教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极端例子。

二战以后，犹太教得到强劲发展的其他途径与它和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国的各种关系有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虔诚的犹太人是反对这样一个国家的。但另一方面，对以色列的忠诚却能够吸引世俗的犹太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以及某些正统派一起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在纳粹大屠杀之后，对建立以色列国家的支持给了犹太人一种更加强烈的团结一致的感觉。事实上，纳粹在屠杀犹太人时对他们也是不作任何区分的。

394 结果犹太教获得了复兴，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70年代时又有了一种新运动：宗教上极其虔诚的犹太人组成了称为哈弗洛特(havurot)的研究和崇拜团体。更多的犹太人重新皈依了犹太教信仰。这在精神上有点像"重生"(born again)派基督徒。保守派人士在妇女担任圣职问题上产生的分裂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尽管参加礼拜的总人数，尤其是在正统派犹太人中，有了下降，但是到了80年代，犹太教总的来说已经变得生气勃勃。而所谓礼拜总人数的下降部分地是由于法律上对婚姻的要求；因为在整个现代历史中，犹太人
395 与外邦人的跨种族婚姻是普遍存在的。而这种婚姻对一位论派那类的团体比对犹太人社会更加有利。

对美国宗教的反思

从上述情况中产生了几种模式。首先，自由主义、工业化、资本主义、多元民主、现代科学技术，所有这些都诞生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事实上，它们部分地是在基督教，尤其是新教本身的激励下产生的。但是基督教仍然必须应付它们，好像它们是外在力量一样。这里的问题是：一个人对于他所钟爱的传统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各种教派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面临了革命的压力？

其次，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教精神固然有利于民主，但它最终也面临着两难处境：多元主义与信奉上帝、有明确的使命以及良好社会风气的公民宗教是相互冲突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增

强了美国社会中的道德和宗教的多元主义。在变化缓慢，有着喜爱国教倾向的加拿大，这种矛盾就不那么明显。但是美国宪法把多元主义融入其中，而这种多元主义与维持传统新教的主导地位并不协调，至少在思想上是这样。

第三，主流新教教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方面试图综合自由主义和科学，另一方面又试图综合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信仰。基要主义运动对这种调和的反对是真刀真枪，毫不妥协的。事实上，它们在某些方面比综合而成的主流教会更加革命，更加激进。主流教会调整了教义，重述了神话，但是对礼仪和组织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复兴派基督教愈来愈重视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他们常常直接在大型超市举行布道会，并且还运用最新的技术手段。他们注重个人宗教经验，经常批评主流教会和教派。基要主义者不是把信仰的基础根植于大多数基督徒认为是上帝启示的《圣经》，而是把信仰的基础本身当成了一个信条。耶稣和《圣经》两者都必须得到信奉，而对《圣经》的信奉通常应更多一些，对《圣经》的解释也尽量要逐字逐句。他们为此在教义方面付出了代价：你在这么做时是否真的有必要牺牲科学和人文历史呢？这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再说，以信仰为基础，有着权威主义论调的认识论，或者说知识模式，也与多元主义不相协调。因此，基要主义倾向于依托一种公民宗教和爱国主义，这在遭受了越南战争对民族自傲感的创伤性打击之后尤其是如此。

基要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保守的。这在政治上可能是如此。但事实上，他们也把《圣经》放到它的古代背景之外。他们在今天运用《圣经》时就好像它是一份当代报纸。他们可以被称为新基础主义者（neofoundationalist），因为他们认可了基督教的创建基础的时期（它自己对圣经基督教的看法），并把它作为惟一的标准。

与此同时，也是第四点，天主教在发展他们的信仰时也做了一些过度的尝试。这里所指的是他们把自身信仰与现代科技和历史知识相协调，使礼仪更加直接明了等等。罗马天主教几乎改变了它的所有方面，但却保留了组织上的基本特征。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它才成功地进行了这些伟大的尝试。在宗教经验层 396

面，有天主教灵恩派的尝试以及神秘主义传统的复兴；在仪式上，他们已经开始采纳方言。这种做法把不同民族的天主教徒融合成为一体。在伦理层面，他们则存在着分裂：总的说来是道德戒律日益松弛。事实上，大多数美国天主教徒并不理会教皇关于计划生育的通谕。另一方面，反堕胎的情感导致他们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与保守的新教徒结成了联盟。在教义层面也有现代化的新尝试，尤其是在弱化对进化论思想的抵制方面。在神话故事层面，《圣经》已经受到天主教学者全面严格的研究，因为现代主义已经不像在本世纪初那样受到谴责。在组织层面，正如我所说的，它们一直都是稳定的。但是，家庭聚会，其他形式的强化研究和虔诚信仰也并非没有重大意义。

与此同时，黑人基督教也从严寒中得到极大的振兴。妇女权利运动对许多宗教团体都产生了影响。土著美国人正在综合一种泛印第安人的宗教。他们希望以此来应对一个更强大文明的压迫和入侵。

所有这些，以及同样产生着影响的犹太人的类似反应，使得现代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化，方方面面也更加不同。它预示着一个充满融会与尝试，消费主义，宗教追求，以及个人选择的世界情景。这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但自然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困惑不解的时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布道以及传统中的明确性会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美国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是否有可以辨别的模式呢？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像在社会和组织机构都足够强大的天主教传统中，它们无疑就能抵制自由主义，缓和个人主义，举办各种社会计划来应对工业化，并对民族主义做出必要而又不过分的让步。但从长远来看，大多数群体对现代生活都已经具有了强有力的适应性。

第十六章　南亚及其对殖民干涉的反响

印度生活的种种变化

在本章我们所讨论的是，英国人征服南亚次大陆以后的南亚地区的情况（当时的南亚次大陆包括现在的印度共和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英国人对尼泊尔的实际控制和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利益）。欧洲人的征服活动从早期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1756—1763）主要是英国人以其优势的海军力量打败了法国人，这场战争的结果使英国人占领了锡兰（即斯里兰卡，在殖民统治时期它的名称为锡兰。一直到 1972 年更名以前，我们在讨论这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时将用“锡兰”这个名称）和印度（当时印度这个名称包括整个次大陆，因此到 1947 年以前我们一直用这个名称）。从历史上看，迄今为止印度遭受的外族入侵都来自西北方向，因此对她来说，英国人的入侵则是一种新的体验。另外有一点也是新的，因为作为征服者的民族已经经历了各种工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这一点在印度和锡兰必然产生很大的反响。这些古老的文明如何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呢？由于当时印度和锡兰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而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397

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在英国人占领印度之前，伊斯兰教已经处于急剧的衰退中。据说，当时以德里为中心的大莫卧儿帝国的权力，最远只能达到帕拉姆（Palam），即现在的德里飞机场所在地。在 18 世纪的晚期，印度出现了许多政权——控制中印度的马拉特（Maratha）联盟、迈索尔（Mysore）国家、南印度无数的小王国、莫卧儿帝国的残部、旁遮普地区新兴的锡克人，以及许多其他的土邦等等。印度当时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英国人扩展他们的控制范围时，印度人由于在语言、宗教和利益上的差异而完全处于 398

分裂的状态。到1805年,莫卧儿皇帝正式归属于英国征服者政权的控制和保护之下。从加尔各答(Calcutta)向外延伸,大部分恒河流域都在英国人的统治下。随后,东海岸和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也被英国征服了。英国人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锡兰岛,除了此岛中部山区的康提国(Kandy,它在1815年陷落)之外。不管怎么说,英国人所控制的各个地区,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教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其他大部分不发达的地区,流行着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教的信仰与仪礼相结合的形式;在锡兰,佛教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时期,基督教也开始发挥作用。此时期,锡克人也脱离印度教,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实际上则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

锡克教的形成

在论述英国文化与印度传统相互影响之前,追溯一下锡克教的历史,是十分有益的。锡克教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相互碰撞的结果。锡克教徒与莫卧儿统治者的冲突,导致了锡克教这种新型社团的产生,此种新社团是靠表示特殊关系的男子的头巾和其他外部标志以及对古鲁·格兰特(Guru Granth)宗教的忠诚而结合起来的。在这种社团形成以前,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些锡克教最初的发展情况,但是这些情况都属于锡克教的早期。这种新型社团的建立,依靠的是旁遮普地区各种不同种姓的联合,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身为贾特(Jats)的农民与商人的联合,他们成了代表锡克教传统的那种虔信派宗教的最有力的支持者。锡克教的发展过程,就是由通过调和与和平的方式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旨结合起来的伽比尔和那纳克的宗教,向第十代祖师戈宾德·辛格(1660—1708)最后所建立的军事组织逐步转化的。戈宾德·辛格在建立军事组织时的一些行动,使他的信奉者感到有点儿困惑。但是,这是锡克教发展的惟一趋势,其本身似乎没有变化,伽比尔的宗教就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戈宾德·辛格的宗教。据我们所知,正是在戈宾德·辛格的时代,锡克教才真正形成。当然,它所使用的仍然是过去的,属于那纳克时代的那些传统和领导方式。



显示出强大力量的印度教女神——迦利。迦利女神是湿婆大神之妻，也是代表死亡和毁灭力量的女神。

戈宾德·辛格

戈宾德·辛格（Gobind Singh ，1666—1708）是锡克教徒的最后一个古鲁、领袖或导师，他最终完成了锡克教社团的转化。他是勇敢、对神忠诚、富于自信心和武士精神的楷模。他精通梵文、波斯文和旁遮普文，并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戈宾德·辛格九岁时，他的父亲被莫卧儿皇帝处死，但是他本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而成为一位有才干的将军。1686年，他在战场上打败了邻近的拉杰普特氏族（Rajputs），一年后又战胜了统治旁遮普的莫卧儿官员。在战争间隙中，他在自己的首都阿南德普尔（Anandpur）进行休整，这座城市设防坚固，难以攻克。但是，后来他还是不得不被迫撤离这个城市。在向莫卧儿首都进发的路上，他抱怨莫卧儿官员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时突然传来莫卧儿皇帝的死讯。戈宾德决定支持皇子莫阿吉姆（Moazzim），他们一起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后来，他到阿格拉（Agra）拜访了莫卧儿帝国的新皇帝。此后，戈宾德在远征中被人暗杀。但是，在临死前，他宣布自己是最后一位古鲁。从此，经典《阿底·格兰特》就成了锡克人的导师。

1699年，戈宾德改革锡克教社团的行动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事件：在早祈祷之后，他把锡克教徒召集到一座帐篷前。他要求一些人走出来，献出自己的头颅，作为牺牲品。最后有五个人走出来，他把他们带到帐篷的后面。戈宾德再一次出现时，他手里拿着滴着血的宝剑；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宰杀了五只山羊。这五个人由于他们的勇敢和忠诚而从此被人尊敬。

戈宾德最后还编纂了一部经典，他把自己的作品收集到这部《达萨姆·格兰特》（*Dasam Granthi*）中。这部经典在锡克教社团中也受到崇拜。戈宾德被称为锡克教的“第十代皇帝”或“帕德沙”（padshah）。

在戈宾德·辛格的时代之前，锡克社团就已经逐渐向军事组织的

形式转化，但是只有戈宾德的改革，才使锡克教真正变成一种宗教与军事相结合的势力。他是武士精神和忠诚信念的真正代表，也是男性锡克教徒学习的楷模。这种武士品德是把尚武观念与精神的奉献结合在一起。

戈宾德的父亲，第九代祖师得格·巴哈杜尔（Tegh Bahadur）在1675年被莫卧儿皇帝处死，死前他宣布戈宾德为他的继承人。戈宾德在打胜了几场反对拉杰普特氏族印度教徒（Hindu Rajputs）和莫卧儿帝国的战争以后，他在阿那德普尔（Anandpur）建立了自己的首 401
都。1699年4月13日，为了举行一种特殊仪式，他把他的信徒召集到这里。在那一天的早祈祷之后，他叫出五个愿意奉献自己生命的男子，把他们领到一个帐篷的后面，过一会儿他带着滴着鲜血的宝剑回来。他实际上只是杀死了五只山羊，当这五名男子又重新出来时，他们被他指定作为新型社团——卡尔萨（Khalsa，意为“纯洁的社团”）的基本成员。戈宾德让这五个人共同喝一碗水，他把这碗水称为永恒不朽的“甘露”（amrit）或神酒。这种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在新型社团中将打破种姓的壁垒。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辛格”（Singh），即“狮子”。所以，在理论上，每一个锡克教徒男子都叫“辛格”。在实践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具有更复杂的含义。

每一个男性锡克教徒都必须佩戴五种标志，以代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即他们所谓的“五K”。这“五K”是：蓄长发、留大胡子（kais）；带梳子（kangha），以保持头发的整洁；穿短裤（kaccha），后来被战士采用；戴手镯（kara），把手镯作为忠诚于古鲁的象征；佩短剑 402
（kirpan）。锡克教徒还禁止喝酒、抽烟（烟草那时已传到印度）、禁止吃那种以穆斯林方式进行宰杀，即通过流血至死的肉。

戈宾德这种大规模的改革最终宣布，在他死后锡克教徒必须把经典《阿底·格兰特》作为他们的古鲁。《阿底·格兰特》又叫《古鲁·格兰特》，它是正规锡克教庙中或“古鲁房”（Guru House 或 Gurudwara）中最重要的崇拜物。《阿底·格兰特》收集了历代祖师的著作，包括那纳克以及在他以前的各位圣者的著作，如那摩德瓦（Namdev）、伽比尔和拉维达斯（Ravidas）的著作等。它的最后修订本是戈宾德·辛格所编纂的。这种形式的《阿底·格兰特》的最初版本，收藏在旁遮普阿

姆利则市的金庙(Golden Temple)里,这座金庙已经成为锡克教徒的精神中心和朝圣地。

随着北印度各种语言和诗歌风格的巨大变化,《阿底·格兰特》对这个地区的虔信派宗教生活进行了广泛的评述。在社会生活中,它非常强调种姓与家族是不相干的。它谴责种姓之间的差别。它还重视纯洁动机的巨大作用。一个人只通过外部的行动而没有内心的虔诚,是不能赢得神的慈恩的。《阿底·格兰特》强调的是履行真理、行为真诚、保持平衡和证悟最高之神。

正如我们所知,尽管有了这些教导,但是锡克教仍然发挥了它自己外在习俗方面的力量。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保持对这种超越种姓的特殊社团的忠诚与实现普遍的人性之间,锡克教创造出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辩证关系。

403 在兰季特·辛格(Ranjit Singh ,1780—1839)的领导下,锡克教的新型社团最终在旁遮普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权,但是此后不久,他们就被英国人打败,并合并到英属印度中。英国人利用锡克教徒的军事特长和尚武精神,主要把他们安置在英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印度军队里。但是,实际上,也不是所有的锡克教徒都完全归属锡克教这种新社团。除了那些在外表上“不剪发”的锡克教徒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锡克教徒被称为“sahajdharis”,他们一直渴望成为锡克教正式成员的身份。总之,那纳克的传统就是印度教虔信派改革运动的一种形式。所以,只有印度教虔信派的这朵云彩,才产生出锡克教运动的这块阴影。

另外,还有一些与锡克教有联系的运动:一方面是伽比尔的信徒,即追随伽比尔道路的伽比尔派(Kabirpanthis);另一方面,是通过《阿底·格兰特》直接受锡克教影响的罗陀索阿米派(Radhasoamins),此派由银行家希瓦·达耶尔(Shiv Dayal, 1818—1878)在阿格拉(Agra)创立的。希瓦·达耶尔遵循古鲁的传统,强调在神与世界的交往中呼喊“沙布德”(shabd)这个词的声音的重要性。后来,这种信仰形式也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有的强调门徒与导师的结合,有的则强调导师与神的结合。虽然罗陀索阿米派是印度教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更多的是属于与锡克教结合的产物。此派的名字表示的是,由克

里希那大神的妻子罗陀所代表的灵魂与大师(Somai)的结合和统一。锡克教的"卡尔萨"思想一直强烈地保留到现在,事实上在英国统治的后期,"卡尔萨"思想就已经成为旁遮普地区和全印度民族主义的一种有战斗力的混合物。以后,一直到1980年,一些富有战斗性的锡克教徒还积极鼓吹在印度的旁遮普建立一个由锡克教统治的独立国家。 404

锡克教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地说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当一种宗教与另一种宗教相遇时,很可能产生出这两种宗教的一种混合物,在当时环境的影响下这种混合物则是第三种力量,实际上就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锡克教运动就属于这种明显转化的例子。在当时的情况下,锡克教算得上是印度教的一种改革形态,正如伽比尔运动那样;对印度教徒来说,宗教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界限。锡克教学习伊斯兰教,把伊斯兰教的许多成分吸收到自己的肌体中,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当锡克教成为一种政治社团以后,它的作用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总的说来,锡克教徒现在自认为他们的宗教是一种独立的宗教,但是现代也有一种对印度宪法的抱怨,认为宪法并没有从法律等角度承认锡克教的独立地位。

英国人的统治:挑战与反响

英国人的影响

1849年,随着英国人打败了锡克人并占领了信德(Sind),在印度确立英国统治的工程全部完成。1857年印度士兵的叛乱,扩展成了大规模的起义,其原因就是由于包裹步枪子弹的油脂是用牛油和猪油制成的,从而激怒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最早的解放战争,虽然起义是盲目的,也没有明确的思想目标。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858年,东印度公司(原来只是一个纯商业企业)所执行的旧的行政管理制度在印度结束。1871年,英国女王开始作为印度帝国的女皇。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许多小国,还有像在中南印度的海德拉巴(Hyderabad)这样较大的国家仍然保留着,它们是以一种内部拼图的形式存

在于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各个地区之间。这些小国的君主都承认英国女王的权威，但是他们之中有很多是相当落后的，要在英国驻当地的驻扎官的指导下才能进行统治。

但是，英国人的统治体制是统一的，因此它使整个印度都处于同一种体制之下，而且这种体制的兴趣在于如何使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且统一起来。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西方传教士长期被排斥在东印度公司所占据的领土之外，因为公司的商业利益不希望传教士的活动扰乱当地居民。从 1820 年以后，基督教传教活动才开始在英国人的占领区进行。在此之前，古老的天主教传教会在一些像罗伯托·德·诺必里（Roberto de Nobili, 1606—1656 年在印度传教）这样具有高度独创性的传教士的领导下工作，罗伯托·德·诺必里在传播基督教时曾采用婆罗门的方法和印度哲学的概念。此外，这些传教会还进行了许多成功的工作，如在塞兰普尔（Serampore, 此地是丹麦的一块飞地）和其他一些地区建立了学院和传教中心等。

在早期英国人的传教阶段，福音派新教会的基督徒强烈地批评
405 印度教的各种习俗，并促使政府禁止了寡妇殉夫制（suttee）。寡妇殉夫制，是指丈夫死后，寡妇必须坐在火葬的柴堆上随同丈夫一起被烧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对印度传统的攻击以及印度教徒想恢复旧秩序的愿望，所以英国人所谓的“印度人的叛乱”不断发生。但是，在 1858 年以后，出现了大量社会现代化和批评传统的现象，如铁路、高等教育的整个体系、新型的商业、农业的变化、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等等。这些变化促使印度宗教传统发生各种各样的反响。同样的事实，据说也发生在锡兰。

伴随着英国人的统治，出现了各种势力，这些势力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这些势力促进了印度中产阶级的发展，而印度中产阶级正是英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结合点。

第一，以福音派为主的基督教势力。他们确信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经常鼓吹什么现代化将与基督教一起出现。他们还以基督教徒的眼光，广泛地批评了伊斯兰教社会的落后，批判了印度教的偶像崇拜和各种有害的风俗习惯，如童婚、种姓制度和庙妓等等。

第二，英属印度帝国行政官员的那种世俗主义精神逐渐加强。

这些官员深受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功利主义影响的，他们主张道德和法律的理性基础就是把幸福扩展到最大的限度，把痛苦缩小到最小的限度。这些行政官员在社会和行政的改革方面是毫不退缩的。

第三，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资本主义要求修建铁路网(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主要创作)，但是它也破坏了当地的工业，诸如织布行业，而有利于兰开夏(Lancashire)的棉纺厂。但是，正是这种势力伴随着帝国主义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是任何国家都逃避不了的。

第四，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英国人的民族主义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尤其是英国文明是优越的，是天生的、充满自信的。这集中体现在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1800—1859)的态度上，他建议印度人兴办高度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抛掉亚洲思想的愚昧。但是，随着民族主义的扩展，也产生出一种与此对立的印度民族主义。在印度民族主义发展的初期，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印度人开始有了印度作为一个民族的意识。

第五，还产生了一种势力，许多其他的东西都必须通过这种势力来传播和实现。这种势力就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通过教育形成了一批新的讲英语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将是促进变革的动力。在各个地区，如孟买、马德拉斯(Madras)、加尔各答、德里和一些土邦，都建立了学院和大学。传教士们鼓励兴办教育，他们有许多人为此奉献了一生，他们认为基督教通过这种渗透作用将产生出新的杰出人才。

第六，在教育的背后出现了科学的力量和权威。众所周知，新的科学世界观为英国和西方文明的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它还具有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效益。

印度教第一个令人震惊的反响：梵社的建立

孟加拉是东印度公司势力的中心，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印度教内 406
部的第一个思想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首倡者是罗姆·莫罕·罗易

(Ram Mohan Roy ,1772—1833)。罗易曾在恒河岸边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巴特那(Patna)受过教育,后来又从事梵文研究。他极强的语言天赋促使他学习英文,在 1803 年他在东印度公司找到一份工作。1804 年,他出版了一本用波斯文写的书,该书批判了印度教传统中的多神论。在这本书中,他把对伊斯兰教的解释与他对 18 世纪理性主义的兴趣结合起来。他还把五种主要的奥义书翻译成英文,试图说明印度教传统的真正核心是惟一最高实在——梵。1820 年,罗易又出版了一本题为《耶稣的教诲》(*The Precepts of Jesus*)的书,此书论述了耶稣给人们的教导是一种生机勃勃的遵守道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应被基督教徒强加给这种原初教导的那些神话和原则所遮盖起来。概括地说,罗易阐述了印度教的神体一位论、对惟一至高之神的崇拜、反对印度教的众多偶像、反对婆罗门祭司所推崇的繁琐祭祀仪式等。

罗易创立了梵社(Brahmo Samaj),或称"神圣学会"(Divine Society)。梵社的其他领导人,如德宾得拉那特·泰戈尔(Debendrananth Tagore, 1817—1905)和凯沙布·钱德拉·森(Keshab Chandra Sen, 1834—1884)继续推进梵社的社会改革主张,这些主张代表印度教的发展前途。在社会改革的鼓动中,罗易是很有影响的,他的宣传导致了 1829 年对寡妇殉夫制的废除。他虽然也受到在加尔各答的那些宣传神体一位论的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但是他渴望表达的是他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印度教徒的基本世界观。他对奥义书进行了神体一位论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他创立了这种世界观。1833 年,在访问英国时,他因生病而死于布里斯托尔港(Bristol)。

罗易的改革运动,在倡导印度教新观点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代表了印度教徒中积极向上的、渴望变革的种姓阶层的观点。这些人不是那些只关心仪礼纯洁性的婆罗门上层人士,而是婆罗门的下层、商人、地主和其他一些通过英国人取代穆斯林的势力和文化而获得利益的人。但是,梵社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它在信仰上的"理性主义"和纯净性而切断了与印度教大众的联系。

在罗姆·莫罕·罗易那里,更重要的是,他建议各种普遍的传统(如穆斯林的、印度教的和基督教的传统)实现超然的统一。这种不

同宗教的统一观念，将最终成为促进现代印度教意识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对在上一节所提到的各种社会势力而言，梵社的世界观都是非常适应的。它可以适应福音派的基督教，因为他们主张纯净并且忠于耶稣最原初的教诲(当然，这种对基督教的“简化”解释大大地激怒了在加尔各答的传教士)。它也适应当时的社会改革和新的经济发展。它还适合新的英语教育。但是，梵社没有能发展正在出现的民族主义；对于印度人来说，最初的民族主义就是把自己看成一个统一体。然而，梵社依靠的正是具有自己民族感情的孟加拉人。

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与印度教原教旨主义

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Dayananda Sarasvati，1824—1883)，是雅利安社(Aray Samaj，又称“圣社”)的创始人。他是一位受到梵社影响的古吉拉特地区的古鲁，他所开创的改革运动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的改革思想主张回归到比奥义书还要早的吠陀赞歌那里去。 407

达耶难陀出生于西印度的卡提阿瓦(Kathiawar)，他很早就离家出走，成为四处漫游的遁世者。1847年，他按规定正式步入游方僧的生活模式。有一段时间，他曾在北印度的马图拉(Mathura)向著名的古文法学家学习梵文。这位博学的老师主张，只有古代先知们的著作才是真正的圣书，而后来印度教的那些哲学和理论都是虚伪的，是带有狭隘宗派思想的。达耶难陀一开始就反对印度教的偶像崇拜，但是直到他访问了梵社以后，他才认识到用现代方式宣传他的思想的重要性。用梵文进行辩论并不是惟一的宣传方式。

1875年，达耶难陀创立了雅利安社。两年以后，当他得到广大商人和那些想阻止基督教对印度教传统进行攻击的人的支持时，他倡导的运动才开展起来。在对待印度教传统方面，他的思想是很激进的，包括放弃婆罗门的权利等。达耶难陀主张，真正的圣典就是吠陀赞歌，而后来的衍生物，如梵书、奥义书都应该抛弃。在吠陀中可以找到现代科学的胚胎(如原子论这样的科学)，吠陀的主要教导属于纯粹的一神论。

雅利安社崇拜惟一的至高之神，他们的宗教仪式是对一切人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仪式，妇女和贱民也能学习经典。这种激进

的平等主义运动，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感情，但是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然而，雅利安社在海外印度教移民中间，如在南非或斐济，却得到很大的发展。许多印度劳工按照定期的劳务合同移居到那些地方，他们被称为"缔约劳工"，在废除了奴隶身份之后，主要工作在蔗糖种植园里。

因为雅利安社是一个强大的改革运动，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印度教传统的主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广泛的印度教宗教联盟中的一个派别。面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优势，需要某种更强大的东西来调动印度教徒的积极性，改革印度教的生活方式。这种东西必须使人认识到印度教大众的实践是有意义的，同时还能在理论上和民族生活方面提供新的不断发展的观点。一方面，雅利安社极端推崇圣典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激发广大印度教徒去学习知识；另一方面，它对偶像崇拜的反对也是许多印度教徒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印度教徒喜欢他们的神话故事和节日，他们很少反对婆罗门，而更多的是反对外国的影响。

在这里，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对付外来批评和改革的策略
408 问题。你想忠于自己的传统，但是又希望或者必须在传统之内进行某些有效的改革，那么你可以把这种改革建立在过去一些原理的基础之上，例如，你可以回归到你认为是自己传统最初的东西。这种对基础的回归，最好叫做"新基础主义"(neofoundationalism)，而不要叫"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这种回归看起来很保守，而实际上是相当激进的。对于雅利安社的改革来说，实际上要改变每一件事，如印度教的仪礼、道德、神话、社会组织、对物质的关心等。

也许还有其他的改革模式。你可能想在建立某种昌盛过去的名义下否认你们传统中的一些特点，这种昌盛的过去可能比圣书时期要晚。如果它是你们文化的经典时代，那么你可以把这种改革称为"新经典主义"(neoclassicism)。首先要回归到经典的过去，然后再用现代术语对它进行诠释——这就是应付西方挑战的最成功的方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锡兰，都是如此。在这些方式中，都是一方面坚持传统，一方面又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它在现代世界中健壮地生存下去。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保留传统，也要做必要的牺牲。保留得越

多，这种调整似乎就越令人满意。

事实上，虽然雅利安社利用了最新式的传教方式，但是它还是没有充分地与现代科学和教育相协调。当然，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注意到印度的过去及其各种经典。雅利安社的新基础主义，很少求助于那些了解自由主义学术研究的人。因此，它有关吠陀圣诗的立场就不容易坚持下去。况且，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一向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不能很好地理解现代科学方法的本质。他认为印度古代经典中就已经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要旨，这种观点本身就丧失了科学发展的辩证观和批判观。但是，他领导的改革运之所以继续发展，是因为他对下属的各个分支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并且在实践上发扬了民主。

在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反对雅利安社强硬路线的改革因素在发展。这种因素主张，印度各种不同的宗教应当共存。从印度民族主义的前景看，伴随着更大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印度教中也有一些人认识到其他宗教传统存在的意义，这种观点将是重要的、具有吸引力的。

罗摩克里希那、维韦卡南达与现代印度教意识

现代印度教意识是通过罗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1834—1886）一生的努力和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的传教工作而培植起来的，这种意识确实具有光明的前途。维韦卡南达可以说是现代印度教意识的主要代言人。这种现代印度教意识是利用以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商羯罗为代表的古典时代的资料，并通过对商羯罗思想进行现代化的诠释而描绘印度教传统的，看起来它不仅深刻地理解印度教传统，而且也理解其他的宗教。此外，现代印度教意识还很好地理解了印度文化发展的大轮廓，因此它变成了一种表达印度民族主义的形式。况且，这是一种能够对付 409
前面所提到的各种势力的意识形态。它还能帮助人们解决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一些人所主张的暴力革命是否是惟一的发展道路，或者说，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能使印度发展自己的民主形式？当然，暴力的观点受到甘地（Gandhi）的责备，他的伟大的政治盟友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进一步发展了民主的目标。这些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将会在下面给予评述。

罗摩克里希那的圣者身份与维韦卡南达深奥微妙的教导相结合,就使这种新的印度教意识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吸引广大的印度教民众——因为他们非常熟悉罗摩克里希那这位崇拜迦利女神的古鲁,也可以吸引中产阶级——因为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受过英语教育的维韦卡南达可以写出极具感染力的文章。后来,质朴的甘地与世故的尼赫鲁相结合,也使现代印度教的意识具有同样的作用。

罗摩克里希那的原名为竭达陀尔·查特吉(Gadadhar Chatterji),罗摩克里希那是其法名,他出生于孟加拉农村的一个毗湿奴派婆罗门家庭。父亲死后,他来到加尔各答协助他的哥哥工作。其兄主持一座新建的迦利女神庙,在此庙中还供奉着湿婆、罗陀和克里希那等大神,实际上这座庙包容了孟加拉人和印度虔信派信仰的各个组成部分。他哥哥死后,罗摩克里希那成了这座迦利——母亲女神庙的祭司,并且潜心修炼与女神相结合的最高境界。他认为自己已达到与迦利女神结合的狂喜状态,但是当一位精通密法而四处漫游的女苦行者来到此庙后,她引导他真正通过了密教的长期修炼过程,这个过程使他的虔信达到适当的程度,并使他的喜悦体验变成一种更加欢喜,更容易驾驭的形式。后来,有一位吠檀多不二论的苦行僧,名
410 为多塔布利(Totapuri),来到这里后,罗摩克里希那又开始跟随他修炼不二论的禅静瑜伽,并且达到了最高的解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甚至连作为人格实体的母亲女神也都消失了。此外,罗摩克里希那还通过修炼证悟到安拉、基督等大神,他宣称他用这些方式所证悟到神的强烈感受,与用印度教方式证悟到神的感受有同样类似的性质。这一点使他坚信,所有的宗教最终能够实现统一。

尽管罗摩克里希那有高深的精神修炼,但是他仍然是一位普通人所喜欢的宗教老师,他总是用极为通俗的形象、故事和寓言来讲课。他还能吸引加尔各答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想利用西方宗教实现现代化的人的注意。罗摩克里希那重新召回了印度教文化遗产的力量,特别是在精神修炼方面。在达其内斯瓦尔(Dakshineshvar)的迦利女神庙(即罗摩克里希那主持的那座庙)里,有一群进行宗教修炼

而达到半欢喜状态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位年轻人，他的名字叫纳伦德拉那特·达特（Narendranath Datta），他出身于卡亚斯塔种姓（kayastha caste，这个种姓原初是首陀罗，但是后来向上发展了，其中包括孟加拉部分出身高贵的人）。这位青年人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且在他父亲死后，改名为维韦卡南达，决心成为一个为宗教献身的人。罗摩克里希那从他身上看到了伟大前途和力量。

恰巧，维韦卡南达也是梵社的成员。虽然他认为罗摩克里希那过于朴实的形象是个问题，但是他一直拜罗摩克里希那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并坚持精神修炼，直至罗摩克里希那去世。罗摩克里希那死后，维韦卡南达继续宣传罗摩克里希那的教导。后来，他到各处朝圣，遍游了印度的四面八方，并且在此期间发展了自己哲学的主要宗旨。他的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1893年他赴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大会，在那里他的声望大大地提高了，甚至后来作为一位名人回到印度。1895年，他在纽约创立了吠檀多学会（Vedanta Society），他的传教活动是在世界范围的。1897年，他在印度创建了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Ramakrishna Mission），他把这个修道士的队伍转化成了一个现代组织，以进行社会改革，从事教育和社会服务事业，宣传建立一种普遍的印度教(a universal Hinduism)。

维韦卡南达的基本观点如下：神圣的存在有两个等级。高等级的神，是无形无性的，不可描述的。但是，通过吠檀多不二论冥思的体验可以认识到神，一个人确实能够从自身内部证悟到神，因为神是惟一的。这种证悟可以消除我们有关世界的任何幻觉。然而，低等级的神是有形式有属性的，例如，她可能是迦利，他也可能是湿婆、毗湿奴……或罗摩克里希那。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象描绘神灵，她或者他都变成了人们虔诚信仰的对象。一切宗教的核心都是神，但它们只是以不同方式来描绘神。印度文化遗传非常清楚地表明：实在(the Real)是惟一的，惟一实在的不同名称只是不同的标签。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是可以联合到一起的，如果它们采取这种积极的方式，即把不同宗教的神话和原则都看作是能够导致惟一之神的预备性的准则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寓居着神，我们能够达到与神的结合。所以说，人性本身就是神。一旦我们彼此之间都能证 411

悟到他人身上的神性，那么就可以产生一种道德，一种充满爱心和社会关怀的道德。

维韦卡南达的思想体系使印度教变得不再是落后的宗教，而使它处于各宗教的前列。一些愚昧的基督教徒总是倾向把自己的信仰看作是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的宗教视为绝对的错误。而那些有远见的印度教徒，却把自己多元论的信仰看作是未来的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产生的先兆。维韦卡南达的新吠檀多论(neo-Vedanta)，可能是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印度教。现在，印度教徒能够解释印度教是各种令人迷惑的、形形色色的宗教的统一。可以说，真正的印度教至今才开始出现，起码是刚刚达到自我意识的完善。这就是为什么维韦卡南达的教导能够直接流行于那些会讲英语的高贵人群中。对于农村和普通印度教徒的偶像崇拜，维韦卡南达的学说也没有采取居高临下的路线。比如一个崇拜蛇的人，他对神的观点就可能受到限制，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通过适当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提高到吠檀多不二论的认识高度，在这种认识中一切差异都会消失。所以说，维韦卡南达是第一个有效地应对了基督教挑战的人。

下一个问题是，谈到功利主义和社会改革，维韦卡南达也声称自己是一个关心人类幸福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幸福应当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幸福绝不能等同于欢乐和喜悦。你应当忠诚于人性，而人性就是神。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满足于每一个人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才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谈到资本主义体系所产生的新的全球意识，维韦卡南达就具有这种意识，他去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会议则是一个生动的证明。他在那里宣传的宗教是一种全人类的宗教、新的全球性宗教，同时也是一种很古老的宗教。从这位圣贤闪光的学识中，你可以吸收到现代和未来世界的光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维韦卡南达的思想体系对印度更是有利的：它能够把所有的印度人，穆斯林、耆那教徒、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都联合起来。这种意识形态表达了一种为印度自豪的情感，因为印度有着伟大的文化成就，但是它没有采取沙文主义者的方式来做这一切。伴随着维韦卡南达的思想，印度的民族自我意识也开始成熟了。

维韦卡南达的思想体系也适合于高等教育。当时在大学里讲授的哲学是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ism),此种哲学是一些英国人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新黑格尔主义很类似于商羯罗的哲学,因此很容易把两者调和在一起。当时,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革命也开始出现了。所以,要把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协调起来并不困难。显然,认识到印度哲学本身是非常深奥玄妙的人,就可以向那些想深入理解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谈到科学,凡是受过科学教育的人,要理解维韦卡南达的哲学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从一方面看,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从另一方面看,在物理学与对神的信仰之间也没有冲突;因为神本身是不可描述的,完全超越了思想,而不单是经验。宗教作为一种体验,是经验主义 412
的。但是,它不是那种不加鉴别就可以接受的信条。况且,印度教传统不是令人厌烦的,它像忠于圣经的基督教一样,也是研究进化问题的:例如,在数论哲学中就提出了一种进化的方案。不仅如此,就连历史对印度教各种圣书的考证,也没有使它们丧失其根本意义。这些圣书就好像指着月亮的手指一样,而月亮正是那些证悟神圣存在的吠檀多不二论的体验。

尽管商羯罗的哲学为维韦卡南达的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实际上商羯罗的哲学还是被维韦卡南达改变了,也被后来现代印度教思想的解释者们所改造。最初吠檀多不二论哲学的主要学说是说明,除了梵——不可描述的绝对——之外,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māyā)的。这种学说根本不鼓励人们去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随着各种证明材料的出现,有关"摩耶"(māyā)的理论已经大大地削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商羯罗把世界看作是虚幻的理由,是因为世界万物不是永恒的。从一种精神的观点看,任何非永恒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但是,这不是字面上的那种意义,即凡是暂时的东西都是虚幻的。那些印度民族主义和宗教统一的新预言家们,对现实世界采取了一种积极而肯定的态度。因此,他们转而求助于《薄伽梵歌》的教导,而采纳了另一种观念:一个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或行动来为神服务(即所谓的业瑜伽[karmayoga])。强调业瑜伽的作用,这也是甘地从他喜欢的经典《薄伽梵歌》中所汲取的内容。

虽然维韦卡南达的思想和传教活动是通过他开创的罗摩克里希那运动而传播的，但是他的号召力却非常广泛，他所表达的立场已经成为印度中产阶级看待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基本观点。对神的虔信行为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很容易地被模糊起来。当时的国歌变成了“向母亲致敬”(Bande Mataram)，即一首孟加拉人向母亲(指迦利女神)致敬的圣歌，这样，印度本身也成了像母亲一样可爱的人物。印度在地理上的界线，也自觉地出现在人民的心目中。除了别的以外，维韦卡南达还鼓励人们在印度的最南端，科摩林角(Cape Comorin)海岸边的一个小岛上建设一座寺庙。这是对印度统一的一种认可：不再像以前一些孟加拉的朝圣者想的那样，认为这里(指讲马拉雅拉姆语的喀拉拉)是在外国。此前，虽然也有人到这里来朝圣过，但是建造这座印度教寺庙表达的是一种民族感情，而不单是对神的虔信行为。所以，后来的领导者(像尼赫鲁那样的一些不可知论者)虽然没有全部接受维韦卡南达的思想，但是他们都深受维韦卡南达思想的影响。印度教的现代意识，就是从维韦卡南达和其他现代思想家那里产生出来的。

作为全印度惟一思想体系的印度教终于被创造出来了：这种印度教不是只有经典和哲学(因为奥义书是离一般实践很远的哲学)的印度教，而是包括所有斑斓灿烂方面的印度教——如偶像、队列、圣地、庙宇、斋戒、圣人、沐浴、火葬、种姓等等。因为维韦卡南达找到了一种最好的方法，能证明印度教的整个仪礼尺度是合理的，并且取消
413 了一些带有社会歧视的礼仪。对于一个被片面看待的神圣实在来说，一切仪式都是不完善的反应。

现代印度教的诸层面

如果我们考察中产阶级在本世纪对印度传统的各种表述，从印度教各方面的发展前景上看，这些表述代表什么呢？

首先，在教义层面，我们注意到商羯罗的哲学仍然被赋予主导的地位，而其他同样重要的哲学体系，如罗摩奴舍的哲学，却被相对忽视了，起码在公共宣传方面是这样的。这些哲学体系都是被放置在吠檀多不二论的人造大伞之下来加以处理。再生和业的法则仍然受

到肯定，这种法则强调一个人的行为报果会影响他的来世。但是，由此产生了一些小的问题：这种信仰如何才能与现代的生物学，即遗传学协调起来呢？如果我把自己的性格归因于自己的父母，那么第三种力量（指前世行为的报果）还起什么作用呢？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是：为了说明前世行为的报果，我的灵魂应寓居在我的父母之中。一个有好运的灵魂，将出自于神圣并具有成功事业的父母；而一个充满坏运的灵魂，则出自灾难不断的父母。所以，在印度出现这样的结果：虽然人们对神的信仰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对再生法则的怀疑却不断增长。

至于印度教的神话或叙事体的经典，在现代意识形态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各种神的故事，特别是毗湿奴大神各种化身的故事，依然起着教育的作用。令人注意的是，他们强调两性关系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与19和20世纪英国人所提倡的禁欲主义观点形成鲜明对照。无论如何，一种新的清教主义在印度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得到传播。当高等教育已经超越少年扩展到青年男女之中时，严格地控制性的感情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印度这样一个婚姻受到家庭的包办并且只限于种姓制度框架之内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印度人一直捍卫种姓制度，认为这种制度能产生比西方人那种不稳定的爱情—婚姻关系更好的关系。

一旦印度人对世界文明和现代思想的贡献在世界场合被更多地、公开地表述出来时，人们就会承认印度过去的那种命运将会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印度人将教会唯物主义的西方去使用他们在长期历史中所探索出来的那些精神的观念、技巧和价值。维韦卡南达就是创造这种新命运的英雄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的英雄，如著名的圣雄甘地。

谈到道德和社会生活，维韦卡南达主张，必须实现观念的转变和现代化。种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与世袭有关的劳动分工制度，并且被一些不必要的宗教禁忌所包裹着。甘地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种姓制度在社会上实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担心会被别人污染的高级纯种姓者，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在新制度下与英国人接触，在官场和火车上与其他种姓接触，结果

变得更加封闭了。但是,要改变这种情况,最困难的是解决相互通婚的问题。

414 至于宗教仪式,现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主要是通过非意识形态的力量。如铁路和后来公共汽车网络的出现,朝圣人数大大增加了,也对贝拿勒斯这样的宗教中心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但是,现代印度教意识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多地到圣地去朝拜。

在宗教感情和经验层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现代社会中民族感情迅速增长。有的时候,在一些亲印度教的极端政治组织中明显地流露出这种感情,它们在解释印度教传统时,没有维韦卡南达和甘地等人那么多的和平主义。例如,海德瓦尔博士(K.B. Hedgewar,1889—1940)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创立的了国民志愿服务团(Rastriya Svayamsevak Sangh,简称 R.S.S),这个组织把印度教的复兴与军事训练(包括梵文与武装操练)结合起来,它的领导人具有献身精神并实行独身主义,在这个青年人的组织中有广泛影响。

无论如何,维韦卡南达和其他一些人都强调内在精神体验的重要性,这种精神体验比爱国主义的感情相对更重要,因为它可以证悟到一个人的真正神性。现代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印度教,也被许多西方的作家所接受,如著名作家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商羯罗思想在西方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更多地强调印度教的解脱经验,而不是它的现实生活,因为印度人对各种神话中人格化的神的虔诚崇拜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另外,印度教的瑜伽对西方人也是全新的,印度人把瑜伽作为自己文化的主要成果介绍给西方人,无论印度教徒还是佛教徒在过去都花费了许多努力研究瑜伽,瑜伽是可以向西方人解释清楚的。有时,瑜伽增强了现代印度教徒所经常表达的一种观点:印度文化在本质上是精神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极端的唯物主义。

在社会组织层面,婆罗门的地位在现代受到很大的冲击。其中部分原因是,翻译和解释印度教的经典并把其思想凝聚在各种书籍中,这已经成为普通的事情了,而不再依靠那些受过训练的婆罗门的神圣记忆和他们吟诵圣诗的那种萦绕人心的腔调。重要的是,新的中产阶级本身包括婆罗门种姓,但也包括许多其他种姓的人;各种新

的知识来自于外国的资料，而不同于印度教神圣知识的那种传统权威资料。此外，一些复兴运动都是反婆罗门的。过去，那些有梵文知识的婆罗门在南亚次大陆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网，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更强大的联盟——铁路、英国人的统治和英语。梵文的整体地位受到了怀疑。在现代印度，它能起什么作用呢？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印度出版的有影响的书籍都是用英文写的。由于这些原因，还发生了一些社会阶层的动乱。但是，种姓制度仍然保持着强大的难以对付的势力，因为任何反对种姓的动乱只会产生一种新的反抗。

在印度教徒生活的物质层面，没有太多的东西涉及到现代印度教的复兴。旧式的工匠在建造庙宇和神像方面，无疑是走下坡路了。但是，现代并不缺乏想修建神庙和纪念碑，来赞美新印度的虔诚信徒。例如，维韦卡南达就在科摩林角建造了神庙。在他以后，我们发现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如出现了一些有关神话的电影——把大史诗改编成电影和一些具有新风格的神的画册等等。但是，印度教新意识形态所赞美的物质事物只是过去的神庙和雕像，目的是证明印度社会的强大和辉煌。 415

印度穆斯林的现代主义

由于英国人打败了北方的莫卧儿政权和南方如迈索尔提普苏丹(Tipu Sultan)这样一些有势力的穆斯林统治者，再加上老的莫卧儿皇帝也卷入了1857年大起义，所以穆斯林最初很不适应英国人的统治，英国人对穆斯林也不像对印度教教徒那样充满好意。第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伊斯兰重要思想家就是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爵士(Sir Sayyid Ahmad Khan，1817—1898)，他在德里受过伊斯兰传统教育，学习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此后还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1857—1858年印度大起义的失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个事件中，他意识到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合理性。他把新的科学知识看作是出自神的善良和终极的行为：他依靠伊斯兰教的哲学原则，认为理性和神的启示是并列的，各有各的作用。但是，他也认为伊斯兰教充满了外来的生活方式，不

幸的是，许多外来的东西都体现在伊斯兰教的教法中。赛义德·阿赫默德·汗对此事采取了一种新基础主义的观点，他力图把可兰经的神圣教导与众多的圣训（有关穆罕默德传闻的汇编）区分开来，认为有些圣训是不可靠的，但却长期被人们口头传诵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因为他极力主张进行法律的和社会的改革，以此实现西方科学与伊斯兰宗教的和谐。此外，他把西方科学的最初动力归功于伊斯兰的源泉，借助希腊思想的传送，还把伊斯兰科学的发展归功于中世纪的西方。他在1878—1880年访问英国以后，在阿里加（Aligarh）创建了英国—东方伊斯兰学院（Mohammedan Anglo-Oriental College），从此开始在穆斯林青年中间开展英语高等教育。他劝导穆斯林不要参加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担心穆斯林在印度民族运动中将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

虽然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现代主义为伊斯兰教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但是它并没有消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冲突的根源。复兴的印度教呼吁保护母牛，但是穆斯林在传统上就有在节日里宰杀牛羊的习俗。另外，印度教徒强烈要求，用天成体书写的印地文应当与以阿拉伯字体书写的乌尔都文具有同等的地位（乌尔都文与印地文是同样的语言，不过吸收了较多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些原因都成了印度现代史上两大教派冲突的长期背景，特别是在北印度。两大教派暴力冲突的鼓号声有的时候可能被遮掩，
416 但是他们之间的争斗却一直清晰可见。

印度人谴责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政策，英国人的许多行动无疑助长了两派的冲突，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的孟加拉省分治”。这个事件引发了恐怖分子的爆炸，扩大了社团暴力的等级。另外，在宗教仪礼方面，两大宗教也存在着不可调和之处。穆斯林认为偶像崇拜是亵渎神灵的最大犯罪，他们一直被湿婆大神、象头神和顽固印度教徒制造的各种偶像所包围着。每一个偶像都是一个罪过，尤其这些偶像被抬着通过清真寺前的时候。对于印度教徒来说，穆斯林宰杀母牛也是一种犯罪，违背了他们从古至今崇拜母牛的深切情感。如果穆斯林认为他们有义务打碎偶像，或者

印度教徒认为他们有义务制止宰杀母牛的话，那么各种不必要的冲突就会马上爆发出来。所以，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和平共存，一直存在着问题。

就如何通过理智来解决两大教派之间紧张关系的问题，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立场深受苏非派的影响，他的这种立场有助于穆斯林更好地理解印度教徒。但是，他本人受到许多乌勒玛（ulama，伊斯兰教有知识的人）的强烈攻击，他的现代主义与许多同教派人的思想感情不协调，受到他们的威胁。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讨论有关穆斯林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反响，但是在这里，我们认为赛义德·阿赫默德·汗是一位有远见的思想家，他满怀自信心和强烈的教育热情，推动了印度的现代主义。

20世纪的早期

甘地：印度教反响中的一种新生力量

如果说印度社会中有一种由现代印度教意识所构成的批判主义的话，那么它可能只处在理论水平上。但是，通过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1869—1948），我们就可以发现已经有一批人把社会实践与理论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甘地成长在卡提阿瓦（Kathiawar，现属于古吉拉特邦），他不仅接触印度教徒，而且也能接触到非印度教徒。他母亲信仰的宗教是属于印度教虔信派，而在虔信派的传统中，亦多少有伊斯兰教的影响。他出生的地方还是耆那教的主要流行区域，因此他也受到耆那教非暴力思想的影响。

19岁时，甘地赴伦敦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开始接触到神智学运动（Theosophical movement）。神智学是把东方宗教的主旨和特点与比较宗教研究结合在一起。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1847—1933）就是一位著名的神智学者，她在印度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甘地回到印度后，曾在孟买做过律师，不太成功，后来到南非纳塔尔的德班（Durban）找到一份工作。他是在1893年去南非的，这一年对印度人很有意义，因为维韦卡南达也是在这一年去芝加哥的。

甘地在南非工作了21年,直到1915年。正是在南非他提出了非暴力的政治抵抗方法,后来他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印度人反对英国
417 统治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是在南非,他穿着独特的服装,表现出圣者的风度。但是,他不是一个隐士,他经常出现在各种事件的最前线。甘地做得最有成效的东西,就是给古代耆那教和印度的“戒杀”(梵文 ahimsa, 英文 non-violence)观念赋予一种政治的内容和意义。他还赋予“自制”(renunciation)的观念以一种新的社会内容。他过着极为朴素和简易的生活,其目的就是要在精神上修炼自己,以从事反对压迫和不公正的斗争。最重要的是,甘地教导人们,在进行这种斗争中我们的动机必须是纯洁的。如果你在内心中仇恨你的敌人,即使你在外部进行非暴力斗争,那也是无用的。在这方面,他也深受基督教福音书的影响:“爱你的仇敌”——这句话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教诲。

从总的原则上说,甘地对宗教采取的路线很类似于维韦卡南达,
418 但是他对这条路线的阐述却不够明确。他用得最多的是“真理”(英文 Truth,梵文 Satyam)这个词,对他来说,“真理就是神”,“神也是真理”。他把他的消极抵抗方法,称之为“坚持真理”(Satyagraham),即“牢牢地抓住真理”。

在祈祷会上,甘地用各种赞颂神的祷文和颂歌,其中也包括基督教的祷文。在实践中他坚持各种宗教统一的观点,但是,他又不想详细阐述出一种高级的系统的哲学或一套完整的教义。在说明宗教的叙事和仪式层面,他做得也不多。然而,为了修炼好自己,他非常严格地遵守他自己制定的各种节欲规则。其行为的主要轨迹集中在道德和社会的层面,而对宗教仪式没有什么兴趣。无疑,他也受到修道院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印度教的还是基督教的。在南非时,他曾与基督教特拉普修会[①]的修士(Trappists)交往。他自己创立的修道院或社团非常符合印度的形式,目的是为了适应现代的斗争。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忠诚的弟子,他们帮助他组织抵制英货、罢工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活动。

① 此修会1140年在法国特拉普(La Trappe)建立。——译注

甘地

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handi，1869—1948)是20世纪印度最主要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他出生于古吉拉特邦的卡提阿瓦(Kathiawar),一个各种宗教混杂的地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就受到耆那教徒、穆斯林朋友和自己印度教家庭的影响,他的家庭属于一个印度教虔信派,此派回避神的偶像,主张虔信者不依靠祭司或圣礼仪式,而直接与神交往。后来,他又通过与托尔斯泰(Tolstoy)的通信和一位名为C. F. 安德鲁斯(C. F. Andrews)的英国传教士的交往,而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从耆那教那里,甘地学到了对“戒杀”(ahimsa)或“不伤害生命”的深刻理解。他把“非暴力”(non-violence)的思想运用到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并通过这种斗争而逐步赋予这个词一种政治意义。

1888年甘地赴英国学习法律,在英国他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的人,从他们那里他得出一种信念:社会道德应当是宗教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893年他去南非的一家印度商行工作,在那里他发展了他的非暴力哲学,并把这种哲学运用于领导印度侨民的斗争实践中。在南非,他呆了21年。1915年当甘地回到印度时,他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并开始领导印度国大党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把“真理(satya)就是神”的概念和“自制”(renunciation)的概念都补充到他的主要思想“非暴力”之中。这些概念集中起来,就组成了“坚持真理”(satyagraham)或“抓住真理”的概念。甘地一直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他与尼赫鲁共同领导了这场斗争,虽然两个人在性格上和斗争策略上有很大的不同。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但是这种独立是以次大陆的分裂为沉重代价的,甘地以绝食为武器极力制止1947年在加尔各答和1948年初在德里爆发的教派冲突。然而,1948年7月30日,一个印度教徒由于对甘地对穆斯林的宽容态度而感到愤怒而杀害了他。后来,印度人称甘地为“国父”,但是他的和平主义和倡导单纯以农村为基础的经济思想,从整体上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伦理层面：圣雄甘地赋予非暴力原则以一种新的道德和政治的意义。非暴力原则具有耆那教、佛教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印度教的传统。

甘地最初的斗争是为南非的印度工人争取合法的权利。这些印度工人主要是在蔗糖种植园工作，种植园主要求他们要比当地南非人负担更多的义务。为此，甘地在南非建立了两个修道院：一个叫“凤凰村”(Phoenix)，在德班附近；另一个叫“托尔斯泰农场”(Tolstoy Farm)，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附近。

由于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斗争的成功，所以二十多年后，即1915年他回到印度时，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人物。随后，他加入到
419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争中印度军队曾为英国忠诚地战斗过，印度本来希望得到英国人的感谢，但是在战后，即1919年，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件发生了。在旁遮普阿姆利则市的贾利安瓦拉广场(Jallianwala Bagh)，英国将军戴尔(General Dyer)下令向群众开枪，造成了最大的流血事件。虽然殖民官方进行了调查，但是这位戴尔将军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然而，英国殖民统治却处于紧张状态。次此流血事件促使甘地在一年以后发动了第

一次不合作运动。当时，甘地与伊斯兰的“基拉发运动”(khilafat movement)相配合，要求穆斯林获得自治权，因为穆斯林忠诚于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哈里发(Caliph)。1924年，哈里发的职位被土耳其人废除了。但是，印度的穆斯林却坚持不同的观点。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在监狱之内和监狱之外多次进行了绝食斗争、领导反对盐税法的向海滨进军，多次与印度总督谈判、控制着国大党的主流意见。他在1947年才结束的民族独立运动中一直是主要领导人，在一些方面他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成功的。伦敦的工党政府终于宣布结束英属印度帝国。但是，印度穆斯林惟一的选择就是印度要分治，正是由于印巴的分治才导致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大屠杀，他们沿着新建国家有争议的边界，甚至远远超过边界相互屠杀。人口众多、气候炎热、贫穷和各种谣言——这些事情使印度在当时最好的时期都变得令人难以捉摸。

印度民族运动的这种结果使甘地深深地感到不安，他力图把和平带到各个出事的地区。甘地呼吁印度教徒应当尊重穆斯林，他的这种行为招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批判。1948年，他在德里的一个祈祷会上，被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开枪打死。但是，甘地崇高的精神力量、他的足智多谋、幽默诙谐、善良仁慈和一生的创造活动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人，其中也包括马丁·路德·金。还有许多基督教徒把甘地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能他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一些人所想的，本世纪最好的基督教徒怎么最终是一个印度教徒呢?)。甘地代表着的正是印度教新意识形态的实践方面。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与巴基斯坦的概念

对于一个统一的印度来说，如果没有人提出某种变通的办法，那倒是令人奇怪的事儿，因为在北印度和西北印度还保存着强大的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在穆斯林中间，一直有一个唠叨不休的问题：在外国的或非穆斯林的范围内，如何来实施伊斯兰法呢？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爵士(Sir Muhammad Iqbal，1877—1938)是个著名的诗人，为了表彰他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所写的著作，英国政府授予他以爵士

爵位。他的哲学思想是期望建立一个真正以道德为动力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必须努力达到这个目标。他还把人类的历史和生活看作是一个向更高道德生活进化的过程。对他来说，最有意义的是1930年他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ad)当选为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在此次穆斯林联盟大会上，他极力主张在西北印度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只有穆斯林能自由地实施伊斯兰法，才能实现真正的伊斯兰教。

伊克巴尔

穆哈默德·伊克巴尔(Muhammad Iqbal，1877—1938)是一位穆斯林诗人、哲学家和改革家，他对建立一个作为独立穆斯林国家的巴基斯坦有很大的影响。他生于锡亚尔科特(Sialkot，现在巴基斯坦)，最初在拉哈尔(Lahore)受教育。后来，他去欧洲留学，在那里获得了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伦敦取得律师资格。在赴欧洲之前，他已经写出了诗集，表达了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趣。但是，在欧洲居住的几年改变了他的前途，回国以后他开始拥护一种泛伊斯兰的观点。伊克巴尔还用波斯文写作，他对民众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印度次大陆。虽然他深受鲁米(Rumi)作品的影响，主要属于苏非派传统，但是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新行动主义的观点。他为伊斯兰教的过去而自豪，但也为衰败和萧条的现代伊斯兰国家而痛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他号召人民行动起来，这使他否定清净无为的思想，而肯定具有创造性的自我，并且呼唤一种自我牺牲精神，为争取正义和兄弟情谊而服务。他的名著《永恒之歌》(*Song of Eternity*，1932年出版)，描绘的是这位诗人在鲁米指导下思想上升的状态，以及对但丁(Dante)和维吉尔(Virgil)的回忆。他被人们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乌尔都语诗人。伊克巴尔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是《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ought in Islam*)，这部著作是他在1928—1929年发表的演讲集。1930年，

他提出在印度建立单独穆斯林国家的思想，后来他被尊称为"巴基斯坦之父"。虽然他批评民族主义，但是从他的泛伊斯兰思想中，派生出在西北印度建立穆斯林国家的观念。他号召在穆斯林中间建立一种新道德精神，这种思想也扩展到其他国家，在原则上也使西方恢复活力，因为西方虽然创造了财富，但是在道德上却败坏了。

伊克巴尔主张的穆斯林国家的概念，最初是不太明确的。一 420
位居住在英国剑桥的穆斯林，名为拉赫马特·阿里(Rahmat Ali)，给了这个概念以精确的解释。他为这个新的国家创造了一个名字，叫"巴基斯坦"(Pakistan)，这个名称是由一些主要省份的第一个字母所组成的，其主要省份有：旁遮普(Punjab)、阿富汗省(Afghan Province，或称西北边省)、克什米尔(Kashmir)和信德(Sind)，再加上巴路支斯坦(Baluchistan)的一部分。后来，拉赫马特·阿里又补充上在孟加拉的另一个穆斯林国家，这个国家在东边很远的地方，他称之为"邦基斯坦"(Bangistan)。实际上，巴基斯坦最初包括东孟加拉，但是在1971年的国内战争后，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家，名为孟加拉国(Bangladesh)。拉赫马特·阿里的思想在一开始被穆斯林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 1876—1948)给拖延了，直到1936年以后真纳才接受这种思想，他才毫不妥协地为建立这个新的国家而奋斗。这表明，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不可避免的。

在1971年国内战争以后，巴基斯坦没有变成一个稳定的国家，这次战争使孟加拉国分裂出来。在孟加拉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巴基斯坦连续不断的军事政权取代了最初的文职政府。这促使伊斯兰法律进入巴基斯坦的政体，但是从伊克巴尔所期盼的复兴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

印度的一些其他宗教运动

虽然维韦卡南达代表着印度现代主义的主流，但是在现代还有 421

其他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宗教运动。例如，像“国民志愿服务团”这样的运动，在提升印度教价值观的方面采取了一种非常强硬的路线。另外，还有一些运动，力图改善许多受歧视集团的权利。从 1935 年后，甘地本人就尽最大努力帮助不可接触者，即贱民。甘地称不可接触者为“哈里真”(Harijan，字面上的意义是“神之子”，这个名称曾一度受到偏爱，但是最近哈里真自己也有些不赞同了，因为他们认为这里包含着某种受人恩惠和保护的意思)。对于一些人来说，贱民的未来是脱离印度教，这种观点在 B. R. 安培德卡尔博士(Dr. B. R. Ambedkar，1891—1956)的一生和著作中就可以得到证明。他青年时代在种姓印度教徒的资助下，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取得了学术成果，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从 1930 年以后，他把主要精力都用来动员他家乡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地区的贱民。虽然安培德卡尔在死前五年就发表了一部论述佛教的著作并且长期以来都认为佛教在印度传统中是最好的信仰方式，但是他正式皈依佛教，是在他死前不久。在他皈依佛教时，他的 400 万追随者也改信了佛教，因此现在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到处都建有佛教庙宇。

还有一种在意义和风格上完全不同的运动，是试图把东方和西方文化从根本上结合起来，这种运动反映在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的一生和著作之中。他从 7 岁到 21 岁
422 一直在英国接受教育，只有回到印度以后，才开始了解自己的祖国。但是，他熟悉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进化哲学，在印度他把这种哲学与奥义书的思想综合在一起。这种综合是在奥罗宾多参加一段革命活动以后，其中包括短时期的坐牢。1910 年，他移居到法属印度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此后他不再从事各种政治活动，而是潜心进行写作和瑜伽禅思。几年以后，他与一位法国妇女合作组织起他自己的修道院，以实现他的理想——“整体瑜伽”(Integral Yoga)。奥罗宾多的哲学理论是：一种“精神”(that Spirit)首先下降到物质世界，然后它再反过来，开始从下向上一级一级地进化。这种进化过程首先是从表面上愚钝的物质开始的，因为在物质的内部隐居着意识(精神)。“整体瑜伽”只是一种手

段,是人在历史的关键阶段促进这种进化过程并上升到更高精神层次的一种手段。奥罗宾多的宗教运动吸引了许多的欧洲人,这种思想在奥罗宾多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其名著《神圣人生》(*The Life Divine*)中得到生动的表达。奥罗宾多的思想与天主教作家皮埃尔·特尔哈德·迪·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的思想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性。

以上这些运动都发生在20世纪20—50年代之间印度人民生活最丰富的时期,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斗争就是重申印度教的价值和印度的价值观。至于以后的时代,还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要谈:后来一些新印度教运动趋向于向全球范围发展,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交往进一步开放,西方人对东方思想的兴趣也越来越增长。

锡兰佛教:一种新的现代主义

与此同时,一些性质不同的进化运动发生在印度南边的锡兰岛上,这个岛在行政上与印度是分离的。1815年,英国人占领了锡兰中部的康提(Kandy)王国,此后有一段时间他们根据停战条约不得不支持锡兰佛教徒建立自己的僧伽团社。但是,各种基督教传教会的到来给锡兰佛教徒增添了压力,佛教徒的士气一度受到很大的压抑。在19世纪的后半叶,佛教徒与基督教传教士为了捍卫各自的信仰,经常进行公开的辩论。佛教徒对自己传统思想中具有较多的理性成分深感满意。

从复兴锡兰人自我尊严的角度看,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美国人克洛尼尔·亨利·S·奥尔考特(Colonel Henry S. Olcott, 1832—1907)访问了锡兰。奥尔考特与具有超凡能力的俄国贵族女人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H. P. Blavatsky, 1831—1891)合作,于1875年在纽约共同创建了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此后,奥尔考特成了一个佛教徒,神智学会也具有佛教倾向,虽然它的总部设在印度马德拉斯市附近的阿迪耶尔(Adyar)。许多看到东方精神中包含着深刻价值的西方人都支持奥尔考特,这种支持对僧伽罗佛教徒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奥尔考特本人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他和神智学会帮助锡兰建立了一所阿南德学院(Ananda Col-

lege)，这是锡兰第一流的佛教学院。另外，他还提出了一种更新佛教知识的方法，尽管他本人不是学者。

423 奥尔考特在锡兰的工作成就，与另一位神智学者安妮·贝桑特在印度的工作成果很类似。安妮·贝桑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著名的演说家和组织者，她在印度的事业还包括参加国大党的活动，她在1917年被选为国大党的第一位女主席。她还创建了一所学院，这所学院后来发展为贝拿勒斯的印度教大学(Benares Hindu University)。这是印度最早的大学之一，一直传播印度教的精神价值。有趣的是，贝桑特收养了一个有天赋的印度教男孩儿，名为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1895—1986)，这个孩子渴望自己成为一位神智学的世界导师。在贝桑特死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实际上他讲授的各种观念与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和禅宗的思想很相似，这两者都认为人们无法表述达到真实世界后的那种境界。

在向20世纪过渡的时期，贝桑特与奥尔考特这样一些西方人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帮助南亚人民认识到，在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眼里，在文化鼎盛时代，南亚本地的宗教传统具有极大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一项重要的事业，就是编辑和出版巴利文的文献。这项事业主要应归功于英国学者 T. W. 里斯·戴维斯(T.W. Rhys Davids，1843—1922)的推动，他创立了巴利文文献学会(Pali Text Society)。这个学会帮助锡兰佛教徒对自己基本的文化遗产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西方式的教育传入锡兰，也产生了与我们在印度所看到的相同的效果。但是，锡兰独立的过程要比印度温和得多。锡兰人的世界主义奠定了与西方相类似的民主制度，然而许多地方自治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建立起来了。

在这一节中，佛教的现代主义出现了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新基础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把以巴利文为经典的佛教看作是佛教的规范，或者把巴利文经典作为检验佛教的标准。一般认为，巴利文经典中许多有关神和精神的资料，都是把佛陀最初的教导神化了的结果，实际上佛陀的教导是属于纯理性和精神的。抛弃那些想像的增添物，从哲学的观点看，在巴利文经典中有许多内容是符合现代科学

(它把世界看作是许多在运动中变化无常的原子)和哲学(佛陀的教导不也是经验的吗?)的。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区别在于,佛教承认那些超常证悟经验的重要性。如果有值得怀疑的地方,那可能是再生的原则。但是,只要我们不是以太真的态度考虑这个问题,它也是与现代思想相符合的。当然,这种理论深奥、烦琐的佛教,并不是大众的宗教;对于大众来说,宗教的外在表现和神话比哲学更重要。然而,佛教的优点在于它对道德伦理方式的教导,这些教导可以直接传达给大众。这种佛教对于会说英语的精英分子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对一些欧洲人来说,此种佛教在不信仰神(但是,许多西方人认为这种信仰是难以置信的,甚至是令人厌倦的,正如他们所知,它有一种神人同形同性论的倾向)的情况下就能使人精神化。

佛教复兴和佛教现代主义的其他标志是宗教改革家安纳伽里 424
迦·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mapala ,1864—1933)的著作,此人在佛教教育方面还做了大量工作,并致力于重建印度佛教的朝圣地,尤其是佛陀的成佛地——菩提伽耶。到 19 世纪末,即在 1891 年,他创立了摩诃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这个社团得到亚洲各地佛教徒的支持,成为推动各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那类组织的建立。

虽然锡兰民族主义是佛教复兴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由于锡兰获得独立的过程相对容易,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也变得默默无闻了。主要是在 1948 年 2 月锡兰独立之后,在僧伽罗人中间出现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最强烈阶段。在 1946 年的选举运动中,这种民族复兴的情绪就已经表现出来,当时许多佛教徒都站到了新成立的斯里兰卡自由党(Sri Lanka Freedom Party)一边。他们所要求的,就是重建类似古代僧伽罗佛教那样的盛世,从波罗羯摩跋诃大王时代
到佛教文明的高潮时代。现在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那种过分现代主 425
义的、具有哲学思辩的佛教,而是要达到一种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僧伽社团与国家之间能够再一次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对于流行上座部佛教的国家(不只是锡兰)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国王被外来征服者赶下台以后,如何来重建这个世界。在古代国王和僧伽社团之间有一种对等的关系,各自承担明确

的责任。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具有现代体制（从外国君主政体中移植过来的）的民主时代，这种体制将是什么样子呢？“把僧伽罗语作为惟一的官方语言”（这是1956年大选运动的主要口号），这一口号大大地增强了僧伽罗佛教文化的观念。当然，也有一些僧伽罗人不是佛教徒，主要是基督教徒，他们的地位并不轻松。但是，绝大多数僧伽罗人是佛教徒。斯里兰卡（1972年新宪法颁布后，锡兰改为此名）开始进入一个新古典的、僧伽罗复兴时期，在这个时期佛教的编年史受到重视，大量的金钱被用于恢复阿努拉达普拉和波隆纳鲁瓦古城佛教的辉煌建筑，并鼓励创办佛教中小学和大学。

所有的佛教复兴活动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中间都引起了极大的不安，泰米尔人主要是属于湿婆悉檀多派的印度教徒，他们的先辈是19世纪作为劳工从印度招募来的。佛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冲突，最终导致斯里兰卡20世纪80—90年代的国内战争。佛教复兴运动并没有像现代印度教那样产生出明确的宽容的意识形态，尽管佛教传统一般都具有宽容的品格，根据这种品格有可能产生像阿育王那样的理想人物。现在，多数僧伽罗人越来越感到他们自己是少数派，因为在印度的泰米尔纳杜邦有大量的大陆泰米尔人，人数超过5000万。

尽管有这些问题，但是斯里兰卡在独立之后还是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佛教文化复兴时期。特别是佛教哲学，通过像G. P. 马拉拉色克拉（G. P. Malalasekala，1911—1968）和K. N. 贾亚提勒克（K. N. Jayatilleke）这些重要人物的著作而繁荣起来。在老首都考提（Kotte）附近，一座新的议会大厦就是按照传统的僧伽罗风格建设的，由于一般人对佛教艺术的喜好，佛教传统的物质层面得到很大的复兴。佛教徒可以到海外旅游，斯里兰卡小乘佛教对世界精神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佛教禅定实践有了很大的更新。同时，佛教本身也参与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工作方面，佛教受到基督教组织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像青年佛教徒协会（Young 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那样的机构中。

独立以后

分治后的印度：某些发展趋势

多元论原则已经写进印度共和国的宪法。印度成为一个世俗的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与宗教是分离的（在各种指导原则中，惟一的例外是有关保护母牛的条款）。最重要的是达到了一种政治的平衡，因 426
此穆斯林或锡克教徒也可以像印度教徒一样担任国家的总统（主要是礼仪官员，但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萨尔维帕里·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5）从1962至1967年担任印度总统，他一直站在向西方推广印度哲学的前列，并创立了一套对所谓“现代印度教意识形态”的通俗解释。他强调在现实世界进行工作的重要性，批判那种脱离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人生观。在这方面，他修正了吠檀多不二论的一些观点。他也受到南印度毗湿奴派（Vaisnavism）思想的影响。他还批判西方科学唯物主义，因为这种哲学没有给宗教的直觉和经验留下生存的余地。

独立后的印度改革了传统印度教的妇女法，但是没能大胆地与穆斯林法律相结合。此外，还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包括试图采用美国所谓“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各种措施来减小不可接触制的影响。各个地区迅速现代化的影响也扩展到印度的中产阶级中，一些在西方开始产生影响的印度教宗教运动，也在印度人中间发生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向国外输出印度教古鲁、瑜伽和祭献物的最好时期。伴随着绿色革命、工业化和其他因素而出现的更大的繁荣（虽然贫穷还是很严重的），旅游业的兴起大大提高了整个印度教圣地的声誉，也加强了全印度的宗教崇拜热情。

当维韦卡南达—拉达克里希南式的现代印度教思想成为重要意识形态的时候，一些非吠檀多不二论的学派，还有如泰米尔纳杜和斯里兰卡的湿婆悉檀多派这样的地方学派，也开始公开宣传它们自己。大量的出版物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印度思想和哲学的各种流派中。印度传统会出现一种绚丽多彩的前景。在印度政治中，一种比

较保守的印度教徒的观点也发展起来，这种观点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印度教国家，而不是1947年出现的那种多元论国家。但是，印度是一座包含着各种种族、教派和语言等矛盾的易燃的建筑物，选择多元论国家——事实证明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印度共和国还把印度划分为主要以一种语言为基础的许多个邦，这种政策则促使各个地区发展自己本地的语言和宗教传统。这样便引起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分裂，并且导致20世纪70和80年代锡克教徒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发生的教派纷争。

少数派宗教和它们对现代化的适应

此时，谈谈少数派宗教是十分必要的，看看它们是如何对待现代化以及如何生活在印度教多数派的环境下的。这些少数派宗教有袄教徒[1]、耆那教徒、基督教徒和锡克教徒等。有关穆斯林的问题（我
427 们将在第二十章论述），在这里只是谈谈他们在印巴战争中实际上是忠于印度的，印度也的确帮助了孟加拉的穆斯林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还经常发生一些偶然的地方性教派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

耆那教徒长期以来就与印度教社会融合成一个整体，在摆脱英国统治后也没发现什么特殊的问题。在现代，他们也经历了一些宗教复兴的事情。耆那教徒是以商人阶层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给了他们许多新的机遇。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在复兴传统印度方面的研究也刺激了耆那教徒去珍惜和复兴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传统，他们出版了各种出版物，建立了一些学术机构，如在西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建立的拉尔帕伊·达尔帕特巴伊印度学研究所（Lalphai Dalpathbhai Institute of Indology）等。

在18世纪时，孟买开始发展成为一个主要港口，并逐渐变成印度最大的城市之一。琐罗亚斯德教徒的社团主要建立在印度的西海岸，他们集中在孟买，学习英语，并与英国人相交往。国大党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些大人物都是帕西人，如达达拜·纳奥罗治（Dad-

---

[1] Parsis，又称琐罗亚斯德教徒、拜火教徒或帕西人。——译注

abhai Naoroji,1828—1917)。

1947年以后,袄教徒的社团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松散了,比如在帕西人的企业中越来越多地雇佣非帕西人。虽然这种社团充满危机,但是仍然受到尊重。一些帕西人也出现混合婚姻:非帕西族妻子所生的子女算是帕西人吗?印度的法律仍然承认一些教派传统中具有消极意义的规定。虽然这种情况使帕西人的集团削弱了(这种危机还不同于美国正统犹太人的危机),但是有一种新的刺激却来自于海外的帕西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帕西人移居到伦敦、加拿大、美国、香港和其他一些地方。这个海外集团在思想上几乎没有传统的观念,他们正以适当的方式对印度帕西人产生着现代化的影响。

传统琐罗亚斯德教对待死者的方式是把尸体暴露在寂没塔(Towers of Silence or dakhmas)上,由于实践上的原因这种方式现在正在衰退,大多数地区的帕西人是实行火葬。由于西方学者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兴趣不断增长,这大大促进了帕西人——尤其是海外定居的帕西人对琐罗亚斯德教的研究,并且是以一种新的深奥方式来阐述这种宗教。

在许多方面,基督教徒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应是非常有趣的。基督教徒显然在某些方面是被怀疑的人,因为他们属于殖民主义势力的宗教,即使许多基督教徒已经与民族斗争相结合,并且与甘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基督教要表现其本来的命运,它所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必须把印度的形式引进到自己的礼仪、精神修炼和思想模式中。在仪式中,通常都是用印度的食品(bhajans),并且结合虔信派的吟唱风格。天主教徒也采取印度式的弥撒(Indian-style Masses)的方式进行精神体验,抛弃了许多 428
欧洲人的实践方式,如用有靠背的长椅等。在这方面,他们的行动受到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改革传教的支持。班加罗尔(Bangalore)的达摩拉姆学院(Dharmaram College)与罗马的一个研究中心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印度哲学,以详细阐述基督教的信仰。还有人关注其他各种各样的经验和倾向,这些经验和倾向使印度的基督教徒具有强烈的印度风味。达摩拉姆恰巧属于托马斯基督教派(Thomas Chris-

tians)的传统,我们可以把这种教派看作是印度基督教的古迹。他们也像其他基督教团体和修道院一样,运用印度教和佛教的瑜伽和禅静方式来深化基督教的精神生活。

20世纪20—30年代,锡克教徒在旁遮普卷入了一场控制宗教庙宇的斗争。锡克教徒中有一种危险的观点,认为人数不断增加的锡克教徒将会逐渐处于印度教徒的包围中。在19世纪后期,为了教育和宗教的目的,锡克教成立了"辛格·萨巴"(Singh Sabha,地方会议),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这种趋势。但是,神庙仍然控制在乌达希斯(udasis)的手中,乌达希斯并没有使锡克教徒在外表上保持一致。这种情况的产生,部分原因是由于戈宾德创立"卡尔萨"社团以后所产生的保守势力。在戈宾德以前的圣者们,一直管理着神庙。有关神庙的斗争是由具有军事性质的政党——阿卡利达尔(Akali Dal)挑起的。

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的过程中,锡克教徒发现自己实际上是站在印度教徒一边的,穆斯林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这就使大多数锡克教徒忠实于新的印度共和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锡克教徒要求保持他们在法律和其他方面的特殊权利,并且不断鼓动在旁遮普建立一个锡克教国家等。印度中央政府坚决抵制这种要求。正因为如此,1984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总理被她自己的锡克教卫兵所暗杀。几个月之前,她曾命令印度军队进攻阿姆利则的金庙,锡克教青年极端派领导人宾德兰瓦尔(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躲进了金庙里的一个要塞。

印度宪法从法律的角度把锡克教徒视为印度教徒,但是许多锡克教徒则希望把锡克教建成一个具有自己权利的独立宗教。在这方面,他们得到现在居于海外的许多锡克教徒的支持,特别是居住在英国和加拿大的锡克人。在英国和加拿大,有少数人信仰一个脱离印度共和国的独立的锡克教国家,并为之取名为卡利斯坦(Khalistan)。

西藏的宗教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西藏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几乎没有受到外部文化势力的明显影响。1903 年，在弗朗西斯·扬哈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人后来成了世界信仰大会的创始人）将军率领下，一个英国远征队攻占了拉萨，强迫西藏签订了一个向英国人开放外交和贸易通道的条约，中国于 1906 年非常勉强地签署了这个外交协议书。英国人的这种行动，是阻止俄国人在这一地区南下计划的一部分。1951 年，中国共产党与达赖喇嘛签署了 429
一个协议，允许继续神权统治。

1959 年在西藏东康巴（Khambas）一带发生了叛乱，这个叛乱很快被中国政府平定下去。但是，达赖喇嘛与数千名佛教徒和其他人却逃离西藏去了印度。达赖喇嘛，原名为丹增嘉措（Tenzin Gyatsho），这位颇有才干和神授能力的青年人逃离西藏后，逐步在北印度的达兰萨拉（Dharamshala）建立起自己的总部。很多西藏佛教徒流亡海外后，在西方许多国家以及印度建立起自己的社团，并且在西方传播西藏式的佛教。这就导致了一个有关喜马拉雅山研究的大复兴，也加强了对大乘佛教的认识，因为在藏文的翻译文献中还保存着许多重要的大乘佛教典籍，而这些典籍在别的地方早已失传。这种复兴也增加了佛教作为一种在西方能生存的宗教背后的各种势力。

当然，西藏式的佛教还流行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如西北印度的拉达克（Ladakh），尼泊尔的部分地区和沿喜马拉雅山山麓的一些地方。自 1959 年尼泊尔向西方开放自由通道以来，尼泊尔国内也发生 430
了很大变化，卡特曼杜山谷（Kathmandu Valley）地区的印度教—佛教社会深受旅游业（20 世纪 60 年代处于反文化全盛期的嬉皮士，经常去尼泊尔观光旅游）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在印度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中，印度教和佛教一直并存于这个社会之中，而事实上一直到 11 世纪在次大陆才出现正规的宗教国家。

对现代南亚宗教的反思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文化和宗教的主要变化，是在次大陆的大多数地区引进了英语教育和英国高等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常常在基督教教会的控制下，并且伴随着一种现代思想与基督教信仰能自然结合在一起的观念。事实上，正如现代西方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现代思想与基督教信仰不会自然结合在一起，科学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之间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对于印度和锡兰的居民来说：一方面，采用新的方式把印度教和佛教的价值结合起来已经变成了可能；另一方面，也需要使它们适应现代化。印度社会和锡兰社会的优点在于，它们有一种方法能把民族主义与传统宗教融合起来。这就需要产生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能解决好科学、自由等等类似的问题。维韦卡南达和拉达克里希南的现代印度教意识以及甘地的和谐共存的实践活动，已经实现了这一点。对于穆斯林来说，伊克巴尔的现代主义则是引导人们沿着通向巴基斯坦的道路前进，巴基斯坦发展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不同于军事独裁的体制，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表面的伊斯兰化。这个话题属于更广泛的、现代伊斯兰教的内容(参阅第二十章)。

在斯里兰卡，佛教的价值观与处于少数派的印度教的价值观都能适应民主开放的原则，佛教很轻松地表现出它与现代科学思想的共存性。社会主义思想也很有吸引力：很早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在斯里兰卡开展民主政治的特点。同样，印度的一些民族主义，也被社会主义的方式所吸引。斯里兰卡的问题是，在不使少数派泰米尔人担心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僧伽罗佛教徒多数派的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不幸的是，复兴僧伽罗文明繁荣时期的那种古代佛教的观点，并不符合在斯里兰卡建立联邦制体制的需要。在青年人中间被僧伽罗高中和大学的教育制度所唤起的那种期望得不到满足，因此1971年以后，在一种意识形态保护下，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增多，实现自给自足和共产主义的号召(与克摩·罗吉[Khmer Rouge]的思想相似)就是这种挫折的表现。但是，

正如我们所知，战后的时期正是斯里兰卡历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

印度人是幸运的，他们在自己文化遗产中继承了大量的材料，能够形成一种高级精致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不会疏远民众，而且还能够调动他们的宗教感情，以实现政治的目标（最终是通过甘地这样具有超凡能力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他们并不是被迫 431



在东印度奥里萨邦的普里（Pure, Orissa）市，一个女托钵僧正在向萨拉斯瓦蒂女神（goddess Sarasvati）祈祷。萨拉斯瓦蒂河是印度教的一条圣河，她被人格化为女河神。后来，她演化为梵天大神的配偶，并且作为代表知识和艺术创造的女神被人们所崇拜。

地进行如此激烈的变革，以至于许多传统不得不被抛弃。印度人可以随手拿回他们的传统，赋予它以新的形式，并给它以现代的力量。

这种新印度教的发展满怀自信地宣布，印度教的观念是能普遍应用的，印度教的实践也可以更多地表现给全世界。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这种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印度教的许多内容通过各种方式在西方被接受了。在西方，有许多第一流的、最重要的古鲁（印度教导师），也流行着各种完整复杂的瑜伽实践活动，这些瑜伽有的时候在超觉静坐会（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这是一个在美国和西方流行的印度教新兴教派，它的流行主要是由于英国甲壳虫
432 乐队的推广）中被简化了。此外，在西方还流行着如国际克里希纳意识教团（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 ，简称 ISKCON）这样一些新兴的印度教虔信派运动。这些现代形式的印度教的基本理论是，世界上一切宗教追求的都是同一种真理。这个理论对西方许多人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由于这种影响，各种自由宗教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世界主义观念也增长起来。所以，一种新印度教的意识在未来将被更广泛地信仰起来。所有这些发展成果都表明，具有积极启示的传统印度教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这种宗教已经不是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种姓制度下的人所认定的那种宗教了。

我们还发现，从上个世纪以来，印度教徒的海外移民不断增加，他们移居到东非、南非、斐济、毛里求斯、塞舌尔（Seychlles）、圭亚那、西印度群岛、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大部分人都是向种植园输出的劳工。近年来，由博士、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才组成的中产阶层也来到西方世界，例如，在美国洛杉矶的马布里峡谷（Malibu Canyon）有一座令人喜爱的南印度式的神庙，就是由居住在南加利福尼亚的一批富裕的印度人出资兴建的。这种流行在海外的印度教，有一种摆脱种姓制度严格要求的倾向，并且与雅利安社、神光运动（the Divine Light Movement）和罗摩克里希那吠檀多传教会（Ramakrishna Vedanta Mission）等运动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这些印度教徒也喜欢参加基督教新教的圣灵降临节和其他的一些充满感情的活动，而基督教新教的教徒也支持印度虔信派宗教的情感。移居海外的印度

教徒在现代印度教的呼声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加强印度教传统中那些作为普遍信仰的启示。

简言之，印度共和国以及更广义的印度文化现在能够充分利用它的各种资源（当然是有选择的），目的为了创立一种既有多元性又有统一性，既包括古代又包括现代的印度教。与此同时，一些小的印度宗教也在新印度迅速发展，其重要原因是由于世俗主义的宪法中蕴涵着多元论的因素。印度教已经进入世界的舞台。佛教也进入了世界舞台，它创造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小乘佛教的现代主义，即使僧伽罗人的新古典主义佛教还没有产生一种在内部与少数派和解的理论：现在虽然还没有在佛教徒中的“印度教理论”，但是有了在印度教知识分子中间的“佛教理论”。

由于西藏的事件，佛教在世界范围内是获益的，因为佛教的思想和传统，通过达赖喇嘛和许多其他西藏佛教徒和流亡者的著作，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在以后讨论海外移民时，我们再谈这些问题。有关现代伊斯兰教以及它的困境和成就，我们将在第二十章讨论，届时人们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

第十七章　近现代的中国与朝鲜

中国在殖民地时期的困境

435 18世纪,特别是在乾隆皇帝(1711—1799)统治下,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整个清朝时期,乾隆治下政府机构效率极高(后期政府倒是毁于腐败),并且艺术也在政府的鼓励下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倒也不乏讽刺意味。当时与欧洲列国的接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像19世纪那样受到威胁的情况。那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怀有普遍的敬意。更早的时期,西方的耶稣会士利马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以他的天文学和其他知识给中国朝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尽管在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修士的请求下,梵蒂冈教皇拒绝了利马窦关于应允许中国基督教徒按照儒家的方式祭祖的建议。梵蒂冈的决定使原本支持耶稣会士的康熙帝(1654—1722)大为不快,因此使基督教在中国朝廷的影响遭到削弱。尽管如此,中国与欧洲,接着又是与美国的冲突直到19世纪才真正爆发。

英国海军在"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登上了世界海军霸主的宝座,东印度公司也因此垄断了对中国的贸易而大受其惠。中国当时有许多商品包括瓷器可供交易,但最重要的商品是茶叶。英国市场对茶叶的需求旺盛,而中国市场对欧洲或印度的产品却没有同等的需求。尽管鸦片贸易在中国是非法的,但当时中国市场只有鸦片的交易是增长的。1839年,清朝的钦差大臣终止了广东与海外的贸易,并且查封了外来交易的鸦片,英国方面以此为由决定对中国宣
436 战。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署了《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诸个口岸对英贸易,英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开设领事馆,香港割让给英国,由此开了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河,同时还在中国一系列口岸城市划出了属于欧洲列强的租借地。中国也逐渐地丧失了海关管

辖权，西方国家，还有后来居上的日本，迫使中国仰其鼻息而行事。

当时的中国还面临其他一些问题：已经划归为中国一个行省的新疆穆斯林在造反，中亚面临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夹在日俄争端中的满洲里的归属权等等。但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如何应对欧洲施行帝国主义的海上霸权，特别是1856—1860年的英法与中国的战争不仅烧毁了圆明园，而且还逼使慈禧太后逃离了北京。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特别是新教的传教活动，也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传统的中国哲学和宗教受到了西方技术（西方海军的坚船利炮是最好的技术例证）和西方精神观念的双重压力。为了抵制这些力量，多半是出于直觉而并不了解这些力量背后的精神动力，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5），这场神出鬼没的反叛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杀戮。太平天国运动在形式上与当时诸多的反叛活动并无两样，但对中国怎样回应西方却留下了良多教训。

洪秀全与新宗教

太平天国运动既是宗教的又是政治的。它取名于"太平"即伟大的和平之概念，这是中国历史上道教历次革命所沿用了近两千年的理想。这个概念起源于儒家的经典，意指远古的黄金时代所具有的伟大和平，或许也可以翻译成"伟大的和谐"。中国的皇帝们经常自以为肩负着恢复这种伟大的和谐的使命。但是它也为人们，特别是道教的人，提供了期待太平盛世的理想：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推翻了汉帝国，其引人注目的口号就是"天下大吉"。摩尼教徒和道教徒在意识形态方面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并且提倡由无为而治创造社会的和谐，其依据也是太平的理念。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洪秀全（1813—1864）运用了同样的理念。他本是客家人，即广西和广东省内的一种说少数民族方言的人。由于感觉受到邻近的族群的欺辱，加之洪秀全宣传他受到神的启示，命令他率领人马开展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客家人因此也就武装起来了。洪秀全曾屡次参加政府用人的科举考试，结果都名落孙山。后来他

从一个叫梁发(1789—1855)[1]的中国基督徒那里得到了一些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并开始与基督教接触。而真正影响他生命的转折点，是他在生病的幻觉中见到天父(耶和华)和耶稣的经历——他回忆说在幻觉中耶稣称他为兄弟。他从天神那儿得到了一枚被视为建立天国象征的印章、一把驱魔的利剑和一些神圣的经文。他自称新救世主并自封为太平天子(即太平天国的真命天子)。在他的族弟冯云山(1822—1852)[2]的帮助下，他们聚集起了具有反清倾向的革命武装。他们也从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秘密会社如三合会(Triads)的思想中得到一些启示。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太平"的理念充满活力，其中一些因素也表现在一个世纪之后的共产党人身上，如男女平等、尊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废除儒家经典、破坏偶像和反对其他宗教崇拜、土地归国家所有、家庭产品归公以及各级权力实行军政合一。在太平天国发动的内战中，这些内容并没有全部得到实施，但是却反映了这些人想大刀阔斧地重建中国的崇高理想。这个过程表现出来自西方新教的明显影响，特别是在激烈反对偶像崇拜方面。当时太平天国的反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如革命势力发展迅猛，1853 年攻下南京后随即改其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太平天国军队的北伐直逼满清朝廷的首府北京，只是在天津受挫之后才给予满清以喘息之机…… 这一切让西方传教士感到欣喜，以为这象征着中国正在转变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西方人在仔细观察了太平天国中西相杂的宗教理念之后发现，中国的基督教化只是个幻觉。西方人最终还是卷入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指挥洋枪队攻击太平军的是戈登将军(General C. G.

---

[1] 梁发，在胡绳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记录此人为"梁阿发"(参见该书第 100 页，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在周南京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中，记录此人为"梁发"(参见该书第 75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原英文音译为"梁伯"，以姓氏加"伯"、"姨"为两广人尊称成年男性、女性的习惯，又南方人多喜欢在人名前加"阿"字，所以三种情况皆说得通，而此人真正的名字应以"梁发"为准。——译注

[2] 冯云山是否为洪秀全的族弟中国史书没有明确的说法，只是说他是洪秀全的好友，做乡村塾师。倒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家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疑英文原作有误。——译注

Cordon,此人后来在非洲哥土穆[Khartoum]战役中被马哈迪[Mahdist]起义军击毙)。

中国清政府的军队使出了浑身解数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遭到四处蔓延的太平天国威胁的儒家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却在政府的军队里被加强了。1864年,南京失陷,洪秀全本人也在南京被围困期间病死。一年之后这场巨大的反叛运动才被镇压下去,但这场反叛运动使大约2000万人丧失了生命。

洪秀全可能有一种直觉的判断,即中国在受尽屈辱的鸦片战争中被西方人击败之后,原国家政权的气数已尽,又该到了改朝换代的时期了。但是他的基督教新教式的萨满天性,尽管充满天启的魅力,绝对取代不了儒家意识形态所能产生的作用。然而在伦理和社会生活层面,太平天国热情的清教思想(如禁绝鸦片、烟草、酗酒等等)和男女平等的政策还是行之有效的。通过"拜上帝会"订立的规则,洪秀全等人简化了虔诚的宗教崇拜仪式并使之易于施行;通过反传统、 439
破坏中国传统的寺庙之类的活动,他们希望表达一种新的命运感。他们编造了一些神话来证明新的和谐时代的来临并宣称自己承担了救世的责任,甚至编写出了充满美好命运前景的救世之歌。但从基本精神和教义方面看,至少可以说这场运动是很虚弱的。他们对西方之所以强大的深层原因缺乏真正的了解、不懂科学的本质与重要性,也不懂新式教育制度的必要性。尽管他们用解读基督教经典(《圣经》)的考试替代了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考试,但这并没有对反思中国的问题提出根本性的挑战。

总而言之,"太平"的理念经不起逻辑的推敲、过度神秘的运动性质也难于使之持久。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与农民造反是大异其趣的,它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自觉地教育其民族以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太平天国的革命目标有点不伦不类,它比其他农民造反要深刻一些,但较真正的革命又失之浅薄。像发生在诸多社会中的情形一样,太平天国运动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前的骚动,它对真正的社会变革既缺乏准确的了解,又没有保证完成最终目标的机制。但是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最迫切的问题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敲骨吸髓的压榨,正在土崩瓦解的中国必须迅速寻找到复兴自强的思路和具体

步骤。不过当时困扰中国的还有其他一系列形势严峻的反叛活动：中原有捻军造反，西北由于民族歧视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回族起义等。

自强运动

到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渗透到自满洲到广东、自天津到云南的口岸，根据与中国签署的一系列通商条约，西方人可以在这些地区居住并开展贸易。尽管这些地方体现了中外交往的力量悬殊而导致的对中国的不平等，但还是为这些地方带来了商业和信息方面的刺激。这也诱导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和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现象称为“买办”阶级，“买办”一词是从葡萄牙语借用过来的。同样，西方传教士也发挥了作用，尽管他们看待中国宗教和文化的态度是极其傲慢的，但他们确实像在印度所做的那样，在中国也按西方的模式开办了高等教育。中国的确也从西方科学教育中受到了益处。

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将西方科学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信仰结合起来。有句流行话说，中国学问重体，西方学问重用，中体西用果真能协调起来吗？但是，的确有不少人试图使这种中西学问的结合成为可能。

中国人当时推行了一种名为“自强”的运动，这是被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所逼出来的。冯桂芬(1809—1874)是这场开始于1860年代的运动的倡导者，而激励他行动的是此前一个学者所说的名言：
440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场运动推动了一系列项目的实施：创办外语学校、兵工厂、码头、选派赴美留学生、航运通商等等。但这些小打小闹的项目对于偌大的中国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太平天国的动机是对的。因为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就不可能在古老的中国立足。庞大的中华帝国仍然被遵循古代儒家和其他诸家的价值观的集权官僚所把持，其社会仍然陷于封建的牢笼之中。这个社会并不了解科学与批判精神以及与人类知识的本质概念之间的关系。

至少人们此时该重新评估一下儒家传统，当代新儒家思想也应

运而生了。这是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我们也该提一下李鸿章(1823—1901),他是权倾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虽然在个人生活小节上不无瑕疵,但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对自强运动施加影响方面都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但只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推动它。尽管他竭尽了全力,但他还是阻止不了1895年甲午之战中中国败于新崛起的日本。到1901年他逝世时,他仍感到自己的努力并未使中国的颓势有任何改变。

李鸿章内心的沮丧也来自如下一些因素:他目睹了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排外的义和团起义失败后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898年的戊戌变法活动与康有为(1858—1927)的经历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康有为出生于中国南方的广东,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来自其祖父的家教(因他幼年丧父)。青年时代他一度对儒家思想很失望,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大乘佛教、道教以及西方的思想和学问。但是他最终还是相信改造儒家传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他强调孔夫子的核心价值——仁,认为其是自由、平等思想和有效变革的核心。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有升平世和太平世,太平盛世往往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在未来的大同世界,传统儒家的价值会被大同的价值所取代,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只能采取渐进的改良主义策略。他建议以儒教为国家宗教,这个提议在1913年的中华民国立法过程中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为光绪帝的政府所接纳,参与了百日变法,颁布了相关的变法条例。但是变法者不成熟的政治活动遭到了朝廷内部保守派的激励抵制,变法条例立即被废止了。无论如何,这次变法至少导致了清朝机构上的某些变化。1911年支持清朝政府的军队崩溃,中华民国遂宣告成立。1912年满清最后一位皇帝宣布退位(尽管之后又有一些波动包括在地方军阀[张勋]的复辟活动和伪满洲国中重新做皇帝,但在共产党的控制下他继续留在他自己 441
的紫禁城里做花匠)。

民族主义与其他选择

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蛮横态度和破坏行为导致了中国民

族主义意识的高涨。中国感觉自己正在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蚕食：在西部，英国势力正在逐步控制西藏；在中亚和满洲里俄国正在向前推进；在朝鲜，日本正在巩固自己的势力；在中国的各通商口岸，西方列强不断地加强其控制，有些已渗透到水路所及的内陆地区。

实际上，中华文明并没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外交部，甚至就没有设想过要平等地与外国交往。自大的中国皇帝认为外国人只配来朝贡并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出长城之外的地域是不在中国人想像之内的，他们仅有的印象是受到过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向狄夷的入侵。甚至满清政府都有被中原人视为外人之感，中国人对满清政权的忠诚一直是大可怀疑的。

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实际上很想革新儒家经典：重新改造新儒家的传统以使这个传统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但不幸的是这个实验难以实现，因为儒学是与传统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相联系的，而这个制度在1905年已经被废止。如果中国的皇室像日本那样早一点选择走现代化之路，改造儒家的前景可能会光明得多。但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中华帝国体制的立国思想是，中国永远优越，而外国是文化上的蛮夷。同时，佛教被断章取义地用以表达中国的民族主义，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佛教思想家太虚（1899—1947）大师鼓吹佛教复兴运动，通过禅坐修炼来提高佛教徒的教育水平，而并非太在意成为爱国主义者。道教则与中国的秘密社会有关，其兴趣在中国内部的反叛，而不是要恢复中国在帝国主义掠夺的时代所失去的尊严。然而，道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很难发展成为科学的思想体系。

在西方诸意识形态中，自由主义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从贵族阶层的眼光看，也是与儒家思想相通的。但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社会中缺少这个阶级，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总是与外国资本系统有千丝万缕的瓜葛，由此而大大削弱了其获取政权的机会；另外一个原因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权力掌握在清一色的军人手中，在这个背景下不可能有资产
442 阶级政治；最后一个原因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之间有壁垒——或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教育，或接受的是全新的西方教育。

回答中国历史难题的另外一个民族领袖是孙中山（1866—1925）。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意识形态有基督教的色彩，因此他的答案也有局限性。像其他杰出的国民党领导人一样，他也是中国民族的边缘分子。出生于中国南方靠近澳门的一个地方，他在夏威夷和美国其他的学院接受了西方式教育。他因文章而在国际上出名，在 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他也是问鼎总统的有力人选。但是好景不长，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军阀袁世凯（1859—1916）窃取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并开始镇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际上直到 1920 年代初，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苏维埃俄国的帮助下才真正成熟起来。莫斯科当时派来给孙中山当顾问的是大名鼎鼎的米哈伊尔·鲍罗廷（Michael Borodin，1884—1951）。

国民党的思想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
主义和民生主义——及他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将建
国的构想分成三个时期，即军政、训政和宪政，而国民党最好只做训 443
政党。由于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而且共产党也成为国民党的一个
组成部分①，孙中山的思想自然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国民党在广
东成立了黄埔军校，年轻的蒋介石（1887—1975）出任校长，他后来使
中国陷于非民主的训政困境，尽管也有人认为他是在向民主迈进。
但是在他的军事独裁下，人们还有什么好期待？1925 年，孙中山谢
世，他所领导的政府变得前途未卜。

中国虽然饱受外国的凌辱，但还不是全然的殖民地。如果她只为某个列强所控制，那中国的政治斗争将会更明朗些。1900 年的中国，一半是自主的，一半是由外国列强会议控制的。只在某些情形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才一目了然，例如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学生们感到凡尔赛和约出卖了中国，因此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是，中国在山东的主权被从战败的德国手中转移到了与中国同样为战胜的协约国——日本的手上。

---

① 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并无共产党是国民党组织中一个部分的说法，只是共产党同意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译注

这次运动激发了人们对新的政治选择的更大兴趣，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受到欢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了全世界，因为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亚洲的诸多民族为这场革命所深深吸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它与国民党的合作，是使中国恢复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另外一种选择。最终的结果是，在重建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1893—1976)的思想和策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反击西方列强，中国必须向外国求教并采用了西方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1]比最极端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更加蔑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宗教。我们也必须看到，毛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某些修改，以使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与新中国

毛的崛起与抗日战争

1926年，蒋介石成功地从南方开始了统一全中国的北伐。1927
年，在攻取了上海之后，他杀害了那里的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这证
明毛的斗争主要只能从农村开始而不是集中在城市里面。毛清楚地
444 抓住了两点：由于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农民是中国历史上革命的
主力；另外，革命的策略是武装斗争。毛后来成了发明游击战的伟大
理论家。这一点就明显可以看出他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
因为后者把城市的无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先锋主力，而且把资本主
义阶段看成了工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准备(由于这个原因，当然也
还有其他原因，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9—1953]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支持的反而是蒋介石和国民党)。

从1927年到1934年，毛领导着在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并与国民
445 党开展了几次反围剿战争。那时的共产党人为了突破围困开始了著
名的万里长征(Long March)，以便他们从江西到西北的一块飞地与
其他共产党力量汇合。这次长征是一个英勇的壮举，其间经历了各

① 指马克思主义。——译注

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领袖,但却被中国人极端地崇拜。他是中国人的上帝。他的哲学,通常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在他死前一直是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毛生长于湖南,是一个小富农的儿子。他13岁被迫于农活,之后很快便厌倦了农村的生活,先后考入中学和长沙的师范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投笔从戎,见证了满清的垮台。之后他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后来他深受"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0年,他担任了长沙一所小学的校长。1921年,他参与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还隶属于国民党。[①]因之,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还倚重共产党人,毛也就有机会在江西搞起了农民的武装运动。他的行为并不符合马列主义以城市无产阶级为先锋队的正统观念。后来蒋介石的军队打垮了江西的苏维埃,毛和他的同志们被迫进行英勇的长征,大约在经过了一年多的战略退却之后,最终于1935年到达了中国西北的延安。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确定了自己在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他们在延安壮大了势力并与国民党联合抗击日本人。在日本人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又开始与国民党人打开了内战,结果于1949年征服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大陆。最初中国模仿苏联的方式发展,可是到了1957—1958年,毛又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大跃进,虽然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但给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然后,主要是从1966—1969年,他又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动荡。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浪漫主义的成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他的某些语录被编成了红宝书,其性质类似于大众圣经。

---

① 此叙述有误。最初的国共合作时共产党人曾经被允许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国民党的一部分。——译注

种战斗、饥饿、损耗，行程超过6000余里。最终到达长征目的地时的人员只剩下了最初出发时的十分之一。但它的意义是保存下了共产党主干力量(在长征的过程中毛取得了党的主席的地位)。[1]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此时共产党已经抵达延安)，长征的会师使共产党也可以开展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依靠成功的游击战已经在中国北方立稳了脚跟，这种局面也由于在1945年击溃日本军队并占领满洲里的苏联红军而得到特别地巩固，因为苏联人将这里的政权交给了毛的共产党。共产党因此抢占了蒋介石的先机，终于在1949年赢得了全中国的政权。

毛泽东思想和红色中国的世界观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毛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比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更有主动性，即他更强调人在改造历史中的主观能动性。他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感到失望，在某种程度上他更钟情于道家的无政府主义和返璞归真的理想。20世纪50年代初，他开始背离苏联的发展模式，担心那种模式会产生脱离群众需要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

最终，他还是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1919年“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文化革命”的回声)，这场革命把当时的教育体制基本上都被冲散了。书本和知识遭到唾弃，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冲向农村去摧毁那里的党政机关。毛希望看到社会沸腾起来，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他有着急躁不安的幻觉，想要增加人类的福祉；他认为虽然中国人一穷二白，但可以依靠他们的信念和努力超过他人，建成一个男女平等、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无阶级社会。

这里没有必要纠缠在中国1965—1976年间是是非非的共产党权力倾轧之中，随着毛的谢世，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宣告结束了。

---

[1] 长征过程中，特别是遵义会议实际上在军事上确立的是周恩来、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党的总书记即最高领导是张闻天，毛泽东当共产党的主席是在长征结束之后，即在延安的“七大”之后。长征途中“毛主席”的称呼是沿用江西苏维埃主席的头衔。——译注

不过在此期间却开展了重构社会的激进的实验。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对毛的极端吹捧，无休止地引用由林彪（1907—1971）编撰的毛主席红宝书中的语录。林彪对毛的吹捧使他当上了毛法定的继承人，可是后来他又在刺杀毛的阴谋败露后死于叛逃苏联的途中。而文革中为了建立对毛的绝对忠诚，一切东西方的传统学问都遭到了彻底的批判。



仪式层面：从毛泽东著作中选编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成为人们信仰的宝库和象征。图中的学生们用红宝书表达他们对毛的忠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段生涯和中国的这段历史迫使我们反思一个问题：中国此时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文化革命的宗教特色在诸多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从一个方面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是宗教的世界观并不重要，但它们肯定是一套信仰和实践系统，在某些历史的重要时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仍然是这样，它们仍是中国人的信仰范式，被用来抵制其他宗教，如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以巩固其现存的世界观。无论如何，用宗教的参照系来思考毛泽东思想是有说服力的。 446

首先，记录毛泽东语录的红宝书在文革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其性质如同宗教的神圣经典。人们到哪儿都必须带着红宝书并且集

会时就高高举起，将它作为论争的依据和行动的指南。人们在游行
集会时、并斗私批修的大会时，都要视红宝书如同毛的神圣体现，毛
被作为伟人的舵手受到普遍的崇拜。（毛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男
女平等主义者，他也许不会反对用这种译名——“舵手”，一个无性别
歧视的名词——称呼他）。其次，人们对毛主席倾尽了感情，硬是把
他当作阿弥陀佛，人们不断地在谈论对毛的无限忠诚使人脱胎换骨
并且心灵得到净化的经历。第三，在理论上人们要掌握毛泽东思想，
或宽泛一点讲是马克思主义，这不仅使他们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还给
他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第四，中国历史提供了强烈的反差：旧中国
447 积贫积弱、腐败不堪、任由西方列强宰割，而毛创建了共产党，在江西
领导了神话般的反围剿，甚至领导了更具英雄气概的万里长征、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等等，毛泽东创造了无数的神话，这也包
括说，靠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强信念治愈了病人，激发了人的豪迈壮举
等等。第五，那个时代有严峻的伦理。那是建立新中国所必须付出
的自我牺牲，必须与农民同甘共苦①，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废除特
权等级思想（甚至是传统儒家的孝道）。这种伦理风气直接反对儒家
的循规蹈矩、长幼尊卑观念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礼节。第六，出现了
新的贵族阶层，即干部。用红宝书武装起来的年轻人形成了反潮流
的文化和组织以反对党政机关的当权派，在街道和农村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没有僧侣名义的宗教虔诚活动。第七，那时也产生了奇特的
文艺。那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式的、既采用西方器具又无资产阶级修
饰的、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反映被神化了的英
雄事迹。

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它在感情和思想方面继承了道
448 教（老子的无政府主义及对炼丹的执著）和佛教（净土宗，毛不时地被
人视为降世在北京的真身佛陀）。正是经受了这种宗教的考验，现代
中国得以形成，尽管经常有反弹。

与此同时，其他的文化传统却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旧时代的
寺庙都被关闭或者改造成了粮仓库房等。经文和书籍也都被付之一

① 上山下乡、下放农村等都是出于同样的理论设想。——译注

炬。绝大多数宗教活动被禁止了，偶像被捣毁，祖先也不再受到祭奠，扫墓、登山祭神也在禁止之列。僧尼回到田间劳动，《圣经》成为禁书，穆斯林受到歧视。总之，这是一个[传统]宗教[1]和其他意识形态受迫害的时代，甚至到现在，那些可能导致传统文化活动复兴的场所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中国新时代

1976年，毛泽东去世。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再由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在内的"四人帮"极左派所控制。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更讲求实效的时代。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指导之下。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开始争论，如何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引进西方科学教育、贸易和技术相结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中国又回到了她一百年前所起步的地方，所不同的是现在她具有了新的形式。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儒家的文化价值与西方的实用方法之间的关系，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与西方实用技术之间的关系。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被派往西方去接受教育，文革中的教育政策被否定，中国急切地想要弥补过去的损失，以建设一个更新的、更繁荣的社会。但是不给人们自由行吗？因为西方制度(这里也包括日本的制度)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种差距也令许多中国人痛心疾首。实际上现在中国又陷入了她过去的历史争论(如中西体用之类)之中。

但总的来看，今天的中国是处于一个宽松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躲躲闪闪的宗教也可能公开活动了。老式的宗教活动也在慢慢地恢复，但是中国传统的三教合一的体制已经被摧毁了，不可能恢复到其革命前原来的样子。我们估计，任何新的宗教形式的出现都必须包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因素。

---

[1] "传统"一词为译者所加，因为对毛的造神运动如果即是一种宗教活动，则其迫害宗教活动则只能是指对其他传统宗教的迫害。——译注

对当代中国的思考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将使中国（以及西藏）的宗教面貌发生永久的变化。毛逝世之后，中国的宗教开始缓慢地得到恢复，宗教的定位相对地讲是个人之事，其意为宗教行为主要是个人的自我选择，因此不会再出现历史上那种三教合一的局面，因为那种三教合一的局面是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有组织的结合。而照西方概念来看，这
449 三种文化传统多少都还有可能发展成为三种相对独立的宗教（就像当代印度的情况一样，“印度教”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现在却成了印度人自觉的宗教）。

中国近代历史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与波动，但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其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往马克思主义，普遍地对自由主义感到失望，对传统宗教的现代形式所知甚少，所以在选择上就有很大的局限。如果蒋介石不篡权，中国不陷于抗日战争，国民党可能已经走上了自由主义的道路。话虽这样说，实际上中国当时会走上其他的什么道路谁也不好预测。

海外华人

我们还应记住，中国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一方面被打垮了的国民党逃到了台湾，他们仍以中国自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发展现代科技的同时还保留着古老的中国传统。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香港，那里的主要居民是中国人；她于1997年已回归中国，但却代表着中国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之外还有大量的海外华人；他们散布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加勒比海地区、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在某些地方他们遭遇到很严峻的困难，特别是在越南，那里许多的难民——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逃难船民”，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华人少数民族——受尽折磨。在印度尼西亚，1965年的军人政变使华人的组织和族群备受摧残。在新加坡，居主流地位的中华文化表现得灿烂辉煌，创造了家长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华人表现得十分积极，已经成功地融入了主流社会。

过去的40年，西方人对中国宗教的兴趣一直在增长，特别是对新儒家的兴趣、对中国各派佛教的兴趣以及对道教的兴趣。在新加坡国立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官方强调了儒家伦理价值的重要性。这种强调也许能为其他地方推行儒家的伦理价值教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近现代朝鲜的宗教

朝鲜近现代社会的初期(17和18世纪)，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新儒家的学说。佛教被逐出了朝鲜的首都；尽管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也对朝鲜重要的知识分子有所影响，但朝廷还是严厉地抵制天主教。到了19世纪，天主教不顾朝廷的迫害仍然在朝鲜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在朝鲜被迫与日本签署1876年条约之后，日本在朝鲜的商业利益不断扩大，紧随其后的是日本的传教活动，从净土宗，到稍后的日莲宗(Nichiren Buddhism)都传入了朝鲜。朝鲜自己的禅宗也主 450
要是由于镜虚和尚(Kyongho，1857—1912)的著作而显得有些活跃。

1910年日本占领了朝鲜，使朝鲜的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1926年日本在朝鲜通过立法，允许和尚结婚(这一直被当作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加以提倡)。朝鲜的佛教组织，尤其是禅宗发生了大分裂，只有一小部分保守的禅宗教徒坚持过独身生活，并遵守旧禅宗静默打坐的戒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朝鲜于1954年将禅宗的教务管辖权转交给了严守教规的曹溪宗。此项举措维护了朝鲜近代禅宗的统一性，并使之成为南朝鲜的主流宗教传统。

基督新教在朝鲜的传播速度也很快。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教活动就十分活跃。尽管有日本的占领，但是新教在20世纪的朝鲜传播速度极快。今天的韩国(南朝鲜)大约已有600万基督教徒。从教徒人数比例来看，这也许是亚洲国家中传教最为成功的地方。这里的基督教教派主要有卫理公会(Methodism)和长老会(Presbyterianism)。在朝鲜本地人的领导下，这些教派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福音(evangelical)和圣经(Biblical)的虔诚处处可见。关于基督新教在朝鲜传教如此成功的原因值得争

453 论，但是如下一些因素是不容忽视的：第一，日本在1910—1945年占领朝鲜期间推行的佛教缺乏当地国民的感情基础；第二，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更有利于发展“无传统根基”的宗教：我们将在后面谈到，朝鲜此时发展出了自己的宗教；第三，西方的传教士同情朝鲜人的民族主义；第四，20世纪70年代，朝鲜基督教徒的数量翻了一番。另外，在朝鲜出现经济奇迹时，个人消费主义对朝鲜传统社会的冲击，也可能使人转信新教。

这种情况已构成了更个性化的宗教（以禅宗、新教以及不断增长的天主教为代表）与传统的儒教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反映在政治方面，即民主政治和军事独裁的区别。在北朝鲜听不到宗教的声响，在金日成（Kim Il-sung）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外界很难判断那里的情况，而他向外炫耀的则是他那保守的、不变的共产主义，他的著作倒是以世界各种文字在出版。

从19世纪到20世纪，朝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宗教，以回应儒教的封建传统和基督教传统。这些新兴宗教中最重要的两支分别是天道教（Ch'ondogyo）和文鲜明（Sun Myung Moon）创立的统一教（the Unification Church）。



朝鲜的儒教：在祭坛焚香祭奠儒学大师。



泰国的舞剧，魔鬼想偷走神奇的珠宝。故事见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印度文化是泰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第十八章）。

天道教于1860年由崔济愚（Ch'oe Suun，1824—1864）所创立，其最初的口号是"东学运动"（Tonghak movement）（以与基督教为代表的西学

相比较)。崔济愚号称得到了神的启示,但却因涉嫌教唆颠覆罪而被处死。崔济愚和他两位后继者的著作被编成了教义,他们的宗教也被称为“天道教”(Heavenly Way 或 Ch'ondogyo)。尽管目前它在南朝鲜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它却被各个方面认定为反叛性宗教,如它策动了 1894 年针对朝鲜王朝的起义,1919 年又积极参与了反抗日本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它主张完全平等,反对根据儒教建立起来的朝鲜等级制传统;它相信上帝无处不在,每人身上都带有神性。它有句最有名的口号:“凡人即上帝”,只要虔诚修炼,人就能与上帝成为一体。它的仪式包括祈祷、仔神附身、念经与坐禅。它将传统的朝鲜宗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义结合为一体,颇具公谊会(Quakerism)的传统。

我们读文鲜明的教义时会发现他是与基督教福音派唱反调的。1936 年,还是个孩子时,他就说自己是受了耶稣的差遣来人间传教。他还说自己见到了佛陀和其他宗教领袖。1954 年他创建了可简称为“统一教”的教会。它的基本教义是:重新解释《圣经》;如果他能完成
454 救世主的使命,人们就应当尽可能地忠诚于文鲜明本人。他设计了新的婚姻制度,以便把教徒们都团结在一个大家庭中,而这个大家庭的“真父母”就是文鲜明和他的妻子。他希望将全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团结在一起。这个宗教在西方也有不少教徒,主要是那里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在修炼方面它主张将宗教与科学融合起来,提倡它的信徒进行跨文化、跨种族、跨民族的婚姻,促进现代所有的企业包括制造业和捕鱼业之间的联合。这种宗教是朝鲜宗教与新教有趣的结合,它以《圣经》为价值取向(加上它自己的经典《原理讲论》[*The Divine Principle*]),但是它所主张的家庭结构,尽管是国际化的,仍然显示出儒家思想的影响。它的神学体系包含有基督教的主题以及东亚传统的阴阳辩证法的因素。由于各种原因,统一教引起了很多争议,但它仍然是朝鲜在西方第一个最大的传教团体。

总之,在朝鲜、在日本都一样,现代化的努力夹杂着各种各样的传统因素,包括本土的萨满教。但是,由于朝鲜被另一个亚洲列强征服,她的发展逻辑就成了另一个样子。统治者的宗教是佛教和日本的神道教,这就使基督教在朝鲜的发展与别处大不一样,别处的基督教是



统一教将朝鲜文化、儒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融合为一体。这个宗教运动把自己视为由文鲜明夫妇作为真父母领导的大家庭。这是1995年汉城举行的集体婚礼祝福的场面。跨种族、跨民族的婚姻被视为反种族主义的途径，文鲜明的书《原理讲论》的目的是建立与上帝亲密无间的美好大家庭。

西方殖民者的宗教，殖民地的人民有抵触情绪。在朝鲜，人们对基督教——这种非统治者的宗教——没有抵触，反而利于它的发展。但是由于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朝鲜被分成南北两部分，要全面描述朝鲜世界观演变的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也应该注意，近代禅宗的发展还是呈现出了强有力的势头，它代表了一种让其他国家也在注目的资源。

第十八章　近现代东南亚

东南亚与殖民时代

455 殖民势力在东南亚的影响相当程度上是逐步完成的。特别地，从很早的时候起，荷兰与葡萄牙就已经渗透到了马六甲海峡，荷兰人及时地在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由于贸易的缘故，英国也逐渐对新加坡和马来亚产生了兴趣，而把婆罗州的各个部分留给了荷兰和葡萄牙，任这两个欧洲强权争来争去。实际上，新加坡可以说是英国人发现的。在19世纪时英国人还夺取了缅甸的南部和北部，把它们当作英属印度帝国的一个附属部分。法国人在这场殖民掠夺中起步相当晚，但他们对越南产生了兴趣，最终实际上吞并了整个印度支那，包括越南的南部和北部，老挝和柬埔寨。美国在189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之后，也把动乱不安的菲律宾当作了自己的战利品。只剩下泰国是惟一没有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国家。

缅甸和印度支那的大部分地区在宗教上都是属于南传佛教的，而越南也有强大的佛教势力。向南，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将在第二十章里讨论它们的发展。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由基督教（具体来说是天主教）控制的国家。

在佛教国家里进行殖民统治的部分结果是通过除去现存的君主政权，从而切断了僧伽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它还惊人地向这些社会中注入了西方文化的教育体制和成果，对传统进行了某种强制性的重新评价。

不过，殖民时代并非总都持续那么长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日本人带入了这一地区，一开始时他们作为亚洲的解放者，因为把亚洲从欧洲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而受到欢呼礼敬。越南战争是1945
456 年日本人被逐出这一地区之后重新开始的反法斗争的继续，尽管越

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告结束，但是基本上说20世纪50年代是标志着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之间的主要界限。

作为对殖民时代的反应，这个地区终于沿着迥异的路线开始演化了。由于天主教的流行以及西班牙和美国的占领，菲律宾的现代化过程有了结果。日本占领期结束后，其宪法的恢复未能足以阻止它滑向军事独裁统治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穆斯林持续不断的叛乱。由于大土地所有者们的存在为共产主义思想在贫苦的农民阶层中留下了市场，所以在很多方面，这个国家都步了拉美国家的后尘。

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异。就这样，在经过了许多年反殖民主义和国内战争之后，一种相当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越南流行了起来。越南当时还有其他一些选择，但是都放弃了：建立在天主教和儒教保守分子支持的基础上的相当右翼的独裁统治；或者在越南战争中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佛教中立主义。老挝和柬埔寨在革命运动的面前曾经试图靠着僧伽的支持恢复老式君主政体的稳定，但是它们失败了。柬埔寨的那场运动被称作"红色高棉"(Red Khmer)，它有着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出于分析的缘故，我把它称作"后佛教的准马克思主义"(post-Buddhist quasi-Marxism)。这种意识形态对这个国家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后来在越南占领军的影响下，基本上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替代。

泰国成功地逃脱了被占领的命运。在那里，一种现代化的佛教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存在着一些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叛乱。和美国的结盟使得它成为资本主义阵营中重要的一员。另一方面，缅甸受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它把社会主义当作缅甸社会维护其有机身份的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的独立时间里，缅甸都致力于孤立自己的运动。它的行为和理念可以被看作是佛教徒的自给自足：这与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多少有些类似。最后是新加坡，这也是该地区非穆斯林政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地方。这个岛上共和国在含混不清的儒教家长式政权下，通过福利资本主义的手段，迅速地进行了现代化。

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较大的民族嵌入在较小的国家或者部落里，从而引发了一些并发症，比如老挝的洪族人、缅甸的克钦人和克伦人

等。他们在一些事件中，比如，在非佛教组织、主要是天主教组织的领导下，与缅甸政府永久性的国内战争中，独立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泰国及其现代化过程

泰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能够幸存到19世纪40年代甚至更晚
457 的时候(当时欧洲的商人正在这个地方变得活跃起来)，基本上是两

蒙固王

蒙固王(1804—1868)是一位佛教徒、改革者、泰国国王，他在东南亚的佛教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1823年以临时身份进入寺院，然后又在其叔叔拉玛三世的领地内长期留驻寺院。他觉得自己在曼谷附近一家丛林寺院里所接受的训练不能让他的才智得到更好的发挥，于是转到了地处首都的一个寺院里。在那里，他可以用巴利文认真地进行一些工作。在后来的一次精神危机中，他遇到了一个孟族和尚(属于泰国和缅甸的一个少数教派)。这个和尚告诉他南传佛教的传统是可信的，并虔诚地信守佛陀的教诲。蒙固王回到他原先的寺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建立起了法宗派。在他的这些改革中，有一项主张是，应当用建立于经验证据基础上的现代化的宇宙观去代替杂含有各种迷信观念的传统宇宙观。他于1851年继承王位，随后引进了各种各样西方的教师和顾问，这些人帮助他对泰国的教育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革。他的行为对于创建泰国现代化的寺院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新的寺院制度运用经典的传统扫除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并且运用现代的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来解释巴利体系的教规。

与此同时，西方势力正在降临这个地区。英国控制了缅甸，而法国则控制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他通过技巧熟练的谈判手段，成功地保住了泰国的独立地位，运用他的地位在英国和法国这两种势力之间盘桓调停。在他死后，他的儿子朱拉隆功继承他的改革事业。

个改革派国王的杰作。第一位国王蒙固王(Mongkut，1804—1868)的生涯很不平常。他受到一位叔叔的眷顾，通过审查获得了继任泰国王位的资格。当时他碰巧正在一个寺院里(那多少有点像是泰国的时尚)。蒙固王仍旧当他的和尚，直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于1851年登基。期间，他成为了一个不错的巴利文学者，并且对泰国当时寺院制度中的许多方面提出了质疑——这导致他按照孟族人的传承接受了宗教改革以及大批的信徒(孟族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结果他创建了一个新的僧伽分支，称作法宗派(Dhammayuttika Nikaya)，意思是“坚持佛法的宗派”，或者用泰语来说，就是 Thammayut。它在泰国的精英分子们当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并且吸引了世俗权势者的保护，这些世俗者既有男的也有女的，既有城镇里的也有乡间的。

后来，当蒙固王成为国王时，他不得不支持整个教派，当然包括支持多数派，虽然他曾经对其仪式以及修行的有效性提出过质疑。但是受到他的特殊关爱的仍旧是他的法宗派，而这个分支教派变成了他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得力工具。他的态度不单是精神上的，而且还身体力行。他深入佛教僧尼们的生活并对其进行改革，还恢复了关于巴利文的研究。从教义上看，他是一个新基础主义者(neo-foundationalist)，回归到了他所追求的关于信仰的教规基础。后来， 458
像西方人一样，他认为佛教教规本质上是理性的和经验的。正是出于这种观点，他最后舍弃了中世纪时用来为国王进行辩护的陈旧的宇宙模式。

根据这种模式，国王处于宇宙的中心位置上。在这里，宇宙被理解为三个层次。最上面的一个是地位较高的诸天，也就是修行者可以通过禅定见证其存在的境界，更具体地说，这一层天是享尽各种福佑和长寿的各种神灵们生活居住的地方。再生在这一层天里，是对无量功德的一种奖励。在我们这个凡俗世界的下面，有一个鬼怪炼狱的世界，那是犯有极大罪恶者托生的所在，在那里，他们忍受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处于中间的位置，即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佛陀显现的地方，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及其各种各样的生存条件，而一个生命体在生命群体中所处的等级位置同样是由其功德善行决

定的。处于这个凡俗世间中心的是转轮王(cakkavattin)或者宇宙之王(字面意思是 Wheel-turner,“转法轮者”——率先转动法轮或者启动义谛的那个佛陀的称号,不过理想的统治者也会被赋予这个称号)。这里所谓的理想通常以阿育王为标准,阿育王变成了东南亚君主们的楷模。在宇宙万物的安排中,国王在维持僧团和僧伽以及提高人们的德行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增长人们的功德,向人类提供更大的机会,使其生命等级得到提升,并且同时赢得尘世间和天国里的福祉。

这是一个可敬的画面,只是呈现它的方式有些陈旧。像天主教和其他传统的宇宙观一样,它涉及到了一个三层结构的宇宙,因此也滋生了大批的神灵,通过这些神灵可以对自然现象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这个画面经过蒙固王加工,已经丧失了它原来的神话色彩。蒙固王把宇宙看作本质上是道德的,而佛教的作用就是提高伦理和精神上的福利。他让自己的外国大臣和亲密同事写作了一本书,以阐明这个经验主义色彩更加浓重的因由。在这本书里,诸天和地狱变成了不太像是心灵状态和有用的教育工具的地方。在神灵方面,关于各种事物的旧式解释受到了大量的讽刺。宗教被彻底精神化了。这是佛教现代化较早也是较为大胆的一个版本,里面充满了自然神论者的神灵。

蒙固王的儿子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68—1910 年在位)继续实施改革计划。他进一步把僧伽集中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并且建立了佛学院,对僧侣们进行更好的培训。泰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佛教徒们终于看到了(有人认为是预示)佛教与现代科学的兼容性,关于缘起法的规律则被看作是一种方便说法,是用来解释作为宇宙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在巴利文体系的教规中有许多自然主义的因素,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佛陀的唯理性和理智主义在它们的经典里得到了明确的显示。因此,泰国现代化的、针对神职人员的新基础主义式教育通过一种现代的方式,对信仰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459 然而,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被强化了,这既与时代精神(人们可能会这么说)相符,也是作为统一国家并把境外地区和文化群体融入民族统一体的手段。这使得佛教以更加有力的方式成为全民族的宗

教，并且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泰国佛教出现了一些带有强烈沙文主义观点的表现形式。但是僧伽精神地位的提高导致了官方宗教和民间杰出的圣人之间的矛盾。这些圣人们达到了很高的冥想境界，因此在世俗的眼里通常拥有神奇的力量。他们在政治生活的外围进行活动。但还是这些圣人，他们总体上发挥着这样的作用：提醒世俗僧伽，它不只是维护社会与国家价值的一个组织，而且还是让世人的精神保持纯洁的一种工具。

君主政体的保存为泰国的政治带来了一定的稳定性，使得它安稳地渡过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种军事政变和政权变迁。像其他地方一样，在佛教徒组织的统治之下，这里也存在着一些有关少数民族宗教的地位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国家南部的伊斯兰教，问题尤其严重。在东南亚的另一个佛教国家缅甸，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人们可能会把泰国的模式看作是有效率的成就，这种成就的获得，基本上是依赖蒙固王及其儿子朱拉隆功的天才能力和远见卓识，这是一种通向现代主义的过渡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没有出现由于外国征服而发生的严重政治腐败，而且君主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保存，从而在新兴的国家政治中发挥了现代主义者的作用。但是在其他国家，尽管君主政体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它们是在外国的控制之下，比如老挝、柬埔寨和越南，都是在法国的控制之下。而且在1975年，由于越南共产党统治的确立，这些君主政体都被及时地扫荡一光了。尽管老挝和柬埔寨也曾经发生过在家人的运动和僧伽改革，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迟缓出现，它们的发展水平都不是很高。不过，柬埔寨由于法宗派僧伽的传人而从泰国的改革中受到了好处。

缅甸的解决方案：从世界中退却

在经过19世纪的三次战争之后，缅甸被吸纳进了英属印度帝国。在1826年的战争中，英国控制了若开（Arakan）和德林达依（Tenasserim）这两个临海省份以及阿萨姆（缅甸于1935年行政独立后，阿萨姆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在1852年的战争中，英国得到了缅

甸的南部，而在1855年的战争中，英国又控制了缅甸直接与中国的云南边界接壤的北部。1890年，英国的版图上又加上了像楔子一样夹在中国和泰国之间的掸邦(Shan States)各省。整个缅甸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从来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过，那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叛乱，其中有一些就是在佛教徒的领导下进行的。例如，在1930年到1931年的沙耶山叛乱(Saya San rebellion)中，一个还俗僧人被宣布为国王，并且赢得了20世纪20年代组成的各种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们的支持，英国军队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把这场叛乱平定下去。

460 事实证明，这种回归君主政体模式的企图在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主义更感兴趣。这些知识分子们混合了佛教徒和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观念，这种特点在吴努(U Nu，1907—1995)的思想和实践中尤其明显。在被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1962年发动的一场政变赶走之前，他曾寻求在缅甸建立起一个佛教徒的社会主义政权。尽管政变后新建立起的政权并未明确地把吴努的政治目的当作自己的工作目标，但实际上是在遵循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并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缅甸才基本上脱离了外国的影响，旅行仍受到禁止或者说是受到严格限制。它还不得不同基督教化的非佛教民族中的分离主义分子们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尽管奈温替代了吴努把佛教当作国教的法令，但是佛教当然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佛教思想中的某些片断对缅甸的孤立主义政策有利。1956年，缅甸僧伽因为在缅甸举行纪念佛陀圆寂2500年的佛教大会而赢得了声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缅甸佛教徒们的禅定方法在斯里兰卡和西方世界也变得有影响力了。

缅甸的孤立主义或许可以解释为古代个人理想在现代社会的集体表现。隐居者或者深山修行的僧侣在佛教传统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缅甸，似乎整个民族都希望退隐出外面更大的世界。他们的想法是，通过这种退隐，缅甸的价值观念可以因此而保持清纯，既不受马克思主义毁灭性力量的玷污(这种破坏力量已经在亚洲的那么多地方对佛教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也不受西方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蚀影响。缅甸的佛教将因此而保持自由，或者稍微掺杂一

些关于神灵的宗教，这些神灵，也就是缅甸人的守护神，就像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农业社会里一样，在森林中，在田野里，在溪水旁组织起武装力量。这些神灵是必须应付的——但是是在佛法的框架之内。我们注意到，不只是缅甸，而且在斯里兰卡的人民解放阵线以及柬埔寨，都存在着类似从资本主义世界退隐的观念，但是在这些事例中，这些观念更加世俗化，也更加政治化。

柬埔寨以及柬埔寨的净化

1887年，在主要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柬埔寨变成了法属印度支那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柬埔寨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作战，而作为一种奖励，法国人多少增加了一些柬埔寨人受到高等教育和进行行政管理的机会。但是更正确的说法是，法国人由于自以为法国文化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坚持进行纯正的法国教育，从而异化了整个印度支那的知识界。

尽管第一次越南战争于奠边府(Dien Bien Phu)以法国败北而告 461
结束，老挝和柬埔寨于1954年在它们自己的君主政体下获得了独立，但是它们却又被卷进了该地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全民武装的斗争中。1975年，柬埔寨的首都金边(Phnom Penh)落入政治上由波尔布特(Pol Pot)控制的红色高棉叛乱分子手中，而波尔布特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979年。随后越南的介入带来了越南控制下的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但是在那之前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和集体屠杀。

所有这些都是在乔森潘(Khieu Sampan，1925—)的意识形态的名义下进行的。乔森潘首先勾勒出这种意识形态的轮廓，然后又在为巴黎索邦神学院撰写的一篇博士论文里把这个环节连接起来。在那本著作里，他分析了自己所认识到的当时柬埔寨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形势。为了得到真正的经济独立，他坚持认为有必要把柬埔寨完全孤立出来，并且回到农业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去。这是一个大胆的想像，他清晰地把它描述出来，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尽管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思考问题，但方向却是非马克思主

义的,因为他朝后去看过去的平均地权论者,而不是透过工业革命的烟雾去看未来。就像一位同情该政权的英国学者在访问过那里之后的巧妙叙述那样:“我看见了过去,但这种过去能够发挥作用。”

除了严格经济意义的见解之外,乔森潘关于国家纯洁性的一些观念也发挥了作用。柬埔寨(波尔布特把国家的名字从 Cambodia 改成了 Kampuchea)要清除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些污垢。这些污垢之一就是教育,另一个是城市生活。在占领臃肿的首都之后不久,红色高棉就命令每个人都搬迁出去。人们离开了这座城市,包括那些不得不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人们以为搬迁只是一项临时
462 的措施,但实际上它却是永久性的:红色高棉要废弃金边这个职能城市。红色高棉到处处死受过教育的人们;僧伽的成员们也在这些被处死的受教育者之列。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毁灭了,其中有很多是由于饥饿。一种缺少宽容性的新宗教取代了统治地位,我称之为“后佛教的准马克思主义”。在越南对柬埔寨进行有效的控制之后,柬埔寨发生了国内战争。红色高棉作为小股力量仍在坚持斗争,在柬埔寨和老挝保留着一支占领军,严重限制着佛教的发展。

在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中,柬埔寨见证了世俗的遁世主义(secularist hermitism)的应用。这是缅甸孤立主义的变种,但它却更加野蛮,而且传统色彩要比缅甸孤立主义逊色得多。然而它的逻辑归根结底却完全是民族主义的:这种孤立主义是在高棉人民的名义下,在高棉独立与“自由”活动的背景中进行的。意识形态最终效力于最强大的世俗价值观念,即民族情感和民族观念的力量。

越南及其反对外国控制的长期斗争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法国人做了很多事情来异化这一地区。特别是在越南,由于儒教思想的强烈灌输,它很难会承认法国思想的优越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多样化的趋势开始在越南表现了出来。当时,日本人的统治首先向胡志明(Ho Chi Minh,1890—1969)的独立宣言让路,他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曾经形成了战时高度组织化的抵抗运动;接着,法国人又试图重新获得对这个国家的

所有权。那场斗争导致了法国的退出和越南的南北分裂。但是这并未妨碍共产党人在这个国家的南部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慢慢地重新夺取领地;于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美国最后卷了进来,于 1965 年向越南派出了军队。

正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宗教的各种张力在越南南部表现了出来。人们被混合在了一起。尽管存在着强大的佛教僧伽,但是也有很多天主教徒:到目前为止,越南是东南亚天主教势力仅次于菲律宾的国家。许多天主教徒从北方逃到南部,使得越南南部的天主教徒人数大大增加。但是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却完全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态度:反共。南部还有一些新宗教,例如受佛教的启发而创建的和好(Hao Hos)秘密社团和更重要的杂合型宗教高台教(Cao Dai)。越来越多采取中间姿态的佛教们扮演起说客的角色,他们既不要马克思主义,也不要西方的物质主义(就像众人经常察觉到的那样,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美国人在以物质主义的方式来进行这场战争,自以为通过火力、空中力量、优势人数等等就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高台教是一个杂合型的越南教会,它是由一个名叫阮文绍 (Ngo Van Chieu,1878—1932)的越南知识分子于 1926 年在一片喝彩声中 463
创建起来的。它具有高度的折衷性,但可以说,它在有关神灵启示的理论方面更像是道教而不是别的。它名字的意思是"高塔",是道教关于至高存在的象征性表述。与旧有的越南传统相一致,中国—越南文化的三合一宗教被揉进了这种新宗教的信仰和实践中,不过,它还编织进了西方的和民族主义的一些环节。它的组织结构模仿了天主教:有一个教皇,一些枢机主教,一些大教主,如此等等。模仿竞争对手的组织结构,这是道教的有趣特征,西藏的本教传统也有这样的特点。从前被当作模版的是佛教的寺院制度,而这里现在变成了天主教。

除了道教的最高神之外,高台教还礼敬其他神灵,比如佛陀、孔子、孙中山,至于耶稣和穆罕默德以及征服者法国的一些伟大人物就更不用提了,其中包括圣女贞德(Joan of Arc)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等人(其中一位神官的任务是接替后者继续写作;高台教中有一种强烈的神灵因素,因此和维克多·雨果进行交流并且记录下更多

的口述著作从原则上讲是可以接受的）。它寻求各种宗教的团结，就
464 像各种荣耀的神灵可以汇聚在高台教的名单上一样，希望可以把各种宗教聚拢起来。但是本质上它是注定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它的组织太强大了，无法有效地充当其他社团的保护伞。到1955年时，它甚至训练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在越南南部和北部的斗争中，它着重反对共产主义。它希望的是一个独立的、在超级大国之间走中间道路的越南。由于这个原因，它同情南部正在发展着的佛教运动。



伦理层面：带着强大的自我控制，一个佛教和尚自焚抗议南越政府的行为。在越南内战中，佛教徒僧侣们通常采取中间立场。尽管佛教不主张自杀，但是在中国佛教里自杀变成了一种零星的传统，而在战时的越南也是一种多少可以接受的行为。

那场运动导致了吴庭艳政府（the government of Ngo Dinh Dien）的垮台。吴庭艳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获得外部支持的能力强于激励国内忠诚的韬略；20世纪60年代，佛教僧侣释智光（Thich Tri Quang）和释智明（Thich Thien Minh）领导下的越南统一佛教会在这

场政治斗争中表现突出，不过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佛教僧尼们通过自杀活动来表达自己的理想，他们的行为体现出感人的德行，也从侧面反映出南越人在忠诚于宗教与意识形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本质上的分歧特征。北越人1975年的胜利导致了不同意见的结束；越南土生土长的宗教是在国外——在美国，特别是有很多越南人流亡的地方，或者在高台教中心和相关的佛教协会发展繁荣的地方——才得到了延续。

就这样，在印度支那的许多地方，实际上是中国的制度在统治 465
着：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的独立。但是越南念念不忘中国人从前对它的控制；和苏联建立起亲密联盟，在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下求得生存，并且偶尔在边界和中国人发生一些战斗，对越南来说这些做法比较有利。民族主义的逻辑决定了这一点。但是民族主义的逻辑却在老挝和柬埔寨指示了相反的说法，反越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疑要在那里出现。

新加坡的福利资本主义实验

东南亚的另一个非穆斯林国家就是新加坡，一个基本是由英国创造出来的城市国家。它是由斯坦福德·拉弗尔斯（Sir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爵士于1819年建立起来的一个贸易港口。有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一直都是马来亚的一部分。由于橡胶种植和锡矿开发的缘故，19世纪晚期，中国人大量涌入新加坡。这些人在商业领域一路前进。1963年，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员，稍后又于1965年，在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的有力领导下，彻底脱离了马来西亚。它作为资本主义在东南亚的汇聚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新加坡由一种福利资本主义的形式管理着。由于在一个狭小的岛国上存在着重要的少数民族，比如印度人、马来人和斯里兰卡人，所以这个政权热衷于强调它的多元性。尽管如此，它的主要意识形态却是一种以教育为本的精英治国论，这让人联想到儒教。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标签的话，那么人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学的后儒家。在

这个框架内,传统宗教如佛教和道教等都占有适当的位置,另外还有基督教和印度教。

在除日本之外所有的亚洲国家中,新加坡是追随资本主义道路最为成功的。由于英国关于发展和教育的观念多少有些过时,所以它从自己的独立中得到了巨大的益处。此外,新加坡还为海外或者散居国外的中国人起到了一种类似指路明灯的作用:它的成功是卓著的,而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还有某种程度上在马来西尼,他们都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歧视。

对东南亚状况的反思

可以看得出来,该地区产生了与各种宗教有关的多种选择。在有些情况下,民族主义者们导致了对传统观念和实践的决定性的同时也经常是非常痛苦的放弃,代之以世俗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最传统的是在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人,而传统色彩最少的是红色高棉民族主义者令人震惊的准马克思主义。佛教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异,它们有泰国通过前瞻性的寺院制度而实现其现代化的
466 寺院制度和缅甸社会主义形式的归隐主义。在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信仰合并很可能就是泰国现代化的适应性调整了,它把规范的佛教和西方的观念融会在一起,却把这种融会建立在缓慢演化的通俗佛教上,这种佛教对取得高水平精神境界的僧尼予以奖励。此外,它还欣赏现代化的精神(当然,还有近现代技术的实用成果)。然后柬埔寨和老挝文化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新加坡朝着后儒家的资本主义的繁荣突飞猛进,把后儒家的资本主义融入了宗教的多元性和福利性的国家制度。

在整个殖民时期和殖民统治结束以后的年代里,东南亚的恐怖历史所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它产生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主要在北美定居下来,但是也有定居在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他们带去了自己的佛教形式,因此让这种宗教形式在西方世界的移植变得更加牢固。由于宗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土地上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同时也由于亚洲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国家都是佛教国家,所以佛

教在这里所遭受的磨难就比任何其他宗教都更严重(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悲惨的戏剧中,都比除犹太教之外的任何其他宗教所遭受的磨难更严重)。这意味着佛教的重心已经向南迁移——移向南传佛教国家——并且以多种方式移向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在那里,佛教出现了显著的繁荣。在其他的难民群体中,值得一提的可能还有部落民族,比如洪族人,他们当中有许多都在美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行将为自己的文化开创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来。

第十九章 近现代的日本

进入孤立状态

耶稣会的到来

467 到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已经建立起了一条从东非经印度至东印度群岛的完整的商运路线。1543年，一些商人的船只碰巧在日本南部失事，使得人们更经常地逗留九州（Kyushu），其中包括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圣弗朗西斯·沙勿略（1506—1552）。这位传教士已经在印度的果阿和南印度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的传教历程尽管非常短暂，却奠定了基督教在日本南部尤其在长崎（Nagasaki）及周边地区的根基。

基督教一开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部分是因为耶稣会士对信仰的表述迎合了本土文化。沙勿略曾用大日如来佛来称呼“上帝”，用佛教术语，用净土的预言来描述信徒的天堂。它看上去简直就像净土宗佛教（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说是正确的——两种宗教的宽恕观是相似的，即使沙勿略可能会抗议说净土宗教义更像路德宗）。

沙勿略和他的后继者们也得益于如下的事实：在当时统一日本的权力之争中，主要的竞争者织田信长（1534—1582）因佛教界抵制他的计划而恼羞成怒，焚毁了著名的佛教中心，即比叡山上的天台寺，并为抗衡佛教而鼓励天主教。他的继承人丰臣秀吉（1536—1598）在政策上同样反对佛教，但某种程度上也反对天主教，因为他害怕传教士的出现本身就会妨碍他的民族统一方略。从1596年开始，传教士的活动遭到禁止，1597年他把包括方济各会士及其日本皈依者在内的26位基督徒钉在了十字架上。

468 西班牙的到来以及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也引起了担忧。当权力之争的最后赢家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1542—1616）在

江户(东京)建立起幕府统治时,基督教以及与外国的交往都被禁止了。佛教和神道教被确立为官方宗教。1637年,九州岛原(Kyushu Shimabara)的叛乱爆发后(许多基督教徒参与了这次叛乱),幕府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开始变本加厉。当权政府开始在全日本建立一个教区体系,每个家庭都必须在一座寺庙中进行登记。寺庙被授权管理葬礼和公墓,这便强化了寺庙和家庭的联系。此外,除了地处长崎的受控的荷兰贸易站之外,外国人被彻底地从日本驱逐出去,整个国家贯彻了一种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

德川时代的宗教

德川的统治是一套非常稳固的体系,它给了日本一段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时间,直至19世纪中期锁国政策显然濒临崩溃而使日本出现又一次危机。尽管它让天皇家族成为整个民族的神圣核心,却把执政的权力交给了幕僚将军——好比世袭的国家首相——并通过地方武士封臣或大名(Daimyo)所把持的一个封建体系往下传递。社会秩序由法律和礼仪极其严格地限定着。泛而言之,社会等级如下:武士,农民,手工艺人,商人(往下还有一两个混杂群体)。尽管商人 469
处在底层,德川时代末期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却使得他们的地位随着财富的积累而上升。

在宗教方面,德川体制把大众和佛教结合起来,并把佛教本身与神灵结合起来;它还希望各个社会等级都遵从适合于自身的规范。比如,武士阶级必须遵从武士道(Bushido):武士之道。作为一个概念,它出现于德川时代之初,而当儒家学者开始阐释它时,它结合了学问和武术的双重观念。这个时代的新武士必须参与社会的管理,从而他们的教育变得重要起来。实际上,随着德川统治的发展,他们开始执行许多专门的任务,除了作为战士之外,还充当管理者、法律和医生。这是儒学融人德川伦理的途径之一。另一条途径是禅与儒家思想的结合;禅还赋予了武术一种精神的意义和根据。

从理论上看,这是有利于佛教的时代,但对政权的批评是不允许的,惟一出现的新形式是黄檗禅(Obaku Zen),它在德川时代初期由隐元(Ingen,1592—1673)从中国引人。它结合了净土理论和禅的修

行。隐元的相较之下更为严格的修行对别的门派是一个挑战，从而刺激了它们的改革和复兴。但德川时代还目睹了神道教和儒学新观念的发展。德川幕府的光国将军（Mitsukuni，1628—1701）开创了伟大的历史书写工作，即根据儒家原则来重新阐释天皇家族的历史。这部著作，《大日本史》（*Dainihonshi*），在以后的明治维新思想中发挥了作用。

在18世纪时，同样有一定意义的是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次复兴的契机是在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1730—1801）之类智识人士领导下的所谓的国学运动（Kokugaku）。它认为日本历史有三个时期：最初是太古时期，接着是受外部势力侵蚀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则是对古代的回归和复兴。这种思想和情绪在德川幕府最后的几年里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情感。

对外开放与内部改革

然而，孤立的时代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19世纪早期的西方强国已经在逼迫中国做着致命的妥协。不久它们也会这样要求日本的。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指挥下驶入江户（东京）湾引起了强烈的不安，1858年被迫接受的不平等通商协议激起了怨愤，并在1867年导致了德川体
470 制的颠覆和天皇统治的重建，史称明治维新（明治是一个天皇朝代的名称）。这尽管在理论上是一次保守的举措，归结到底却是激进的，因为新的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们对他们所要采纳的措施有很好的见解。

自186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期，日本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的现代化进程和政治扩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紧随1894—1895年与中国的战争之后的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在1905年的对马岛（Tsushima）海战中大获全胜而告终；1910年对朝鲜的吞并；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反对德国，从而巩固了日本作为"荣誉性的西方国家"（honorary Western nation）的地位。

日本人迅速地领会到，要想强大到足以抵制外国的侵略，就必须

具备军事威力，而军事威力依赖于现代科技；后者需要教育，教育反过来又要求着社会的现代化。他们于是决定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他们通过种种途径来实现这种改变：建立一支应征军，建立西方式的大学，派送学生出洋，创建现代工业，吸收西方宪政的模式，废除封建体制，并赋予武士阶级以新的角色——重新调整的海陆军，新的职业以及新的思维模式。 471

然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对天皇家族的效忠以及借此表现的对国家的本质即国体的效忠。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过去一直生活在中华帝国的阴影之下，现在它已经有了一种成熟的民族主义；它不必像中国那样经过盲目的四处摸索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诸多民族中的一个（而不仅仅是惟一的中央帝国）；它也不必像印度那样在对外国势力的反抗中发现自己的文化统一性。现已名声扫地的德川政权曾奉行的原则正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统一的日本，必须闭关锁国以防御外国的影响。现在，国家的本质还是同一个，手段却已迥然：通过慎重的开放，明治维新者们能够控制外国的影响力，并让它们服务于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日本。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就是惊人的。

第一个影响到宗教的重大措施是分离神道教和佛教的一道天皇敕令。这引发了一系列削弱佛教的事件——群众反对僧院的压力，德川时代教区制度的衰微，反佛情绪的高涨，许多和尚尼姑的还俗等等。上面提到的分离被认为是必要的，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同天皇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神道教仪式。事实上，许多神道教神祠就存在于佛教寺庙体系之内。神灵经常被视为世界中的一定程度上次于佛但又不被佛教信徒拒绝的力量；另外，正如亚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在最纯粹的狭义上的佛道修行和对本土神灵的崇拜之间有一种连续性。不过，即使在德川时代，人们也已经意识到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所独有的一套诸神与修行的体系。因此，神道教和佛教在神祠和修行上的这一次极为强劲的分离是有备而成的；而神佛分离令（Shin-butsu hanzen rei）颁布的结果是，佛教寺庙在群众的狂热中遭到了破坏。

神道教成为国教

宪政制度意味着更多的变化。它的基础是法国和德国模式(比如,国会被称为议会)。在此,宗教得到了有保障的自由。日本人所做的,是确定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民族主义中不明朗的东西。他们要求所有的日本人都遵从官方神道教的仪式,因为这些仪式与宪政的主流伦理联系在一起,代表了对民族的效忠。然而,为了同时确保这一点和保障宗教自由,他们找到了一条巧妙的权宜之计——宣称神道教不是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处境跟马克思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不同,那些国家的宪法宣称宗教自由,而马克思主义
472 作为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不是宗教。

最初的想法是要使复兴的神道教成为一种要求全体公民认可的理论意识形态;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主要在心不甘情不愿的佛教僧侣中发起的意识形态宣传活动遭到挫折,国家神道教实际上被削弱了。祭司事实上被禁止在仪式过程中布道,以至神道教最后会变成一种伦理和礼仪的统一体系,它固然比附了神秘色彩,但它无法成为一套能独立抗衡其他思想体系的教义。为了澄清事态,诸如天理教之类的各种新宗教流派,但凡有一点点神道教意味的,都被国家重新列为教派神道教(Sect Shinto)。结果是,在现代有三种或更多的神道教:神社神道教(Shrine Shinto),这是今天可在日本发现的典型的神道教,是一套根植于神社的修习体系(现已同佛教分离);国家神道教(State Shinto),存在于1882年至1945年间,它的式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一部分;教派神道教(Sect Shinto),包括许多新的流派。人们有时也会提到佛学神道教(Buddhist Shinto)和儒学神道教(Confucian Shinto),它们涉及到世界观的各种调和形式。

由于把神道教命为日本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明治政府正式表达了至高无上的民族价值,这是我在前面已经说到过的。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围绕着美国国旗或英国君主制的典礼——即使说到的这些国家在理论上也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国家。

简言之,国家神道教——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神社神道教——是一种残缺的宗教,因为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教义。但它确实

构成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情感核心，因为它把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捍卫视为所有日本人的神圣义务。它的民族精神与现代武士道不谋而合，这种武士道经过重新解释后甚至成了征募士兵的方法。那么多人在不断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忍痛寡欲和英勇献身就证明了对这类精神的把握。

现代对佛教的影响

最初，明治维新对佛教来说似乎是灾难性的事件。德川幕府一朝提供的支持又被收回去了。佛教迅速地失去了政府庇护，成员人数迅速地减少。神道教和佛教的分离运动毁掉了许多寺庙和机构。但在面向西方知识的新的开放中，新的契机也出现了。

人们开始尝试对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进行精致的综合，这些尝试的最高成就也许出自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1875—1945）。他的第一本重要的著作发表于1911年，其中提出的哲学方法受到了康德、柏格森和威廉·詹姆斯的影响，而他意在探索一种分析经验的方法。对他而言，纯粹的经验，也就是不与概念和自我意识相杂陈的 473
经验，没有我们通常用来解释经验的主客二元对立。他同禅的关系在这里很明显。他对大乘佛教的空无观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把他的绝对空无界定为一切个别存在者的明镜。他通过这样一些途径试图把自康德以来的一些西方探究，即对现象背后的东西的探索，同佛教的思想范畴结合起来。

晚些时候另一个人进行的尝试与此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禅学家铃木，或更确切地说是铃木大拙贞太郎（Suzuki Daisetz Teitaro，1870—1966）。这两个人是朋友，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发现他们在基本思想上是接近的。但铃木的主要贡献是编辑和翻译禅宗著作，并在自己论禅的作品中把禅同时与科学和神秘主义联系起来，从而在西方世界中激起了对禅的普遍兴趣。在使日本思想获得世界的相当认同上，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西方人开始对日本佛教产生兴趣的这一事实，也刺激了日本人对佛教的再度关注。



一个和尚在现代大阪乞食。

日本的新宗教

474 比在明治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这些更具哲学意味的运动更强有力的，是日本的新宗教运动，其中一些有 佛教背景，另一些则有暧昧的神道教背景。事实上，其中有些流派在德川时代终结以前就有发端，并与这个时期纷乱的社会动荡密切相关；但它们的全盛期来得更晚一些，是在后明治时期繁荣起来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现时代的三个例子：天理教（Tenrikyo），大本教（Omoto）和日莲正宗（Nichiren Shoshu）。

天理教：世界的中心和一个新的社会

天理教最初有一种神道教意味；在1888年的宗教重整中，它被当作一种所谓的宗派神道教流派来对待，不久以后人们又把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强加给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1947年的宪法确保了真正的宗教自由，它净化了自己的教义，至此就蒸蒸日上，作为一种宗教，它相当成功地传布于国内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许多地方。

它由一位女性在风雨飘摇的德川幕府衰颓的那几年里发起。她就是中山美伎（Nakayama Miki，1798—1887）。她早年献身于净土宗，并渴望成为一位尼姑。但她遵从父母之命结了婚，随后又献身于神道教。41岁那年，她接受了一次显圣，这构成了她以及后来她最亲密的门徒饭降伊藏（Iburi Izo，1833—1907）所接受的所有神启的核心。她的使命是为一个完美的神国开辟道路，在那个神国中，人类将享受与神相同的快乐生活。她教义中的这一救世主要素在她生前死后都导致了与国家的冲突，她因此而多次受到监禁。作为一个启示者，她被认为是天理王命，也就是说，是神临凡的活身。神启有三个先定的特征——恰当的灵魂，恰当的方位，恰当的时刻。

活动地点对天理教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该教最重要的修习的核心。它就是神社（jiba），其标志是设置在日本旧都奈良附近的天理市（Tenri）的神祠中的甘露台，神启表明这个地方就是人类的发源地。那里的神社有必要的空间供舞蹈仪式的表演，这种仪式概括并再现了亲神造物的过程。

创始人美伎怜悯他人（她惯于把自家的地产给穷困潦倒者），且善于治疗，由此表现出了她的谦卑和精干。她留下的教义概括了一种新信仰的精髓，而归于她的门徒饭降名下那些教义则包括了有关流派组织的相当一部分指导。今天的教会在一名大祭司主持下聚集起来，这位祭司就是美伎的后裔。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有约300万信徒，并在天理城有一个非常兴旺的中心，包括神社，一所大学，一座著名的图书馆——其中藏有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方善本和古代手稿（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家医院，传教机构总部，以及一整 475

套供回来拜访神社的教会成员居住的宿舍。一座围绕着神祠的城市发展起来了。

天理教的叙事层面既以创造也以美伎的生活为核心,因为后者

中山美伎

中山美伎(1798—1887)是天理教的创始人,天理教是日本的一支新兴宗教,它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38年。在美伎的早年生活中,她皈依了净土宗。她希望成为一名尼姑,但她的父母想让她成婚,她顺从了他们的意愿。她被她的丈夫和婆母严格地管制着。40岁的时候她病了,被人们认为是禁欲苦行者,接下来她被神灵附身,自称是天理王命或天神。神灵让她把家中的财富贡献给人们。她的家人拒绝她的要求,因为这是她的显圣幻象,所以她家人认为她疯了。但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她的愿望,把她自已奉献给了神。那时他们已经因为满足她的愿望变得十分贫穷了。

但她不仅仅有显灵的启示,她还利用萨满教仪式变成了一位信仰上的医疗术士。

美伎认为当今世界是堕落的。贪婪占据了我们的心灵,人类已经远离了最初展现出的原始的纯洁。在那种原始状态里,人与神融为一体。她希望一个新的时代能够在不远的将来破晓而来。她的神学理论是一神论:天理王命是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就是在天理市的神圣中心即甘露台中,人类诞生了。她设计了一套供在那里表演的宗教舞蹈,表现创造的神话。因为当局在她的教义中察觉出了革命的意味,她曾多次被监禁。1887年1月26日,美伎去世了,死的时候她让她的信徒表演圣舞,即神乐祭(zutome)。这种圣舞曾受到警察的阻止。美伎去世前,她曾问道,是天理亲神的律法还是人类的法律更强有力。她的信徒认为她死后进入了灵界。她留在圣所即神社里帮助她在尘世中的信徒。她的许多诗篇被收集起来,作为教堂的圣典。美伎最亲密的追随者饭降伊藏(Iburi Izo,1833—1907)继承了她的衣钵。现在这个教派已经拥有三百多万的信徒。

被认为始终在她的精神圣地中帮助着信徒。这里树立起了一种生活的典范(顺便说一句,这种生活正与日本社会中如此受敬重的男性的武士美德形成对比)。至于教义的层面,天理亲神被视为普遍施恩于其造物的真神和神圣的祖先,但同时又特别地显现给信徒。他渴望 476 创造,是因为他想看到人类的快乐与和谐,但这因为自私而受到了妨碍,神启就意在克服这一点。人类的生命被当作亲神贷出的某种东西(人类则借入它),这构成了天理教教义的伦理要旨(我们很快就要讲到这一点)。拯救也要求灵魂的净化,这可以通过轮回在一系列生命中实现。这缓和了神社的特殊神宠论的影响——即一个人应当在神社这个神圣中心为最终与亲神融为一体做准备——因为善行和净化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神宠而在神社得以再生。

仪式层面的核心是在中央神社的祭祀舞蹈。对该中心的朝拜是信仰组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在伦理的层面,我们已经注意到,把一个人的生命视作借贷物是如何能激励信徒变得无私,并把他们的世俗才能贡献给神圣事业。用神道教式的语言来说,正如尘埃显然会模糊镜子一样,人类的过失应当被当作所谓的"八埃",从其覆盖的人心上——即人的本真——拂去。它们是恨、怒、贪、傲等等。其基本的精神具有此世性,意在建立起可见的社区生活。

在物质层面上,我们注意到天理市的重要性。实际的主神社是用昂贵的木料建立起来的精美绝伦的建筑,但它没有圣像,除非你把参加仪式的人所面对的神社的甘露台算在内。祭司的礼服的许多图案让人想起神道教的风格,但这些仪式同神道教中使用的那些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一宗教极为强调亲神的爱:亲神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美伎的创世传奇就强调这种观念。整个创世传奇都没有谈到同天照大神以及天皇家族的神话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主旨。这是导致天理教和明治政权确认的国家神道教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在一个经历了飞速的工业化以及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在内的其他重大社会变化的日本国里,天理教对那些在后工业时代属于核心家族的人们有更多的意义。

大本教和其他相关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本教在被政府令所解散后始终没有东山再起。然而，它极大地刺激了别的运动。它发源于一农妇出口直子(Deguchi Nao, 1837—1910)的萨满显灵。她认为出口王仁三郎(Deguchi Onisabiro, 1871—1948)的天才证明了他是上帝的救世信使，她预言过他的到来。他被她的家庭所收养，成了她的女婿。这一新宗教所传布的神学认为，灵魂从神灵的世界堕入了这个物质的世界。弥勒佛(Maitreya Buddha)被预言要来到这个世界，王仁三郎认为自己就是弥勒转世。这一流派认为日本的现状是罪恶的，亟待神
477 的重建，而这种重建将伴随着一个新的时代而来。它倾向于认为新的时代意味着向田园式和谐的某种回归：在这样一种生活中，宗教将获得艺术般的生命力，将具备艺术的优美与和谐的情感。

这种思潮是对日本的工业化以及整个现代化的一种反叛；尽管它根据国家神道教的指令宣称爱国，但它的神话和教义在许多方面跟国家所采取的路线有着持久的对峙。它是政治上的右派，但它强调乡村生活和恢复农业。由于这些异端的政策，它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了镇压。但它影响了别的新团体，包括御木德近(Miki Tokuchika,生于1900年)在1956年创立的"完全自由教团"(Perfect Liberty Kyodan)或通常所知的PL教团。这一派尤其吸收了人生是一种艺术的论点。因此，它的二十一条准则的头三条就是："人生是艺术。人的一生是自我表现。自我是神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大本教强烈地试图把当前的问题归因于国祖神从日本的隐退，并希望在一个新时代中我们时代的罪恶将被某个救世主或在他的领导下被扫除殆尽。对预言的诉求暗含着对现时代种种潮流的反对：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宪政，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还为所有宗教的本质统一与世界的和谐而辩护。因此，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混合了和平主义与极端独裁主义的观点。

天理教和大本教都有神道教的背景，但二者事实上都编造了不同的神话。二者都没有遵从国家神道教或天皇家族的官方神道教。

但它们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天理教的发展方向是在这个尘世间实际地建立一个城市和一个中心,大本教则想回到一种田园式的天堂。它们都在向同一个时代证明自己。在这个时代,神道教体制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而自从一种崭新的神道教在明治前后(以及随后从1912年开始的昭和[Showa]时期)发展成形以来,这种体制就爆发出更大的强力——这种较新的神道教虽声称历史悠久,却自觉地把自己塑造成一种独立的传统,而不再是对佛教和儒学价值观的一种功能性补充。

正如在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中,三大宗教的松散的结合承担起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日本的传统中也有儒家意识形态、佛教教义和修习以及神灵的有效结合。然而在新的日本国里,这些力量开始分离。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制度和观念开始取代儒家价值观;佛教开始自觉地同国家分离开来;神道教开始被塑造成一种独立的体系。我们已经看到,在民族主义时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神道教在严格意义上并不通过宣扬任何教义来维持它统一人民的威力,但它有它的天皇神话。

新的宗教运动令人不安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它们宣扬了不同的神话。与此相一致的是,它们的发源总是显灵体验,而这种体验是深深 478
地扎根在民间文化中的。只有到了晚些阶段,人们才会对更抽象更具分析性的教义产生需要。

日莲正宗与创价学会

严格地说,我们这里谈论的并不是一种新的宗教,而毋宁是一种旧传统的复兴,最初发起这一传统的是13世纪的日莲。这次复兴要归功于牧口常三郎(Makiguchi Tsunesaburo,1871—1944),他在自己的哲学中结合进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因素——尤其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而,他废弃了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真理概念,而强调通过依日莲宗教义的大意所进行的当下修习来获益。人类的至高目的是幸福。牧口在改造日莲宗训义的过程中创立了一个组织,而他最忠实的信徒户田城圣(Toda Josei,1900—1958)后来重组了该组织,称为创价学会(Soka-Gakkai或Value-Creation Society)。

学会意在根据“美”和“利”的意愿——分别是艺术和道德的基础——来提升信徒的利益。它强烈地相信，不断重复《妙法莲华经》的祷文以及在别的方面遵循日莲正宗（日莲的信徒）的一般生活和戒律是有益的。由于这个群体背离了战争年代的民族主义原则，常三郎和户田受到了监禁，而常三郎就是在监狱中去世的。创价学会是一个世俗组织，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它以大胆进取的方式令人改宗，即所谓的折伏，我们可以把这解释为通过制服令人皈依。在运动遭到禁止后，藉着战后精神复兴的希望，户田的重组非常成功，并通过其政治党派即公明党（Komeito Party）进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创价学会的目标是此时此地的利益，是促进一个世界性组织以最终带来世界和平。它的仪式集中于《妙法莲华经》的祷文。这是每天一早一晚都得吟唱的。创始人日莲刻写的经卷置于地处富士山附近的大石寺（Taisekiji）的一座寺庙中，它的流木是祈祷的核心，日莲则被视为佛的化身，甚至高于释迦牟尼。但常三郎进行的哲学现代化根本上赋予了创价学会一种现代气息，因而使之有别于更为传统的佛教流派。

在组织风格和哲学基础方面，创价学会效仿了西方的思潮。在神话和仪式层面，它继承了古老的日莲宗。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次成功的调和，在现代日本已然迥异的处境中保住了这一古老传统的精华。

日本的民族主义及其后果

479 国家神道教上升到似乎高于宗教的地位，这意味着宗教与国家的某种调和，这在日本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重组日本的过程中天皇家族被赋予了特殊的角色。通过把天皇确立为一位不管理国务的神圣帝王，幕府已经为此铺平了道路。明治维新表面上是把权力还给天皇，但随着这种政体演变为模仿欧洲某些做法的宪政，天皇的地位就不再明确了。

在最大程度上，天皇的功能是一种神谕，人们会把国家事务告知

他并请示他的意见，但他不会直接介入具体的政务。这是引导事态的一种特殊机制，即把天皇家族同神道教的仪式以及它自己作为天照大神的后代这样的神话联系起来，它构成了民族效忠的强大核心。天皇成了国体或民族精神实体的人格形象。后者是一种神，天皇则以人格化的形式代表了那位神。在明治维新后从受压抑的秘密状态中浮上水面的种种日本宗教，包括基督教，都必然地屈从于民族神。要不是因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选择了民族主义来组织自己的那种政治制度，所有这一切可能早就过时了。

使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阶段的军事征服，也是其通往帝国主义的道路。这种模式在白种人的大国中已然流行。英国、俄罗斯、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一定意义上的美国，都在最近的时代里在太平洋地区开始了其进程，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参与了此进程。到19世纪末期，这就不仅仅是通过赤裸裸的沙文主义来得到辩护了。殖民者认为把西方文明的成果，即基督教带给了被征服地区的"土著民"。若不考虑日本几乎不可能代表"基督教"文明，它直到凡尔赛时代之前的行径都是符合一般而论的帝国主义的。但民族精神从那以后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它在20世纪30年代占领满洲的企图以及与中国的战争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实际上就像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显然，19世纪是做这些事情的恰当时机，而在20世纪它们则成了罪行！况且，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同德国和意大利站在了一起。它遭到的惩罚是严重的：大部分城市毁于大规模的空袭，最后以1945年8月原子弹轰炸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结束了这一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是日本基督教色彩最浓的一座城市）。

这些灾难事实上并没有中断整个现代化进程。相反，它们推动了这个进程，因为真正的资本在于日本人的头脑和娴熟的双手，而不 480
是已经建成的工厂和码头：轰炸在物质方面促进了现代化。呈现在日本人眼前的西方生活模式在数量上至少有三种：有自由的民主选择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尽管也可以与福利社会主义相协调；有马克思主义模式，伴随着国家的中央控制以及对思想言行的极权式支配；还有法西斯模式，那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极端民

族主义。日本曾经追随的就是这最后一种模式，也正是这种模式在1945年使日本遭到了决定性的摧毁。既然美国是主要的财富大国且在塑造新的宪政方面发挥着决定作用，应当推广的就是自由模式。但同时，还把天皇保留为宪法规定的君主（尽管如此，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他还是有着神圣的潜在意义的）。

1945年10月，盟军司令部（Allied Occupation）废除了国家神道教，1946年新年，天皇宣布他不是神。结果，神道教解散为神社神道教。这个转变进行得非常平静。立法取消了要求所有家庭跟佛教教
481 区体系之类的宗教组织建立联系的规定，这意味着宗教和信徒的联系更具个性色彩，但这却促进了对宗教的忠诚。就神道教而言，估计与东京著名的明治神社有关系的组织就超过了25万个。乡村有大约8万个神社，其中大多数加入了神社神道教协会，后者致力于训练祭司、提供普及的宗教教育、发展神祠等等。信徒的协会或俱乐部关注的是进行一般的维护、发展神道教音乐以及物色准信徒等等。这样，宗教就开始获得了自主选择的基础。佛教寺庙的信徒也是如此。

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日本世界观

宗教的多元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宗教与国家的分离，人们与宗教的联系所具有的自愿性质，以及日本人对西方思想的普遍沉迷，都使事态显然变得极为混乱和支离破碎。由于存在着一个人同时属于一个以上协会的可能性，而旧的传统又倾向于综合不同门类的信仰和崇拜，日本登记在册的信徒总人数超过了总人口数。宪法以及一个全力以赴追求资本主义成功的开放的社会，它们所支持的自由在日本人的世界观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它如何与传统的宗教相适应？甚至，真的有一个统一的日本世界观吗？

如果有一个流行的核心概念，那可能就是和谐。许多新的宗教流派都恳切地强调世界各宗教的统一；尽管日莲正宗的宗风是激烈好斗的，大多数大乘佛教流派还是追求和谐的。神道教也有意于与其他教派维持和谐的关系，部分地是因为它不具有任何严格的

从而可能与别派发生冲突的教义体系。从这一点看，民主是平息分歧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各宗教流派之间的冲突，因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为自愿的信仰追求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基础。它与另一个日本观念也相容，即在采纳任何重大的政策路线之前必须先得到一致同意。

宗教在促进民族大和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要表现出一种高贵宗教的渴望，其他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可能仍旧沉溺于追求这种宗教。但是，尽管宗教在某种程度上有这样的社会作用，它首先还是重在满足人们的存在的或情感的需要以及物质的需要——在佛教那里是通过冥想或祈祷，以及某种程度上通过哲学洞察；在神道教那里是通过自我净化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儒家价值观中是通过道德升华；对西方式人道主义的拥护是通过宽容的处世态度来体现的。

跟印度和中国的情况相反，面对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挑战，日本的发展道路是不同寻常的。不像主流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那样，它没有回到自己的过去，从古典时代挖掘哲学资源来适应现代世界，来重新塑造反殖民斗争。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向外寻找一种西方思想 482



沿着富士山而上的朝圣者。富士山是日本的圣山。每年的七八月份都有一百多万人爬到位于火山口顶端的神道教神社，这座火山自从 1707 年到现在，一直都处于沉睡状态中。

体系,然后又师夷长技以制夷,或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她确实利用了自己传统中的思想资源,但它同时又明确地承认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明治改革家们强行地让神道教从它先前与佛教的纠缠中摆脱出来,并把它发展成一种民族团结的宗教仪式,这是试图为追求民族理想,为实现民族的精神本质的一致提供一个明确的神圣基础。同时,他们几乎以同样的方式采纳了自由立宪,将其视为必然。神道教由于没有教义的包袱而可以灵活地促进民族的统一,而不必宣扬可能会与现代观念和科学思想发生严重冲突的东西。

但从以下两个角度可以说维新者们并不能够避免与宗教的冲突——首先,天照大神的传说一度构成了天皇家族的权威和神圣的终极基础,而一些新的流派提供了与此不同却十分有力的神话;其次,各种宗教都有追求统一的传统,因此不会轻易地臣服于民族主义的绝对命令。对外出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多地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导致了民族精神实体即国体的绝对化,以及各宗教对爱国精神
483 的绝对服从(同样的事情实际上也发生在别处,比如欧洲)。

然而,民族主义时期一度建立起来的基础可能还有残余,日本为此发动了(实际上是被迫发动了)一场自由主义运动。这演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尝试,即吸收某些西方做法并把它们融入整个日本综合体。尽管基本上始终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它的核心是一个模糊的民族大和的概念,以此取代对国体的更为具体的情感。各宗教能够通过思想和实践的多元框架来适应这种和谐。在这样一些条件下,神道教作为同时在社会与自然中呼唤和谐的一个焦点而开始了令人瞩目的复兴。

极为强调艺术的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唯美主义中得到了某些回应。日本人保持着对自然的强烈的亲和感,即便朝鲜战争以来,迅猛的经济复苏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同时又总是恶劣的人类环境。社会总是那么拥挤又刻板,神社和寺庙则始终是重要的舒缓途径,容许人类短暂地超越他们当下的环境、对正确社会行为的苛求以及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味追求。

如果拿日本与印度和中国做一下比照:日本人在对传统的保留

上不如印度人，但他们的现代化更有渗透力；他们牺牲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到中国人那个份上，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现代化还是更有渗透力。在宗教的层面上，他们的全球影响力不如印度人，但他们的许多导师和修行都已经流传在外：如铃木等人，禅宗之类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日莲正宗，以及对待艺术的宗教方式等。

第二十章　在阴影中穿行的伊斯兰教

挫折与回应

伊斯兰教命运的逆转

484　1683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向欧洲扩张的高潮。由于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 1674—1696在位)带领盟军前来救援,土耳其军队未能攻占维也纳。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属地的大部分都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Habsburgs)家族占领,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塞尔维亚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奥斯曼帝国本是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一个小公国,在对先前拜占庭帝国属地的征服中崛起,势力从中欧延伸至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向南一直到埃及。它控制了包括圣地在内的阿拉伯大部分地区,自认为是伟大的伊斯兰早期文明的继承者。然而,欧洲的战争技艺在不断进步,奥斯曼人却停滞不前。

不仅仅是欧洲,此时穆斯林世界也麻烦不断。18世纪末,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完全处于无序之中,到19世纪中期,印度次大陆已被英国主宰。17世纪,荷兰人已基本控制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尼西亚。19世纪,马来西亚被英国人占据,伊斯兰北非被法国人占据,到20世纪早期,意大利人又占据了利比亚。英国人主宰着埃及和苏丹。俄罗斯在向中亚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开进。在19世纪,希腊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获得了自由,巴尔干的其他地区也从奥斯曼人手里解放了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在国际联盟
485　(League of Nations)委任托管协议的安排下,各阿拉伯国家处于英国和法国的统治之下:伊拉克、外约旦(Transjordan,后来的约旦)和巴勒斯坦归英国,叙利亚、黎巴嫩归法国。英国控制了海湾各小国。沙

特阿拉伯取得了独立，由其君主和瓦哈比派(Wahhabi)伊斯兰教(见下文详述)来控制。但是波斯断断续续处于西方控制之下。因此，整个穆斯林世界发现自己实际上被西方所占领。对一个曾经骄傲和辉煌的文明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瓦哈比派改革：重返逊奈

18世纪是伊斯兰教历史上一段不平静的时期，在社会和道德方面重建信仰的种种努力都于此时出现。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平静，部分原因在于面对欧洲，人们意识到了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但是，瓦哈比运动却在受这种不平静影响最小的地区之一——阿拉伯半岛产生了。这里穷困贫瘠，四处劫掠的西方海上势力对之不屑一顾。伊本·阿卜德·瓦哈布(Ibn 'Abd al-Wahhab，1703—1792)的求学生涯从麦加和麦地那开始。他受到了罕百里教法学派的训练，复兴伊斯兰教的使命在那里激发了起来。此后，他在巴士拉学习，开始了呼吁净化宗教的宣教活动。

重返阿拉伯半岛之后，他与当地的一位统治者穆罕默德·伊本·沙乌德(Muhammad ibn Sa'ud)及其继承人建立了联盟。这个沙特国家(Saudi State)逐渐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半岛，但是埃及总督于1818年受命将之镇压。此后，沙特人又卷土重来，建立了第二王国，却在19世纪90年代土崩瓦解。但1902年，沙特家族一位强有力的领袖阿卜德·阿齐兹('Abd al-'Aziz)，通常被称为伊本·沙乌德(Ibn Sa'ud，1879—1953)，占领了利雅得(Riyadh)，建立了第三沙特王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沙特国家。令人惊叹的石油宝藏开发了出来，沙特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力量。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依然是王室的选择和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

瓦哈布的学说主要是号召改革，号召重返伊斯兰教原初的教义和法律基础。瓦哈布最先宣讲的是讨黑德(*tawhid*)，即神的独一，谴责那些对他来说意味着滋生多神教的宗教实践形式，比如说对圣徒陵墓的崇拜。这一现象在有苏非倾向的群众中本来极为常见。他的主要著述被称作《独一之书》(*Kitab al-Tawhid*)。他对独一的解释非常极端。他认为，任何会干扰对独一神的信仰，也就是说任何把

终极关怀归因于神之外其他东西的做法，原则上都是多神教，因此都应受谴责。对中世纪法律和习俗的许多内容，他都拒绝接受，认为那些是创新，而要求回到更严格意义上的《古兰经》的律法。他还恢复了以伊智提哈德即明智的推理为指导源泉的做法。而且这种推理必须直接以《古兰经》和早期圣训或逊奈为基础。他以此为据，拒绝了
486 中世纪教法学家的许多意见。总而言之，他的复兴运动多多少少就是我们所描述的新基础主义，即返回伊斯兰教的根基，清除中世纪实践的影响。瓦哈比派并不自视为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派，而认为自己是对改革的一种召唤，不过，它逐渐接受了最初反对者们给的这个看似像宗派的称呼。对于在现代伊斯兰世界遭受来自不同方面攻击的苏非派，瓦哈比派采取抵制态度。

瓦哈布的后代成为王室的首席宗教顾问，他们是"谢赫之家"(family of the shaykh)，通过这一体制，瓦哈比派和沙特王室的联盟制度化了。伊本·沙乌德利用宗教的热诚组建了一支兄弟会式的或伊赫万(Ikhwan)的军队。因为国家的政策路线相当实用主义，对这支军队所献身的事业是一个打击，1929年军队发生叛乱。但是，叛乱很快被扑灭。可以说，在此后的年代里，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沙特王室必须与巨额石油财富带来的惊喜和问题做斗争之时，实用主义的方针继续与瓦哈比意识形态中带有复兴倾向的保守主义相混合。

还应提到的是，沙特阿拉伯掌控了圣地和朝觐，因此它在伊斯兰世界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尽管瓦哈比主义带有某种原教旨主义的色彩，但它确实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对主流伊斯兰教的复兴。它代表着这样一种思想：如果伊斯兰教因为来自其他文明的破坏而受煎熬，那是因为它已经不忠实于自己的传统。而沙特惊人的财富又从反面对此进行了论证：如果一个国家繁荣昌盛，那是因为它依然忠实于神的指令和早期伊斯兰教的精神。但批评者却可以诟病沙特过多地妥协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且是由王室统治——许多更渴望传统的穆斯林对此并不欢迎。

实际上，除了在科威特和一些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的做法与别处迥异。这种做法就是将一个由3000甚至更多成员组成的家族制

度化，这些人就像国家这个血肉之躯中的骨架，掌控着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家族的忠诚和国家的忠诚因而在这个精英团体中融为一体。沙特还雇用了很多人为自己工作，但却没有给予他们政治权利。因此，这是一个精英主义的阶层体制：家族精英、宽泛的家庭、国家、外籍工人。但是整个家族对伊斯兰教的忠诚毋庸置疑，因为《古兰经》就是这个国家的宪法。

在意识形态方面，与瓦哈比派思想一致的是，国家强烈反对蓄意的蒙昧，其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的无神论。因此，沙特是共产主义的强烈反对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会同情西方的价值观，那些价值观是为神举伴侣，是舍克（*shirk*）或说多神教的例证。下面我们还要谈到伊斯兰教中其他形式的保守复兴主义（conservative revivalism），这种思潮成为面对西方时的一个选择，而且不用排斥技术的现代化。简而言之，这种保守主义所依赖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即，伊斯兰教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信仰者们没有完全忠实于它纯粹的形式。 487

伊斯兰现代主义：穆罕默德·阿卜杜

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至少名义上是穆斯林社团，即乌玛的一个主要代表。但西方很容易就把它从中分离了出来。1869 年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的开通显示出，法国和英国在该地区有了源源不断的利益。随后是英法的联手统治。在 1881 年到 1882 年阿拉比帕夏（Arabi Pasha）领导的起义中，英国舰队炮轰亚历山大（Alexandria），直接控制了该地区。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Muhammad ʻAbduh）就生活和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在开罗的艾资哈尔，即著名的中世纪大学里接受的教育，很可能是 19 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

阿卜杜还受到了另外一个改革者加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fghani，1838/9—1897）的影响。阿富汗尼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有着泛伊斯兰主义的理想。他认为，伊斯兰世界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不团结。在游历印度期间，他对那些接受英国统治的穆斯林深恶痛绝，并写了一篇有力的文章予以批评。他本人的立场与中世纪的伊本·西那（Ibn Sina）相同，认为通过理性，人自然地具有知晓关于神

的知识的途径，但是，对理性的这种应用并不容易，因为对民众而言，众先知，尤其是先知穆罕默德，已经用丰富的象征形式揭示了启示。这种立场很容易适应现代知识的进步，也就是说随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日益增加，我们看待《古兰经》启示的方法也会随之变化。作为泛伊斯兰主义的大力倡导者，阿富汗尼希望复兴穆斯林社团对普遍性的渴望，以面对不断进步的西方，特别是英国。

穆罕默德·阿卜杜部分赞同以上观点。由于参与了1881年的起义，他只能流亡国外。在巴黎，他和阿富汗尼一起出版了一份激进刊物，号召革命和社会改革。之后，他得以重返埃及，并担任法官，不久成为穆夫提（*mufti*）和伊斯兰教法的首席解释者。身居此位，他致力于伊斯兰教法和宗教捐赠体制的改革。

穆罕默德·阿卜杜在自己的思想中对他认为错误地渗入伊斯兰教的各种因素进行攻击，比如宿命论，以及对圣训的盲目接受。他深受早期伊斯兰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自由意志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至于科学，它在西方的发展也要部分归因于伊斯兰世界的贡献，在信仰与现代科学之间，不存在不和谐。如果穆斯林因为错误的原因拒绝现代知识，会使他们落后，而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因此，他希望推广一种回到早期的伊斯兰教、一种净化的伊斯兰教，没有中世纪陈腐知识和圣徒崇拜的积弊。不过在这项理论工作中，他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苏非主义的影响，即认为宗教的内在化显示出信仰和科学在精神方面的和谐性。他认为早期伊斯兰教的制度指向立法民
488 主。为了回应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其声称的文明优越性，他认为伊斯兰教是完美的宗教，它吸取了犹太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的优点，并将之普遍化了。

正是在这种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在殖民统治下出现的伊斯兰国家，包括埃及，能够把伊斯兰教与法律改革，比如关于多妻制，以及银行和慈善基金方面的改革，联合起来。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纲领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伊斯兰必须摆脱中世纪的积弊，包括苏非仪式的积弊。第二，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释必须根据其精神，而非字面含义。在回归原初的伊斯兰教方面，现代主义受到了瓦哈比派的影响，但是它是自由主义的，反对拘泥于经典的字面含义。这样一

来,对法律的审视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之下进行,这就包括类比推理,以及对整个社团普遍福祉的考虑。在现代主义的裁决里,穿着西式服装,食用没有按照仪式屠宰的肉类,这类实践都是允许的。第三,伊斯兰教被视为可以在此世实现的一个体制:筑建现代的伊斯兰教要比宣扬天国的报偿更为重要。

来自黎巴嫩的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id Rida,1865—1935)继续着阿卜杜的工作。他在开罗城外出版了一份叫做《灯塔》(*Al-Manar*)的杂志,影响非常广泛。对于他认为自萨拉夫(*salaf*)时期,即第一代先知追随者的时期,就被带入信仰和崇拜方面的创新,他持反对态度。尽管如此,他赞成社会准则的变化。他认为,《古兰经》降示的是普遍准则,而非正确行为及正当社会组织的法律细节。由于他赞同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中的中心位置,也由于他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他的思想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伊斯兰教中存在着单一伊斯兰社团、一个中央领袖(哈里发)的理论,在这种语境中,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特殊问题。

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反殖民主义斗争

对明智的观察者来说,民族主义显然是西方这个混合物中的因素之一,在欧洲和海外,它都与现代化进程有关联。但是,当把它应用于伊斯兰教背景之中时,就产生了复杂的结果。印度的哈里发运动(*khilafat movement*,1818—1924)以比民族主义略为广泛一些的内容为基础,也就是以所谓穆斯林对哈里发的忠诚为基础。奥斯曼人把哈里发制度作为一种虚弱的形式一直保留着,帝国衰败后哈里发又作为宗教职位在土耳其昙花一现,旋即被废除。哈里发运动也因此而瓦解。尽管如此,这一泛伊斯兰运动依然代表着伊斯兰世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种回应。然而,现代主义(modernism)确实在向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它有可能把民族的忠诚融入到更为广阔的框架中去。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学校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标语:"伊斯兰教是我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的语言;

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

489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广泛传播，但最初针对的是奥斯曼帝国。它轻而易举就和现代主义混合在了一起。但是，作为一个抗衡所谓西方道路带来的社会破坏后果的概念，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也有吸引力。有些运动，比如20世纪60年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取得政权的复兴党(Ba'ath)社会主义，就是明显的世俗运动。

土耳其和非宗教解决方案

对各种事态做出最引人关注回应的是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1881—1938)的领导下，土耳其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关于西方的问题。1922年，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苦战结束，这带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苏丹制和哈里发制的废除，1923年革命紧跟其后开始。在1838年以来的所谓坦齐马特(Tanzimat，意为重新调整秩序)时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运动中，奥斯曼帝国曾经以温和的方式进行了现代化。但是，自1923年以来，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他改名为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urk)，把一个反宗教的世俗革命决定性地制度化了。

土耳其首先引进一部西方式的宪法，在理论上把主权赋予了人民。其次，引进世俗教育，用土耳其语教授，老式的宗教学校被废除。第三，废除沙里亚(启示律法)，以民法取而代之。第四，镇压苏非教团，把圣徒陵墓世俗化，宗教人士的服饰大部分被禁止，非斯帽也被禁止，停止使用阿拉伯语，废止阿拉伯语字母，改用罗马字母。不鼓励妇女佩戴面纱，禁止多妻制，宣布其他一些明显歧视妇女的行为为非法。婚姻世俗化。

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震撼了宗教传统主义者，但是至少它从表面上把土耳其转变为一个欧洲式的国家。除了个别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地区，如阿尔巴尼亚、南也门和苏联统治下的中亚之外，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发生比这更为激烈的变化。土耳其的实验并不完全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其允诺的立宪制与军事专政混为一体。

宗教力量的复兴已经出现，阿塔图克一些过于严苛的做法已经得到修正。

埃及和埃及以外的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部分寄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政体的演变之中，但君主制和控制埃及的外国势力却对此形成阻碍。温和的现代主义已无路可走，此时穆斯林兄弟会（The Muslim Brotherhood）作为另外一个选择出现了，它也是现代化的，但却与现代主义者的道路不同。兄弟会的创始人是小学教师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1906—1949）。他希望能够以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复兴伊斯兰教。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所谓的萨拉菲叶（Salafiyah），也就是说植根于第一代穆斯林（即萨拉夫）的宗教。我们看到拉希德·里达（Rashia Rida）也使用了这个概念，而这也是北非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班纳本人对苏非主义颇为心仪，虽然他所组建的穆斯林兄弟会避开了数世纪来苏非主义的积弊，但却遵循着苏非所强调的个人虔诚。 *490*

作为一个社团，兄弟会的活动多种多样：它对政治和经济很有兴趣，同时又投身体育运动。在这些方面，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城市化的宗教运动，而少有传统的因素。但是，它在教义和礼拜活动方面是极端的新基础主义，同时还致力于把穆斯林从外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穆斯林兄弟会，也就是伊赫万穆斯林（al-Ikhwan Muslimun），迅速成为埃及的一个极有影响力的组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成员已达一百多万。通过会议、讲道、出版物和全面积极的活动，兄弟会声名显赫。同时它还秘密从事暴力和革命谋略的培训。

以色列国的建立既给兄弟会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灾难。许多年轻的兄弟会成员参加了反以斗争。但是在阿以休战期间，兄弟会成员暗杀了埃及警察总长，之后又暗杀了首相。1949 年，哈桑·班纳本人被杀，此事很可能是官方授意。兄弟会活动被政府禁止。许多成员逃往其他阿拉伯国家继续活动，在叙利亚尤为出名。1951 年，兄弟会再次被宣布合法，它对加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Jamal Abdel Nasser）领导的“自由军官”（Free Officers）掌权寄予厚望。但是兄弟

会再次遭到镇压。此后在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s-Sadat,1918—1981)统治期间,它获准活动。但是兄弟会采取了极端的行动,在1981年暗杀了萨达特,这次问题还是出在以色列:兄弟会认为萨达特的和平斡旋是对阿拉伯事业的背叛。

491 1982年,据信有一万多人在兄弟会的中心、叙利亚城市哈马(Hama)被杀,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叙利亚其他一些主要城镇。他们被视为对阿拉维派政权的威胁,该派以一个小派别为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世俗的。1979年麦加大清真寺被占领,随后发生了流血事件,占领清真寺的就是兄弟会的一个支派。可以说在阿拉伯世界的不同部分,这个组织都很活跃,因而被视为现存政权的威胁。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对待那些在他们看来是背叛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和西方对伊斯兰的威胁,兄弟会一样严酷。而由于以色列国的存在,这些问题常常变得非常具体。

尽管兄弟会成员在组织和宣传方式方面非常现代,但是他们对待教育和国家的态度并不如此。他们认为,为重新恢复沙里亚而奋斗是他们的责任和命运。一个穆斯林国家中存在一个多元化的政府就是背叛。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应该以《古兰经》为宪法。他们在法律方面的这一强硬路线非常重要,这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由于赞成严格实施法律,他们无疑会同意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在1908年写下的一句格言:“改革的伊斯兰不再是伊斯兰。”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祖国的问题,英国的承诺前后不一。犹太国随后在1948年建立,穆斯林应当如何应对西方的问题因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使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突出,也形成了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团结一致的意识。而分别发生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战争,更让强烈的敌意持续存在。

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Zionist Congress)召开,以色列国自身就是此次会议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实现。但是,这一计划中包含着宗教的不确定性。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世俗的民族主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支持者都曾是或正是社会主义者,对这些

人来说，以色列就是一个新纪元的预示。基布兹(*kibbutzim*)，即公社，是对理想的集体生活的实现。在驻扎于巴勒斯坦的各基布兹中，常常弥漫着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的气氛。由于和民族主义之间联系密切，犹太复国主义有时带有右翼政治色彩，就像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1880—1940)的思想中表现的那样。至于宗教上的犹太人(religious Jews)，他们往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或对此漠不关心。原本打算在慕尼黑(Munich)召开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计划，就是因为德国拉比们的反对而改变。

不过，犹太复国主义也得到了宗教人士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自1904年以来担任雅法(Jaffa)拉比的库克(Avraham Yitshaq Kook，1856—1935)。此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个学者，他在圣地看到了信仰复兴的希望。正因为这一点，他遭到了与他一样信奉正统犹太教的人的反对。

他的儿子叶胡达·库克(Tsevi Yehuda Kook，1912—1982)超越 *492*
了较早期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他认为，正统派的任务是维持以色列的现状，抵制世俗生活方式的侵蚀。他参与了创建注重军事和积极行动的正统派组织的活动，关注的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the Six-DayWar)后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扩张，并建立定居点。这一运动以信仰者集团(Bloc of the Faithful，或 the Gush Emunim)而闻名。

在以色列，宗教的不确定性在被称作"圣城卫士"(Neturei Karta)的组织身上表现最为深刻。该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极端正统的哈西德派犹太人(Hasidic Jews)，他们常常在安息日用石块投掷汽车，或是以别的方式对耶路撒冷那些违反犹太律法的行为进行强烈抗议。他们聚居在城市一隅，是一个封闭的社团，可以自行管理，并且不用纳税和参战。他们穿着传统服装，研习《妥拉》，他们是新锡安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不过，以色列国逻辑中还存在更深层的问题。由于这个国家是在民族的基础上组成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但是，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主要靠宗教维持。因此当国家希望从宗教中脱离出来以适应民主政治时，必然会带来张力。而且，对于复杂的事物，新建的以色列国采用了本属奥斯曼土耳其的做法。奥斯曼帝国采用米兰

特(*millet*)制度，让巴勒斯坦和别处的犹太人管理自己事务，并通过一位首席拉比行使自己的法律。根据1953年以色列的一项法律，拉
493 比在家庭法和属人法方面有裁判权，因此在以色列没有民事婚姻(civil marriage)。既然拉比是正统派的，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人在以上事务中没有地位。对于犹太人来说，公民身份是由哈拉卡(*halakhah*)，即律法来确定的，但这个国家却声称是世俗的。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和非犹太人公民的地位有关。很明显，赋予信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以投票权，让他们可能运用投票权来推翻犹太国，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被允许的。这样一来，这些团体的成员就必然处于某种次等的地位。不过，对大



被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损毁的律法书卷。在掩埋之前，大拉比戈伦(Shlomo Goren)正在对之进行检查。

部分人来说，以色列的制度还是多元化和民主的。以上张力无疑将继续存在。同时，巴勒斯坦人将会看到自己的国土被残酷地剥夺。

由于耶路撒冷被认为是三大宗教的圣地，这一事实给以色列带来了更多宗教方面的压力。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发誓，为了伊斯兰教的事业，在夺回耶路撒冷前绝不停歇。而且，伊斯兰教在传统上把世界区分为伊斯兰领域和战争领域，后一领域是展开武装斗争和吉哈德的场所。以色列国就像是对纯粹伊斯兰领土的一次痛苦入侵，因 494
此斗争反抗就是穆斯林的职责。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犹太复国主义如同插在信仰心脏上的一枚匕首。而从阿拉伯人的观点来看，犹太复国主义还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延续，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国就会解体。因而，苦难和冲突的许多根源还将存在。

北非的伊斯兰教

在埃及以西，从摩洛哥到突尼斯，北非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及其腹地被称作马格里布（Maghreb）。利比亚有时也被包括在内。这一地 495
区的宗教逐步被穆拉比特（marabout），即具有奇妙能力的圣徒所主宰。圣徒逐渐成为兄弟会的号召人物，兄弟会成员及其家庭中的妇女儿童以圣徒为中心聚合在一起。在许多地区，所有人都属于这个或那个兄弟会，不少人属于多个兄弟会。这就是典型的马格里布宗教。圣徒的神奇能力在他死后依然存在，他的坟墓被认为具有同样的力量。这是广泛传播的苏非现象在北非的独特表现。在伊斯兰教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西非的传播中，穆拉比特的角色也很重要。

但是，法国统治了该地区，此后意大利又统治了利比亚，这种宗教的影响日渐减小。因为在开始信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兴中产阶级中，所谓萨拉菲叶运动及其改革的新基础主义逐渐成为主流观点。根据萨拉菲叶的解释，马格里布地区被外国人占领，是因为兄弟会败坏分裂了宗教。马格里布地区的萨拉菲叶运动是一个总体性的运动，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但是，当各个国家取得独立之后，不论是在君主制的摩洛哥，还是在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和资本主义的突尼斯，宗教都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之中。在利比亚，也存



阿尔及利亚试图把伊斯兰教和现代民主制度融合起来，尽管1990年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在大选中的胜利导致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建立了军事统治。

在对兄弟会的新基础主义评论：卡扎菲上校（Colonel Muammar Qaddafi，1942—）倡导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这一主张是彻底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同时强调和严格信奉《古兰经》，而非伊斯兰教中积累的诸多传统。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乌勒玛都从属于政府。

伊朗及其对现代化的强烈反冲

16世纪，什叶派在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被立为国教，它在波斯的地位得到巩固。阿拔斯一世(Shah Abbas，1527？—1628，1587年开始统治)在位期间，文化极为繁盛，美丽的伊斯法罕就是在此时建设的。不过，宗教强迫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阿拔斯一世的统治标志着不宽容的开始，事实上这也起到了保护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作用。萨法维王朝最终在18世纪崩溃。一番兴衰交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包括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英国都插手波斯的事务。1921年，礼萨汗(Reza Khan)发动政变，后来他号称诸王之王(Shah of Shahs)，其政治制度相当稳定，一直延续到1979年。

礼萨汗效仿凯末尔·阿塔图克的政策。他废除了宗教学校，把教育现代化，劝阻妇女佩戴面纱，为波斯(从1935年起称伊朗)，至少是波斯的城市设定了西方化的道路。由于礼萨汗同情希特勒，在1944年，当时占领伊朗的英俄联手行动，将其赶下王位。礼萨汗的儿子穆 496
罕默德·礼萨(Mohammad Reza，1919—1980)继位，但是其步子走得更远。特别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他推行现代化，组建庞大的军队，这一切都靠大量的石油开采权使用费来支付。

1979年的伊朗革命部分是对这些变化的传统主义反击，部分是对国王政权中高压警察制度的反应。反对力量由多种成分组成，伊朗共产党(Tudeh Party)，自由主义的穆斯林，伊斯兰社会主义者，还有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0？—1989)为首的新基础主义什叶派运动。霍梅尼曾在1963年被捕，后被驱逐出境。他先在伊拉克的一个什叶派中心生活，而后住在巴黎郊区。他所传达的信息相当新鲜：他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要遵从伊斯兰教法的指示，为此体制中设立了一些宪法监护人。共和国中设有议会，应该是民主制的。尽管它本身是个有些保守的运动，但在与过去君主制伊朗的关系上，表现非常激进。它的目的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消除君主制和世俗的 497
种种主张。同样激进的是，它还要求进行伊斯兰式的生活试验，把教

法运用于银行业、资本主义的运作过程，还有婚姻安排和家庭生活。它要把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伊斯兰化，让公众过明显和自觉的虔诚生活。



妇女节的示威活动，向革命政权和阿亚图拉霍梅尼展示忠诚。

从否定的方面来看，伊斯兰共和国要同两个大撒旦做斗争，一个是苏联的无神论，一个是西方无信仰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它还要反对穆斯林世界的无神论倾向，比如复兴党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它还充满希望地要把革命的动能输出到国外。而且，许多国家和各种环境中的穆斯林确实对伊朗摆脱西方、建立伊斯兰式的独立的做法表示赞赏，尽管他们可能并不赞同霍梅尼在革命后建立的政体。

巴哈伊信仰：来自于伊斯兰教的新信仰

霍梅尼治下的伊朗不是一块宽容之地。伴随这股复兴主义的意识形态，某些组织自然会受到追剿。巴哈伊信仰(Baha'i)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因为它被视为穆斯林异端，而非单独的宗教，而对异端，

是不能有丝毫宽恕的。巴哈伊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其美国总部位于伊利诺斯州（Illinois）的威尔梅特（Wilmette），世界行政中心位于海法（Haifa）。但我们还是可以视它为从什叶派伊斯兰教范围内产生的激进现代化运动。

巴哈伊信徒追随的是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Mirza Husayn Ali Nuri，1817—1892）的教诲。此人也就是著名的巴哈欧拉（Baha' Allah），即神之荣耀。巴哈欧拉是巴布派（Babis）运动的追随者，追随的是通往真理的门，即“巴布”（Bab）。被认为是“门”的是一个赛义德（Sayyid）[①]，名叫阿里·穆罕默德（Ali Muhammad，1819—1850），出生在波斯的设拉子（Shiraz）。在其门徒看来，巴布是联系他们与什叶派传统中的隐遁伊玛目的纽带。后来他们卷入了反对现政权的起义，巴布在大不里士（Tabriz）被火刑处死。他的学说包括对《古兰经》的象征性解释，以及对救世主到来的期待。

在巴哈伊信徒看来，巴哈欧拉就是这个救世主。巴哈欧拉被囚德黑兰（Tehran）期间，经历了一次非凡的宗教体验。此后他宣布自己就是先知，大部分巴布信徒都追随了他。被流放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之后，他和门徒又被奥斯曼人驱逐到巴勒斯坦，安顿在阿卡（Acre）。巴哈伊信徒也把巴勒斯坦视为圣地。

巴哈欧拉的长子阿拔斯·欧芬迪（Abbas Effendi，1844—1921），也被称为阿卜德·巴哈（'Abd al-Baha），即“荣耀的仆人”，承担传教和组织的工作，先后游历埃及、欧洲和美国。他在遗嘱中指定自己长女之子绍基·欧芬迪·拉巴尼（Shoghi Effendi Rabbani，1899—1957）为继承人。此时整个巴哈伊运动已经由一个委员会来管理了。

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带有进化论的色彩。在它看来，世界各宗教，特别是它主要关注的西方三大宗教没有过时，也没有错误，而是都处
在道路的不同阶段。因此，可以认为穆罕默德是“众先知的封印”，但 *498*
这只是在他完成了前任工作的意义上而言。即使是巴哈欧拉，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被人取代。这里更多强调的是神内在的不可知性，但是神的逻各斯会使自己为人所知。因此，巴哈伊在教义上倾向于宗

① 即圣裔，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所传后裔的尊称。——译注

教真理的相对性，以及所有宗教本质上的一致。

从叙述角度来看，巴哈伊信仰认为巴哈欧拉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将成为行动的主要舞台，向着世界政府发展而去，并且重视人类平等及男女平等。世界语言（即英语）和人类事务中的非暴力态度都受到巴哈伊信仰的青睐，因而在伦理方面，巴哈伊信仰强调兄弟姊妹之爱，禁止喝酒，服务人类。

在仪式层面，巴哈伊信仰要求每日私下祈祷，还有一定时间的斋戒，但它不是很仪式化的宗教。由于相信各宗教本质上的一致，因此巴哈伊信仰对各种形式的宗教经验，包括沉思方面的发展都很关注。在组织层面，它有一个神权政治的选举体制。至于物质表现，各种不同的宏伟殿堂，比如位于威尔梅特的那一座，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型建筑，用世界各个信仰的象征标志装点。

简而言之，尽管巴哈伊信仰脱胎于什叶派伊斯兰教，并抓住隐遁伊玛目的概念，使用了什叶派末世论的主题，但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信仰，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和现代化的特点。它是精神革命的范例，在世界文化之全球化状态出现前，它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这个一体化的世界作了宗教方面的准备。

因此，巴哈伊信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对更为传统的宗教之间的冲突感到不满并进行反思的人。在南亚和非洲，它那具有伊斯兰教的色彩但却外向型的信息，使它很有吸引力，信仰人数极大增长。在伊朗，它是最大的宗教少数派，但是近来由于伊朗革命的影响，却身处困境。目前巴哈伊的全球信仰人数约为 200 万。

中东以外的伊斯兰教

巴基斯坦：一个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宣教会（Jama'at-i Islami）给新巴基斯坦国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该组织本是毛拉纳·毛杜迪（Mawlana Mawdudi，1903—1979）在 1941 年创建的一个政治运动。毛杜迪对真纳的世俗化很是怀疑，但是对巴基斯坦分治却颇为心仪。他常常激烈地反对政府，而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伊斯兰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非穆斯林不享有

完全的权利。他预言要把伊斯兰教法运用于公共生活，对宗教采取一种整体化的观点，即将政治、经济、私人生活和公共崇拜凝聚在一起，形成单一的整体。由于参与了 1951 到 1953 年之间的反阿赫迈 499
底亚(anti-Ahmadiya)暴动，毛杜迪被捕入狱，甚至被判死刑，不过没有执行。在巴基斯坦与孟加拉(Bangladesh)战争之后的文官统治中，他的组织失去了许多地盘，但依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现在的孟加拉，它从来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其中原因尤其在于它在战争中支持的是巴基斯坦。不过，齐亚·哈克(Zia ul-Haq)统治时期实施的伊斯兰教法，确实使伊斯兰宣教会对伊斯兰体制的鼓动产生了一些实效。

从另一方面看，孟加拉国建立于 1971 年，但从来没有真正展示出对伊斯兰宪法的这种理念的热情。

中亚的伊斯兰教

前苏联的穆斯林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高加索(Caucasus)、伏尔加河(Volga)中游流域和中亚。在俄罗斯向东扩张时期，为改变许多穆斯林的信仰，尤其是伏尔加河地区的穆斯林，曾做过多种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延续了相似的政策，只不过是用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来取代宗教。不过，沙皇时期对整个土耳其斯坦(Turkestan)[①]的伊斯兰教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基督教传教士所进行的劝诱改宗活动被禁止，受到伊斯兰现代主义更直接影响的鞑靼人(Tatars)的现代主义宣传甚至也被禁止。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鼓励落后，以便利俄罗斯进行统治。结果，当俄国发生革命时，土耳其斯坦爆发了反对苏维埃的起义。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宗教因素的激发，历时十年才被镇压下去。

自此以后，俄国对中亚的移民和无神论宣传都加快了步伐。尽管如此，尽管清真寺和教育体系还受到种种过分要求的严格控制，伊斯兰教依然存活了下来，甚至以自己的方式繁荣着。宗教教育和出版实际上被禁止，只有政府掌管的小型培训学校还存在，培训数量有

① 对里海以东广大中亚地区的一种称呼。——译注

限的教职人员。不过据估算，大约 80% 的非俄罗斯人依然是穆斯林，这是从中亚有 3000 万穆斯林人口推算而来的。据估计，按照苏联的分类，这 3000 万人中有 20%，属于"狂热分子"。也就是说，这些人属于坚定的信仰者。其他人则更受传统影响。但是，即使占 20% 的无神论者，实际上也都行割礼，并按照伊斯兰教的仪式举行葬礼。不过，整个地区能正常运转的清真寺，很可能不到 200 座。

因此，一方面是公开的伊斯兰教或多或少地失去了活力，但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实践依然以一种更为私人化的方式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原因何在？当然，部分是由于民族主义情感，这些人感觉自己处在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威胁之下。不过更直接的解释是，苏非教团依然存在，这是政府无法控制的，因为他们能够秘密活动，能够通过口头的语言来展开活动，不需要和当局发生公开冲突。他们
500 代表的是一种巨大的地下宗教活动，在其他地区，例如高加索，也同样如此。

在多个苏非教团中，纳合西班迪教团是最重要的。该教团建立于 14 世纪时的布哈拉(Bukhara)，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中长期发挥着显著作用。它在苦行禁欲方面并不过分要求，这就非常适合在苏联进行传教活动。同样重要的是建立于 12 世纪的卡迪里教团(Qadiriya)，其创始人是圣徒阿卜德·卡迪尔('Abd al-Qadir，1088—1166)，他来自里海(Caspian)地区，其陵墓位于巴格达，是一个重要的朝圣之地。(顺便说一句，朝觐圣徒陵墓的习俗备受改革派新基础主义穆斯林的谴责，他们认为这一做法是中世纪的创新。)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改革派对苏非派都怀有成见，常常认为他们是信仰堕落、背离正道的原因之一。但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苏非派确是伊斯兰教能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1979 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扶持 1973 年国王被驱逐之后建立，而今被围困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以牢固确立自己在阿富汗的影响。这就引发了阿富汗境内伊斯兰游击队组织的抵抗，这抵抗尽管并非团结一致，但却很顽强。在这种环境下，苏联政府并不可能总是对中亚军队的忠诚抱有太多指望。



卡塔尔多哈(Doha)大清真寺的内景。

东南亚的伊斯兰教

13世纪以前，伊斯兰教社团在东南亚地区一直没有占主流。此后，伊斯兰教的影响可能主要在孟加拉，或是更广泛地说，在印度。但是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贸易一直引人瞩目。穆斯林商人，还有当地统治者雇用的穆斯林顾问，是伊斯兰教逐步渗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圣徒和传道士，特别是苏非的作用也同样重要。苏非派的神秘主义与印度教和佛教的主题相混合，这在爪哇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军事力量有时也很重要，因为沿海的统治者会控制本地区而独立于内陆封建统治者。到15世纪后期，伊斯兰教在爪哇占据优势，并逐渐向印度尼西亚群岛更遥远的岛屿渗透。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巩固一直持续到殖民地时代。伊斯兰教的影响还到达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以及缅甸沿海的部分地区。

尽管英国在1795到1824年之间控制着马来半岛和新加坡殖民

地，但是荷兰人在这一地区占据优势。此前葡萄牙人曾在马六甲和其他地方颇具影响。欧洲对该地区的主宰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因此萌芽。

503 伊斯兰现代主义和瓦哈比改革运动对该地区带来很大冲击。1912年，这里就建立了组织良好的运动，即穆赫迈底亚（Muhammadiya）运动。该运动旨在净化伊斯兰教，特别是净化爪哇中部的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教中带有的民间宗教因素。换言之，它的目的在于根除典型的小农世界观，以及该地区印度教、佛教传统根深蒂固的某些方面。但是，运动逐渐成为一个泛印度尼西亚运动，在传教和出版活动中，它按照荷兰改革宗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的方法进行了组织建构。在伊斯兰宗教教育的改革和现代化方面，该派也贡献良多。

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更为保守的力量此时亦有大举措。1945年独立以来，印度尼西亚发生过代表不同地区伊斯兰政府的三四次武装起义。在马来西亚，有些州实施伊斯兰教法，赋予教法联邦地位的活动一直存在。印度尼西亚官方统治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可以总结为五项准则，即潘查希拉（*Pancasila*）[①]，这原本是对佛教传统中的五戒的称呼。对于这一意识形态，国内也存在不满。

由于爪哇是印度尼西亚的中心，它的价值观常常被视为可以使用于全国，因此，爪哇的影响最为重要。潘查希拉方案寻求为整个印度尼西亚创造一个多元框架：五项准则分别指信仰神、民族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后面四项，穆斯林原则上没有异议，尽管有人认为民族主义理应从属于穆斯林的精神。但是对信仰神这一点的解释却是有意模棱两可，这样一来，苏拉威西岛（Sulawesi）中部托拉查（Torajas）的宗教也被囊括在其中。而从穆斯林的观点看来，它无疑是多神论和万物有灵论。毕竟，印度尼西亚是由众多岛屿组成，人民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语言，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倾向于一种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以便不疏远各个地域的群体。

① 又称建国五基，其内容由1945年颁布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规定。——译注

对现代伊斯兰教的反思

我们对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各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在后面关于东欧(第二十二章)和黑非洲(第二十三章)的章节中,我们还会涉及到这一内容。我们看到,现代主义和新基础主义已经成为主宰一切的主题,这些运动中的伊斯兰教已与过去的伊斯兰教存在距离。尽管苏非派在西方的一些圈子里深受欢迎,对苏联地区伊斯兰教的存活它也有重大贡献,但它还是受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来自新基础主义者的批评。苏非派对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座桥梁,把伊斯兰教与先前存在的各个宗教和民间膜拜连接了起来。

伊斯兰教通过改革运动逐渐巩固了自身,越来越具有一致性。 *504* 部分原因在于现代空中运输使朝觐麦加比以往更加容易,有助于伊斯兰团结的巩固。而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又促发着利益冲突。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有时会使各实体相互斗争,造成严重的冲突。比如始于1980年的两伊战争,部分原因在于种族差异(伊拉克攻击伊朗,想占领其西南领土,那里的多数人口操阿拉伯语),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宗教(尽管什叶派在伊拉克非常强大),而更多还是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即伊拉克政权奉行的世俗思想和伊朗霍梅尼政府的复兴主义之间的不同。

尽管存在诸种障碍,伊斯兰团结的基础结构至少还是存在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了伊斯兰复兴,提出了回到伊斯兰教早期、考虑或是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要求。但是,宗教复兴主义者想要回到早期的根基,而一些更为激进的信仰者渴望采用某种伊斯兰现代主义,在这两种人之间,确实有一道鸿沟。目前的种种迹象相互冲突:随着伊斯兰教传播到穆斯林本来为少数的欧洲、美国和其他更多 *505* 地方,对这些地方的伊斯兰教来说,重要的是现代主义的压力。但是,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重要的却是实施复兴主义的法律的压力。对于克莱默勋爵提出的那个问题:改革的伊斯兰教还是伊斯兰教吗? 我们依然在等待着答案的出现。

也许我们可以从马来西亚发生的这些事件中，发现伊斯兰教法中的一些纠缠不清之处。必须注意，马来半岛是马来西亚这个复杂联盟的中心地带，那里实际上存在一个华人少数派（同时还存在其他一些少数派）。他们基本上都不信仰伊斯兰教；而马来西亚恰恰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分为多个由王公统治的州。在某州，来自另外一个州的三名年轻女子参加了选美比赛。但是该州的穆斯林教职人员领袖宣布，从伊斯兰教法的观点来看，参加选美是不合法的（选美当然是一种违背传统伊斯兰价值观的西方现象）。但随后发生的事情更糟，大穆夫提宣判政府的几个部长叛教，因为他们阻止伊斯兰刑法在另外一个州生效。按照这一刑法，对偷窃和通奸的惩罚是断肢和石击。同时，关于妇女着装的法令也不断严格。而法令依据的不是马来西亚传统，而是在马来西亚并不受欢迎的阿拉伯习俗。然而，各州苏丹的权威又以不同的方式和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这就打击了现政权进行现代化、实现信仰宽容的积极性。马来西亚首相曾经下令做一个审查，统一制定各州所有法律。但是，这样会对少数派有利吗？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紧张状态，进行现代化的需求，以及互相纠缠的各种传统看法，使整个国家的情况一团糟。

对伊斯兰教局限性的补充说明：阿赫迈底亚

伊斯兰教的自我定义最终还是存在问题。我们可以阿赫迈底亚（Ahmadiya）为例，阐明这一问题。阿赫迈底亚是一场运动，它发端于印度。在世界某些地区，比如西非，它的改宗工作相当成功。这很可能是伊斯兰组织中最成功的传教活动，它在世界各个部分拥有上千万成员。

该运动的基础是米尔扎·库拉姆·阿赫迈德（Mirza Ghulam Ahmad，1835—1908）的学说。他来自印度北部旁遮普一个叫做卡迪亚（Qadian）的村庄。他是一个复兴主义者，宣称自己具有特殊的地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纳比（nabī），即先知。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正统穆斯林与之保持距离，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后，绝对不需要再有别的先知了：这就是为什么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阿赫迈德还把自己视为弥赛亚和印度教预言的复临

的毗湿奴的化身。他不认为弥赛亚具有某种超凡的本体论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耶稣事实上并没有升入天堂，而是逃离了十字架，踏上了前往克什米尔的旅途，他的坟墓位于斯利那加(Srinagar)①。理所当然，关于耶稣的这个观点同时开罪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对穆斯林来说，根据《古兰经》中惯常的解释，耶稣从来没有被钉上十字架。不过，阿赫迈底亚运动在许多方面与伊斯兰教是一致的，尽管它拒绝接受武装圣战的观点。 506



塞内加尔的达喀尔(Dakar)，穆斯林在过于拥挤的大清真寺外礼拜。

阿赫迈底亚运动内部的分歧导致了支派的出现，在拉合尔(Lahore，现巴基斯坦境内)建立总部的一个支派与正统伊斯兰教比较接

① 为克什米尔西部城市，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首府。——译注

近，它否认米尔扎·库拉姆·阿赫迈德是先知，仅称他为改革者。另外一个支派卡迪阿尼派（Qadiani）则更为激进，它于1947年在巴基斯坦拉布瓦（Rabwah）建立。该支派在传教方面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因为其成员的热忱，他们强调宗教中热忱、富有生命力的部分，而不仅
507 是外在的仪式。除此而外，还因为他们采用了现代基督教传教的方式：当众宣教，散发小册子和其他印刷品，有良好的组织，以及有时咄咄逼人的宣传。但是，该派受到正统派的敌视。1954年，巴基斯坦裁定，卡迪阿尼派不是伊斯兰教，不应当使用暗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那些主张。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现代伊斯兰教的趋势是按照正统教义来严格定义宗教：一个不进行宗教实践的正统穆斯林要比一个进行宗教实践却不正统的穆斯林好得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阿赫迈底亚运动目前的法律处境更糟，如果它留在印度教为主的印度，情况可能还会好些。

复兴主义伊斯兰教的诸层面

尽管伊朗革命非常重要，但可以说未来更多地还在于逊尼派伊斯兰教内部的复兴运动，比如穆斯林兄弟会。至少在一些国家，比如苏丹、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确实存在着实施伊斯兰教法的要求：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存在着进行类似立法的呼声。这一复兴主义的精神要求重建规则，但是其使命往往以最新式的词语表达。我们可以从这种伊斯兰教中辨别出如下诸层面的内容。

教义层面，复兴主义伊斯兰教倾向于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从字面含义对《古兰经》进行解释。它不敌视科学，但是不接受中世纪和前现代伊斯兰教的一些哲学体系。至于叙事层面，它理所当然地认可先知的事业，并以此为焦点。但是它还认为，由于种种创新，伊斯兰文化已经背离了真正伊斯兰教的精神，也正是因为所有这些，伊斯兰教已经落入了目前相对而言令人遗憾的境地。伦理和法律层面，它号召重新实行沙里亚。在饮酒和妇女的举止这类问题上，它非常严格，通常赞成佩戴面纱。由于它是传统主义的，但又不是非常传统——因为它正是从挑战传统、无视传统的环境中产生的，它对传统的

拥护是一件自觉的行为，因此非常强调"皈依"真正的伊斯兰教。与典型的纯粹的传统穆斯林相比，复兴主义伊斯兰教具有更明显的传教热情。因此在经验层面，它精力旺盛：但不是朝着苏非神秘主义沉思的方向发展，因为在复兴主义者眼里，苏非们的实践通常败坏了伊斯兰教的名声。从组织层面来看，复兴主义伊斯兰教从基督教传教士那里学到了很多方法，不过，它还是很强调伊斯兰教教育。在仪式层面，它很虔诚，强调常规公开礼拜的重要性。在物质层面，它常常在修建新清真寺问题上一马当先，特别是在那些穆斯林处于少数地位的地方；因此，在斯里兰卡的小巷里，在英国利物浦的后街上，都会看到由石油财富赞助修建的新建筑。伊斯兰教正处在一个生机勃勃的全球阶段。

第二十一章　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影响

欧洲人带来的太平洋地区的开放

508 早在16世纪初，西班牙人就已经能够从墨西哥航海到达印度了。到16世纪末，他们已开拓了从东方返回的航线。葡萄牙的麦哲伦(Magellan)开拓了向南绕过好望角的路线。18世纪，出现航海发现的第二次浪潮，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1728—1779)作为一位重要的探险者，探查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岸，并接触了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包括夏威夷(他死在那里)。后来，捕鲸人和殖民者登上了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岛屿，欧洲帝国主义打开了这里的门户。传教士遍布这一地区，特别是在19世纪期间，基督教成为这里的主导宗教。

在17世纪后半叶，西班牙人将天主教输入马里亚纳(Mariana)群岛，来自菲律宾(那里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传教团来到这里。伦敦传教协会于1797年进入塔希提岛(Tahiti)。从那以后，他们又进入了库克群岛(Cook Islands)，萨摩亚群岛(Samoa)，图瓦卢(Tuvalu)，以及吉尔伯特(Cilberts)，基里巴斯(Kiribati)。美国的传教士于1820年开始在夏威夷工作，基督教很快就变成夏威夷女王治下的官方宗教。循道宗在国王皈依(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乔治)后，拿下了汤加(Tonga)，同样，在斐济，诸多岛屿也在循道宗的旗下统一起来。长老会在瓦努阿图(Vanuatu)占据了主导地位。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主要是来自法国)，在许多岛屿活动，天主教在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和新几内亚(New Guinea)成为主导宗教，但由于其规模广大且文化众多，因而没有像这一地区的其他岛屿一样统一起来：这里还有其他的基督教教派在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高地，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有传教士进入。在英国和德国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澳大利亚接管)，圣公会和路德宗地位牢固，但



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的一位传统主义者在参与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1984年主持的弥撒。

是也有其他的新教教派，罗马天主教现在是数量上最大的群体。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传教工作已经由本地的传教士来担当。 509

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地区，整个地区的人口都皈依了基督教，而且是一种特定的基督教派。这有助于社会在放弃旧有的宗教时保持

稳定。但是也有一些较小的教会在改变宗教信仰的过程中变得强大
510 起来，它们虽以牺牲基督教的既定形式为代价，但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些教会中最有名的是摩门教会，它由夏威夷向外传播，它不仅对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极感兴趣，而且渴望将其升华。

传教活动的影响是戏剧性的，主要是通过将《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这使语言有了新的维度，赋予《圣经》的形象和模式以巨大的力量。如此过程深深地影响了太平洋地区许多人的思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结果：衣着方式（特别是女人的衣着方式）改变了，与西方的贸易活跃起来，最戏剧性也是最令人悲哀的是：诸如麻疹等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小病小灾的事，给那些没有免疫能力的人带来灾难性的结果。直到引入西方的医疗之后，这种新的瘟疫才得到减缓。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太平洋地区的经历变得复杂，战争期间许多岛屿被日本人统治，后来当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军队浴血奋战，对太平洋地区进行反征服时，这些岛屿又成了后者的地盘。

还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在某些地区，由于外来人口的定居，当地人口变成了少数。在夏威夷，日本人和美国白人处处可见；在新喀里多尼亚，法国人流入很多；而在斐济，出现了许多印度移民，他们工作在制糖植物的种植园里，到 1980 年时，他们已成为微弱的多数。这些流入的人口，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很多怨恨。新喀里多尼亚处于法国的统治下，而夏威夷则被美国吞并为它的一个州。在斐济，由当地人发动的军事政变（coup d'état），推翻了 1987 年选举产生的、印度人占主导地位的政府。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陆地较大，有着与群岛极为不同的历史。这两个地方都受制于来自英国的殖民定居者的审慎的政策。

澳大利亚最初是作为处罚罪犯的殖民地。美国革命使美国无法再作为罪犯的殖民地，而当时英国流行的观念是，治疗犯罪这种疾病的最好方法是让罪犯离开这个国家，将他们送到海外去（因为许多人

认为犯罪有某种遗传的基因,这样做也许是一种永久性的治疗)。于是从 1788 年开始,首先由悉尼海湾开始,新南威尔士州变成了一个罪犯定居点。1813 年以后,殖民者发现了跨越大分水岭的道路,并向西扩展草场和农田。其他的殖民点也建立起来:诸如 1801 年在纽卡斯尔(Newcastle),1804 年在霍巴特(Hobart),1824 年在布里斯班(Brisbane),所有殖民点最初都是罪犯的定居地。但是逐渐地,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殖民地而不是一个惩罚地,而这一转变,则是由于在 19 世纪 50 年代发现黄金促成的。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国家。它的国土与美国差不多,也有一些 511
大都市。但是它的许多地方属空旷之地。定居者从海岸开始,向内陆进展,但是他们没有几乎与此同时的美国向西部大举进发的那种乐观主义。澳大利亚的广阔内地贫瘠而酷热,只有特别灵巧的生活方式才能适应,白人经常生病。所以当澳大利亚的定居者们向腹地进发时,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变得仅仅为生存而不是什么想像中的黄金城(Eldorado)而辛勤工作。所以在澳大利亚的神话中,关于生存的主题远远多于到达"黄金的西方"之主题。此外,澳大利亚背靠大洋,其历史的大部分是无意识地存在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澳大利亚人对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有了自觉的意识。他们的商店、他们的习俗、他们的郊区花园、他们的啤酒、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语言——所有都来自"家乡",这个家乡是大不列颠,而不是英格兰,因为他们将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很好地混合起来了。他们在陌生的海岸建立起不列颠的郊区。澳大利亚这个混合体有些像不列颠的情形,但是没有同样的阶级体制。

此外,尽管英格兰的教会在"罪犯殖民"的早期有些地位,但始终没有确立起它在英格兰那样的地位。各大主要宗派全都在澳大利亚建立起来,诸如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s)、救世军等其他教派,也都建立起来。罗马天主教总是极其重要的少数派,在 20 世纪后半叶已上升为 25%。最初他们主要是爱尔兰人。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所谓新澳大利亚移民,如波兰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等的到来,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又有越南人和其他

的亚洲人到来，他们打破了原来一直保持澳大利亚白种人的移民政策。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福音派的布道和思想在澳大利亚走势日盛，它们呼吁遵守禁忌，禁止赌博，遵守安息日等等。特别是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以前，在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有许多张力，这个因素还影响到澳大利亚和政治：罗马天主教徒大多参加工党。

新西兰的殖民者却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即有计划地定居下来。比如在克赖斯特氏奇（Christchurch），建立了圣公会类型的社区，而在奥塔戈（Otago，首府达尼丁，Dunedin）的社区，则是由苏格兰自由教会建立的，它是从加尔文派的苏格兰长老会中分离出来的改革派。但是在新西兰也有淘金热，在奥塔戈，由于淘金和其他的原因，劳工的价很高，刚开始形成的阶级体制被打破了。新西兰有类似于澳大利亚的体制，没有国教，但在学校中安排有宗教教育。新西兰一直只有数量相当少的人口，特别是在南部岛屿，这使之有一种相对繁荣的外表，对欧洲的绵羊出口也变得组织化了。

512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重要区别，必然影响到原住民的各自命运。尽管毛利人（Maoris）被剥夺了属于他们的土地，但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与白人进行了战争。他们的地位虽然被削弱了，但在理论上他们具有了平等的权利，而且部分地借助于保护性的原则，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地位逐渐有所改善。现在有许多人是混血种的后代，而那些有毛利人血缘（达到八分之一），并希望成为毛利人的人，其地位也能改善。重要的一点部分是因为欧洲人与原始波利尼西亚人（Proto-Polynesians）在身体上的密切相似，使种族融合变得容易了。不管怎样，毛利人至少强大得足以战斗自卫，因而两个种族要以互相尊重为基础才能共同生存（当然，在白人当中大有坚持种族主义的人）。而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太虚弱，太分散，他们与白人定居者在习俗上和文化上极为不同。他们完全被驱逐出澳大利亚的富庶地区，现主要居住北方和中部。在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他们被蓄意灭绝。种族灭绝的行动多次发生，许多白人拒绝将他们视为完全的人类。

今日澳大利亚土著的宗教

我们必须看到，现代土著人的宗教在这种极为忧郁的背景下发生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分为二或三种形式。首先是梦与土地之神圣性的本土宗教。其次是来自不同派别的基督教传教团。最后是两方面的某种混合。

在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土著宗教有所复兴，当时土著人对土地所有权采取了公开的和更有活力的立场，这部分地受到澳 513
大利亚工党的鼓励。由此出现了一个泛土著人的舞台，类似于美国的印第安人运动。尽管土著宗教表现为一种网络，这种网络曾在过去以相互重叠的神圣性和盘根错节的方式覆盖了整个大陆，但是这种宗教依然是地方化的。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之下，假如土著人想继续生存下去并获得相关的权利，他们就必须统一起来；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日益浮现出来的新的泛土著人的意识形态，它特别强调要包容土著人的土地观与环境观。对于此类观点，在现代西方的范畴里也表现出一种趋势，即将各种价值观混合在一起，其中生态学构成其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但这仅仅是刚刚迈进去发现澳大利亚广泛开展的运动如何塑造它自己的门槛。

需要补充的是，梦时代的观念本身并不适于解释变化，因为它将仪式和习俗固定在不受时间影响的情境里，因而只适于那些想继续保持它们的人。但是，由于土著人的土地被强有力的外来者侵占，现代至多只是一个被多次中断的时代。所以到目前为止，尽管人们可以提及一两处，但几乎不存在结合物和传统的重新塑造。因此，在东北海岸之外的埃考(Eicho)岛，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了一种运动，它将土著人的祖先和基督教所说教的先知合成到一起。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发起这场运动的人有一种相当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公开那些传统的秘密的神圣物体。这种做法的全部理由，就是他们的知识能够用来面对并结合由传教士和白人所展示的知识。土著人最初的系统虽然有助于保持他们最重要的力量的神秘性，但却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当然，期望的结果没有出现：外来者并不受所展示的假定知识的影响。但是也有适应的迹象：神圣的物体第一次为妇

女所见，承认妇女有其重要的权利（这与传统的土著社会不一致）。但是由于她们并不了解这些物体的意义，所以她们的地位还是不平等。

这个新运动随着强劲的基督教基要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复兴而逐渐终止，而后者以其安全保障，以其现代化的方法，比较温和的禁欲主义——这些在与流行的酗酒和其他社会疾病作战时，起到重要的作用——强有力地侵入土著人的生活。的确，如同其他的基督教形式一样，在旧有的宗教网络破碎时，它所具有的关于价值观的宗教网络，可以取而代之。与白人接触的结果之一，是许多年轻人离开传统，这使老一代大伤元气，并影响到整个群体。在这样一种文化崩溃的情境里，酗酒蔓延开来，而治疗的方法之一，就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新世界。

在澳大利亚的西部沙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起来
514 一些具有极简单仪式的新膜拜，它们适合于各种不同的定居者的混合群体，女人被允许参加成年礼（initiation），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是与土地权利相关联的政治活动。然而这些膜拜无一不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一种独立发展的泛土著的情结，但是无可怀疑的是，土著人在这种新的包容一切的重新肯定各种价值观的运动中，得到了书写他们的宗教并对之加以解释的学者们的帮助，比如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就写了《澳大利亚宗教：导论》（*Australian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1973）。

白人到来之后，毛利人的宗教生活

在19世纪后半叶，各种各样的传教团在北岛活动，那里是大多数毛利人聚居的地方。从基督教的观点看，它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毛利人像其他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实际上是全体皈依了这种新的宗教。传统并没有多大的反弹。然而，出现了两个毛利人的基督教运动：举手派（Ringatu）是在19世纪60年代由一个毛利战士创立的，他变成了一位布道家，而更为重要和更有活力的是拉塔纳（Ratana）运动，它以其创建者命名，拉塔纳在战胜了酗酒之后皈依了基督教。这是由毛利人控制的教会，它在政治角斗场中，在争取人类

尊严和社会正义的斗争中也能够发挥作用。

近来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迹象，现在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古老的毛利人的宗教，被用作基督教信仰的背景，即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旧约》。这种运动当然是以各不相同的形式广泛出现于第三世界。白人主流教会在宗教问题上也采取了开放平等的姿态：早先的一位新西兰大主教就是个毛利人，他曾任州长—统帅（即国家的尊敬的总统和英联邦之女王的代表）。

新西兰的奥克兰（Auckland）也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城市，来自不同岛屿的非毛利人的波利尼西亚人汇聚于此，部分的原因在于这里的疆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交由新西兰托管，部分的原因在于这个城市的吸引力。基督教的非常传统的形式在此获得成功——无疑给予移民的流动生活以一种确定的和有根的感觉。

美拉尼西亚与船货崇拜

德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在不同的时期统治了新几内亚及远离中心的群岛（在那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统治在起作用），其影响较为巨大。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现的所谓的船货崇拜（Cargo cults）是主要的回应。这些运动基本上以本土的范畴为基础，但是经常与基督教的神话的和末世论的因素混在一起，期求与作为欧洲人带来的货物的源泉的神灵建立联系。这些货物，从罐头食 516
品到无线电收音机，都让当地人大开眼界。在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中，蔬菜和谷物起源于不同的神灵：比如他们知道是哪位神灵将芋头带给人类。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欧洲人的船货中，也必定有其超越的或隐藏的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助长了当地人的惊奇，他们对美国人带来的日常的大量供给惊叹不已。而按照他们的仪式范畴，无疑地，他们也有可能直接进入这些物品的神圣源泉。假若白人否认有这种神圣的源泉，或说这些物品产生于工厂，那无疑地是他们在掩盖，以便只有他们自己拥有这些船货。



船货崇拜，在美拉尼西亚特别普遍，图中表现了孟加拉湾尼科巴（Nicobar）群岛（与南太平洋诸岛可能有语言上的联系）的贡品。图中，位于顶部的白人被各种船货，诸如枪、笔、镜子等等包围着。第二层是个传统的小房子，两边是西方的船。再下一层是传统的货币，即猪。最底层是各种不同的海洋生物。

有时这种膜拜还引起白人的逗乐子的蔑视。那种通过在新几内亚建造小规模的机场,并举行某些仪式就能得到烘豆的想法,乍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是这些膜拜有着更深刻的意义,这是旁观者所不能一下子就看出来的。罐头食品等等,只是被当地人看作更高力量和更重要的知识的具体显现。他们知道那种知识更为重要,并因此有时将入侵者看作神灵。尽管他们知道那种知识更有力量,但是他们并不拥有它,他们并不知道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他们如何能够想像工业革命、劳动分工、牛顿的物理学、资本主义、亚当·斯密和凯恩斯(J. M. Keynes)的思想是怎么回事?这一切全都在他们的文明视野之外。新来的船货是力量的符号,他们力图掌握获取它们的权力, 517
但是他们所知道的惟一途径,就是仪式的手段。说到底,他们的仪式曾使他们收获足够的芋头。

尽管这种新的宗教运动的观念机制是本土性的,但是这些形式却不同于纯粹当地的膜拜,通过基督教的版本,它们演变成了具有混合特征的基督教—本土的运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意识变成自觉的,所以人们可以发现第四种,即有意识地回归传统,或可以称为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的东西。仪式的重要性到处可见。在基督教运动中,既有对正确行为的强调,也有某种适当的复古主义的仪式。有时,特别是在一些混合运动中,人们会毁坏自己的水果和农产品,砍树毁田。这是在为千禧年做准备的一种表现方式:这些运动受到基督教的强烈影响,未来的神话显得格外重要。作物的毁坏不仅为神奇地出现的富裕的未来铺平了道路,而且也表现为一种巨大的献祭,其隐含的意义在于拒绝那些曾经提供旧的食物的神灵,而而向那些提供新食物的神灵。

如同许多其他的新宗教运动产生于小规模的社会与强有力的殖民统治相遇的地方一样,船货崇拜代表了使用古老范畴的第一次实验。但是它们最终并没有作为新宗教存活下来,因为它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分水岭那一边的观念。随着西方模式的教育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化——包括在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的高等教育和在斐济的南太平洋大学,也许会出现某些更新的文化汇合形式。有迹象表明这种新形式已经出现,如在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的摩洛

运动(Moro movement),就将基督教、传统和资本主义混合在一起。可以说它"超越了船货崇拜",因为它已经跳跃到"另一边"。

太平洋地区的道路

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太平洋地区,基督教(大部分是新教)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许多地区,皈依是群体性的和从上自下的。这有助于整个地区的稳定。当然,它们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社会,分散在从密克罗尼西亚到波利尼西亚的群岛上。因此它们很容易受到"海岛逻辑"的影响,即它们特别容易受到外来力量的侵害。

由于它们是小规模的,由于现代世界是个巨大的经济的和组织化的力量的混合体,因而对于岛民来说,"联合"是特别重要的:为此目的形成了南太平洋地区(包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参与的"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这也导致是否有某种精神上的对等物的问题,某些人还撰文论述"太平洋地区的道路",以代表这一地
518 区的价值观念。这种"道路"寻求与某些前基督教的价值观的混合在一起;在某些方面,这里隐含着复兴。这一地区的人们经常认为,北方的基督教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将要由太平洋地区的更新和更充满活力的基督教使之复兴。这些人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把握住了基督教的重心确实正在向南移动。

随着在更大的南方国家中的毛利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意识觉醒,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现的新的政治结合体,这一地区可能会在小规模群体争取尊严的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几内亚的西部地区,在荷兰帝国之后,处于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之下:这里已经点燃了另一种民族斗争的火花,因为殖民主义绝非只是白人才有的。南太平洋地区有着蓝色的海洋,高低不平的土地和美丽的灌木丛,这里虽然不是没有严重的问题,但是有一种呼唤,要求重塑它的价值,以对人类整体的福利做出贡献。



经验层面：夏威夷怀基基海滩的一位福音传道士，希望引发人们的皈依。

第二十二章　东欧和苏联

俄罗斯：扩张与革命

521 在全球化的殖民主义浪潮中，俄罗斯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过，由于他们的帝国常常是在陆地上进行扩张，所以他们并非总能被注意到；除了欧洲部分（这一部分已经大得让那些西边的人难以明白）之外，俄罗斯还有大片远离欧洲的领土，所以外人对俄罗斯往往有着最模糊不清的想像。即使在19世纪晚期，比如当不列颠被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伤透脑筋时，这次威胁也只是从中亚向印度推进，直朝向阿拉伯海的暖水海洋。俄罗斯向东大大扩展至西伯利亚，这也很少为人所知。而且，在20世纪其他殖民强国疲于防卫之时，已经相当现代化了的俄罗斯帝国摇身一变成了苏维埃联盟，几乎很难再被算作殖民强国。

在17世纪结束之前，整个西伯利亚完全落入俄罗斯人之手。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曾被许多西伯利亚民族，比如雅库特人（Yakuts）和通古斯人（Tunguz），零零落落地占据过。在中亚，俄罗斯开始向南推进；迟至1900年，他们兵临波斯和阿富汗边境；之前，他们早已征服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其他一些民族。此外，早在1800年之前，俄罗斯人完成从乌克兰向黑海和克里米亚的推进，并在敖德萨（Odessa）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港口。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虽然俄罗斯的版图已经基本成形，俄罗斯人还是从中国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正是这样一个帝国，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所接管。

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比如，1861年的废除农奴制；始于1891年的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其中包括横穿西伯利亚的铁
522 路；矿业的开办和工业的发展；从圣彼得堡到乌拉尔山脉的无数大型城镇的发展。俄罗斯行将经历1914年的经济大飞跃；然而，僵化的



在华沙的宗座教堂门口，一群农民正在庆祝农村团结会成立周年，他们打着代表胜利的"V"字手型，欢呼相互之间的自由联合。

官僚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沙皇制度最终经不起战争的打击。1917年，自由主义革命爆发了；旋即，在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俄国革命爆发了。不久，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9—1953）接掌了这场革命的方向；他采取"一国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的路线；对农业实行集体化改革，制定了多个五年计划，冒进地提倡高度的工业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的国家机器；对宗教实行一种几乎完全镇压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获得了压倒性的最终胜利，随后，苏联的军队控制了大半个东欧，斯大林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也被强加给了波兰、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苏联军队没有完全占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地区并没有成为强加的对象。不过，在上述所有地区，马克思主义都成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而且往往都是取代了以前的国家宗教。

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态

虽然在斯大林死后饱受批评，但是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推崇为发展和组织共产主义国家的范式。置身欧洲处境

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执政党提出过不同的选择模式。奉行强硬孤立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曾与中国短暂结盟，以抗衡苏联的势力。阿
523 尔巴尼亚镇压了基督教和国内的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自称是世界上惟一完全无神论化的国家。这个断言肯定不是真的，因为即使在这样高压的处境下，如同在苏维埃帝国的穆斯林地区一样，在苏非主义团体的秘密努力下（和借着其他途径），宗教依然存活着。南斯拉夫的当务之急是维系由不同民族组成的联邦的统一。南斯拉夫还尝试了一种不结盟的共产主义，而且断绝了与西方的商业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不同的范式出现了，这部分地反映了宗教在不同国家内的处境。波兰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在战后更是如此，因为大屠杀实际上彻底消灭了波兰境内为数众多的犹太人。此外，波兰的边境向西缩进，这意味着波兰东部的乌克兰地区被苏联吞并，包括该地信奉正教和东仪天主教（Uniate，即隶属于梵蒂冈的正教）的民众。于是，波兰成为了单一的天主教国家。二战之前，波兰的天主教会在政治上往往是右翼的；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以团结工会运动（the Solidarnosc or Solidarity movement）为最高潮的一系列事件中，天主教会却大致采取了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姿态。团结工会本身不是一个教会组织，在实践中，它极力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和宗教上的开放性；尽管如此，团结工会和教会重合之处颇多，团结工会的很多重要集会往往都发生在弥撒之中或之后，而且，
525 这些集会的领导人中就有一位虔诚的教士瓦莱斯卡（Lech Waleska）。

1978 年，枢机主教卡罗尔·伊蒂瓦（Karol Wojtyla，生于 1920 年）当选为教皇，名为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他是第一位波兰籍教皇，也是近五百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由此，波兰谋求独立的努力得到了推进，并最终赢得了胜利。在维系生存和经历兴旺的同时，波兰教会在教义和道德方面大体上持守了保守的立场；然而，在社会政策方面，波兰教会倾向于认同这样的主张：以一种更为纯粹的民主方式治理各种社团以及国家。

另一个宗教兴旺的东欧国家是罗马尼亚，不过，这里的信仰主要是正教的（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匈牙利人中，有一些为

数相当少的天主教徒）。一开始，教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备受迫害；之后，特别是在齐奥塞斯库（Nicolas Ceausescu，1919—1989）从1966年开始的统治之下，教会从国家那里得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财政支持。罗马尼亚略微独立于苏联，不过，这种独立的方式不同于波兰。在波兰，政府和党面临是否彻底压制群众运动的种种巨大难题。罗马尼亚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不过这是自上而下被强加的。为了控制民众，罗马尼亚当局采取了相当斯大林式的统治方式：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秘密警察的四处渗透。不过，因为执政者重视民族主义和罗马尼亚人光荣的传统遗产，因为教会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时期维系了罗马尼亚人的语言和民族身份，所以，允许教会发展兴盛是颇有助益的、大有可能的。而且，教会的兴盛还起到了一种安全阀式的作用：由于天堂的微光，人们可以不再专注于尘世的严酷。

但是，罗马尼亚当局的官方意识形态仍然还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党员、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都被认为不应参与教会的活动，也不应成为教会的一员。宗教上的不同意见被禁止。不得使一个信徒改信另一宗教，各种宗教活动受到了布加勒斯特有关当局的严密监视。浸礼会的和其他的游方传道人遭受了残酷的折磨。

埃利亚德的贡献

偶然之中，罗马尼亚出了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自东欧的、最重要的宗教学研究方面的知识分子。在战前的罗马尼亚，这位少年老成、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投身于文艺复兴研究当中，并由此扩展至东方学的研究；1928—1932年，他来到印度，在印度最有名的哲学史家达斯古普塔（Surendranath Dasgupta，1885—1952）门下求学。正是在印度，埃利亚德开始了对瑜伽的操练和研究。回到罗马尼亚之后，他广泛参与各项文字活动，创作的作品不仅有学术著作还有小说。在世界范围 526
内不同的民间宗教中，他看到了其中的共性，从而寻求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以便公平地、跨文化地对待人类无意识中涌现出来的不同普遍

原型和象征。在某些方面，他堪称一位罗马尼亚民粹主义者；在试图从农民那里获得拯救的民粹主义看来，农民有着直觉性的知识和价值观，对于人类来说，这些知识和价值观有着最为宽广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并没有疏远罗马尼亚右翼和部分成员后来与纳粹有过合作的所谓“铁卫团”(Iron Guard)。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罗马尼亚的外交事务服务；祖国沦陷后，他流亡国外。1945—1955年间，他写下了他的主要作品；1957年，他在芝加哥成为教授，开始在美洲大陆广泛发挥影响。

埃利亚德在宗教上倾向于正教，这个宗教把人类原型宗教的永恒价值和基督教以无时间性对历史进程的打破与突入融为了一体。在某种意义上，埃利亚德的著作，甚至那些表面看来最为超然和学术的作品，都在寻求一种救赎：把我们从被剥夺了拯救象征的流亡状态之中救赎出来。

作为一种选择对象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1980年的波兰(随着团结工会的形成)、1956年发生革命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些自发的运动方兴未艾，这些运动的诉求可以表述为“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或者换句话说，民主的社会主义。由于苏联坦克的实际在场或威慑，这些运动都被镇压了。这些运动的动力来自于民族主义和对日常生活自由的渴望，显然，这两种情绪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斯大林扶植的各国当局压抑了。

二战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曾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这里残存着民族主义和渴望自由的根基：在纳粹和共产党先后残酷统治捷克之前，拥有完善组织的捷克人曾经历过一段类似黄金时代的时期。不过在当时，其他国家在政治上都是右翼的。右翼思想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颇为流行，这实际上是凡尔赛(Versailles)条约之后脱缰而出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反映。对于以民族为导向的新东欧来说，民族主义确实是一种宪章。由于在民族政策方面有着更为极端的形式，上述国家最终被来自莫斯科的采取强硬路线的政权接管了；莫斯科一心想将东欧纳入其帝国版图。与此同时，通

过支持一种崭新的、温和的基督教民主政治，西欧的天主教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成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方民主理想的传承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正教会，凭着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时期的经验，采取了妥协路线，经受住了共产主义统治的暴风雨。



1930年的反宗教运动：正准备运走的许多圣像。

于是，在整个东欧和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成了真正的教会。谁想获得晋升和过上好日子、想参与对国家的统治，他就必须加入共产党。公民必须赞同官方的意识形态。正如以往路德宗式协议的安排："谁的统治，谁的宗教"[①]，现在，我们就得出如下标签："谁的统治，谁的意识形态"（*cuius region eius ideologia*）。之所以这样说，仅仅是因为我们相当随意地区分了宗教和意识形态；而并非表示我们没有注意到：以往的新教—天主教瓜分东欧的格局又一次以新的形式被重演了。 527

① 参本书第十四章的"宗教改革：神学和政治权力"。——译注

组成集团的东欧各国并不是多元化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被日本宪法确定的“国家神道”一样，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不是宗教的严格意义上（*de rigueur*）的宗教。不过，缺乏教义体系的神道教并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样的渗透性；而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当局却努力依靠官方力量制定一套必须内在化的观念。于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宗教开始插手学术生活、科学、艺术和每一种理性活动。

苏联的宗教

欧洲部分

528 在第二十章，我们曾提及伊斯兰教在苏联的兴衰变迁。在这里，我们稍后会谈及苏联统治前后西伯利亚的一些小规模宗教的情况。首先，我们简略地看一下传统基督教会和其他群体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处境。1917 年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图景，所有私人财产均被收归国有，正教会拥有的土地也概莫能外。与此同时，宗教教育被禁止。不过，在 1929 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和宗教界都激烈地反抗着集体化的新措施；直到 1929 年，宗教才遭受了最为严厉的限制，举行崇拜成了宗教组织所拥有的惟一权利。

1926 年成立的“战斗无神论联盟”（the League of Militant Godless）积极从事反对宗教的宣传工作。该联盟指控传统宗教是不科学的，因为传统宗教不仅抛弃了进化论，而且认为上帝在天上，如此等等（这仅仅是一种拘泥于字面意义的攻击）。它还指控说，传统宗教在政治上是右翼的，是反革命。传统宗教是迷信的、腐败的、被教士操纵的、伪善的，如此等等。与此同时，关闭教会、把教堂变为粮仓或无神论博物馆的运动方兴未艾，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依然履行职能的教会建筑和神职人员锐减了 90% 以上。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发了不少新问题。许多俄罗斯人把“神圣的俄罗斯”当作自己表忠心的主要对象。正教会在其骨子里就特别地具有一种民族主义精神，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俄罗斯正教曾击退过来犯的条顿骑士团和波兰的天主教沙文主义者，这些事迹依然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因此，考虑到其爱国主义的因

素，斯大林使正教会拥有了更大程度的自由，从此开始的更为宽松的时期一直持续到了1956年前后。

但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东仪天主教会却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因而不得不与正教会混合，也就是说，上述两地的教会必须断绝和梵蒂冈的关系。天主教早就一直背着“需要翻译的组织”(a translational organization)的污名，天主教徒往往被怀疑为可能不爱国的人。因为同样的缘故，犹太教也被视为一个国际性的宗教。一般而言，不参与宗教活动的犹太人可以在苏联社会生活得相当好(暂且不论斯大林晚期开始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参与宗教活动的犹太人却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处境：尽管一部分犹太人拿到了前往以色列的签证许可，迫害已成了家常便饭。此外，就是连这样的宽容，浸礼会的和其他新教团体的传道人也从未享受过。游方的和地下的传播福音的基督徒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因为他们违反了苏联的规矩。上述种 529
种都意味着宗教组织受到了公开的、明显的控制。

官方教会的领导人不得不走着钢丝，一方面努力维持自己羊群的有限独立，另一方面又要在世俗事务方面对苏联的官方路线亦步亦趋。上述的所有说法不仅适用于主流的俄罗斯人群体，也适用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教会，比如历史悠久的亚美尼亚教会。

西伯利亚的一些小规模宗教

俄罗斯人向东方的推进，毫无疑问地深刻影响了西伯利亚广大区域内的各个民族。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同欧洲人的接触，可能招致疾病和麻烦。这里的许多民族都受过正教传教士活动的影响。1917年的革命对这里的影响也非常含混不清。对于这些受过沙皇压迫的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深表同情的。一方面，共产党人热衷于用民间传说、语言和本土艺术等来表达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反对宗教，想把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这里的人民。其中面临的部分难题就是：如何把民间传说等和宗教区分开来。

在苏联社会的新处境下，“家庭壁炉”之类的一些风俗依然存留。在苏联的远东部分，有证据表明，通古斯人中仍然存在萨满教；而布

里亚特人（Buryats）奉行的则是佛教、萨满教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体；与此同时，各种风俗相互杂糅，保留在苏联的农庄生活和集体组织生活之中。（在某些方面，苏联农业生活的集体化特征有助于部族群体的识别和认同。）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许多古老的萨满教世界观存留下来，有时以正教的语言为掩饰——在那些基督教和本土宗教融为一体的地方，——有时则无须掩饰。

最近，一些苏联人类学家对西伯利亚的宗教做了更为同情的探究；他们发现，所存留下来的宗教观念比以前所认为的更多更广。这再一次证明，苏联的无神论并不是所向披靡的。

苏联的无神论

然而，无神论的确代表了人类世界观的一种重要分支。我们可以说，在苏联存在的各种世界观中，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种世界观；即使在传统宗教十分活跃的东欧，这种无神论也拥有一批重要的追随者。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无神论表达了对早已被革命取代的旧世界的种种腐败的反抗。无可否认，在革命之后，许多不必要的苦难发生了；但是，尽管如此，共产主义制度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这种制度就可以用其特有的方式表达出一种爱苏联，尤其是爱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含义。尽管这种制度让很多人大失
530 所望，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所代表的世界观确实赢得了不少公民的忠心——毫无疑问，这种世界观对其信奉者具有相当严格的资格要求，——要不然，这种制度就不可能行之有效。现在，我们就从以下几个层面简略地概述一下这种世界观。

在教义方面，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颇有说服力地把唯物主义当作中心。这种唯物主义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不是朴素唯物主义，并不认为意识事件和精神产物都简单地是物质；而是认为，意识事件和精神产物来自物质，它们的存在能够而且的确颇为重要地反映了物质的世界，这种反映的范围包括：从精神状态如何影响身体的健康状况，到革命意识如何增进社会的物质生产。第二，这种唯物主义也具有高度的活力，也就是说，这种唯物主义认为，事物蕴含的各种矛盾

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列宁可能会认为，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物力论(dynamism)把独立的生命赋予了宇宙，而且使得我们不再需要如下的观念：一个外在的上帝使得宇宙的运动成为可能。

在神话的历史叙述方面，在各种最终导致世界革命和实现全人类社会正义的历史范式中，苏联的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17 531
年的革命是其他革命的先驱，因此，中国等国家应该承认，苏联这个榜样更加高明和更为优先。

在伦理的层面，致力于消除失业的苏联制度实现了伟大的社会正义；这种成就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明显的，在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国家则更不明显。相比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为工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尊严和地位，某些个人权利的丧失显得微不足道。新型的苏联人勤劳、有教养、有远见，而且热衷于科学、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实现。

在仪式的层面，马克思主义者摒弃了旧式的繁文缛节(mumbo-jumbo)[①]，但是，这个新兴国家依然有其礼仪。在去列宁墓朝圣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仪式不知不觉地融人了这个民族国家的礼仪之中。至于这个新兴团体的物质层面，由于被认为应该反映新社会的特色，苏联的艺术界相当推崇圣像式的绘画，以便展示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形象和党与国家的成就。很难说这种光亮华丽的写实主义是艺术；但是，如同宗教绘画一样，这种写实主义被用来发挥激励和感召的作用。类似地，伟大的作家被认为应该是社会现实主义者；尽管有些最为苛刻的批评意见偶尔会欣赏异议作家的成就，但是，苏联人无法用管控的手段制造出伟大的艺术。越来越难以把握自己作品的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和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等伟大的苏联音乐家，千方百计地经受住了苏联制度的冲击。不过，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物质方面的成就：水力发电、火箭技术、工厂以及所有可以归功于苏维埃国家的建筑和发明。

① 音译为"芒博琼博"，原指西非某些部落的守护神，其附身于戴假面的巫医，能祛邪并能使妇女事事顺从。后泛指"咒语"、"胡话"、"无意义的活动或事物"、"繁文缛节"等。——译注

上述的种种层面，组成了一个还算可以信靠的世界观。往往正是这种世界观成了批判的主要对象，不过，批判也常常来自这种世界观的内部。在当今世界上，作为一种主要的无神论形式，这种世界观是不会被忽视的；而且，这种世界观的变种还被不同的地区坚持着，比如北京、平壤和哈瓦那。在组织层面，马克思主义依然强有力地扎根于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

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统绪往往被十分活跃地（有时是极不宽容地）传承着，这些传承者都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97—1940）的追随者；这位苏联红军早期的大英雄，堪称暴风雨中的海燕和革命的理论指导者。托洛茨基更为灵活的革命理论，对于许多对苏联制度的高度中央集权和僵化的官僚主义大失所望的西方人来说，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最后，对于苏联的社会学家和外部的观察者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在苏维埃国家，宗教绝没有衰落和消亡。很多苏联现代知识分子绝没有屈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战斗的无神论的外表下，新近最为重要的两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1890—1960）和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生于1918）都表达了一种东正教的观点。即使是遭受最严重打击的佛教，似乎也有持续下去的力
532 量。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尽管统计数据不一，仍有20%左右的公民继续参与教会活动。至于伊斯兰教，依然保持信仰的比率实际上非常高。

苏联的解体及其余波

1991年之前的东欧、中亚、俄罗斯和西伯利亚，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已经完全解体。苏联就这样解体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
533 （Mikhail Gorbachev，生于1931年）上台执政，他的改革导致了更大的开放，反过来揭示了旧制度的全然低能、悲哀和可怕。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的说服力，许多人认识到，70年的革命、高压统治和中央计划产生了大量的苦果。真正多产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防御性的工业和相关部门，二是宣传事业。此外，这种制度压抑了许多不同的民

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必将兴起于苏联这样多元化的陆上帝国，包括它的欧洲部分在内。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民族主义即将重现。伴随着民族主义复兴的是宗教的兴盛。民族主义和宗教的融合可以部分地归功于波兰籍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生于1920年），他在波兰民族主义的觉醒和之后柏林墙（曾服务于维持对东方各国的奴役）的适时拆毁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般而言，前苏联在东欧的各个从属国，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斯洛伐克，最终都采取了民主的政治体制；只有白俄罗斯未作改革。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经历了外战和内战。中亚诸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赢得了独立，开始了形式各异的独裁政治；与此同时，长期受到压迫的伊斯兰教大大地复兴了。在车臣（Chenchnya），随着苏联时代的告终，一场战争接踵而来；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穆斯林对俄罗斯统治的反抗，这场战争已愈演愈烈。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苏联帝国（和之前的俄罗斯帝国）都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因而存在着忽视如下事实的一种倾向：1989年以来的时期是一个非殖民地化的时期。在这个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宗教起到了意义重大的作用。作为每个国家传统都具有的一种重要因素，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并且取代了以往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宗教发挥了作用：在东欧是不同类型的基督教，在阿塞拜疆和中亚是伊斯兰教，在蒙古是佛教。与此同时，在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是战胜苏联军队的主力；1988年，苏军撤出阿富汗。

在南斯拉夫的瓦解中，宗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共同的传统遗产和语言，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克罗地亚是天主教的，而塞尔维亚则是东正教的。从1991年起，两国之间开始了残酷的战争。由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的分裂，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被卷入这场三方冲突的，还有第三股势力，即曾在铁托统治时期被隔离的穆斯林。在根本上，由于宗教，这三个种族群体发生了分化。不少是穆斯林的阿尔巴

尼亚人居住在塞尔维亚南部的科索沃地区，在这里，他们饱受塞尔维亚族统治者的压迫。因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巴尔干地区堪称一个火药桶；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这很容易导致动荡不安。

从苏维埃时代开始，俄罗斯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　俄罗斯境内存在着很多规模不小的穆斯林飞地，比如，位于莫斯科以东 560 英里（900 公里）的鞑靼斯坦（Tatarstan），其首府位于
534 喀山，再如，位于乌拉尔地区西南部的巴什基尔斯坦（Bashkirstan）。在俄罗斯联邦的结构之内，散布着大量这类或大或小的异族飞地。最近一段时期，少数派和福音派发展迅速，对占支配地位的正教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态度并非多元主义的统治阶层依然试图强行推广一种统一的宗教教育。

这种制度实行中央集权，而且实际上是俄罗斯人的制度，因此，少数民族感到了压迫。此外，斯大林的残酷无情让人毛骨悚然；斯大林设立了异乎寻常而且十分庞大的监狱系统——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这个监狱系统得以“名垂青史”。即使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当局依然四处施虐。经常聚集在一起的苏联坦克造成了不少苦痛的灾难，比如，在东柏林、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塞拜疆。

在苏联反抗纳粹的光荣结束之后，斯大林的高压统治臭名昭著；尽管如此，颇为古怪和饶有意思的是，支持苏联制度的西方知识分子从未遇到过支持纳粹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那种严厉批评和强烈谴责。其实，比起希特勒的德国，俄罗斯的共产主义传统更加热衷于极权主义，更加无所不包地玩弄事情的真相。

由于僵化的中央集权，它总体上相当无能；它对消费者利益缺乏尊重，这使得生活了无色彩，即使它不切实际的修辞学也不能为此增添多少色彩。如果回顾一下苏联无神论的以下几个层面，我们可能会进一步地认识到为什么它消失得如此迅速。

在教义方面，它所显示的充满动力的唯物论依然看似合理；但是，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世界上的精神力量应该被如此忽视，其他可供选择的信仰（比如佛教）没有必要加以重视。在这个制度被描绘成科学制度的同时，现代物理学等方面的发展却与列宁等的粗糙唯物

论发生了冲突。而且，由于1917年以后的不断犯错和施虐，苏联在革命历史中的神话意义逐渐减弱。

在伦理方面，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不错，但是，实际上的安排并无正义可言：党员干部作威作福，普通公民勉强糊口，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当作奴隶囚禁于监牢。

也许，正是在仪式层面上，最为严重的弱点出现了。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和犹太教会堂纷纷被关闭或者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仪式生活的传统色彩被剥夺了，人生各阶 535
段的仪式（比如婚礼和葬礼）变得太过简单、近乎苦行；公共节日庆祝的往往是一些抽象观念。国家的仪式往往缺乏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所珍视的温暖；而且，对工作的表彰有可能成为一种压迫。

与此相关，除了爱国主义的情绪之外，马克思主义制度大概没有给宗教的经验层面留下丝毫空间。在苏联哲学的框架之内，内在生命的诗歌、对神灵的敬畏之情、对爱的强烈感知多半是毫无意义的。怪不得，很多艺术家和作家都曾表示抗议和持有异议。于是，俄罗斯人常常会想起他们的伟大作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布尔加科夫（Bulgakov）。

在物质层面，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典型的象征：斯大林所钟爱的结婚蛋糕和城内星罗棋布的实用型公寓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实验性可言：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本可产生的多样性令人惊奇地缺席了。在这一点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仿效了正教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

因此，苏联的制度最终吸引力渐失。它的弊端并非仅仅在于指令性经济，而是遍及这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隐私化。个人之间得以维系的强大纽带来自于侦查和监视，这使得每个人只能相信自己的亲密小圈子；但是，即使如此，他仍然被朋友和家人出卖，“施塔西”（Stasi，东德的警察当局）的记录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类似的情形依然存在于朝鲜、越南和古巴。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有所变化：经济领域和宗教领域都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第二十三章　现代世界中的非洲

欧洲的影响

奴隶贸易

536 直到1800年以前，非洲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外国征服的影响。沿海岸有些葡萄牙人的贸易站，还有些其他欧洲人的定居点，主要从事奴隶贸易。在好望角一带，有些荷兰的农场主和定居者（他们引进了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作为劳工），英国人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但是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依然保持其传统的力量和社会模式。

许多地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东非和撒哈拉沙漠的周围地区，被不同的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人所从事的奴隶贸易所打破。贸易获利极大。它的源头在种植烟草、糖，后来是棉花的种植园，它们成为新世界（巴西、加勒比和北美）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有上千万的奴隶被送到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奴隶主要来自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黄金海岸以及东非，在19世纪时又增加了来自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和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奴隶。到达的奴隶数量（因为许多奴隶，多达30%，在途中死去），在西班牙属地的美洲，英属加勒比地区和法属的美洲地区，各是150万；巴西大约是350万；荷兰属地的美洲地区是50万；英属北美地区和美国加起来是40万左右；在欧洲则不足20万。那是人类大迁移的日子。它在西方和西南非洲的影响，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特别是美国南部、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它给这些地区的文化打上了新的印记。反过来它也影响了非洲，因为构成非洲独立运动之基础的许多新观念，是从新世界的大洋那边传过来的。

537 在某种程度上说，奴隶制的宗教影响深深地取决于引人的文化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假如是天主教的，如在海地和巴西，就可能

会将非洲的宗教与圣徒膜拜融合在一起。而在信奉新教的北美地区是不赞成圣徒膜拜的，因而非洲人的价值观不得不以其他方式引入基督教的实践中。洗礼的仪式，上帝附体的观念，精灵的形象，就成为表现一种混合文化的不同方式。在北美，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而不是靠一波接一波的奴隶输入，这使之与非洲的经验保持距离。当然，民间故事和音乐等因素，不仅被坚持下来，而且与白人文化形成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融合。

在转达非洲的宗教价值方面，天主教提供了有利的背景，也有助于创造新的宗教。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南非的定居地

1652 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希望在去印度的途中为过往船只建立一个补给站，最初在好望角建立的补给站并不大。那个居民点后来成为好望角镇。那里虽然最初并没有打算成为一个殖民地，但是当荷兰的定居者从事农耕后，他们所占领的地区逐渐扩张，远远超出了好望角镇。到 19 世纪末，农耕者已经延伸到凯伊河(Kei)一带。

英国人接管好望角是拿破仑战争的结果，拿破仑曾派许多人定居在纳塔尔(Natal)。讲荷兰语的农民(或布尔人，Boers)越过凯伊河，在菲什河(Fish)一带作战，与此同时，他们因那些被他们视为外在的干扰而恼怒，特别是那些极力鼓吹废除奴隶制的传教士们。1835 年，布尔人开始了名为大迁徙(Great Trek)的运动，不久以后占领了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和德兰士瓦省(Transvaal)，它们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与此同时，天才的谢克(Shaka, 1787? —1832)将一个新的民族凝聚在一起——祖鲁人，先是布尔人，后是英国人与之冲突。1879 年祖鲁人失败后，英国人控制了整个纳塔尔地区。

英国人与布尔人两次作战，第二次战争极为艰苦，从 1899 年至 1902 年。布尔人由于英国人禁止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走出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这个词的原初意义)，并毁坏他们的家园和农田而被激怒。英国人在 1910 年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包括德兰士瓦省，奥兰治自由邦，纳塔尔和开普省(Cape Province)，而布尔人的报

复就是政治上不与之合作。英国人的利益首先在于黄金和钻石。罗兹(Cecil Rhodes,1853—1902)曾眼看着英国人的统治从好望角延伸到开罗。南非的制度事实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扩展到罗得西亚(Rhodesia),但那里一直是个独立的殖民地(在早先的非洲文化大量毁灭之后改名为津巴布韦)。

538 到 1948 年时,布尔人(现在的南非白人)已经在基本上为白人选民的范围里民主地获得了权力,并开始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也就是说,他们尽可能地将不同的种族区别开来:黑人,所谓的混血人(或混血种族),亚洲人,白人。白人统治和优越的假设,充其量是薄薄的雾纱。这个制度极大地剥夺了黑人受教育、经商,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权利。而其基础,则部分地建立在荷兰改革宗(Dutch Reformed Church)神学有关分隔的意识形态上。

这是加尔文派的神学。南非白人部分地来源于属于加尔文派的荷兰祖先,但是也有受到法国胡格诺派(Huguenot)宗教难民的影响,这些难民对传统信仰有着强烈的执著。此外,在"集体迁徙"(Trek)之后——顺便说一句,大部分迁徙者并没有得到教会的允许,因而没有牧师与他们在一起——苏格兰的加尔文派牧师开始在南非的布尔人中工作。加尔文派倡导一种预定论(predestinationism),鼓励南非白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要以古代以色列人为榜样塑造他们的生活和战争。1838 年他们在布拉德河(Blood River)打败了祖鲁人,他们将此归属于神灵的帮助,定了一个盟约以便纪念这一天。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和自由的,不想受到其他种族的污染。所有这一切都被结合为一种用于道德说教的强有力的神话;但是它也论证了种族优越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制度里,黑人和混血人,以及亚洲人(主要在纳塔尔的印度人和其他人),与白人相比,他们在南非是无足轻重的。稍后我们会看到某些黑人对此的回应。

殖民地的争夺

南非的早期定居地建立之后,对非洲疆土的大规模的殖民地和征服才开始。这一行动主要来自法国人,他们的行动又激起英国人

与之竞争。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也参与进来。到 1900 年时，非洲已经被殖民者瓜分完了。只剩下意大利人接管利比亚，法国人与西班牙人在他们之间瓜分摩洛哥。只有埃塞俄比亚于 1896 年在阿多瓦(Adowa)重挫意大利人后还保持着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失去了她在非洲的殖民地；坦噶尼喀(Tanganyika)被英国接管，而纳米比亚(Namibia，西南非洲)则被南非接管。

1881 年，马赫迪(Mahdi)作为一位弥赛亚式的领导者，将伊斯兰教的末世论与反叛的政治运动混合在一起，开始了他在苏丹的反抗斗争。那时苏丹处于埃及的控制之下，英国人进行了干涉。1885 年喀土穆失陷，戈登将军(General Gordon，1833—1885)被杀害。直到 1898 年马赫迪运动才在恩图曼(Omdurman)战役中被摧毁，埃及与英国联手将苏丹作为共管地。

对非洲的争夺加剧了欧洲人的竞争。边界的划定大部分没有考虑到非洲大陆的语言的和文化的差别。当非洲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541
20 世纪 60 年代变得非殖民化时，这些边界却被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for African Unity)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主要是因为其荒谬：一旦引入一个争议，整个用纸牌搭成的房子就会坍塌)。后来形成的这些国家不得不尽其可能地塑造各自的身份认同神话。

基督教渗透进黑非洲

无可置疑的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变化是基督教的广泛传播，这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基督教现在已是黑非洲占优势的宗教。在以前的某些阶段，人们曾以为伊斯兰教会成为主导的信仰。虽然伊斯兰教的确获得某些进展，但是与基督教相比较，还是太小了。

在 18 世纪时，除了沿海的欧洲人的居民点或贸易站有少量的基督教徒外，除了在古代的埃塞俄比亚王国有基督教徒外，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基督教。但是到了该世纪末，反对奴隶贸易的一些基督教徒，安排了一群非洲裔的被解放的奴隶定居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30 年后建立了一所弗拉贝(Fourah Bay)学院，这是非洲第一所现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当黑人传教士走出这个地区时，这里成为

传播基督教的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来自约鲁巴(现在的尼日利亚)的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1809?—1891),他成为尼日尔的大主教。

在非洲分成几大块之前,传教士已经有所进展,尽管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是白人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但他在探险方面的成功远远大于灵魂方面的获胜(他只使一个人皈依,那个人后来还叛教了)。在殖民地期间,出现将《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的特别积极的活动,这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基督教与教育密切相关,这不仅是因为许多学校事实上是靠传教士管理的,而且因为非洲社会看到了现代化的需要——往往是自觉的——学校是实现这一点的主要中介。除此之外,基督教在这样一个充满突变和令人烦恼的变化的时期内,给人们提供了某种可依赖的东西。当古典的非洲宗教枯萎时,基督教提供了一种选择。

《圣经》似乎有着巨大的超凡力量。由于传教士相当短缺,所以本地的传道人被大量使用,但他们往往只受到很少的培训。然而他



一群埃塞俄比亚的虔诚信徒:埃塞俄比亚古老的基督教经常是非洲人弥赛亚之希望的焦点。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上的彩车，这个节日在每年的大斋节前五天内举行（参见第二十四章）。

们身上总是带着《圣经》：对于大多数非洲人来说，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用本土语言的第一本，也常常是惟一的一本书。它的力量令人既敬畏又向往，它读起来有声有色——能够读它的人，能够从神奇的字里行间读出一套奇异的音乐片断。此外，它的主题在非洲人听起来是真实的。它谈到了割礼、恩多尔（Endor）的女巫、求雨的争论、预言、治疗和以色列人所遭受的苦难。所有这一切，黑非洲都很容易认同。

542 正如在基督教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和其他地点发生过的一样，人们在如何实践《圣经》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它具有革命的潜能。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教会几乎完全处于白人的控制之下；假如许多黑人认为这种做法与《福音书》的精神相矛盾，一点也不奇怪。黑人对于不公正的部分愤怒，可以在独立教会中看到，这在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被证明是非常有力的现象。应当指出，另一方面，确有许多传教士支持独立运动。因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到处还弥漫着家长统治的情感。罗马天主教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以及新教各派中各种各样的“返回家乡”（back home）的革命变化，全都在改变这种状况。

黑非洲的主流教会

实际上，不仅仅在曾经是（如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地区，而且在整个非洲，罗马天主教是人数最多的宗教。但是在大部分地区都缺少教牧人员。与此相似，新教教会也缺少训练有素的人。结果是大部分的非洲基督教，在传教的时候使用了许多当地的传道人。这意味着即使在白人控制教会的顶峰时期，下面的许多事情也是变化多样的，难以做到事无巨细皆在掌控之中。这个系统的力量在于它放弃了许多世俗的事务，因而它产生了许多虔诚。越来越多的领导职务由黑人承担，有六个非洲人还做了红衣主教。在南非，尽管有许多白人的英国圣公会信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但也有了黑人教会领袖。开普敦的图图大主教（Desmond Tutu）是个最好的例证。这些人物开始通过基督教内的和其他的全球组织，在教会决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在这些教会中明显地有着不同的思想线索。一方面对自由神学

有着极大的兴趣,因为南非和其他地方的斗争,在教会的范围内,涉及到全球的不公正,涉及到对事物是怎么样的和应当怎样做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比较保守的角度看,存在着对非洲神学的兴趣,非洲神学力图运用古典的非洲范畴来阐述基督教。这种努力是想在本地的观念中看到某些《福音书》的先兆,从而在它们当中发现某些东西可以替代或增补《旧约》。某些人还将非洲神学与黑人神学区别开来,认为后者只是自由神学的一个版本。

"非洲性"(Africanness)的概念:一种现代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非洲的和黑人的神学,都建立在这样一种感觉上:有一种共同的非洲的或黑人的经验。这在殖民地时代以前还勉强可以说是真实的。许多地区缺乏交流,语言支脉不同,缺少一位活生生的"他者"能够提升黑人的团结——这些因素以及其他的因素,都阻碍形成统一的非洲观。特别是经历殖民地体验之后,逐步增长的对黑人历史之本质,所受的痛苦和蔑视的理解,在非洲经常可 543
以感觉到,以至于一种新的认同发展起来。

教会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引起歧义的,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来到非洲的许多传教士带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非洲人是低等的,他们需要基督教和文明,达此目的的途径是皈依和教育,如此之后,非洲人才能骄傲地取得和白人相似的地位。于是"最黑暗的非洲"形象被设计出来,欧洲和美国的读者非常兴奋地追随利文斯顿的航海与艰苦工作,或追随热情的斯坦利(H. M. Stanley,1844—1904)的冒险。非洲人成为野蛮人的代表,虽然有时无疑有点高贵。

这种形象一直没有离去:尽管种族主义到处可见,但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尤其严重。所以非洲人寻找一种自觉的非洲人的认同,并不是什么不自然之事。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作家群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论述了什么是黑人特征与气质(Negritude)的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森格索尔(Leopold Sedar Sengthor,1906—)的激励。

在与此相同的环境里,还有一种更富包容性的意识:将非洲宗教的概念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因此在 1945 年,一位方济各会的修



社会层面：教会在南非黑人斗争的两个方面作用显著。图中图图主教（后来成为开普敦的大主教）正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论政府禁止一次有关宗教与和平的会议的问题。

士坦普尔斯（Placide Tempels，1906—1977）出版了《班图人的哲学》
544 （*La Philosophie bantoue*），书中描述了一种泛班图的世界观，即将世界看作来自上帝（God）的动态系统，它受一个生命力之等级体系的支配，其中某些是仁慈的，某些是邪恶的，它们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时间里表现为或弱或强。其他的作者虽然不生活在班图地区（赤道和南非），但也看到了同样的结构。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古典的非洲宗教逐渐被人们看作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在这种观念里，非洲宗教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发明，它本身成为从一新的视角观察古典的宗教现象的一种方式。

泛非洲的探索优势，在于它在一个大范围里将各种价值观，诸如科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基督教等等，结合起来。然而，一种本土的非洲世界观并没有出现，它具有的优势锋刃和复杂性，需要跟

上现代的社会的和技术的变化。从总体上说，现代化的进程是随着皈依基督教教会（较小程度地皈依伊斯兰教）而出现的。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伊斯兰教

在殖民地时期，伊斯兰教继续从北方传入黑非洲。促进人们改变信仰的重要中介，是各种各样的苏非派的教团和北非的伊斯兰教隐士，后者尤其是在西非起到了领导的作用。其中来自塞内加尔的尼亚斯（Ibrahim Niass，1900—1975），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特别强调伊斯兰教的普遍特征，反对经常出现的将伊斯兰教与本地文化和价值观混合起来的特殊化的倾向。但是这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萨拉菲叶（Salafiya）运动，其领导者是在开罗和北非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引入了一种比较激进的反殖民化和反西方的动力。他们严厉批评 545
北非的伊斯兰教隐士和苏非教团的领导人利用无知民众的倾向：他们想要一种改革的，坚定地根植于《古兰经》的，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同时，他们认为这种伊斯兰教能够在价值观上和知识力度上抗衡西方。

在东非，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作用很小。但是斯瓦西里（Swahili）文化十分重要：语言自身反映了一种混合的非洲—阿拉伯的社会，它的边缘易于变动，沿着海岸和内地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中心，其中有些部分是19世纪阿拉伯人从事的一度兴旺的奴隶贸易的结果。伊斯兰教还在乌干达的巴干达（Baganda）贵族中站住了脚，而这一地区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激烈争夺之地——传教士由于得到了英国人的援助而更有力地推进了基督教。

在黑非洲的伊斯兰教中，曾一度广泛出现了将不同的仪式混合起来的现象，但这种倾向昙花一现，当穆斯林的哈吉（hajj）来到麦加时，不仅看到了正统的伊斯兰教，而且带回了改革的观念。萨拉菲叶运动也是倾向于铲除这种混合。

非洲伊斯兰教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东非和南非的来自亚洲的移民，在殖民地时期他们从事种植园的工作。这些移民中有少数人是穆斯林，作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移民，他们在南非的开普省成为

所谓有色人种或混血人的一部分。亚洲人与黑人之间有张力，最著名的事件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大部分印度移民逃离了阿明(Idi Amin)统治下的乌干达；1947年在南非德班(Durban)发生的祖鲁一亚洲人暴乱，以及从那以后不时发生的骚乱。这种张力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甘地(Gandhi)的榜样——一个极有影响的人物，从1893年起，他在南非为人权斗争了20年——不容易在南非的黑人人口中形成感召力。

埃塞俄比亚及其古代的基督教历史

埃塞俄比亚的遗产，对特别是在海外复兴运动中的许多非洲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然而形势却由于1972年塞拉西(Haile Selassie,1892—1975)的帝国统治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所推翻而变得复杂起来。(顺便说一下，马克思主义已经在非洲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不仅出现在埃塞俄比亚，而且在早先属于葡萄牙领地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以及其他一两个地方也出现过。)埃塞俄比亚有着长期的基督教历史，而且几乎没有受过外国的统治，这使之在非洲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神话。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在4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存在。它与闪米特族有着紧密的关联。君主政体可以追溯到曼涅里克(Menelik)，他是所罗门王和示巴(Sheba)女王的儿
546 子；在仪式中运用舞蹈和《诗篇》的充满活力的作用，令人回想起大卫时代的吟游诗人；男性行割礼；奉星期六为安息日。17世纪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企图改变这种宗教并使之罗马化，这种努力最初似乎是成功的，国王也于1621年皈依了。但是国王推行新宗教的努力最终失败：它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如此保持其独立性，保持其古代的结构。它保持其特色：在经文书写中用古代的吉兹语言，它的等级制度，它与埃及科普特教会的联系，它的铭刻，彩绘的神龛，生活在石制的修道院和隐修院中的修士，它的巫术仪式，它的古老而又特殊的圣徒，特别是圣乔治和圣母马利亚，它的音乐和舞蹈，它的吟游诗人和赞美诗：这些对埃塞俄比亚人来说是具有本质性的，非常熟悉的，它已经融入了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文化和身

心之中。虽然雄心勃勃的耶稣会士在埃塞俄比亚的文献的建筑中留下了印记，但最终没有得到什么回报。

由于埃塞俄比亚有着如此长期的黑人基督教的历史，所以它往往被看作非洲大陆和海外的新兴黑人运动的一种模式。有些美国和加勒比地区的教会，在名称前面加上阿比西尼亚或埃塞俄比亚的前缀，有时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吉兹语和英语的混合体。由于在埃塞俄比亚出现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它控制了教会，1974 年出现了大量难民，从而使这种混合变得更为复杂。

现代非洲的新宗教运动

现代社会最有活力的现象，是许多地区的独立教会和新宗教运动的增长，它们产生的变体大都围绕着基督教的主题，但大都努力使宗教适应非洲的传统而不是接受西方传入的外国宗教的结构。它们在古典的非洲宗教与西方思想之间形成了一种桥梁作用。据估计，其数量可能有一万个，广泛传播于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中部、扎伊尔和南非，但是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数量很少。非洲的基督教徒中也许有 15% 属于这些群体，尽管我们已经指出过，在非洲，基督教的边缘是非常容易变动的。

对于非洲的黑人来说，白人的宗教有许多问题。总的问题之一是控制：传教的教会往往倾向于家长式的统治。另一个问题是祖先崇拜(ancestor cults)的作用，这种膜拜在非洲的社会背景里是非常重要的，但却被传教士看作迷信或偶像崇拜。第三个问题是多配偶制，它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构成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男人不得不只保留一个妻子而放弃其他人，那会产生极大的不公正。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健康。在某些方面，所谓的西方医学似乎是有效的，但是在其他领域里作用并不明显，所以返回到古典非洲的治疗方式也是合乎情理的。在基督教的背景里也有与此相似的信仰治疗。 547

新宗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这些问题，比如在黑人领袖的领导下从主流教会中分离出去；或者聚焦于某个黑人先知或弥赛亚式的人物；除此之外还有建立黑人的控制权。它们能够将信仰治疗

法甚或更传统的医药包括进来，它们允许多配偶制(随着非洲人掌握了《圣经》，他们很容易看到多配偶制乃是古代以色列宗教的组成部分)。它们能够将非洲社会的其他特征和宗教实践重新整合在一起。

我们将要考察的第一个例证，是由先知金班古(Simon Kimbangu，1889—1951)创立的新教派。这是一个有趣的例证，尽管它是一种分离运动，但却在1969年成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因此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好名声"。这是基督教的一种重新进入主流教会的情况

"耶稣基督通过先知金班古在世之教会"

548 金班古出生在当时的比属刚果(后来改名为扎伊尔)，结婚后受洗成为一个浸礼会教友。由于未能通过考试，他不能成为一名牧师，但是他却接受过如何成为一个传道人的培训。他曾获得召唤他成为一名医治者的异象，最终他开始进行医病。他迅速获得了皈依者，殖民地当局看到了其中的危险。1921年他被下令逮捕，但是他逃脱了，然而在年底时他又自愿投降了。尽管以反叛比利时的统治为名可以判处他死刑，但是比利时国王在传教士的请求(他们希望宽大处理)下为之缓刑。此后他被囚禁在狱中，直到1951年去世。他的囚禁生活使他在某些方面更像个先知，尽管他的许多追随者(超过2000人)遭到流放和关押，但运动却继续扩展。在金班古死后，他的小儿子按照他的意愿将他的教会加以改组，最终加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成为具有400万成员的扎伊尔的得到官方承认的教会之一。

当然，金班古的生活经历，在某些方面，使他的门徒回想起耶稣：
549 受到召唤，为人治病，大批的信众，被殖民地当局定罪致死。值得注意的是，《圣经》的这些主题以这种方式反射出来，并使先知在他自己的治疗力量中认识到"圣灵"的作用。

金班古

金班古是“耶稣基督通过先知金班古在世之教会”的创始人。他是个传统的医生的儿子，生活在下比属刚果（后来的扎伊尔，1997年成为民主刚果）的姆卡姆巴（M'Kamba）。他所创立的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和较早独立的非洲教会。当然，其他的教会处于西方传教士的领导和掌控之下。金班古像其他的基督教青年一样，和他的妻子在一所浸礼会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然而他没有通过成为牧师的考试。但是他获得了不同的召唤。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我是基督，我的仆人不忠于信仰。我选择你在你的兄弟面前见证我，并改变他们的信仰。照顾我的信徒”。金班古感到害怕，逃到利奥波德维尔（Leopoldville，现在的金沙萨），在那里，他在一个炼油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当他返回村庄后，又获得另一个关于医病的召唤。在以前的若干年中，一直有流行病肆虐。1921年4月初，他举行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医病：他把手放在一位患重病的妇女身上，治好了她。

必须意识到，殖民地和教会的当权者对民众的控制。金班古的医病不能与之和睦相处。当他的运动扩展开来时，他受到殖民地当局的威胁。当他逃脱当局的逮捕后，与少数追随者转入地下。但是9月间的另一次异象使他自愿投降了。他于10月受审，被判130鞭刑处死。但是比利时国王在某些传教士的督促下给他缓刑，他被终身囚禁在伊丽莎白维尔（Elisabethville，今卢本巴希，Lumumbashi），并于1951年死于此地。在此期间，他的两千多门徒遭围捕，被关押在许多拘留中心里。然而事与愿违，这样做恰恰增强了这个教派。它在1969年作为诸多独立教会中的第一个被接纳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

先知谢姆贝与南非的锡安会

许多南非的新宗教运动都与医病有关。但是它们也强调其领导

人的超凡魅力(charismatic powers)。它们或多或少受到美国教会的影响(他们曾派人到南非),如伊利诺斯州的锡安福音基督教普世教会(Evangelical Christian Catholic Church of Zion City),出于这个原因,许多新宗教运动如今被归类为锡安会。因为它们经常渴望尘世的自由,其名号也有着深刻的意味。

在这些新宗教运动中,最著名的是由先知谢姆贝(Isaiah Shembe,1870? —1935)在祖鲁人中创立的教派。那时祖鲁人的土地已经被剥夺,在1906年祖鲁人反抗后不久,谢姆贝获得了异象体验,在这些体验中,有一次是在因兰伽卡兹山(Inhlangakazi),他在那里静修了12天,经受了诱惑并最终获胜,通过这次体验,他获得了既能驱逐邪恶精灵又能医病的力量。他在另一座山,班德城外的伊库法卡美尼(Ekuphakameni)山建立了他的中心,那里成为每年一度的大汇集之地。谢姆贝的生活经历使他被许多门徒看作弥赛亚。不管怎样,他所创建的拿撒勒教会,深深地浸透了他的非凡的创造性,包括从他的文思泉涌中写作的赞美诗(为此日的他年过四十学会阅读后又致力于这些赞美诗的写作)。这些赞美诗嵌人隆重的载歌载舞的令人愉快的仪式之中,而他的门徒则身着祖鲁人的服装。这是一种民族的宗教复兴运动,这个民族曾在战争中被打垮并被殖民统治所剥夺。

罗马天主教的某些分离运动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证,一个是复兴“非洲主义”(Africanism),另一个是立足于新教源泉的基督教。我们曾经提到写过论班图人的哲学的坦普尔斯神父,他曾帮助“贾马亚”(Jamaa,这个词在斯瓦西里语中意为“家庭”)运动的创立。这个运动趋向于从教会内部表达一种非洲的天主教教义,但是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的,于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变成了分离组织,至今仍然活动在扎伊尔的沙巴(Shaba)区和开赛(Kasai)区。在肯尼亚和赞比亚,还有其他的分离的天主教运动。但是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在热情鼓励母语化的同时,号召与其他宗教对话而不是压制,号召本地化,但对那些意在分离的群体来说,梵二会议的作用并不大。

某些其他的运动

这些教会表现出来的非洲宗教性的一个重要线索，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创立于尼日利亚、兴盛于非洲西海岸，强调祈祷和圣灵医治之重要性的阿拉杜拉(Aladura)运动。它们将灵恩的异象与对《圣经》 550
之自我信赖的品德混合在一起。

末世论色彩比较强的运动，是由赞比亚的女先知伦施娜(Alice Lenshina, 1919? —1978)创立的。她也获得一个异象，相信她自己受到了上帝的特别宠爱。她离开了原来所属的长老会教会，转而给她的门徒施洗，她特别强调音乐的形式，音乐将她和她门徒的背景协调起来。冲突最终爆发了，最初是与殖民地当局，后来是与获得独立的赞比亚政府。鲁姆帕(Lumpa)教会(优秀的教会)认为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因而拒绝纳税。在与当局的作战中，她的门徒手持原始的武器，因而很容易被打败。他们居住在清教徒式的社区里，社区位于魔鬼所控制的区域之外，这些集权的组织随时准备与新政权开战。尽管这个运动在精神上主要是基督教的，但它并不否定魔法，魔法虽然被看作邪恶的，然而有时也会得到鲁姆帕教会的保护。相比之下， 551
具有理性思维的长老会教徒，只是简单地否定魔法的存在。

某些其他的运动是古典非洲宗教的复兴者，它们用组织和宣传作为传教的手段，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在比属刚果(扎伊尔)西南部创立的“我们祖先的上帝的教会”(Eglise de Dieu de Nos Ancetres)，便是一例。

在各种各样的新教会和新宗教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在传统的功能被转移的地方，传统的内容也被抛弃：比如在某些运动中，医病虽然十分突出，但却没有传统的方法或理论。另一种模式是比较明显的“汇合”，在这些运动中，诸如信仰祖先等古典的主题，被编织到以《圣经》为基础的说教中。在许多运动中，异象的体验都十分重要。这中间有些东西是新教群体难以控制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许多民间人物(既有男也有女)，被他们的信徒看作先知，有时也看作遵循耶稣道路的“受难的仆人”(Suffering Servants)。新宗教运动的许多主题与《新约》有着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

作为对进入非洲社会的各种强劲力量的回应，新宗教运动经常是在有限的背景中发挥作用。它们形成了某些引人注目的和美的虔诚形式。它们的最大弱点——金班古的教派在某种程度上已克服——是这些新宗教以及古典的形式，都需要某种教义的或哲学的支撑，否则，它们无法成功地消化现代科学、经济变化、城市化与基督教的冲击。它们面临着一种选择：或者返回到主流教会中，成为那个背景中的非洲人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或者更明确地转向，以便创造出一种新的非洲式的汇合，将非洲的古典宗教与西方的概念（包括基督教的概念）融合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带来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一种泛非洲的哲学是否正在形成？或者，非洲是否正在被吸纳入一种全球化的处境中（在这种处境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维模式和组织模式将构成一种精神的殖民主义新形式）？这正是探索非洲哲学的黑人特质（Negritude）及其他形式的重要性所在。新宗教运动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它们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缘地带涌现和沸腾。但是它们在数量上，无论是在非洲社会的多元性中，还是在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的各个支脉中，都只是些小碎片。

对黑非洲的反思

非洲的场景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未来无疑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552 的继续扩展，并以牺牲古典非洲的宗教形式为代价的。这些宗教形式赖以生存的社会在整体上太小了，不足以承受现代社会变化的全部冲击，特别是城市的吸引力。而后一现象无疑有利于新宗教运动的发展，它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加非个人的关联中，给予人们以一种新的认同感。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大部分已经结束，1989 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垮台，新南非在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的领导下诞生。但是非洲人还在忍受着西方人对他们的文化成就和生活方式评价过低的现状。力图逃脱这些局限的一个重要的努力——向非洲人详细说明他们在过去和未来对世界文明的特殊贡献——将形成一种哲学的框架，我们可以在此框架中看到非洲的种种

观念与制度。与此同时，海外的非洲人在南美、加勒比地区的，尤其在北美，也非常重要。在那些地方，宗教的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非洲精神之诸层面

在结束对非洲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考察之际，我们可以简要地做一些概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然地有许多变化，但也有某些模式浮现出来。

首先，在仪式层面，基督教的各种形式，无论是主流教会的还是新宗教的，都强调非洲的崇拜形式。这在赞美诗中和某些新宗教运动的"虔诚主义"（devotionalism）中（比如在谢姆贝教会的舞蹈中），以及在使用母语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推动了本土化进程。对许多非洲人来说，由于主流教会缺乏牧师和神甫，以及其他的原因，圣餐并不是核心的要素。充满活力是洗礼的表象，这部分地由于水在古典的非洲背景中是净化的象征，部分地由于溪水经常令人既敬畏又向往。

在经验层面，异梦与异象在新宗教运动的形成中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非洲的古典宗教与五旬节教派有某种姻亲关系，因而后者传播较广。在城市生活的转变选择中和在农村经济的变化中，承诺变得更为重要，在这些环境里，皈依的经验是重要的。

至于伦理道德，已经出现了一些对非洲社会中的婚姻习俗和多配偶制的反省。还有一些对待祖先的责任的问题。在非洲场景里，非常重要的是团结的观念，兄弟姐妹的观念，这些观念在某些新宗教社区里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

在教义层面，出现某种在现代宇宙论的背景中建构独具非洲特色的整体主义的途径：我们如何将非洲关于世界上的诸多力量相互联系的某些传统观点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此外，还有如何在非洲的背景里为宗教的多元论提供哲学基础的问题。

神话层面留给人们很多反思的东西，它从世界历史的视角讲述 554
了非洲的故事，以及基督教在非洲的故事。看来似乎有一种故事正在出现，它强调黑人在奴隶贸易和殖民地时代所遭受的苦难，这些苦难与《旧约》中的以色列人的经历和"受难的仆人"有相似之处。



仪式层面：在古典的非洲宗教中，水具有突出的作用，在非洲基督教的新形式中，它又增添了新的意义。

在艺术层面，非洲的雕刻与绘画已经对西方人的想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正被用来更深刻地表现蕴含在非洲的新的精神。

非洲，是个生机勃勃的大陆，也是个问题丛生的大陆。它的宗教生活诸层面可以和其他地区的贡献相媲美，然而更深层的创造即将到来。

第二十四章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征服的精神

尽管西方人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远航的目的是要到达亚洲，但是直到1520年，哥伦布首次登陆近30年后，西班牙人才最终相信他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发现了一片如此辽阔的土地，参与开发的热情有如当年参与十字军一般。将穆斯林从西班牙驱逐出去，曾是件艰巨的事情，但是这点燃了西班牙人对罗马天主教的热心，葡萄牙人也是如此，只不过稍逊一筹。宗教改革，引起了欧洲人在宗教上的分裂，但却增强了忠于罗马天主教事业的价值，而这一切，导致许多复杂的问题。事实上，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的所作所为是相当残酷和贪婪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事实，即他们自以为是在遵循上帝的意志。教会在征服者之后接踵而来，在虔诚信徒的眼前展现着扩展基督工作的远大前景。 555

对于本地宗教，诸如阿兹台克宗教和印加宗教的一般态度，是一种恐怖和鄙视的态度。阿兹台克人的人祭活动令人很不舒服。但是真正恐怖的是“新世界”居民的普遍的偶像崇拜。所以许许多多的本地文化被连根铲除。将文化从宗教中消除，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大量的本地文献和创造物已经被毁灭了。

征服的精神，既是献身于一种神圣的事业，同时也是大力开发被征服人口的机会。由于教会方面实行了“反宗教改革”，从而为将正统的罗马天主教信仰送达新世界提供了动力和机制。因此征服就其自身而言，也是一次十字军运动。

征服的令人惊讶的平静是件奇怪的事情。西班牙人遇到的两个帝国都是高度集权化的。西班牙人打击了这些帝国的大脑，其身体也就瘫痪了。他们的优势在于马和火枪，轮船和大炮。征服的迅速与荣耀增强了胜利者的自信心，他们相信自己的文明和宗教极大地 556

优越于他们所统治的人们的文化。

到1700年之际,西班牙人在"新世界"统治的地区极其广大,从加利福尼亚到得克萨斯再到巴塔哥尼亚高原,从厄瓜多尔到加勒比海。葡萄牙人在与荷兰人(他们在苏里南[Surinam]保留一个基地)几番较量后统治了巨大的巴西。但是某些地区特别重要,而其他地区则人口稀薄并地处边缘。富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是秘鲁和墨西哥(当时称新西班牙),以及加勒比地区。在此期间,"新世界"的生活方式对增强如此之大的地区的统治起了巩固作用,而在推行这种生活方式的进程中,教会担任了主角。

关于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争论

无论是好是坏,土著人被称作印第安人(indios,or Indians),因为哥伦布和他的后继者都以为自己到达了印度。印第安人作为原住民保留下来。征服对印第安人的影响及其后果,是使之灭绝。这不仅仅是因为许多印第安人实际上变成了奴隶,他们在秘鲁和其他地方的银矿里,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还因为欧洲人带来的疾病(特别是天花)的爆发。从现有的资料来估计人口数量不大容易,但是到1700年时,新西班牙的人口只有1500年时的十分之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教会和政府当局如何看待印第安人。他们是否被看作完全的人类?

在这场辩论中,一位决定性的人物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1474—1566)。他生于塞维利亚(Seville),到海外参与对海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现在是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分界线)的征服。他是一名牧师,但却要参加征服古巴的艰苦战斗。在这两个群岛上,他在 *encomienda* 制度下获得了土地。这是一种封建制度,被西班牙人征服的土地和村庄,通常作为参战和征服的奖赏。然而在40岁时,他改变了观念,他开始深切地关心印第安人的状况,并且从那时起就变成了他们利益的捍卫者,勇敢地和坦率地大声反对对印第安人施以暴行。他放弃了他的产业。他的精力过人,参与各种各样的斗争与计划,包括在委内瑞拉建立一个殖民地,他试图在那里让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在一起进行农业劳动,但是没有成功。



非洲人在海地的伏都教(Voodoo)中接触罗马天主教教义。

卡萨斯在法庭上为印第安人的权利辩护，他对诸多虐待的反对 559
获得了成功。他是1542年通过新法律的重要力量，这个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印第安人的权利。他热情地倡导人人平等，在他的名著《印第安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ndies*)中，他收录了某些重

要的信仰范围内的残酷与虚伪:在他看来,传道应该是一种宣传与温和的劝告之事,不应施以暴力和奴役。而反对者们站在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立场上,认为印第安人是劣等的,是"像猴子一样的人"。卡萨斯热情地论证说印第安人像白人一样有灵魂。他的事业,他对殖民主义的虐待的不懈反对,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缓和"新世界"之本地居民的状况。

一个宗教,两个民族

"新世界"有许多西班牙人的定居点。这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当然,印第安人还有其生活的空间,后来的历史,主要是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但是,混血人的阶级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梅斯蒂索混血儿(*mestizos*)不同于白人,他们控制着拉丁美洲的历史。白人又分为克里奥罗(criollos),即生长在"新世界"的白人,以及生在家乡西班牙的白人。从本质上说,从19世纪初期开始的"新世界"摆脱西班牙的解放斗争,是克里奥罗对宗主国控制的反叛,总体上说还留下了一些适当的机构。

在墨西哥和秘鲁的大部分地区,表现出的模式是印第安人组织成自己的村庄,来自不同差会的传教士——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一边劳作,一边用当地语言进行传教。那些世俗的教士(不属于任何差会的普通教士)总是照顾白人,但一两代人之后,也开始关照梅斯蒂索混血儿。如此形成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从殖民者的角度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让印第安居住在村庄里更易于控制。他们也能较容易地被结合到 *encomiendas* 制度中来,从而将其纳入强迫劳动的模式。在远离中心的地区,教士和传教士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宣讲基督教,这种做法合乎教会内部正在增长的传教观念:以卡萨斯为榜样。

大部分印第安人被迫转变信仰,在连根铲除土著宗教和毁坏被征服者之神灵的过程中,只有少许的不安。罗马天主教的圣徒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阻止某些古老神灵的重新出现,或至少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在墨西哥,最重要的圣徒是瓜达卢佩(Guadalupe)的圣女:在墨西哥的郊外,圣女向一位印第安人显现,并

用纳瓦特尔人(Nahuatl)的土语向他讲话。她成为梅斯蒂索人自己的宗教象征;西班牙人的马利也说印第安人的语言。在广袤的拉丁美洲地区,到处都保留着小型的本土文化与宗教,它们还没有被传教事业所触动,并且在罗马天主教织就的巨大网络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大部分的皈依发生在特兰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之后,有所改革的,更能有效工作的罗马天主教,给"新世界"带来了十分华贵的巴罗克艺术和建筑风格。宏伟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在许多城市的前基督教场所上建立起来,诸如墨西哥城的"市长大教堂"(Tempio Mayor)的所在地,曾经是阿兹台克皇帝举行人祭的地方。 560

印第安人逐渐认识到,西班牙人的到来,虽然不是世界的末日,但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古老的祭祀真的必不可少吗?入侵者践踏了神灵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在16世纪下半叶,宗教法庭也来到了"新世界",铲除偶像崇拜、异教和犹太教。这可能涉及到被俘的其他人中的新教水手,最初直接指向在印第安人中退缩的人,但是后来,家长式的精神传播开来,因为印第安人被认为太土,不可能有充分的责任心。的确,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有非西班牙人担任神父,所以建立起来的东西是彻底的家长式的制度。

在巴拉圭和加利福尼亚的家长制

这种家长制可以用一个耶稣会的例证和一个方济各会的例证来说明。耶稣会士于16世纪中叶来到"新世界",在17和18世纪,他们开始组织起称为"农庄"(Reductions)或集中的村庄,大量的地产以皇家特许或其他的方式授予了差会。在这些居民点中,印第安人被教以有用的手艺和技巧。学校是开放的,本地语言得到保护并有了书写。这是一种仁慈的专政:完全服从于耶稣会神父的命令,至于其他,印第安人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一切。这是一种宗教的共产主义。印第安人在此,总的说来不是自愿的,但是因为他们出生在这个体制中,或将此作为对某些罪孽的回报。

耶稣会士的重要说教与他们大声呼吁教育相符,但相信的人很少。在他们的世界里,教育涉及到僧侣的等级。教会具有教诲的职责和施教的功能。作为教皇的士兵,他们传达真理。但是这种方式

并非鼓励自信,独立判断或自由表达。结果是,当耶稣会士被驱逐出"新世界"的(由于欧洲的政治原因)时候,耶稣会农庄中的印第安人大量流失,整个体制也随之垮台。这个体制的最著名的地区位于现在的巴拉圭,这个小国家曾经移交给耶稣会,并实行过他们那一套奇异的控制方法。

562 在加利福尼亚,从南部的圣迭戈到旧金山以北,形成了一连串的传教站,在18世纪后半叶,在一位方济各会修士塞拉(Junipero Serra,1713—1784)的倡导下建立起来了。这些传教站将当地的印第安人(诸如丘马什人,Chumash)聚集在一起,以便推动他们从事农耕和其他行当。这些传教站经常配备一小队士兵守卫,维持秩序和保持安定,因为那时阿尔泰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刚刚被西班牙人占领。随着19世纪初墨西哥的独立与接踵而来的美国的接管,这一地区的体制亦随之垮台。印第安人的集中,以及他们对白人疾病缺乏抵抗力,给印第安人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与此同时,也毁灭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在方济各传教士的一连串的传教站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在西班牙风格的教堂里(这是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有些由印第安人描画出来的假冒的大理石,而印第安人不知道他们画的是什么。但是到处都有瓜达卢佩的圣女:印第安人生活的内在价值的一种象征,尽管其生活在文化上受到白人的鄙视。

拉丁美洲的分层

"新世界"人口与宗教政策的最终结果,是人们被安排在三个或四个层次中。有两种西班牙人,欧洲出生的和克里奥罗(*criollo*),位于顶层;然后是大量的梅斯蒂索混血儿,最后是印第安人。在某些地区,比如在加勒比群岛,实际上已经没有印第安人了,而是从非洲引入的奴隶。19世纪大量引进了黑人;直到1888年巴西才废除奴隶制。还应指出的是,在19和20世纪,还有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

这导致了多种多样的人种模式。古典的模式在白人,梅斯蒂索混血儿和印第安人之间形成的人口上升比例,大致为1:2:4或1:2:3。这个模式适用于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有些地区,梅斯蒂索混

血儿占了较大的比例，如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有些国家黑人占了优势，诸如巴西和古巴(然而古巴已经失去其印第安人，而在巴西，印第安人也是人口中的最少部分)。有些国家，特别是智利和阿根廷，白人占了压倒优势。在阿根廷，半数以上的移民来自意大利，西班牙人、法国人和其他群体也占有显著地位，而在巴西，则有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和日本裔群体：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巴西是最丰富多彩的。在某些地区，诸如亚马逊河流域、中美洲的部分地区、阿根廷中部地区、智利南部，还有一些未曾被征服过的印第安人。在圭亚那(以前是英属殖民地)，有一部分数量可观的人口来自印度，他们是19世纪下半叶作为契约劳工来到这里的，在讲英语的其他加勒比地区，也有一些东印度人。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北部国家，有其古典的分层模式，印第安人位 563
于底层。这使得经济的和社会的斗争更加尖锐，在具有大量黑人的巴西也有不同方式的表现。这种状态并没有受到1810—1826年独立战争的影响。作为结果的政治模式一直坚持到现代，只有很小的变化。

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

殖民地的反叛在本质上是由白人精英组织起来的。当然，曾经有过为了印第安人利益的独立战争，但是都被摧毁了——最著名的战役是由印加王子阿玛鲁斯(Tupac Amarus，1742—1781)领导的，他领导的安第斯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殖民地的白人寻求独立的运动很像北美殖民地的早先那一代人所做的。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大英帝国所推行的新体制使广泛的贸易和投资具有了可能性。但是政府的变更并没有在本质上触动土地占有制度，也没有改变具有强烈种族色彩的阶级结构。

在巴西没有必要发动战争：巴西于1815年建立了独立的君主政体，后来又变成一个帝国，1889年帝国崩溃后成立了共和国。古巴直到1888年才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获得独立。在英属加勒比地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群岛才获得独立。然而在海地，反抗的奴隶

们于1804年建立了黑人的统治。巴拿马直到1903年才出现，横贯东西的巴拿马运河使之看起来像个三明治。

在拉丁美洲的精英中，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的显性主题是自由，而且经常掺杂有某些反教权主义的情绪。即使在某些国家中宗教差会遭到驱逐，但大多数教会继续履行其传统的功能。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政教分离在名义上都已经实现了。各种力量的增长，诸如共济会的影响，新教的作用，来自欧洲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政府的自由理论，以及大量来自欧洲的移民，都对罗马天主教会形成压力，它的保守倾向一直坚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人口的增长，拉丁美洲在罗马天主教世界中的影响也增长了。

新教，经常在改变信仰的部落群体中发挥作用，而且在许多新移民的群体中有牢固的基础，在一段时间里，新教曾被看作异己的，甚至是北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美国佬或称为“外国佬”的人，的确有相当大的传统的敌意，这种敌意既存在于精英当中——由于审美的哲学强调讲拉丁语的南方文化的优越性，诸如称为“阿利
564 耶主义”(Arielism)的哲学一度非常时髦；也存在于普通百姓中——因为人们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对大众的剥削，在20世纪主要来自美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罗马天主教的“行动运动”(Action movement)，激励人们关注民主和贫困：通过创立基督教的民主政党，将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传播开来。但是许多教会人士希望寻求教会与社会之间的一致，想往回到古老的时代：诸如天主事工会(Opus Dei)等组织有助于实现这种梦想，这是一种新兴的由教牧人员和世俗人参与的具有极右倾向的运动。然而，这种返回到罗马天主教基督徒的和谐状态的梦想(这实际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被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中断了。此后出现了一个教义革新和新的社会思考的爆炸性的时期，人们将其称为“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的观念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它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状况的分析与罗马天主教的和《新约圣经》中所显示的基督的价值观混合在一起。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给予圣经学术以极大的推动，某些新的思想家在《新约圣经》中看到了基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贫困的本质上是革命的关注。他们论证说，教会的原初职责就是要改善穷人的生活。他们经常批评那种老式的态度，即用死后得到天国福乐的信仰来粉饰现实的苦难。因此这个运动在精神上是批判社会的、革命的，它关注的是改变社会结构和反对资本主义。它导致某些神职人员投身于革命斗争，如参与尼加拉瓜的桑地尼斯塔(Sandinista)革命。

解放神学还从分析第三世界贫困的现状出发，关注其他的某些方面。他们非常渴望一种实践的路径(他们用马克思的话语“实践”作为他们实现其理想的口号)；他们渴望立足于草根，由此改变教会自上而下的传统路径。他们还想提高穷人(这经常意指印第安人)的觉悟，这些穷人往往沉浸在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也很少能够改变的宿命论中。解放神学兴办“基础社区”(base communities)来实现其理想——创建一些小型社区，俗人和神职人员组织起来进行社会改良，读《圣经》，提高本地人的觉悟。在巴西和南美大陆的其他地方，已经建立起二十多万个这样的社区。

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之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南非的参与教会斗争的人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解放神学的杰出倡导者有秘鲁的古铁雷斯(Gustavo Cutierrez)，乌拉圭的西冈多(Juan Luis Segundo)，巴西的博夫(Leonardo Boff)，哥斯达黎加的阿 565
斯曼(Hugo Assmann)和阿根廷(新教教徒中)的博尼诺(Jose Miguel Bonino)。

拉丁美洲的新教

在20世纪，新教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它有三个根基：首先是

诸如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等国家的移民教会，它们随许多德国人和其566 他的欧洲移民来到这里；其次，更重要的是，来自美国的新教传教团，他们在罗马天主教徒和印第安人部落中传教，《圣经》的福音布道频频得手；第三是自发地在拉丁美洲人中产生的新教群体，特别是各种灵恩教派。在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之后，灵恩主义在罗马天主教内，像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突起之势。在一个世纪前，新教在拉丁美洲只有几十万人，而现在已经达到一千八百多万人。但是统计数字很难找到。

由新教成功引起的忧虑，一度摆到了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会议议程上，此外还有共济会的冲击和其他问题：直到最近，罗马天主教与新教的关系依然很紧张，罗马天主教力图保持其旧有的垄断地位，而新教则往往以严肃的宣传福音的方针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迷信（在他们看来是如此）。新教在拉丁美洲以及罗马天主教世界的其他地区获得成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因为新教的个人主义在一种资本主义的、都市的环境里有其意义。其次是因为新教强调宗教的体验和皈依是直接的、有感染力的、允诺和睦相处的、富于情感的，并将此作为新的团体的粘合剂。第三是人们自然会意识到，无论是世界宗教之间，还是一个宗教之内，多元论是必不可少的。罗马天主教不可能再主张其惟一的可能性。

所有这一切，只是拉丁美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1968年在麦德林（Medellin）举行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会议，通常被看作一个转折点，从此后，唤醒人的社会良知的声音变得更为响亮和重要，教会方面也似乎承认在基督徒的生活方面和社会方面，需要新的结构。这种呼声伴随着解放神学，已经使拉丁美洲的基督教走到世界宗教史的舞台中央。

宗教与种族

加勒比地区的教会

加勒比群岛在殖民地时代经历了文化上的创新，当地原来的印

第安人，大部分被疾病和压迫夺去了生命。在经济上，群岛变得依靠种植园，特别是糖，而且从非洲输入黑人在田间干活。所以在不同地区，还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白人居民点，他们是来自欧洲的移民——西班牙、法国、荷兰、丹麦，特别是英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是黑人，普通百姓中还有一个混血的层次。但正如我们指出的，某些殖民地的当权者后来又引入了印度人和中国人作为雇工。在大陆上，殖民者拥有英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和荷属苏里南，这些地区都很重要，而且也都包含有印第安人；与此相似的还有中美洲大陆上的伯利兹(Belize，以前为英属洪都拉斯)。

由于群岛上的人口大部分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所以基督教占了主导地位；但是除了移民和传教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影响。首先，在一两个地区，特别是巴巴多斯(Barbados)，长期以来黑人皈依基督教是不合法的。在其他地区，如在海地，有一些非洲的观念和仪式与罗马天主教的活动混杂在一起。在英国长期统治的群岛上，英国的教会(曾一度被确立为官方宗教)，只在白人移民中有吸引力，从180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非国教团体，如浸礼会，循道宗等，填充了黑人的空白。在最近20年中，加勒比地区发展最快的群体是灵恩派，其中，部分的原因要归在基要主义的美国传教士身上。 567

在古巴，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27—)于1959年的获胜，导致了对宗教的压制。到1980年时，只有三分之一的古巴人声称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而且有一大部分与称为桑泰里阿教(Santeria)的运动相重叠。这和前卡斯特罗时代绝大多数人称自己是罗马天主教徒形成对比。无疑某些回答有利于或预期了这种民意测验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反映了社会精神和政权的变化。尽管自1979年建立的尼加拉瓜的桑地尼斯塔政府最终可能会实现社会稳定，但卡斯特罗的政权是西半球惟一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政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宗教

在加勒比地区，有许多宗教是用来表现"非洲性"(Africanness)的。在某些方面，古巴的桑泰里阿教(卡斯特罗胜利后，遭到驱逐的教徒在美国建立了许多中心)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直接引入了

非常之多的约鲁巴宗教的人物和仪式。桑泰里阿教的神灵出版约鲁巴,但却等同于罗马天主教的圣徒:雷神桑科(Shango)变成了圣芭芭拉;灵卜奥伦米拉(Orunmila)变成了圣弗朗西斯;奥巴塔拉(Obatala)变成了怜悯的圣母马利亚;伊勒格巴(Elegba)变成圣彼得。在此类宗教中,两种宗教传统被整合在一起,罗马天主教的圣徒无疑为其他的信仰提供了一种包装,这些信仰为那些被迫来到种植园的人们所坚持。这些特征还适用于与之相似的宗教,如特立尼达岛(Trinidad)的称为"桑科"(Shango,来自神名,亦译为"信仰同化祭礼")的膜拜群体。

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是那些交织在一起的宗教传统,但这些传统并没有很恰当地结合为一种体系,这可以苏里南的称为"温蒂"(Winti)的系统为代表。这也许是因为新教所占居的主导地位,它部分地源自摩拉维亚传教团,而这一传统很少有混合的倾向。无论如何,属于"温蒂"的人们,在其他的背景里,其行为举止往往是个正直的基督徒,或是新教徒,或是天主教徒。"温蒂"认为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精灵和力量——空气,大地和水的神灵,由最高的上帝所控制——在许多方面与古典的非洲信仰相似。各种各样的仪式既可以唤醒,也可以抚慰各种神灵,而精灵附体则是这种宗教的标志性特征:它涉及到包括患病和萨满式的治疗等日常事务。

568 在巴西,有两种形式的唯灵论(spiritism)很有影响力。一种名为"卡德克学说"(Kardecism),是以法国思想家卡德克(Allan Kardec,1804—1869)的名字命名的。他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有一种处于转世化身过程中的精灵,人们可以通过媒介与之交流。这种精灵有其等级,最终归源于上帝。幸福与不幸皆为前世行为的结果。基督教之爱是最大的美德,我们应当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培养这种爱,以期达到精神的完美:所以我们是行动自由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卡德克学说的信仰体系排除奇迹和巫术的世界观,对于其信徒而言,一切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的这些思想于19世纪70和80年代引入巴西,开始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吸引大量的追随者。尽管天主教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反对它的运动,但是它继续获得支持。

卡德克学说还影响了一种更加世俗化的、充满象征的乌姆班达

(Umbanda)宗教运动,这个运动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里约热内卢,是一种松散的,以非洲人为基础的,由萨满式的男人和女人所领导的各种膜拜群体的聚合物。其中也强烈地混杂有约鲁巴因素。这些群体特别是在那些规模较大的、经常是肮脏不堪的都市棚户区里影响较大,因为它们给人以归属感。它们的神灵经常等同于罗马天主教的圣徒,在教会的成员与乌姆班达教的成员之间,有很高的重迭比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政府曾力图铲除这些膜拜团体,但是没有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卡德克学说与乌姆班达运动出现了某种混合,由于卡德克学说为那些膜拜团体提供了一种善良的教义和理智的框架,而那些膜拜团体则有助于为它增添不那么有教养的色彩和力量。

与古巴的桑泰里阿教有些相似的系统,是海地的伏都教(Voodoo,这是外人对它的称呼)。在这种信仰体制和仪式的实践方面,罗马天主教并不被其所拒绝,而是被用作一种框架,同时它将非洲的某些神灵或精灵(某些来自尼日利亚,某些来自贝宁和扎伊尔)纳入其中,用来处理日常问题和生活中的苦难。基督教的上帝在海地的克利奥尔语(Creole)中为Bondye,他统治并派遣他的天使,精灵,接近于人的存在到尘世;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并不求他做什么。所以他在功能上非常相似于古典非洲宗教中的高位神。更直接的关注赋予更直接的精灵。仪式的范围从简单的点燃蜡烛到动物献祭,而且在城市中,小的神殿是通用的。击鼓和唱歌的目的是为了精灵附体,这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因为这是精灵与人交流的主要途径,并能够使精灵参与到仪式之中。一般来说,这种宗教体制是由奴隶用源于非洲的材料创造的,罗马天主教的某些范畴是它的一种补充。

这里考察的所有这些宗教系统,就其重视其非洲之根而言,它们都给予黑人以自尊。但是某些其他的教派将关注点放在未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拉斯塔法里运动(Rastafari),它的起源与牙买加的领袖贾维(Marcus Garvey,1887—1940)的工作有关,他于1914年成立 569
了全球黑人促进协会。1930年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加冕,同时发生了"大萧条",这些都有助于人们对在千禧年时重返埃塞俄比

亚乐园的兴趣,这是丰富的非洲传统的一个象征。

拉斯特法里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着强烈的反白人倾向,它认为白人比黑人低劣,认为黑人之所以来到西印度群岛,乃是一种惩罚,他们将海尔·塞拉西看作活着的上帝,充满了重返埃塞俄比亚的希望,相信黑人不久将能够统治白人。这些信仰后来有所改变:当时的拉斯特法里主义者要求有某种外表特征,如留"骇人"长发绺(然而它以有教养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里变成了一种时髦,就像拉斯特法里音乐一样)和抽大麻。在牙买加的黑人中,更强调的是自助自强,而很少依靠海尔·塞拉西的帮助,尤其是在他于1974年被推翻并于次年死去之后。

南美洲小规模群体的问题

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如尼加拉瓜,特别是在亚马逊盆地,这些地区的开发导致了政府的控制和商业盘剥,给至今还生存于拉丁文化与社会之外的独立的印第安人群体带来诸多痛苦。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伐木和采矿,以及开发牧场和种植谷物,都对部落民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由不同的新教群体广泛进行的福音传道,也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许多部落群体将来还能否长久地保持其现在的生活方式,非常令人怀疑。另一方面,许多很久以前就已经松散地被整合到罗马天主教之中的人们,如安第斯高原上讲盖丘亚语(Quechua)的人们,虽然保留了征服前的原有文化与宗教,但却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上层建筑。

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状况的反思

世界上的这个高度变化的地区的活动是显著的。有些社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特别是在那些印第安人具有较高比例的国家里,问题就更为严重。但是在有些地方,以种族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已经有所克服。在墨西哥,1910年的革命寻觅那些本身是印第安人的领袖,最著名的有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1806—1872),这次革命也被纳入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的大壁画中,这个壁画表达了

将本地人的自由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革命制度党(有些人认为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为墨西哥提供了社会稳定和一个世俗的反教权的政府,尽管罗马天主教徒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然而贫穷依旧。

罗马天主教会的作用有两个方面:它的古老的保守派支持既定的政权,而其精英则朝向由新的解放神学所描绘、所鼓励的新的革命航向。在许多地区,尽管新教的福音传道日益增进,但是黑人群体中 570
涌现的宗教,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非洲之根相联系。在南方的许多共和国里,白人社会正在为政治问题和选举权而奋斗,但是对多元民主的渴望,在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军人政权残酷的大屠杀和智利的暴政与军国主义(特别是在1973年皮诺切特[Pinochet]在1973年掌权)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加勒比与拉丁宗教诸方面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发展中挑出一些最为重要的项目,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精神的样板。在教义层面,最富有生命力的贡献是解放神学;但由于唯灵论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Hispanics)中发展起来,结果是卡德克学说也传播开来。

至于神话和故事层面,一种拉丁美洲在人类文明中具有特殊作 571
用的意识正在增长;很多人崇拜瓜达卢佩的圣女,她填补了征服者的宗教与被征服者的宗教之间神话上缺失的环节。

在经验层面,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出现了对灵恩派经验的关注和对"再生"宗教的关注。我们还可以指出,在小规模社会的层面上,依然坚持有萨满教;广为人知的还有黑人宗教中对媒介物的关注。对于幻觉剂的兴趣还在继续,如在安第斯印第安人中所使用的古柯(coca),在拉斯特法里(Rastafaris)信徒中使用的大麻。

就仪式层面来说,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之后,罗马天主教仪式的极大简化,本地语言的使用,都标志着从古老的殖民地的巴罗克风格发生重大的转变。在解放神学影响下一步建立的"基础社区",使《圣经》作为宗教实践方面的核心要素的作用得以复兴。

至于伦理道德,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布道中所指出的,对贫

穷的关注正在增长，并贯穿在罗马天主教中比较具有革命取向的诸方面。新教引入了比较个人主义的精神，这不仅为资本主义的增长所鼓励，而且也得到正在南方的共和国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消费主义的支撑。

在组织上，在某些地区，教会与国家有较大的冲突——在墨西哥是潜在的，在古巴和尼加拉瓜则较公开——普遍的状况是，在一段时间里，教会的权威不断削弱，而多元化越来越显著；然而解放神学对草根的关注，使来自民间的教会组织再次兴盛起来。

在物质层面，罗马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的外在标志虽然逐渐减少了，但这并没有改变那些高大的教会建筑，它们建于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时期，笼罩着城市，在那个充满信心的时代，西班牙热衷于修建那些教堂，热衷于将自己的基督教文明之版本带到这块大陆上。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建筑，在平原和安第斯山的灰尘四起的小城镇，在河边和大洋边上的建筑，它们是殖民地精神由开始到褪色的见证。

第二十五章　对 20 世纪的反思

一般而论，从 20 世纪起，各个宗教就开始了相互了解的历程。572
这是宗教的比较研究成果丰硕，各宗教间的对话真正开始的第一个时期。尽管这在各宗教之间建立了积极的关系，却也象征了一种更加深不可测的力量。因为它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而这种情况部分地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

两次世界大战同样要对其他一些重大的变革担负部分责任。俄国革命是由德国人引起的，而它确实波及了整个沙皇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凡尔赛和约将一个苛刻的和平强加给德国，刺激了希特勒和纳粹的崛起，同时也助长了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君主的势力，也是使许多国家从殖民奴役中解脱出来的主要原因。它同样带动了中国的革命。在所有这些变化当中，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因素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首先关注我们要讲述的故事的比较黑暗之面。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纳粹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曾激起了人类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大屠杀。希特勒统治时期对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人种族的大清洗，源自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即，非雅利安人种都是低劣的。苏联长期持续的苦难（较之希特勒时期，甚至有更多的人被杀戮或饥饿至死）则归咎于一种不容异己的极权主义，它所涉及的都是些危险而沉闷的抽象概念。同样，这也伴随着对宗教价值观的压制和对人类的普遍残忍。类似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被证实是致人于死命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下的大屠杀依赖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对所有染指资本主义广阔世界之教育和宗教的人格杀 573
勿论。乔森潘（Khieu Sampan）在巴黎大学时就杜撰了一套疯狂的意识形态。其他一些血腥的浩劫则归因于宗教与民族的差异：印巴分治时的杀戮混乱；此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土耳其发生的对亚美

尼亚人的种族清洗；后来在中非发生的胡图族（Hutus）和图西族（Tutsis）的大屠杀，等等。

一般而论，这个世纪的灾祸主要可以归咎于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的因素。宗教与民族身份一旦结合就会产生出一种强有力的混合体。然而，从整体看来，在20世纪这些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宗教却成了遭受迫害的对象：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治下的东正教和天主教；毛泽东主义治下的中国传统宗教，以及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红色高棉统治下的佛教；纳粹统治下的犹太教；苏联统治下的中亚伊斯兰教。

人们同样要对南非加以注意，其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正是纳粹主义的一种文雅的形式（它被英国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软化了）。这一切随着纳尔逊·曼德拉于1990年的获释以及一个新体制的建立而烟消云散。



1983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斯托泽克的和平圣母像面前祈祷。

20世纪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一直是民族主义。它从欧洲 574
延伸到亚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为反殖民运动助势。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神话，并常常以它们的语言对之加以美化，另外也为现代国家的创立提供了各自的框架。国家实体规定了教育体系、福利体系和官僚体系，等等；不同国家人口中具有的同一民族也经常频繁地成为紧张冲突的一个起因。现代战争和游击战为相互对抗提供了一种模式。宗教通常成为了不同传统之间差异的标记。

第四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这与共产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思想是相对立的，与民族主义也有着不和谐的关系。它碰巧是合乎科学原则的惟一哲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才会与李森科（Lysenko）刚愎自用的生物学理论纠结在一起，却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毫无用处。自由主义代表了一种开放的社会，而后者也强调对理论采取批判性态度。科学不断地受到修正。自由主义尽管可以与宗教相结合，但却不能与启示或经文中最严谨的观点相结合。因此，在宗教领域出现了一种两极化的趋势：或是倾向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或是通常所谓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或是倾向于一种更为保守的或是基要主义的类型。我们可以将信仰的发展视作向现代主义进发的过程，同时又伴随着保守主义的反动。中间立场是存在的，这些倾向在各个层面上也并不一定是平行的。比如说，基督教中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在思想领域常常是自由主义的，而在仪式及伦理层面却奉行保守主义。

在一些西方国家，自由民主主义也削弱了传统。举例来说，在苏格兰、瑞典和芬兰，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都很少。通常人们都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进程，而宗教性受到腐蚀几乎是现代化生存不可避免的结果。毫无疑问，自由主义使人们不再那么愿意遵从传统的权威。比如，尽管教皇一再呼吁抵制人工流产，意大利的出生率在20世纪末仍旧是全世界最低的。但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去做弥撒。教皇似乎仍充当着一个仪式核心的角色，但却不是道德训导者。尽管如此，世俗化并不是普遍现象：在美国，教堂礼拜的出席率相对较高，而且在个体中也出现了建立自己的宗教的倾向。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对精神层面的事物而不是对传统，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态度。



京都的神道教节日，身着天照大神服装的人物形象在街上巡行。

日本的两次冒险

在回望20世纪之际，我们目睹了苏联和纳粹帝国的崩溃，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不那么暴虐的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另一个帝国则带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相，这就是日本，一个将民族主义与宗教相融合的例子。20世纪日本的带有神道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是效果
577 显著的，在其驱使下，东亚很大一部分地区：朝鲜、中国的东北地区、东南亚、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上的诸多岛屿，都受到了它的部分控制。在这一时期，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主义者，通常，这可能意味着对隶属国的蹂躏。

种族主义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延伸，它是20世纪的一股洪流，尽管它很难定义（这部分因为它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日本的

成功在军事上有助于削弱旧殖民主义，因此，它是亚洲国家民族主义传播中的一个因素。

日本的第二次冒险是对富有神道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进行大扫除，代之以美国占领军所支持的自由民主主义。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只是速度稍慢一些。香港也部分地采用了这一模式，尽管在 1997 年回归大陆后仍然留下了一些问题。所有这些国家中都有颇具实力的佛教少数派团体，从大体上说，佛教是一种带有个人化倾向的宗教。在这个地区，由开明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之间进行的对话卓有成效。

伊斯兰教的问题

20 世纪见证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强大势力的又一次突起；然而它不可能完全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到 20 世纪末，它只统辖了极少数几个具有某种类似民主政体的国家——也许有土耳其（在那里伊斯兰教是被部分禁止的）、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是民主的，其中一些国家则津津乐道于一种残酷的政体（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就很显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不得不逐渐接受了多元主义，而另一些国家——尤其是伊朗和苏丹，则没有。当然，在 20 世纪的整个后半叶，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所关注的，首先是以色列和创建巴勒斯坦国等问题。

举例来说，虽然埃及创建起一个现代国家，但它还不得不同时与伊斯兰教的各种势力竞争，这些势力的力量来自民众的贫穷和一种斗争的哲学。这类原教旨主义的目标旨在净化伊斯兰教，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重新树立其古老的教法，即沙里亚。其理论是，伊斯兰教令人悲观的现状源自这种信仰的堕落，而这主要是苏非主义和西方的示范作用造成的。尽管伊斯兰教经常是生机勃勃并且崇尚武力，它却无力解决一个复苏的伊斯兰世界的问题。答案很可能存在于一种多元的、民主的、具有现代知识的信仰形式之中。这一处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宗教。

对多元主义的需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国家都有其他少数派宗教。而伊斯兰教那种带有蔑视性的设想则认为，只有惟一

的一个团体存在。而且,现代社会需要宗教自由,而这是传统的伊斯兰社会所不容的。此外,就像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事件[1]所显示的那样,根据对沙里亚的一条解释,这个社会对言论自由有各种严格的限制。对民主政体的要求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
578 质决定的:其自由权利与商业运作息息相关。然而不止于此,民主主义还蕴涵了某些人类的权利,尽管不同的宗教对民主这个概念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如今对这些权利的维护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最后,虽然伊斯兰教和现代科学,尤其是宇宙哲学并无多少分歧,但在与教育的关系方面,它也造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传统的伊斯兰教育需要和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同生并存:而后者却需要致力于对现存理论的质疑和批判,这和一种拘泥于文本的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似乎可以说,伊斯兰教需要一种现代主义的形式来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二者并无大异)相调和。

特别是在最后一点上,即与科学的关系上,苏非主义被伊斯兰的各种倾向低估了。伊斯兰教内的这条神秘暗流不但缓和了它的拘泥于字面的倾向,还常常使一种关于神性和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得以发展,而这种观点与时下的思考也许是并行不悖的。

20世纪的伊斯兰教在北美与欧洲大行其道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在德国、英国和法国,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劳工尤其重要。现在,南加利福尼亚的穆斯林比犹太人还要多。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需要一种能将现代思维与传统思维结合起来的信仰形式。

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某些原教旨主义的或伊斯兰的组织构成了最引人注意的焦点,它们首先在中东和北非一带已经复活。与以色列持续的对抗点燃了它们的狂热情绪。它们回顾达尔·伊斯兰(Dar al-Islam,即穆斯林居住区)占有整个巴勒斯坦的那种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人就代表了一种由强大的美国撑腰的异族入侵。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的现状是极其可悲的:这一曾经大放异彩的文

[1] 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因其著作《撒旦诗篇》而被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下令所有穆斯林追杀一事。——译注

明首先是被西方殖民主义侵害，现在又遭到西方影响的侵蚀，因此必须打击这种影响。然而，很难分辨这种斗争究竟是为了伊斯兰的解放，还是为了政治上的自由。无论如何，对于穆斯林而言，圣战的象征是强有力的，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的武装组织在对抗以色列时常常倾向于采用游击战术。

毫无疑问，以色列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首先这是一片属于依据一个宗教而界定出来的国家的国土，尽管那个群体，即犹太人，大部分是世俗主义者。除此之外，其建国运动、犹太复国主义，既是世界世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然而，这一特性中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是犹太教的正统派，其余的还包括犹太教的保守派或是改革派。他们所得到的支持大部分来自美国，在那里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强大而富有影响力。因此，在以色列，宗教的因素绝不可能被忽视，这部分是因为选举制度给予了宗教各政党过多的影响，而且，这个国家自建国之日起，传统主义的势力就很一直十分强大。由于 1967 年那场战争的胜利，以色列在控制了许多 579
巴勒斯坦人的同时，也占领了相当一部分巴勒斯坦的领土，因此，巴勒斯坦的解放问题在阿拉伯人的议事日程上，或是更一般地说，在穆斯林的议事日程上，一直占有显著的位置。

这只是延缓了阿拉伯国家中军事与皇室独裁体制的寿命，并保障了伊朗新伊斯兰政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确立。因此，一个巴勒斯坦国家最终有望建立，且我们应该期待阿拉伯和其他国家与以色列的和平共处早日实现。

当然，在其他地方，类似的军事政体或极权政体在穆斯林世界里——在继承了苏联封闭体制的中亚国家，在遭到严重毁坏的阿富汗，甚至在相对多元的印度尼西亚，在苏丹和北非的很多地区——也都可以找到。

与此同时，在南亚有大量的穆斯林，他们代表了穆斯林世界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安于一种民主政体，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则正勇敢地为此目标奋斗。不幸的是，在印度，印度教好战派中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观点威胁着印度教传统和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平衡；而且没有其穆斯林公民——

其数量大致相当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各自的人口数量——的忠诚,印度将会陷入混乱之中。

尽管原教旨主义型的伊斯兰教在很多方面都是保守的,但是它仍然具有社会意识的倾向,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常常是很现代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它将为一个更为开放的正统宗教开辟道路。此外,伊斯兰教对西方国家大量渗透的事实,意味着更大的影响将从这些散居在外的人扩展到伊斯兰的其他主要地区。因此,这个世纪末出现的一些新发展,将有可能造就一个更积极地参与同其邻居的宗教进行对话的现代主义的伊斯兰教。

中国问题

随着20世纪的结束,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转折。邓小平(1904—1997)执政时期见证了他所支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仍然不是没有问题存在,比如八亿农民的困境,他们的收入要远远低于沿海地区的一些新兴群体。邓小平领导下的一个成效在于放宽了对于宗教的管制,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复兴。

1997年香港的回归宣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这可能是两种体系,即香港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汇合。在经济改革取得相对的成功之后,中国可能将推动政治的改革。

对一些宗教的确认

580 部分是由于反殖民斗争的结果,部分是由于对一些相互重叠的现象的认识,主要是在20世纪出现了一些新概念。因此,与古典非洲宗教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形式相关,非洲宗教的概念得以了发展。非洲黑人之间的血缘亲意识赋予了这一理念额外的真实性。类似地,美洲本土宗教这一概念现在也被广泛接,受并正在开始有了一部经典汇集。与此类似,澳洲本土宗教、波利尼西亚宗教和其他地区性的宗教范畴也已得到确认。或许最新得到确认的是环极宗教(Circumpolar Religion)。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确认。

20世纪开始发生的另一件事是部族和其他群体之间越界的联

合。对自己势单力孤的意识更成为加强合作的一个诱因，在印度和缅甸的不同种族地区，以及墨西哥和中美洲所谓的印第沃人（indios）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新兴宗教

世界的全球化意味着各宗教之间前所未有的相互遭遇。结果之一便是许多新兴宗教运动的产生。当宗教 A 遇到宗教 B 时，它们可 581
以相融合并相互影响。它们可能成为宗教 Ab 或者宗教 Ba，然后通过排他反应，变成宗教 Aa 或宗教 Bb。它们也许还会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类型，即宗教 C。这种排列组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非洲，不同的宗教形式与基督教结合形成了各种新兴的独立教会，它们同时糅合了本土仪式的要素和新约教义中的信仰等等。在 19 世纪，英国公教就是融合了英国国教会的教义和天主教的传统教义。福音派基督教和儒教则在统一教会中得到了结合。

此外，有原创性的一些新兴宗教如摩门教，是从 19 世纪各种宗教复兴的环境中产生的；20 世纪以来，在全世界（从新几内亚到西伯利亚）各种小规模的传统之内，出现了许多信仰上的转变。在日本、在印度教传统中、在美洲、欧洲和其他地方，新兴宗教的数量也十分引人注目。

普世主义

世界上主要的宗教，由基督教开始，在此期间都加强了相互的联系。20 世纪见证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和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对天主教进行的改革。除了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对立外，基督教徒之间一些显著的分歧已经通过不同方式得到了消弭。类似地，佛教徒也成立了世界佛教联谊会。伊斯兰教虽然经常实行相互宽容的方针，但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分裂确实仍在继续。

但是在各大宗教内部除了这些普世的情感之外，有时分歧也相当尖锐。在犹太教内部，尤其是在以色列，正统派、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各种运动之间的分裂已十分剧烈。

尽管有这些紧张的局面，各宗教之间仍然存在一种更广泛的普世主义。现代时期以来，也许从1993年的世界宗教议会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正面的强调。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形式是由维韦卡南达提出的[1]，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所有信仰的终极统一性，都在这种形式中得到了肯定。说到底，并非所有的宗教，或者说也许并非任何一种宗教都真正都相信这一点。所有的宗教是否可能统一仍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诸宗教的统一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怎样在各种不同层面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人们可能会观察到，正是由于主要在20世纪对宗教所进行的比较研究，真相已经变得更为清晰了。的确，由于西方宗教的很多狭隘性和缺乏兴趣，这一领域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得以全面发展。）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教义方面，许多宗教关于创造的理念事实上都相类似。这种观念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一个神圣的存在创造，而
582 且也是由他继续着：换言之，是由他（或是她，它）继续维系着的。这一观念在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有神论的印度教，尤其是道教和儒教、锡克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中都有迹可寻。非洲宗教和其他宗教中也有此说。然而，在佛教和耆那教里，却没有世界依赖于一个造物主的说法。因此，这是诸宗教统一性之说无法得以维持的一个主要方面。

其次，关于人的生命也有一些重大的分歧。很多宗教，包括古老的和现代的宗教，都坚持生命的再生和转世说，而其他宗教则不然。

在神话或叙事的层面，各个宗教也均有其特别之处：它们是尊重一个角色还是另一个角色，都会造成了很大的不同。即使除去结构上的含义（比如道成肉身等等），克里希那、基督和穆罕默德的故事也

---

① 参见本书第十六章，即原书第410页。——译注

大相径庭。此外，有些信仰集中于一个人，其他一些信仰则集中于全人类，如此等等，这也造成了许多不同。

在经验层面也存在着重叠和分歧。因此，在苏非主义、中世纪神秘主义、道教和佛教中都存在着一致的神秘体验，尽管其特点有所不同。但是在宗教的某些阶段，对于神秘体验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感的强调，是有差异的。在上座部佛教中，一种传统与另一些传统的分离是最为明显的，在那种佛教中冥想的生活表现得最为鲜明。

尽管在伦理层面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叠，在细节和重点上仍然有重要的差异。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关于德行的诫命包括彼此不同的婚姻条款；儒教和印度教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锡克教和耆那教对待动物的态度也各具特色；等等。

在仪式的要求上，各个宗教也有所区别：献祭往往是需要的，有的需要朝圣，有的需要沉思的生活，却不需要崇拜。在另一方面，上座部佛教徒的生活与唱赞美诗的基督徒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差异，而婆罗门教的仪式也十分不同于贵格会的仪式。在一些宗教中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礼仪的东西，在另一些宗教中则不是。

在考虑各种宗教之统一性的问题时，尽管组织的问题比起其他层面来也许不是那么重要，然而一些组织形式仍然在拯救的问题上具有自身的特点。*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教会之外无救恩）：倘若没有教皇制，教会会是这样的吗？婆罗门构成了一个神圣的赋予活力的等级，而佛教的僧伽是将人带入涅槃（或者至少是一种更好的生活）的权威团体。我们又一次看到，差异是十分显著的。

最后，甚至对物质层面的理解也是彼此不同的，这种不同即在于是否被允许以物质形式代表超越者。神灵是否体现在它们的象征物中呢？

所以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一切中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在有些地方，不同的理念之间甚至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因此，继续坚持一切宗教具有基本的统一性似乎是不现实的。 583
不可否认，确实有过像维韦卡南达和圭农（Guenon）这样的人为之做

过论证。这种统一性一直主要以一种潜在的神秘主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以在许多宗教中所理解的冥想生活为基础的。但那同样需要一个假设，即，对统一的一种可见的信仰，是神的形象。这一假设在上座部佛教中并不存在。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不同神圣存在将要由实在者而不是非实在者来统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又如何能适应这样的理论呢？

然而，各信仰之间难道不会存在着一种不那么严格的相互适应性吗？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考虑——所有的大宗教都倾向于殊途同归。举例来说，它们都逐渐确定了神圣体验和神秘体验的韵律，并且，一方面强调主体与相遇者之间的结合，另一方面又强调神与其崇拜者之间强大的施予恩惠的对立。大乘佛教、苏非主义与基督教在这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这可以引导我们进行一种更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可以分辨出所有这些模式中所暗示的一些未来的转变。或许最终将会出现一种汇合。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宗教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它们不能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体呢？它们还并未达到这一步。也许它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它们各自的信息，从而曲解了启示真理。很有可能在下一个千年里，它们将会更好地理解启示真理并且彼此理解。

当然，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某种形式的统一呢？这似乎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彼此有分歧的话就不能够和平共处。其实，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即使一些人明确地提出宗教统一的迫切要求，总会有另一些人要对此表示异议。简言之，在某种程度上，不统一总是人类群居的一个特征。

尽管如此，对统一抱有某种希望还是值得的，这部分是因为，各信仰之间的冲突是十分不幸的，并且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世纪中，对话已经获得了进展。只要可能，我们就必须避免敌对的局面。现在，让我们采取某种不同的方针，通过认识的途径，或者毋宁说，通过认识的理论来处理这些问题。

关于认识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如何得知我们声称自己认识的东西,但是就宗教的状况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做出回答的问题。许多回答都诉诸于启示、权威,或是个人体验。然而,如果你借助的是这个启示而我借助的却是另一个,应该怎么办呢?个人体验可能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在精神上它可能确实使人信服,但对于信仰而言,它却是一个"软"理由,一种不同的启示也可以引出类似的证明。然而,从公众的观点来说,无论我的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确定性,它仍然(我重复一遍,是从公众的观点来说)只是一个见解的问题。

换言之,肯定一种信仰就是表达一种确定性;但是它很难表达客观的确定性。从这一角度出发,信仰不是某种可以教条化的东西,而是我们可以开始对话,也应该进行对话的问题。

而且,站在这一立场能够得到的结论是,各种宗教都有开放性的 584
问题:它们不应该强加于人,但其教义也不应该受到禁止。从认识的理论与民主或开放社会的要求来看,在一个现代国家,所有的大宗教(同样包括许多小宗教)都应该享有表达自身的宽容环境,而不必在意传统的学说。事实上这正是20世纪内愈加频繁出现的倾向,尽管例外仍然存在:在伊朗和其他一些地方,现代民主的秩序尚未站稳脚跟。

现代社会也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倾向。举例来说,各种仪式都存在着简化的倾向。时间的紧迫,理解的需要,当代生活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有类似地的简化倾向。然而确实有某些传统主义,比如正统犹太教,却一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再一次突出了许多宗教中存在的信仰和实践上的内在分化。宗教中形形色色的自由派在正在向一个方向发展,而新保守主义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那些个人主义最为发达的地方,可以说有相当数量的人们,在创造着(正如以往一样)他们自

己的宗教。他们时常把灵性和各种不同的健康情况联系起来，并且参与一些私下的仪式。在20世纪末，形形色色的社会学著作都描述过这些人，并且时常把他们与那些被笼统地称为“新纪元”（New Age）的运动相提并论。这些个人在信仰上常常非常折衷，对一些组织或教会的忠诚也许并不牢靠，也不专一。那些更专注于一种宗教传统的人很容易低估这类个体的严肃性和认真劲——他们也许看起来有些轻率或疯狂。但是，他们确实代表了宗教方面的一种正在上升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根本上属于新教[①]，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依赖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信仰。他们还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一些探索者，正在努力去发现开启生命的“神秘钥匙”。

因特网上的交流无疑会方便了这一过程，而且一般而言，因为这种交流是由个人操作的，它加强了这种媒体的个体方面，因此有助于那些借此传播的宗教。

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一种反思

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群——更不用说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和非洲的人群——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的信仰明显是世俗的信仰。在这个群体中，一股生气勃勃的力量由一些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组成。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世俗人文主义者或曾经是某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时常把各种信仰如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的或自由的无神论的信仰混合起来。此外也有其他一些思想主题搀杂进来——比如说弗洛伊德的思想仍旧相当强大。

585 当我们回顾整个20世纪，尤其是认真去理解和描绘世界诸种信仰的本性之后，我们应当会对弗洛伊德的或荣格的分析有一种相当程度的怀疑。大体而言，弗洛伊德本人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追随者，都完全忽视了此世神话中的一些细节；而荣格的分析却是从相当数量的材料中有选择地得出的，因此很难证伪。此外，在这些领域中，对神话的界说是有误的，事实上神话包括了范围广泛的种类不同的故事。然而，各种不同类型的心理分析却都纳入了一种宽泛的人文

① 新教的原文 Protestantism，原意为“抗议派”。——译注

主义框架,并且仍然在西方世界很有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科学人文主义的一般框架得到了被称之为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理论的支持。这一点,再加上半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变种(特别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也许可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他们通常拒斥宗教,他们也是 20 世纪末的一股强大的理智力量。与宗教不同的是,科学人文主义当然诉诸于科学,并且总是不断地修正自身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但在另一方面,它却永远不会去探索可以被称作"生命的灵性层面"的东西。然而除了偏见之外,却找不到它为什么不应该如此去做的原因。

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自然地视世界为一个经验的世界,即认为应该从经验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并且视之为世界的本来面目。但是另一方面,这样做并没有确切地排除超越者。我们说,大爆炸是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开始。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假定更多的东西。但是,比方说,有神论者却可能会将大爆炸的根源归咎于第一因(First Cause)。宇宙和整个世界也许根本就会不存在。据说宇宙是由一种有意识的原因带人存在的。这类观点虽然不能被证实,但是它们确实考虑到了关于超越存在者的观念。这种论证遵循的是所谓"宇宙论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在这种论证中,在阿奎那等人的有神论传统中,科学的世界观和有神论的世界观之间的相容性显示了出来。

然而,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自满自足的哲学,它在 20 世纪变得日益重要了起来,这部分地是因为其自身的优势,部分是因为人们对一些现有信仰和传统有所幻灭。后者有时会以各种拘泥于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似乎否定了科学探索的各种发现。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主要的变化之一来自于环保主义者的观点:将有生命的存在物与他们的环境以及他们在地球上的作用结合为一体,这种方式不仅仅吸引人,而且还给人以启迪。他们还指出,人类正在奔向种种极端的危险境地——让地球承受我们日益熟练的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污染物和副产品。地球的变热也许是自然出现的,但是很多迹象表明,这应该归咎于人类自身。一些诸如马尔代夫之类的小岛国也许将会消失,还有一些沿海城市也有可能将会沉没——

各种各样的有害结果都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新的、对环境的关注,可
586 以为传统宗教及科学人文主义者所分担。事实上,这个领域的一些主要问题有时是由这些传统宗教所提出来的:耆那教徒对动物生命的怜悯,佛教徒关于众生之间相互联系的观念都曾有过巨大影响。另外,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或其他一些原住民对待他们周围的环境以及与他们的动物伙伴平衡共存的方式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当然,由于很多不同的原因,这些民族正在逐渐远离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因纽特人已经放弃了打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已经迁移到了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

1969年,作家兼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使用了盖亚(Gaia)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对大地女神的称谓),来表明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有着各种形式生命的、统一的、相互作用的实体,就像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一样。那些从前往月球途中的太空中拍摄的美丽生动的地球照片,则加强了这一形象的比喻。而这些东西正在开始进入我们意识。也许宇宙同样地应被视为诸天体的一种巨大的相互作用。无论如何,环境论似乎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确立起来,并能作为科学人文主义和宗教哲学的元素之一发挥作用了。

最后还有一点是,首先从美国开始,女权运动已对西方社会并且越来越多地在其他地方造成了极大冲击。妇女权利的增加,是民主国家内争取人权的斗争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扩展。它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某些内容。有时保守的宗教对其有过些抵制,但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妇女正在过去曾是男权观点盛行的宗教领域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这样一个基本思想现在才刚刚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接纳——教育一个女孩等于教育一代人。但是像其他社会改革一样,要改变那些顽固的看法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在那些对过去合理地起作用的习俗之破坏存有恐惧的文化中,更是如此。然而,自由最终是不可抗拒的,一个信息开放的全球化世界会使它更快地得以实现。

现代世界中的散居者

我们已经注意到，宗教是如何通过移民在各民族之间传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带来的巨变和自发的移民，意味着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伊斯兰教的涌入，印度教和锡克教进入英国，非洲形式的基督教，以及一些新兴的宗教运动。在整个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人的定居地出现了；中国的移民出现在东南亚以及更遥远的地区。因此，很多国家的人民信仰的是混合的宗教，少数民族遍及各地。这些不同的散居者们造就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精神。

因为从总体上来说，货币是从富国向穷国流动的，也就是说，从接纳这些移民的地方流向输出移民的地方。这样，这些新的散居者往往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祖国。这些新的地区对宗教的挑战更多于传统地区，它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准备以一种多元的态度对待宗教。另一方面，它们有可能会支持激进的少数民族团体。因此，来自加拿大、英国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支持，使得锡克教徒争取卡利斯坦的运动更加活跃。与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佛教霸权的斗争特别地藉着欧洲的泰米尔流亡者而发起。 587

在以色列，有一种对古老的散居的奇妙逆转。新的家园回到了原地，人们以一种怀旧的目光看待这件事情。在 20 世纪来临之前，即 1896 年，泰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b）出版了他那本论以色列的广为流传的著作《犹太国家》（*Der Judenstaat*），他在书中为犹太民族国家进行了论证，因为他那个时代维也纳的反犹太主义（毫无疑问，它影响了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可怕的政治理念）不会让犹太人得到安宁，哪怕他们已在别的民族占上风的国家中被同化。他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希特勒从未想到一个犹太国家的梦想会成为现实，而自己通过大屠杀促成了它的实现。但是，即使到了 20 世纪末期，以色列的安定仍然未得到保障。它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进程至多只能算是脆弱的。来自美国的巨大支持并不能轻易克服其邻国（包括与他们混杂的巴勒斯坦人的）仍旧敌对的意图。爆炸事件仍在



克里希那运动中的西方崇拜者。

继续，或者仍然在威胁着人们。然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比如美国，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各种各样的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却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这是可以（尽管不是必然）从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痛苦中得出的教训。

588 但是，即使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仍然有必要教育人们学会宽容；这也需要知识。如果我们仍然对别人无知，单说"宽容那些人吧"是没有用的。我在这本书的最开始就说过，从我们这个世纪起，各个宗教才真正开始了相互了解的历程——而且这种过程大部分发生在 20 世纪后半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具体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在高等院校中，甚至在这之前是在初等学校里引进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这种方式造成了一些进步，但是，在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困难，比如，西方的基督徒中有人仍错误地认为，向年轻人介绍其他的信仰多多少少是对忠诚和真理的背叛。更有甚者，还有其他的声音在说，由于宗教是错误的，向年轻人进行宗教教育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些观点的回答在于，既然我们应该理解世界，我们就必须去了解各种世界观。不去了解我们邻人的价值观，是一种粗俗的无知。问题并不在于邻人所说的是否正确，而在

于是否有力。要考虑的不是其道理而是其力量。而且，毫无疑问，那部分地决定于它在情感上的影响力，而与其证据无关。所以我们将以一些关于宗教教育的思考来结束此书。我们这样做，部分是由于，在现代社会，用系统化的方法研究宗教，将愈来愈有助于缓解多元化社会中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紧张冲突。

世界观的分析与多元化社会

传统上，宗教教育（或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里与之相应的世俗教育）常常被认为是在灌输一种官方的信仰或是意识形态，有时可能会有两个系统：比如说，在德国，有相互平行的天主教学校与新教学校，在北爱尔兰也是一样。但是最近，多元主义的影响以及对一种教育（而不仅仅是教学）观点的认识，使得一种多元信仰的方法得以产生并发展。在英国，从 60 年代起这一点就十分明显了，而在斯堪的 589
纳维亚、德国、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同一时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在美国，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这样的方式自 80 年代起开始被采纳。在南非，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死亡，宗教教育上一种类似的多元主义也得到了发展。基督教教育的性质也已经被减弱，它采取了正面的态度对待其他宗教，并且在提出问题时也不再设置最终的答案——这些变化大部分发生在自由派圈子里，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尤其是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以后的天主教教育之中。

这改变背后的逻辑在于，为了理解各种宗教，或者理解某些宗教，你必须从它们的视角去看待它们，并且从它们情感的立场出发。或者，由于这一说法看起来有些抽象，不如说，你需要去理解持有其他信仰的人，那么，你就必须对他们抱有同情。在这里，同情并不一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情：但是你必须能够为他们设身处地。这就要求要有想像力，稍后我们将看到想象力是如何可以培养的。但是光有同情是不够的。你同样也需要有很多信息。如果你想要了解安息日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你就必须具体地知道犹太人如何守安息日。你应该知道有关创世的故事和这一故事与安息日的关系。你必须知道家庭在犹太人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以及家庭在更广大的团

体中的角色。你也必须知道在不同的犹太团体(正教的,保守的,改革的等等)中的各种不同的实践方式。换言之,宗教教育的关键在于了解情况之后的同情。

传统上,欧洲和北美的宗教教育主要依靠《圣经》。传授《圣经》的益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本身不会告诉你关于这一信仰或是这一宗教的全部知识,它只是举出了种种宗教体验的例证。你无法得知人们是怎样做的,它也无法对教义进行清楚的解释。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被人们奉行的基督教,你还需要了解很多《圣经》之外的东西。类似的意见也适用于《可兰经》、《塔木德》或是《论语》,尽管这并不是说,全面地了解相关的经典并不重要。而且,毫无疑问,在对外国宗教的研究中,可以获取相当多的经验,由此可以得知如何对它们进行有意义的探究。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使所有这一切都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年轻人能够对他们身边的种种信仰,同样也对更广大世界的种种信仰都有所了解。

这最后一点尤其值得详细论述:即关于更广大的世界的问题。在上半个世纪中,世界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文化融合的进程伴随着紧张局面的日益增长。在许多事件的进程中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已经得到了见证。即使你居住在,比方说,澳大利亚,一个穆斯
590 林相对较少的地方,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仍然很重要,因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群体就居住在与之相邻的印度尼西亚。因此,了解这个更广大的世界就意味着要去了解宗教。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历史:为了领悟各种传统,你必须领悟各种信仰。

传统的基于经典的宗教教育,会使年轻人对其他的信仰无知和抱有成见。的确,这是宗教隔离常常引发的一个重要结果。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北爱尔兰。一般而言,自从北爱尔兰成为一个分离的实体以来,甚至在这之前,教育在那里事实上是分开进行的。这样的分离竟然得到了允许,实在让人吃惊。如果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黑人,而所有的新教徒都是白人,那么这种隔离还会得到许可吗?但是由于这种分离被冠以了“宗教”之名,因而得到了宽容。天主教徒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新教徒的孩子们一无所知。有人可能会解释说,这正是教会的意愿。然而,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教会也可

以上颇民主和人权。

所以一般而论，对宗教教育而言，多元化的方式是最好的。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正是在20世纪，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对宗教的比较研究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事实，在宗教探索方面努力促进更加令人兴奋的活动。

我们已经提到了"了解情况的同情"的重要性。这当然并未告诉你关于宗教的真实性（或虚假性）；它的目的只在于提供关于宗教究竟如何作用并被感受的知识。它也能够告诉你，宗教曾经如何作用并被感受，尽管这样要更难一些：一个现存的宗教总比已经绝迹的宗教易于了解。你总是可以询问人们信仰什么，如何感受，但你却不能对死去的人这样做。

当你已经了解一种宗教或世界观之后，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对它进行判断——它大体上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是其它什么情况。但是当你尚未了解，或有所误解的时候，你就无法判断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在大多数人当中，宗教都是被误解的。这是人类的境况中仍在继续的丑行之一。无知是如此普遍，而理解是如此稀有。20世纪发生了一个伟大的突破：人们开始决心去了解其它的文化和传统，尽管这仍然只是少数人所拥有的价值观。我们同样也看到，还有一些人希望与其它传统进行真正的对话。这至少显示了一种愿望的存在，即，不只是要理解另一种信仰，在可能的时候，还要去认同它的价值观。这样的愿望在从前并非完全没有，只不过在20世纪更为普遍。

当今世界的"融合"——多元化的状况——具有使同情变得更为可行的优势。无论你居住在哪里，你都可以和佛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交上朋友。你可以陪他们去寺庙、清真寺或犹太教会堂，等等。这可以激发你天性中富有想象力的一面，可以使你的同情更加生动。当我在南非德班（Durban）的时候，曾被朋友带到 591
一个福音派色彩很浓的教堂去，那里全都是印度人（当晚除了我和我的朋友都是）。我对这一场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能感觉到一种对灵性的庆祝。在仪式之后，他们甚至要求我讲点什么。我说，在加利福尼亚将会有德班的一点痕迹，并感谢了他们的好客。我对他们所说

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都不赞同；但我可以诚实地说，我对那种宗教有了更好的理解，并且感谢他们对我们的邀请。

同样，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旅行的时代。如果你到斯里兰卡旅行，你就能看到现实中的佛教。在五十多年前，当我年轻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去锡兰（那时候是这样称呼的）。现在，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参观另一种文化的名胜同样能够激发同情，并且能使你了解另一种传统，和佛教僧人的交谈能帮助你进入另一种传统。另外，还可以借助于小说进入另一种文化或文化圈：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或者安东尼奥·弗加扎罗（Antonio Fogazzaro）的《圣徒》（*The Saint*），或者 R.K.纳拉扬（R.K. Narayan）的《向导》（*The Guide*）。毕竟，一个小说家常常体现了一种同情，因为叙事就浓缩了一种观点和情感的元素。同样的说法也适应于电影或电视节目。十三集系列片《漫长的探索》（*The Long Search*）就表现了世界上各种主要的宗教，它象征着 20 世纪对理解各种宗教的越来越多的努力。

理解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也是很值得反思的。我们很有可能永远不能完全地了解任何人。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能更好地了解他或者她，或比从前了解得更加深刻。我们的雄心不在于要达到什么深刻的程度，但是，就人类历史的很多时期和在大多数社会中发生的事情而言，对理解其他的文化和观点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进步。迄今为止，人们常常担心开放的思维会导致信仰的荒废，而这又会削弱了社会的结构。

一个世界性的世界观

最后，我们可以问道：即使在宗教方面没有一种统一，那么是否可能在某种更高的层次上，有某种世界性的世界观呢？我要说，正如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社会，需要一些指导各种宗教和各种意识形态彼此对待的准则。我们的讨论始终在暗示，有时则是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整个社会应该是多元化的。这一点说明，我们不应该压制任何宗教的表现，除非是为了良善的理由。只要有可能，不同的习俗就应该并存共处。应该允许灵性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

行为上并不需要刻板的千篇一律。即便在现在，循规蹈矩都可能是太多了。在穆斯林人口很多的地方，禁止一夫多妻制并没有很强烈的理由，而官僚制度带来的难题也还会到处存在。

在宗教教育方面的标准应当是走向理解，而且各国政府可以鼓励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对话。一个民主的公众社会在宗教问题上不应 592
当是刻板麻木的，而且决不应该鼓励语言上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人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当安宁的景象——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另外一些地方，民主制度正在同种种仇恨的爆发作斗争，也正在取得进步。在那么一些地方，例如在伊朗，宗教上的不宽容正在导致人权被扼杀。然而总起来看，我们可以说，过去的半个世纪同以往的年代相比，事情已经朝着良好的方面发生了可观的变化。尤其在前苏联是如此，而西欧从更早的年代开始也是这样。因此，全球的景象肯定是光明的。

也许，在一个宽容增加的时期，一个新的宗教时代正在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伟大人物——圣雄甘地、图图大主教、约翰二十三世教皇、特雷莎嬷嬷——都是宗教性的人物，这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所有时代最有影响的人物一直也是如此：孔子、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伽比尔、琐罗亚斯德……

因此，一个世界性的世界观正在浮现。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全球多元主义”。

词汇总表

Adi Granth:《阿底·格兰特》,锡克教经典,有时也被称作《古鲁圣典》,即指该书在最后一位古鲁,戈宾德·辛格死后成为古鲁。

Adur or Atar Fire:阿杜尔或阿塔尔圣火,被视为经过净化的火,用于琐罗亚斯德教寺庙仪式中。

Ahimsa:戒杀,不杀生,非暴力,耆那教的一种美德,亦见于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中,甘地赋予了它一种政治意义

Ahura Mazda:阿胡拉·马兹达,琐罗亚斯德教用语,指善神及创世者,后称奥尔玛兹德。

Ajiva:非命,非灵魂,耆那教用语,表示生命或不活动实体(与耆那 jivas 或精神相对)。

Akh:阿赫,古埃及宗教中人类光明灿烂的方面,死后也能出现。

Allah:真主安拉,(伊斯兰教)独一真神。

Amesha Spentas:七位圣仙,琐罗亚斯德教义中被认为是主神后裔的七位圣仙。

Amrit:甘露,锡克教徒在接受施洗时所用的长生不老的甘露。

Anabaptists:再洗礼派,宗教改革早期的一种运动,认为只有成人方可受洗,因为它要求受洗者必须有信仰,而只有成人才会有信仰。

Anekantavada:非一端说,在耆那教中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教义。

Angas:安伽,耆那教传统中最早的文献。

angas:佛教八正道中的各个阶段或部分。

Angra Mainyu:安格拉·曼纽,琐罗亚斯德教中与主神相对的邪恶势力,即后来的阿赫里曼。

Arca:偶像,画像,印度教圣像。

Atman:阿特曼、灵魂、我,印度教中永恒或至上的自我。

atonement:神人和合,基督教中相互妥协的教义,其时上帝与人类通过基督的牺牲不止一次地"合为一体"。

Atua：阿图阿，波利尼西亚宗教中的神灵之一，创造神或某种较为低级的神。

Avatara：化身，印度教大神(大多指毗湿奴)的下凡或化身，化身有罗摩、克里希那和未来之神迦尔基等。

ba：巴，身魂，意为“永远活着”，古埃及宗教中人的灵魂(带有 akh)。

baptism：洗礼，加入基督教会者须领受的浸水礼或点水礼。

Baptists：浸礼宗，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该教派强调施洗的神圣性，自再洗礼派之后延续至今；在美国，尤其是在南方势力强大。

Bhakti：巴克提，虔信，印度教和某些佛教传统中的虔诚崇拜。

Bible：《圣经》，经书集，基督徒视之为上帝启示的记录。

Bodhisattva：菩萨，推迟了其最终解脱，孜孜劳作，普渡众生的未来佛。最著名的菩萨形象是观世音，在中国为观音，在日本则为 Kannon。

Bosatsu：菩萨，日文名词，指菩萨或者其他注定要觉悟者。

Brahman：梵，印度教牺牲以及婆罗门家族中的力量，据推测是支撑宇宙的神力；神圣的现实，主神。

Buddha：佛陀，了然万法实相的觉悟者。

Bundahishn：《波斯创世纪》，琐罗亚斯德教中指世界的原初创造；也指一种经典的名称。

Butsudan：佛龛，日本家庭中置有佛像的神龛，与敬拜神灵的神龛相似。

Caliph：哈里发，伊斯兰的领袖，最后驻扎于伊斯坦布尔；现代民族主义和此前的各种运动分裂了伊斯兰世界，现代传播泛伊斯兰哲学的种种努力又重新发出了恢复哈里发制度的呼吁。

Calumet：卡柳梅特，从加拿大到南美之间的土著美洲人传统中一种抽烟工具的法文表述。

Chiao：教，一种宗教运动，教义或教派。

Chinvat：钦瓦德或离渡，(伊斯兰教义中[1])通往天堂或地狱的桥。一个美丽的姑娘将会引导善的灵魂通过这座桥，而恶的灵魂会发

[1] 疑有误，应为在琐罗亚斯德教中。参见原书第 223 页。——校注

现这桥薄如刀刃,并会由此滑落到地狱。

Christ:基督,受膏者或弥赛亚,拯救的实施者。

Church:教会,在现实和天堂的基督徒社群。

Communion:圣餐,圣体或弥撒或主的晚餐。圣餐还有一种特别的用法名为“圣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那些已经得救的和死去的人都包含于其中。

Corroboree:狂欢,澳大利亚土著聚集的节日,经常在此重新演绎神话。

Cosmos:宇宙,有序世界,在古希腊用于表示宇宙。

Daimoku:《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的日语题名,被日本佛教日莲宗用来肯定解脱。

Dao(Tao):道、道路,道教中所言宇宙的基本原则。

Dharma:法,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中存在于社会和自然生命之中的法则或原理。

Dhyana:禅、禅那,静虑,沉思,常见于逐渐净化意识的八个阶段。

dhyana(巴利语为 **jhana**):禅,冥思、默想(佛教),后来在中国译为禅(韩文为 Son,日文为 Zen)。

Digambara:天衣派、空衣派,耆那教传统中的一个主要支派,指裸体禁欲者(直译“天衣派、空衣派”)。

Ecopsychism:生态有灵论,认为周围环境中存在精灵的观点(狩猎和采集的人们通常都有此类观点)。

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让—保罗·萨特推崇的一种哲学观点,马丁·海德格尔和其他很多人都强调人类的自由(亦即人类的存在先于本质;随着人类的演进而攒合成为自然)。

Fascism: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或者是极端浪漫的民族主义形式的强力权威系统;并不必然是种族主义,但在纳粹主义的情况下却确乎如此。

Filioque:“和子句”,“和从子来”,这个短语被罗马天主教写进尼西亚信经,而东正教则视之为错误的窜人,双方的裂痕由此更甚。

Frashokereti:混世之终,琐罗亚斯德教神话及教义中创造、复活以及最后审判的行动;事物的更新。

fravashis：庇灵，琐罗亚斯德教中人类永恒的精神，居留于天界（我们存留于此是劫数所致）。

Fundamentalism：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一个使用宽泛的术语；通常用于保守的基督徒；有时也用于伊斯兰教，即指极端的穆斯林，亦用于印度教徒（亦即，B.J.P.）。就圣经而言只限于指称亦步亦趋的基督徒。

Grace：恩典（或泽为恩宠、圣宠），上帝的力量进入人的里面，从而使人有能力做出善行、并且得到拯救。

Granth：参见《阿底·格兰特》。

gurudwara：锡克教神庙。

Guru：古鲁，印度教传统中精神力量的预感者，也指聚集于古鲁·戈宾德·辛格的十位锡克社团领袖。

Hadīth：哈底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经过确认的故事，因而也是行为的依据和参照。

Hajj：哈吉，赴麦加朝觐，对任何有能力的穆斯林而言都是至喜至乐之事。经历了朝觐的人称为哈吉。

Hasidim (or Chasidim)：哈西德派，18 世纪晚期兴起于东欧（乌克兰和波兰南部）的一种运动，强调神秘主义。

haskalah：哈斯卡拉，欧洲的犹太启蒙运动，主要发生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在犹太人中间引起了新的思考和伦理、礼仪实践。

Hesychasm：静修主义，东正教的一种神秘主义，尤其是指中世纪早期希腊的神秘主义（来源于希腊语"hesyche"，意为"安静"），并涉及某些呼吸的技巧。

High God：高位神，一个神祇概念，该神祇与人类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却遥遥主宰着我们的命运（此概念由威尔海姆·施密特提出）。小部落通常信奉此类神灵。

Holocaust：整只焚烧的燔祭品、大屠杀，希腊语，意为整只焚烧的燔祭品（直译"完全焚烧的"）。后用于指纳粹对无数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大屠杀。

hubris：傲睨神明，来源于希腊语的"hybris"，意指人的傲慢自大，这种傲慢自大使得人宣称自己与神明（或上帝）并列。

ikon（**or icon**）：圣像，用于描绘圣人或基督，常被置于东正教教堂的显要部位，以供人尊崇和亲吻，并被视为"通往天堂的一扇窗户"。

Imam：伊玛目，清真寺中的领拜人。也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对其十二位领袖人物的称谓。

Israel：以色列，作为犹太人之渴望焦点的一块土地。

Isvara：自在天，印度教主神（直译即主宰）；通常用来指称单个神灵（毗湿奴、湿婆等）。

Janamsakhi：《阇难萨契》，锡克教用来纪念祖师那纳克生平的著作。

jati：阇提、贾特，种姓，其大体结构是由婆罗门为首的瓦尔纳（然后是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阶层，其后即是不可接触者或曰 dalits）。

Jhana：禅，参见 dhyana。

jihād：吉哈德、圣战，（伊斯兰教中的）神圣斗争，指精神或军事方面的斗争。

Jina：耆那，胜利者，对大雄的称号。他的门徒被称为耆那教徒。这一称号也被用来称呼佛。

jing：经，通常指中国古代儒家的五经，也可指其他诸如禅宗的《六祖坛经》这样的经典。

Jodo：净土（日文），通往涅槃的极乐世界。

Kabbalah：喀巴拉，犹太神秘主义的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传统"，表现在像（13世纪西班牙的）《光明》（*Zohar*）之类的文献中。

kachina：卡奇纳，美国西南部霍皮人使用的一种神圣面具。

Kama：爱或愉悦（巴利文为 sanskrit）。

Kami：神或神道教中的魂灵。

Kannon：（日本）以女性形象出现的菩萨（在中文中为观音）。

Karma：业，字面意义即行为，也指行为的后果，包括影响它们的法则。

Kashrut：卡什鲁特，犹太教的饮食规定，比如什么是"洁净可食的"（kosher）或无污染的、纯净的。

Kevala：完全知，（耆那教）解脱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灵魂毫无情欲，居于宇宙的顶峰，被描绘为宇宙中的巨人。

Khalsa：卡尔萨，锡克教社团，"纯粹的分子"由戈宾德开始。

Khilafat：哈里发运动，追求哈里发制度的重建。

Kojiki：《古事记》，神道教的经典文献，在公元前7世纪编纂而成。

Kokutai：国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神道教有时被称为国家神道教。

Li：礼，孔子特别推崇的恰当的行为，包括礼仪或庆典。

li：理，新儒家哲学所提倡的原则或精神潜能，与气或物质能量结合而成的具体之物。

Liberal Protestantism：新教自由派，这种新教派别以学术、科学和民主原则为依据来解释圣经。

Liberation Theology：解放神学，天主教内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解释福音的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中南美洲颇有影响。

Logos：逻各斯，人的理性，有时等同于统管宇宙的原则或基督。

Love：爱，希腊语为"agapē"，对他人的挚爱，这是基督徒的首要美德。

Mahavrata：大誓戒，耆那教的和尚或尼姑所坚守的大戒，发誓不杀生，不撒谎，戒淫，戒盗，不拥有私人物品。

Mahayana：摩诃延那、大乘佛教，依靠空宗哲学，强调佛陀之道的佛教运动，包括如净土佛教等的新信仰方式。

Mana：玛纳，神力的概念：由人类学家和宗教史学家采用的一个美拉尼西亚语词。

Mandala：曼荼罗，小乘佛教和印度教中使用的一种神图，有时又将宇宙空间的各个方向对等于各尊大菩萨。

Manes：玛涅斯或玛纳，古罗马宗教中死者的鬼魂。

Manthra：关于力量的词语，主要来源于最早的经典，为祷告者所用。

Mantra：印度传统中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在后期佛教中也存在。

Mappo：末法时代，佛法无法在留存的时代，所以就兴起了像净土宗这样的宗派。

marabout：穆拉比特，指北非伊斯兰教中的圣徒或圣人。

marae：马拉伊，波利尼西亚带有神殿的神圣地域。

masalai：马萨雷，巴布亚新几内亚词语，指会作祟危害人类的魔鬼或精灵。

mashiah：弥赛亚，将于末后来临，复兴以色列，并宣告和平时期的到来者。这个头衔曾被用于耶稣。

matsuri：祭祀、祭典、庙会，神道教节日。

Mennonites：门诺派，门诺·西蒙斯的追随者，主要分布于东欧和北美，为再洗礼派的后继者。

Messiah：参见 弥赛亚（mashiah）。

Miko：神子、巫女，神道教的沙门或神女，被严格地作为处子抚养，献身于地方神的教派。

Millet system：米勒特制，奥斯曼人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安排，使之能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Mitzvah（复数为 Mitzvot）：（犹太教的）诫律，诫命，共有 613 条，包括 10 条主要诫命和其他诫命。

Mizimu：亡灵，祖先（班图语）。

modernism：现代主义，所有宗教传统中的一种现代化立场。典型的有犹太教改革派、新教自由派、佛教现代主义和伊斯兰教现代主义，等等。

Mool Mantra：（锡克教）"基本颂条"，由那纳克创作的信条的一个简单叙述，坚持真神的惟一性。

mysteria：指奥秘或者秘密宗教，它们最初都以戏剧性的形式启示了真理。

mythos：神话（或译密索思），以权威性模式表达的关于神明的故事。

nabi：纳比，伊斯兰的先知，包括易卜拉欣、耶稣以及穆罕默德。

Nembutsu：念佛，虔诚地呼唤"佛"，在日本佛教净土宗中的口号是"向佛致敬"。

Neoconfucianism：新儒家，中古时期中国和朝鲜的儒家复兴运动。

Neo-Platonism：新柏拉图主义，以普罗提诺为先驱的宗教哲学。

Nganga：恩冈，中南非地区传统的去魔治病的专业人士，亦即所谓的巫医。

Nirvana（巴利文为 **Nibbana**）：涅槃，对由贪、嗔、痴引起的再生的断绝。

numen：元神或守护神，古罗马宗教中的精灵或神明，来源于鲁道

夫·奥托发明的形容词"numinous"。

numinous：神秘者，其特征为能够引发敬畏的神秘感和恐惧感。

Ohrmazd：奥尔玛兹德，参见阿胡拉·马兹达。

Pancasila：五戒，佛教的五大戒律——戒杀生，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

panth：班陀，直译道路，参见锡克社团(遵循此道路)。

pentecostalism：灵恩运动，按《圣经》规则衡量通常属很保守的一种运动，说方言，强调圣灵激发的体验(故有此名)；在拉丁美洲势力强大。

philosophia：爱智，对智慧的爱。以往，特别是在希腊化和罗马世界，比起现在的哲学来，那时的哲学更像是宗教。

Prajna（巴利文为 **pranna**）：般若，表示洞察力、远见的佛教术语。

Pratityasamutpada：缘起、缘生，（佛教）事件的因缘生起，联系世界轮回流转的各个事件的规律。

Presbyterianism：长老会，基督教宗派，属于改革后的教会，根据加尔文所制定的规则选举长老管理教会。

Puja：（印度教）敬拜、崇拜。

Pure Land Movement：净土运动，起源于印度，后来在中国和日本发展起来，由阿弥陀佛（日文为 Amida）净土而得名，在日本它以激进的形式出现。

Qabbalah：参见 Kabbalah。

qalandars：卡兰达里，穆斯林的禁欲主义者，通常是采用印度教的自虐方式。

Qan（中文为 Chan）：禅宗、禅，冥想，沉思（梵文 dhyana 的中文翻译），也是日本佛教一个重要宗派的名称，在日语中为 Zen。

***qi*（*ch'i*）**：气，物质能量，与理构成现实世界中的物质实体。

Qur'ān：《古兰经》，（伊斯兰教）降示给先知的神圣启示或真主的言词，它是永恒的。

Rabbi：（犹太教）拉比，教授传统经书《妥拉》的老师，某个社群的有学问的老师或属灵顾问。

Rahit：拉希特，锡克教徒的伦理及仪式法典，包括佩戴五 K：常蓄的

髻发、短剑、马裤、梳子和铁镯。

Reconstructionist movement：重建派运动，现代犹太教运动，由卡普兰(Mordecai Kaplan)创始于1935年。该运动强调犹太文化的生命力，贬低对神人同形同性的上帝的信仰。

Reform Judaism：犹太教改革派，现代犹太教自由派，深受以撒·怀斯(Issac Wise)的影响，在北美势力尤强。

Religio：宗教、与神合一，使我们与神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宗教(拉丁语)。

***ren*(*jen*)**：仁，儒学传统中指人道、待人忠恕之意。

rsi(rishi)：吠陀读者或梦者。

Salat：撒拉特，伊斯兰教中的礼拜。

Samsara：三昧(佛教)，(佛教)生存者的活的流转，期间个体都被卷进生死轮回之中。

sangha：僧伽，佛教僧侣社团。

Sannyasin：隐士、遁世者，隐士，常常是经历过人生各个阶段体验之后摈弃俗世的长者(印度教传统)。

sant：桑陀，属于北印度虔诚派传统的北印度一个教派。该教派的典型特点就是认为神没有属性，其最重要的两个人物(这是就他们创立了锡克教而言的)是迦比尔和那纳克。

Sat Guru：萨陀·古鲁，锡克教中大多赋予主神的名号，即"存在，上师"。

Satori：觉悟、彻悟，在禅宗中指觉悟、大彻大悟。

saum：沙渥姆，(伊斯兰)斋戒，尤其是在拉马丹斋月期间。

Shabbat：(犹太教)安息日，休息的一天，从星期五日落时直至星期六日落时。

Shari'a：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不同的学派对此有不同解释。

Shi'a：什叶派，它是逊尼派——或说伊斯兰教传统形式之外的另一个派别。什叶派对哈里发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信仰隐遁的伊玛目会在未来重新显现。

Shinto：神道，日本宗教中强有力的一支，在近代曾有一段时间是日本国强制的民族精神。

Sikh：直译“门徒”，锡克教徒。

Sila：戒、尸罗，德行，或能激励德行的美德或戒律，如汇总了佛教徒道德的五戒等。

Sin：罪（基督教），人与上帝的疏离，据说最初归咎于亚当和夏娃的作为。

starets：俄罗斯的圣人。

Stupa：佛塔（佛教），收敛圣者遗物的土堆，其后稳定的结构就是以庙和塔为基本特征。

Sufism：苏非主义，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或冥思之道。

Sunyata：空，大乘佛教的中心哲学教义。

Svetambara：白衣派，指耆那教徒中不实行裸体苦修的一派；该派的每个男女僧侣都用三块白布裹身。

Tabu or tapu：塔布，波利尼西亚语词，意为危险的或禁止的：巨大的玛纳产生塔布。

Taiping（T'ai P'ing）：太平，道教文献中所指之天堂；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

Taizhi（T'ai Chi）：太极，新儒家所言之终极泉源，即宇宙大化流行之基。

Talmud：《塔木德》，犹太传统的主要文本，以亚兰语写成，有巴比伦式和巴勒斯坦式两种形式。其中前者作为其法律、伦理或哈拉卡（halahic）[①]方面的规定，原则上对所有正统犹太人都具有约束力。

Tantra：坦陀罗，佛教或印度教的仪式，有时强调神的女性力量

tapas：直译热量，印度传统中表达苦行的术语，在耆那教和印度教部分派别中有专门的强调。

Tathagata：如来，佛的称号之一，意为“如来”。

Tathata：真如，大乘佛教用语，表示终极实在。

Temenos：神圣的区域（希腊语）。

Tendai：天台，日本佛教中一种神圣而奥秘的运动，最初以《妙法莲花经》为基础。

---

① 或作 halachic，《塔木德》中不载于《摩西五经》的口述律法。——译注

***Tian*（*T'ien*）**：天、苍天，或上天之人格神，其世间体现者即皇帝。

Tirthankara：指点迷津者，耆那教最高领袖称号之一。

Theos："上帝"或"神明"（希腊语）。

theosis：神化，成为神圣的、或象上帝的（希腊正教）。

Torah（Judaism）：《妥拉》（犹太教），训诫或法律，以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在西奈传至摩西；其书面形式等同于希伯来圣经的头五部书。

totem：图腾，来自北美的阿尔冈金词语；自然界隶属某一部族的一个动植物属种，该部族不会射猎或采集它。

Trinity：三位一体，在基督教中，上帝被认为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个位格合一于同一个本体。

umma：乌玛，穆斯林公社、伊斯兰社团。

Unitarianism：上帝一位论，不信奉三位一体学说的一种思潮。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实利主义，一种伦理理论，认为善恶行为先天注定，藉此就导致人类的幸福与痛苦。

Yahweh（Judaism）：雅赫维或雅威（犹太教），希伯来语对上帝的称呼。

Yazatas（Zoroastrianism）：雅扎塔众神（琐罗亚斯德教），被认为有价值或应该崇拜的天灵和天使。最流行的是密特拉。

yin－yang：阴阳，中国宗教中的雌雄概念。

yoga：瑜伽，一种能达到完美精神内省的印度传统的训练方法。

yasasna：火祆祈祷，琐罗亚斯德教传统中的崇拜。

zakat：扎克特、济贫税，施恩泽于穷人：伊斯兰信仰的柱石之一。

Zen：禅，直译"思虑"，字面意义即"冥思"、"默想"。瑜伽佛教在日本的名称，运用了多种沉思的新技巧。

Zurvan：佐尔文，永恒时间，琐罗亚斯德教后期一个分歧的焦点，奥尔玛兹德和阿赫里曼就产生于此，并被视为神。

参考书目

Walter Capps, *Religious Studies: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Minneapolis, 1995

S. Cromwell Crawford, ed., *World Religions and Global Ethics*, New York, 1991

Mircea Eliad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15 vols., New York, 1987

E. E. Evans-Pritchard, *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 Oxford, 1965

John R. Hinnells, ed., *A Handbook of Living Religions*, Baltimore, 1985

G. van der Leeuw, *Religion in Essence and Manifestation*, Princeton, 1987

Rudolf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London, 1950

Sabrina P. Ramet and Donald W. Treadgold, eds., *Render under Caesar: The Religious Sphere in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1995

Eric J. Sharpe, *Comparative Religion – A History*, London, 1976

Ninian Smart, *Dimensions of the Sacred: An Anatomy of the World's Beliefs*, San Francisco, 1997

Ninian Smart,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Mankind*, 5th edn., Upper Saddle River, NJ, 1996

Ninian Smart and Richard Hecht, eds., *Sacred Texts of the World*, London, 1982

R. J. Z. Werblowsky, *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hanging Relig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1976

Earliest Religion

E. O. James, *The Beginnings of Religion*, Westport, Conn., 1973

Johannes Maringer, *The Gods of Prehistoric Man*, New York, 1960

Alexander Marshack, *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72

Elizabeth Shee Twohig, *The Megalithic Art of Western Europe*, Oxford, 1981

South Asia

Paul Bowen, ed., *Themes and Issues in Hinduism*, London, 1997

E. O. Cole and P. S. Sambhi, *The Sikh Tradition*, London, 1978

Edward Conze, *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84

S. N. Dasgupta, *A History of Indian Philosophy*, 5 vols., Delhi, 1976

M. David Eckel, *To see the Buddha: A Philosopher's Quest for the Meaning of Emptiness*, San Francisco, 1992

Mircea Eliade, *Yoga: Immortality and Freedom*, 2nd ed., Princeton, 1969

Gavin Flood, *An Introduction to Hinduism*, Cambridge, 1996

Melvyn C. Goldstein and Matthew T.

Capstein,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Berkeley, 1988

Richard Gombrich, *Theravada Buddhism*, London, 1988

Frieholm Hardy, *The Religious Culture of India: Power, Love and Wisdom*, Cambridge, 1994

Peter Harvey, *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m*, Cambridge, 1994

P.S. Jaini, *The Jaina Path of Purification*, Berkeley, 1979

Winston L. King, *Buddhist Meditation*, Philadelphia, 1980

Klaus K. Klostermaier, *A Survey of Hinduism*, Albany, NY, 1994

Julia Leslie, *Roles and Rituals for Hindu Women*, London, 1997

Wendy Doniger O' Flaherty, ed., *Karma and Rebirth in Classical Indian Traditions*, Berkeley, 1980

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aught*, New York, 1962

Ninian Smart, *Doctrine and Argument in Indian Philosophy*, London, 1964

John S. Strong, *The Experience of Buddhism: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Belmont, CA, 1995

Giuseppe Tucci, *The Religions of Tibet*, Berkeley, 1980

Steven Vertovec, *Hindu Trinidad*, London, 1992

Benjamin Walker, *Hindu World*, 2 vols., London, 1968

A.K. Warder, *Indian Buddhism*, Delhi, 1970

Heinrich Zimmer, *Myths and Symbols in Indian Art and Civilization*, Princeton, 1972

China and Korea

D. Bodde, *Festivals in Classical China*, Princeton, 1975

Julia Ching, *Chinese Religions*, New York, 1993

Kenneth Ch'en, *Buddhism in China*, Princeton, 1973

F. H. Cook, *Hua-yen Buddhism*, Philadelphia, 1977

Theodore de Bary and JaHyun Kim Maboush, eds.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in Korea*, New York, 1985

Daniel K. Gardner, *Chu Hsi and the Ta Hsueh*, Cambridge, MA, 1986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 edn., New York, 1969

D. Howard Smith, *Confucius*, New York, 1973

L.C. Thompson, *Chinese Religion: An Interpretation*, 4th edn., Encino, Ca., 1989

Holmes Welc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New York, 1967

Holmes Welch and Anna Siedel, eds.,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New Haven, 1979

Fe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vols., Princeton, 1952–3

Japan

Carmen Blacker, *The Catalpa Bow: A Study of Shamanistic Practices in Japan*, London, 1975

H. Dumoulin, *History of Zen Buddhism*, New York, 1965

H. Byron Earhart, *Japanese Religion*, 3rd edn., Belmont, Ca., 1982

Joseph M. Kitagawa, *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1990

S. Murakami, *Japanese Religion in the Modern Century*, Tokyo, 1980

D. T. Suzuki, *Shin Buddhism*, New York, 1970

South East Asia

Georges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Canberra, 1968

Clifford Geertz, *The Religion of Java*, Glencoe, Ill, 1960

Melford E. Spiro, *Burmese Supernaturalism*, 2nd edn., Philadelphia, 1978

Donald Swearer, *The Buddhist World of Southeast Asia*, Albany, NY, 1995

Keith W.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1983

Oceania and Australasia

Mircea Eliade, *Australian Religions: An Introduction*, Ithaca, New York, 1973

Peter Lawrence and M. J. Meggitt, eds., *Gods, Ghosts and Men in Melanesia*, Melbourne, 1965

Albert C. Moore, *Arts in the Religions of the Pacific, London*, 1997

Roslyn Poignant, *Oceanic Mythology: Myths of Polynesia, Micronesia, Melanesia, Australia*, London, 1967

Jean Smith, *Tapu Removal in Maori Religion*, Wellington, 1976

Indigenous American Religions

Walter H. Capps, ed., *Seeing with a Native Eye*, New York, 1976

Michael Coe, Dean Snow and Elizabeth Benson, *Atlas of Ancient America*, New York and Oxford, 1989

Ake Hultkrantz, *The Religion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Berkeley, 1979

Walter Krickeberg, et al, *Pre-Columbian American Religions*, New York, 1968

J. H. Steware, ed., *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 vol. 1, Washington, D. C., 1949

Ancient Near East

W. F.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Baltimore, 1958

J. Gray, *Near Eastern Mythology*, London, 1969

S. N. Kramer,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New York, 1963

S. Morena, *Egyptian Religion*, New York, 1973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and Boston, 1984

Mircea Eliade, *Shamanism*, Princeton, 1965

John R. Hinnells, *Persian Mythology*, New York, 1971

John R. Hinnells, *Zoroastrianism and the Parsees*, London, 1981

Geo Widengren, *Mani and Manicheism*, New York, 1965

R. C. Zaehner, *The Dawn and Twilight of Zoroastrianism*, New York, 1961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Northern Europe

Peter Brown, *The Making of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Mass., 1979
Hilda Davidson, *Gods and Myths of Northern Europe*, Baltimore, 1964
E. R. Dodd, *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New York, 1970
G. S. Kirk, *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New York, 1975
M. P. Nilsson, *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New York, 1964
A. D. Nock, *Conversion*, New York, 1961
A. and B. Ress, *Celtic Heritage*, London, 1975
H. J. Rose, *Ancient Roman Religion*, New York, 1948
Kyrosslava T. Znayenko, *The Gods of the Ancient Slaves*, Columbus, Ohio, 1980

Judaism

Joseph Blau, *Modern Varieties of Judaism*, New York, 1966
Richard Hecht and Roger Friedland, *To Rule Jerusalem*, Cambridge, 1995
Louis Jacobs, *The Jewish Religion: A Companion*, Oxford, 1995
E. Kedourie, ed., *The Jewish World*, New York, 1979
Nicolas de Lange, *Judaism*, Oxford, 1987
C. G. Monterfiore and H. Loewe, eds., *A Rabbinic Anthology*, new edn., New York, 1974
J. Neusner, *Early Rabbinic Judaism*, Leiden, 1975
H. Rabinowicz, *The World of Hasidism*, Hartford, Conn., 1970
D. Rudavsky, *Modern Jewish Religious Movements*, 3rd edn., New York, 1979
G. G. Sholem,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 New York, 1961
Juliet Steyn, *The Jew: Assumptions of Identity*, London, 1998
Alan Unterman, *Jew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oston, 1981
J. Weingreen, *From Bible to Mishna*, New York, 1976

Christianity

Catherine Albanese, *America: Religion and Religions*, Belmont, Ca., 1981
A. S. Atiya, *A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70
D. B. Barrett, ed.,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Nairobi, 1982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1967
Owen Chadwick, *The Popes and Europe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1
C. H. Dodd, *The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70
Enrique Dussel, ed., *The Church in Latin America, 1492 – 1992*, Maryknoll, NY, 1992
R. S. Ellwood,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Groups in Modern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1973
W. H. C. Frend, *The Early Church*, Philadelphia, 1966

Judith Herrin, *The Formation of Christendom*, Princeton, 1987

W. J. Hollenberger, *The Pentecostals*, London, 1972

Paul Johnson,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1976

J. N. D. Kelly, *Early Church Doctrines*, New York, 1978

C. Lane *Christian Religion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79

John McManners,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xford, 1992

Y. Meyendorff, *Byzantine Theology*, 2nd edn., 1978

Marta Sordi, *Christians and the Roman Empire*, Norman, OK, and London, 1994

Timothy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Baltimore, 1980

Islam

Clinton Bennett, *Muhammad: An Interpretative Study*, London, 1988

Clifford Geertz, *Islam Observed*, New Haven, Conn., 1968

Ernest Gollner, *Muslim Society*, Cambridge, 1981

S. Hussain M. Jagri,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hi' a Islam*, London, 1979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63

Richard C. Martin, *Isla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Englewood Cliffs, N. J., 1982

Marmaduke M. Pickthall, *The Meaning of the Glorious Koran*, New York, 1930

Fazlur Rahman, *Islam*, 2nd edn., Chicago, 1979

Anne-Marie Schimmel, *Mystical Dimensions of Islam*, Chapel Hill, N. C., 1975

Wilfred C. Smith,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Princeton, 1957

H. Montgomery Watt, *Muhammad: Prophet and Statesman*, London, 1974

David W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Cambridge, 1975

African Religions

Roger Bastide, *The African Religions of Brazil*, Baltimore, 1978

David Chidester, *Religions of South Africa*, London, 1992

Adrian Hastings, *A History of African Christianity*, 1950 – 1975, New York, 1979

Irving Hexham and Karla Poewe, *New Religions as Global Cultures*, Boulder, CO, 1997

Elizabeth Isichei,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Grand Rapids, MI, 1995

J. S. Mbiti, *Concepts of God in Africa*, New York, 1970

Thomas Pakenham,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London, 1991

E. G. Parrinder,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 3rd edn., London, 1979

Benjamin C. Ray, *African Religions*, New York, 1976

H. W. Turner, *Religious Innovations in Africa*, Boston, 1980

E. M. Zuesse, *Ritual Cosmos: The*

Sanctification of Life in African Religions, Athens, Ohio, 1979

Secular Worldviews

Frederick Coplest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VIII, London, 1966

Leszcek Kolo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1978–1981

John Macquarrie, *Twentieth Century Religious Thought*, 2nd edn., New York, 1981

David Martin, *A General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 San Francisco, 1979

Peter Merkl and Ninian Smart,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84

David Roberts, *Existentialism and Religious Belief*, N.Y., 1960

T.L.S.Sprigge, *Theories of Existence*, Harmondsworth, 1985

索 引

（英汉对照各条后的数字为英文原书页码，即中译本的边码）

Aaron 亚伦 211

Abbas, Shah 阿拔斯一世 495

Abbasid dynasty 阿拔斯王朝 285, 296

'Abduh, Muhammad 阿卜杜，穆罕默德 487

Abhayagiri, Sri Lanka 无畏山寺，斯里兰卡 76

Abhinavagupta 阿毗那伐笈多 99

Aborigines, Australian 土著居民，澳大利亚 66, 167, 177 – 180, 180, 512 – 514

Abraham 亚伯拉罕 209, 210, 295

Abu Bakr 阿布·伯克尔 295, 296

Abulafia, Avraham 阿布拉斐亚 271

Achaemenids, the 阿赫门尼德家族 218, 221, 224

Achilles 阿喀琉斯 234

Adam's Peak, Sri Lanka 亚当峰，斯里兰卡 78, *79*

Adapa 阿达帕 200

Adi Granth《阿底·格兰特》 100, 101, 401, 402, 403

Adonis 阿多尼斯 209, 232

adur 阿多尔 219

Advaita Vedānta 吠檀多不二论／不二论吠檀多 82, 89, 90, 97, 409, 412, 426

Adventists *see* Seventh-Day Adventists 基督复临派 参见：基督复临安息日派

Afghanistan 阿富汗 500, 533

Africa 非洲 32, 307 – 322, 360, 580

Islam 伊斯兰教 28, 307, 494 – 495, 505, 544 – 545

slave trade 奴隶贸易 536 – 537

Christianity among Black Africans 黑人中的基督教 541 – 544, 546

new movements 新运动 546 – 554, 580

see also: Nigeria; South Africa; Yoruba; Zulu 参见：尼日利亚；南非；约鲁巴人；祖鲁人

African –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 308, 373 – 374, 387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非洲卫理圣公会 373, 587

Afrikaners 南非白人、布尔人 538

āgamas 阿含 97

Agni 阿耆尼 55, 56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 359

ahimsā 戒杀、不杀生、非暴力 *68*, *69*, *70*, *70*, 417

Ahmad, Mirza Ghulam 阿赫迈德,米尔扎·古拉姆 505
Ahmadiya movement 阿赫迈底亚运动 505 - 507
Ahriman 阿赫里曼 219, 224, 225
Ahura Mazdā 阿胡拉·马兹达 219, 220, 221 - 222, 224, 226
Ainus, the 阿伊努人 134
ajiva 非命、非灵魂 69
ājīvikas 生活派、邪命外道 62, 67, 71 - 72
Akali Dal 阿卡利·达尔 428
Akan, kingdom of 阿肯的王国 307
Akbar, Mughal emperor 阿克巴,莫卧尔皇帝 48, 97, 304
akh 阿赫 205
Akhenaten, Pharaoh 埃赫纳吞、法老 203
Akiba, Rabbi 阿吉巴拉比 253
Akkad/Akkadians 阿卡德 / 阿卡德人 199, 200
Aksobhya Buddha 阿闳佛 93, 93
al - Ash'ari 艾什尔里 297, 305
Aladura movement 阿拉杜拉运动 549 - 550
al - Afghani, Jamal al - Din 阿富汗尼,加马尔丁 487
Alawi, the 阿拉维派 302, 491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489, 522 - 523, 533
al - Banna, Hasan 班纳,哈桑 489 - 490
Albigensian heresy 阿比尔派异端 278, 281
Al - Darazi 达拉兹 302
Alexander II, Tsar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348*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68, 75, 199, 218, 230, 237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488, *494*, 495
Al - Hakim 哈齐姆 302
Al - Hallaj 哈拉智 298
'Ali 阿里 *292*, 295, 296, 300
Ali, Rahmat 阿里,拉赫马特 419, 20
Allah 真主安拉 105
Allen, Richard 艾伦,理查德 373
All - India Muslim League 泛印度穆斯林联盟 412, *421*
al - Muntazar 蒙塔扎尔 300
al - Qadir, Abd 阿卜德·卡迪尔 500
Altamira, Spain: cave paintings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37
Altizer, T. J. J. 阿尔提泽,T. J. J 392
ālvār poets 阿尔瓦尔派诗人 97
amadlozi 阿马德罗兹 321, 322
Amaterasu 天照大神 *136*, 137, 476, 479, 482, *575*
shrine (Ise) 伊势天照大神殿 140, 151
Amazon Basin 亚马逊盆地 181, 184, 569
Ambedkar, Dr B. R.. 安培德卡尔,B.R.博士 421
Ambrose, St. 圣安布罗斯 264
America, North: 北美:
Native Americans 土著美洲人

11, 28, 191 - 196, 229, 365, 366, 368, 375, 389, 390, 396, 580
early colonies 早期殖民地时代 366 – 368
18th century 18 世纪 368 – 370
19th century 19 世纪 370 – 372, 376 – 378
Catholicism 天主教 370, 372 – 373, 396
Black religions 黑人宗教 373 – 374, 386, 388 – 390, 396
Islam 伊斯兰教 386
Jews and Judaism 犹太人与犹太教 349, 350, 365, 375 – 376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义 378 – 379, 383, 384, 395
evangelicalism 福音派 378, 379 – 380, 383 - 385
1960s and 1970s 20 世纪 60 与 70 年代 386 – 391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391 - 393, 395
America, South 南美 181, 184
map 地图 *182*
Spanish conquest; 西班牙人的征服 555 – 556, 559 – 560
racial patterns 种族的模式 562 – 563
liberation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和解放神学 563 – 566, 569 – 571
Black religion 黑人宗教 568
see also: Aztec civilization; Incas
参见:阿兹达克文明;印加文明
American Muslim Mission 美国穆斯林传道会 389 – 390
Amesha Spentas 七位圣仙 219, 223
Amida Buddha 阿弥陀佛 142 – 144, *143*, 145, 151
Amitābha Buddha 阿弥陀佛 81, 86, 93
Amoghasiddhi Buddha 不空成就佛 93
Amon 阿门 203
Amos, Prophet 先知阿摩斯 214
amrit 甘露 100, 401
Amritsar, India 阿姆利则,印度 101,419
Golden Temple 金庙 101, 398, 402, 428
Amun 阿蒙神 203
An 安 199
Anabaptists 再洗礼派 334 – 335
Anāhitā 阿娜希塔 223
Analects (Confucius)《论语》(孔子) 107, 112, 130
Ananta 阿南塔 85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353
Anat 阿纳忒 205, 206, 209
anattā (nonself) 无我、非我 80
Anawrahta, King of Burma 阿律奴陀,缅甸国王 160
Anaxagoras 阿那克萨哥拉 236
Anaximander 阿那克西曼德 236
ancestors 祖先、起源 109, *111*, *150*, 175, 184, 313, *317*, 318, 321 – 322, 546

Andrews, C. F 安德鲁斯,C. F. 417
anekāntavāda 非一端说、非极端说 69
Angas 安迦 69
Angkor, Cambodia 吴哥,柬埔寨 158, 165
Angkor Thom 大吴哥 158
Angkor Wat 吴哥窟 157, 158
Anglican Church 英国圣公会、安立甘宗、英国国教 335, 336, 341, 342, 342, 343, 356, 370, 508
women priests 女牧师 381, 387
Anglo - Catholicism 英国国教高教会派 336, 574, 581
Angra Mainyu 安格拉·曼纽 219, 220, 222, *222*, 224
animism 万物有灵论 35, 41
Anthony of Egypt, St. 埃及的圣安东尼 261
anthropology 人类学 35
Antwerp: Jesuit church 安特韦普:耶稣教会 *340*
Anu 安努 200
Anubis 阿努比斯 204
Anulap 阿努拉普 177
Anuradhapura, Sri Lanka 阿努拉达普拉(斯里兰卡古代城市) 51, 76, 80, 425
Apache, the 阿帕切人 191
apartheid 种族隔离 538, 552, 573
Aphrodite 阿芙洛狄忒 209, 232 - 233
Apollo 阿波罗 2, 233
apsaras 阿布沙罗斯 158
Apuleius: *The Golden Ass* 阿普列乌斯:《金驴》 241
Aqiba, Rabbi 阿齐巴拉比 271
Aquinas, St. Thomas 阿奎那,圣托马斯 270, 279 - 280, 302, 340, 585
'Ararat, Mount 阿拉法特山 295
araññika 林栖和尚 77
āranyakas 森林书 73
Arawaks 阿拉瓦克人 184, 185
arca 偶像、画像(印度教) 87
Argentina 阿根廷 562, 565, 570
arhant 阿罗汉、罗汉 81
Arianism 阿里乌主义 262
Ariège, France: cave paintings 法国阿里埃日的洞穴壁画 *34*, 38, 38
Arielism 阿利耶主义 563
Aristotle/Aristotelianism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主义 231, 234, 237, 270, 279, 280, 302, 303
Arius/Arianism 阿里乌/阿里乌主义 *258*, 259, 261
Arjun, Guru 阿尔詹,古鲁 101
Arjuna 阿周那 14, *85*, 88
Ark of the Covenant 约柜 213, 217, 274
Armenia 亚美尼亚 267, 529, 533
Artaxerxes II, King 阿塔薛西斯二世,波斯王 223
Artemis 阿尔特弥斯 2
artha 利 90
Arya Samāj 雅利安社、圣社 407 - 408, 432

Aryans 雅利安人 52, 53, 54, 55, 87, 60, 72, 220
Asanga 无著 85
asceticism 禁欲主义,苦行 53
Asclepius 阿斯克勒庇俄斯 234
Ashanti, the 阿散蒂人 315
mask 面具 *311*
Ashikaga period, Japan 日本足利时代 134, 149, 150
ashrams 道院、书院、静修林(印度教) 410
Aśoka, Mauryan emperor 阿育王,孔雀王朝国王 45, 72, 75 - 76, 78, 160, 458
assassins 阿萨辛 302
Assmann, Hugo 阿斯曼,雨果 565
Assur 阿淑尔 *199*
Assyrians 亚述人 197, 199, 199, 200, 215, 217
Astarte 阿斯塔忒 200, 209, 209, 230, 232
atar 阿塔尔 219
Atatürk see Kemal Atatürk 阿塔图克,参见:凯末尔·阿塔图克
Athanasius, St. 圣阿塔那修 261, 265, 278
Atharva Veda 阿闼婆吠陀 54
atheism 无神论 35
Soviet 苏维埃 529 - 532
Athens, Greece 雅典,希腊 233
Acropolis 雅典卫城 206
Athirat 阿提拉忒 205
Athos, Mount 阿索斯圣山 *275*, 276, 277, *277*
Atīsa 阿底峡 94
ātman 阿特曼,灵魂,我 49, 74, 87
Atua 阿图阿 168
Augsburg, Peace of (1555) 奥格斯堡和约(1555) 332
Augustine, St. (354 - 430) 圣奥古斯丁(354 - 430) 227, 256, 264, 265, 266, 278, 280, 336
Augustine, St. (6th - 7th c.) 圣奥古斯丁(约公元6—7世纪)268
Augustus, Emperor 奥古斯都皇帝 240
Aurelius, Marcus: *Meditations* 奥勒留,马可:《沉思录》 238
Aurobindo see Ghose, Aurobindo 奥罗宾多,参见:奥罗宾多·高士
Aurungzeb, Mughal emperor 奥朗则布,莫卧儿皇帝 20, 304, 305
Austin, John 奥斯丁,约翰 36
Austral Islands: Tangaroa 南方群岛:坦伽罗伊 17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510 - 511
see also: Aborigines 参见:土著居民
Avalokiteivara 观世音,观自在 *67*, 81, *93*, 94, *127*, 128, 137
see also: Kannon; Kuan - yin 参见:观音
avatar 化身 48
Avatāra 化身 87
Averroes see Ibn Rushd 阿威罗伊,参见:伊本·路西德
Avesta《阿维斯塔》 221, 223
Aztec civilization 阿兹特克文明

181、182、186、188、91，555、560
Azusa Street revival 阿佐萨街复兴运动 384

ba 巴 205
Baal 巴力 205 – 206，*206*，209
Ba'al Shem Tov 巴阿勒·舍姆·托夫 348
Baalbek，Lebanon：Temple of Bacchus 巴贝克，黎巴嫩的巴库斯神庙 *206*
Ba'ath 复兴党 489，497
Babis，the 巴布派 497
Babur 巴布尔 304
Babylon/Babylonians 巴比伦／巴比伦人 197，199，200，201，212，213，215，216，217，224、269
Baghdad 巴格达 303，500
Baha'i 巴哈伊，巴哈伊信仰 497 – 498
Balder 巴尔德 283 – 284
bali，Indonesia 巴厘岛，印度尼西亚 164
Bangladesh 孟加拉 43，45，286，397、420，499，579
Bantu，the 班图人 543 – 344
Baptists 浸礼宗 334，335，357，366，368 – 369，371，373，376，379，525，567
baraka 圣人具有的神秘的力量 298
Bar – Kochba，Shimon 巴尔—科赫巴，西蒙 253
Barlaam 巴拉姆 276
Barmen Declaration（1934）巴门宣言（1934 年） 361
Barth，Karl 巴特，卡尔 361
Church Dogmatics《教会教义学》 361
Bāsava 巴萨瓦 98
Baur，Ferdinand 鲍尔，费迪南德 354
Becket，Thomas 伯克特，托马斯 *280*
Belize 伯利兹 185 – 186，566
Belobog 贝洛博格 284
Belorussia 白俄罗斯 393，528、533
Bema festival 呗摩祭庆 227
Benares 贝拿勒斯 *20*，21、53，57，57，60，82，102，414
Benedict，St．圣本笃，圣本尼迪克特 278
Bengal 伯利兹 406，500
Benin，kingdom of 贝宁王国 307，317，*317*
Oba 奥巴 *316*
Bentham，Jeremy 边沁，杰里米 405
Bergson，Henri 柏格森，亨利 422，472
Bernard of Clairvaux，St 明谷的圣伯纳德，圣伯尔纳 278，279，281
Bernnini，Gianlorenzo：*The Ecstasy of St Teresa* 贝尔尼尼：《圣特雷莎的出神》 *326*
Berrigan，Daniel 贝林格，丹尼尔 392
Besant，Annie 贝桑特，安妮 416，423
Besht see Ba'al ShemTov 贝什特，参

见：巴阿勒·舍姆·托夫
Bhagavadgitā《薄伽梵歌》 14, 75, 88–89, 97
bhakti 虔信 46, 48, 75, 87, 89, 414
movements 虔信派运动 88, 98, 100, 101, 104, 432
Bhindranwale, Jarnail Singh 宾德兰瓦尔,加纳尔·辛格 428
Bhuton 不丹 43
Bible;《圣经》 353, 354, 355, 356
see New Testament; Old Testament 参见:《旧约全书》,《新约全书》
Big Bang theory 大爆炸理论 585
B.J.P. (Bharatiya Janata Party) 印度人民党(联盟) 579
bKa' – gdams – pa order 噶当派 94
bKa' – rgyud – pa order 噶举派 94
Black Elk 布莱克·艾尔科 389
Black Islam 黑人伊斯兰教 388–390
Black Power 黑人权力运动 386, 393
Black religions 黑人宗教 365, 373–374, 379, 386, 387, 388–390, 396, 568–569
see also: Africa 参见:非洲
Blavatsky, Madame H.P. 布拉瓦茨基夫人 422
Bodh – Gaya 菩提伽耶 21, 60, 99
Bodhi Tree 菩提树 47, *48*
Bodhidharma 菩提达摩 126
Bodhisattvas 菩提萨埵,菩萨 58, 81, 85,
see also: Avalokiteśvara 参见:观世音菩萨
body-painting 文身 *173*, 177, 316
Boehme, Jakob 伯麦,雅科布 341
Boers 布尔人 537, 538
Boff, Leonardo 博夫,勒沃纳多 565
Bön religion 苯教 94–95, 463
Bonhoeffer, Dietrich 朋霍费尔(或潘霍华),迪特里希 362
Boniface, St. 圣卜尼法斯 268
Boniface VIII, Pope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 *266*
Bonino, José Miguel 博尼诺 565
Book of Changes see Ijing《变化之书》参见:易经
Book of the Dead (*Book of Going Forth by Day*)《亡灵书》 203–204
Borneo; 婆罗洲 159, 164
see also: Brunei 参见:文莱
Borobodur, Java 婆罗浮屠,爪哇 *152*, 157, 159, 165
Borodin, Michael 鲍罗廷,米哈伊尔 442
bosatsu 菩萨 137
Brahmā 梵天 48, 67, 85
Brahman (*brahman*) 梵 49, 53, 73, 74, 87, 406
Brāhmanas 梵书 73, 407
Brahmanism 婆罗门教 72–75
see Brahmins 参见:婆罗门
Brahmasūtra《梵经》 89, 97
Brahmins 婆罗门 *16*, 45, 46–47, 49, 50, 534, 56, 57, 63, 67, 68,

72, 73, 74, 82, 87, 98, 102, 104, 157, 164, 414
Brahmo Samāj 梵社 406, 407
Brauron, Greece: relief 希腊布劳隆的浮雕 2
Brazil 巴西 181, 308, 536, 537, *541*, 556, 562, 563, 564, 565, 568
Brigid of Kildare, St. 圣布丽古德 283
Brown, Joseph Epes: *The Sacred Pipe* 布朗,约瑟夫:《神圣的魔笛》 389
Brunei 文莱 155, *500*
Bruno, Giordano 布鲁诺 330, 331
Bryan, William Jennings 威廉·布赖恩 380
Buddha 佛陀,浮屠佛 14, 16, 17, *17*, 45, 47, *48*, *48*, 51, 53, 57 – 58, 59 – 62, 64, 64, 68, 72, 79, 81, *116*, 236
see Buddhism 参见:佛教
Buddhism 佛教 11, 17, 18, 28, 62 – 64, 67 – 68
key terms 关键述语 58
In China 在中国 59, 76, 106, 108, 124 – 128, 130, 131, 441, 443, 447 – 448
In India 在印度 43, 45, 49, 50, 57, 72, 81 – 86, 91, 421, 424, 429
In Indonesia 在印度尼西亚 159
In Japan 在日本 134, 135, 136, 138 – 147
In Korea 在韩国 132 – 133, 449 – 450, 453, 454
In Laos 在老挝 161
In Nepal 在尼泊尔 429 – 430
In Sri Lanka 在斯里兰卡 13, 43, 45, 59, 60, *64*, 76 – 81, 160, 162, 422 – 423, 424, 424 – 425
In Thailand 在泰国 155, 160 – 161, 456, 457 – 459, 465, 466
In Tibet 在西藏 91 – 95, 116, 432
In Vietnam 在越南 163, 462 – 465
see also: Theravāda Buddhism; Zen Buddhism 参见:小乘佛教;禅佛教
Bukhara 布哈拉 304, 500
Bulgaria 保加利亚 522, 526, 533
Bundahishn《波斯创世记》 219
Burma 缅甸 80, 155, *155*, 159, 160, 162, 164, 455, 456, 459 – 460, 466, 500, 580
Buryats, the 布里亚特人 529
Bushmen 布须曼人 *309*
Butsudan 佛龛 137, 150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261, 274 – 275, 276

Caesar, Julius 凯撒 240, 282
Cairo, Egypt 开罗,埃及 296
al – Azhar university 艾资哈尔大学 301, 487
Caitanya 多尼耶 99
California, USA 加利福尼亚,美国 562, 578
calumet 卡柳梅特 168

Calvin, John 加尔文,约翰 332、333, *333*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21、333－334、335、336、341、343、538

Cambodia (Kampuchea) 柬埔寨 155、160, 161、455、456, 459、460－462、65、572－573
see also: Angkor 参见:吴哥

Canaanites 迦南人 197, 205－206, 217

Canada 加拿大 192, 366, 370, 373、395

Canterbury, England 坎特伯雷,英格兰 268, 280, *280*

Cao Dai 高台教 462－464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345－346, 356, 358, 376, 386, 395, 405、439、460、465

cargo cults, Melanesian 货物崇拜,美拉尼西亚 514、*515*、516－517

Caribbean 加勒比地区 181, 184－185、308, 449, 536, 546, 556, 562, 563, 566－567

Caribs 加勒比人 184, 185

Caroline Islands 加洛林群岛 177

Carter, President Jimmy 卡特,杰米,总统 383

Carthage 迦太基 197, 199, 209, 230, 240, 258

Cassian, St. John 卡西安,圣约翰 261

caste 种姓 46－47, 50, 87, 91, 95、98、105、413

Castro, Fidel 卡斯特罗,菲德尔 567

catacombs, Roman (罗马)基督徒地下墓地 *244*、*248*

Catherine of Siena, St. 锡耶那的圣凯瑟琳 281

Catherine the Great 叶卡捷琳娜大帝 352

Catholic Action movement 天主教行动运动 564

Catholicism, Roman: 罗马天主教
and Reformation 与宗教改革 331－332、335－336, 340－343
Counter－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335－336, 344－345, 555
Vatican Councils 梵蒂冈公会议 356－357, 363
and Leo XIII 与利奥八世 359
in America 天主教在美洲 365, 370, 372, 392, 396, 511
and liberalism 与自由主义 392
see also: Christianity, early; Jesuits; missionaries 参见:早期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

cave paintings 洞穴壁画 *32*、*34*、34－35, 37, *37*, 38, 41

Ceausescu, Nicolae 齐奥塞斯库,尼古拉 525

Celtic religion 凯尔特宗教 267－268、282－283

Ceres 刻瑞斯 238

Ceylon see Sri Lanka 锡兰,参见:斯里兰卡

chacmools 查克摩尔 *187*

Ghampa, kingdom of 甘蒲王国 156, 158

Ch'ān (Qān) Buddhism 禅佛教 110
see Zen Buddhism *参见*：禅佛教
Chang Lu (Zhanglu) 张鲁 122
ChangTao Ling 张道陵 108
Channing, William Ellery 钱宁,威廉·艾勒利 371
Chardin, Pierre Teilhard de 德日进,泰亚尔·德·夏尔丹 422
Chariot mysticism 马车的神秘主义 271
Charlemagne, Holy Roman Emperor 查理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 262, 263
Chaucer, Geoffrey: Canterbury Tales 乔叟,杰弗里:《坎特伯雷故事集》 *280*
Chavin culture 查文文化 182, 184
Chechnya 车臣 533
ch'i (*qi*) 气 109, 129
Chi Rho Christ 的标记,希腊词 Christos 开头的两个字母,或作 XP *253*
Chiang Ch'ing 江青 448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443, 444
Chichén Itzá, Mexico 奇琴伊察,墨西哥 186, 187
Chih-i (Zhii) 智顗 125
Children of God movement 上帝之子运动 386
Chile 智利 562, 565, 570
Chimú empire 奇穆帝国 182
chin 秦 114
China 中国 106-112, 130-132, 435-441、579
key terms 关键术语 109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41-443
under Mao 毛治下 443-448
diaspora 港台及海外华人 449
and Tibet 和西藏 428-429
see Buddhism; Confucianism; Daoism; Legalism; Marxism; Neo-Confucianism *参见*：佛教,儒教,道教,法家,马克思主义,新儒家
ching 经 109
Chinul 知讷 133
Chintvat Bridge 钦瓦特桥,离渡桥 219, 223, 336
Chin-yen 智俨 132
Ch'oe Suun 崔济愚 453
Chogye school 曹溪宗 133
Ch'ondogyo 天道教 453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2,13,17,19
early; 早期基督教 230, 242, 245, 246-248, 253, 254, 255-256, 257-261
key terms 关键术语 259
and East-West split 和东西方大分裂 261-263, 265-267
medieval 中世纪 274-282
18th-19th century 18 至 19 世纪 353-356
20th-century 20 世纪 363-364
see Catholicism, Roman;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Protestantism; Reformation *参见*：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宗教改革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教科学派 365, 372, 377-378

Chu Hsi (Zhuxi) 朱熹 129 – 130
Chulalongkorn 朱拉隆功 457, 458
Ch'un – ch'iu《春秋》 112
Cîteaux, France: monastery 西多,法兰西隐修院 278
Clovis, King of the Franks 克洛维,法兰克国王 262
Cluny, France: monastery 克吕尼,法国修道院 *251*, 278
Coatlicue 科亚特利库埃 188, 191
Coffin, William Sloane 考奋,威廉·斯洛恩 392
Colombia 哥伦比亚 562
Columba, St. 圣科伦巴 268
communion service, Christian 基督教的圣餐仪式 17, 259
Communism 共产主义 358, 430, 428 – 429, 437, 526 – 527
see also: Marxism *参见*:马克思主义
Confucianism 儒教 106, 107, 113, 114, 115 – 116, 119, 120, 121, 124, 163, 366
see also: Neo – Confucianism *参见*:新儒家
Confucius (Kong) 孔子(孔) 108, 111, 112 – 114, *113*, 116, 119
Analects《论语》 107, 112, 130
Congo, Democratic (Zaire) 民主刚果(扎伊尔) 307, 310, 320, 321, 360, 546, 547, 551
Congregationalists 公理会 367 – 368, 371
Constantine, Emperor 君士坦丁大帝 *246*, 246 – 247, 256, 258, *258*, 269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261, 274 – 275, 276, 278, 281
Hagia Sophia 索菲亚大教堂 263
Constantinople, Council of (381) 君士坦丁堡会议(381 年) 267
conversion 皈依 14
Cook, Captain James 库克,詹姆斯,船长 508
Coptic Church 科普特教会 267, *267*, 307, 546
Córdoba, Spain 科尔多瓦,西班牙 302, 303
corroboree 狂欢 168
Cortés, Hernán 科尔特斯 191
Cosmos 宇宙 231
Counterculture 反文化运动 386
Counter –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329, 344 – 345, 555, 571
Cox, Harvey: *The Secular City* 考克斯,哈维:《世俗之城》 392
Creation stories 创世故事 15, 41, 179, 201, 581 – 582
Creed, the 信经 262
Croatia 克罗地亚 268, 335, 533
Cromer, Lord 克罗默伯爵 491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 343
Croton, Italy 克罗托内,意大利 236
Crowther, Samuel Ajayi 克劳瑟,萨缪尔·阿加伊 541
Crusades, the 十字军 *253*, 271, 275 – 276, 279, 280 – 281
Crystal Cathedral, Anaheim, US 阿纳

海姆天主教水晶教堂,美国 383
Cuba 古巴 535, 562, 563, 567, 571
Cuzco, Peru 库斯科,秘鲁 182, 183
Cybele 西布莉 *209*, 230
Cyril, St. 圣西里尔 267, 268 - 269
Cyrus the Great, King of Persia 居鲁士大帝,波斯王 216, 218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526, 533

Dafni, Greece: Church of the Virgin (希腊)达夫尼:童贞女大教堂 *249*
Daimoku see Lotus Sūtra 题目,参见:《妙法莲华经》
Dainihonshi《大日本史》 469
Dakar, Senegal: mosque 达喀尔,塞内加尔:清真寺 *506*
dakhmas 寂没塔 226, 427
Dalai Lamas 达赖喇嘛 94, 429, *429*, 432
Daly, Mary: *Beyond God the Father* 戴利,玛丽:《超越父神》 387
Dao 道,道路,真理 109, 110, 119, 131
Daode Jing (*Tao - te Ching*)《道德经》 107, 116, 119
Daoism (Taoism): 道教:
in China 在中国 106, 107 - 108, 111, 115, *115*, 116, 119 - 120, 121 - 124, 128, 131, 132, 441, 443
in Vietnam 在越南 163, 463
Darwin, Charles: Evolutionary Theory 达尔文,查尔斯:进化论理论 353, *354*, 354 - 355, 356, 383
Dasgupta, Surendranath 达斯古普塔,苏伦德拉纳斯 525
Dasyus 达斯优斯 54
Datta, Narendranath 达特,纳伦拉那特 410
David, King 大卫,以色列王 212
Davids, T. W. Rhys 戴维斯,T. W. 里斯 423
Dayal, Shiv 达耶尔,希瓦 403
deism 自然神论 350
Delaware Indians 特拉华印第安人 366
Delphi, Greece 德尔斐,希腊 233
Demeter 得墨忒耳 234, *235*
Democritus 德谟克利特 238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579
Dengyo Daishi *see* Saichō 参见:最澄
determinism 宿命论,决定论 62
Deutero - Isaiah《以赛亚次书》 214, 215
Devīmahātmyam 戴维玛诃特摩耶 89
Dge - lugs - pa order 格鲁派,黄教 94
Dhammaceti, King of Burma 达摩悉提,缅甸国王 160
Dhammayuttika Nikāya 法相应派 457, 459
dharma (*dhamma*) 达摩、法则 55, 75, 76, 81, 87, 90
Dharmapāla, Anagarika 达摩波罗

424
dhyāna 禅,禅那 48, 58, 63
"Diamond Vehicle" 金刚乘
see: Vajrayāna, *参见*:金刚乘
The diasporas: 流亡者、散居者
Chinese 海外华人 449
Jewish 犹太流亡者、散居者 27, 243
Modern 近现代散居者 586 - 588
Diderot, Denis 狄德罗,丹尼斯 345
Digambara 天衣派、空衣派 69
Dinka, the 丁卡人 *313*, 319
Dion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迪翁 237
Dionysianism 狄奥尼索斯主义 234, 235 - 236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大法官狄奥尼修斯 280
Dionysos 狄奥尼索斯 233, 235
dispensationalism 神授 379
divination 占卜 110, 315
Djangawwul 丹伽乌尔 179
doctrine 教义 17
Dogen (monk) 道元 147 - 148, 152
Dogon, the: masked dancers 多贡人:带面具的舞者 *313*
Doha, Qatar: Grand Mosque 多哈大清真寺,卡塔尔 *502*
Dominic, St. 圣多明我 278
Dominicans 多明我会或译多米尼克会、道明会 278, 279, 281, 435, 559
Dong Zhongshi (Tung Chung - shi) 董仲舒 121
Doré, Gustave: "Scripture Reader in a Night Refuge" 多雷:"晚间避难所的读经人" *355*
Dostoyevsky, Fyodor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多尔 353, 535, 591
Dravidians 达罗毗荼人 43, 52, 53
Dreaming, the (Dream Time) 梦,(梦幻时代) 178, 179, 180, 513
Dreyfus, Alfred 德莱弗斯,阿尔弗雷德 350 - 351, *351*
drugs mind-altering 改变思想的药物 386, 390
see also: hallucinogens *参见*:"致幻药"
Druids 德鲁伊特 282
Druze, the 德鲁兹派 302
dukkha 苦 62
Dúrgā 杜尔迦女神,难近母女神 48, 89
Dyer, General 419

Ea 伊亚 200, *202*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404, 406, 435
Easter Island 复活节岛 166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 12, 13, 14, 21, 261 - 263, 265 - 266, 261, 262 - 263, 265 - 266, 268 - 269, 276, 335, 352 - 353, 365, 387, 390 - 391, 526, 528
Eckhart, Johannes 爱克哈特,约翰内斯 281
ecopsychism 生态有灵论 180
Ecumenical Movement/ecumenism 普世主义运动、普世主义、普正统教

会运动 260, 360, 363, 581
Eddy, Mary Baker 艾娣,玛丽·蓓克 377-378
Edo, the 埃多人 316
Edwards Jonathan 爱德华兹,乔纳森 368
Effendi, Abbas 欧芬迪,阿巴斯 497
Eglise de Dieu de Nos Ancêtres "我们祖先的上帝的教会" 551
Egypt: 埃及
ancient 古代 197, 199, 202-205, 211, 217, 237
Coptic Church 科普特教会 307, 546
Islam 伊斯兰教 487-488, 489-490, *492*, 577
and Britain 与英国 538
see also: Cairo *参见*:开罗
Eiku (monk) 睿空(和尚) 142
Eisai 荣西 147
El 埃尔 205, 206, 210
Elamite culture 艾拉米特文化 52
Elcho Island 埃尔科岛 513
Elegba 伊勒格巴 567
Eleusinian mysteries 伊流欣努密教 230, 234, 235, 240
Eliade, Mircea 埃利亚德,米尔塞亚 229, 514, 525-526
Eli'ezer, Yisrael ben 以利撒,以色列·本 348
Elima 伊利玛 320
Elizabeth I, Queen 女皇伊丽莎白一世 335, 341, 342
Emerson, Ralph Waldo 爱默生,拉尔菲·瓦尔多 371, 372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弗里德利希 357, *357*, 358
Enki 恩基 170, 200
Enlightenment, the 启蒙运动 345, 350, 353, 370
Enlil 恩利尔 200
Ennin 圆仁 141
Enuma Elisha (epic)《埃努玛·埃利什》(史诗) 201
Ephesus, Council of (431) 以弗所会议(431年) 267
Epictetus 爱比克泰德 238
Epicureanism 伊壁鸠鲁主义 230, 238
Epicurus 伊壁鸠鲁 238
Episcopal Church 圣公会 370
Erasmus, Desiderius 伊拉斯谟 *329*, 330
Eskimos *see* Inuit, the 爱斯基摩人, *参见*:伊努伊特人
Essenes 艾赛尼派 243
est (Erhard Seminars Training) 艾哈德研讨培训 393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538, 538, 541, 545-546, 569
Coptic Church 科普特教会 267, *267*, 307
Etruscans 伊特鲁里亚人 230, 238
Eucharist, the 圣餐 259, 261, 336
Euripides: *The Bacchae* 欧里庇得斯:《酒神的女伴》 233
Evangelical Christian Catholic Church of Zion City, Ilinois 伊利诺斯州锡

安城,福音派基督公教会 549
evangelicalism 福音派教义;福音运动; 378, 379 - 80, *381*, 383
television 电视福音传道 383, 384 - 5
Evans-Pritchard, B. E.: *Nuer Religion* 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的宗教》 320
Evolutionary Theory 进化论理论 353, *354*, 354 - 355, 356, 383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生存主义 359
Exodus, the《出埃及记》 17, 211 - 212, 216
Ezra 以斯拉 216, 253

Falwell, Jerry 法威尔,杰丽 383
Fard, Wallace D. 法德,华勒士 388 - 389
Farrakhan, Louis 法拉克汗,路易 *381*, 390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328, 359 - 360, 361, 393
Fates, the 命运三女神 232
Fatima 法蒂玛 296, 301
Fatimid dynasty 法蒂玛王朝 296, 301, 302
Fazang (Fa - tsang) 法藏 125, 132
feminism 女权主义 387, 423, 586
Feng Guifen 冯桂芬 439
FengYunshan 冯云山 437
Feuerbach, Ludwig 费尔巴哈,路德维维希 358
Ficino, Marsilio 菲奇诺,马尔西利奥 330
Fiji 斐济 166, 174, 407, 432, 508, 510, *516*, 517
fire: and sacrifice 火:与献祭,祭品 55 - 56
Five Northern Masters 北宋五子 129
Flood, the 大世洪水 202
Fogazzaro, Antonio: *The Saint* 弗加扎罗,安东尼:《圣徒》 591
Fox, George 福克斯,乔治 366 - 367
Francis of Assisi, St.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278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芳济会 278, 435, 543, 559, 562
Frank, Ya'akov 弗兰克,雅阿科夫 347
frashokereti 混世之终 219
fravashi 庇灵 219, 223, 224, 225
Frazer, Sir James: *Golden Bough* 弗雷泽,詹姆斯:《金枝》 35
Freemasonry 共济会 563, 566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 358, 584 - 585
Totem and Taboo《图腾与禁忌》 35
Frey 司丰饶、和平及耕耘之神 283
Freya 弗雷 283
Fuji, Mount 富士山 *21*, 482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asadena 富勒神学院,帕萨迪纳 384
Fu - nan empire 扶南王朝 157, 158, 159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 378–380, 383–384, 395
Funj empire 芬吉帝国 307

Gabon Pygmies 加蓬:俾格米人 313
Gabriel, archangel 天使长加百列 288
Gaia 盖亚 586
Galileo Galilei 伽利略,伽利勒 26, 328
Gandhi, Indira 甘地,英迪拉 *398*, 428
Gandhi, Mohandas K. (Mahatma) 甘地,莫罕达斯 K.(圣雄) 27, 353, 380, 409, 413, 416–419, *418*, 421, 427, 431
Ganges, River 恒河 20, 21, 46, 47, 53, 57, *57*, 76, 82, *86*, 102
Gaon of Vilna 维尔纳的加昂 348
Gaozong (Kao-tsung), Bmpemr 高宗皇帝 124
Garuda 金翅鸟 *85*
Garvey, Marcus 贾维,马库斯 568–569
Gāthās, Zoroastrian 偈颂,祆教的 220, 221
Gaudapāda 乔荼波陀 90
Gauguin, Paul: *Manao Tupapau* (*The Spirit of the Dead Watches*) 高更,保罗:"守护死者的精灵" *171*
Gautama *see* Buddha 乔达摩,释迦牟尼之俗姓;参见:佛陀
Gavaēvōdāta 原牛 223
Cayamaretan 原人 223
Genesis《创世记》 35, 201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28, 132, 228, 229, 303
geomancy 泥土占卜 110
Ghana 加纳 307, *311*, 315, 546
Ghose, Aurobindo 高士,奥罗宾多 421–422
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 202, *202*
Gilgamesh, *Epic of*《吉尔伽美什》,史诗 201–202, *202*, 205
Gītā see Bhagavadgita《梵歌》,参见:《薄伽梵歌》
Gnosticism 诺斯替教 225, 245, 247, 248, 257
Gobind Singh, Guru 戈宾德·辛格,古鲁 101, 398, 401, 402
God 上帝,神,主, 48, 49
Goddess, the (Hindu) 女神,(印度教) 89, 94, 95, 105
Gohong (Ko Hutxg): *Baopuzi* 葛洪,《抱朴子》 123
gopuram (temple tower) 庙、塔 86
Gorbachev, Mikhail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 532–533
Gordon, General C, G. 戈登将军 438, 538
Goren, Rahbi Shlomo 戈伦,拉比 *483*
Gosāla, Maskarin(Makkhali) 拘舍罗,末伽黎 67, 71
Goths 哥特人 262
Graham, Billy 葛培理 381, 383
Gran Chaco 格兰查科 181, 184

Granth see Adi Granth《格兰特》,*参见*:《阿底·格兰特》
Great Awakenings 大觉醒运动 368, 370–371
Great Goddess 大女神 52
Greece, ancient 希腊,古代 *206*, 217, 230–238, 243
Greek Orthodox Church 希腊正教 261–263, 265–266, 267
se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参见*:东正教
Greenberg, Irving 格林伯格,欧文 362
Greenham Common, England 格林翰卡门,英国 *587*
Gregory of Sinai, St.(西奈的)圣格列高利 276–277
Gsen-rab 兴饶祖师 94
Guadalupe, Our Lady (Virgin) of 瓜达卢佩,圣女 559, *560*, 571
Guanyin (Kuan-yin) 观音 93, 118, 128
see also: Kannon *参见*:Kannon(观音)
Guatemala 危地马拉 *185*, 185–186
Guiana 圭亚那 562, 566
Guomindang 国民党 442, 442–443, 444
Guoxiang (Kuo Hsiang) 郭象 120
Gupta empire 笈多帝国 45, 91
gurudwara (Gurdwara) 古尔德瓦拉庙 402
Guru Granth see Adi Granth《古鲁·格兰特》,*参见*:《阿底·格兰特》
Gurus 古鲁,帅尊 100, 101
Gush Emunim 信仰者集团 492
Gutiérrez, Gustavo 古铁雷斯,古斯塔沃 564
Gypsies 吉普赛人 362

Hades 哈得斯 232, 234
hadith 哈底斯,圣训 288, 292, 298
Haiti 海地 537, 556, 556, 563, 567, 568
hajj 哈吉,朝觐, 292, 305, 504
Halevi, Yehuda 哈列维,耶胡达 270
hallucinogens 致幻药 184, 184, 221
Hamzah 哈姆扎 302
Hanafi Muslims 哈乃斐派穆斯林 299
Hanbali Muslims 罕百里派穆斯林 299
Hanfeizi (Hah Fei-tzu) 韩非子 116
Hanuman 哈奴曼 *102*
Hao Hoa 和好秘密社团 462
Haoma 豪摩 223
haoma 豪摩 221, 223, 225
Haraldsson, Olaf 哈拉尔德松 268
Harappa civilization 哈拉帕文明 52
Hare Krishna movement 国际克里希那意识运动 386, 588
Harijans 哈里真、神之子 421
Harivamśa 诃利世系 89
Harnack, Adolf von 哈纳克,阿道夫·冯 356
Hasidic Jews 哈西德派犹太人 17, *274*, 272, 347–349, 375, 393

Haskalah 哈斯卡拉 272, 349
havurot 哈弗洛特 394
Hawaii: 夏威夷 166, 169, 508, 510, *518*
poem 夏威夷的诗 169 – 170
Haydn, Joseph 海顿,约瑟夫 345
headdresses 头饰,发式 175, 316
healing cults 信仰治疗教派,治疗崇拜 102, 315
Hebrew Union College, Cincinnati 希伯来协和学院,辛辛那堤 375
Hedgewar, Dr K. B. 海德瓦尔,K. B.博士 414
Hegel, G. W. E 黑格尔 341, 354, 357, 358, 359, 411
henotheism 单一主神教 56
Henry VIII, King 亨利八世(国王) 335
Hera 赫拉 232
Heracles 赫拉克勒斯 234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 236
Herod the Great, King 希律王,叙利亚王 213
Herzl, Theodor 赫茨尔,泰奥多尔 351
Der Jugenstaat《犹太国》 587
Hesiod 赫西奥德 233, 237
Hesychasm 静修士 276, 277 – 278, 352
Hideyoshi, Toyotomi 秀吉,丰臣 151, 467
Hildegard of Bingen 希德加尔德 279
Hinayana Buddism 小乘佛教 126
Hinduism 印度教 11, 13, 27, 28, 43, 44, 45, 50, 51, 54, *85*
key terms 关键术语 87
classical 古典时期 87 – 91, 104 – 105
and Islam 与伊斯兰教 95 – 97, *96*
regional movements 地区运动 97 – 99
19th – century reforms 19 世纪的改革 406 – 4010
modern 近现代 413 – 415, 431 – 432
see also: Sikhism; Vedas; Vivekānanda 参见:锡克教,吠陀,维韦卡南达
Hirohito, Emperor of Japan 日本裕仁天皇 *470*
Hitler, Adolf 希特勒,阿道夫 223, 359 – 360, 361, 362, 495, 572, 587
Hittites 赫梯人 197, 199
Hmong, the 洪族人 163, 456
Ho Chi Minh 胡志明 462, *463*, 465
Holocaust 整只燔祭,大屠杀 231, 328, 351, 362, 393, 523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262
Homer 荷马 232, 233, 237
Homo erectus 直立人 32, 36, 37, 42
Homo habilis 能人 32, 42
Homo sapiens 智人 32, 36, 42
Honen 法然 142 – 144

Hong Kong 香港 436, 449, 577, 579
Temple of a Thousand Buddhas 千佛寺 *434*
hongaku 本愿,普渡众生之愿 141
Hongxiu Quan 洪秀全 436 – 437, 438
Hopi, the 霍皮人 192 – 193
Horus 荷鲁斯 203
Hsun – tzu (Xunzi) 荀子 114 – 115, 116
Hu Yüan 胡瑗 129
Huanglao (Huang – Lao) 黄老 124
Huayan Buddhism 华严宗 125 – 126, 132, 133
Hua – yen 华严 140, 141
hubris 傲睨神明 231, 232
Hugh, Abbot of Cluny 于,克吕尼的隐修院长 251, 278
Huineng (Hui – neng) 慧能 126 – 127
Huitzilopochtli 维奇洛波奇特利 191
Hülegü Khan 旭烈兀汗 303
humanism 人道主义 359, 392
Hume, David 休谟 545
Hungary 匈牙利 268, 335, 484, 522, 526, 533
Hung – hsiu Ch'üan *see* Hongxiu Quan 洪秀全
hunter – gatherers 狩猎—采集者 32, 34, 36, 38, 191 – 192
Hus, John 胡斯 370
Husayn 侯赛因 295, 300, 301, 305
Huxley, Aldous 赫胥黎,阿尔多斯 14, 386, 414
Huxley, T. H. 赫胥黎,托马斯 359
Hyksos 喜克索斯人 202

I Ching see Ijing《易经》,参见:*Ijing*
Iamblichus 杨布利柯 242
Ibn 'Abd al – Wahhab 伊本·阿卜德·瓦哈布 485
Ibn al – Arabi 伊本·阿拉比 96, 303, 305
Ibn Gabirol: *Crown of Royalty* 伊本·伽比鲁勒(或译加布里奥尔):《忠诚的冠冕》 269 – 270
Ibn Khaldun 伊本·赫勒敦 305
Ibn Rushd (Averroes) 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 302 – 303, 305, 331
Ibn Sa'ud 伊本·沙乌德 485, 486
Iceland 冰岛 268
iconoclasm 破坏圣像 263, 343
see ikons 圣像
icon *see* ikons 圣像,偶像,雕像,参见:*ikons*
Ieyasu, Tokuguwa 德川家康 468
Ife, Nigeria: bronze 尼日利亚的伊费:青铜雕像 *311*
shrine 神坛 318
Ijing (*I Ching*)《易经》 110, *110*, 112
ikons 圣像,偶像,雕像 12, 21, 259, 261, 263, 263, 265, 266, *277*, *527*
imam 伊玛目 292, 300
Inanna 伊南娜 200, *209*
Incas, the 印加人 *182 – 183*, *188*,

555, 563
India 印度 43-6, 155-157
British Raj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397, 398, 403, 404-405, 415, 416, 419
Christians 基督徒 102, 105, 405, 426, 427-428
Jews 犹太人 105
since Independence 独立以后 425-428, 431 432
see ājivikas; Aryans; Brahmanism; Buddhism; Gandhi; Hinduism; Islam; Jainism; Mughal empire; Parsees; Śaivism; Sikhism 参见:生活派,雅利安人,婆罗门教,佛教,甘地,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莫卧尔帝国,帕西人,湿婆教,锡克教,
Indian Mutiny (1857) 印度大起义 404, 405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395, 396, 566
Indo-European languages 印欧语言 43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155, 286, 298, 449, 455, 484, 503, 518
see also: Java参见:爪哇
Indra 因陀罗 54-55, 72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印度河流域文明 45, 51-53, 54, 89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345-346, 355
Ingen 隐元 469
iNkosazana 伊恩考萨扎纳 322
Inuit, the 伊努伊特人 192, 196, 229
Iona, island of 伊奥纳岛 268
Iqbal, Sir Muhammad 伊克巴尔,穆罕默德爵士 419, 420, 430
Iran 伊朗 495-498
see Persia参见:波斯
Iraq 伊拉克 504, 577
Ireland 爱尔兰 267, 268, 282, 283, 346
Iroquois, the 易洛魁人 192, 193-194
Isaac 以撒 210
Isaiah (Yesha'yahu), Prophet 以赛亚,先知 14, 214-215
Ise, Japan: Amaterasu's shrine 伊势,日本:日照大神的社庙 140, 151
Isfahan, Iran 伊斯法罕,伊朗 495
mosque 清真寺 *295*
Ishtar 伊施塔 200, 209, *209*
Isis, cult of 伊西斯教派/膜拜 230, 241
ISKC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 国际克里希那意识协会 432
Islam (Muslims) 伊斯兰教(穆斯林) 164-165, 197, 222, 261, 268, 269, 285-292, 295-302, 305-306, 335, 484-487, 503-505, 507, 577-578, 579, 581
key terms 关键术语 292
in Africa 在非洲 28, 307, 494-495, 505
and Blacks 与黑人 386, 388-390

in China 在中国　108, 132, 228, 439, 579
in Egypt 在埃及　487 - 488, 489 - 490, 577
in India 在印度　28, 43, 95 - 97, 102, 105, 159, 286, 304 - 305, 397, 415 - 416, 419, 420, 426 - 427, 505 - 506, 579
in Indonesia 在印度尼西亚　155, 163 - 164, 500, 503, 579
in Iran 在伊朗　495 - 8
and Israel 与以色列　490, 491, 493 - 494, 578 - 579
in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　155, 505
and Mongols 与蒙古人　303 - 304
in Pakistan 在巴基斯坦　498 - 499, 506 - 507, 579
in Russia 在俄罗斯　499 - 500, 523, 533 - 534
in Spain 在西班牙　281, 302 - 303
in Thailand 在泰国　459
Islamic - Socialist Organization of Afro - American Unity 非洲裔美国人伊斯兰—社会主义统一组织　*388*, 389
Isma'ilis 伊斯马仪派　301 - 302
Israel 以色列　212, 215 - 216, 217
State 以色列国家　328, 362, 393, 490, 491 - 494, 577, 578 - 579, 587
Israelites 以色列人　197, 205, 209 - 217
Isvara 自在天　87
Izo, Ibuti 饭降,伊藏　474, 475
Jabotinsky, Vladimir 亚博廷斯基　491
Jacob 雅各　210
Jade Emperor (Yuhuang Shangdi) 玉皇大帝　128
Ja'fari Muslims 加法里派穆斯林　299
jaguars 美洲豹　184
Jainism 耆那教　43, 45, 46, 47, 48, 49, 50, 51, 62, 67, 68 - 71, *71*, 72, 98, 416, 426, 427
key terms 关键术语　69
Jamaa movement 贾马亚运动　549
Jama'at - i Islami 伊斯兰宣教会　498 - 499
James, William 詹姆斯,威廉　472
Janamsakhi《阇难萨契》　100
Januarius 贾纽埃里厄斯　238
Japan 日本　134 - 135
key terms 关键术语　137
preclassical period 前古典时期　138 - 142
classical period 古典时期　142 - 147, 151 - 152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50 - 151, 467 - 468, 479
16th century onwards 16 世纪以来　23, 450, 453, 468 - 471, 474 - 483, 574, 577
see kami; Shinto; Zen Buddhism 参见:神,上帝,[神道](死者的)灵魂,神道教,禅佛教
Jātaka stories 本生故事　60, 81

jātis 贾提、种姓、种族 50, 87
jāts 贾特 398
Java, Indonesia 爪哇,印度尼西亚 159、163、500, 503
Borobodur 婆罗浮屠 *152*, 157, 159, 165
Jayatilleke, K. N. 贾亚提勒克,K.N. 425
Jehangir, Emperor 贾汉吉尔皇帝 101
Jehovah 耶和华 210
Jehovah's Witnesses 耶和华参见证会 377, 378
Jeremiah (Yirmeyah) 耶利米 14, 215 - 216
Jericho: plastered skulls 耶利哥:敷以膏药的骷髅 41
Jerusalem 耶路撒冷 21、253, 253, 254, 267, *273*, 275, 288
Temples 圣殿 27, 212 - 213, 216, 217, 253
Jesuits (Society of Jesus) 耶稣会 *340*, 344, 392, 435, 467 - 468, 546, 560
Jesus (Yehoshu'a) 耶稣(耶和华) 16, 17, 243 - 245, 246, 254, 354, 356, 505 - 506
Jetavana, Sri Lanka 祇多林寺(斯里兰卡) 76
Jews: 犹太人
in Africa 在非洲 307
Ashkenazic and Sephardic 在德意志、北欧和在西班牙、葡萄牙 269, 273
in China 在中国 108, 132
in India 在印度 102, 105
modern 现代犹太人 393 - 395
in Poland 在波兰 523
and Romans 与罗马人 242, 243, 245, 253 - 255, 269 - 270
in Russia 在俄罗斯 347, *348*, 528
in USA 在美国 349, 350, 365, 375 - 376
see also: Hasidism Holocaust; Israelites; Israel; Judaism *参见*:哈西德主义,大屠杀,以色列人,以色列,犹太教
jiba 神社 474, 476
Jihad 吉哈德,圣战 292, 299 - 300, 578
Jina 耆那 69
Jinnah, Muhammad Ali 真纳,穆罕默德·阿里 420, 421
jīva 命,灵魂 69, 71
jnāna see dhyāna 智慧,*参见*:禅
Job 约伯,《约伯记》 14
jōdō 净土 137
Jodoshinshu 净土真宗 144 - 145
John the Baptist (Yohanan) 施洗约翰(约翰) 243 - 4
John, St.: Gospel 圣约翰:福音书 247
John of the Cross, St. 圣十架约翰 345
John XXIII, Pope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357, 363
John Paul II, Pope 教皇约翰·保罗二

世　364, *509*, 525, 533, *570*, 571, 573
Jordan, River 约旦河　21
Josei, Toda 户田,城圣　478
ju 儒　108, 111, 124
Juárez, Benito 胡亚雷斯　569
Judah 犹大　212, 213
Judaism 犹太教　17, 27, 28, 209 - 210, 213, 215, 216 - 217, 222, 228, 253 - 255, 270 - 274, 328, 350 - 351, 365, 376, 387 - 388, 393
  key terms 关键术语　272
Juno 朱诺　238
Jupiter 朱庇特　238

Ka'bah, Mecca 麦加克尔白　286, 290
Kabbahh *see* Qabbalah 卡巴拉,*参见*: 喀巴拉
Kabīr 伽比尔　101,398, 402, 403
Kabirpanthis 伽比尔派　403, 404
Kachin, the 克钦人　163, 456
kachinas 卡奇纳　168
  Hopi 霍皮人　192 - 193, 193
Kalahari desert 卡拉哈里沙漠　*309*
kalam 凯拉姆　296 - 297
Kālī 时母,迦利女神,黑色女神　48, 89, 99, *401*, 409, 412
Kaliyuga 迦利时期、争斗时期　48, 99
kāma 欲,爱,愉悦　90
Kamakura Shogunate, Japan 镰仓幕府时代,日本　134, 146
kami 神灵,上帝,[神道](死者)灵魂　135, 136 - 138, 139, 140, 141, 150, 471, 477
Kammu, Emperor of Japan 恒武,日本天皇　140
Kampuchea *see* Cambodia 柬埔寨
Kanchipuram, Tamil Nadu: temple tower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坎奇普兰:寺庙顶塔　*86*
Kang Yuwei 康有为　440 - 441, 441
Kanjur, the 甘珠尔　95
Kannon 观音　137, 144, 145, 151
Kano, Nigeria 卡诺,尼日利亚　*538*
Kant, Immanuel 康德　345, 354, 472
Kao - tsung (Gaozong), Emperor 高宗　124
Kaplan, Mordecai 莫迪凯·卡普兰　393
Kardec, Allan 卡德克　568
Katdecism 卡德克主义　568, 570
Karen, the 克伦人　456
Kariji Muslims 哈瓦利及派穆斯林　299
karma 业,羯磨　49, 56, 87, 98, 413
karmayoga 业瑜伽　412
Karna 迦尔纳　*85*
kashrut 卡什鲁特　272
Kathmamiu Valley 贾德满都谷地　105
kāyastha caste 卡亚斯塔种姓　410
Kemal Atatürk (Mustafa Kemal) 凯末尔·阿塔图克(穆斯塔法·凯末尔)

489, 496
Kennedy, John F 约翰·肯尼迪 385
Kenya: Sikh temple 肯尼亚:锡克教庙 577
Kerder 卡尔得 224
Kevala 完全知 49, 69
Khalistan 卡利斯坦 428
Khalsa 卡尔萨(锡克教团) 100, 401, 403
Khan, Sir Sayyid Ahmad 赛伊德·阿哈迈德·汗 415, 416
Khazars 卡扎尔人 269, 270, 284
Khieu Sampan 乔森潘 *461*, 573
khilafat movement 哈里发运动 419, 488
Khmer empire 高棉王朝 158 - 159, 160
Khmer Rouge 红色高棉 456, 461 - 462, 465
Khomeini, Ayatollah 霍梅尼,阿亚图拉 *496*, 496 - 497, *502*
kibbutzim 基布兹 491
Kim Il - sung 金日成 453
Kimbangu, Simon 金班吉,西蒙 547 - 549
King, Martin Luther 金,马丁·路德 364, 380, 385, 389, 392, 419
Kitaro, Nishida 西田·儿多郎 472 - 473
Knights Templars 圣殿骑士团 279
Ko Hung (Gohong): *Pao - p' u - tzu*《抱朴子》 123
koans (riddles) 心印,以心传心(谜语) 148
Kōbo Daishi *see* Kukai *参见*:空海
Kojigi《古事记》 137, 138, 139
Kokugaku (National Learning) movement 国学运动 469
kokutai 国体 137, 479, 483
Kong *see* Confucius 孔,*参见*:孔子
Kook, AvrahamYitshaq 库克 491
Kook, Tsevi Yehuda 库克,叶胡达 492
Koran *see* Qur'an《可兰经》,*参见*:《古兰经》
Kore (Persephone) 科瑞 234, 235
Korea 朝鲜 59, 108, 132 - 133, 137, 449 - 450, 453 - 454, 470, 535
Koya, Mount, Japan 高野,山,日本 141
Koyosan, Mount 高野山 135
Krishna *see* Krsna 克里希那,参见:黑天
Krish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 克里希那意识运动 99
see ISKCON *参见*:国际克里希那意识协会
Krishna 克里希那 423
Kronos 克洛诺斯 232
Krsna 黑天 *16*, 88, 88, 89, 99, 403
Ksatriyas 刹帝利 50, 54
Kuan - yin *see* Guanyin 观音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 中国皇帝忽必烈汗 94, 160
Kūkai 空海 141 - 142
Kumbh Mela Festival, Prayag 贡帕庙

会 102, *433*
Küng, Hans 孔汉斯 392
Kuo Hsiang (Guoxiang) 郭象 120
Kushan empire 贵霜帝国 45
Kwakiutl Indians: Sacred Songs of the Shaman 夸扣特尔印第安人:萨满的神圣之一歌 195
Kwoth 克沃斯 319, 320
Kyanzittha, King of Burma 江喜陀,缅甸国王 160
Kyongho 镜虚和尚 450
Kyoto (Heian), Japan 京都,日本 140, *152*、*575*

Lagerwey, John 拉杰韦,约翰 124
Lakota, the 拉科塔 192, 194-196
Laksmana 罗奇曼(罗摩的兄弟) *102*
Laksmi 拉克希米女神 *85*
Laojun (Lao-chun) 老君 122, 123
Laos 寮国 155, 160, 161, *162*, 164, 455, 456, 459, 460, 465, 466, 466
Laozi (Lao-tzu) 老子 107, 108, 111, *115*, 116, 119, 122, 123, 124
Lapp people 拉普人 229
lares 家庭守护神 239
Las Casas, Battolomé de 拉斯·卡萨斯 556, 559
Lascaux, France: cave paintings 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 32, 37
Latin America *see* America, South 拉丁美洲,参见:南美洲
Lee KuanYew 李光耀 465
Leeuw, Gerardus van der: *Religion in Essence and Manifestation*. 范德利乌:《宗教的本质和现象》 168
Legalism, Chinese 法家,中国 116, 121
Le Moustier France: Neanderthal man 法国穆斯提尔:尼安德特人 37
Lenin, Vladimir Ilyich 列宁,弗弗基米尔·伊里奇 *357*, 358, 522, 530, 530, 531
Lenshina, Alice 伦希纳,爱丽丝 550, 550
Leo XIII, Pope 利奥十三世,教皇 358-359
Lessing, Gotthold: *Nathan the Wise* 莱辛:《智者纳旦》 345, 349
Leto 勒托 *2*
Leviathan 利维坦 205
li (ceremonial propriety) 礼 109, 114-115, 116
li (energy) 理 109, 129, 133
Li Hongzhang 李鸿章 440
Liangba (Liang Pa) 梁发 436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353, 356, 361, 378, 385, 395、574
Liberation Theology 解放神学 392, 393, 542, 564-565, 566, 569, 570, 571
Libya 利比亚 495, 538, 577
Ligoupup 利勾普普 177
Linbiao 林彪 445
lingam 林伽(泰米尔语——男性生殖器) 51

Lingāyata/Lingāyats 林伽派 98, 102
Litan 利坦 205
Livingstone, David 利文斯顿,大卫 541
Lixue see New - Confucianism 《理学》,*参见*:新儒家
Lizhi (*Ji Chi*) 李贽 112
Locke, John 洛克,约翰 341
Logos 逻各斯 231
Loki 洛基 283
London: Buddhist temple 伦敦:佛教寺院 575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传教协会 508
Lotus Sutra《妙法莲华经》 137, 138 - 139, 140, 141, 146, 147, 478
Lovelock, James 拉夫洛克,詹姆斯 586
Loyola, St. Iguatius 罗耀拉,圣依纳爵 344
Lubavitcher Hasidim 哈西德犹太教仪式派成员 393
Lucretius: *De rerum natura* 卢克莱修:《物性论》 238
Lugh 卢格 282
Lumpas, the 拉姆帕斯教会 *550*, 550 - 551
Luther, Martin 路德,马丁 135, 144, 145, 331 - 332, *336*, 356
Lutheranism 路德宗 13, 332, 335, 336, 341, 342, 373, 379, 508, 527
Macaulay, Lord 麦考利勋爵 405
Machu Picchu 马丘比丘 *188*
McPherson, Aimee Semple 麦克弗逊,艾米·西姆普尔 384
Madhva 摩陀婆 89
Mādhyamika 中观学说,大乘空宗 85, 423
Magadha 摩揭陀(地区) 68, 75
Maghreb, the 马格里布 494 - 495
Magi, the 麻噶 221, 223, 226
magic 魔法,巫术 35, 37
Mahabalipuram, Tamil Nadu 泰米尔纳杜邦港城马哈巴利普拉姆 *86*
Māhbhārata《摩诃婆罗多》 48, *85*, 88, 104
Mahāsanghikas 大众部 81
Mahāvaipulya Buddhāvatamsaka Sutra《华严经》 *125*
Mahāvairocana, Buddha 大日如来佛 141, 142
Mahāvihāra, Sri Lanka 大寺,斯里兰卡 76
Mahāvīra 大雄(耆那教创始人) 45, 51, 53, 58, 67, 68, 69, 72
mahāvrata 大誓戒(耆那教誓言) 69
Mahāyāna Buddhism 大乘佛教 45, 46, 59, 81 - 86, 92 - 93, 119, 126, 159, 163, 429, 481
Mahdi, the 马赫迪 538
Mahinda 摩哂陀 76, 78
Maimonides 迈蒙尼德 270
Malacca 马六甲 155, 159, 163, 455, 500

Malalasekara. G. R 马拉拉色克拉，G. R. 425
Malaysia 马来西亚 *155*, 159, 163, 298, 449, 455, 500, 503, 505, 507, 577
Malcolm X 马尔科姆·艾克斯 *388*, 389
Mali 马里 *313*, 307
Maliki Muslims 马立克派穆斯林 299
mana 玛纳 55, 167 - 168, 169, 174
mandalas 曼荼罗，坛场 93, 93, 142, 157
Mandela, Nelson 曼德拉，尼尔逊 552, 573
manes 玛涅斯，玛纳 231, 239
Mani 摩尼 *209*, 218, 226, 227
Manichaeism 摩尼教 108, 132, *209*, 218, 225, 226 - 227, 228, 230, 247, 257
Mānikkavācagar 摩尼迦瓦沙伽尔 97
manthras 圣力 219
Mantra Sect (Shingon) 曼特罗教派（真言宗） 141
mantras 咒语，颂歌 59, 142
Mantrayāna, the 真言乘 59, 92
Manu, law books of《摩奴法典》 90
Mao Zedong (Mao Tse - tung) 毛泽东 *434*, 443 - 448, *580*
Little Red Book 小红书 445, *446*, 446, 447
Mao, Mount 茅山 123
Maoris 毛利人 170, 512, *512*, 514
Mappo 末法时代 142, 145
marabouts 穆拉比特 495
maraes 马拉伊 168, *171*, *173*
Maratha Confederacy 印度马拉他人联盟 398
Marcion 马西昂 245
Marcuse, Herbert 马尔库塞，赫伯特 386
Marduk 马尔都克 200, 201
Marett, R. K, 马雷特 35
The Threshold of Religion《宗教导论》 168
Marpa 玛尔巴 94
Mars (战神)玛尔斯 238
Marx, Karl 马克思，卡尔 354, 357, *357*, 358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24, 25 - 26, 328, 346, 357 - 359, 386, 393, 430, 456, 489, 572, 574
in Africa 在非洲 545
in China 在中国 443 - 449, 535
in Russia 在俄国 *521*, 522, 527, 529 - 535
Mary I, Queen of England 玛丽一世，英格兰女王 335
Masalai 马萨雷 168
Mashiah (Messiah) 弥赛亚 215, 243, 245, 253, 272, 273, 347
masks 面具 *175*, *196*, *311*, 316
see also: *kachinas* 参见：卡奇纳
Mass, Christian 基督教弥撒 17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53, 104
Mather, Cotton 马瑟，科顿 368

Mather, Increase 马瑟,英克利斯 368
Matsuri 祭祀,祭典;祭日,节日,庙会 137
Maui (Trickster of the Pacific) 莫伊(太平洋地区的恶作剧精灵) 170, 173
Maurya, Candragupta 孔雀家族的旃陀罗笈多 75
Mauryan empire 孔雀帝国 45, 75
Mawdudi, Mawlana 毛杜迪,毛拉纳 498 – 499
māyā 摩耶,虚幻 *412*
Maya civilization 马雅文明 181 – 182, 185, 185 – 186, 191
Mayapán 马雅潘 186
Mbuti Pygmies 俾格米人 320 – 321, 321
Mecca 麦加 286, 287, *291*, 295
 Ka'bah 克尔白 286, 290, *504*
 see also: *hajj* *参见*:哈吉
Medes, the 米底人 218, 221
Medina 麦地那 287, 295
meditation 沉思,冥想,坐禅 14, 36, 48, 49, 63, *146*, 148, 261, 386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明治维新,日本 134, 469, 470 – 471, 472, 477, 479, 482
Melanchthon, Philip 梅兰希顿,菲利普 336
Melanesians 美拉尼西亚 166, 167, 168, 174 – 177
 cargo cults 货物崇拜 514, 515, 516 – 517
Mencius (Mengzi) 孟子 108, 114
Mendelssohn, Moses 门德尔松,摩西 349, 350
Menelik 曼涅里克 545
Menes, Pharaoh 美尼斯,法老 202
Mengzi (Mencius) 孟子 108, 114
Mennonites 门诺派 369
Mercury 墨丘利神 282
Merkavah mysticism 犹太教灵轮神秘主义 271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197, 199 – 202
Messiah *see Mashiah* 弥赛亚
Methodism 循道宗,卫理公会,卫斯理会,美以美会 355, 357, 369 – 370, 371, 373, 450, 508, 567
Methodius, St. 圣美多迪乌斯 267, 268 – 269
Mexico 墨西哥 556, 559 – 560, 562, 569, 571, 580
 see also: Maya civilization 马雅文明
Micronesians 密克罗尼西亚 166, 167, 177
Mihitnale shrine, Sri Lanka 卡米欣特莱神殿,斯里兰卡 78
Miki, Nakayana 中山,美伎 474 – 475, 476
miko 神子、巫女 137
Mila Raspa (Milarepa) 弥拉·罗思巴(或称弥拉惹巴) 94
Mill, John Stuart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 405

Miller, William 米勒,威廉 377
Million Man March (1995) 百万人大游行(1995年) *581*
Minoan civilization 克里特米诺斯文明 230
Miroku 弥勒 476
Mishnah, the《密西拿》 254
missionaries, Christian 传教士,基督教 28, 268, 344, 360, 404 - 405, 422, 430, 437, 439, 508, 841, 559 - 560. 562
Mithra 密特拉 219, *223*, 225
Mithraism 密特拉教 219, 241
Mithras 密特拉神 230, 240, 241
Mitra 密特罗 55
Mitsukuni 光国 469
mitzvah (犹太教的)戒律 272
Miztimu 米 提努 168
Moctezuma II, Aztec emperor 莫克特祖玛二世,阿兹特克帝国 191
Mohenjo - Daro civilization 摩亨佐一达罗文明 52
moksa 解脱 49, 90
monasticism 隐修主义,修院制度 50, 261, 263, 268, 276 - 8
Mongkut 蒙固王 457 - 8
Mongolia 蒙古 229, *429*
Mongols 蒙古人 28, 94, 132, 146, 159, 160, 228, 229, 303 - 304, 352
monotheism 一神教 35, 41
Montesquieu, Charles de 孟德斯鸠 345
Moody, Dwight L.慕迪 379 3
Mool Mantra"基本颂条" 100
Moon, Reverend Sun Myung 文鲜明牧师 386, 453 - 454, *454*
Moral Majority movement 道德多数派运动 383, 384, 386
Moravians 莫拉维亚弟兄会 370
Mormonism 摩门教 21, 365, 371, 372, 378, 383, 510, 511, 581
Morocco 摩洛哥 494 - 495, 538
Moses (Motheh) 摩西 26, 209, 210 - 212, 211, 216
mosques 清真寺 *20*, *295*, *502*, *506*
Mozart, W. A.莫扎特,W·A 345, 349
Mozi (Mo - tzu) 墨子 114
mudrā 手印 141 - 142
Mughal empire 莫卧尔帝国 45, 97, 159, 165, 304, 397, 398, 415, 484
Muhammad, the Prophet 先知穆罕默德 14, 16, 17, 285, 286 - 288, 289 - 290, 292, 295, 498
Muhammad, Elijah (Elijah Poole) 伊利亚·穆罕默德 388 - 389
Muhammad, Sayyid'Ali 穆罕默德,赛义德·阿里 497
Muhammad, Wraithuddin 穆罕默德,瑞斯沃迪/华莱士 389
Muhammadiya movement 穆赫迈底亚运动 503
mimmification 木乃伊化 203, 205
Müntzer, Thomas 闵采尔,托马斯 335, 341

Mushm Brotherhood 穆斯林兄弟会 489 – 491
Muslims see Islam 穆斯林，参见：伊斯兰教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359
Mu'tazlah, the 穆尔太齐赖派 296 – 297, 305
Mycenacan culture 迈锡尼文化 230
mysteria 奥秘、秘密宗教 231
mysticism 神秘主义 14, 78, 261, 281, 341, 345, 385 – 386, 582, 583
mythos 神话，密索思，信仰模式 231
Myths 神话 15 – 17

Nabi 纳比，先知 292
Nāgārjuna 龙树 82, 85, 126
Namdev 那摩德瓦 402
Namibia 纳米比亚 538
Nānak, Guru 那纳克，古鲁 100 – 101, 398, *402*, 403
Nao, Deguchi 出口直子 476
Naoroji, Dadabhai 纳奥罗治，达达拜 427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350
Naqshbandi order 纳合西班迪教团 304, 500
Nara, Japan 奈良，日本 140
temples 庙，寺 139, 140
Narayan, R.K: *The Guide* 纳拉扬，R.K:《向导》 591

Nasser, Colonel Gamal 纳赛尔，加马尔，上校 490, *490*
Natal 纳塔尔 537, 538, 548, 549
Natan, Rabbi, of Gaza 纳坦，加沙的拉比 347
Nation of Islam 伊斯兰民族 *381*, 388 – 389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22 – 25, 346 – 347, 351, 396, 405, 430, 488 – 489, 574, 587
Nature 大自然 35
Navajo, the 纳瓦霍人 191
Nayanar poets 那衍纳尔派诗人 97
Nazarite Church 拿撒勒教会 *548*, 549
Nazism 纳粹主义 328, 351, 359 – 360, 361, 362, 572
Ne Win, General 奈温，将军 460
Neanderthal humans 尼安德特人 32, 36, 37, 42
Nebuchadnezzar 尼布甲尼撒 212, 215
Nehru, Jawaharlal 尼赫鲁 409, 412
Neihardt, John G, 内哈特，约翰 389
nembutsu 念佛 137, 144, 145
Neo – Confucianism 新儒家 129 – 130, 131, 133, 149, 151 – 152, 359, 363, 440, 441, 449
"neo foundationalism" 新基础主义 395, 408, 423, 486, 503
Neo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230, 236, 241 – 242, 264, 330
Neo – Thomism 新托马斯主义 359,

363
Nepal 尼泊尔 43, *47*, 59, *67*, 397, 429 – 430
Nestorian Christianity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 108, 132, 228, 267
Nestorius 聂斯托利 267
Netherlands, the 荷兰,尼德兰 333, 335, *343*, 343, 484, 556
Neturei Karta "圣城卫士" 492
New Britain 新不列颠岛 176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亚 166, 508, 510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岛 166, 174, 175, 176, 508, 514, 516
New Ireland: masks 新爱尔兰岛:面具 175
New Testament《新约》 26, 27, 28, 265, 288 – 289
John's Gospel《约翰福音》 247
New Zealand 新西兰 166, 510, 511
Newman, John Henry 纽曼 356
Newton, Isaac 牛顿 328, 353
nganga 恩冈 168
Ngo Dinh Diem 吴庭艳 464
Ngo Van Chieu 阮文绍 462 – 463
Ngurunderi 恩古伦德利 178
Niass, Ibrahim 尼亚斯,伊布拉伊姆 544
nibbāna see nirvāna 涅槃
Nicaea, Council of (325) 尼西亚会议(325 年) 247, 256, 257, 258, 260, 261, 267
Nicaragua 尼加拉瓜 567, 569, 571
Nichiren Buddhism 日莲宗 142, 146 – 147, 151, 152
Nichiren Shoshu 日莲正宗 478, 481, 483
Nicobar islands 尼科巴岛 515
Niebuhr, Reinhold 尼布尔,莱茵霍尔德 391
Nigeria 尼日利亚 307, 316, *538*, 546, 549
see also: Ife; Yoruba *参见*: 约鲁巴
Nihonshoki《日本书记》 137, 139 – 140
Nikon, Patriarch 尼康,牧首 352
Nillel 尼勒尔 253, 255
Nineveh 尼尼微 199
Ninian, St. 圣尼尼安 267 – 268
Ninlil 宁利尔 200
nirgunam 无属性的 96, 100, 104
nirvāna (*nibbāna*) 涅槃 49, 58, 63, 67, 79, 80, 85
niyati 命运、宿命 72
Nobili, Roberto de 诺必里,罗伯托·德 404
Nobunaga, Oda 织田信长 150, 467
nominalism 唯名论 38
non – injury (*ahimsā*) 不杀,非暴力主义 68, 69, 70, 70
Norinaga, Motoori 宣长,本居 469
Nu, U 吴努 460
Nuer, the 努尔人 319 – 320, 322
numen (*numina*) 神明,神灵 14, 231, 238
Nuri, Mirza Husayn Ali 努里,米尔扎·侯赛因·阿里 497

Obaku Zen 黄檗禅 469
Obatala 奥巴塔拉 319, 567
Oceania 大洋洲 167, 177
Odin 奥丁 283
Oduduwa 奥杜杜瓦 318, 319
Ogun 奥冈 *318*, 319
Ohrmazd 奥尔玛兹德 219, 224
Olcott, Colonel Henry S. 奥尔考特, 克洛尼尔·亨利 422, 423
Old Testament《旧约全书》 201, 205, 214, 210, 212, 214-216, 243, 244-245, 340-341
Olives, Mount of 橄榄山 21
Olorun 奥罗伦 319
Olympic Games 奥运会 233
Olympus, Mount 奥林匹斯山 233
Om 唵 101
Ometéotl 奥梅特欧特尔 188
Omoto 大本教 476-478
Onin War (1467-1478) 应仁之乱 (1467-1478) 150
Onisabiro, Deguchi 出口,王仁三郎 476
opium trade 鸦片贸易 435-436
Opus Dei movement 天主事工会运动 564
oral traditions 口述传统 16-17
Orinoco Basin 奥里诺科盆地 184
orisa 奥里萨 319-319
Orphism 奥尔菲斯教,或俄尔甫斯教 230, 234-235, 236
Orunmila 奥伦米拉 567
Osiris 奥西里斯 203-205, 241
Otto, Rudolf: *The Idea of the Holy* 鲁道夫·奥托:《论神圣的观念》 14, 41, 361-362
Ottoman Turks 奥斯曼土耳其人 274-275, 281, 304, 335, 347, 352, 484, 487, 488, 489, 492
Oxford Movement 牛津运动 356
Oyo, kingdom of 奥约王国 307

Pacific islands 太平洋群岛 166-167, 508-510, 517-518
pacifism 和平主义 353, 366, 386, 392
Pagan, Burma 蒲甘,缅甸 159
Schwezigon Pagoda 阿难陀寺 160
Pahlavi literature 巴列维语文献 221, 224
Pakistan 巴基斯坦 43, 45, 286, 397, 420, 430, 498-499, 506-507, 577, 579
Palamas, St. Gregory 帕拉马斯,圣格列高利 276, 277-278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05, 210, 230, 237, 243-245, 255, 491-494, 497, 577, 578, 579
Pali (language) 巴利语 45
Canon 巴利语正典 59, 62, 67, 76, 77, 423
Palmyra, Syria 帕尔米拉,叙利亚 206
Pampas, the 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 181
Panama 巴拿马 563
panth 班陀、道路 100
Papacy 教皇制,教廷 262, 265,

266, 278, 281, 329, 331, 332, 341,344, 347
infallibility 无谬误论　356 – 357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亚新几内亚　166, 167, 174, 175, *509*, 518
Paraguay 巴拉圭　560
Parakramabahu, King of Sri Lanka 波罗羯摩跋诃,斯里兰卡的国王　160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236
Parsees (Parsis) 帕西人,印度拜火教徒　102, 426, 427
Parthians, the 帕提亚人　218
Parvati 雪山神女　89
Passover, the 逾越节　*17*, *19*, 212
Pasternak, Boris 帕斯捷尔纳克　531
Patagonia 巴塔哥尼亚高原　181
Patna (Pataliputra), India 帕特里普特拉,现为巴特那(华氏城),印度　53, 57, 76, 406
Patrick, St 圣帕特里克　267, 283
Paul, St. 圣保罗　14, 27, 245, 265, 280, 336, 354, 361
Pegu, Burma 缅甸勃固　160
Pelagius 贝拉基　265
Penn, William 佩恩,威廉　366
Pentateuch, the 摩西五经　216
Pentecostalism 灵恩运动　384, 566, 571
Perfect Liberty (P.L) Kyodan 完全自由教团(简称 PL 教团)　477
Perfection of Wisdom《智慧的圆融》　81, 82, 85
Perry, Commodore Matthew 佩里,马太船长　469
Persephone 珀尔塞福涅　234, *235*
Persia/Persians 波斯/波斯人　197, 199, 216, 217, 218 – 219, 224, 237
see Iran; Islam; Manichaeism; Zoroastrianism; Zurvanism *参见*:伊朗,伊斯兰教,袄教,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扎尔万派
Peru 秘鲁　556, 559, 562, 564
see also: Incas *参见*:印加
Perun 佩伦　284
Peter, St. 圣彼得,圣伯多禄　265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352
peyote cult 仙人掌教派　390
Phaedo (Plato)《斐多》(柏拉图)　236 – 237
Pharisees 法利赛人　243
Philip II, King of Macedon 腓力二世,马其顿国王　237
Philippines, the 菲律宾　155, 156, 159, 165, 455, 456
Phil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斐洛　243
philosophia 爱智　231
Phoenicians 腓尼基人　197, 199, 209
Pico della Mirandola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330 – 331
Pilate, Pontius 彼拉多,本丢　245
pilgrimages 朝圣,朝觐　47, 151, 280, 336
see also: hajj *参见*:哈吉
Plato/Platonism 柏拉图/柏拉图主义

38, 230, 234, 236 – 237
see also: Neoplatonism *参见*:新柏拉图主义
Plotinus 普罗提诺 241, 242, 264
Enneads《九章集》 241
Pol Pot 波尔波特 461, 572
Poland 波兰 268, 335, 347, 484, 522, 523, 525, 526, 533, *573*
Polonnaruwa, Sri Lanka 波隆纳鲁瓦,斯里兰卡古城 51, *64*, 80, 425
Polynesians 波利尼西来人 166 – 170, 173 – 174, 181, 580
polytheism 多神教 35, 41
Pompey 庞培 240
popes *see* Papacy 教皇,*参见*:教皇制
Porphyry 波菲利 241
Portugal/Portuguese 葡萄牙/葡萄牙人 335, 397, 500, 508, 546, 555, 556
Poseidon 波塞冬 232
Powamu ceremony 鲍瓦姆庆典 *193*
prajñā 般若,智慧 58, 127
Prajñāparamitā Sutras (*Perfection of Wisdom*)《般若波罗蜜多经》(智慧圆融之经) 81, 82, 85
prakrti 原初物质,自性 75
Pratītyasamutpāda 缘起 58, 126
Praxiteles 普拉克西特勒斯 232
Prayag, India: Kumbh Mela Festival 印度波罗耶伽:贡帕庙会 102, *433*
prehistoric religions 史前宗教 32 – 42
premillennialism 前千禧年主义 379
Pre – Raphaelite movement 拉斐尔前派运动 356
Presbyterianism 长老会,长老制,长老会教义 333, 336, 367, 373, 450, 508, 551
Presocratics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 236
"primitive" religion "原始"宗教 34, 41
Prohibition, the 禁酒令 380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170, 233
Prophet, the *see* Muhammad、先知,*参见*:先知穆罕默德
Prophets, the 众先知 213 – 215, 217, 289 – 290, 295
Protestantism 新教 328
in Korea 在朝鲜 450, 453
in Latin America 在拉丁美洲 563 – 564, 565 – 566
in USA 在美国 373, 395
see liberalism; Reformation *参见*:自由主义,宗教改革
psychotherapy 心理疗法,精神疗法 393,
see also: Freud, Sigmund *参见*:西格门德·弗洛依德
Pueblo peoples 普韦布洛人 191, 192 – 193
pūjā 崇拜、礼拜(印度教) *46*, *81*, *87*
Purānas《往事书》,《古事记》 89, 104
Pure Land movement 净土运动 86, 124, 128, 135, 142 – 145, 147,

150, 151
Puritan 清教徒 366, 367 - 368, *368*
Pygmies 俾格米人 313, 320 - 321, 321
pyramids, Egyptian 金字塔,埃及 202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234, 236, *237*

Qabbalah 喀巴拉 271, 272, 331, 348
Qaddafi, Colonel Muammar 卡达非,穆阿马尔,上校 495
Qadiani, the 卡迪阿尼派 506 - 507
Qadirīya 卡迪里教团 500
qalandars 卡兰达里 96
Qān Buddhism 禅宗 109, 110, 126 - 128, 131, 133
qi (*ch'i*) 气 109, 129
Qingdu (Ch'ing - t'u) see Pure Land movement 净土,*参见*:净土运动
Quakers 贵格会,教友会 *334*, 335, 341, 366 - 367
Quebec Act (1774) 魁北克法案 (1774) 370
Quechua, the 盖丘亚人 569
Quetzalcóatl 羽蛇神 *187*, 188, 191
Qumran community 库姆兰社群 243
Qungqiu (*Ch'un - ch'iu*)《春秋》 112
Qur'an《古兰经》 285, 286, 288 - 290, 295, 297
Quraysh, the 古来氏人 286, 287

Rabani, Shoghi Effendi 拉巴尼,绍基·欧芬迪 497
rabbis 拉比 253, 254, 272
women 妇女 387 - 8
Rābi'ah 拉比亚 299
Rādhā 罗陀 99, 403
Rādhakrishnan, Sarvepalli 拉达克里希南,萨尔维帕里 27, 426, 430
Radhasoamis 罗陀索阿米派 403
Raffles, Sir Stamford 拉弗尔斯,斯坦福德 465
Rahit 拉希特(锡克教的法典) 100
Rahner, Karl 拉纳,卡尔 392
Rainbow Snake 彩虹蛇 178, 180
Rāma 罗摩 89, *102*
Ramakrishna 罗摩克里希那 408, *409*, 409 - 410
RamakrishnaVedanta Mission 罗摩克里希那吠檀多传教会 410, 411, 412, 432
Rāmānuja 罗摩奴阇 89, 97, 413
Rāmāyana《罗摩衍那》,《腊玛延那》 48, *102*, 104, 450
rangga 朗加 179
Rangoon, Burma: Shwedagon temple 仰光,缅甸:瑞达光大金塔 *155*
Ranjit Singh 兰季特·辛格 403
Rashnu 审判官 223
Rastafarianism 拉斯特法里主义 568 - 569
Ratnasambhava Buddha 宝生佛 93
Rauschenbusch, Walter 劳兴布希,沃

特 376, 380
Ravidas 拉维达斯 402
Re 拉神 203, 204
realism 现实主义 38
rebirth 再生 48, 49, 56, 237, 413, 582
Reform Movement (China) 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国) 440
Reformation, the 宗教改革 27, 281, 328, 329, 331 - 343, 345
reincarnation *see* rebirth 化身,再投胎,参见:再生
religio 宗教 231
ren 仁 109, 114
Renaissance, the 文艺复兴 329 - 331
Rennyo 莲如 145
Reza, Mohammad 礼萨,穆罕默德 496
Reza Khan 礼萨汗 495 - 496
Rhodes, Cecil 罗得斯 537
Ricci, Matteo 利玛窦 435
Rida, Muhammad Rashid 里达,穆罕默德·拉希德 488, 490
Rig Veda《犁俱吠陀》 45, 48, 54, 56
Rinzai Zen 临济禅 147, 148
Rio de Janeiro, Brazil 里约热内卢,巴西 *541*, 568
Risorgimento, the 意大利复兴运动 347
rituals 宗教仪式 13 - 14, 17
Rivera, Diego: murals 里维拉,迪耶戈:壁画 559, 569
Roberts, Oral 罗伯特,沃拉尔 383
Rogerson, Bishop Barry 罗杰逊,巴里,主教 *381*
Roman Catholic Church *see* Catholicism, Roman 罗马天主教会,参见:罗马天主教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200, 217, 219, 226, 227, 230, 231, 238 - 242, 248, 253, 261 - 262
Christians 基督徒 230, 242, *244*, 246 - 248, *248*, 253, 254, 255 - 256;
Jews 犹太人 242, 243, 245, 253 - 255, 269
Romania 罗马尼亚 12, 522, 525 - 526, 533
Roosevelt, Franklin D. 罗斯福,富兰克林 380
Roy, Ram Mohan 罗易,罗姆·摩罕 406
R. S. S. (Rastriya Svayamsevak Sangh) 国民志愿服务团 414, 421
rta 梨多,法则,秩序,规律,天则 55
Ruanväli *stūpa*, Sri Lanka 鲁安瓦里塔,斯里兰卡 76
Rúmī 鲁米 420
Runcie, Robert 伦齐 364
Russell, Bertrand 罗素,伯特兰 359
Russell, Charles Taze 拉塞尔 377
Russia 俄罗斯 *12*, 54, 268 - 269, 276, 278, 347, 348, 352 - 353, 484, 499 - 450, 521 - 523, 528 - 535

Revolution 革命　360, 443, 529
Rutherford, Joseph Franklin 拉瑟福德,约瑟夫·富兰克林　377
Ruusbroec, Jan van 吕斯布鲁克　281

Sabbath (Shabbat) 安息日　216, 270, 272
Saccas, Ammonius 萨卡斯,阿摩努伊斯　241, 242
sacraments, Christian 圣礼,圣事(基督教)　266
sacrificial rituals 祭祀仪式　13
Sadat, Anwar as - 萨达特,安瓦尔　490
Sadducees 撒都该人　243
Sahagún, Bernardino de: *Tasks of the Wise Man* 萨哈贡:《哲人的使命》　188
sahajdhāris 锡克教徒的称号　403
Saichō 最澄　140 - 141, 142
Śaiva Siddhanta 湿婆圣典派,湿婆悉昙多派　426
saivism 湿婆派　89, 97, 99
śaktism 性力派　48, 93, 95
śākyas 释迦族　60
salaf 萨拉夫　*488*
Salafiyah 萨拉菲叶　490, 495, 544 - 545
salat 礼拜　292
Salt Lake City, Utah: Mormons 犹他州,盐湖城摩门教徒　372, 383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　379, 511
Samarkand, Uzbekistan 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　348
Sambourne, Linley: cartoon 桑伯恩,林勒:卡通　354
Same people 萨美人　229
Sāmkhya 数论派　74 - 75, 412
samsāra 轮回,流转　49, 56, 58, 85
San, the 参见:布须曼人　*309*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　*565*
Sangha Order 僧伽团社　50, 58, 60, 63, 67, 425
Śankara 商羯罗　50, 88, 89 - 90, 91, 99, 145, 408, 411, 412, 413, 414
sannyāsins 游方僧,遁世者　49, 50, 87
Sanskrit 梵语,梵文　45, 53, 82
sant 桑陀　96, 100
Santería 萨泰里阿教　567
Saosha 拯救神　223
Saoshyants 救世主苏什扬特　223, 224
Sarasvati 萨拉斯瓦蒂女神、辩才天女　*431*
Sarasvati, Dayānanda 萨拉斯瓦蒂,达耶难陀　407, 408
Sarrator 萨拉托尔　238
Sartre, Jean - Paul 萨特,让 - 保罗　359, 543
Sa - skya order 萨迦派　94
Sassanid dynasty 萨珊王朝　218, 224, 225, 226
Sat Guru "萨陀·古鲁"　100
satori 觉悟,彻悟　139, 148 - 149
satyagraham 坚持真理　418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485 - 486

saum 斋戒 292
Saya San rebellion 沙耶山叛乱 459
Schechter, Solomon 谢克特,所罗门 376
Schmidt, Wilhelm 施米特,威廉 35
Schneersohn, Joseph Isaac 希涅苏,约瑟夫·以撒克 393
Schuller, Robert 舒勒,罗伯特 383, 385
Schüssler – Fiorenza, Elizabeth: *In Memory of Her* 伊丽莎白·舒斯勒–菲尔莱瑟:《纪念她》 387
Scofield, C.I. 斯考菲尔德,C.J. 379
Scotland 苏格兰 267 – 268, 333, 335, 343, 345
Scottish Free Church 苏格兰自由教会 511
Sea Woman 海洋女神 196
Seabury, Bishop Samuel 西伯里,塞缪尔,主教 370
Segundo, Juan Luis 塞贡多,朱安·刘易斯 564 – 565
Selassie, Haile 塞拉西,海勒 545, 569
Seleucids 塞琉西王朝 218, 224, 243
Seleucus 塞琉古一世 78
"Self – Strengthening" Movement (China) "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中国) 439 – 440
Semele 塞墨勒 233
Sen, Keshab Chandra 森,凯沙布·钱德拉 406
Sengthor, Leopold Sedar 桑戈尔,勒沃坡尔德·塞达 543
Serafim, St. 圣谢拉菲姆 353
Serbia 塞尔维亚 533
Serra, Junípero 塞拉,朱尼佩罗 562
Seth 塞特 203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397, 435
Seventh – Day Adventists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377, 378, 511
Seymour, William J. 威廉·西摩 384
Shabbat (Sabbath) 安息日 270, 272
shahd 沙布德 403
Shafi'i Muslims 沙斐仪派穆斯林 299
Shah Jahan 沙·贾汗 304
Shaka 谢克 537
shakubuku 折伏,折服 147, 478
shamanism 萨满教 15, 38, 38, 40, 102, 168, 184, 185, 193 – 194, 195, 196, *196*, 228 – 229, 315, 389, 529
Shammai 萨玛伊 253, 255
Shango 信仰同化祭礼舞 567
Shapur I, Sassanid emperor 沙普尔一世,萨珊朝皇帝 225, 226
shari'a 沙里亚 19, 292, 489
shaykh 谢赫 96, 297
Shembe, Isaiah 谢姆贝教派,以赛亚 548, 549
Shi'a Muslims 什叶派穆斯林 *292*, 295, 296, 300 – 301, 302, 496 – 497
Shi – hsiu 神秀 127

Shijing (*Shi Ching*)《诗经》 112
Shikoku, Eight - Eight Temples of 四国 151
Shin Arahan 僧阿罗汉 160
Shingon Buddhism 佛教真言宗 141 - 2, 151, 152
Shinran 亲鸾 142, 144 - 145, 152
Shinto 神道教 135, 136, 137, 149 - 150, 151, 471 - 472, 476, 477, 479, 480 - 481, 482, 527, 574, 575
shirk 舍克 291, 416
shōbogenzō《正法眼藏》 147
Shōmu, Emperor of Japan 圣武,日本天皇 140
Shotoku Taishi, Prince 圣德太子 134, 138 - 139
Shujing (*Shu Ching*)《书经》 112
Siberia 西伯利亚 229, 321, 352, 521, 528, 529
Sierre Leone 塞拉利昂 541
Sikhism 锡克教 45, 100 - 101, 102, *398*, 398 - 404, 426, 428, 577, 587
  five Ks 五 K 401 - 402
  key terms 关键术语 100
sīla 戒律 58
Simons, Menno 西蒙斯,门诺 335
Sinai, Mount 西奈山 21, 211, 212
Singapore 新加坡 155, 449, 455, 456, 465
Sioux, the 苏人,苏语,达科他印第安人/语 375
Sita 悉多 *102*
Śiva 湿婆神 *46*, 48, 51, 52, 56, *85*, 88, 89, 97, 98, *104*, 105, 433
skandhas 蕴(佛教) 93
skepticism 怀疑主义 53, 356
skulls, plastered 敷石膏的骷髅 *41*
slave trade, African 非洲的奴隶贸易 536 - 537
Slavs 斯拉夫人 282, 284
Smith, Adam 斯密,亚当 328, 345, 475
Smith, Hiram 史密斯,希拉姆 372
Smith, John, II 史密斯,约翰,二世 21
Smith, Joseph, II 史密斯,约瑟夫,二世 372
Snake Skirt 蛇状下摆 188
Sobieski, Jan, King of Poland 索别斯基,约翰,波兰国王 484
Social Gospel movement 社会福音运动 357, 376
Socialism 社会主义 357, 358
Society Islands 社会群岛 170
Society of Friends *see* Quakers 公谊会,*参见*:贵格会
Society of Jesus *see* Jesuits 耶稣会,*参见*:Jesuits
Socrates 苏格拉底 236, 237
Soka Gakkai 创价学会 478
Solidarity Movement 团结工会运动 *522*, 523, 525, 526
Solomon, King 所罗门,以色列王 212, 545
Solomon Islands 所罗门群岛 166

Solzhenitsyn, Alexander 索尔仁尼琴 531 – 532, 534
soma 苏摩(植物) 54
Soma 苏摩（印度教的酒神） 56
Son Buddhism 禅佛教 133, 450, 453, 454
see Zen Buddhism 参见：禅(Zen) 佛教
Soto Zen 曹洞禅 147, 148
South Africa 南非 407, 416, 418, 537 – 538
Spain 西班牙 468, 555, 559
Jews 西班牙犹太人 269 – 270, 271, 274
Muslims 西班牙穆斯林 296, 302 – 3, 335
Spenta Mainyu 斯班塔·曼纽 220
Spinoza, Barukh 斯宾诺莎 349 – 50
spirits, possession by 精灵附体 315
śramanas 沙门 53, 56 – 57, 63, 67, 73, 157
Sri Lanka (Ceylon) 斯里兰卡(锡兰) 44, 51, 397
Buddhism 佛教 13, 43, 45, 59, 60, *64*, 76 – 81, 160, 162, 422 – 423, *424*, 424 – 425
Tamils 泰米尔人 425, 430, 587
Śrī Vaisnavism 室利毗湿奴派 97 – 98
Srivijaya, kingdom of 室利佛逝帝国 159
Stalin, Joseph 斯大林 357, 361, 444, 522, *525*, 526, 528, 534
Star Carr, England 斯塔卡尔(地名，英国东北部) 38
Stoicism 斯多亚学派 230, 238
stūpas 窣堵波、塔 58, 77, 68, 82
Sudan 苏丹 307, 313, 319, 507, 538, 544
śūdras 首陀罗 50
Sufis/Sufism 苏非 / 苏非派，苏非主义 96, 163, 291, 292, 296, 297 – 298, 301, 303, 304 – 305, 486, 489, 490, 95, 499 – 500, 507, 545, 577, 578
Sukhāvatī school 乐土或净土学派 86
Sulawesi 苏拉威悉 159, 164, 503
Sumatra 苏门答腊 155, 159
Sumer/Sumerians 苏美尔 / 苏美尔人 52, 197, 199, 200
Sun Dance, Lakota 太阳舞，拉科塔人 *195*, 195 – 196
SunYat – sen 孙中山 *442*, 442 – 443
sunna 逊奈 298, 301, 485
Sunni Muslims 逊尼派穆斯林 296, 300, 301, 507
śūnyatā 空 58
Surinam 苏里南 566, 567
Surya 苏里耶神 55
Sūtrakrtāna《经造支》 70
sūtras 经 81 – 82
suttee 萨提、寡妇殉夫制 404 – 405
Suzuki, D.T. 铃木大拙 473, 483
Śvetambara 白衣派 69
Swahili culture 斯瓦希里文化 545
swastika, Buddhist 佛教中“万”字图

案 *110*
Sweat Lodge Ceremony, Lakota 蒸汽浴净礼,拉科塔人 194 - 195, 196
Switzerland 瑞士 333, 335
Sylvester, Pope 西尔维斯特,教皇 258
symbolic thinking 象征性思维 37 - 38
Syria 叙利亚 205, 206, *206*, 490, 491, 577
Syriac Churches 叙利亚教会 267

Ta'aroa (Tangaroa) 塔阿罗伊(坦伽罗伊) 168, 169 - 170, *170*
tabu [taboo] 塔布 167, 168, 169, 173
Tagore, Debendranath 泰戈尔,德宾得拉那特 406
Tahiti 塔希提岛 166, *171*, 508
Taiping 太平 109, 122
Taiping movement 太平天国运动 109, 436 - 439, *437*
Taiping Zhing《太平经》 122
Taiwan 台湾 449
  temples 寺庙 *123*, 532
Taixi (T'ai - hsi), abbot 太虚大师 441
T'aizhi (T'ai Chi) 太极 129
Talmud《塔木德》 254, 272
Tamils 泰米尔人 43, 425, 430, 587
  poetry 诗歌 97
Tanakh《塔纳克》 244
Tangaroa (Ta'aroa) 坦伽罗伊多/塔阿罗伊 168, 169 - 170, *170*
Tanjur, the 丹珠尔(西藏佛经) 94
Tannin 坦宁 205
Tantra 密典,密法,密教 48, 58, 86, 89, 93, 95, 102, 409
Tanzania (Tangany/ka) 坦桑尼亚 538, 546
Tao (Dao) 道 109, 110, 119, 131
Taoism *see* Daoism 道教
Tao - te Ching (*Daode Jing*)《道德经》 107, 116, 119
tapas 苦行 48, 69
tapu see tabu 参见塔布
Tārā 多罗 93 - 94
Tasmania 塔斯马尼亚岛 512
Tathagatas 如来佛 61, 79
Tegh Bahadur 得格·巴纳杜尔 398
Teitelbaum, Yo'el 泰特巴姆,约艾尔 393
television evangelism 电视福音布道 383, 384 - 385
temenos 神圣的区域 231
Temmu, Emperor of Japan 天武,日本天皇 139 - 140
Tempels, Father Placide 坦普尔,普拉塞德,神父 543 - 544, 549
Ten Commandments 十诫 211, 212, 213, 217, 247
Tendai 天台 137, 141, 142, 145, 150, 151, 152, 467
Tengri 腾格里 229
Tenochtitlán 特诺奇蒂兰特 186, 196

Tenrikyo 天理教 474 - 476, 477
Tenzin Gyatsho 丹增嘉措 429
Teotihuacán 特奥蒂瓦坎 186
Teresa of Avila, St. (阿维拉的)圣特雷莎/德肋撒 326, 345
Teresa, Mother 特雷莎修女,德肋撒修女 364
Tertullian 德尔图良 258
Tezcatlipoca 特斯卡特利波卡 188
Thailand 泰国 76, 80, 155, 160 - 161, *161*, *450*, 455, 456 - 459, 465, 466
Thales 泰勒斯 236
Thammayut 法宗派(泰语) 457
Themis 西弥斯 232
Theodosius, Emperor 狄奥多西,皇帝 256
Theos 神 231
theosis 神化 259, 265
Theosophists 神智学派、神智学者 416, 422, 423
Therapeutai, the 特拉普提 243
Theravāda Buddhism 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 59, 75 - 81, 82, 155, 156, 159 - 163, 425, 455
Thich Thien Minh 释天明 464
Thich Tri Quang 释智光 464
Thomas, St. 圣托马斯 102
Thomas Christians 托马斯的基督徒追随者 102, 428
Thor 托尔 283
Thoreau, Henry David 梭罗,亨利·大卫 371, 380
Thoth 图特 *204*
Tiahuanaco empire 蒂亚瓦纳科帝国 181
Tiamat 提阿玛忒 200, 201
Tibet 西藏 43, 45 - 46, 51, 59, 86, 91 - 95, *116*, 397, 428 - 429, 432, 441, 463
Tientai school 天台宗 125, 141
Tillich, Paul 蒂里希(田立克),保罗 391 - 392
Timur 帖木儿 228, 304
Tipu Sultan 提普苏丹 415
Tirthamkara 耆那教的祖师 69
Tishtrya 雨神提什特里亚 223
Titans 泰坦,提坦 232, 233, 235
Tláloc 特拉洛克 191
Tlingit, the: shaman's mask 特林基特人:萨满的面具 196
Togo 多哥 317
Tokuchika, Miki 御木,德近 477
Tokugawa Shogunate, Japan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 134, 151, 152, 468 - 469
Tokyo, Japan: 东京,日本:
  Meiji shrine 明治神宫 *480*, 481
  Zojo - ji temple 增长寺 *483*
Toledo, Council of 托莱多会议 262
Tolstoy, Leo 托尔斯泰,列夫 353, 416, 535
Toltec empire, Mexico 托尔特克帝国 181, 186, 191
Torah, the《妥拉》,圣经律法 18, 27, 28, 212, 216, 243, 244, 254 - 255, 270, 272, 272, 274
Tore 托利 313, 320

Tosefta, the 托塞夫塔 254
Totapuri 多塔布利 409
totemism 图腾崇拜 35, 41, 168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超觉/超验冥想 431
Transcendentalism 超验主义,超越主义,先验主义 371 – 372
Trent, Council of (1545) 特兰托会议(1545) 344, 560
Triads 三合会 437
Trickster, the 恶作剧精灵 170, 173
Trika (Triad) Śaivism 三位一体湿婆派 99
Trinity, doctrine of the 三一论/三位一体论 17, 19, *26*, 27, 258, 259, 261, 262, 265
Tripitaka, the 三藏 80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 531
Tryggvesson, Olaf 特里格维松 268
Tsevi, Shabbetai 茨维,萨巴塔伊 347
Tson – kha – pa 宗喀巴 94
Tsunesaburo, Makiguchi 常三郎,牧口 478
Tung Chung – shi (Dong Zhongshi) 董仲舒 121
Tunguz, the 通古斯人 529
Tunisia 突尼斯 494 – 495
Tunnan 图南 205
Tupac Amarus 图帕克·阿马鲁 563
Turkey 土耳其 577
see also: Ottoman Turks *参见*:奥斯曼土耳其
Turner, Bishop 特纳,主教 373
Tutu, Archbishop Desmond 图图大主教 364, 542, *543*
Twelve Tribes of Israel 以色列十二部落 212
Twelvers, the 十二伊玛目派 300
Tylor, Edward 泰勒,爱德华 35
Tzazulteotl *187*

Uganda 乌干达 545, 546
Ugarit, Syria 乌伽里特,叙利亚 205, 206
Uisang 义湘 132
Ukraine 乌克兰 347, 348, 352, 523, 528, 533
Ulama 乌勒玛 416, 495
Ulfilas 乌尔斐拉斯 262
'Umar 欧麦尔 295
'Umayyad dynasty 倭玛亚王朝 295, 296, 300
Umbanda religion 乌班达宗教 568
umma 乌玛,穆斯林公社,穆斯林社团 292
uMvelinqangi 乌姆威林宽吉 321
Unification Church 统一教会 386, 453 – 454, 581
Unitarian Universalist church 一位论派—普救派教会 387
Unitarianism 一位论 371, 395, 406
United States *see* America, North 合众国,*参见*:北美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世界黑人改进协会 569
"untouchables" 不可接触者 50, 91,

421，426
Upanishads《奥义书》 26，45，56，68，72–74，97，406，407，412
Īśa Upanisad《伊萨奥义书》 73，74，75
Urban II，Pope 乌尔班二世，教皇 *251*
'Uthman ibn 'Affan 奥斯曼，第三任哈里发 292，295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实利主义 405
Utnapishtim 乌特纳皮什提姆 202，205

Vairocana Buddha 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 93，140
Vaisnavas 毗湿奴派 72，89，97
Vaiśyas 吠舍(种姓) 50
Vajrayāna，the 金刚乘 59，92，92–93，94，102
Valerian，Emperor 瓦留良，皇帝 225
van Buren，Paul 冯·布伦，保罗 392
Vanuatu Island 瓦努阿图岛 166，508
Vardhamāna *see* Mahāvīra 筏驮摩那，*参见*：大雄
varnas 瓦尔那，肤色，种姓 50
Varuna 瓦鲁那(神) 55
Vasubandhu 世亲 85
Vatican Councils：梵蒂冈公会议 356
I 第一次
II 第二次 357，363，364，385，392，428，542，549，552，564，566，581
Vayu 伐由 223
Vedānta 吠檀多 89，426
Vedānta Society 吠檀多学会 410
Vedas/Vedic texts 吠陀经 26，47，53–54，63，68，73，88，407
Venezuela 委内瑞拉 556，562
Venus 维纳斯 238
Venus of Willendorf 维朗多尔夫的维纳斯 39
Vestal Virgin 维斯太贞女 239
Victorinus 维克托里努斯 *258*
Vientiane，Laos：temple 寮国永珍：寺庙 *162*
Vietnam 越南 108，155，156，158，163，449，455–456，460，462–465，464，535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383，385，386，392，395，455–456
Vijñānavāda school 唯识论、唯识派 85
Vikings 维京人 181，283–284
Viracocha 维拉科查 183
Viraśaiva 勇者湿婆派 98
Virgin of Guadalupe 瓜达贞佩的圣女 559，560，571
Vishtaspa，King 维什塔斯帕王 221
vision quests 视觉探索 15，195，196
Visnu 毗湿奴 *16*，46，48，56，72，*85*，88–89，*89*，97，99，*102*，105，413
Vivekānanda 维韦卡南达(意译：辨

弃） 27, 408, 410 – 413, 414, 415, 416, 417, 421, 430, 581
Vladimir, Prince of Kiev（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 269
Vogelherd cave, Württemberg 弗吉尔赫德洞穴，符腾堡 *37*
Voltaire 伏尔泰 345
Voodoo 伏都教 *556*, 568

Wahhab, Ibn 'Abd al – 伊本·阿卜德·瓦哈布 485
Wahhabi reform movement 瓦哈比改革运动 485 – 487, 488, 503
Walbiris, the 瓦尔比里人 179
Waleska, Lech 瓦莱斯卡 525
Wang Kon 王建 133
WangYangming 王阳明 130
Watts, Alan W. 瓦茨，艾仑·W 385 – 386
Weber, Max 韦伯，迈克斯· 333
Wesley, Charles 卫斯理，查理 370
Wesley, John 卫斯理，约翰 21, 370
Whitby, Synod of（664）惠特比会议（664 年） 268
White, Ellen Gould 怀特，爱伦·古尔德 377
Whitefield, George 怀特菲尔德，乔治 368
Whitney, Eli 惠特尼，伊莱 346
Williams, Roger 威廉斯，罗杰 366, 367
Winti 风 567
Wise, Rabbi Isaac 怀斯，以撒，拉比 375
witchcraft 魔法 169
Witchdoctors 巫医 168
women's movement 妇女运动，女权运动 387 – 388, 392, 394, 396, 586
Wonhyo 元晓 132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363, 547, 581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s（1893）世界宗教大会（1893） 410

Xavier, St. Francis 沙勿略，圣弗朗西斯 135, 145, 150, 467
xin 心 114
Xipe Totec 希佩·托特克 191
Xiuhtecuhtli 齐乌蒂丘特利 188
Xunzi（Hstin – tzu）荀子 114 – 115, 116

Yahweh 雅赫维 / 雅威 210, 211, 215
yājña 祭祀 75
Yamabushi 禁欲者，苦行修道者 150
Yamato, Japanese emperors 大和，日本天皇 136 – 137
Yamm 雅姆 205
Yang *see* Yin andYang 阳，*参见*：阴与阳
Yangzi（Yang Hsi）杨羲 123
yasasna 火祆祈祷 219
Yaxchilan, Guatemala: relief 雅克钦兰，危地马拉：浮雕 *185*

yazata 雅扎塔　223
Yazatas 雅扎塔众神　219
Yehoshu'a *see* Jesus 约书亚，*参见*：耶稣
Yellow Turbans 黄巾起义　122, 436
Yemen, South 南也门　489
Yggdrasil 乾坤树　284
YHVH (Yahweh) 雅赫维 / 亚卫　210, 211, 215
Yi T'oegye 李退溪　133
Yi Yulgok 李栗谷　133
Yin and Yang 阴阳　109, *110*, 111, *118*, 121, 131
yoga 瑜伽　40, 41, 46, 48, 63, 64, 74, 75, 87, 102, 422
Yohanan *see* John the Baptist 约翰，*参见*：施洗约翰
Yoruba, the 约鲁巴人　*311*, 315, 316, 317 - 319, 322, 541, 567, 568
Young Turks 青年土耳其党人　489
Young, Brigham 杨伯翰　*371*, 372
Younghusband, General Francis 扬哈斯本，弗朗西斯，詹姆斯·拉夫洛克将军　428
Yuan Shikai 袁世凯　442
Yuejing (*Yueh Ching*)《乐经》　112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522, 523, 526, 533
Yuhuang Shangdi 玉皇上帝　128

Zaire *see* Congo, Democratic 扎伊尔，*参见*：民主刚果
zakat 济贫税　292
Zambia: the Lumpas 赞比亚朗帕斯教会　550, 550 - 551
Zarathustra 琐罗亚斯德　219 - 220, 224, 226
  see Zoroastrianism *参见*：琐罗亚斯德教，袄教
Zealots 奋锐党人　243
zen 禅　137
Zen Buddhism 禅宗　*18*, 119, 135 - 136, 138 - 140, *139*, 142, 147 - 152, 450, 469
  see also: Son Buddhism *参见*：禅佛教
Zeno of Citium (季蒂昂的)芝诺　238
Zeus 宙斯　2, 231 - 232, 233, 234, 235, 239
Zhang Dao - ling 张道陵　108, 121
Zhanglu (Chang Lu) 张鲁　122
Zhii (Chih - i) 智顗　125
Zhuangzi (Chuang - tzu) 庄子　108, 120
  Book of Zhuangzi《庄子》　107, *116*, *119*, 120
Zhuxi (Chu Hsi) 朱熹　129 - 130
Zia ul - Haq 齐亚·哈克　499
ziggurats 塔庙　201
Zimbabwe 津巴布韦　15, 307, 537
Zinzendorf, Count 亲岑道夫　370
Zionism 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350, 351, 362, 376, 393, 491 - 492, 549
  Zulu 祖鲁　321
Zoroastrianism 琐罗亚斯德教，袄教　102, 108, 132, 218, 219 - 223,

224 – 226, 228, 427
Zulus 祖鲁人　321 – 322, 537, 538, 545, 549
Zurvān 佐尔文　219
Zurvanism 琐罗亚斯德教佐尔文派　218, 219, 224, 225

译、校、审后记

一本《世界宗教》出自一个人之手，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为纷繁多样的"世界宗教"实在浩如烟海。然而，由于这个人是被誉为"宗教研究之父"的天才宗教学家尼尼安·斯马特，这个奇迹也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不过，如果这本《世界宗教》译自一个人之手，其结果很可能会毁掉这个奇迹。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尼尼安·斯马特第二！因此，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世界宗教》，是多人的合作，绝大部分译者几乎可以说都是自己所译部分的专才。

我曾经决定不参与任何学术方面的合作项目，理由很简单：人多步调难免不一，不如自己一人天马行空。然而，我们这次的合作可以说是成功和愉快的，理由也很简单：专才专用，能够保证译文的基本质量；词汇总表和索引每人分担，虽然有许多重复劳动，但却保证了这本内容涉及面广而杂且图文并茂的巨著，能够通过多人合作而达到术语、人名、地名等基本统一。当然，我一人校审如此巨著也是相当困难的，不仅由于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语言能力的有限，也由于时间的限制——从找译者开始，我只有七个月的时间。正因为如此，书中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只能恳求读者原谅。

任何成果后面自然都有着无数的辛劳。书稿完成之后，被我透支的身体开始报复，血压高持续了一个月，心率不齐，早搏成串……就是在这种时候，我才又体会到了合作的重要性。为此，我要特别感谢参与这次翻译的所有人员：许列民（第 1 章、第 15 章、大事年表）、朱明忠、葛维钧、刘建（第 2 章、第 16 章）、单纯（第 3 章、第 17 章）、杨海涛（第 4 章、第 19 章）、德远（第 5 章、第 18 章）、金泽（第 6—7 章、第 13 章、第 21 章、第 23—24 章）、唐均（第 8—9 章）、瞿旭彤（第 10—11 章、第 14 章、第 22 章）、王宇洁（第 12 章、第 20 章）。我自己只译了第二版前言、导言和第 25 章的部分。另一部分是我的女儿何可人所译。可人已不是第一次替母捉刀，我常常是在有意识地锻炼

她，使她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也学会分担。当然，逐字逐句地为她校对也是她的这种分担带来的另一种付出吧。我要说，没有所有译者的尽心尽力，此书不可能如期交稿，更谈不上早日与读者见面。

高师宁
2003年11月于北京